

目录

[理想國譯叢序 9](#_Toc55746046)

[獻詞 10](#_Toc55746047)

[薩森訪談會的主要參與者 11](#_Toc55746048)

[阿道夫·艾希曼的家人 11](#_Toc55746049)

[協助艾希曼躲避法律制裁及逃往阿根廷的人士 11](#_Toc55746050)

[杜勒出版社的圈內人以及阿根廷的其他相關納粹分子 12](#_Toc55746051)

[參與追緝、逮捕和審判艾希曼的人士 13](#_Toc55746052)

[其他 13](#_Toc55746053)

[導言 16](#_Toc55746054)

[第一章 “我的名字成了象征” 23](#_Toc55746055)

[第一節 走向公眾之路 24](#_Toc55746056)

[一個精英單位的自我形象建構 25](#_Toc55746057)

[小總理 25](#_Toc55746058)

[猶太人的沙皇 27](#_Toc55746059)

[一個重要人物 29](#_Toc55746060)

[敗中取勝的招數 31](#_Toc55746061)

[完美的希伯來專家 32](#_Toc55746062)

[理想的象征符號 34](#_Toc55746063)

[公關活動 35](#_Toc55746064)

[窮兇極惡的引誘者 36](#_Toc55746065)

[好的新聞，壞的新聞 38](#_Toc55746066)

[“我曾在這里，而且無所不在” 40](#_Toc55746067)

[大穆夫提的朋友 41](#_Toc55746068)

[那個瘋子 44](#_Toc55746069)

[戰爭罪犯第14號……第9號……第1號 46](#_Toc55746070)

[第二節 一個名字在戰后的事業生涯 49](#_Toc55746071)

[“我會笑著跳進坑里……” 50](#_Toc55746072)

[精心策劃的逃跑計劃 51](#_Toc55746073)

[紐倫堡的幽靈 52](#_Toc55746074)

[第三節 討厭的隱姓埋名狀態 56](#_Toc55746075)

[“北方要塞” 57](#_Toc55746076)

[家庭聯系 58](#_Toc55746077)

[艾希曼的猶豫不決 59](#_Toc55746078)

[探訪家人？ 61](#_Toc55746079)

[有條不紊的脫逃行動 63](#_Toc55746080)

[自求多福的旅人 66](#_Toc55746081)

[第二章 間奏曲：在中東的虛假蹤跡 89](#_Toc55746082)

[第三章 艾希曼在阿根廷 94](#_Toc55746083)

[第一節 在“應許之地”過生活 95](#_Toc55746084)

[里卡多叔叔的圣誕賀卡 97](#_Toc55746085)

[休戚與共 102](#_Toc55746086)

[第二節 國內戰線 106](#_Toc55746087)

[德國-阿根廷關系 109](#_Toc55746088)

[艾希曼被雙手奉上 111](#_Toc55746089)

[第三節 友情相助 116](#_Toc55746090)

[不同的頭條標題 120](#_Toc55746091)

[納粹的黃金 121](#_Toc55746092)

[再度成為專家 121](#_Toc55746093)

[人生的勝利 124](#_Toc55746094)

[一群失落者在失落的崗位上 128](#_Toc55746095)

[第四章 所謂的薩森訪談 149](#_Toc55746096)

[第一節 作者艾希曼 153](#_Toc55746097)

[“阿根廷文稿” 155](#_Toc55746098)

[“開潛艇的匿名流浪者” 156](#_Toc55746099)

[《其他人都講過了，現在我想說話！》[54] 158](#_Toc55746100)

[圓融的歷史 159](#_Toc55746101)

[給聯邦總理的一封公開信 162](#_Toc55746102)

[那么道德呢？ 163](#_Toc55746103)

[老罪犯與新戰士 168](#_Toc55746104)

[自圓其說與樂在煽動 170](#_Toc55746105)

[第二節 談話中的艾希曼 172](#_Toc55746106)

[簽約各方 172](#_Toc55746107)

[出版商：埃伯哈德·弗里奇 172](#_Toc55746108)

[“合著者”：威廉·薩森 174](#_Toc55746109)

[薩森訪談會 176](#_Toc55746110)

[確定時間與門外漢的優勢 177](#_Toc55746111)

[一個社交事件 179](#_Toc55746112)

[女性來賓 181](#_Toc55746113)

[不知名的助手：朗格爾博士 184](#_Toc55746114)

[武器：言語暴力 186](#_Toc55746115)

[敵人：書籍 189](#_Toc55746116)

[認知：滅絕 193](#_Toc55746117)

[背信棄義 195](#_Toc55746118)

[“600萬人的謊言” 201](#_Toc55746119)

[不合時宜的結束語 205](#_Toc55746120)

[沒有結論的結束 207](#_Toc55746121)

[第五章 虛假的安全感 229](#_Toc55746122)

[舉報人洛塔爾·赫爾曼 230](#_Toc55746123)

[回德國去？ 232](#_Toc55746124)

[博爾曼在阿根廷 237](#_Toc55746125)

[“避開艾希曼！” 238](#_Toc55746126)

[弗里茨·鮑爾的消息來源 239](#_Toc55746127)

[艾希曼在科威特 241](#_Toc55746128)

[我沒有同志 245](#_Toc55746129)

[第六章 角色的轉換：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261](#_Toc55746130)

[第七章 余波蕩漾 264](#_Toc55746131)

[薩森的資料 264](#_Toc55746132)

[出售 265](#_Toc55746133)

[艾希曼與阿根廷的舊包袱 266](#_Toc55746134)

[艾希曼的文稿成為搖錢樹 267](#_Toc55746135)

[《生活》雜志及其后果 269](#_Toc55746136)

[尋求懺悔 271](#_Toc55746137)

[安全漏洞 272](#_Toc55746138)

[以色列的副本 273](#_Toc55746139)

[被湮滅的證據 275](#_Toc55746140)

[“阿根廷文稿”的評估與舊材料 277](#_Toc55746141)

[艾希曼之后 278](#_Toc55746142)

[消失的錄音帶 279](#_Toc55746143)

[重新發現 281](#_Toc55746144)

[附記：BND檔案，抑或艾希曼的第四項事業 283](#_Toc55746145)

[言猶未盡 287](#_Toc55746146)

[縮略語 299](#_Toc55746147)

[致謝 301](#_Toc55746148)

[出處說明 303](#_Toc55746149)

[參考文獻 310](#_Toc55746150)





[德]貝蒂娜·施湯內特　著

周全　譯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殺劊子手

北京日報出版社

Eichmann vor Jerusalem: Das unbehelligte Leben eines Massenmörders  
 by Bettina Stangneth  
 Copyright © by Arche Literatur Verlag AG, Zürich-Hamburg, 2011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出版外國圖書合同登記號：01-2020-1152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殺劊子手 /（德）貝蒂娜·施湯內特著；周全譯. ——北京：北京日報出版社，2020.4

ISBN 978-7-5477-3600-5

Ⅰ.①耶… Ⅱ.①貝… ②周… Ⅲ.①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料 Ⅳ.①K15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20)第038453號

責任編輯：許慶元

特邀編輯：劉廣宇

裝幀設計：陸智昌

內文制作：陳基勝

出版發行：北京日報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東城區東單三條8-16號東方廣場東配樓四層

網　　址：http://www.scpph.com

郵　　編：100005

電　　話：發行部：（010）65255876

總編室：（010）65252135

印　　刷：山東臨沂新華印刷物流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經　　銷：各地新華書店

版　　次：2020年4月第1版

2020年4月第1次印刷

開　　本：965毫米×635毫米 1/16

印　　張：42

字　　數：510千字

定　　價：115.00元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系調換

# 理想國譯叢序

“如果沒有翻譯，”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曾寫道，“我們無異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語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應說：“翻譯不僅僅是言詞之事，它讓整個文化變得可以理解。”

這兩句話或許比任何復雜的闡述都更清晰地定義了理想國譯叢的初衷。

自從嚴復與林琴南締造中國近代翻譯傳統以來，譯介就被兩種趨勢支配。

它是開放的，中國必須向外部學習；它又有某種封閉性，被一種強烈的功利主義所影響。嚴復期望赫伯特·斯賓塞、孟德斯鳩的思想能幫助中國獲得富強之道，林琴南則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變國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與故事，必須以我們期待的視角來呈現。

在很大程度上，這套譯叢仍延續著這個傳統。此刻的中國與一個世紀前不同，但她仍面臨諸多嶄新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他人的經驗來幫助我們應對難題，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是面對復雜與高速變化的時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保持一種非功利的興趣：對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本身充滿興趣，真誠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經驗。

理想國譯叢主編

梁文道 劉瑜 熊培云 許知遠

# 獻詞

獻給迪特爾，我暗夜之旅的指引星。

書中主要人物  
 （以下介紹譯自本書英譯本）

以下是一些比較不知名，但在戰后與阿道夫·艾希曼（呂訥堡石楠草原[Lüneberg Heath]的“奧托·黑寧格”[Otto Heninger]，以及阿根廷的“里卡多·克萊門特”[Ricardo Klement]）有所關聯的人士。

### 薩森訪談會的主要參與者

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Ludolf von Alvensleben）：希姆萊的首席副官、黨衛隊高級官員和警察領導人，是戰后藏匿于阿根廷境內的最高階納粹分子。

埃伯哈德·弗里奇（Eberhard Fritsch）：1946年后擔任“杜勒出版社”（Dürer Verlag）的負責人，發行納粹刊物并擁有自己的書店，以之作為納粹在阿根廷的活動中心。弗里奇還是戰后最激進的納粹刊物《路徑》（Der Weg-El Sendero）的出版商。

朗格爾博士（Dr. Langer）：來自維也納的前納粹黨衛隊高官和薩森訪談會的固定成員，其余細節不詳。

威廉·薩森（Willem Sassen）：荷蘭籍的納粹同路人與昔日武裝黨衛隊戰地記者團的成員。戰后成為政論宣傳家、記者、作家和阿根廷納粹流亡者的捉刀代筆人，同時還是艾希曼訪談工作的組織者和東道主。

### 阿道夫·艾希曼的家人

霍斯特·阿道夫·艾希曼；迪特爾·赫爾穆特·艾希曼；里卡多·弗朗西斯科·艾希曼（Horst Adolf Eichmann; Dieter Helmut Eichmann; Ricardo Francisco Eichmann）：阿道夫·艾希曼夫婦的二子、三子和四子。

卡爾·阿道夫·艾希曼（Karl Adolf Eichmann）：阿道夫·艾希曼的父親。

克勞斯·艾希曼（Klaus Eichmann）：阿道夫·艾希曼夫婦的長子。

奧托·艾希曼（Otto Eichmann）：阿道夫·艾希曼的弟弟，與羅伯特一同組織和支援艾希曼審判案的辯護工作。

羅伯特·艾希曼（Robert Eichmann）：阿道夫·艾希曼同父異母的弟弟，律師，曾于1960-1962年間組織和支援其兄的審判辯護工作。大部分的“阿根廷文稿”即竊取自其辦公室。

薇拉·艾希曼（Vera Eichmann）：阿道夫·艾希曼的妻子，在戰后使用其婚前姓氏——利布爾（Liebl）。

### 協助艾希曼躲避法律制裁及逃往阿根廷的人士

漢斯·弗賴斯萊本（Hans Freiesleben）：在呂訥堡石楠草原為艾希曼安排藏身之處的黨衛隊成員。

奧爾斯特·卡洛斯·福爾德納（Horst Carlos Fuldner）：定居阿根廷的黨衛隊成員，曾在阿根廷總統胡安·庇隆（Juan Perón）的默許下協助納粹戰犯逃亡。

阿洛伊斯·胡達爾主教（Bishop Alois Hudal）：梵蒂岡的奧地利籍羅馬天主教主教和希特勒的同情者。戰后協助包括艾希曼在內的納粹逃犯偽造身份證件。

內莉·克拉維茨（Nelly Krawietz）：黨衛隊隊員庫爾特·鮑爾（Kurt Bauer）的姐妹，曾協助從戰俘營脫逃的艾希曼找到棲身之處，后來在艾希曼躲藏在呂訥堡石楠草原時曾前往探望。

赫伯特·庫爾曼（Herbert Kuhlmann），化名為佩德羅·蓋勒（Pedro Geller）：與艾希曼同船前往阿根廷的前武裝黨衛隊裝甲部隊軍官、“卡普里”（CAPRI）公司的員工，以及1953年艾希曼在查卡布科（chacabuco）街公寓的擔保人。

路易斯（阿洛伊斯）·辛特霍爾策（Luis [Alois] Schintlholzer）：協助艾希曼逃離德國的前奧地利黨衛隊官員，曾參與因斯布魯克（Innsbruck）1938年迫害猶太人的行動，并在意大利犯下戰爭罪行。

### 杜勒出版社的圈內人以及阿根廷的其他相關納粹分子

赫伯特·哈格爾（Herbert Hagel）：黨衛隊成員，昔日納粹黨林茨省黨部領導人的秘書，“卡普里”公司的員工。

貝特霍爾德·海利希（Berthold Heilig）：昔日納粹黨布倫瑞克（Brunswick）省黨部的領導人，在圖庫曼（Tucumán）為“卡普里”公司工作。

卡爾·克林根富斯（Karl Klingenfuß）：曾任職于納粹德國外交部的“猶太人事務處”，1967年以前的德國阿根廷商會負責人。

萊因哈德·科普斯（Reinhard Kopps），化名為胡安·馬勒（Juan Maler）：多產的作家、狂熱的納粹分子和薩森的對手，曾在《路徑》雜志的早期階段為杜勒出版社工作。

約翰·馮·萊斯（Johann von Leers）：昔日黨衛隊官員和納粹德國宣傳部的高級理論家，1950-1954年藏匿于阿根廷，并為《路徑》雜志撰稿。

迪特爾·門格（Dieter Menge）：前黨衛隊隊員和德國空軍飛行員，阿根廷廢金屬業大亨，薩森的贊助者。

康斯坦丁·馮·諾伊拉特（Constantin von Neurath）：納粹德國前任外長的兒子，與魯德爾等人共同創辦“同志工作會”向納粹逃犯提供法律協助和急難救濟，1958-1965年任西門子阿根廷分公司負責人。

威爾弗雷德·馮·奧芬（Wilfred von Oven）：記者，納粹德國宣傳部部長戈培爾（Goebbels）旗下的新聞處處長。其《與戈培爾直到最后》（Mit Goebbels bis Zum Ende）一書曾交由杜勒出版社發行。

弗朗茨·威廉·普法伊費爾（Franz Wilhelm Pfeiffer）：國防軍上校和傳說中納粹黃金的運送者、薩森和魯德爾的朋友，并擁有艾希曼在華金-戈里納（Joaquín Gorina）負責管理的養兔場。

佩德羅·波比耶辛（Pedro Pobierzym）：波蘭裔的納粹德國國防軍士兵，在阿根廷與包括迪特爾·門格和威廉·薩森在內的納粹人士有生意往來。

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Hans-Ulrich Rudel）：德國空軍轟炸機飛行員，希特勒旗下的最高級騎士十字勛章獲頒者，戰后與諾伊拉特成立“同志工作會”，為納粹分子提供法律上和財務上的協助。魯德爾是弗里奇的朋友和薩森的仰慕者，薩森則曾捉刀幫他寫書交由杜勒出版社發行。

約瑟夫·施萬伯格（Josef Schwammberger）：黨衛隊成員和1942-1944年的克拉科夫猶太人隔離區指揮官，戰后受雇于西門子阿根廷分公司。

迪特爾·福爾默（Dieter Vollmer）：弗里奇的親密同事，曾為《路徑》雜志工作，1954年返回德國后仍與杜勒出版社密切合作。

約瑟夫·弗特爾（Josef Vötterl）：昔日“特別行動隊D支隊10A行動分隊”（Einsatzkommando 10A der Einsatzgruppe D）那個犯罪團伙的成員。潛逃布宜諾斯艾利斯之后，在1955年回到西德（聯邦德國）并任職于聯邦憲法保衛局（Bundesamt für Verfassungsschutz, BfV），1958年重返阿根廷。

### 參與追緝、逮捕和審判艾希曼的人士

茲維·阿哈羅尼（Zvi Aharoni）：德國猶太裔的以色列摩薩德特工，找到了艾希曼在阿根廷的地址，并且查明“里卡多·克萊門特”就是艾希曼。

弗里茨·鮑爾（Fritz Bauer）：1956-1968年的黑森州總檢察長，以及納粹戰犯的追捕者。鮑爾于確定艾希曼在阿根廷的行蹤后，將消息提供給了以色列有關當局。

托維阿·弗里德曼（Tuviah Friedman）：全家遇害的大屠殺幸存者、納粹獵人，海法猶太文獻中心的創辦人。

弗朗索瓦·熱努（François Genoud）：瑞士金融家、希特勒的崇拜者和堅定的納粹分子，曾借由銷售馬丁·博爾曼（Martin Bormann）和約瑟夫·戈培爾等納粹人士的遺作而獲取利益。熱努最后參與了銷售艾希曼文稿以牟利的行動，并且資助了艾希曼的法庭辯護費用。

伊塞爾·哈雷爾（Isser Harel）：1952-1963年的摩薩德首腦，曾針對艾希曼被逮捕一事撰寫了一些具有爭議性的書籍。

吉德翁·豪斯納（Gideon Hausner）：1960-1963年的以色列總檢察長，主導了艾希曼審判案。

洛塔爾·赫爾曼（Lothar Hermann）：家人死于大屠殺的達豪集中營幸存者，起先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而后在蘇亞雷斯上校鎮（Coronel Suarez）的德國猶太人社區擔任法律顧問。曾向弗里茨·鮑爾等人通報艾希曼正藏身阿根廷。

阿夫納·W.萊斯（Avner W. Less）：出生在德國的猶太裔以色列警方總督察，于艾希曼被捕后負責對他進行審訊。

海因里希·馬斯特（Heinrich Mast）：德國與美國的情報員，與霍特爾過從甚密，據說曾在1953年向維森塔爾透露艾希曼在阿根廷。

羅伯特·塞爾瓦蒂烏斯（Robert Servatius）：曾在紐倫堡審判中為納粹辯護的德國律師，后來在以色列擔任艾希曼的辯護律師。

瓦倫丁·塔拉（Valentin Tarra）：于艾希曼藏匿期間負責在阿爾陶塞（Altaussee）地區監視艾希曼家人的奧地利警官。

西蒙·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大屠殺的幸存者，戰后成為最著名的納粹獵人。維森塔爾找到了第一張艾希曼的照片，并曾極力阻止艾希曼家庭宣布艾希曼死亡的企圖。

### 其他

托馬斯·哈蘭（Thomas Harlan）：臭名昭著的反猶太電影導演法伊特·哈蘭（Veit Harlan）的兒子、致力于揭露納粹戰爭罪行的作家，以及弗里茨·鮑爾的朋友。1961年在波蘭《政治周刊》（Polityka）公開了一篇“阿根廷文稿”中的文字。

威廉·霍特爾（Wilhelm Höttl）：奧地利籍的黨衛隊成員；戰后成為紐倫堡審判中的控方證人，曾經引述艾希曼有關600萬名大屠殺受害者的說法。霍特爾后來成為“情報”特工，向各國情報機構、新聞媒體和歷史學家兜售了許多虛假信息。

魯道夫（賴熱）·卡斯特納（Rudolf [Rezsö] Kasztner）：奧匈帝國出生的猶太人，布達佩斯“救濟與救援委員會”的執行副總裁，1944年配合約埃爾·布蘭德（Joel Brand）與艾希曼協商“用貨物換鮮血”，試圖借此拯救匈牙利猶太人。戰后被錯誤指控與納粹合作，1957年在以色列遭到刺殺。

赫爾曼·朗拜因（Hermann Langbein）：集中營幸存者、國際奧斯維辛委員會在維也納的第一總書記。1959年時曾在奧地利對艾希曼提出刑事控訴。1961年取得“阿根廷文稿”的最完整版本并加以傳播。

亨利·奧蒙德（Henry Ormond）：達豪集中營的幸存者、納粹受害者的律師、鮑爾和哈蘭的朋友。曾在1961年協助公布“阿根廷文稿”。

丹尼爾·帕森特（Daniel Passent）：波蘭《政治周刊》的編輯，在1961年根據朗拜因的“阿根廷文稿”版本發表了五篇系列文章，并由哈蘭和他自己加以評注。

米奇斯瓦夫·F.拉科夫斯基（Mieczysław F. Rakowski）：波蘭《政治周刊》主編，驗證了“阿根廷文稿”的真實性。

密普·薩森（Miep Sassen）：威廉·薩森的第二任妻子。

薩斯基雅·薩森（Saskia Sassen）：威廉和密普的女兒，著名的美國社會學家。

英格·施奈德（Inge Schneider）：薩森一家的朋友，他們全家乘船逃離歐洲時的船長女兒。

迪特爾·維斯利策尼（Dieter Wisliceny）：黨衛隊成員、艾希曼的好友和助手，戰后成為紐倫堡審判的控方證人。他為了自保而把罪責全部推給艾希曼，但仍難逃1948年在布拉迪斯拉發（Bratislava）出庭受審并被判處絞刑。維斯利策尼的紐倫堡證詞有助于在1961年將艾希曼定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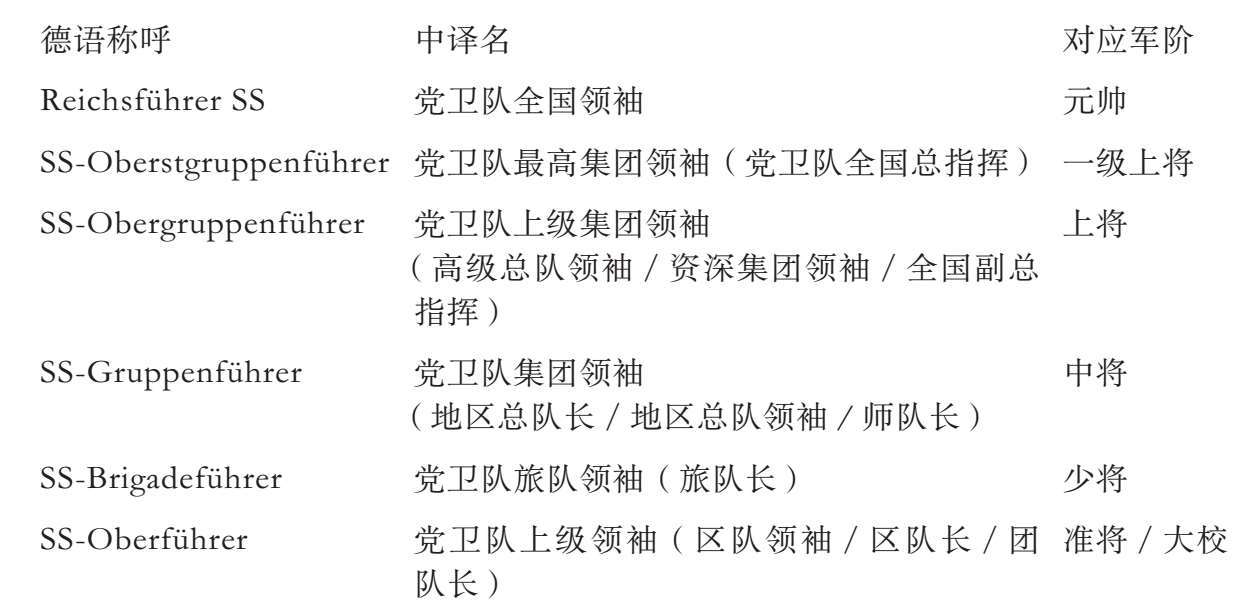
納粹黨衛隊職階名稱  
 （以下對照表由譯者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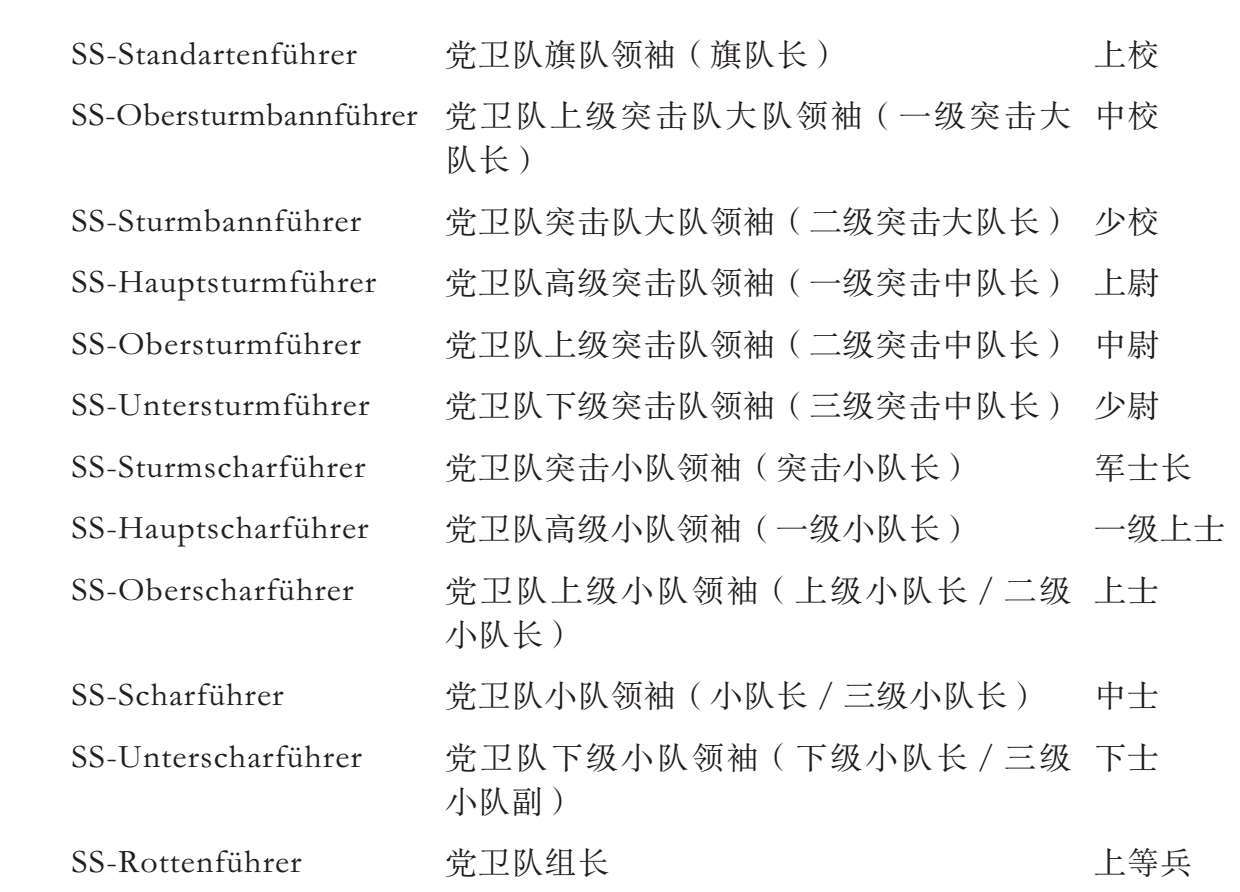
“黨衛軍”一詞往往使用得不很精確。其實納粹的“黨衛隊”（Schutzstaffel）可略分為二：

一般黨衛隊（Allgemeine SS）：非軍職的保安／警察人員。

武裝黨衛隊（Waffen-SS）：作戰部隊。

后者才是真正的黨衛軍。本書主角“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艾希曼則來自前者（不上戰場的黨衛隊），在開戰后隸屬于帝國保安總局第四局（秘密警察局，即“蓋世太保”）。





# 導言

這些事情讓我一直不怎么摸得著頭緒。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_1_1)

若是談論起那場系統化殺害了數百萬男性、女性和兒童的屠殺，任誰都無法不提及此人。然而，人們甚至都不確定他的名字：到底叫“卡爾·阿道夫”還是“奧托”？在我們自認為早已查清此人時，一些再簡單不過的問題卻仍然讓我們驚訝。但是就多年來一直被學術界和新聞界熱烈探討的這位先生而言，我們對他的認知果真還存在如此巨大的缺漏嗎？畢竟阿道夫·艾希曼的名氣，甚至讓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或者萊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等知名人物都瞠乎其后。既然如此，何必還要另外寫一本書呢？但這其實是一個相當簡單的問題：我想要探究清楚，究竟有誰在“摩薩德”（Mossad）[\*](#_11)采取其著名行動，把艾希曼從阿根廷綁架到以色列出庭受審之前就已經認識他了。

艾希曼在以色列回答得輕描淡寫：“我在1946年以前幾乎沒有知名度，直到那位霍特爾博士（Dr. Hoettl）[\*](#_12)……給我加上惡名，說我是謀殺了五六百萬猶太人的兇手。”[[2]](#_2_2)任何人都不應因為被控有罪者講出這種話而感到吃驚——更何況是這樣一名被告。畢竟艾希曼曾經有過一句名言，聲稱自己“只不過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毀滅機器上的一顆小齒輪罷了”。然而著實令人詫異的是，各種關于艾希曼的研究文獻直到今天依舊乖乖地附和那種論調。盡管這名大屠殺兇手已在其他方面引起了巨大爭議，但每個人都還異口同聲地認為：在耶路撒冷審判之前，只有一小撮人熟悉“艾希曼”這個名字。[[3]](#_3_1)

然而在閱讀舊報紙的時候我卻開始產生懷疑，覺得無論艾希曼的講述還是相關研究都有不對勁之處。以色列總理大衛·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在1960年5月23日公開了一則震驚世界的消息，宣布已經逮捕阿道夫·艾希曼，并且將把他送上法庭接受審判。接踵而至的并非困惑的沉默，而是許許多多充滿細節的長篇大論，描述那名據稱沒幾個人認得的男子。瀏覽更加老舊的出版物，我的懷疑得到了明確的證實。早在審判開始很久以前，那個看似“默默無聞”的人就已經獲得了比絕大多數納粹分子都多的綽號，諸如“卡利古拉”（Caligula）[†](#_13)、“猶太人的沙皇”（Zar der Juden）、“種族謀殺的經理人”（Manager des Völkermords）、“大審判官”（Großinquisitor）、“猶太人大屠殺的技術師”（Techniker des Judenmords）、“最終解決者”（der Endlöser）、“官僚者”（Bürokrat），以及“大屠殺兇手”（Massenmörder）等等。以上都是人們在1939-1960年間即已給艾希曼貼上的標簽。那可不是后見之明，反而早就散見于各種報刊、小冊子和書籍當中。我們只需要查閱一下，便能得知人們在什么時候對阿道夫·艾希曼知曉了多少，以及如何評價。在此期間，只有一小群人異口同聲地唱反調，表示對他一無所知。這些人都是艾希曼昔日的同僚和戰后的納粹分子，不顧一切只想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既然這樣的話，又衍生出另外的問題：相關的知識為什么就湮沒無聞了呢？回過頭來看，那個人怎么有辦法讓自己在眾目睽睽之下突然銷聲匿跡的呢？這些問題的答案都直指那個史無前例的“反人類罪行”（Menschheitsverbrechen）——我們亦可稱之為“大屠殺”（Holocaust）、“浩劫”（Shoah），或者“滅絕猶太人”（Judenvernichtung）。

我們總喜歡把犯罪分子想象成一群見不得人的家伙，由于害怕公眾的評斷而偷偷摸摸干下他們的勾當。等到東窗事發之后，我們又總是以為公眾會有一致的反應，本能地排斥那些罪犯，并將他們繩之以法。于是最初有人設法探究歐洲猶太人如何被剝奪權利、遭到驅逐和屠殺的時候，人們依舊完全按照上述刻板印象，認為是一批見不得天日的家伙瞞著“民族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為非作歹。可是相關研究工作早已擺脫此種見解，不再認為那批肇事者僅僅是置身正派百姓當中的一小撮既病態又反社會的怪胎，假如百姓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的話，必定會群起而大加撻伐。我們如今已對國家社會主義“世界觀”（Weltanschauung）所起的作用、對集體行為的互動，以及對極權制度的后果頗有所知。我們已經了解，暴戾的氛圍甚至可以對本無殘暴傾向的人產生影響；此外我們亦已探明，勞動分工能夠對個人責任感造成多么災難性的影響。盡管如此，人們在一個問題上依然爭論不下：我們究竟應該把艾希曼這樣的兇手歸類到何處，要怎么看待他呢？艾希曼所呈現出來的面貌因敘述者而異：他或者是一個完全正常的人，卻在極權主義之下被調教成缺乏主見的謀殺犯；或者是一名執迷于種族滅絕的偏激反猶太主義者；要不然根本就是一名精神病患，那個政權不過是遮掩其虐待狂本質的幌子罷了。于是關于艾希曼我們有了各種南轅北轍的形象，而且由于圍繞漢娜·阿倫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于平庸的惡的報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的論戰，那些形象被激化得更加水火不容。然而迄今為止，有一個視角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忽略——公眾的看法。人們沒有把目光投向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現象”。也就是說，未曾針對艾希曼在人生不同階段所呈現的形象進行考察。

盧梭告訴我們，任何導致不公不義的主張總會涉及兩種人：提出主張的人，以及其他聽信了他的人。[[4]](#_4_2)我們只要看看公眾對阿道夫·艾希曼的看法，便能很大程度上了解這種獨特的共謀所蘊含的巨大危險——尤其是當有人像那個聲名狼藉的“猶太事務主管”（Judenreferent）一般，已經徹底參透了這種共謀關系的時候。因此，本書既不按照年代順序把艾希曼的故事描寫成他的犯罪經過，也不講成他的罪行發展史，而是要重建他這個人所造成的影響：在何時且有誰認得艾希曼？人們在什么時候對他有過怎樣的看法，而他又對人們所知、所想的事情做出了何種反應？艾希曼現象多大程度上是他裝腔作勢的天賦塑造的？這種角色扮演對他兇殘的職業生涯，以及對我們如今理解他的故事有什么幫助？

\*\*\*

今天我們之所以能夠重建這個視角，要歸功于極為豐富的第一手資料：現存有關艾希曼的文件、證詞和目擊者報告多過其他任何一名納粹領導人，甚至連希特勒或戈培爾也沒能制造出更多材料。原因不僅在于艾希曼在戰后又多活了17年，也不只是因為以色列警方為審判收集證據所付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反而是由于艾希曼自己的夸夸其談和寫作激情。艾希曼在其生命的每一個階段，都為每一個新觀眾和每一個新目的重新塑造一個新的形象。無論身為下屬、上司、兇手、逃犯、流亡者，還是被起訴者，艾希曼都隨時密切關注自己所產生的影響，試圖利用每一種境況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我們若比較他所扮演過的各種角色，很快即可看出其行為背后的方法。

然而，艾希曼真正為人所知并得到詳細描述的角色，卻只有他在耶路撒冷登場的那一次。其背后的意圖顯而易見：他打算保住一命，并為自己的行為辯解。如果想要理解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表演與他的罪犯身份和“致命成就”之間存在著什么關系，我們就必須回到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此外我們還必須更進一步，擺脫各種完全根據他在耶路撒冷展現的形象所做出的詮釋。

如果我們聽信艾希曼在以色列的說辭，那么他是在1945年，也就是狂妄的“千年帝國”已成廢墟之后，才真正開始自己一直夢寐以求的生活的。按照其說法，之前的“猶太事務主管”轉而變成一個與世無爭的養兔人，回歸到一直以來他內心深處的世界。畢竟邪惡的僅僅是那個政權，而且主要過錯都出在別人身上，他在希特勒統治下耀眼的事業只不過是命運一個意外的轉折罷了。可是艾希曼自己心知肚明，許多人可能抱持截然不同的看法，因此他小心地避免使用阿道夫·艾希曼的本名以策安全。他甚至讓妻子只稱呼他名字的第一個部分——得自其祖父的奧托[\*](#_14)。[[5]](#_5_2)當其他人投降時，他冒用“阿道夫·卡爾·巴爾特”（Adolf Karl Barth）的名字隱匿在成群的戰俘當中，隨即用“奧托·埃克曼”（Otto Eckmann）的假名接受審訊。成功脫逃后，又以“奧托·黑寧格”[\*](#_15)的身份前往德國北部的“呂訥堡石楠草原”，與其他同樣換了新名字的人共同砍伐木材。接著他搖身成為養雞人，晚上還特地拉奏小提琴來取悅鄉間的女性居民。奧托·黑寧格的生活已相當接近他日后在阿根廷養兔子時的情形，只有兩個明顯的不足之處——他無法聯系自己的家人，而且是一名遭到通緝的戰爭犯：“像鼴鼠一般過著地下生活的那五年間，這成了我培養出的第二天性，每當遇見一張新面孔，我就會問自己一些問題，諸如：你認得這張臉嗎？那個人是不是表現出曾經見過你的模樣？他是否在回想有沒有見過你？在那幾年里，恐懼從未離開過我，仿佛隨時都可能有人站在我的背后，突然大喊：‘艾希曼！’”[[6]](#_6_2)他期盼，假以時日，納粹大屠殺能夠像所有雜草叢生的墳墓一般，也逐漸遭人淡忘。可是艾希曼的這個愿望未能實現。最后他除了逃亡之外看不到別的出路，于是1950年，奧托·黑寧格也消失不見了。他化身里卡多·克萊門特，經熱那亞（Genoa）離開歐洲，在阿根廷獲得了新的身份和官方證件，之后開始了他一直想要的那種生活：在一個水力發電站興建項目中找到工作，率領一組測量人員縱橫穿梭于阿根廷北部地處亞熱帶的圖庫曼省——當地的山脈與峽谷不禁讓人聯想起阿爾卑斯山區。他有許多時間騎在馬背上長途跋涉、探索山地、馳騁于遼闊的彭巴草原（Pampa），甚至還兩次試圖登上美洲第一高峰阿空加瓜山（Aconcagua）。兩年后，當他的妻子終于能夠跟三個孩子一同過來團聚時，他還帶著兒子們參加探險活動，向他們傳授騎馬和釣魚的技巧，以及他對大自然的熱愛。項目執行公司的倒閉雖然迫使里卡多·克萊門特另謀高就，在一段時間內給和樂的家庭生活帶來了陰霾，但最晚在1955年，幾經波折之后，他又開始時來運轉：他不但成為一家兔子養殖場的經管者，還有了第四個兒子，盡管他的妻子已經過了40歲。那個“小兔子”（Hasi）于是成了父親的驕傲。[\*](#_16)無怪乎里卡多·克萊門特起心動念，決定蓋一幢自己的房子來安置他那位體型富態的妻子、四個兒子、母臘腸狗菲菲（Fifi）、母德國牧羊犬雷克斯（Rex）、自鳴鐘，以及一些阿爾卑斯風景畫。[[7]](#_7_2)要是沒有被摩薩德綁架的話，他應該直到今天都還過著里卡多·克萊門特那種與世無爭的生活……

只可惜這個感動人心的故事有一個重大缺憾：里卡多·克萊門特或許是艾希曼在護照上的姓名，但這個已經改頭換面的納粹——如今完全不碰政治的大自然愛好者——卻從沒有真正來到阿根廷。艾希曼不是一個喜歡鄉村田園生活的人。對他來說，戰爭——他的那場戰爭——從來都沒有結束。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或許已經退役了，但狂熱的國家社會主義者仍然在役。對他來說，那個讓他不必親自動手就能殺死幾百萬人的極權國家雖已遙不可及，但自己卻還遠遠沒有失去抵抗能力。這名年約50歲的男人或許會在結束一天工作之后，拿著一杯紅酒，坐在離家50公里外的養兔場陽臺上，甚至演奏起小提琴，但以上種種都無法說服他，這種田園風情將成為他的人生前景。南緯35度看不見朦朧暮色和日落余光，天色會一下子昏暗下來——夜幕的降臨比歐洲北部地區人士所習慣的更迅速、更濃烈。艾希曼一到晚上便開始讀書和寫作，但我們絕不應該把這種表現看作內斂自省的功夫。那可不是一位怡然自得的老大爺在享受閱讀之樂。愛好和平的養兔者會把書擲向墻壁并撕得粉碎，沒完沒了地在頁面邊緣寫下侮辱謾罵的眉批，并且仿佛著了魔似的在成堆紙張上寫滿評述。鉛筆在他潦草涂畫的力道下折斷，而他戰斗的意志始終不懈。那名納粹世界觀的戰士從來沒有被打敗，而且他絕不是一個人。

我們今天之所以對艾希曼在阿根廷的生活知道得那么詳細，是一個幸運意外造成的結果。最近兩年，許多檔案館紛紛出現了研究人員從前接觸不到的文件。于是這些“阿根廷文稿”（ArgentinienPapiere），亦即艾希曼自己的流亡手記，再加上今日以“薩森訪談錄”（Sassen-Interviews）這個不十分精確的標題而聞名的訪談轉錄稿與錄音帶，首次得以被用于重建真相。這總計1300多頁的文件不光展現了艾希曼被綁架之前的生活與想法。率先試圖對此進行總結與詮釋，同時也意味著一種挑戰：應如何運用關于國家社會主義反人類罪行最重要的戰后第一手資料。之前混沌不清的各種關聯突然變得豁然開朗了。尤其變得再清楚不過的就是，艾希曼即便于逃亡之際也不打算躲在黑暗中秘密行動。他在阿根廷也想被人看見，而且他希望像從前一樣，被視作一個新時代的象征。

誰要是尋找光亮，就會被人看見。1945年之后與艾希曼有瓜葛的人，在人數上顯然比之前認為的更多。追蹤艾希曼如何走入地下和走上逃亡之路，我們不僅會遇見納粹獵人和暗殺小組，更會發現他的幫助者、同情者，甚至還會找到仰慕者和友好者，雖然之后很長時間，那些人都否認自己認識艾希曼，或者稱跟他只有幾面之緣。例如曾經自愿參加武裝黨衛隊并進行戰爭宣傳的荷蘭人威廉·薩森，幾十年來都聲稱自己只不過是艾希曼的“捉刀代筆人”而已。和他一樣，艾希曼的大部分朋友都否認與那名通緝犯有密切往來。他們的論調如今再也站不住腳。“阿根廷文稿”甚至揭露了究竟哪些人曾主動聯絡艾希曼重溫過往時光，而且更重要的是，共同研討未來的政治計劃。在阿根廷的時候，艾希曼并非一個生活在失敗中的賤民，就好像威廉·薩森也不只是一名好奇的記者，或者希姆萊的首席副官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并沒有成為一個痛改前非的納粹。盡管有人千方百計對他們視而不見，但這些納粹生活在阿根廷乃不爭的事實。他們已于逃離盟軍的法庭之后重新組織起來，其計劃遠不只是開始寧靜的新生活而已。艾希曼周圍的那些人士既已流亡遠方置身自由之中，便評論起德國和世界的發展局勢來。他們雄心勃勃地炮制出各種推翻政府的計劃，忙于組建志同道合者的網絡，甚至還開始偽造文件否認事實，借此捍衛他們眼中那個光輝燦爛的國家社會主義。艾希曼與他們為伍，充滿自信且積極參與，是一名炙手可熱的專家（有數百萬件謀殺案證明他的專業性）——正如他昔日在“帝國保安總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RSHA）主管猶太事務時所習慣的那般。

因此，“艾希曼在阿根廷”并非一出獨角戲，而是記錄了那名前“一級突擊大隊長”如何驚人地展開第二事業，再度成為歷史與“猶太人問題”的專家。盡管艾希曼后來竭盡全力試圖說服所有人，他在戰后已經洗心革面改過自新，可是針對他在阿根廷的所思所想和社交生活進行的研究，卻得出了非常不一樣的結論。假如艾希曼曾經在任何時候真心想要成為這個與世無爭的里卡多·克萊門特，那就只有他在以色列身陷囹圄之際。他在阿根廷送給同志們的簽名照片上，則自豪地署名為：“Adolf Eichmann - SSObersturmbannführer a. D.”（阿道夫·艾希曼——退役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

\*\*\*

但1945年之后的艾希曼，不只是一個阿根廷的事件。在聯邦德國，他的姓名同樣留存于人們的記憶當中。盡管后來有些人假裝對他一無所知，但存在的大量證人陳述、新聞報道和有關艾希曼的各種出版刊物，都展現出德國人如何早在1960年以前，就已經在關注他的名字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了。在研究“艾希曼現象”的時候，我們還有一個間接資料來源可供利用，而且其重要性更是不可低估：艾希曼的受害者和追捕者——尤其是他昔日同僚和知己——的證詞。那些人絕不可能忘記他，因為他們必定擔心，艾希曼還會像他們記住他一般深深地記得他們。任何認識艾希曼，或者僅僅知道他是誰的人，都不希望被他回憶起來。美國情報部門的檔案、緝捕名單，以及德國檢察機關、聯邦憲法保衛局和德國外交部對外公開的少數文件，都讓人得以初步勾勒出艾希曼在戰后初期，尤其是在成立之初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和奧地利的重要性。艾希曼——或者其實是他在別人心目中的形象——已經越來越成為一個政治問題。只要那名納粹“反人類罪行”的關鍵證人還逍遙法外，就足以對德國人試圖“通過徹底遺忘來克服過去”的做法構成威脅。艾希曼即使在阿根廷也不想安靜低調地生活，甚至還打算寫一封公開信給德國聯邦總理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這個事實意味著他正在變成危險因子。難道果真有誰愿意讓這個知道那么多內情的人，回到聯邦德國來暢所欲言嗎？

所有這一切都使追捕艾希曼的過程比之前流傳的那個關于愛情、背叛和死亡的傳奇故事想讓我們相信的復雜得多。其中不僅關涉一心要找到那名大屠殺兇手的上百萬受害者與納粹獵人，或者以不同技巧裝模作樣的各國政府，還有許多人堅定地百般阻撓，以免過去的一切隨那名男子一起從流亡中驀然重返。因而不僅需要阿根廷有一位機警的盲人，發現他女兒的男朋友就是那名反人類罪犯的兒子，更需要許許多多其他事項的配合，才終于克服了那種不顧一切閉口不言的愿望。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前的故事同時也是一連串錯失的機會，未能通過在德國舉行審判來創造一個真正的新開始。如果我們想要知道那個窮兇極惡的時代，其結構在多大程度上殘存到了戰后，以及如何必須設法在缺乏新人管理執行的情況下用一個新國家取而代之，就必須深入分析這個故事。今日在德國政府機關內部仍然保存著不對公眾開放的艾希曼檔案，因為有人擔心其內容會威脅國家安全。這是一個丑聞！承認前任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阿道夫·艾希曼是德國歷史上的一頁，是早就應該做的事情。

\*\*\*

自《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于平庸的惡的報告》在1963年出版以來，任何探討阿道夫·艾希曼的嘗試都意味著與漢娜·阿倫特的對話。[[8]](#_8_1)那位猶太女性出身柯尼斯堡（Königsberg），曾師從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和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學習哲學，直到國家社會主義將她逐出德國為止。阿倫特后來在1961年為了艾希曼審判案而前往耶路撒冷。和所有哲學家一樣，她想要進行理解。但沒有人能夠直接理解，而總是要以自己的想法和經驗，以及對昨日世界的印象為中介。漢娜·阿倫特首次在報紙上讀到艾希曼的時間應該不晚于1943年，且18年后正處于研究的巔峰期。她期待在耶路撒冷發現的，是自己曾經多次詳細描述過的：一個才智過人、魔鬼般的大規模殺人犯，具有我們在文學巨著中所見過的那種令人害怕的魔力。即便在1960年，阿倫特也還寫道：“他是那個團伙里面最聰明的人士之一。”誰要是有膽量理解他，就應該能在理解納粹罪行的路上邁出重要的一步，所以“我受到了很大的誘惑”。[[9]](#_9_1)

等到真正見到艾希曼的時候，那位具有敏銳觀察力的女哲學家并不是唯一感到困惑的人。我們若閱讀最初的一批報道，即可發現那些審判觀察員無論來自何方，幾乎人人都獲得了同樣的印象：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是個可憐蟲，缺乏撒旦在我們眼中所該具有的那種懾人魅力。那名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曾經帶來了畏懼和恐怖，尤其是數百萬人的死亡，如今卻用沒完沒了的字句和言詞來轉移注意力，把一切都形容成被迫奉命行事和遵守效忠誓言。艾希曼對此驚人地擅長，即使在1961年的時候，也應該有人心中起疑才對。只可惜質疑的聲音非常微弱，而且相當不受歡迎。但質疑者與庭審觀察者最重要的區別在于，前者都接觸到了至少部分“阿根廷文稿”的內容。

大屠殺研究在1960年仍然處于起步階段，書面證據少得可憐，想要從被告口中獲取新信息的愿望壓倒了小心謹慎的態度。漢娜·阿倫特在理解時選擇了她所熟悉的方法，即反復閱讀艾希曼的話，并對說話的人進行詳細的分析。其背后的假設是：只有當人希望自己被理解時，才會寫作和講述。她比幾乎其他任何人都更詳盡地閱讀了審訊和審判的記錄，但如此一來反而使她落入陷阱中，因為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頂多就是個假面具而已。阿倫特未能看清這一點，不過她還是敏銳地意識到，她無法真正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樣子來理解“艾希曼現象”。

沒有其他任何關于阿道夫·艾希曼——甚至關于國家社會主義——的書，能夠像《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那般引起廣泛的討論。該書實現了蘇格拉底以降哲學界的最高目標：通過辯論來理解。然而最晚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參照漢娜·阿倫特的做法只會使辯論越來越偏題。人們不由自主地感到，所涉及的主題早已不再是“艾希曼”。人們更在意的僅僅是談論辯論和各種“惡的理論”（Theorien des Bösen），卻不想比1961年時的那位女哲學家更多地挖掘艾希曼這個人本身。幸好如今情況已經出現了巨大的轉變：我們能夠接觸到許多截然不同的第一手資料——至少在理論上如此。

1979年以后，所謂的“薩森訪談錄”已經大部分對外公開，讓人得以一窺漢娜·阿倫特和其他全體審判觀察員所無法看到的資料：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坐在一位朋友舒適的房間內侃侃而談，身邊圍繞著昔日的戰友——如今跟他同樣置身阿根廷的納粹黨人。然而人們在處理這些豐富信息時的態度還是草率得令人吃驚，顯得既勉強又嚴重缺乏對資料的好奇。1998年以來，陸續有一些原始錄音帶被發現，只需仔細閱讀文字轉錄就能夠看出，在阿根廷發生的事情，絕不僅僅是一名尋訪故事的新聞記者跟一個想要喝杯威士忌的落魄納粹聚在一塊，共同沉溺于回憶之中而已。若有誰打算真的跟漢娜·阿倫特唱唱反調，而不再只是對著她那本書的好成績大發牢騷，其實早就可以在訪談錄中找到大量反駁的武器。然而人們卻反其道而行，繼續復述艾希曼在以色列炮制的故事，以他所說的時間順序為基準，引述一家立場偏頗的出版社出的文稿贗本[\*](#_17)，甚至讓完全不為人知的艾希曼相關資料在檔案館里被貼上錯誤的標記——盡管那些資料甚至可以讓歷史學家們具有傳奇色彩的“處變不驚”（Überraschungsresistenz）特質面臨嚴峻考驗。因此，我們至少應該跟漢娜·阿倫特學習一件事情：在面對未知的時候，應該讓自己被未知吸引。

\*\*\*

本書的首要目的是設法呈現所有可用的資料，以及隨之而來的挑戰。光是“阿根廷文稿”本身的歷史，以及它宛如一大塊難解拼圖的碎片那般散布于各地檔案館的現狀，便足以讓我們見識到“艾希曼現象”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面，由此產生的一切爭議都是值得的。本書首次詳細呈現這些第一手資料，以及它們在歷史上成形的經過，希望借此推動研究、提出更多問題。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同樣也是與漢娜·阿倫特的對話。原因不僅在于我自己對這個主題的研究，是許多年前經由《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開始的。我們對歷史事件的理解與它發生之際的時空環境密不可分，因此我們不能忽視阿倫特的視角。阿倫特有勇氣做出明確的判斷，但也冒著風險，盡管付出了一絲不茍的努力，總還是知道得太少。在艾希曼研究中所獲得的最發人深省的見解之一就反映在阿倫特身上：一個人未必需要才智出眾，便足以誤導像阿倫特那樣十分聰慧的人，用她自己的武器——印證自己期待的渴望——擊敗她。但我們若想認清這種機制，就必須要有思想家在身邊，他們勇敢地面對自己的期待和傾向，從而可以看到自己的失敗。

行文至此，我仍要在全書的開頭即向讀者發出警示，而這么做的最好方法，莫過于直接引用漢娜·阿倫特飛往耶路撒冷旁聽艾希曼出庭受審之前寫給一位好朋友的話：“這或許會很有趣——要是它沒有變得那么恐怖的話。”[[10]](#_10_2)

\* 即以色列情報和特殊使命局。——編注

[\*](#_2) 所有出現于引文中的老式拼法或拼字錯誤皆保留原樣，不按照慣例標示“原文如此！（sic!）”。——原注（無德文打字機可用的時候，ä、ö、ü、ß等字母分別拼寫成ae、oe、ue、ss，例如霍特爾的正確拼法為“Höttl”。——譯注）

[†](#_4) 即羅馬帝國第三任皇帝蓋烏斯·尤利烏斯·凱撒·奧古斯都·日耳曼尼庫斯，后世史學家稱其為卡利古拉，這是他自童年時期就有的外號，意為“小軍靴”。卡利古拉被認為是羅馬帝國早期的典型暴君，建立恐怖統治，神話王權，行事荒唐。——編注

[\*](#_5) 艾希曼全名為Otto Adolf Eichmann（和許多長子一樣，他被冠上了祖父的名字）。——譯注

[\*](#_6) 有些資料將黑寧格（Heninger）誤譯成“亨寧格”（Henninger）。二者的德語讀音頗不相同，第一個e在前者是長音，在后者則是短音。——譯注

[\*](#_7) 全名為里卡多·弗朗西斯科·艾希曼（Ricardo Francisco Eichmann, 1955— ）的“小兔子”相當爭氣，于父親被處決之后苦讀成為近東考古學家和德國大學教授。——譯注

[\*](#_10) 指的是極右派“德魯費爾出版社”（Druffel-Verlag）在1980年用“阿根廷文稿”胡亂拼湊出來的《我，阿道夫·艾希曼》（Ich, Adolf Eichmann）。請參見本書《余波蕩漾》章。——譯注

[[1]](#_1) 1961年2月5日寫給卡爾·雅斯貝爾斯的信函（Hannah Arendt, Karl Jaspers, Briefwechsel 1926-1969. Herausgegeben von Lotte Köhler und Hans Saner. München, Zürich 1985, 459）。

[[2]](#_2_1) 1962年5月艾希曼回答法國《巴黎競賽畫報》提出的書面問題。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2, 38.

[[3]](#_3) 我沒見過任何關于艾希曼的出版物不出現類似這樣的句子，而我自己直到七年前也還信誓旦旦地如此宣稱。比較新的例證則是一本探討德國外交部的大部頭著作：Eckart Conze,Norbert Frei, Peter Hayes, Moshe Zimmermann,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München 2010, 604.

[[4]](#_4_1) Jean-Jacques Rousseau, Discours sur l’ 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Amsterdam 1755）第二部分的最初幾個句子。

[[5]](#_5_1) 1945年戰爭結束后不久，艾希曼的名字所造成的混亂便蔓延開來，頑固地一直持續至今。其實他的名字顯然是可以查證的。那不但能夠在他的出生證明中找到（BArch Koblenz AllProz 6/236），更出現在納粹時代的官方文件上——例如黨衛隊“人種與移居部中央辦公室”的檔案資料（BDC‚ BArch Berlin, RuSH-Akte Adolf Eichmann）。“卡爾”（Karl）則源于艾希曼父親的名字所帶來的混淆——那個名字非但可以在林茨市的電話簿上找到，也出現在他父親的納粹黨證上。由于在以色列的時候，艾希曼的名字跟他父親的名字被同時提起，稱為“阿道夫，卡爾·阿道夫·艾希曼的兒子”（Adolf, Sohn von Karl Adolf Eichmann），這個誤解就一直延續了下來。除此之外，艾希曼和許多長子一樣，繼承了祖父的名字。

[[6]](#_6_1) Meine Flucht, 22，1961年3月寫于以色列。艾希曼本想把這份文稿取名為《在1945年5月的一個夜晚》（In einer Mainacht 1945），引自按照手寫稿頁碼來編頁的打字稿。BArch Koblenz AllProz 6/247.

[[7]](#_7_1) 將這些細節視為“文學修飾”的人，可在1960年6月6日艾希曼被綁架之后拍攝于其家中的照片，以及刊登于當時許多雜志的圖像中找到證據（尤其是1960年6月26日至7月16日的《明星周刊》）。其他細節則來自艾希曼在以色列寫給家人的信函。其副本現存于以色列國家檔案館以及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BArch Koblenz AllProz 6/ 165 und 248）。

[[8]](#_8) 該書英文版在1963年出版于紐約和倫敦。德國讀者起初只能在《水星雜志》（Merkur）上讀到將近20頁的文字，內容是經過編輯部刪節的第二章與第三章。第一個德文版本于1964年在慕尼黑發行（Paperback Nr. 35）。本書在下面引用的就是這個版本。

[[9]](#_9) 阿倫特寫給瑪麗·麥卡錫的信函，1960年6月20日。Hannah Arendt, Mary McCarthy, Im Vertrauen. Briefwechsel 1949-1975. Herausgegeben von Carol Brightman. München, Zürich 1995, 150.

[[10]](#_10_1) 阿倫特寫給瑪麗·麥卡錫的信函，1960年6月20日。Hannah Arendt, Mary McCarthy, Im Vertrauen. Briefwechsel 1949-1975. Herausgegeben von Carol Brightman. München, Zürich 1995, 150.

# 第一章 “我的名字成了象征”

曾經到哪里都有人認識我……

——艾希曼告訴薩森，1957年

我們直到今天都不知道，艾希曼究竟是什么時候決定去南美洲生活的。但他曾經解釋自己為何受到吸引前往阿根廷：“我知道，有些好朋友在南美洲的這個‘應許之地’等著向我伸出援手。我可以公開地、自由地、驕傲地向那些朋友們說出：我是阿道夫·艾希曼，前任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1]](#_1_3)

公開地、自由地、驕傲地成為阿道夫·艾希曼？——多么不同凡響的愿望！艾希曼居然會認為那是一個現實的可能，這在當時和現在顯得一樣荒誕可笑。因為“阿道夫·艾希曼”這個名字早已成為“納粹滅絕猶太人”的代稱，就連他自己也對此心知肚明。畢竟，若沒有必需的理由，絕不會有誰那么大費周章地隱姓埋名前往異國討生活。當艾希曼計劃自己的逃亡行動時，他有一個很好的理由：他實在是太出名了，根本不可能一直不被發現。

有太多人認識艾希曼，并且知道他如何參與了對猶太人的權利剝奪、驅逐遞解和大肆屠殺。若說這一事實在今日已經遠不如艾希曼生前的時候清楚，那要歸功于他在耶路撒冷異常成功的自我展示。1960年被綁架到以色列以后，艾希曼便竭盡全力把自己描述成許許多多無足輕重的部門主管之一，是第三帝國謀殺機器上的“一個小齒輪”、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他只是一個無人知曉的小官員，根本發揮不了任何影響力，結果卻因為一個錯誤、一些愚蠢的意外和別人的怯懦而“背了黑鍋”。但艾希曼自己心知肚明，那根本是個謊言。他的姓名絕非只在一個小圈子里面才有人知道，更不是隨著那場審判才變得家喻戶曉。恰好相反，在那場至今令他臭名遠揚的罪行中，他的名字在深重的罪惡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阿道夫·艾希曼本人曾密切關注他的名字演變成為猶太人大屠殺的象征的過程。事實上，艾希曼自己十分清楚，他和他的上司們都有意鼓勵了這種發展。艾希曼壓根兒不想成為他時而自稱的那種“躲在黑暗中的人”。一直要等到在以色列上了法庭，他才處心積慮地營造一種印象，讓人覺得他是個人微言輕、面目不明、隨時可被替代的無名小官。可是到了面臨死刑威脅的時候，有誰不想這么做呢？即便如此，許多人仍然相信艾希曼是一個“躲在黑暗中的人”。有些人甚至將艾希曼的“不可見性”視為其謀殺罪行的成功關鍵。[[2]](#_2_4)然而有不少線索指出，最晚從1938年開始，艾希曼就已經既非默默無聞，也對隱身幕后不感興趣了。隨著我們著手追蹤這些線索，那個“躲在黑暗中的人”的形象就會明亮許多了。

## 第一節 走向公眾之路

他人緣很好，在哪里都受到歡迎。

——魯道夫·赫斯（Rudolf Höß）論艾希曼

阿道夫·艾希曼1932年在奧地利的林茨（Linz）加入德意志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NSDAP）[\*](#_317)和黨衛隊（SS）。他們一家在他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從德國搬到了那里，因為艾希曼的父親認為自己能在林茨開拓一份理想的中產階級職業生涯。兒子的事業卻發展得很不一樣：他不愿擔任教區管理委員的差事，也無意在父親的公司謀得一職，反而利用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在奧地利被取締的機會，于1933年跟隨林茨的一位納粹黨高級干部返回德國，來到當時那股新興政治勢力的核心地帶。時至1934年——無論是因為目標明確、受到高人指點，抑或基于敏銳的權力直覺——艾希曼進入了黨衛隊保安局（Sicherheitsdienst，SD）。當時這個安全單位的規模還小得很，卻早已聲名狼藉。因為人們知道SD這兩個縮寫字母背后的那群人曾積極卷入“羅姆事件”（Affäre Röhm）。[\*](#_318)艾希曼后來雖千方百計把自己調職到黨衛隊保安局一事解釋成“純屬意外”或“張冠李戴”，但此說法未免荒唐透頂。假如艾希曼所言不虛的話，那么當初他恐怕是唯一處于狀況外的人，竟然還不知道黨衛隊保安局的凜凜威風，其神秘萬分的工作人員，以及他們那位深具領袖魅力的頂頭上司萊因哈德·海德里希。[[3]](#_3_3)1934年年中加入黨衛隊保安局的人雖然無法期待獲享高薪，卻可望贏得黨內同志的尊重和敬畏，更何況還有那個令人艷羨的工作地點：位于帝國權力中樞首都柏林威廉大街102號（Wilhelmstraße 102）的宏偉宮殿。對一個年紀未滿30歲，兩年前還是上奧地利州（Oberösterreich）一個普通汽油推銷員的小伙子而言，這無疑是職業生涯中的一大躍升。艾希曼感覺自己已經站穩了腳步，這也體現在他所做出的（在黨衛隊內部同樣有助于升遷的）一個決定中：想要結婚成家。于是他娶了比他小四歲的薇拉·利布爾為妻。薇拉來自波希米亞的姆拉代（Mladé），她將跟兩個替蓋世太保工作的兄弟一樣，因為其丈夫的社會地位上升而受益。

黨衛隊保安局的人從一開始就享有特殊地位。他們是納粹黨內部的情報單位，因此有些法條和規定不適用于他們。軍事操練已成為過去，黨衛隊的制服大多數時候都只放在衣柜里。1935年4月之后，一般黨內同志已被禁止與猶太人有任何私下往來，而保安局的情報職能卻讓其成員可以堂而皇之地置禁令于不顧，因為他們把自己定義成“一直在執勤”。微服調查更是特別具有吸引力的任務，艾希曼即便時隔二三十年仍對此津津樂道：他造訪猶太人舉辦的各種活動并建立聯系，讓人覺得他求知若渴、思想開闊。[[4]](#_4_4)他曾找來一位猶太裔的希伯來文教師（以致他的上司兩度明令禁止他那么做[\*](#_319)），而且和他的所有同僚一樣，研讀猶太讀物，從600頁的大部頭著作到每天的報紙。他還經營國際關系，甚至應一位猶太人的邀請前往巴勒斯坦參觀訪問。艾希曼后來稱之為一門“至少長達三年的學習課程”。[[5]](#_5_4)但他從未提及的是，上司時而不得不因為他的無組織紀律和遲到早退而當面告誡。[[6]](#_6_4)人們很容易誤以為這種生活方式屬于一個洋溢著學術氣息，但政治觀點略嫌原始的文人雅士。然而除了在咖啡館談天說地、寫寫文章、發表演講報告，以及晚上與同僚一起研讀專業書籍之外，官方檔案中也披露了艾希曼如何把告密者打的小報告仔細整理成卡片、做反猶太宣傳、進行逮捕，以及與蓋世太保聯手審訊逼供。黨衛隊保安局具有雙重性質，既是世界觀的精英（Weltanschauungselite）又是權力的工具（Machtinstrument）。正因為如此，它對自詡“新而不同”的那一代人深具吸引力。

艾希曼向更廣大的公眾（這回是猶太公眾）展現出來的第一個形象出現在1937年年中，是一位“聰明活潑”的年輕人。可是若有人對他指名道姓而非稱呼其頭銜的話，他就會變得很不友善。恩斯特·馬庫斯（Ernst Marcus）在回顧1936-1937年的時候指出：“他喜歡保持匿名，而且把在‘專員先生’（Herr Kommissar）這個官方頭銜后面加上其姓名的做法，看成不被允許的冒犯行為”。[[7]](#_7_4)艾希曼自己顯然無力擺脫“沒有臉孔、穿著皮革長大衣的執法力量”這種刻板印象，此刻板印象同時塑造了黨衛隊保安局和蓋世太保的早期形象，反正它們的受害者很難分辨二者之間的區別。[\*](#_320)不過艾希曼喜愛的這種匿名狀態并沒有維持很長時間。當艾希曼與他的同僚赫伯特·哈根（Herbert Hagen）聯袂前往中東旅行時，英國特勤機構注意到他們，并阻止二人進入巴勒斯坦。當時拍攝的照片也被保管在相關檔案中。[[8]](#_8_3)到了1937年年底，這個“黨衛隊保安局專員”的名字也在柏林的圈子里為人所熟知。對于納粹通常不予理會的那些事項：猶太復國主義、非自愿移民出境時的錢財轉移問題、猶太人內部的討論，以及各式各樣的猶太利益代表團體、人員和協會，艾希曼都“令人費解地一清二楚”。

如今已很難重建艾希曼究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從一個安靜、隱蔽的默默觀察者變成了優等民族（Herrenrasse）張牙舞爪、頤指氣使的發聲者。至少在柏林，最晚在1937年6月，艾希曼默默無聞的名聲即已被完全打破。有一次他幾乎砸了猶太拉比約阿希姆·普林茨（Rabbi Joachim Prinz）歡送會的場子，橫沖直撞、喧賓奪主，使2000位來賓無法對那名黨衛隊官員視而不見。[[9]](#_9_3)從此只要一談論起“那個惡心討厭，讓人跟他握手以后恨不得馬上洗手的家伙”，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誰。為求安全起見，艾希曼在上司面前辯解：“我從來不跟那些猶太人握手。”[[10]](#_10_4)不露聲色地獲取信息的時代顯然已成過去。

此種轉變與保安局全新的自我形象若合符節：他們不想繼續待在幕后了，而主張保安局要在猶太政策中占據主導地位。這是希特勒一直念茲在茲的問題，攸關榮譽，并且隨著《紐倫堡法案》的頒布，出現了新的機會。[[11]](#_11_2)在艾希曼的配合下，這個目標在第二年就已經得到實現。黨衛隊保安局的人迫不及待地等待那個新時代來臨，希望終于可以表明立場，向“敵人”展現改變后的風向——或者套用艾希曼別具一格的表達方式來說就是：“讓他們終于意識到，炸彈開始要爆炸了。”[[12]](#_12_2)到1937年年底、1938年年初時，艾希曼已是柏林猶太人社區內的知名人物，而且顯然一點也不在乎自己逐漸受到“敵人”的注意。

### 一個精英單位的自我形象建構

在自己人的圈子里，艾希曼的知名度也隨著保安局地位的上升而大幅提高。起初主要只是低階人員因為受訓時聽艾希曼授課而認識他，不過他的接觸范圍很快便擴大開來。一方面是因為強迫猶太人移居國外的行動需要諸如外交部、蓋世太保、經濟部等等單位的配合，即便彼此之間的合作未必總是一帆風順；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海德里希善用宣傳手段，巧妙地使自己旗下的保安局和主管猶太人事務的II 112部門（Judenreferat II 112）[\*](#_321)聲名大噪。因此光是在1937年1月，就有300多人前往II 112部門取經。其中不僅包括軍校和國防部的軍官，更有日后的外交部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以及南斯拉夫秘密警察的首腦。[[13]](#_13_2)該部門的工作還包括給納粹黨的青年組織授課、前往上西里西亞執行公務[[14]](#_14_2)，以及參加在紐倫堡舉辦的黨大會。艾希曼在紐倫堡是尤利烏斯·施特萊徹（Julius Streicher）[†](#_322)的貴賓，后者的同僚曾極力爭取與艾希曼建立關系。[[15]](#_15_2)盡管英國的入境禁令讓他栽了一個大跟頭，但艾希曼還是因為其巴勒斯坦之行，在1937年躍升為“猶太人問題”方面的“公認專家”。

顯然，艾希曼很早便掌握了一項絕活，甚至有辦法利用失敗的計劃來粉飾自己的聲譽。即便后來在耶路撒冷的時候，艾希曼也宣稱自己熟悉以色列，因為他之前曾造訪過那里。在國家社會主義者中間，艾希曼的“專業知識”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讓他引以為傲：“1934、1935、1936那幾年，我還是個小學徒。……前往巴勒斯坦的時候，我已經出師。等到回來以后，我成了師傅。”[[16]](#_16_2)1934-1938年艾希曼首度任職于柏林時，見過他的人雖然未必都記得住他的名字或長相，卻有許多人清楚黨衛隊保安局的猶太事務部門是什么，以及干些什么勾當。其中的員工僅僅因為是該部門的一員便可以獲得注意。鑒于艾希曼一點也不靦腆的自我推銷天賦，他想必曾經充分利用了這個機會。

### 小總理

1938年3月中旬，奧地利經歷了所謂的“德奧合并”（Anschluss）。艾希曼隨即被派往維也納，主管一個隸屬于“II 112部門”的特別單位。這次調職使他終于進入了公眾的視野。艾希曼從一開始就不掩飾他如何設想自己在歷史上的形象。在一次維也納各界猶太名流奉召出席的集會上，艾希曼大剌剌地以“曾赴巴勒斯坦游歷者”之姿現身，非但手持馬鞭、身穿黨衛隊黑色制服，而且還大肆炫耀自己關于猶太組織和猶太復國主義歷史的知識。剛剛完成《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史》（Geschichte der zionistischen Bewegung）第二卷的阿道夫·伯姆（Adolf Böhm），必須洗耳恭聽艾希曼如何自詡為其最狂熱的讀者之一，而且確實對該書第一卷的內容爛熟于心。重要的是，這位時年65歲的老人家被迫意識到，黨衛隊如今將把他潛心收集的知識用作進入猶太組織的鎖鑰，從而成為對抗猶太人的武器。艾希曼還向伯姆表達了他對第三冊的期待：應該要有一章長篇大論地講述艾希曼自己。把阿道夫·艾希曼寫成猶太復國主義的開路先鋒嗎？縱使不知道后續發展，也顯而易見阿道夫·伯姆完全無法忍受這樣的想法，于是沒有再繼續寫下去了。[[17]](#_17_2)

艾希曼塑造的自我形象不再是羞怯、拘謹和不事張揚的了。他在世界歷史上要求一席之地，理由僅僅是自己屬于一個初具雛形的黨衛隊組織。這淋漓盡致地呈現出所謂優等民族“世界觀的精英”看待自己的傲慢方式。當時的一位見證人[[18]](#_18_2)這樣描述對艾希曼的印象：“然后艾希曼走了過來，就像一個年輕的神明。他那時長得非常好看，高大、黑衣、容光煥發……”他也表現得宛如神明一般，握有大權，能夠決定逮捕或者釋放人犯、查禁或者重新核準某些機構。他還是一家猶太報紙的創辦人和審查者，最后甚至能夠決定誰可以動用猶太社區的銀行賬戶。[[19]](#_19_2)盡管納粹黨人在維也納的權力架構混沌模糊，從一開始就在管轄范圍上爭執不清[[20]](#_20_2)，但艾希曼還是有辦法向外界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他在寫給柏林上司的報告中宣稱：“我完全控制住了他們，在沒有征求我的同意之前，他們不敢采取任何行動。”他對此的驕傲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間：“如您所能想象的，至少其中的領導們，我都已經讓他們了解了新情況。”同樣讓艾希曼引以為傲的是，在其督導之下，很快將推出《錫安主義評論》（Zionistische Rundschau）：“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將是‘我的’報紙。”[[21]](#_21_2)

艾希曼的知名度隨之快速提高。他的名字在同年3月底已開始出現在奧地利和境外猶太人的信函及報道當中。[[22]](#_22_2)艾希曼到處宣揚，“他命中注定要指揮和領導維也納的猶太人事務”。[[23]](#_23_2)他是直接與猶太機構和社區代表們打交道的最高階納粹黨人。湯姆·塞格夫（Tom Segev）非常貼切地寫道：“猶太人把他和希特勒看成制造大屠殺的兩個阿道夫。”[[24]](#_24_1)阿道夫·艾希曼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猶太政策的表現，而且不只對猶太人來說如此。艾希曼主動與國際猶太組織建立起來的聯系更加深了這樣的印象：需要爭取它們的合作——尤其是它們的金錢——來提高外移者的比例。結果有不少被迫移民國外的人帶著艾希曼這個名字一同走上了流亡之路。戰爭爆發僅僅三個月后，大衛·本——古里安就會首次在日記中寫下“艾希曼”這個名字。[[25]](#_25_1)

艾希曼在1938年8月正式接掌新成立的維也納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 in Wien），他的名氣從此也在自己人的圈子內迅速流傳開來。不久后，海德里希邀請他到柏林參加一場由戈林主持的會議，使他有機會在諸如戈培爾、弗里克（Frick）、馮克（Funk）和施圖卡特（Stuckart）[\*](#_323)等重要人物面前炫耀其“實際執行……的經驗”[[26]](#_26_2)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外移人數。艾希曼的表演使他在那些圈子里贏得了“非常規組織大師”的稱號，而“非常規組織”（unkonventionelle Organisation）正是那個時代諸多充滿魔力的字眼之一。“中央辦公室”作為一個跨部門的機構引起了轟動，許多部長和納粹要員都派代表前往維也納實地考察這項試驗。[[27]](#_27_1)它以新穎、快速、果決、有效的行動打破了傳統官僚組織的藩籬，因而完美契合了國家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于是“我一下子變成了名聞遐邇的艾希曼，名聲一直向上傳到了黨衛隊全國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和其他部長那里”。[[28]](#_28_1)那個構想是如此吸引人，讓戈林恨不得把它推廣到全國。艾希曼則滿心期待自己能夠參與其中。海德里希自己也沒有錯過前往維也納視察的機會，并以他特有的同時夾雜著贊許、諷刺和宣傳口號的含混表達方式，稱呼艾希曼為他的“小總理”（kleiner Ministerpräsident）。[[29]](#_29_1)

艾希曼已經充分意識到，在國家社會主義的體系內，聲譽不亞于直接的權力：“這一切給了我巨大的推動力量。”[[30]](#_30_1)這名32歲的男子明顯已經躋身納粹精英之林：他成為維也納電影行業舞會的座上賓、參加了入侵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閱兵儀式，還獲得了納粹高層領導的簽名題贈。[[31]](#_31_1)艾希曼的地位已經如此穩固，以至于他被批準安排自己的人展開實驗，率先在多普爾（Doppl）和桑德霍夫（Sandhof）兩地成立了奧地利的猶太人強制勞動營。[[32]](#_32_1)他的上司們對維也納這位富有創造性的部屬非常滿意，以至于干脆對他的濫權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33]](#_33_1)

艾希曼后來在1957年回憶道，“那時我眼看著就要成為解決猶太事務的帝國專員”，只可惜別人對他飛黃騰達的嫉妒“阻礙”了此事的發生。[[34]](#_34_1)盡管設立維也納機關的過程中也有其他人的投入和想法[[35]](#_35_1)，但這并沒有妨礙艾希曼的自吹自擂——更何況那些“其他人”是猶太人。要等到數十年后，當艾希曼必須在法庭上為自己的謀殺和驅逐行動辯護之際，他才會重新想起他們。在維也納接下來的幾年，艾希曼出色地將自己描繪成“時代的風云人物”。1938年年底，他那“獨一無二的機構”出現在了維也納《人民觀察家報》（Völkischer Beobachter）[\*](#_324)的周日圖片增刊上[[36]](#_36_2)，甚至還登上了匈牙利的《佩斯特勞合日報》（Pester Lloyd）。[[37]](#_37_1)即便他的名字沒有出現在報紙上，可是他從一開始就大搞公關活動，以致那些文章充斥著典型的艾希曼式用語。

### 猶太人的沙皇

1939年3月上旬，柏林猶太社區的代表們應召與艾希曼見面。我們借助幸存參與者的回憶錄可以推斷出那次約談發生了什么事情。按照本諾·科恩（Benno Cohn）[[38]](#_38_1)的記錄，他和保羅·愛潑斯坦（Paul Eppstein）、海因里希·施塔爾（Heinrich Stahl）、菲利普·科楚維爾（Philipp Koczower）——此外或許還有阿圖爾·利林塔爾（Arthur Lilienthal）——見到了穿著便服的艾希曼和一名穿制服的黨衛隊高階官員。見面至少是讓人覺得不舒服的：艾希曼猛烈抨擊那些被叫來見面的人，大聲咆哮并威脅要把他們送入集中營，然后宣布幾天之后將在柏林成立全國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本諾·科恩后來在1961年的審判中出庭作證，回憶起那次談話的開始：“艾希曼劈頭就對德國猶太人代表發起猛烈攻擊。他面前放著一個裝了各種剪報的文件夾，當然里面都是外國的報道，它們把艾希曼描繪成一心只想殺害猶太人的嗜血獵犬。他給我們讀了《巴黎日報》（Pariser Tageblatt）的片段，問我們文中所言是否屬實，并表示相關信息一定來自我們圈子內部：‘到底誰跟猶太通訊社（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JTA）的蘭道（Landau）講過話？他一定是從你們那兒得到的消息！’”艾希曼在所謂“移民出境者的報紙”上面發現了自己的名字，這顯然讓他一點也高興不起來。艾希曼為什么會突然在1939年年初，因為“敵人”流亡者報紙上一篇關于他的文章而做出如此咄咄逼人的反應呢？

后來在阿根廷，甚至在以色列的監獄里，艾希曼于言談之間仍然難掩第一次在報紙上看見自己姓名時所產生的自豪感。那是“一篇社論，標題為‘猶太人的沙皇’”。[[39]](#_39_1)從艾希曼對此事的記憶即可看出，他其實是興奮過了頭，因為那既非以他為主題的文章，亦非與他有關的頭條或社論，嚴格說來只是《巴黎每日新聞報》（PariserTageszeitung）頭版一篇邊角文章的最后一句。這份以德文在法國發行的流亡者報紙是《巴黎日報》的后繼者。[[40]](#_40_1)1939年2月15日，名為《來自帝國》的專欄下寫道：

蓋世太保的強制移民措施

柏林，2月14日

【ITA報道】：上周，布雷斯勞（Breslau）的300名猶太人突然接到蓋世太保的命令，必須立刻租下一艘船并在一周之內移居上海。布雷斯勞的猶太社區表示沒有足夠的錢租船后，蓋36世太保宣布“此事將得到妥善解決”。就在同一天，蓋世太保從布雷斯勞三位最富裕的猶太人那里查抄了所需金額。不過強制移民的計劃暫時失敗了，因為船運公司要求以外幣支付回程保證金，以防乘客被拒絕入境上海。

蓋世太保逼迫從集中營釋放出來的猶太人盡快移民出去的壓力并未減輕。成千上萬新近獲釋的猶太人團團圍住主要位于柏林和維也納的外國領事館，以及各種猶太組織的辦公室，希望盡快獲得移民出去的機會——不論是在什么條件下、要前往任何地方，都無所謂。若他們無法在限定時間——通常極短——內離開德國，將有重新遭到逮捕并被送入集中營之虞。

據悉柏林市即將設置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在本周內入駐昔日“猶太兄弟會”所在的大樓，由來自維也納、綽號為“猶太人的沙皇”的黨衛隊官員阿道夫·艾希曼主管。

根據現有的研究結果來看這篇報道，只能說雅各·蘭道（Jacob Landau）和邁爾·格羅斯曼（Meir Grossmann）所創辦的“ITA”（JTA）——亦即“猶太通訊社”——堪稱消息相當靈通。若從艾希曼在1939年3月的反應來看，該通訊社未免消息太過靈通了。因為的確就在1939年年初這個時候，與日本和中國領事館的洽商正在進行，以確定兩國是否會阻止大規模猶太移民入境。艾希曼已徑自委托一位名叫海因里希·施利（Heinrich Schlie）的老朋友過去探聽口風[[41]](#_41_1)，從完全非官方的途徑繞過了外交部。施利是“漢薩旅行社”的經營者，從1937年7月起就和猶太事務部門保持密切合作關系，希望能夠從中獲得大量生意機會。然而這些外交性質的磋商工作相當棘手，他們一方面不希望這條擺脫猶太人的新途徑在付諸實現之前就被堵住，同時也不愿讓競爭單位聽到風聲。文章中的其他細節也八九不離十：只有能夠證明自己可以移民出去的猶太人才可能從集中營獲釋，而且一旦移民逾期，就會立即被重新逮捕。后一種做法在納粹圈子里也不是秘密，甚至是有效的驅逐手段。威逼和“鞭策”便是他們刻意選擇的招數。在納粹時期，除非是在宣傳部任職的那些人，否則不會有誰把強迫移民國外的做法形容為“獲得雙方一致同意的人道主義行動”。文中有關艾希曼在維也納大名鼎鼎的說法也同樣正確，因為他在當地可絕對沒有隱姓埋名。

那么艾希曼為什么會對這篇文章如此憤恨不平呢？這絕不是因為別人送給了他“猶太人的沙皇”這個綽號，因為在納粹圈子里，這樣的諢名是令人垂涎的對象。艾希曼與猶太人代表會面時所提到的“嗜血獵犬”這個稱呼，是流傳最廣的一個。1938年年底之后，艾希曼的同僚和朋友阿洛伊斯·布倫納（Alois Brunner）和約瑟夫·魏斯爾（Josef Weiszl）二人，也都有此綽號。1944年在匈牙利，艾希曼甚至這樣介紹自己：“你們知道我是誰嗎？我是嗜血獵犬！”[[42]](#_42_1)海德里希也早就被貼上了這個標簽，而且它完美契合了充滿追捕意味的黨衛隊形象。[\*](#_325)納粹積攢的這些昵稱具有幾乎無限的想象力：在維也納，布倫納也很喜歡自稱“猶太人蘇斯”[\*](#_326)[[43]](#_43_2)；約瑟夫·魏斯爾是維也納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在多普爾設置的第一個猶太人營區的主管，也是艾希曼集團最兇殘的暴徒之一，他喜滋滋地寫信告訴妻子，最近人們稱他為“多普爾的猶太人皇帝”（Judenkaiser von Doppl）[[44]](#_44_2)；另一名集中營指揮官阿蒙·格特（Amon Göth）則是“克拉科夫的皇帝”（Kaiser von Krakau）。[[45]](#_45_1)如此看來，“沙皇”這個綽號比“小總理”更合乎當時人們的口味。即使到了20世紀50年代，艾希曼仍然沉溺于此類比喻之中。他不但多次告訴薩森，自己曾被稱為“猶太人的主教”，并且還表示：“我管轄下的人們敬畏我已經到了此種程度，以致那些猶太人簡直想把我推舉到皇位上。”[[46]](#_46_1)任何把自己比擬成猶太皇帝的人，無疑都面臨許多問題，但對夸大其詞作風的羞愧（或厭惡）并不包括在其中。因此被“敵人”稱為“猶太人的沙皇”，對艾希曼而言是受歡迎的恭維，而非值得動氣的挑釁。艾希曼后來也承認，他是故意用那篇報紙文章在猶太人代表面前裝模作樣的。[[47]](#_47_1)

文中提到的另一個細節，即柏林市將要設置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且艾希曼果真在當天向猶太社區代表宣布了它開始運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事情的真相是，戈林在1939年1月24日要求海德里希成立全國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并由海德里希親自負責。在帝國保安總局1939年3月的季度報告中，辦公室正式成立的日期被定在2月27日，開始工作的時間則是3月上旬。然而，《巴黎每日新聞報》的那篇報道早在2月15日即已刊出，并且正確寫出了未來的地址：選帝侯大街（Kurfürstenstraße）116號猶太兄弟會所在大樓將是艾希曼日后的工作場所。換句話說，那篇小文章相當于宣布了艾希曼要被晉升到原本特地為海德里希設置的職位，亦即成為全國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的負責人——而當時除了幾個當事人，幾乎沒人知道艾希曼將被調職前往柏林。

這種人事問題對于一個納粹野心家來說尤其微妙棘手。艾希曼無疑必須忍受上司們的質問，為何如此沉不住氣地拿著自己尚未獲得的職位到處大肆張揚——而且還是在主要敵人面前。這樣的場景想必十分丟臉，以致艾希曼在召見猶太人時表現出侵略性和攻擊性，更何況他的一位上司就站在旁邊。艾希曼斥責猶太人代表的時候，強調的是報道的第一部分，即強制移民的實際狀況。并且提到了一些形容納粹的典型說法，像是“嗜血獵犬”、“眼睛布滿血絲的猶太人的敵人”等[[48]](#_48_1)，可是那篇文章根本沒有出現此類字眼。由此可見艾希曼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以致做出了過度反應。他被踩到了痛處，因為此事攸關他在自己陣營內的聲譽。

這個新聞事件讓人更有理由懷疑艾希曼后來在以色列的說辭：他是被迫返回柏林的，因為他根本不想調離維也納，由此也就動搖了艾希曼關于“維也納是他一生中最成功時期”的講法。既然自豪感和對晉升的喜悅能讓艾希曼變得口無遮攔，并且在維也納大肆張揚即將被調職一事，那么他反對調回柏林的意愿一定不會很強。消息的最初來源顯然并非柏林的猶太社區，而是維也納的猶太宗教社群。猶太通訊社的蘭道先生固然剛好去過柏林[[49]](#_49_1)，但后來的文章顯示，《巴黎每日新聞報》在維也納另有線人。是艾希曼自己說漏了嘴，所以他才會責怪海因里希·施塔爾和其他在場的柏林猶太人代表，未經他同意便去到維也納，并與當地的猶太宗教社群互通信息。

### 一個重要人物

艾希曼一再不厭其煩地向世人談起他的記憶，盡管到了最后往往只剩下具有阿諛意味和反猶太色彩的部分。他曾經以“猶太人的沙皇”之名出現在國際媒體的頭版，獲得了今日許多人依然夢寐以求的知名度——只可惜那批“巴黎寫手”非但不懂得贊賞他的“工作成果”，反而只知道“抹黑”[[50]](#_50_1)。從那時起，艾希曼的新聞剪報文件夾就持續變厚：“在1939年之前的和平時期，國外關于我的文章數量十分龐大，以致《沖鋒報》（Der Stürmer）從前當過老師的保羅·武爾姆（Paul Wurm）把外國相關文章收集起來，作為禮物送給了我。”[[51]](#_51_1)然而我們頗有理由懷疑，幫艾希曼收集剪報資料的人是否果真為保羅·武爾姆，因為艾希曼早在1937年就主動結束了二人的密切合作關系。[[52]](#_52_1)其實艾希曼根本不需要這些原始資料，因為許多部門都在收集外國的新聞報道，猶太事務部門當然也包括在內。畢竟監視“猶太世界的新聞媒體”就是該部門的每日例行工作。所以很可能的情況是，艾希曼不想讓別人懷疑是他自己收集了那個據稱已在戰爭結束前不久銷毀的剪報集。可是艾希曼后來在阿根廷自吹自擂的時候，其話中的驕傲仍顯露無遺：“在國內和歐洲其他各國，再沒有任何人能夠像敝人這般，成為猶太政治生活中家喻戶曉的人物。”[[53]](#_53_1)在艾希曼的下屬中間，他們那位上司的赫赫威名當然更非什么秘密，況且他還登上了國內的煽動性報刊。[[54]](#_54_1)

根據艾希曼的講法，下一篇關于他的報紙文章似乎是針對布拉格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Prague Central Office）而發。[[55]](#_55_1)他告訴薩森：“當我被派到‘保護國’[\*](#_327)的時候，又有一家外國小報寫到了我。”[[56]](#_56_2)這一回的“小報”是《建設》（Aufbau），即為“紐約德國猶太人俱樂部”發行的月刊。1939年9月號在第8頁刊登了一則小小的公告：

布拉格：在突擊隊領袖艾希曼的主導下，“移民辦公室”已開始將保護國的全體猶太人遷至布拉格。無論以何種方式，每天必須有200名猶太人離開那個占領區。

艾希曼當時的官階為“黨衛隊高級突擊隊領袖”。[\*](#_328)文中提到的“突擊隊領袖”并非任何納粹官階，而只是一個軍事職位，這可能是黨衛隊千奇百怪的新創官階名稱屢屢在國外造成的又一個誤解——畢竟艾希曼從來沒有擔任過什么“突擊隊領袖”的職務。但就其他方面而言，那篇短文的來源也算可靠。同年3月以前，艾希曼除了維也納中央辦公室的工作之外，也忙于建立柏林的全國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如今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以“保護國”的名義并入德意志國（Deutsches Reich），他更必須從一開始就參與布拉格中央辦公室的組織工作，甚至還跟家人一同移居布拉格。薇拉·艾希曼于是在1939年年底，當她身懷六甲、即將生下第二個男孩的時候，與丈夫搬進了捷克猶太作家埃貢·埃爾溫·基施（Egon Erwin Kisch）昔日的住所。她的一些家人也跟著搬進了同一棟樓房——作為一名事業新貴的妻子，她能夠獲得許多意想不到的好處。從1939年7月14日開始，艾希曼在布拉格的活動皆有明確記錄可尋，因為在那一天，他作為瓦爾特·施塔勒克（Walter Stahlecker）[†](#_329)的“代表”，出面與保護國的政府進行談判。[[57]](#_57_2)施塔勒克是黨衛隊區隊領袖，與艾希曼私交甚篤。他不但把艾希曼介紹為自己的代表，還介紹艾希曼是一些樣板機構的負責人，而布拉格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就將按照那些機構的模式——即按照“全國模式”或“柏林和維也納模式”——建立。施塔勒克還邀請在場人士前往維也納實地參觀。[[58]](#_58_2)布拉格猶太社區的代表人員從一開始就明白他們在跟誰打交道，而且知道自己既然奉命成為日后在布拉格的聯絡對象，毫無疑問將被迫與維也納那些非自愿的“同事們”交流。[[59]](#_59_1)早在1939年8月，也就是在艾希曼官方領導的布拉格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成立不到一個月時，倫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情報單位已收到一份關于猶太百姓在保護國處境的內容翔實、來源可靠的報告。文中呈現出的艾希曼形象令人印象深刻[[60]](#_60_1)：

黨衛隊二級突擊中隊長艾希曼已于7月接掌了蓋世太保負42責猶太人問題的部門，此前他是維也納和東方邊區[\*](#_330)負責猶太人問題的重要官員。艾希曼享有特別全權，據稱直接向希姆萊匯報。他前往布拉格的目的是要讓整個保護國擺脫猶太人。

艾希曼先生立刻積極投身完成這項任務。由于如他所說，他無法逐一跟每個猶太人交涉，于是總共委派了四個人擔任保護國猶太社群的代表，他親自接見這些人并向他們下達命令。他們是布拉格猶太宗教社群的主席埃米爾·卡夫卡（EmilKafka）博士、該社群的秘書弗蘭蒂澤克·魏德曼（Frantisek Weidmann）博士，以及巴勒斯坦辦事處的兩位代表——卡恩（Kahn）博士和埃德爾施泰因（Edelstein）秘書長。艾希曼接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魏德曼博士送去維也納24小時，實地考察當地的各種設施。等魏德曼博士回來以后，艾希曼便下令即在布拉格的猶太宗教社群設置移民部門。

“中央辦公室”實際上是“一個由蓋世太保：艾希曼先生及其同僚金特（Günther）、巴爾特（Bartl）、諾瓦克（Novak）和富克斯（Fuchs）領導的機關”。個別捷克機構的代表人員也在此工作，“因為艾希曼先生已經下令，從現在起，任何其他機關都不可以向猶太人核發任何許可證……布拉格猶太宗教社群向艾希曼先生保證，每天將有250名猶太人前往中央辦公室申請移民許可”。然而完成這個配額成了很大的問題，于是該文繼續寫道：

猶太人正面臨著一場真真切切的災難的威脅，因為艾希曼先生確信：只要被逮捕兩三次之后，每一個猶太人都會想盡辦法移民出去。艾希曼先生處心積慮地在當地猶太人中營造一種氛圍，即能夠獲準移民出去就是不幸中的萬幸，縱使身無長物也不打緊。如此一來，凡是有辦法把大批猶太人運送出去的個人或“旅行社”都會特別受到眷顧。艾希曼先生更允許一些來路不明、收取高額費用的人員運輸業者，將自己的辦事處搬到布拉格。于是出現了那些臭名昭著的可惡非法運輸行動，把人運往巴勒斯坦、南美洲和其他地區。全球新聞媒體紛紛刊登詳盡的相關報道……

在組織移民行動的同時，艾希曼先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來清除保護國內的猶太人。他在猶太人中間營造必要的氛圍，促使他們“渴望移民出去”。他更特別規定，所有猶太人都必須遷居到布拉格。……此舉意味著摧毀他們的生計。艾希曼先生認為，這些人該怎么活下去、將要住在哪里，不是他要操心的事。如果布拉格的一個房間里面擠了10～15名猶太人，他們將會更努力地想辦法移民國外。艾希曼先生在保護國這里所施展的手段，跟他在東方邊區用過的方法如出一轍。

任何干預或解釋都無濟于事。艾希曼先生口頭下達的指令就是法律規定，并且已經開始執行。

無論這篇報道的撰寫者是何許人也，他顯然認識艾希曼本人。字里行間清楚地呈現出艾希曼這名黨衛隊代表是何等重要。有別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這個艾希曼在發號施令和做決定的時候，能夠毫不困難地說出“我”這個字。這個艾希曼安排遣送、發出指示、給予許可、采取措施、下達命令、接見下屬，無論如何，這篇報告都不會讓人對艾希曼的行為產生任何疑問。至于《建設》文章中同樣報道的將捷克猶太人全部重新安置到布拉格的做法，更完全符合艾希曼在維也納已經有效遵循的一種模式：所有猶太人都必須搬到首都，以便能夠最快速地從那里移民出去。在布拉格，艾希曼甚至不再試圖隱瞞此一措施的真正意義：生活條件越是窮困艱難、所處環境越是危機四伏，那么被迫移民出去的壓力也就越大。

借由一股腦兒地驅逐猶太人和沒收猶太財產的行動，到1939年夏末，艾希曼已經在奧地利、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和所謂“國家老區”（Altreich）的猶太人團體中取得了顯著地位。在自己人的圈子里面，這種不斷上升的權力地位同樣沒有受被忽視，因為艾希曼很快就被看成“在維也納和布拉格設立移民中心的人”。[[61]](#_61_2)與此同時，艾希曼也從海德里希的平步青云中獲益良多。在一個不那么注重官階，而是建立在庇蔭關系之上的體系里，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艾希曼后來曾令人印象深刻地描述這種“候見室威望”（Vorzimmer-Autorität）：“我從來不必在海德里希的候見室等很久。盡管待在那里其實是很有意思的事，因為可以遇見各式各樣的人物。而大家都知道，凡是能夠進入海德里希候見室的人……無論官階高低，都大有來頭。”[[62]](#_62_1)——類似阿道夫·艾希曼那樣的角色。

### 敗中取勝的招數

在《建設》刊出那篇短文的同一天，德國對波蘭的入侵開始了。此事不僅改變了新聞報道的優先順序，更大大擴展了艾希曼的活動范圍。被大肆報道的“東方生存空間”（Lebensraum im Osten）非但給“猶太人問題”新增添了300多萬波蘭猶太人，同時也為移民與遷居的計劃開啟了新的可能性：如今除了敲詐、劫掠和驅逐猶太人之外，還能夠在個人職權范圍內，把他們從社會的邊緣遣送到帝國擴大后的版圖上更加荒涼的邊緣地帶。得益于全面深入的研究，現在我們已相當清楚1939年10月，在艾希曼的領導下，首次將猶太人從維也納遣送到摩拉維亞的俄斯特拉發（Mährisch Ostrau[Ostrava]）時的情形。不過即使早在1939年的時候，這個在東方建立“猶太人保留地”的計劃就已經受到外界注意。倫敦《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和《巴黎每日新聞報》分別在1939年10月23日和24日報道了一個準備設置在盧布林（Lublin）附近的“猶太人保留地”，稱“波蘭全境的猶太人將被遣送到那里”。隨后幾天，這兩家報紙繼續追蹤報道了“希特勒的猶太人國家計劃”。[[63]](#_63_1)第一篇關于將猶太人從維也納驅逐到摩拉維亞俄斯特拉發的報道出現于1939年11月18日。雖然因為從一開始便困難重重，計劃在此時已經停止許久，不過就這種通常會高度保密的問題而言，消息泄露的時間還是早得驚人。[[64]](#_64_1)

艾希曼自己對消息的泄露難辭其咎，因為他曾要求維也納和布拉格猶太社區的主要代表隨第一批被遣送者一起前往尼斯科（Nisko）附近的桑河（San）沼澤地。本亞明·穆爾默斯坦（Benjamin Murmelstein）、尤利烏斯·伯斯漢（Julius Boshan）、貝特霍爾德·施多費爾（Berthold Storfer）、雅各布·埃德爾施泰因和里夏德·弗里德曼（Richard Friedman）等人暫時還沒有遭到遣送——他們必須眼睜睜看著這個蓄意謀殺的計劃執行。[[65]](#_65_1)他們于是見證了艾希曼在摩拉維亞俄斯特拉發和尼斯科兩地的表演，艾希曼在尼斯科更至少發表過一次“歡迎演說”。對這種妄自尊大的表現，除了戰后的描述之外，1939年11月25日的《巴黎每日新聞報》上面已可找到一篇標題為“由SS骷髏頭單位看守的保留區”的專文。其最后一段是：

根據來自華沙的報道，蓋世太保特務愛爾曼（Ehrmann [!]）已經抵達該地。此前他相繼是維也納和布拉格的“猶太事務專家”。他來自巴勒斯坦的德國殖民地薩羅納（Sarona），會說意第緒語和希伯來語，是尤利烏斯·施特萊徹的密友。在布拉格，他曾經威脅恫嚇猶太人，要是不趕緊移民出去就會遭到大屠殺，但同時他也給移民許可申請者制造了最大的麻煩。

即使那個打字錯誤也掩蓋不了文中人物的身份，因為所描述的內容——如我們在后面會看到的——已經清楚得無以復加了。[[66]](#_66_1)至于文中提到他是尤利烏斯·施特萊徹密友一事，非但不正確，而且肯定會惹惱艾希曼。該文的其余部分展現了尼斯科行動（Nisko-Aktion）在新聞界激起的強烈回響，并且引述了丹麥、瑞典和波蘭的報紙。遣送猶太人的首次嘗試吸引了新聞媒體的大量關注，因此很難理解為什么還會有人大費周章，另外邀請目擊者過去見證。無論如何，納粹黨不太可能僅僅是低估了行動所產生的輿論效應。因為即便一個小型猶太人社區理事會，其在納粹黨人眼中所具有的國際影響力，也遠遠超過了大型猶太社區的實際能力。艾希曼及其上司們最初的打算，或許是想通過讓猶太社區的主要代表陪同人員運輸，來安撫被遣送者與一般大眾。根據經驗，顯要人物的在場能夠給人受尊重、有地位的印象。這種印象至關重要，因為這畢竟是一次破天荒的嘗試，要讓成千上萬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在眾目睽睽之下登上火車，駛向連他們自己都不清楚的目的地。納粹黨人非常重視這次嘗試產生的公眾效應，于是全程詳細記錄了各種輿論反應。[[67]](#_67_1)也有可能，盡管這個實驗從一開始就陷入困難，但他們希望通過有人親眼見證，給停滯不前的移民行動施加更多壓力。

事到如今，替代移民國外的做法已不再是留在維也納市內，忍受艱苦條件并要處于暴力和騷擾的陰影下，而是前往一個與外界斷絕聯系的沼澤地帶。因此，艾希曼在返回布拉格之后告訴埃德爾施泰因：“每天來到布拉格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的移民出境者人數必須增加，不然的話，布拉格的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就要關閉了。”同時，他允許埃德爾施泰因離開保護國，前往外國談判。[[68]](#_68_1)如果“尼斯科計劃”的確像一些研究者和艾希曼本人所說，是一個完全失敗的納粹計劃（或者如艾希曼以他特有的那種令人受不了的表達方式所稱的，是個“天殺的恥辱”[Mordsblamage] [[69]](#_69_1)），那么艾希曼至少也再度設法對之加以充分利用：他把桑河沼澤地用作最后通牒來施壓。埃德爾施泰因借前往的里雅斯特（Triest）的機會把他的尼斯科報告帶到境外。倫敦《泰晤士報》（Times）隨即以此為基礎，在1939年12月16日刊發了近300行的長文。開門見山的標題——《納粹的計劃：一條通向滅絕的無情道路》（‘The Nazi Plan: A Stony Road to Extermination’）——毫不含糊地揭露了所發生的事情：據保守估計，在波蘭有上萬人死亡，數十萬人遭到驅逐。有報道指出，猶太社區“被迫參與這項令人毛骨悚然的工作”。文中充滿遣送過程的相關細節，并使用了諸如“猶太人保留地”（Judenreservat）、“生存空間”（Lebensraum）和“殘余波蘭”（Polish Reststaat）之類的德文術語。[[70]](#_70_1)

納粹黨人對那篇文章的反應迄今不詳，但他們無疑曾經讀到過，而且艾希曼扶搖直上的職業生涯未曾因此受到任何傷害。納粹的波蘭總督漢斯·弗蘭克（Hans Frank）試圖阻止運送任何猶太人進入其轄區，然而就連他的怒火也奈何不了艾希曼。有傳言說弗蘭克已經簽署命令，只要艾希曼再度踏上“波蘭總督府”（Generalgouvernement）的土地，就立刻加以逮捕。但艾希曼卻把此舉當成一個愚蠢至極的笑話。他在阿根廷趾高氣揚地解釋說：“他下達了命令，要逮捕一位帝國保安總局的成員、一名高級部門主管，由此可見他是多么妄自尊大。這就是弗蘭克的風格，他是個自大狂，開始表現得像個獨裁者，以為那么容易就可以把我抓起來！”艾希曼接著說了自己公然做出這種推測的理由：“他顯然把我當競爭對手看待。”[[71]](#_71_1)但真正妄自尊大的人其實是艾希曼，認為漢斯·弗蘭克——希特勒的律師和波蘭占領區當時的總督——在與阿道夫·艾希曼的權力斗爭中，從一開始就屈居下風。無論是弗蘭克本人，還是嘲笑弗蘭克失敬的人，都沒有把這位“艾希曼”看成一個聽命行事、毫無影響力的小小官僚。

### 完美的希伯來專家

《泰晤士報》刊出那篇專文三天后，艾希曼奉命掌管帝國保安總局第四局（Amt IV des RSHA，即“蓋世太保”）轄下的“R特別部門”（Sonderreferat R）。該部門后來在1940年1月30日與全國猶太移民中心合并，劃歸到負責被占領地區的第四局D處（IV D），更名為第四局D處4科（Referat IV D 4）。[\*](#_331)這個改變大大擴展了艾希曼的職權范圍：除了逼迫猶太人移民之外，現在他還要負責協調將猶太人遷移到東方的各種計劃。艾希曼隨后的晉升更加表明，沒有人懷疑他組織大規模人口遷徙的能力。從1940年4月起，他和一位同僚還另外接手了位于波森（Posen）的移民安置中心，負責執行希姆萊“清空瓦爾特高（Warthegau）的異族人”的計劃。于是波蘭人和猶太人被強制遷出，以便讓位給來自沃里尼亞（Volhynia）和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的德裔移民。[\*](#_332)有趣的是，艾希曼的聲名此時已經傳到了波蘭。當時住在索斯諾維茨（Sosnowitz）的弗里達·馬齊亞（Frieda Mazia）后來在1961年出庭作證：

我們大約在1940年年初就已經知道，如果有高階的德國官員或軍官過來，大家還是躲藏起來為妙，千萬別在街頭露面。……有傳言說絕對不能跟他們接觸，因為他們當中有一個人出生在巴勒斯坦的德國殖民地，不但會說意第緒語和希伯來語，而且熟悉所有猶太習俗。[[72]](#_72_2)

馬齊亞女士在這里的證詞，并不是受了戰后才知道的信息的影響。除了前面引述的《巴黎每日新聞報》的專文，另一篇關于艾希曼的最有影響力的文章亦表明了這一點。1940年12月6日，紐約的《建設》刊發了一小段文字。這回不但完全集中于艾希曼，甚至還出現在頭版：

完美的希伯來專家

艾希曼專員是蓋世太保新派往羅馬尼亞的密探和劊子手，他已經在本周抵達布加勒斯特（Bucharest）。艾希曼來自巴勒斯坦，誕生在特拉維夫（Tel-Aviv）附近薩羅納的圣殿騎士封邑。他能說一口流利的希伯來語，并且熟悉猶太復國主義的歷史，以及猶太復國運動各個團體的人物、影響力和政治傾向。

這篇短文幾乎沒有講對任何事情，也正因為如此，艾希曼才特別感到沾沾自喜，畢竟所有那些傳說的來源恰恰就是他自己。艾希曼來自萊茵蘭的索林根（Solingen），不過他知道那個位于巴勒斯坦、名字鏗鏘有力的圣殿騎士聚落——雖然即便在《邁爾大字典》（Meyers Lexikon）上面也查不到“薩羅納”那個地名。或許艾希曼是從利奧波德·馮·米爾登施泰因（Leopold von Mildenstein，他的頂頭上司和受人欽佩的近東問題“專家”），或者從他的朋友奧托·馮·博爾施溫（Otto von Bolschwing）那里，聽說了有關特拉維夫附近這群激進反猶的德國群體的事情，以及他們如何在1871年之后自詡為圣地的最后一個基督徒堡壘。[[73]](#_73_2)當然，也有可能是他在瀏覽猶太報刊的時候，偶然發現了圣殿騎士聚落的名字。[[74]](#_74_1)艾希曼很早就有意使用薩羅納這個地名，既在自己的陣營之內，也在猶太社區代表及其周遭人士面前，加深了別人對他的印象。海因里希·格呂貝爾（Heinrich Grüber）是柏林市一位專門替不信仰猶太教的猶太人發聲的牧師，曾經在1940年直接向艾希曼詢問他所謂的出生地。盡管我們不太清楚艾希曼究竟是怎么回答的，但格呂貝爾聽完之后顯然相信了那個傳說。[[75]](#_75_1)

艾希曼也向維也納的猶太人講述了同樣的事情，用以假亂真的流利說辭談論起弗拉基米爾·澤埃夫·亞博京斯基（Vladimir Zeev Jabotinsky）和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以及二人對猶太復國主義的不同觀點，還提到只有猶太人才感興趣的名字。[[76]](#_76_1)本亞明·穆爾默斯坦也曾親耳聽過艾希曼講他的身世故事。[[77]](#_77_1)迪特爾·維斯利策尼（艾希曼的同僚和朋友，他們之間的關系十分復雜，愛恨交織）曾講述過幾個不同的版本，內容都可以總結為：艾希曼講了自己的故事之后，欣喜地發現人們相信了，于是意識到這個傳說能派上多大的用場——例如讓他可以堂而皇之地謊稱自己會說希伯來語，而且對猶太人了解得一清二楚。[[78]](#_78_1)

這個故事更宛如一根紅線，貫穿了艾希曼的公眾形象。1943年人們在荷蘭談論它[[79]](#_79_1)；1944年在匈牙利，艾希曼更積極靠它來鞏固自己的威權。維斯利策尼也利用它來使猶太社區對他的頂頭上司心生畏懼——因為艾希曼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讀得懂，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又打扮得那么像猶太人，隨時都有辦法不知不覺地混進他們當中。這種恐怖情景產生了持久的效果，以至于人們在戰后都還擔心艾希曼會冒充猶太人秘密前往巴勒斯坦，躲藏在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當中。[[80]](#_80_1)據說艾希曼也曾在私下談話中，向官階高出他許多的黨衛隊指揮總部（SS-Führungshauptamt）的集中營督察長里夏德·格呂克斯（Richard Glücks）講過薩羅納傳說。那個傳說在許多方面對他的聲譽產生了助益。

鑒于艾希曼兩三下就足以在同事們面前裝出完美希伯來專家的樣子，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到不少關于他如何有效打造自己角色和形象的方法。[[81]](#_81_1)艾希曼根本不會希伯來語，而且也只能說一點點意第緒語。或許是受到他所欽佩的米爾登施泰因的激勵（米爾登施泰因同時通曉希伯來語和意第緒語），艾希曼曾試圖學習那兩種語言，但很快就達到了自己的限度。事后回顧時，他把第一次嘗試的時間定在度蜜月之際，也就是1935年3月。[[82]](#_82_1)有證據表明，他在1936年夏天首度提出申請，想找一位猶太裔的希伯來文教師，但被海德里希拒絕了，并且向他推薦了一位“雅利安人”語言老師。雖然那位老師愿意效勞，后來卻沒有了下文。[[83]](#_83_1)米爾登施泰因大約在同一時間被調離，部門的語言問題隨即在第二年變得越發嚴重，因為已經再沒有人能夠閱讀希伯來文了。盡管嘗試了“自學”，但艾希曼還是對希伯來文一竅不通，而他在1937年6月第二次提出的拜師申請又遭到了拒絕。[[84]](#_84_1)艾希曼稱他隨即買來一本教科書，掃羅·卡萊科（Saul Kaléko）編著的《大家來學希伯來文》（Hebräisch für Jedermann）。[[85]](#_85_1)然而既不同于書名，也不同于艾希曼的講述，那本教材即便對訓練有素的自學者來說也相當不容易，頂多只適合作為艾希曼辦公桌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擺設品罷了。

于是1938年，艾希曼自掏腰包，在維也納跟本亞明·穆爾默斯坦上了幾小時希伯來文課，但這也沒有帶來多少幫助。[[86]](#_86_1)奧地利和匈牙利的證人們都認為，艾希曼不過是很有技巧地用一些簡單的句子虛張聲勢罷了。[[87]](#_87_1)1960年在以色列的時候，艾希曼顯然完全聽不懂希伯來語，而且也無法閱讀。然而，他僅僅靠著幾個短句和不至于把希伯來文書拿顛倒的本事，便足以扮演內行人的角色。

這必須歸功于艾希曼的表演天分和良好的記憶力，但同時也是由于德國的猶太人并不習慣有人對他們這么感興趣，況且對方還是一名納粹黨員。納粹成員當中竟然有人這么了解猶太人，實在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但反過來也說明艾希曼必然已經是納粹政權特別引人關注和特別出名的人物，否則那些傳說根本不可能出現并流傳得這么廣。

艾希曼從一開始就密切關注自己的公眾形象，并千方百計設法加以影響。連他最后的那些注記，也只能視為對別人關于他的書籍和論斷所做出的回應。1961年出庭受審時，艾希曼的反猶太主義偏執導致他過分高估了學術界和新聞界的“沆瀣一氣”；同樣，1939年在柏林對著猶太代表們大發雷霆的時候，艾希曼也高估了外國新聞媒體在他自己國內的影響力。那些報刊根本不準輸入德國，即使連擁有它們也是危險的事情。“世界猶太集團”與“國際新聞界”和“遭到滲透的學術界”之間密切互通消息，這僅僅存在于納粹的噩夢之中。但這并不表示艾希曼出現在歐美報刊上的公眾形象只不過是來自遠方的幻影。消息來源是納粹暴力所及范圍內的線人，因此即便最不切實際的文章，也多少能夠向我們呈現此人帶來的影響。

### 理想的象征符號

阿道夫·艾希曼不是第一個意識到公眾形象能夠發揮極大作用的人。對象征符號和理念所能產生效果的認知，正是納粹黨成功的秘訣之一。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中早已發出提醒，千萬不要低估一個象征性人物所能產生的影響。艾希曼20世紀50年代在阿根廷說，自己是在戰爭爆發后才終于成名的：“我在各地聲名大噪。”[[88]](#_88_1)他的名字甚至出現在昔日同僚在維也納出版的一本書中。[[89]](#_89_1)但艾希曼名聞遐邇的主要原因，還在于他的受害者們看得見他。“僅僅靠著新聞媒體，艾希曼這個名字就已經成為一個符號……總而言之，猶太人一詞……變得跟艾希曼這個名字密不可分。”[[90]](#_90_1)一個原先毫不起眼、名稱改來改去的公家機關，早已被每個人簡稱為“艾希曼辦事處”[[91]](#_91_1)，艾希曼在國外的代辦人員則被稱為“艾希曼別動隊”（Sonderkommando Eichmann）。[[92]](#_92_1)這類用語極具影響力，以致在紐倫堡審判的證人陳述當中還不時出現。這一現象不能完全用“艾希曼與帝國保安總局的許多部門負責人不同，在戰爭期間一直留在他的職位上”來解釋。要是沒有合適的公開露面機會，他永遠不可能為自己贏得這樣的名聲，而若無這樣的名聲，“艾希曼辦事處”便不可能長年有這樣的權力地位。一個人只能在自己手臂夠得著或者命令可達的范圍內活動，而艾希曼的形象卻能夠在他從未去過的地方產生影響，先決條件是有人把他的聲名傳播到那里，即便那個人是敵人也無妨。艾希曼曾解釋道：“人們認為我擁有的權力比我實際掌握的大得多，結果每個人都以為自己受到監視。”[[93]](#_93_1)而這只不過是因為人們害怕他所謂擁有的權力罷了。

納粹黨的權力概念是非常個人化的，而其取得快速成功背后的機制不只在高層才發揮作用。艾希曼和他的同僚們很快就意識到，一個元首般的人物多么有利于延攬權力。這是促使艾希曼不愿意躲在陰影下，也不吝于自我標榜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些人需要一塊掛得出去的招牌，使它跟猶太人問題“不可救藥地聯系在一起”，而“艾希曼”這個名字正是那塊能夠取信于人的招牌。艾希曼后來試圖讓這種選擇看起來像是出于偶然——此種觀點進而不時出現在一些關于艾希曼所扮演角色的書籍和專文當中。然而還有什么其他名字被考慮用作象征符號呢？

艾希曼密切關注其在公眾中建立起的與日俱增的名氣，因此他不會沒有看到，自己的所作所為也跟著越來越出名。國際新聞媒體對此做了報道，納粹黨人則巨細靡遺地研讀“世界猶太集團”的報刊文章——在一場同時使用“思想武器”的戰爭中，新聞檢視不啻前線偵察任務。隨著艾希曼的計劃與行動跟他的名字成功聯系在一起，無論是在他自己看來還是在同僚們的心目當中，艾希曼的重要性都在不斷提高。與此同時，許多人也因為艾希曼出席部級協商會議和規劃會議而對他熟稔起來。盡管我們對透過個人生平來看待歷史帶著十二分的小心，仍不免驚訝地發現，竟然在那么多重要會議的與會者名單上都找得到艾希曼的名字。他從一開始便參與了各項準備工作，主導各式各樣的實驗，而那些實驗——諸如維也納中央辦公室、多普爾強制勞動營、桑河河畔的尼斯科猶太人保留地、遣送斯德丁（Stettin）[\*](#_333)猶太人的行動、建立猶太人隔離區，甚至首次大規模滅絕的嘗試——全部可以看成日后大屠殺慣用手法的濫觴。等到海德里希在臭名昭著的萬湖會議（Wannseekonferenz）上正式指派他負責全面協調“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的跨部門合作之后，艾希曼的職業生涯水到渠成地來到下一個階段。這種喪心病狂的項目需要能想出非傳統解決辦法的人，以免陷入冗長煩瑣的官僚程序。艾希曼在維也納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的領導工作，及其之后的所作所為，一再向每個人證明，他完全能夠做到這一點。他被認為具備組織方面的才華，有辦法完成從來沒人做過的事情。其他人每逢束手無策的時候，就會向艾希曼求援。例如，斯特拉斯堡大學（University of Strasbourg）的“骨骼收藏”要求取得仍然活著的“猶太裔布爾什維克委員的顱骨”。由于艾希曼的支持，這也是可以辦到的。[[94]](#_94_2)

棘手問題解決專家的聲譽讓艾希曼自鳴得意，甚至在他既非倡議者亦非主要推動者的情況下，也有辦法讓別人相信某項計劃出自他的主意。例如所謂的“馬達加斯加計劃”（Madagaskar-Plan），直到今天都還跟艾希曼的名字連在一起，即便已經證實，最初的想法并非來自艾希曼，他甚至從來不曾具體參與過那項計劃。[[95]](#_95_1)但他還是成功了，以至于直到今日，盡管反駁的證據確鑿，在談論這項人口遷移計劃時，卻沒有人能不提起他的名字。在后來的歲月里，艾希曼極力轉移人們的注意力，意圖在環境丕變之后淡化自己當初所扮演的角色，但這種做法反而更進一步確認了他昔日掌權時所實際享有的地位。只有心虛的人才會設法隱瞞，而艾希曼在這方面的做法效果驚人。

因此，歷史學界花費了不少時間，才弄清那些大規模人口驅逐和遷移計劃的重要意義，而艾希曼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作為“IV R特別部門”[\*](#_334)的負責人，他的職責是“于東方地區進行人口驅逐之際，總管安全警察相關事宜”。與艾希曼同時代的人更清楚其中的關聯，這從內政部的一份報告中即可看出端倪。該報告指出，1941年9月，艾希曼主張擴充猶太人的定義，把“半猶太人”也包括在內，“他極力支持新的規定，盡管對于應該采取什么形式沒有表態”。報告中關于他的個人簡歷寫道：“艾希曼曾負責在維也納和布拉格設立移民中央辦公室，并指揮了將斯德丁等地的猶太人遣送至波蘭總督轄區的工作。”[[96]](#_96_2)

1940年2月13日夜間將猶太人驅離斯德丁，以及隨后發生在波森和施奈德米爾（Schneidemühl）[\*](#_335)的驅逐行動，成為重新規劃整個東方占領區的序幕，并引起了全球媒體的注意。[[97]](#_97_2)各國的反應受到納粹的密切監控，艾希曼更利用了這種原本讓人感到緊張的國際關注，一如從前利用失敗的尼斯科計劃那般，在次月和猶太人代表舉行會談時施加壓力——威脅他們如果未能達到所要求的移民配額，就會采取類似的“人口遷移計劃”。[[98]](#_98_1)艾希曼的公共形象使媒體夸大了他在人口遷移工作中的角色。他處心積慮地強化別人的印象，讓人覺得他隱藏在每件事、每個人的背后。再加上媒體對人口驅逐的報道，那一切所構成的恐怖情景不是外人能夠想象的。盡管國際新聞界也報道了過度的暴力，甚至做出加油添醋的宣傳，但在當時卻反而被艾希曼利用，而沒有對他造成傷害。各種報道中越是充滿“那是艾希曼干的好事”這種論調，人們越是“純粹出于習慣把一切事情都算到他的頭上”，他的名聲也就跟著越發響亮。[[99]](#_99_1)艾希曼不僅看透了這種輿論傳播的機制，甚至還將其為己所用。

### 公關活動

作為東部人口遷移工作的協調者，不論在受害者還是他的同僚看來，艾希曼的自信都顯而易見。1941年1月，希姆萊出于自我吹噓和公共宣傳的目的，下令籌備一項將在同年3月舉行的名為“大返鄉”（Die große Heimkehr）的展覽，以慶祝“引領回家”（Heimholung）人口遷移政策的成功。艾希曼迫不及待地要趁此機會大顯身手。他竭盡全力，終于成功地“在人口遷移展覽中，為強制撤離行動爭取到一個特別展廳”。雖然納粹黨國外德意志民族事務部（Volksdeutsche Mittelstelle）由于擔心負面的輿論反應而寧愿避開這個部分[[100]](#_100_1)，艾希曼還是力排異議，實現了他向德國公眾展示其“成就”的愿望。所以一方面是歡天喜地的新移入者的照片，另一方面則是被驅離的人數以及圖片資料。但不管艾希曼再怎么信心滿滿，到頭來依舊無濟于事。開展的日期先是被延后到1941年6月，又在希姆萊視察過后于最后一刻喊停，敷衍那些大失所望的部門專家們開展日期推遲到1942年3月。結果那個展覽從未舉辦，部分原因在于實際取得的“成功”不盡人意。然而這個過程表明，韜光養晦的生活從來都不是納粹的理想，他們自我炫耀的沖動往往甚至必須被壓制，因為國家領導們有時會覺得，對某些正在發生的事情選擇隱瞞才是更聰明的做法。

\*\*\*

1941年年初，“艾希曼辦事處”再度擴大編制，此后三年多的時間都改稱第四局B處4科。“IV B 4”這個縮寫即便在戰后依然維持著標志性的名聲。艾希曼的名聲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變得越來越響亮，這從倫敦流亡者日報《報紙》（Die Zeitung）在1941年10月24日引述瑞典報道發表的一篇專文中即可看出：

大規模謀殺柏林猶太人

斯德哥爾摩《社會民主黨人報》（Social-Demokraten）針對5000多名柏林猶太人被強制遣送至東方一事進行了報道，詳細內容如下：

行動在10月17日夜間開始。黨衛隊將受害者從床上叫醒，命令他們穿好衣服并打包隨身行李。接著他們被立即帶走，住宅被貼上封條，屋內留下的私人財物則被視為已遭沒收。遭到拘捕的猶太人被驅趕至鐵路貨車站和一些猶太會堂的廢墟，然后在10月19日被集中遣送到東方。他們都是50歲到80歲之間的年邁男性，以及婦女和孩童。他們將在東方“投入有用的工作”，這意味著他們要排干羅基特諾（Rokitno）沼澤的水。這項工作將在俄羅斯的冬季由老人、婦女和孩童完成——身上穿著他們被拘捕時所攜帶的衣物。由此可見，這項行動毫無疑問是有預謀的對猶太人的大規模殺戮。此次行動的領導人是黨衛隊集團領袖艾希曼。[[101]](#_101_1)

黨衛隊集團領袖的位階相當于中將，對艾希曼來說根本遙不可及，畢竟他在那時候還只是一名黨衛隊二級突擊大隊長。[\*](#_336)盡管艾希曼在以色列法庭上聲稱，他只不過是帝國保安總局里面一個小小的官員而已，但人們在20年前可并不這么看待他，那么高的官階顯得完全合情合理。[[102]](#_102_2)當時的文件表明，艾希曼在遣送柏林猶太人的行動中發揮了主要作用。1940年夏天，戈培爾提出要求，務必要在即將獲勝的戰爭結束之后，立刻“于不超過八個星期的時間內，將6.2萬名仍居住在柏林的猶太人全部運往波蘭”。[[103]](#_103_1)1941年3月20日，艾希曼在宣傳部的一次會議上宣布，如果與已獲希特勒批準的遣送六萬名維也納猶太人的行動結合起來，驅逐1.5萬名柏林猶太人將是可能的事情。根據會議記錄，此次討論的結果為：“委由艾希曼同志針對遣送柏林猶太人一事，為省黨部領導人（Gauleiter）戈培爾博士[\*](#_337)研擬建議方案。”[[104]](#_104_2)這個方案固然暫時還需要從長計議，因為必須考慮到，“當前的生產工作需要每一名具有工作能力的猶太人”，但艾希曼從一開始就已經參與了那個構想。受莫斯科戰役的影響，行動方案又發生了改變，而一場滅絕戰的暴戾氛圍，更進一步讓之前人們連想也不敢想的某些“解決辦法”變得可以接受。戈培爾馬上意識到這個機會，早在1941年8月18日便重新提起“柏林猶太人”的問題。他不但和希特勒討論這個問題，接著還展開了長達好幾個星期之久的反猶太新聞宣傳活動。德國境內的第一波遣送行動開始于1941年10月15日，柏林的第一次運輸工作則發生在10月18日，將1013名猶太人送往羅茲（Lodz）。

這個消息立即得到廣泛傳播，再一次登上了《建設》的頭版。那篇文章給哲學家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把它剪下來拿給自己的朋友特奧多爾·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看，并且保存了下來。[[105]](#_105_1)接下來的幾天，這一事件受到國際新聞界的普遍關注，以致戈培爾在1941年10月28日的日記中寫道：“從柏林清空猶太人的行動，盡管只是小規模的初步行動，還是成了敵方宣傳的一大主題。”[[106]](#_106_1)斯德哥爾摩《社會民主黨人報》的消息正確無誤，只不過“5000多人”并非柏林被遣送離開者的數目，而是自10月18日至出刊日期之間被遣送的總人數，還包括了來自維也納、法蘭克福、布拉格和科隆的猶太人。[[107]](#_107_1)這些事件過于駭人聽聞，以致負責組織的那個人被冠上了如此高的位階。艾希曼的形象與此一點也不沖突，這表明他后來宣稱自己“只負責運輸相關事宜”的說法顯然只是為了自保而已。對1941年的艾希曼來說，那種角色未免太大材小用了。

### 窮兇極惡的引誘者

1941年年底，“最終解決方案”的含義已經完全轉向“毀滅”（Vernichtung）。由于艾希曼宣稱是他“創造”出了“最終解決方案”一詞[[108]](#_108_1)，甚至還吹噓說，戈林的命令使他從此能夠“徑自排除其他部委和機關的一切異議與影響”，因此這種含義上的變化也跟他的名字聯系在一起。[[109]](#_109_1)艾希曼從一開始就前往東方，以便親自視察各種滅絕設施，而且他的造訪當然都被記錄了下來。艾希曼日后描繪自己是一名為了機密任務而獨自出差的文書人員，與事實根本扯不上什么關系。他自己甚至曾不經意間嘲諷了這個形象。在阿根廷時，艾希曼稱他一直擔心在面對恐怖場景的時候不能維持自制力，“因為總有下屬像一條尾巴似的跟在我們后面。他們會把這種表現解讀成軟弱，并且消息馬上就會像野火一樣蔓延出去”。小小的聽命行事者或許能夠表現得躑躅不前，可是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艾希曼呢？——“那可絕對不行！”[[110]](#_110_1)他有義務扮演好自己的象征性人物角色。

密切盯著他的不只是艾希曼自己的同僚。雖然世人對瘋狂的大規模謀殺感到難以置信，因而起初未曾做出反應，但這并不意味著艾希曼的所作所為沒有見諸報紙。國際新聞界在1942年3月即已消息靈通地報道了有關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Theresienstadt）的計劃[[111]](#_111_1)，從5月起更開始報道了大規模謀殺，而且早在同年春天，報紙已威脅要采取反制行動來收集犯案者的姓名。[[112]](#_112_1)流亡者報刊記錄了對“鮑姆反抗小組”（Widerstandsgruppe Baum）成員的濫捕濫殺[\*](#_338)，而且有證據表明艾希曼曾經參與此事。[[113]](#_113_2)同樣受到公開譴責的還有華沙的情況[[114]](#_114_1)、遣送法國猶太人出境的惡劣情狀，以及“兒童轉移”（Kindertransporte）列車的背景——今天我們知道是艾希曼下令讓那些火車“滾”向毀滅。[[115]](#_115_1)1942年11月的報道首度提到海烏姆諾（Chełmno）[†](#_339)，以及艾希曼在當地視察過的毒氣卡車。[[116]](#_116_2)披露納粹謀殺計劃的報道中所引述的數字非常駭人聽聞（但后來證明正確無誤）[[117]](#_117_1)，以致盟軍在1942年12月17日公開威脅要追究所有涉案人員的刑事責任。

猶太人政策方向的改變，意味著新聞媒體失去了可能的用處：只要艾希曼繼續跟猶太人討論移民配額和資金事宜，并為此需要國際組織的合作，威脅恫嚇就是有用的手段。然而，等到目標變成謀殺之后，就再也沒有進行協商的必要了；之前或許有利于談判的威逼恐嚇的形象，如今已然成為遮掩謀殺意圖時的障礙。于是不可再做出威脅，反而要讓人安心、放心、轉移注意力，并加以安撫，否則就沒有辦法順利組織大規模的遣送行動。若必須先把人運送到另外一個地點，然后盡可能不為人知地加以殺害，那么就一定要讓這些人或多或少卸除心防，愿意登上火車。誰要是不抱著一絲希望，相信事情或許還有轉圜余地的話，就完全不會有動機這樣做。漢娜·阿倫特很貼切地稱之為“較小的惡的邏輯”（die Logik des kleineren Übels/the logic of the lesser evil）。

艾希曼總是有辦法引誘他的猶太談判對手們做出讓步與合作。其唯一的憑借就是讓他們期待，跟艾希曼進行“談判”能夠防止更糟糕的情況發生。有鑒于此，不難想象一旦那些人發現自己落入了陷阱，會是何等莫名驚駭。在運輸途中、在集中營內，以及直接面對滅絕機器的時候，那些非自愿的合作者才終于意識到，他們曾被卷入了什么樣的事情。如果在此覺醒的時刻不產生這種印象，認為自己已淪為一個惡魔般的兇手——一個披著人皮的惡魔——的犧牲品，還要等到什么時候呢？日后一些令人聞之色變的標簽，諸如“卡利古拉”、“大審判官艾希曼”、“無情的怪獸”等等，都根源于被迫認清納粹猶太政策真正意圖的那些時刻，但也源自那種像真正的暴力威脅一般，讓人成為受害者的心理機制。[[118]](#_118_1)

就一個權高位穩的操縱者而言，他自己是否名實相符基本上無關緊要。他的名氣決定了別人對他的期待，以及相應做出的表現。如果把一名黨衛隊官員看成生死的主宰者，那么就沒有什么可懷疑的余地了。外在的期待會讓他變成最受人畏懼的那種模樣，于是所看見的一切都將確證相關的謠言，傳說也就成了現實。如果誰有辦法利用這種相互作用，感受到別人的期望，并有意識地反映別人期望中的形象，便足以完全混淆別人的判斷能力。誰要是懂得利用這種依賴、恐懼和期望的循環來玩弄自己的受害者，就能夠從一名部門主管升格成為“猶太人的沙皇”。艾希曼及其同僚非常明白：他們能夠“通過這種操控獲得巨大的躍升”。

“艾希曼”變成了那種機制的具體化身，因為這是猶太社區代表們所知道的名字，而且人們相信那些代表。于是這個名字宛如幽靈般在受害者中間廣為傳播，即便艾希曼根本不可能親自在場，或者直接為他們的苦難負責。這解釋了為什么許多劫后余生者雖然很可能從來都沒有跟他碰過面，卻能夠回憶起當初遇見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阿道夫·艾希曼時的情景。顯然人類自我保護機制所起的作用，讓我們既不可能也不愿意把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命運的那號人物，想象成一個微不足道的貨色或者低下猥瑣的家伙。

凡是經歷過苦難、屈辱和死亡的人，都不希望發現自己是完全平庸之人的受害者。因為掌握著我們生殺大權的家伙竟然什么都不是，這個想法只會比有人控制著我們更加令人難以接受。這種機制讓人無法清楚看出罪魁禍首的面目，更推波助瀾地促進了象征符號的創造，通過單方面限縮自主判斷的空間，強化了當權的一方。最終，迫切地想要起碼看上自己的折磨者一眼的愿望，導致了一些眾所周知的投射性回憶。艾希曼曾“被看見”出現在會議上、機構中，甚至集中營內，然而證據表明，他從來也沒有到過那些地方，或者只是在其他時候去過。但我們不可低估那些回憶的參考價值，尤其是它們反映心理投射的一面：受害者們之所以會把穿著長筒皮靴的咆哮者或傲慢的視察官員都當成艾希曼，那是因為“艾希曼”早就不再只是一個具體人物，而是成了人們受其擺布的權勢之象征和保證。至于究竟是誰實際體現出并且粗暴地利用了那種權勢，反而變得不再重要。這個名字所造成的潛在威脅，遠遠超出了任何缺乏個性的匿名官僚體制所能達到的程度。

### 好的新聞，壞的新聞

從艾希曼卷入所謂“菲亞拉新聞事件”（Fiala-Presse-Affäre）一事，即可看出當時德國方面為了各種令人不快的公開報道有多么焦慮，以及艾希曼對國際輿論了解得多么清楚。盡管納粹不斷告訴自己，消滅猶太人乃是維護其自身生存的唯一手段，他們卻沒有足夠信心把這個觀點告訴世人。遍布全國各地的密探與監視網絡，更意味著他們擔心就連本國百姓也無法認同那些謀殺行動。希姆萊很早便意識到，永遠也無法把這個“我們歷史上的輝煌篇章”形諸文字。他更禁止奧迪洛·格洛博奇尼克（Odilo Globocnik）為萊因哈德行動[\*](#_340)的“英雄們”立碑紀念以流傳后世。其他許多不小心留下的痕跡已經給希姆萊帶來了足夠的麻煩，于是他在1942年夏天下令想辦法避免搞出更多新的萬人冢，并且要把舊有的那些都清除干凈。[[119]](#_119_2)任何形式的公開曝光都只會造成傷害。

在德國百姓與外面世界接壤的邊陲地帶，亦即在被武力奪取或者主動歸附但大致仍保留原有政府的那些地區，新聞媒體最有可能帶來危險。每當“大規模謀殺”和“滅絕”之類的字眼甚囂塵上時，艾希曼與同僚們便愈發頻繁地遇到令人尷尬的問題，甚至還遭遇反對。于是他們產生了用新聞報道來反制的念頭。據維斯利策尼稱，他曾向艾希曼推薦了一位名叫弗里茨·菲亞拉（Fritz Fiala）的斯洛伐克記者。[[120]](#_120_1)在德文版《邊境信使報》（Grenzbote）的德國猶太裔擁有者被沒收財產之后，菲亞拉成為該報主編，并且擔任其他許多歐洲報社在斯洛伐克的特派員。菲亞拉曾經自告奮勇，愿意以調查記者的身份來實地調查集中營內的“真實情況”，借此糾正它在公眾眼中的陰暗形象。

1942年夏天，當希姆萊因為國際新聞界的報道而日益擔憂世界輿論的反應時，艾希曼想起了菲亞拉的提議（艾希曼后來卻稱那是按照希姆萊的交代），在同年盛夏為菲亞拉安排了集中營參觀之行。維斯利策尼于是與菲亞拉一同前往位于日利納（Žilina）的一座斯洛伐克集中營，第二天早上接著駛向卡托維茲（Katowice）。在那里，國家警察局的一名刑事專員陪同二人來到索斯諾維茨——本津（Sosnowice-Bendzin），參觀了當地的猶太人隔離區和強制勞動工廠，且在吃過午餐并與猶太老人們交談之后，繼續前往奧斯維辛（Auschwitz）。[\*](#_341)在下午兩點到達之后，維斯利策尼與菲亞拉二人受到集中營指揮官魯道夫·赫斯的親自接待。赫斯向菲亞拉展示了指揮官辦公室，以及集中營的個別分區，然后與他們乘車來到斯洛伐克和法國女性進行強制勞動的洗衣房。菲亞拉獲準向她們問話并拍攝照片。維斯利策尼顯然設法禮貌地婉拒了赫斯的晚餐邀請，即便他后來稱那是由于時間安排上的問題。根據維斯利策尼的回憶，他們二人在下午四點鐘左右，“或者甚至更早”，便離開了那座集中營。

菲亞拉針對德國的集中營和斯洛伐克遣送出境的猶太人，撰寫了好幾篇圖文并茂的報道，而且他知道那些文字必須先通過艾希曼和希姆萊的審查。至于那些文章為什么一直要等到11月才刊出，此事就令人費解了。[[121]](#_121_2)也許希姆萊打算把正面新聞留到他親自前往布拉格視察之際[[122]](#_122_1)，也許他們只是在觀望輿論的發展，或者他們對自己的計劃已經喪失信心，畢竟那些專文提到了一些人們通常不會主動提起的地名。但不論實情如何，1942年11月7日、8日和10日，《邊境信使報》刊載了三篇很長的文字，配圖的照片上呈現出笑臉迎人的白衣少女、整潔的生活環境，以及對德國集中營內狀況的贊揚。[[123]](#_123_1)菲亞拉提到了一些能夠在斯洛伐克證實的地名，而他所引用的女性的話反而完全揭穿了整個把戲的惡毒用意。一位年輕女性不僅嘲笑了菲亞拉關于外國“暴行宣傳”的講法，還語帶諷刺地告訴他說，“奧斯維辛集中營內的日子比在巴勒斯坦要好過多了”。菲亞拉在這個背信棄義的把戲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尚不清楚。于是我們無法曉得，同時身為黨衛隊保安局線人的菲亞拉是否受到操弄，以致果真“在奧斯維辛只看見了微笑的臉孔”，還是他自行在文章中炮制出了那一切。那些文章的刪節版也被其他報紙轉載[[124]](#_124_1)，后來被艾希曼用作拒絕所有官方參訪集中營活動的理由。他把不自由的媒體作為世界觀斗爭的武器，以宣傳來反制宣傳。

\*\*\*

試圖借由推出相反的報道來影響公眾輿論的做法雖然不無效果，但現場展示終究還是可以產生比菲亞拉的造假報道更好的效果。納粹黨人習慣了德國勢力范圍內受到嚴密監控、仰人鼻息的新聞媒體，于是他們才會大驚小怪地一口咬定國外媒體也受到了其死對頭——猶太世界陰謀（jüdische Weltverschwörung）——的控制。從種族理論者的角度來看，實現新聞自由根本是難以想象的事情。艾希曼于是通過其他手段化解了人們最初的疑慮，成功將特萊西恩施塔特宣傳成一座模范的猶太人隔離區。在1942年3月出現的第一批媒體報道中，特萊西恩施塔特仍然被視為“猶太人在保護國的殉難”，是通往滅絕的“惡魔計劃”的下一步。[[125]](#_125_1)但自從1943年6月安排德國紅十字會參觀了整理得煥然一新的特萊西恩施塔特之后，輿論便開始轉向。用一套只能用成績斐然來形容的戲碼，艾希曼和他的同事們給到訪者變出一個截然不同的營區——其中充滿了祥和的氛圍，沒有任何人再從那里遭到遣送。訪客們關于過度擁擠和營養不良的批評開始消退，而他們竟然獲準參訪一事，更有助于集中營的聲譽。[[126]](#_126_1)盡管此次演出仍不足以抵消其他營區的滅絕行動和大屠殺所不斷引發的指控，但特萊西恩施塔特還是讓人立場動搖，甚至就連已看出其展示功能因而抱持批判態度的新聞記者，也都受到了誤導。結果如納粹所愿，他們用過于正面的眼光來看待特萊西恩施塔特：那是一座“終點營區”，條件相對較好，以戰時標準看還能說得過去。1943年8月27日紐約《建設》報細節豐富的封面故事《特萊西恩施塔特：一個“模范隔離區”》（Theresienstadt: A “Model Ghetto”）[[127]](#_127_1)在結尾寫道：

當特萊西恩施塔特被創造出來之際，納粹的勢力已在消退中。一些納粹領導人由于害怕未來不可避免的報復而惶惶不可終日。他們于是開始尋找無罪證明。艾希曼，那名會說希伯來語和意第緒語、曾在布拉格猶太社區制造恐怖的蓋世太保專員，想必已經變得緊張起來。特萊西恩施塔特的氛圍，與戈培爾和羅森貝格（Rosenberg）的集體迫害心態形成了鮮明對比。等到對納粹“保護者們”的報復之日來臨時，他們將會如此為自己辯護：“在那個極度暴虐蠻橫的時代，我們竭盡所能表現出了人性，特萊西恩施塔特就是我們的無罪證明。”

人們沒有質疑那種被刻意營造出來的環境，而只是懷疑德國人的動機，因而從根本上低估了其暴戾和謊言的程度。艾希曼及其同僚們竟然如此大費周章，為了一天的對外展示而粉飾整座城鎮，緊接著第二天又重新回到日常的騰騰殺氣，這遠遠超出外界的想象。順便值得一提的是，漢娜·阿倫特早在1943年9月的一封讀者投稿中，即已反對將特萊西恩施塔特解釋成無罪證明（她最晚是在這個時候聽到了艾希曼這個名字），然而就連阿倫特也無法想到這種罪行的真實程度。[[128]](#_128_1)她試圖解釋，必須在別的地方尋找“特萊西恩施塔特的真正原因”，因為即便所謂的模范隔離區也是整個遣送手段的一部分。[[129]](#_129_1)這種做法是“一個前后一貫的政治路線”中的一環：猶太人只有在這樣的地方才會被容忍，甚至得到還過得去的待遇——不是因為能夠在當地利用猶太人煽起反猶太主義，就是因為附近有太多目擊證人，于是不得不讓猶太人逃過一劫。“為了安撫百姓，納粹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國一再重申，他們并不打算滅絕猶太人，而只是要將之隔離開來。特萊西恩施塔特就用作這個目的，因為它地處保護領地的中央，位于由平民百姓控制的地方。”甚至在流亡海外時期，漢娜·阿倫特即已驚人清楚地看出，“大屠殺的發生地要不然是在俄羅斯大草原那樣人煙稀少之處，要不然就是在至少可望爭取到部分居民或多或少積極參與的地區”。誰要是想對希特勒統治地區的實況進行可信的描述，首先必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解釋迫害猶太人的行動與納粹國家機器之間的關聯”。“無罪證明”的想法在此毫無立足之地。

然而漢娜·阿倫特的聲音依然是個例外。倘若知道國際紅十字會在1944年對特萊西恩施塔特進行第二次正式訪問之后所撰寫的報告有多么脫離現實，就無法不贊嘆艾希曼的公關杰作。德國紅十字會的代表在報告中寫道： “這個居住點給每一位先生留下了非常好的整體印象。”[[130]](#_130_1)特萊西恩施塔特的工作人員汲取教訓，上一個代表團表達的不滿，例如過度擁擠，已及時用最粗暴的手段加以改正，所以這次沒有任何事情破壞所欲獲得的好印象。艾希曼跟他的同僚們創造出一種錯覺，讓恐怖幾乎消失于無形：不期待看見地獄的人，比已經做好最壞打算的人更容易上當受騙。1943年和1944年年初，公眾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事項上。雖然原因主要是戰事的發展，但我們還是不能輕忽“轉移注意力策略”通過有針對性的新聞攻勢所收到的效果。更何況艾希曼的做法，比戈培爾通過其煽動性文章進行的笨拙宣傳可要高明多了。艾希曼甚至有辦法誘使“敵方媒體”為他傳播他自己的謊言。

### “我曾在這里，而且無所不在”

但即使是最高明的公關工作，也只能把美麗畫面的逐漸黯淡推遲很短一段時間。人們慢慢對最終勝利產生了懷疑。當初只不過是因為對勝利充滿信心，才使他們不怎么在意清理痕跡的工作。將來還有時間清理現場的希望正逐漸消失，涉事者與知情者對戰敗后個人聲譽和個人前途的憂慮則與日俱增。[[131]](#_131_1)

當其他人已經開始考慮戰后時期之際，艾希曼的名聲正傳遍整個被占領的歐洲和毗鄰地區。這不僅是“艾希曼辦事處”里那些“猶太事務顧問”（Judenberater）所起的作用，更要歸功于不辭辛勞在各地穿梭旅行的部門主管本人。艾希曼日后曾說：“我曾在這里，而且無所不在。別人從來都不知道我什么時候會出現。”[[132]](#_132_1)只需看看艾希曼的出差行程即可明白：在阿姆斯特丹的會議、在布拉迪斯拉發的招待會、在海牙的鉆石交易談判、在尼斯的外交晚會和前往摩納哥散心、在巴黎召開的部際會議、閃電式訪問哥本哈根，此外還到訪猶太人隔離區、特萊西恩施塔特與各個毀滅營[\*](#_342)，以及東方的分支機構，一直到基輔和柯尼斯堡。[[133]](#_133_2)艾希曼一直喜歡強調：“從前我是個旅行者。”[[134]](#_134_1)“我們在歐洲的每一個角落，我都有辦法鉆進去。”[[135]](#_135_1)“艾希曼這個名聞遐邇的名字”[[136]](#_136_1)更在各處都是敲門磚，甚至比他那紅色的官方通行證還要來得有用——即便許多曾經為艾希曼及其同僚打開大門的人，后來都寧愿自己當時沒有被找上門來。

然而艾希曼的事業發展早就不再像從前那樣一帆風順。1943年的時候，有兩起事件更是特別產生了妨害。一是華沙猶太人隔離區的起義行動，完全撼動了艾希曼對猶太人的認識；另一則是丹麥人成功抵制了遣送猶太人出境的計劃，這被艾希曼視為個人的挫敗。[[137]](#_137_1)其原先的計劃根本沒有把抵抗行動納入考量，更遑論是被視為“缺乏戰斗意志的”猶太人的肢體暴力，以及納粹想“從猶太人手中解放出來的”各個民族所展開的破壞行動。對于一個只曉得詭計、訛詐，以及玩弄各機構于股掌的人來說，這種轉變意味著真正的巨大威脅。艾希曼不得不同時針對兩方面的轉變采取應對措施，來反制其同黨和同謀者在態度上，以及對手在行為上出現的變化。在此情況下，他一方面必須鞏固控制，另一方面則必須確保權威，于是因應時勢塑造出另外一種自我形象，并且在其同僚的幫助下成功地廣為傳播：這個艾希曼不僅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人，他還有許多有影響力的朋友。

海德里希在1942年6月的突然死亡，使艾希曼失去了最主要的靠山，不僅在公務上如此，在情緒上亦然。自己的頂頭上司遭到暗殺，想必讓艾希曼感覺是對自己的人身威脅。基于個人安全方面的考慮，艾希曼設法用防彈玻璃和汽車后備箱內的移動武器庫來自保，并開始確保沒有人拍攝他的照片。[[138]](#_138_1)家庭成員的安全防護也得到升級，他的孩子們在上學途中都有一名保鏢跟隨。[[139]](#_139_1)保住自己的權力則是更大的問題。希姆萊起初試圖自行接手海德里希的職責，但希姆萊是一個大忙人，且眾所周知其反復無常的個性會帶來許多麻煩。雖然在外人看來，艾希曼與希姆萊的關系似乎更近了，但實際上他無法指望希姆萊一直成為他的靠山。帝國保安總局第四局的負責人海因里希·米勒（Heinrich Müller）——“蓋世太保米勒”（“Gestapo-Müller”）——雖然不是個事業狂，不會在公開場合搶著出風頭，但這仍不足以減輕艾希曼適應新局面的困難。

盡管如此，與希姆萊的密切聯系還是成為艾希曼及其同僚在敵人和己方競爭者面前自我吹噓的工具。正如艾希曼派往各個占領區的“猶太事務顧問”表示自己來自“艾希曼辦事處”、自稱為“艾希曼特別行動分隊”那般，艾希曼在各地旅行穿梭以及與德國各機構進行談判的時候，也打出了黨衛隊全國領袖的名號。艾希曼真正的合法地位實際上更高，因為他出遠門是為了“執行元首的特別任務”。然而在一個建立于關系之上的政權中，只有與當權派的私人接觸才可帶來真正的影響力。盡管帝國總理府的撐腰有助于在和內政部談判時壯大聲勢[[140]](#_140_1)，但暗示自己有辦法當面向希姆萊稟報事情，顯然能夠產生更大的效果。自1943年以來，艾希曼于談判陷入停滯時動不動就威脅要立刻飛去見希姆萊的做法，在局外人看來跟小孩子口中的“我要向我的媽咪告狀”同樣可笑。可是就一個像納粹領導階層那般依賴個人關系的體系而言，其中所蘊含的威脅是不容小覷的。

有不少例子顯示，希特勒或希姆萊的一個決定，往往就能出人意料地把本來無法改變的一切攪得天翻地覆，或者讓他人原本飛黃騰達的事業毀于一旦。艾希曼曾在阿根廷向薩森吹噓，1943年的時候，他有一次在電話里對著希姆萊的參謀長、黨衛隊上級集團領袖[\*](#_343)卡爾·沃爾夫（Karl Wolff）大聲咆哮——這或許只是一個吹牛皮大王的白日夢，然而它也顯示了國家社會主義的等級結構及其運作方式。[[141]](#_141_2)誰要是真有辦法接近希姆萊，即可成為影響別人計劃的巨大不確定因素，從而成為一個有權勢的人物。我們有必要意識到，當艾希曼宣稱必須立刻飛去希姆萊那里討論事情的時候，他所表明的是什么含義：他這個一級突擊大隊長（甚至包括維斯利策尼那樣的一般成員），竟然在戰爭的最后階段，在紅軍的炮火聲已遙遙可聞、物資和燃料嚴重短缺之際，隨時有一架飛機可供差遣，而且不必預約就能立刻見到希姆萊。

如果跟艾希曼打交道的人們，包括其同僚在內，的確認為他具有這種權力地位的話，那么艾希曼的趾高氣揚和自我標榜也就收到了效果。這遠遠不意味著艾希曼果真擁有這樣的權力地位，也不表示他的派頭與職位相稱。但艾希曼顯然靠著自己的派頭給了別人那種印象。如果那種印象需要升級，他就必須具備一種可相對應的派頭，或者至少不能與之格格不入。艾希曼深諳其中的道理：只因為其同僚們也“以如此尊敬的態度”來對待他，他才有辦法做出名過其實的表現。

在黨衛隊保安局的那些小嘍啰粉墨登場之際，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Gustaf Gründgens），當時最偉大的舞臺劇演員和最聰明的觀察家之一，曾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簡單方式，向自己的演員們解釋了那種機制：“國王總是由別人演出來的。”舞臺上權強力大的國王，未必要由杰出的演員來扮演，因為演技精湛的臣仆就足以讓舞臺上的幽靈變成君主，而所憑借的就是他們對他做出的行為。權力結構是群體互動產生的現象，永遠無法由“強人”獨自實現，因為“強人”是被那個現象創造出來的。若是看穿了這種現象，不管經由什么途徑，便可進而利用其受害者的無助表現來增強效果。艾希曼的同僚們顯然在這方面極具才能，更何況他本人也不是隨便找來的角色。于是艾希曼也就令人印象深刻地扮演了“強人中的強人”。結果，維斯利策尼（艾希曼顯然也一樣）甚至宣稱自己與希姆萊有親戚關系，而那只不過是這種嘗試的最終強化，以便在變幻莫測的權力網絡中攫得一席之地。[[142]](#_142_1)但就連這種事情也被人相信了，并且留下深刻印象——不僅艾希曼的受害者和同僚如此，到頭來甚至連二戰以后的歷史學家們也是這樣。

### 大穆夫提的朋友

艾希曼還非常成功地自稱享有一種完全不同的關系，即他與“耶路撒冷大穆夫提”（Großmufti von Jerusalem）的親密個人友誼[[143]](#_143_1)，這既滿足了他的虛榮心，也同時符合他對不切實際的故事的熱衷。這個說法對公眾產生的效果，可以從其后續發展中看出，甚至為艾希曼在戰后的逃亡提供了掩護。若仔細觀察艾希曼如何成功地讓這種友誼的謊言顯得可信，即可看出自我吹噓、巧妙的信息操弄與公眾反應之間的交互作用。

哈吉·穆罕默德·阿明·阿爾-侯賽尼（Hadj Muhammed Amin al-Husseini），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在20世紀30年代被視為中東各種談判的敲門磚。這位昔日的士兵在1921年時被英國人授予了這一宗教職務。無論從經濟還是政治的角度來看，他都是貿易伙伴炙手可熱的接觸對象，因此，納粹德國和阿爾-侯賽尼之間存在著不止一個聯系渠道。其中之一是德國情報部門派駐耶路撒冷的賴歇特（Reichert），可直接通達黨衛隊保安局的猶太事務部門（此外還有當地的線人、艾希曼早年上司米爾登施泰因的朋友奧托·馮·博爾施溫）。有人猜測艾希曼與哈根在1937年前往中東旅行時曾經會晤過阿爾-侯賽尼，否則至少也見到了他的親信。這種猜測的根據是艾希曼提出的服裝津貼申請——他希望購置新的西服和一件風衣，因為“我的旅行計劃包括與阿拉伯權貴們談判”[[144]](#_144_1)。

雖然阿爾-侯賽尼在那批黨衛隊保安局人員抵達之前不久，便因為煽動阿拉伯人起義反抗英國占領當局而倉促出逃，但這個事實似乎并沒有推翻日后形成的推測，即認為雙方僅僅是因為這個意外才沒能見面。但無論實情為何，阿爾-侯賽尼曾在1933年希特勒上臺之后發函祝賀，并從1937年開始加強他與納粹德國之間的聯系。經由安卡拉和羅馬逃脫后，他于1941年11月6日在柏林獲得政治庇護，之后一直留在德國，直到戰爭結束為止。其間他帶來了形形色色的頭條新聞，更造成了巨大的費用開銷。1941年11月28日獲得希特勒接見之后，二人于12月9日再度會面。[[145]](#_145_1)這位穆夫提也在納粹帝國的其他方面大顯身手。1942年12月18日，他在柏林伊斯蘭研究中心的揭幕儀式上發表演說。他還成立了由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志愿兵組成的“黨衛軍第十三武裝山地師（克羅地亞師）”，非但在自己的黨衛隊部隊里面有了穆斯林戰士，而且他還對所謂的“猶太人問題”興致盎然。希特勒的激進反猶太主義在穆夫提那里找到了知音。后者通過收音機廣播，用激昂的煽動言論將仇恨從開羅傳播到德黑蘭和孟買：“不管你在哪里找到了猶太人，都要殺死他們。這可以取悅真主、歷史，以及我們的信仰。”[[146]](#_146_1)

阿爾-侯賽尼在德國停留期間給新聞界帶來了充滿異國情調的圖景，而且為圖書出版業提供了一本豐富多彩的傳記，描繪那名有著紅褐色胡須和藍眼睛的男子。[[147]](#_147_1)阿爾-侯賽尼在帝國保安總局第四局有自己的聯絡官（漢斯-約阿希姆·魏澤[Hans-Joachim Weise]），陪同他在德國、意大利和被占領地區旅行，并負責他的人身安全。外交部也有專人負責照顧他的生活起居（維爾納·奧托·馮·亨蒂希[Werner Otto von Hentig]）。阿爾-侯賽尼的工作人員在1942年夏天參加了至少一次黨衛隊保安局舉辦的培訓課程。[[148]](#_148_1)1942年上半年的時候，阿爾-侯賽尼還跟弗里德里希·祖爾（Friedrich Suhr）至少進行過一次長時間的討論——祖爾是艾希曼旗下第四局B處4科b組（IV B 4b）的主任，負責處理猶太人財產與國外事務。[[149]](#_149_1)此外還可以確定的是，艾希曼與希特勒和戈培爾一樣，也對這位異國客人印象深刻。維斯利策尼回憶說（那一回他同樣不在現場），艾希曼非常興奮地告訴他阿爾-侯賽尼到訪辦公室的情形，并確認那次見面的時間在1942年年初。根據維斯利策尼1946年在監獄里的供述，艾希曼告訴他說，大穆夫提在參觀之前已經去過希姆萊那里：

不久之后，大穆夫提來到位于選侯大街116號的辦公大樓，拜訪了猶太事務部門主管阿道夫·艾希曼。……過了幾天，我恰好在柏林見到艾希曼，他詳細告訴了我那次到訪的經過。艾希曼在他那間收集了歐洲各國猶太人口統計資料的“卡片室”（Kartenzimmer），針對“歐洲猶太人問題的解決方案”向大穆夫提做了詳盡的報告。據說大穆夫提對此印象非常深刻，并且告訴艾希曼，他已經問過希姆萊并獲得同意，等到軸心國獲得勝利、他返回耶路撒冷之后，將從艾希曼部門派一位成員擔任他的私人顧問。在那次談話中，艾希曼問我是否樂意自告奮勇，但我一口拒絕了這樣的“東方冒險”。大穆夫提的個人特質給艾希曼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當時曾告訴我，事后還一再重申，大穆夫提也給希姆萊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對猶太-阿拉伯事務發揮了影響。據我所知，艾希曼經常與大穆夫提見面和商討。至少1944年夏天在布達佩斯的時候，他曾經提到過這件事。[[150]](#_150_1)

維斯利策尼越是設法嫁禍艾希曼以便為自己脫罪，他關于艾希曼和大穆夫提的故事就越發精彩紛呈：他說，這二人是最要好的朋友，而且艾希曼告訴過他，阿爾-侯賽尼曾經“微服”前往奧斯維辛，實地參觀毀滅行動（根據阿爾-侯賽尼的樣貌，這其實大有可疑）。維斯利策尼最后的一些供述已明顯流露出絕望之意。他告訴正在為以色列情報部門追捕艾希曼的摩西·珀爾曼（Moshe Pearlman）[\*](#_344)：“據悉在德國軍事勝利的巔峰時期，大穆夫提有一次對希姆萊說，他希望希姆萊能夠在戰勝以后把艾希曼借給他一陣子，以便也能夠在巴勒斯坦應用其‘解決猶太人問題’的辦法。”[[151]](#_151_2)

所有這些故事的根源都是一名被關押在布拉迪斯拉發監獄里的男子，他不惜一切代價逃避被處決的命運，為此可以出賣任何人。因此它們可信的程度并不高。和艾希曼一樣，維斯利策尼在戰爭時期也曾用類似的話威逼壓迫猶太談判對象。當維斯利策尼需要采取強硬立場與被占領國的猶太人代表或政治人物談判的時候，他會讓他們確信：“大穆夫提與艾希曼保持著最密切的聯系與合作。”[[152]](#_152_1)一次，在談判斯洛伐克猶太兒童移民出境的可能性時，維斯利策尼強調說：“那位穆夫提跟猶太人是不共戴天的敵人……他在與艾希曼的對話中不斷提及此事，而大家都知道艾希曼是出生在巴勒斯坦的德國人。那位穆夫提還是德國有系統地滅絕歐洲猶太人的倡議者之一，因而在執行相關計劃時一直是艾希曼和希姆萊的合作者與顧問。”在戰后為此遭到質疑時，維斯利策尼卻改口表示，他“從來沒有說過艾希曼出生在巴勒斯坦，以及穆夫提一直是希姆萊的合作者”。換句話說，他并沒有收回有關大穆夫提曾與艾希曼合作的說辭，因為這種講法正意味著猶太人政策中的“國際承諾”。

艾希曼自己也沒有審慎對待這種說辭，甚至還利用報刊文章和官方小道消息來推波助瀾。阿爾-侯賽尼逃亡到德國，以及他和希特勒的公開亮相，受到了《德國每周新聞》（Wochenschau）和各大報刊的密切關注。許多公職部門也注意到阿明·阿爾-侯賽尼設法干預猶太人問題。那位大穆夫提一聽說有人考慮讓猶太難民移居巴勒斯坦，便立即寫出一大堆抗議信，并親自前往相關負責部門。這種事情固然也在新聞界引起了反響，但主要還是各個政府機構內部的話題。[[153]](#_153_1)艾希曼對此做出回應，宣稱是他親自通知了他那位朋友。[[154]](#_154_1)甚至連艾希曼在其他機構的同僚都認為這的確有可能，而等到他威脅說下一次還會那么做的時候，此事的可能性就顯得更大了。最后，1944年在匈牙利，當進一步遣送猶太人的談判陷入僵局之際，他更聲稱自己多次在林茨與阿爾-侯賽尼晤面。[[155]](#_155_1)阿爾-侯賽尼在1944年年底確實置身林茨，而且艾希曼會不時前往該地，畢竟他的家人就住在那里。更何況即便艾希曼沒有發出邀請，也不難查明有如此一位異國貴賓剛好同時來訪。對艾希曼來說，聽起來冠冕堂皇的差事是很好的借口，讓他趁機抽身離開已經聽得見蘇聯紅軍炮聲的布達佩斯。此外，后續的發展也表明，艾希曼最晚在那時一定已經開始跟他的妻子——尤其是跟他住在林茨的父親——考慮，萬一戰敗之后該如何自處，該怎么轉入地下生活。歷次高度機密的所謂“拜訪大穆夫提之行”，為這種模擬演練提供了理想的偽裝。

等艾希曼在阿根廷講起他與阿爾-侯賽尼的關系時，卻已不再講述那些晤面，雖然其他時候當他談論自己與權貴們的往來時，通常不會語帶保留，而更喜歡把一面之緣夸大成密切接觸。[[156]](#_156_1)在薩森訪談會上，艾希曼反而強調他們只打過一次照面，而且不是在他的辦公室。到他辦公室拜訪的其實只有大穆夫提的三名官員，向他們解釋艾希曼部門的一切事務即已足夠。根據艾希曼的說法，他只在一場招待會上遇見過阿爾-侯賽尼，除此之外都只是與其隨從打交道，他稱那些人為“我的阿拉伯朋友們”。艾希曼在薩森的圈子中表現出顯而易見的保留態度，是出于一個簡單的原因：薩森的朋友、出版商埃伯哈德·弗里奇與阿爾-侯賽尼有聯系。阿爾-侯賽尼是弗里奇出版的極右派雜志《路徑》的讀者，該雜志不時刊登這位中東人士的明確反猶太信息，有一次甚至還印上了他的簽名照片。

艾希曼既無法估量這種關系親密到何種地步，又無法判定奧托·斯科爾策尼（Otto Skorzeny）等人所吹噓的中東交易之真實程度。[\*](#_345)因而他有很好的理由，避免在薩森訪談會上大肆渲染他那段精彩絕倫的友誼。1960年在以色列的時候，艾希曼終于意識到他自己的故事所帶來的巨大危險，因此試圖更進一步弱化他與大穆夫提的聯系：

我記得大穆夫提是在1942年或1943年帶領隨員來到柏林的。第四局為了表示歡迎，在帝國保安總局位于萬湖畔的賓館舉行了招待晚會，我也被邀請參加。他的隨從當中被介紹為“伊拉克少校們”的三位先生曾前往保安總局實地了解情況，但我已經忘記了——或者更貼切地說是一開始就沒記住——他們的名字。有人告訴我（應該是第四局的人那么說，不然我還能從哪里聽來呢？），其中一位少校后來成了“中東的海德里希”。此外我還聽說，那人是大穆夫提的侄子。大穆夫提本人從未去過第四局B處4科，也從來沒有跟我說過話——唯一的例外是在前述那場招待會上，由第四局的一位東道主所做的簡短正式介紹。[[157]](#_157_2)

艾希曼接著在審訊中聲稱，當大穆夫提到訪第四局的時候，他根本就不在辦公室。誠然，他在招待會上見過阿爾-侯賽尼，但二人壓根兒就沒有交談，畢竟國家貴賓與部門主管之間的差距實在是太大了。[[158]](#_158_1)無法排除這種可能，即艾希曼這回才所言不虛，其余一切都是吹牛大王編造出來的故事。但這不足以改變這樣的事實，即艾希曼所聲稱的與阿明·阿爾-侯賽尼的關系在納粹時期非常具有說服力：人們很容易把艾希曼這名猶太事務部門的主管，想象成是阿爾-侯賽尼那位中東貴族的朋友。然而人們之所以相信那些故事，并非因為二人在反猶戰爭中目標一致。純粹是通過嫻熟的輿論操縱和自覺的形象維護，才使它們能夠發揮影響。假若艾希曼是一名唯唯諾諾的聽命行事者，做出每一個決定之前都要先得到上級的首肯，那么將永遠無法讓人相信他所講的這個故事。艾希曼在他的那些故事以及自我形象建構中，都充分利用了刻板印象。

從戰后立即發生的事情，便不難看出這些故事取信于人的程度：當艾希曼在戰俘營內表示他將逃往中東，投奔大穆夫提的時候，難友們馬上相信了他。沒過多久，有關艾希曼在中東展開新的職業生涯的流言已經甚囂塵上，甚至直到他被逮捕都不曾稍歇。他所宣稱的“個人友誼”如火如荼地繼續自動發展，到艾希曼人生的盡頭時，竟然反噬了他。在以色列審判時，檢方突然出示了一本據稱曾屬于阿明·阿爾-侯賽尼的行事歷。1944年11月9日那天清楚地寫著“艾希曼”這個名字。結果吹牛皮大王萬劫不復地被困在自己的謊言中。[[159]](#_159_1)就在那個說謊者提出完美無缺的證據，證明他自己的謊言的確所言不實的時候，已經不再有人相信他講出的任何事情了。

### 那個瘋子

在納粹時代的最后幾年，艾希曼已經開始面對昔日成功塑造出的形象所帶來的危險后果。假使他名不見經傳的話，根本就不必擔心自己的戰后聲譽。但如果艾希曼希望自己會被人遺忘或忽略，那將是非常不切實際的想法。原因有二：首先，他并非浪得虛名，無緣無故就成了納粹猶太政策的象征。其次，恰恰是這種名氣使他成為一個理想的投射面，讓別人把自己的罪責推得一干二凈。既然艾希曼老是喜歡出風頭，人們如今很容易就能躲藏在他的背后。這種傾向在1944年的時候即已顯現出來。盡管多線作戰帶來各種人力方面的問題，艾希曼的部門還是再次擴大編制，改稱第四局A處4科（IV A 4），業務進而涵蓋了之前最負盛名的職權范圍：所謂“政治化的教會”（politisierende Kirchen）。那時艾希曼即便在教會的圈子里也早已不是無名之輩。其傲慢自大的行為方式，甚至使他出現在一份同時寫給新教和天主教教會代表的報告當中：一位名叫格哈德·萊費爾特（Gerhard Lehfeldt）的新教律師曾在1942年年底1943年年初與艾希曼有過接觸，并且確信正在籌劃中的“混血人種”（或“半猶太人”）相關法案，以及引發“玫瑰大街抗議事件”[\*](#_346)的那場行動，都“出自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艾希曼的倡議”。所謂的《萊費爾特報告》（Lehfeldt-Bericht）也被交給了富爾達（Fulda）主教會議主席阿道夫·貝爾特拉姆（Adolf Bertram），特別用于向教宗報告。[[160]](#_160_2)如今艾希曼正式負責宗教業務一事已經傳播開來，他的名聲甚至變得更加響亮。從1944年3月起，嚴格說來有兩個艾希曼：一個是難得出現在柏林的艾希曼本人，另一個是他那盲目忠誠的副手羅爾夫·金特（Rolf Günther），完全按照其上司的意思負責“艾希曼辦事處”。“艾希曼”因而能夠同時出現在兩個不同的地點。[[161]](#_161_1)

但這時開始窩里反了。正當艾希曼置身匈牙利，以驚人的高效首次親自督導遣送行動，配合“艾希曼特別行動分隊”讓自己的惡名更上一層之際，他最親密的同事和同僚卻紛紛將觸角伸往其他方：迪特爾·維斯利策尼、赫爾曼·克魯邁（Hermann Krumey）、庫爾特·貝歇爾（Kurt Becher）等人，甚至包括海因里希·希姆萊在內，都努力與一個特定的人群建立聯系，而那些人正是他們整整十年來唯恐避而不及，甚至打算從地球上抹去的對象。維斯利策尼和克魯邁一再與具有影響力的猶太人長談，將艾希曼描繪成一個邪惡的怪物，而他們自己則是一籌莫展的聽命行事者，竭盡所能想要阻止一切。希姆萊試圖與國際代表談判；保安總局局長恩斯特·卡爾滕布倫納（Ernst Kaltenbrunner）已在探討與奧地利單獨媾和，或者至少于戰后獲得特殊地位的可能性；保安總局情報部門的威廉·霍特爾甚至已被招募成為敵方的特務。最重要的是，人們正在重新拉幫結派，以便為將來的問題預先做好準備，并且有了新的動機要把艾希曼這個名字推向世界。[[162]](#_162_1)

事實證明，艾希曼深植于公眾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對所有這些努力助益頗大。既然人們已經相信，這名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在自己的位置上享有比別人更大的權力，其他人大可乘機夸大艾希曼的影響力，從而淡化自己的角色。但這種做法不可能總是奏效，尤其若是像卡爾滕布倫納那樣的人物聲稱自己的意見一直被艾希曼推翻，更只會顯得荒謬可笑。但即便如此，這也表明了艾希曼顯赫的地位：甚至連卡爾滕布倫納也看見了機會，以為或許會有人相信他的說辭。不過對其他許多不像帝國保安總局首腦那般位高權重的人來說，這法子倒還真是管用。因此好幾個不同因素在1944-1945年共同決定了艾希曼的形象：首先，由于其職務上的相對獨立性、他在布達佩斯所處的地位，以及戰局的災難性發展，艾希曼自己的行為變得越來越一意孤行。其次，他的同僚們已經開始改變跟猶太受害者打交道的方式，從而借由與他們那位上司保持距離來強調艾希曼所起的作用。最后，那些猶太談判代表如今再度被派往國外接洽，他們不僅在那里談論艾希曼，還在信件或報告中寫下他們與艾希曼接觸的經過。

艾希曼自己在匈牙利的行為夾雜著狂妄自大和絕望無助。起先他短暫地以令人難以置信的虛偽態度[[163]](#_163_1)施展了所謂的外交手腕：“既然我的頂頭上司黨衛隊集團領袖米勒親口表示，他是派了大師本人過來，我自然希望能夠表現得像是一位大師”[[164]](#_164_1)，畢竟“來到匈牙利的是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艾希曼”。[[165]](#_165_1)結果卻演變成一場令人毛骨悚然的過激行動，看不出一絲一毫節制與慎重的跡象。艾希曼再次大肆吹噓一切讓他覺得可以拿來唬人的東西：他與匈牙利最高領導當局之間確實存在的密切接觸、與第三帝國權威人士之間未必存在的直接聯系，以及他所掌控的從所謂“個人專機”到奧斯維辛毒氣室的所有器材設備等等。“我是嗜血獵犬！”“我讓奧斯維辛的磨坊磨起來！”[[166]](#_166_1)“我可以把你想要的猶太人都交給你”“以貨換血”“我會向希姆萊報告”“我要撂倒布達佩斯所有骯臟的猶太人渣”。[[167]](#_167_1)他并不總是清醒和懂得分寸，跟別國外交人員起爭執；威脅要暗殺“猶太人的朋友”——例如“[拉烏爾·]瓦倫貝里（Raoul Wallenberg）[\*](#_347)那只猶太狗”[[168]](#_168_2)；他還聲稱準備前去拜訪大穆夫提，后者當時的確在插手納粹政治；出現問題的時候，他會親自前往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決；外交部的人員和集中營指揮官魯道夫·赫斯都來拜訪過他。他似乎無處不在，同時又哪里都不在。艾希曼滔滔不絕地講來講去，以致周圍不明就里的人相信他確實直接參與了推翻匈牙利攝政米克洛什·霍爾蒂（Miklós Horthy）的行動。[[169]](#_169_1)等到解放馬伊達內克（Majdanek）毀滅營的照片傳遍世界，又有人認為艾希曼要為所發生的一切負責，而且他最終會與希姆萊公開決裂。[[170]](#_170_1)如果維斯利策尼后來的講法可信，那么艾希曼當時在下屬面前的炫耀也已經達到了新的高度。維斯利策尼聲稱，艾希曼曾在匈牙利吹噓，說他和奧迪洛·格洛博奇尼克就是整個滅絕猶太人構想的幕后推手。[[171]](#_171_1)艾希曼瘋狂沉迷于他那殺氣騰騰的畢生志業，并且相信“布達佩斯鐵定會為我樹立一座紀念碑”。[[172]](#_172_1)他嚇唬受害者，等到取得了“最終勝利”，希特勒將任命他擔任“世界猶太人專員”（Weltjudenkommissar）。[[173]](#_173_1)要不是艾希曼在匈牙利的恐嚇記錄如此嚴肅清醒，我們恐怕會誤以為他在當地登臺演出了一場荒誕劇。但他的表演甚有成效，最終為他贏得了“以瘋子般的癡狂”迫害猶太人的名聲。[[174]](#_174_1)根據官方統計，匈牙利遭到遣送的男女老少共有437,402人，但甚至連這個數字聽起來都簡直像是低估了。

當艾希曼對著猶太談判代表約埃爾·布蘭德和賴熱·卡斯特納大聲咆哮的時候，他的同事們正設法小心翼翼地展開對話。這種一個唱白臉一個唱紅臉的做法并非新鮮事，但艾希曼的同僚們如今迫不及待地想要“扮白臉”。維斯利策尼只管信口雌黃，聲稱消滅猶太人是“艾希曼的夢想”[[175]](#_175_1)，并且夸大自己的影響力來證明他是多么積極地幫助受害者。[[176]](#_176_1)最后他甚至還在卡斯特納面前，把自己形容成艾希曼威脅、逼迫、恐嚇的受害者，借此爭取同情。此外，維斯利策尼強調自己一直竭盡全力、無私無我地在可能范圍內對抗他那位恣意妄為的上司。[[177]](#_177_1)克魯邁試圖把自己打造為可靠的暴行見證者，宣稱只想借此揭發真相。與艾希曼在希姆萊面前爭寵的庫爾特·貝歇爾，當時正在匈牙利執行一項特別任務，當他自己針對猶太資產的談判陷入僵局時，就拿出艾希曼的名號用作威脅恫嚇的手段。因此艾希曼后來解釋說：“每一個部門都試圖從匈牙利猶太人那里榨取一切有用的東西，而在壓榨的時候就用艾希曼那個大壞蛋來嚇唬他們。”[[178]](#_178_1)運用這種策略，庫爾特·貝歇爾不僅組織了滅絕猶太人背景下的最大規模劫掠行動之一，同時也為紐倫堡審判成功制造出了不在場證明。[[179]](#_179_1)最后，匈牙利的犯案者也嘗試使用這種策略，并設法親近猶太人代表。[[180]](#_180_1)就像此前迫害猶太人時那般，同樣瘋狂的反猶太主義使他們過分高估了那些代表們的重要性，認為只要有一兩個猶太人幫忙講好話，就足以讓人忘卻十年來對猶太人的迫害。結果這種期望只在極少數幾個案例中得到實現。維斯利策尼與卡斯特納的各種談話并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好處，因為最后連卡斯特納的緩頰之辭也還是救不了他。不過他的那些言論為艾希曼具有高度影響力的形象奠定了基礎。庫爾特·貝歇爾就幸運許多。墻頭草兩邊倒的作風固然拯救了他，但他保住一命的原因也在于：盡管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數以百萬計的財產掠奪案都必須算到他的賬上，他卻成功地抹除了自己卷入謀殺方案的一切痕跡。許多人將在戰爭的最后幾個月仿效他的范例，利用一切機會與艾希曼公開保持距離，從而在此過程中預先表明了艾希曼的獨特角色。這在戰后被證明是極為有效的自保舉措。

賴熱·卡斯特納和約埃爾·布蘭德則把“怪物艾希曼”[[181]](#_181_1)的形象傳播到了國外。布蘭德在土耳其被逮捕之前和之后，以及在開羅被關押期間，都曾向“戰時難民事務委員會”的代表艾拉·赫希曼（Ira Hirschmann）以及英國情報部門報告了艾希曼在滅絕猶太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182]](#_182_1)這間接促成了全球新聞界對臭名昭著的“用貨物換鮮血”（Blut-für-Ware）[\*](#_348)交易的報道。[[183]](#_183_2)卡斯特納在戰時記載日記，戰后立即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所謂的《卡斯特納報告》（Kasztner-Bericht），與他其余（曾受到維斯利策尼和貝歇爾強烈影響）的聲明共同構成美國和英國當局籌備紐倫堡審判時的主要書面資料。[[184]](#_184_1)這些結合早些年由艾希曼本人自豪地公開建立起來的形象，便形成了一種再也不受其創造者控制的局面。最后他別無出路，只能借著那個名聲進一步實現自己兇殘的目的，直到再也用不下去為止。接下來他就只能改名換姓了。

### 戰爭罪犯第14號……第9號……第1號

艾希曼知道他的名字已經產生了越來越不利的效果。當希姆萊讓他暫時離開布達佩斯一陣子的時候，他認為那是針對其名聲所做出的反應。因為如果再繼續留下去的話，“我的名字將會造成一些困擾”。[[185]](#_185_1)但在某種程度上，艾希曼卻把這種走投無路的處境當成了褒獎，這從他開始炫耀一個最新的排行——自己在戰犯名單上的位置——就可以清楚看出。這樣做的也不是艾希曼一個人，那些兇手們爭先恐后地競爭在通緝令上的位置。自從同盟國威脅要收集涉案者的姓名以后，他們便開始猜測誰會出現在頭號通緝令上。對涉案者姓名的宣布，主要是通過被占領地區的地下廣播電臺來進行，同時警告他們不得繼續參與大規模謀殺行動。威廉·霍特爾報告說，艾希曼和卡爾滕布倫納二人都曾談起過自己的戰爭罪犯排名。[[186]](#_186_1)盡管霍特爾是最不可信的證人之一，他對此事的說明卻與其他人的證詞相吻合。艾希曼自己也沒有否認這種大吹大擂的說法，并且在阿根廷講述了相關細節：“有一次我在新聞評論中……發現了戰爭罪犯名單。那時我排在第9位，而且還被整件事情逗得有一點開心。”[[187]](#_187_1)在以色列的審訊中，他聲稱自己是第14名。駐布達佩斯大使館的猶太事務處處長霍斯特·特奧多爾·格雷爾（Horst Theodor Grell）是艾希曼的聯絡人，他也記得艾希曼曾經在1944年秋天自豪地向他表示，自己是敵人眼中的“頭號戰爭罪犯”，因為有600萬猶太人都要記到他的賬上。格雷爾并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認為艾希曼只不過是套用“敵人越多，榮譽越大”那句俗語來吹噓自己的重要性罷了。[[188]](#_188_1)盡管格雷爾對大屠殺表現出的驚訝和難以置信是徹頭徹尾的假象，但他關于艾希曼的說法卻含義分明：雖然戰敗在即，但艾希曼對自己“職業生涯”的驕傲之情以及夸大其實的傾向卻始終保持不變。艾希曼的話甚至還帶有預見性，因為到1947年的時候，他果真已作為“猶太人的頭號敵人”（Judenfeind Nr. 1）遭到大衛·本-古里安和西蒙·維森塔爾的通緝。[[189]](#_189_1)

隨著戰爭接近尾聲，艾希曼的同事們越來越避免跟他一同公開亮相。他們顯然非常清楚地知道為什么應該這么做。人們不想被看見跟“猶太人的沙皇”一起享用午餐。盡管艾希曼那棟辦公大樓內的食堂是少數幸免于空襲的建筑之一，選侯大街116號的那位先生卻讓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當權時期的事業狂人如今已淪為賤民，這種羞辱當然瞞不過艾希曼。他在1957年抱怨說，人們起初“巴不得能夠邀請我參加各部委舉行的會議、非正式的磋商、私人餐會和其他類似的活動”，后來卻是每一個人都假裝不認識他。[[190]](#_190_1)在接下來的那些年頭，艾希曼成功地謊稱自己在1945年戰爭的最后幾個月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為他的辦公大樓安排食物供應和防御措施。許多對此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人刻意沒有糾正他，但這并不表示艾希曼在納粹政權的最后時刻已經洗手不干了。

雖然不借助艾希曼的謊言來重構戰爭最后幾個月所發生事件的工作才剛剛起步，但我們已知的少量資料已足夠表明，殺害猶太人的兇手們以“令人動容”的方式把謀殺事業貫徹到了最后一刻。艾希曼不但奉希姆萊之命，繼續穿梭于帝國的殘余部分，將知名猶太人士扣留為人質——因為希姆萊還認真地希望能夠借此與同盟國談判，保住自己一命，此外更有各種跡象表明，艾希曼甚至參與了最后的滅絕行動，用毒氣殺害了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KZRavensbrück）的猶太人。1945年1月26日，不僅臭名昭著的莫爾別動隊（Sonderkommando Moll）和毒氣卡車都被派去了那座集中營，營內還特地設置了毒氣室。[[191]](#_191_1)2月初，一些婦女被從拉文斯布呂克轉移到特萊西恩施塔特，并且在該地平安活到戰爭結束。她們后來回憶曾被艾希曼審問，以便查明她們對這些謀殺行動知道多少。艾希曼還威脅說，假如她們把在特萊西恩施塔特的見聞講出去的話，將會受到懲罰。[[192]](#_192_1)

1943年1月被遣送離開荷蘭的夏洛特·扎爾茨貝格爾（Charlotte Salzberger）回憶，艾希曼與金特、恩斯特·莫斯（Ernst Moes）和卡爾·拉姆（Karl Rahm）聯手審問了她、她的妹妹以及另外三位女性。他們“非常彬彬有禮地”審問，“想要查明我們對滅絕行動知道多少”。幾名女性全都立刻意識到是誰、出于什么目的在審訊她們：“我們甚至早在荷蘭就已經曉得艾希曼是何許人物。我們知道，他會使用許多意第緒和希伯來字眼，此外還有謠言稱他會說希伯來語，出生在薩羅納。他的說話方式非常清楚地呈現出那種特點。他對我們的過去、我們的出身背景，以及我們在荷蘭的生活很感興趣，針對猶太會堂、錫安主義、各種證件和我們參加過的青年團體提出非常具體的問題。”然而所有人都意識到那是轉移注意力的障眼法，因為“他告訴我們，現在我們獲準前往特萊西恩施塔特的猶太人隔離區。但我們要是在那邊泄露了在拉文斯布呂克的經歷，或者我們所知道的任何事情，那么‘您們’——他使用了這個稱呼[\*](#_349)——將會從煙囪飄出去”。

盡管如此，恐懼還是在特萊西恩施塔特迅速蔓延開來，擔心那里也會設置毒氣室。幸存下來能夠對此發表意見的每個人都表示，艾希曼正是那些計劃背后的推動力量。[[193]](#_193_2)當時艾希曼果真剛好在特萊西恩施塔特，正在為國際紅十字會的下一次參訪做準備，而他最不需要的就是關于毒氣室的話題。可是到4月初，當他與外交部代表和其他納粹高官一起陪同漢斯·杜南特先生（Hans Dunant）參觀特萊西恩施塔特的時候，清楚表明立場的反而是他自己。在布拉格舉行的晚宴上，他介紹自己為“負責處理所有猶太問題的黨衛隊全國領袖直接代理人”。國際紅十字會的奧托·萊納（Otto Lehner）記得，“整個晚上，艾希曼都在發表他對猶太人問題的理論”。他對著齊聚一堂的各國外交人員嘮嘮叨叨地講述有關猶太人保留地的計劃，“關于整體的猶太人問題，艾希曼堅稱，希姆萊目前主張采取人道做法。他本人雖然不完全認同那些辦法，但身為良好的戰士，自然必須無條件服從黨衛隊全國領袖的命令”。[[194]](#_194_1)盡管如此，萊納還是在自己的報告中滿懷信心地指出，他已經從艾希曼那里得到保證，特萊西恩施塔特的猶太人不會有任何事。

魯道夫·赫斯記得，艾希曼經常造訪希姆萊位于柏林郊區的宅邸齊騰宮（Schloss Ziethen），而且即便在那里也毫不隱瞞自己的計劃。此外甚至連晉升為黨衛隊旗隊長與警察總監（Oberst derPolizei）的前景也不能打動艾希曼了。[[195]](#_195_1)艾希曼后來一再表示，那倒不完全是因為戰爭就要失敗的緣故，主要的理由反而在于，如今他既不相信那些能夠拔擢他的人，也不怎么相信自己的同事們。從他早有預謀的、招人憐憫的退場表現，即可看出其不信任感已經達到了何種程度。艾希曼位于選侯大街116號的辦公大樓成為納粹高官們碰面的地方，不僅因為還有片瓦遮身，以及一些東西可吃，更重要的理由在于，那里可以讓他們獲得一個新的身份——提供偽造身份的人如今就在此辦公，如流水線作業般按需核發身份證件。艾希曼喜歡借此機會佩戴著公務用槍在其頂頭上司面前裝模作樣，大聲嚷嚷表示他不需要新的證件，因為他的手槍就是他的新身份。海因里希·米勒則如他所愿地回應道：“假若我們有50個艾希曼的話，就一定能夠打贏這場戰爭。”[[196]](#_196_1)艾希曼在自己的同事們面前也做出這樣的表演：艾希曼永遠追隨他的元首，至死不渝。并且發表了他迄今最著名的臨別感言：他會笑著跳進坑里，因為那里有好幾百萬猶太人跟他躺在一起。

這個可怕的吹牛皮大王沒有告訴柏林的任何人，他為自己在元首死后的生活做出了怎樣的規劃。他其實早已安排就緒，會有人在一個安全的地點為他備妥新的身份證明。艾希曼同時還向迪特爾·維斯利策尼和威廉·霍特爾謊稱已斷絕與家人的聯系，并編造了一個假的逃亡計劃——他們二人很快便證明了自己是散播謊言的高手。[[197]](#_197_1)這種小心謹慎的態度非常有道理，因為他的同事們早已另有盤算，不惜犧牲艾希曼，以使自己盡可能清白地進入新紀元。畢竟，就連恩斯特·卡爾滕布倫納，艾希曼的老上司、稱兄道弟的老朋友、當年在奧地利拉他入黨的那個人，也竭盡一切努力，想要在自己被捕之前先擺脫掉那個不受歡迎的伙伴。他把艾希曼派往一個并不存在的“阿爾卑斯要塞”（Alpenfestung），讓他在山腰的一棟小屋內用性命捍衛德國。不難想象的是，許多人巴不得艾希曼在為祖國而戰的時候一腳墜入冰川的裂縫。最后，就連他多年以來的同事們也要求他離開，因為身邊那名“被通緝的戰爭罪犯”給他們帶來了太大的危險。[[198]](#_198_1)等到全國各地的希特勒照片被紛紛丟出窗外，人們羞愧莫名地把成千上萬冊《我的奮斗》埋進花園地下、從仍然豎立的墻面上鑿除一個個卐字符號時，國家社會主義最大惡行的象征符號已經別無選擇，只能盡快消失。

## 第二節 一個名字在戰后的事業生涯

阿道夫一直是我們家里的黑羊。

——卡爾·阿道夫·艾希曼向美國陸軍防諜隊（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 CIC）做的供詞[[199]](#_199_1)

誰要是放棄了自己的名字，就會永遠失去對它的控制權。如今已屬于市場行銷基本法則的這個道理，當時卻讓艾希曼感到驚訝，盡管除此之外他熟練掌握了自我推銷的技巧。艾希曼早就放棄了仍然受到持續宣揚的“最終勝利”，甚至及時規劃了可能的逃跑方案。但即便如此，他顯然也料想不到，自己周遭的每一個人都能那么快就找到新的救贖，把納粹禮向前伸出的手臂對準了他，并用“艾希曼這個名聞遐邇的字眼”開啟了完全不同的大門。

最晚在1944年，艾希曼就已經知道，自己是一名遭到通緝的戰犯。截至目前，只有極少數這樣的通緝名單得到了研究，但每一份已知的名單上面都找得到艾希曼的名字。在“巴勒斯坦猶太事務處”（Jewish Agency for Palestine）1945年6月8日的通緝卡片上，編號6/94的艾希曼高居首位。[[200]](#_200_1)1945年6月27日，世界猶太人大會請求美國公訴人緝捕阿道夫·艾希曼，并在紐倫堡指控他為主要戰犯之一。[[201]](#_201_1)8月，維斯利策尼在美國方面的審訊中針對艾希曼做出了詳盡報告。[[202]](#_202_1)維也納警察當局也對艾希曼展開了搜尋行動，并在一年后發出了拘捕令。[[203]](#_203_1)1945年9月，艾希曼出現在英國軍情四處制定的《德國警察、黨衛隊以及各種黨派和準軍事組織人員黑名單》上。1946年6月17日，美國陸軍防諜隊制作了一份關于艾希曼的三頁報告，其主要依據為霍特爾、貝歇爾，以及艾希曼家族（顯然是為了混淆視聽）的供詞，該報告已經糾正了有關薩羅納的神話。時至1960年，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關于艾希曼的檔案已經包含了一百多份報告和文件。[[204]](#_204_1)“聯合國戰爭罪行委員會”（UN War Crimes Commission）的前身組織自1943年秋季以來，就一直在收集犯案者的名單，而在被稱為“納粹獵人圣經”的“戰爭罪犯和安全嫌疑人中央登記處名單”（CROWCASS List）上面，當然也出現了艾希曼的名字。[[205]](#_205_1)

盡管如此，在德國投降之后，最讓艾希曼擔心的并不是盟軍無所不在的軍事單位。美國人固然逮捕了他，但他們僅知道人名，而他在德國徹底戰敗的局面下很容易就可以改名換姓。艾希曼先是在烏爾姆（Ulm）和上普法爾茨魏登（Weiden/Oberpfalz）的戰俘營假裝自己是一個名叫阿道夫·卡爾·巴爾特的低階人員，但很快就改稱自己是出生于布雷斯勞的黨衛隊三級突擊中隊長奧托·埃克曼。這個名字聽起來相當接近他的真名，萬一有人認出他并喊出來，也不至于引人側目。此外，軍官的職階能夠讓奧托·埃克曼免服勞役。艾希曼的選擇經過了深思熟慮：如今在布雷斯勞已不復保有任何書面記錄[\*](#_350)，而且他把自己新的出生日期“往前挪了一年……這樣我可以比較容易地記住那些數字。我的簽名也變得比較順手，即便一時失神也不至于在簽字時露出馬腳”。[[206]](#_206_2)他在被轉囚于弗蘭肯（Franken）地區的上達赫施泰滕（Oberdachstetten）時，仍舊保留了那個姓名和官階。[[207]](#_207_1)

艾希曼自己畢竟有過審訊的經驗，因此并不擔心會在接受審問時露餡。戰俘營很大，驗明正身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更危險的反而是可能認得其長相的人，亦即集中營的幸存者以及曾跟“移民專家”艾希曼打過交道的猶太人。這些人偶爾會現身戰俘營，尋找曾經折磨他們的人和殺害了他們家人的兇手。艾希曼后來絮絮叨叨地表示：“猶太人委員會一來到營區，我們就必須排隊集合。嗯，他們會盯著我瞧，想確定是否曾經看見過這樣的嘴臉。……我們必須排成連隊……然后過來一個大約由15名傻蛋組成的猶太委員會……他們很仔細地從一排又一排的隊伍前面走過，盯著我們每一個人的臉。可不是嗎？他們也盯著我的面孔瞧個不停，一直非常起勁。我們不準開口講話，否則我們肯定會對著他們叫出最好聽的名字。等他們檢查完畢，我們便向前走兩步，輪到下一排。”[[208]](#_208_1)

然而艾希曼卻說，這種追捕方式很好逃脫，只要所有戰俘都團結一致，彼此不動聲色就夠了。想從成千上萬名衣衫襤褸、滿臉胡茬的男子當中辨認出身穿制服、臉孔白凈的黨衛隊官員，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更何況是在這些囚犯因為戰敗而自視為一個團結整體的情況下。但隨著越來越多納粹罪行的細節被披露出來，甚至讓一些立場堅定的納粹黨人也感到恐懼和震驚，這種團結一致很快便宣告瓦解。此外，即便最親密的戰友情誼也未必能一直保持穩固，通常等到人們開始為自己的前途感到擔憂之際就會破裂——例如直面來自美國陸軍防諜隊的審訊軍官，或者面臨紐倫堡審判的時候。到了這樣的節骨眼，就再也無法繼續隱身于茫茫人群當中了。艾希曼很快意識到，危險除了來自他的敵人之外，也來自他所認為的朋友。那些對絞刑架心生畏懼的納粹黨人突然回想起來，他們不管在哪里都有辦法認出艾希曼的臉，同時卻又極力設法讓人忘記他們為何如此熟悉艾希曼那張臉。

誰要是常年一直大聲宣揚自己的獨特角色，難免會在政權更迭之后成為理想的投射屏，讓其他每個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罪責推得一干二凈。艾希曼盡管并非可憐無辜的替罪羊，卻也從未享有過戰爭罪行審判的證詞中給他冠上的那種權力地位，畢竟艾希曼絕不可能獨力殺害600萬猶太人。正因為人們十分清楚地知道艾希曼是誰，現在才必須聲稱自己根本不認識他、從來沒有和他見過面，而且頂多只是粗略知曉他所做過的事情——由于滅絕猶太人的行動屬于最高機密，他們甚至不知道參與者的名字。結果每當提到艾希曼的名字時，那些被告和證人們的回答非但不是：“誰？從來沒聽過！”反而都假裝做出驚駭的反應：“他？沒見過！”他們進而滔滔不絕地解釋為什么不清楚那個人的底細，反正他們顯然完全不可能認識他。這么一來，真正令人詫異的事實反而消失不見了：竟然有那么多納粹黨人、納粹政權的反對者與受害者，其實對那個名字知之甚詳。

### “我會笑著跳進坑里……”

在紐倫堡審判中，猶太人大屠殺只是諸多審理事項之一，而且無論如何都不是特別重要的那一個。從美國公訴人的相關準備工作即可看出，這個主題是多么不受重視。最終只有一個人被派來執行這項任務，結果他不堪重負，幾乎只能心懷感激地完全仰賴卡斯特納的報告。[[209]](#_209_1)鑒于犯罪規模的龐大、沒完沒了的涉案名單，以及要在短短幾個月時間內弄清楚一個四面受敵的政權內部是如何運作的（這是研究人員至今仍在設法解決的問題）這個驚人的任務，此種處理方式并不讓人感到意外。檢方為了避免可能來自本國內部的批評，小心翼翼不特別強調猶太事務的做法，也阻礙了對猶太人的屠殺成為國際軍事法庭最重要的課題。雖然當時也出現了貝爾根-貝爾森（Bergen-Belsen）、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以及奧斯維辛等集中營尸體堆積如山的照片，但罪行真正的規模一直要等到1945年年底，才通過魯道夫·赫斯、威廉·霍特爾和迪特爾·維斯利策尼等人的證詞而公之于世，而那時第一次審判已經進行了三個月（雖然應該指出的是，所有這些供詞早在好幾個月之前即已提交給調查當局）。如果有誰用搜索引擎在第一次紐倫堡審判的記錄中搜索“艾希曼”這個名字，很快就會得出印象，此人被談及的次數不多。[[210]](#_210_1)事實上，被用作基礎證據的《卡斯特納報告》甚至還把艾希曼的名字拼錯（Eichmann被寫成“Aichmann”），更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印象。但若是看一看那個名字在分配給相關主題的有限時間內出現得多么頻繁，并且考慮到審判期間只有宣誓的證詞被當庭宣讀，事情看起來就截然不同了——每當討論到滅絕猶太人的行動，艾希曼就是最重要的名字之一。[[211]](#_211_1)

1945年7月，當艾希曼還冒充阿道夫·卡爾·巴爾特被困在上普法爾茨的一座美國戰俘營時，不久前還在維也納擔任安全警察與黨衛隊保安局負責人的魯道夫·米爾德納（Rudolf Mildner）已勾勒出一條“責任序列”（Verantwortungslinie），讓人很容易成功地躲在后面：“執行之前，黨衛隊集團領袖米勒先與IV A 4部門的負責人、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艾希曼口頭討論。艾希曼原本隸屬于黨衛隊保安局第三處，為了這項任務而被調職到帝國保安總局第四局。”[[212]](#_212_1)米爾德納的把戲顯而易見：既然其間既沒有文件也沒有證人，他身為局外人也就無從得知任何事情。只可惜不曾有人當面質問米爾德納，他是從哪里得知了那種下達指令的方式。紐倫堡戰爭罪行審判開始之前，在許多昔日的納粹犯罪地點，各種關于艾希曼的報告和陳述已經開始出現。它們或來自從前的敵手（羅斯韋爾·麥克萊蘭[Roswell McClelland]，瑞士，1945年8月2日），或來自盟友（匈牙利薩拉希·費倫茨[Ferenc Szálasi][\*](#_351)政府的內政部部長沃伊瑙·加博爾[Gabór Vajna]，匈牙利，1945年8月28日），或來自同事和朋友。紐倫堡第一次審判開始一個多月后，檢方出示了威廉·霍特爾那篇惡名昭著的證詞，其中談到艾希曼曾經向他提及的600萬名受害者（1945年11月26日）。12月中旬，卡斯特納的書面證詞被當庭宣讀，緊接著又宣讀了霍特爾的聲明，于是掀起一股以《600萬猶太人遭到謀殺》為標題的新聞報道浪潮。這個死亡統計數字——400萬人死于集中營，另有200萬人被特別行動隊殺害——頓時傳遍世界各地，其始作俑者的名字隨之聞名遐邇：阿道夫·艾希曼。

例如1945年12月19日的《富爾達人民報》（Fuldaer Volkszeitung）指出：“霍特爾證詞的根據是一個名叫艾希曼的人向他所做的陳述，該人身為黨衛隊高級官員，在滅絕行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霍特爾認為艾希曼的陳述正確無誤，因為其所處的位置必然使其對被害猶太人的數目有著最清楚的認知。一方面，艾希曼通過特別行動隊把猶太人送進毀滅營；另一方面，他自己在蓋世太保高層的職位，讓他得以深入了解有多少猶太人被以其他方式殺害。”自此，在涉及受害者數目時，艾希曼被視為關鍵證人，無與爭鋒。在阿根廷，這個名聲將為他打開進入薩森圈子的大門。12月20日，法庭開始設法還原包括艾希曼部門在內的蓋世太保的組織結構，卻被一再改變的部門名稱搞得一頭霧水。1946年1月初，特別行動隊D支隊領導人奧托·奧倫多夫（Otto Ohlendorf）和迪特爾·維斯利策尼的證詞，讓艾希曼的名字出現在更多新聞報道中。艾希曼那位昔日的朋友和下屬刻畫出一個頤指氣使的上司，而把自己表現為深受其害的人，并且引述了艾希曼講過的一句名言：“他說他會笑著跳進坑里，因為一想起有500萬[\*](#_352)條人命要算在他的賬上，他就感到極大的滿足。”[[213]](#_213_2)對此，紐倫堡審判中官階最高的被告戈林不禁充滿同情地評論道：“這個維斯利策尼只是一個小人物，因為艾希曼不在這里，他才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214]](#_214_2)所提到的艾希曼正是戈林于1938年11月展開迫害猶太人行動之后，在會議上結識的那個艾希曼。

### 精心策劃的逃跑計劃

艾希曼一再表示，正是這些證人的陳述促使他逃離戰俘營。如今人們甚至開始在戰俘營里談起他的名字，而美國陸軍防諜隊在安斯巴赫（Ansbach）的訊問，讓這名現在叫奧托·埃克曼的囚犯越來越不舒服。他意識到，被拆穿身份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對上達赫施泰滕戰俘營內的難友們而言，知道或者猜出奧托·埃克曼究竟是誰都是一種風險。當聽到艾希曼說出他的逃跑計劃時，他們一定都松了一口氣，因為即便只是在艾希曼的附近被別人看見，也會給自己的前途帶來危險。艾希曼則像在隨后的歲月里一次又一次做的，巧妙地故布疑陣。他故意告訴一群軍官，自己打算“去大穆夫提那里”。[[215]](#_215_1)這個消息只用了幾星期即已傳播出去，而直到艾希曼在阿根廷被綁架為止，人們都還一直懷疑他已經去了中東。但實際上，他在一位名叫庫爾特·鮑爾的低階黨衛隊隊員的合作下，精心而冷靜地研擬了一個截然不同的脫跑計劃。鮑爾的姐姐內莉已答應為此提供協助，而且最重要的是，艾希曼在甚至連最親密的朋友也想象不到的一個地區——德國北部——找到了聯系人。當他還在戰俘營的時候，黨衛隊隊員漢斯·弗賴斯萊本[[216]](#_216_1)就已經為艾希曼安排好了一個躲藏地點：其兄沃爾德馬爾（Woldemar）是下薩克森策勒（Celle）附近一個林區的林務員，絕對會守口如瓶。當艾希曼的軍官獄友們首先被問到他的下落時，他們一致認為那個膽大包天、喜愛旅行的艾希曼正打算潛逃中東，投靠他的穆斯林好友。但他們的同志其實早就在別人的默默幫助下，開始安排自己的新生活了。

1月，奧托·埃克曼頭戴一頂麂皮帽、身穿一件改成“巴伐利亞式樣”的國防軍外套，與鮑爾一同消失了。鮑爾孀居的姐姐內莉·克拉維茨幫他在農莊找到了一個藏身之處。那位在目擊證人眼中風姿綽約的少婦，同他一起搭乘火車前往漢堡。結伴旅行的男女不像單獨出門的男子那樣顯眼，因而很少受到盤查。但在前往策勒之前，艾希曼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地：萊茵蘭（Rheinland）。[[217]](#_217_1)我們尚不清楚他是否認為那里有一個連內莉都不該知道的更好的躲藏地點，但能夠確定的是，他去那里是為了取自己的新證件——“我為奧托·黑寧格安排的證明文件。”[[218]](#_218_1)我們雖不知道是誰幫他準備了那些文件，但至少有一個跡象顯示出那些文件放在誰那里：他父親的一位兄弟仍然住在阿道夫·艾希曼的祖籍地，杜塞爾多夫附近的貝吉施地區（Bergisches Land）。艾希曼的父親對自己的兄弟完全信任，隨后幾年不斷告訴他兒子的確切下落，甚至還寫信告訴他艾希曼的逃亡和在阿根廷的新生活。[[219]](#_219_1)艾希曼之前曾經探望過他的叔叔。這個地址可想而知是新身份證件的存放地點，而且或許是艾希曼與他父親保持聯系的渠道之一。[[220]](#_220_1)不管怎樣，艾希曼早已及時妥當地安排了他的逃亡行動，因此還有足夠的時間來偽造能夠取信于人的證件，并把它們好好地藏匿在萊茵蘭。考慮到戰敗投降的各種后果，以及交通運輸和郵政投遞的全面崩潰，艾希曼想必很早就已經做好了應急準備工作。

奧托·埃克曼從巴伐利亞的戰俘營消失將近三個月后，奧托·黑寧格[[221]](#_221_1)于1946年3月20日——艾希曼40歲生日的第二天——正式登記成為呂訥堡石楠草原的居民。登記流水編號1757的下面，寫著對這名據稱“1906年3月1日出生于布雷斯勞的商人”的附注：“已婚、新教徒、難民”，之前的居住地址是基姆湖畔普林（Prien am Chiemsee）。沃爾德馬爾·弗賴斯萊本自己剛在1945年6月帶著妻子和小孩一起逃亡到該地區，如今在修道院森林管理處擔任林務官，住在“科倫巴赫森林管理所”（Forsthaus Kohlenbach），可以施予援手。[[222]](#_222_1)黑寧格和當時許多“投靠弗賴斯萊本”[\*](#_353)的男子一樣，藏身在森林中一間被他們昵稱為“島嶼”（Die Insel）的小屋里，為一家名叫布爾曼（Burmann & Co）的公司收集木材和砍伐樹木。

艾希曼依然頭腦冷靜且深思熟慮，就連比絕大多數人都更熟悉他的維斯利策尼，也料想不到會有這么一個藏身之處。當維斯利策尼主動請纓協助盟軍查明其昔日上司的下落時，曾聰明地針對艾希曼可能的逃亡地點列了一份清單，果真證明他已將艾希曼的習慣摸得一清二楚。維斯利策尼信心十足地說：“凡是認得艾希曼的人都知道，他膽小得不敢一個人獨處。”[[223]](#_223_2)但顯然沒有人真正足夠了解艾希曼。那份清單列出的可能藏身處所既沒有包括德國北部，甚至連萊茵蘭也付之闕如。維斯利策尼料到了他的上司可能做出的一切，卻百密一疏沒有料到艾希曼也有辦法耍弄他。艾希曼已對紐倫堡審判將給他帶來的危險做出了正確判斷。

### 紐倫堡的幽靈

……這個負責執行滅絕計劃的邪惡人物。

——羅伯特·杰克遜（Robert H. Jackson），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美方首席檢察官

艾希曼不但立刻成為紐倫堡相關新聞報道的主題，防諜隊所有分支機構更于維斯利策尼做出證詞幾天之后，在1946年1月10日接到通知，要求緝捕阿道夫·艾希曼那名共謀殺害了600萬猶太人的兇手。通知中還提出警告，把他形容成“不惜設法殺出一條血路的亡命徒”。[[224]](#_224_1)到了2月的時候，艾希曼的名字也出現在法國猶人遭受迫害的文件中。時至1946年3月4日，卡爾滕布倫納的辯護律師更已認定每個人都知道艾希曼是誰，他指出：“眾所周知，艾希曼就是負責整個猶太人滅絕行動的人。”4月5日，正當匈牙利前總理斯托堯伊·德邁（Döme Sztójay）在布達佩斯忙著做出對艾希曼不利的證詞時，魯道夫·赫斯向紐倫堡軍事法庭提交宣誓證詞，聲稱近幾年艾希曼所產生的象征意義讓他的地位獲得了“巨大的上升”——盡管這種說辭在1946年就像在1942年一樣，并不怎么站得住腳。這個發展非常有利于過去那幫人的自我辯解策略，他們很快就抓住了這個機會。于是霍特爾幫卡爾滕布倫納說謊，宣誓“確認”艾希曼跟他那位來自奧地利的同志[\*](#_354)“沒有直接的公務往來”。[[225]](#_225_2)卡爾滕布倫納則聲稱艾希曼通常直接向希姆萊匯報，甚至繞過了蓋世太保的負責人米勒。既然米勒剛好消失得無影無蹤而希姆萊又已經死了，卡爾滕布倫納干脆厚顏無恥地撒謊，稱他一輩子總共只跟艾希曼見過兩次面。[[226]](#_226_1)霍特爾的上司威廉·布魯諾·瓦內克（Wilhelm Bruno Waneck）也是卡爾滕布倫納的好朋友，他狡猾地進一步幫腔說，卡爾滕布倫納還經常因為“疏于管理第四局，把所有事情都留給米勒”而飽受批評。就“解決猶太人問題”而言，希姆萊“在海德里希遇刺身亡之后已完全把工作交由艾希曼辦理”，甚至“早在海德里希還在世的時候，艾希曼就已經享有了持續擴大的主導權和絕對的特殊地位，以致他在整個猶太部門（指在帝國保安總局內部）完全獨斷獨行。在海德里希死后，他便直接對希姆萊負責。據我所知，這在帝國保安總局內部是每個人都清楚的事實”（1946年4月15日）。卡爾滕布倫納的辯護律師考夫曼（Kauffmann）稱奧斯維辛集中營一直處于“臭名昭著的艾希曼的思想指導下”[[227]](#_227_1)

魯道夫·赫斯于1946年4月15日首度現身法庭。多虧其鬼魅般的外表，戰后人們的腦海中終于凝結出那批“躲在黑暗中的人”的具體形象。赫斯曾是擁有最恐怖記錄的死亡集中營的指揮官，他指出艾希曼非但實地參與營地的建造并決定使用“齊克隆B”（Zyklon B）毒劑，而且還向他傳達了各種命令，是一個比赫斯自己還要狂熱的反猶太主義者。尤利烏斯·施特萊徹于1946年4月29日結結巴巴地表示，他之前從未聽說過艾希曼（盡管他曾經在1937年邀請艾希曼參加黨大會）。負責從巴黎遣送猶太人的赫爾穆特·克諾亨（Helmut Knochen）在1946年6月17日解釋說，下達給他的命令原則上直接來自艾希曼或希姆萊。6月28日，曾經主管蓋世太保組織與人事的維爾納·貝斯特（Werner Best）談到了“艾希曼辦事處”。卡爾滕布倫納的辯護律師更在7月9日要求進行無罪辯護，因為“在只有博爾曼[\*](#_355)、希姆萊與艾希曼知情的情況下，才從1941年開始密謀并執行了大規模的犯罪行為”，那不折不扣是“希姆萊和艾希曼的猶太人行動”（Judenaktion Himmlers und Eichmanns）。1946年7月13日，自己的罪責尚不清楚的康拉德·摩根（Konrad Morgen）解釋了為什么自己擔任黨衛隊法官的時候曾極力爭取對艾希曼提起訴訟，試圖借此證明艾希曼即使在黨衛隊里面也是一個特例。三天以后，美國首席檢察官羅伯特·杰克遜稱艾希曼為“負責執行滅絕計劃的邪惡人物”——艾希曼后來在讀到此種說法時特別火冒三丈。[[228]](#_228_2)瓦爾特·胡本柯騰（Walter Huppenkothen），帝國保安總局的蓋世太保組長以及“7月20日特別調查委員會”成員，在1946年7月18日表示：“猶太事務部門（IV B 4，后來的IV A 4b）及其主管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艾希曼，在第四局享有特殊地位。該部門位于選侯大街的一棟大樓內，艾希曼及其辦公室的大多數成員都住在里面。”艾希曼“經常出外旅行”，米勒名義上是他的“頂頭上司”。顯然是為了保持距離，胡本柯騰繼續補充道：“艾希曼和他的同僚們從來沒有提到過自己的任務。但是我通過與同志們的談話，知道艾希曼經常晉見希姆萊。”[[229]](#_229_1)

丹麥蓋世太保的前負責人卡爾·海因茨·霍夫曼（Karl Heinz Hoffmann）繼續采取同樣的路線：“猶太人問題的處理權當時掌握在艾希曼手中。他并非國家警察出身，而是從黨衛隊保安局調職到警界的。他和他的辦事處位于一棟特別的建筑物里面，與其他部門幾乎沒有往來。……他名義上隸屬于第四局，卻非常特立獨行。我在此特別強調，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并非警界出身的緣故。”（1946年8月1日）

蓋世太保審判的辯護律師魯道夫·默克爾（Rudolf Merkel）總結道：“希特勒在1942年4月下令實施‘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那意味著從肉體上消滅——亦即謀殺——猶太人。……希特勒和希姆萊用于執行命令的工具，是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和他的猶太事務部門雖然在編制上隸屬于帝國保安總局第四局，但其實享有絕對自主的地位，甚至完全獨立于蓋世太保之外。”默克爾提到了“艾希曼的機構”，并聲稱只有兩個人要為迫害猶太人的行動負責：艾希曼和克里斯蒂安·維爾特（Christian Wirth）[\*](#_356)（1946年8月23日）。霍斯特·佩爾克曼（Horst Pelckmann）律師在為黨衛隊辯護的時候解釋說，德國外交部也是艾希曼謊言下的無助犧牲者，“受害于他巧妙的以假亂真戲法”（1946年8月26日）。最后，甚至黨衛隊保安局的辯護律師也試圖撇清與艾希曼部門的關系，并且宣稱“艾希曼部門”不在黨衛隊保安局的職責范圍內。最夸張的是，這到最后竟然演變成同為黨衛隊上級集團領袖的一名前武裝黨衛隊上將和一名前警察上將爭論，他們二人究竟是誰比較畏懼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艾希曼。[[230]](#_230_2)他們同時卻又相互支持對方的供詞，表示自己非常希望采取行動來阻止匈牙利的猶太人遣送行動和徒步行進，然而他們完全不可能對抗艾希曼的權力地位。卡斯特納早在1945年就已經用一個詞描述過這種現象：“艾希曼主義”（Eichmannism）。[[231]](#_231_1)

檢方和法官基本上清楚這里在搞些什么名堂。美國公訴人托馬斯·多茲（Thomas J. Dodds）因而在1946年8月29日糾正說道：“根本就沒有那樣子的‘艾希曼部門’。艾希曼只不過是蓋世太保里面的一個部門負責人而已，主管教會和猶太人事務。蓋世太保的這個部門主要負責將歐洲猶太人驅趕到一起，然后把他們送進集中營。蓋世太保內部所稱的這個‘艾希曼部門’，并不比米勒屬下的其他任何部門更加獨立于蓋世太保之外。”多茲的俄羅斯同僚也表示贊同：“艾希曼借由毀滅營……來滅絕歐洲猶太人的計劃，來自蓋世太保的體制。”（1946年8月30日）但盡管如此，那種對艾希曼的描述依然產生了顯而易見的效果，并且在判決書中留下了痕跡。艾希曼的名字被提到了三次：“在黨衛隊旗隊長[\*](#_357)艾希曼的主導下，帝國保安總局所屬的蓋世太保成立了一個特別部門，負責處理猶太事務，并且利用自己的密探來調查被占領地區的猶太人問題。”[[232]](#_232_2)一個后來成為滅絕猶太人同義詞的術語，從此變得與艾希曼的名字密不可分：“‘最終解決方案’意味著滅絕猶太人。正如希特勒早在1939年年初即已發出的威脅，這將是戰爭爆發的后果之一。為了執行這項政策，蓋世太保成立了一個特別部門——由艾希曼擔任主管的B 4部門。滅絕猶太人的計劃在進攻蘇聯后不久即已開始施行。”艾希曼的正統性也被清楚地闡明，因為判決書中寫道，艾希曼“被希特勒委派來執行這項計劃”。[[233]](#_233_1)

在談論艾希曼和紐倫堡審判時，或早或晚都會有人引用弗朗西斯·比德爾（Francis Biddle）的一個手寫注記。[[234]](#_234_1)那位來自美國的法官在審判文件上艾希曼的名字旁邊寫下了一個疑問：“他是誰？”人們普遍認為，這并非一個哲學或者心理學上的問題，純粹只是因為比德爾不知道被提到的那個人究竟是誰。但人們很容易忽略那個注記的時間，它其實寫在審判開始之前。當時只有少數幾個法學專家，其中多半并非德國人，他們必須在非常短的時間內摸清楚納粹的國家體制及其犯罪的規模。即便今日也沒人能嚴肅地宣稱自己已經看清了那一切。盟軍的戰犯通緝名單上包含了六萬多個名字，所以法官沒聽過文件初稿上提到的名字之一，完全不令人感到意外。弗朗西斯·比德爾的注記反而顯示出他在準備時的認真態度。更令人驚訝的反而是比德爾在哪里讀到這個名字。因為比德爾在名字旁邊寫下疑問的那個文件，是“審判框架”（Urteilsrahmen/Frame of the Judgment）早期的版本，亦即一份嚴格保密的起訴書草案。[[235]](#_235_1)時隔一年，等到法官小組決定將艾希曼這個名字納入判決書中列出的80個名字當中，而且提到它至少三次時，比德爾的疑問顯然已經得到解答。

艾希曼名副其實地成了“紐倫堡的幽靈”，無處不在卻又難以捉摸。[[236]](#_236_1)他的名字還會在隨后所有的相關審判中繼續作祟。嚴格說來，1946年9月的紐倫堡與1939年春天的維也納情況沒有兩樣：艾希曼的名字又一次在其長官和同僚的大力支持下，不可救藥地與猶太人政策關聯在一起。但時代已然改變，艾希曼至少在剛開始的時候無法樂在其中，因為再也沒有“工作”可通過他和他的赫赫聲名獲得“巨大推動”了。他不再被崇拜者包圍，反而被棄如敝屣，是人們寧愿不認得的對象——除非把艾希曼送上死路能夠讓自己受益。艾希曼因此相當孤獨地待在森林里。盡管昔日同志們使盡渾身解數把自己的罪過都推到他身上，艾希曼后來甚至還能充滿體諒地說：“假如換成是我的話，恐怕也會表現得一模一樣。”[[237]](#_237_1)只不過倘若情況反過來，艾希曼卻很難找到像他那樣合適的替罪羊。結果艾希曼無計可施，只能看著他聞名遐邇的名字出現在報道和他在北德最先拿到的小冊子上。許多年后，艾希曼描述，如此一來他終于被拉到了“國際聚光燈下”[[238]](#_238_1)，而他打定主意要做出他在過去十年內無論如何都不肯的事情：保持隱身。

艾希曼究竟在什么時候才真正是“躲在黑暗中的人”（Mann im Dunkeln）[[239]](#_239_1)？或許只有在他穿著黑色皮革長大衣、只想當一名黨衛隊保安局專員的短暫時期，宛如來自“黑色電影”系列的角色一般令人畏懼和神秘感十足。然而最晚從1937年開始，其他各種角色已經更加吸引人，很快還變得更有用處。正如艾希曼自己所希望的那樣，他已經成為國家社會主義猶太人政策的象征——不僅在別人眼中如此，在他自己的行為表現和自我認知中顯然也一樣。戰后出現的唯一改變，就是他更進一步被夸大為獨來獨往的犯案者。這要歸因于知情者與同謀者的自保需求，以及其他人所想要的心靈慰藉。他們一廂情愿地認定，只有一小撮人、一個由極少數圈內人所組成的秘密團伙，犯下了那個有史以來最大的罪行，而且就連納粹黨人也對那批怪物避之唯恐不及。兇手的團伙越被說成是對外封閉的，“其他人”宣稱自己毫不知情的謊言也就越發能夠取信于人。

艾希曼要等到1960年在以色列的時候才終于體會到，被認為是“躲在黑暗中的人”也能帶來益處。他欣然接受了維斯利策尼有關于此的描述，盡管在擔任猶太事務部門主管的時候，艾希曼會覺得那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侮辱。如今他坐在以色列的牢房里，一心只想證明從來都沒有人認識他，但并非因為他有著巨大而神秘的力量，反而是由于他如此不顯眼和不重要。艾希曼對他昔日朋友和同志們的連篇謊話，表現出一種交織著不理解、不相信和失望的態度，有時顯得如此可憐兮兮，簡直會讓人以為他至少在某些時候確實相信自己的說法。最耐人尋味的疑問莫過于：為什么艾希曼事后能夠如此成功地否認自己曾經享有的突出地位，以致人們忽視了他在1960年和1961年之前的形象？其實只需要稍看一下他在審判之前的形象即可發現，艾希曼根本不可能既是一個象征，同時又無籍籍名。

事情的真相是，艾希曼在受審期間試圖拿來跟自己相提并論的昔日同僚當中，沒有任何人曾經享有像他那么突出的地位——不僅在1960年之前的文獻當中如此，在納粹時期的公眾印象里也是一樣，無論加害者或受害者都有相同的看法。以拉德馬赫（Rademacher）、塔登（Thadden）、維斯利策尼、布倫納乃至于西克斯（Six）等人為例，我們在談論艾希曼的報紙上怎么樣也找不到他們的名字，紐倫堡的判決書同樣也沒有提及他們。當以色列政府在1951年公開向德國提出賠償要求時，其官方的原始文件中僅僅列出了五個兇手的名字，艾希曼就是其中之一[[240]](#_240_1)，而報道此事的那些報紙都沒有問為什么。

## 第三節 討厭的隱姓埋名狀態

他想必無聊得要命。

——漢娜·阿倫特評論躲藏在德國北部的艾希曼

乍看之下，呂訥堡石楠草原沒有什么能讓人聯想到飛黃騰達的黨衛隊事業生涯。阿道夫·艾希曼的生活方式與奧托·黑寧格有著天壤之別。如今已無量身定做的制服、光可鑒人的皮靴、辦公大樓與勤務人員，留給他的只剩下一件襤褸的國防軍外套和森林里的一棟小屋。他不再擁有發號施令的權力，再也不能“頤指氣使”，再也無法乘坐自己的公務汽車行遍半個歐洲，再也不可能用新的手段來消滅敵人。艾希曼的世界在短短幾個月時間內就變得非常簡單，甚至幾乎可稱之為“一目了然”，因為作為一名戰俘和逃犯，他的生命始終處于危險之中，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求生上面。森林中的寧靜、充足的食物供應[[241]](#_241_1)、日復一日的日常生活，這一切不僅提供了某種安全感，更令人不得不回歸內心世界。艾希曼后來在阿根廷宣稱：“1946年的時候，我第一次嘗試以書面形式記錄我的回憶，并寫下了當時還記憶鮮活的一些數字。”[[242]](#_242_1)考慮到艾希曼所處的環境和他日后的寫作熱忱，此事一點也不令人意外。然而不能把這種舉動看成反躬自省，因為艾希曼即便已經失去了他的辦公桌，卻完全沒有失去他的舊心態。除此之外，他寫作的原因并不是要設法理解自己的所作所為，而是由于被他視為畢生成就的那些行為如今普遍受到了譴責。艾希曼并不打算追求真理，而是要為自己的行為尋找一種最可信的辯解以防萬一。

他想必早在成為戰俘、隨時可能面臨審訊威脅的時候就已經開動腦筋，到底該如何描述他那驚人的職業生涯，以便盡可能減輕自己的罪責。許多上司和同僚接受審判的新聞，讓他聯想到自己遲早也會——無論是以證人還是被告的身份——被傳喚出庭。艾希曼自己曾經多次扮演審訊者的角色，足以知道簡單的謊言根本不可能讓他全身而退。然而事情的真相實在太駭人聽聞了，甚至無法用輕描淡寫的方式表達。若是跟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指揮官坐在一起小酌紅酒，他們或許不難達成共識，認為謀殺數百萬猶太人的行動只不過是“后代子孫們不必再進行的戰役”。[[243]](#_243_1)可是艾希曼足夠聰明，知道其他大多數人不會這樣看。那個時代的多數人一心只想推諉卸責，忘記自己在過去12年中跟在誰的背后做出了什么事情。但是對于因犯下反人類罪行而遭到通緝的信仰堅定的納粹黨人而言，戰爭還遠遠沒有結束。

艾希曼始終承認，他從一開始就閱讀了所有關于納粹滅絕猶太人的報道和文章。他曾有些漫不經心地告訴薩森：“在林木茂密的石楠草原，我的面前擺放著一大沓舊報紙，上面都有關于我的文章，用了像是‘大屠殺兇手艾希曼’、‘大屠殺兇手在哪兒’和‘艾希曼躲藏在哪里’之類的標題。”[[244]](#_244_1)艾希曼后來的各種談話和證詞都顯示，他確實知道當時主要的文章和事件，只不過我們無法確定他是在什么時候讀到它們的。因此我們只能設法找出他在那段時間或許已經讀過哪些東西，而且無法排除他是后來才看到那些材料的。第一本他后來反復引用的書是歐根·科貢（Eugen Kogon）所撰寫的《黨衛隊國家》（Der SS-Staat），其主要根據是美國軍事當局委托昔日集中營囚犯集體整理出來的“布痕瓦爾德報告”（Buchenwald Report）。[[245]](#_245_1)該書在1946年出版，將罪魁禍首描繪成一小撮反社會的變態虐待狂，想必會讓艾希曼覺得既受侮辱又遭挑釁，這完全不符合他對納粹領導階層的理解——在他眼中，那是一個新的精英集團，而他信仰堅定地自視為其中的一員。除此之外，艾希曼很早就在報紙和小冊子上讀到了霍特爾和維斯利策尼的證詞，因為它們已在新聞媒體引發了巨大的回響。根據艾希曼自己的說法，他在北德的時候就已經讀過了1946年秋季出版、由羅伯特·肯普納（Robert M. W. Kempner）編輯的《紐倫堡審判》（Das Urteil von Nürnberg）。[[246]](#_246_1)基本上，沒有任何證據能夠否定，艾希曼在做伐木工人時期的確讀過那些出版物，因為在“島上”，懷舊的政治性談話顯然經常發生。該地區的百姓至今仍然記得，如果有誰想要喝杯啤酒談談往事，森林里那群伐木工以及與他們同住的紅十字會護士露特（Ruth）的房子是一個受歡迎的晚間聚會場所。那些小冊子不必花錢就能獲得，因為英國占領軍把它們作為再教育工作的一部分而免費分發。無論如何，當艾希曼在1948年離開森林，搬到阿爾騰薩爾茨科特（Altensalzkoth）那個小村莊經營一家養雞場的時候，他的興趣已經非常明顯。可是在回顧當時的生活時，艾希曼卻提出了相反的說法：“在美麗的石楠草原上，生活平靜地發展下去。每逢周日，我就騎著自行車前往策勒附近的鄉村酒館……酒館主人有時會告訴我當地報紙寫了關于艾希曼的什么，我聽了便不禁難掩笑意。他總是習慣性地說：‘說不定一切都是謊話和捏造出來的東西。’那讓我非常高興和滿意。”[[247]](#_247_1)

艾希曼不只從報紙和書籍中讀到他在歷史上的特殊角色，周遭環境也在提醒他這一點。他的新居住地距離昔日的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只有幾公里之遙，該營區當時已經變成了一座難民營，暫時收容那些從納粹殺戮行動中幸存下來的無家可歸者。艾希曼就生活在他的受害者附近，只不過如今他已是雞農而非劊子手了。他后來在阿根廷用這個光怪陸離的場景來附和薩森的意見：“呂訥堡石楠草原附近就是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當地周遭的一切都飄蕩著大蒜味，而且那里只有猶太人，因為那個時候還會有誰過來買東西呢？當然只有猶太人。于是我告訴自己說，我把木材賣給了猶太人、把雞蛋賣給了猶太人。我感到震驚和困惑，在心中自忖道：你瞧瞧看，真是天殺的！那些家伙應該都已經被殺光了，可是他們卻正在跟我討價還價。可不是嗎？”[[248]](#_248_1)但不管艾希曼在老朋友們之間發出怎樣令人作嘔的納粹式吹噓，近在咫尺的貝爾根-貝爾森還是對他造成真實的困擾，即便艾希曼只是輕描淡寫地順手寫道：“在那幾年，我從來沒有擺脫這樣的恐懼：有人會站在我的背后突然大喊：‘艾希曼！’”[[249]](#_249_1)而他攬鏡自顧時顯然不曾產生同樣的擔憂。

我們不知道艾希曼在呂訥堡石楠草原寫下了哪些想法。至少按照他在阿根廷的說辭，當他再次離開藏身之處的時候，已經先后將回憶錄和各種統計數字一把火燒掉了，因為不想帶著它們一起上路。[[250]](#_250_1)

在米勒-科倫貝格林區（Revierförsterei Miele-Kohlenberg）和阿爾騰薩爾茨科特認識奧托·黑寧格的人們，都沒有意識到他的恐懼和內心的掙扎。他們遇見了一位不酗酒也不賭博的好好先生，有辦法公平地安排食糧分配，十分熟悉“公家機關的繁文縟節”，既聰明又彬彬有禮，而且還按時繳納房租。此外，這名帶有輕微維也納口音的男子聲音相當有魅力，行為表現更顯示出他絕非出身鄉間地區。村內的女性居民在1960年告訴新聞記者：“他是那樣安靜謙卑的一個人，經常在溫暖的夏夜為我們演奏小提琴。他演奏過莫扎特、舒伯特、巴赫和貝多芬。”[[251]](#_251_1)當地的男性也高度評價這位新來者：他通常被認為掌握嫻熟的技術知識，有辦法修復損壞的機械設備，更何況他還擁有該地區唯一一臺收音機，特別喜歡追蹤新聞動向。奧托·黑寧格表現得隨時隨地都樂于助人。盡管這聽起來像是庸俗的陳腔濫調，但就連小孩子都喜歡他，因為他能夠輔導功課，還會給他們巧克力。[[252]](#_252_1)沒有人真正清楚奧托·黑寧格的底細。這個小村莊的居民讓他進入他們的生活，把房間和田地租給他，用車子幫他把雞運往市場，購買他的雞蛋，并且尊重其不事張揚的作風。在戰爭剛結束的那段時期，沒有人喜歡被別人問起，因此也不會詢問別人。[[253]](#_253_1)然而艾希曼對自己身邊的那些人并沒有很高的評價。“如果我不想讓周遭的尋常百姓起疑心的話，那么就不能閱讀比兒童故事更有深度的東西。”[[254]](#_254_1)漢娜·阿倫特盡管沒有聽到這種貶損言論，卻還是做出了相當正確的推斷，認為艾希曼在呂訥堡石楠草原想必“無聊得要死”（tödlich gelangweilt）[[255]](#_255_1)——而這帶來的無可否認的好處就是，至少他不必再算計別人的性命了。

### “北方要塞”

艾希曼將自己描繪為一個孤獨異鄉人的做法還另有一層用意：在隨后的那些年里，他基本上總是避免提到當初接觸對象的姓名。因為即便是在呂訥堡石楠草原，一名昔日的黨衛隊隊員其實也不可能那么遺世獨立。艾希曼無論如何都不是唯一有類似的過去，并且選擇藏匿在這個鄉下地方的人。柏林的納粹黨人很早即已討論過可能的緊急會面地點。雖然有些人還對虛無縹緲的“阿爾卑斯要塞”和“北方要塞”（Festung Nord）等防御陣地心存幻想，可是像艾希曼這樣的人物應已十分清楚那些地區的真正意義：縱使戰敗，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也可以迅速在那里聚集起來，以便交換重要的信息。奧地利的薩爾茨卡默古特（Salzkammergut）和德國北部的策勒地區，其戰略位置都非常有利。二者皆地處邊陲，距離國界不遠。在那里可以不引人注目地重建網絡，一旦遇到緊急狀況也可以就近逃離：位于奧地利地理中心的阿爾陶塞距離屬意大利的南蒂羅爾地區（Südtirol）[\*](#_358)只有一箭之遙，從阿爾騰薩爾茨科特則不難抵達德國的一些主要港口。長年扮演移民專家角色的艾希曼，必定立刻看出了這些“要塞”帶來的可能性。他把自己和家人剛好分別安置在這樣的地區，絕非出于偶然。當年阿爾騰薩爾茨科特一帶的居民，直到今天都還記得曾經到訪過的昔日黨衛隊人員，例如維利·科赫（Willi Koch）[[256]](#_256_2)，他甚至很可能知道奧托·黑寧格究竟是誰。另外一位名叫路易斯·辛特霍爾策的訪客則絕對知曉其身份，許多年后該人還肆無忌憚地吹噓，自己所屬的一個小圈子曾經幫助艾希曼逃亡，他的言論甚至還傳到了西德（聯邦德國）情報機關一名線人的耳中。[[257]](#_257_1)

路易斯（阿洛伊斯）·辛特霍爾策是最殘暴的黨衛隊打手之一，那批人早已因為卷入1938年11月集體迫害因斯布魯克猶太人的行動，成為臭名遠揚的罪犯。[[258]](#_258_1)但對于這名1914年出生、年輕時代就小有名氣的奧地利拳擊手而言，那不過是其謀殺事業的開端而已。辛特霍爾策深度參與了武裝黨衛隊針對意大利平民采取的所謂“報復行動”，在1943年摧毀了村落卡維奧拉（Caviola），導致40人遇害，其中一些人更被活活燒死在自己家里。此外他還在1943年積極參加了對猶太人的迫害，最終在1945年2月成為特倫托（Trient）的蓋世太保領導人。他在戰爭末期的撤退甚至也伴隨著各種謀害打殺。[[259]](#_259_1)盡管在戰后多次被捕，甚至兩度在缺席審判的情況下被意大利法院判處無期徒刑，辛特霍爾策卻一再成功地逃脫法網。在20世紀40年代末期，這名不肯悔改的黨衛隊成員與妻子和后來生下的孩子們定居在比勒費爾德（Bielefeld）。他保留了自己的真名，卻仍然使用偽造的德國護照，因為奧地利已經對他下達了逮捕令。我們不清楚辛特霍爾策與艾希曼在德國北部會面時的情形。他們可能通過奧地利黨衛隊同志的圈子建立了聯系（辛特霍爾策直到1989年去世為止都是該團體的堅貞成員），也可能因為其他的機緣而重新相見，但無可爭議的是，他們二人都知道彼此的來頭。辛特霍爾策后來表示，艾希曼親口告訴過他，自己在德國北部藏匿了“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的相關檔案和文件，其中包括各種統計數字，而且更重要的是，還有參與者的背景資料。[[260]](#_260_1)辛特霍爾策還是奧托·黑寧格在呂訥堡石楠草原的最后一位訪客：他從那里帶著艾希曼不被察覺地抵達奧地利邊界。艾希曼后來開玩笑地和威廉·薩森說道：“當初在呂訥堡石楠草原的時候，我到處跑來跑去。可不是嗎？你瞧，我總是馬不停蹄，并沒有一直窩在某個角落里面。”[[261]](#_261_1)鑒于艾希曼甚至能夠跟來自比勒費爾德的老同志們見面，我們不難想象他的話中意味著什么。

隨著時間的流逝，許多人從戰俘營回到家里。其中至少有一個人重新與艾希曼取得了聯系：獲釋之后也前往阿爾騰薩爾茨科特定居的漢斯·弗賴斯萊本。黨衛隊的同志情誼再度被證明持久不渝。起初只是有利于茍活偷生和隱匿躲藏的聯系，在隨后幾年發展成了一個協助逃亡的網絡。對于許多避居北德的前納粹官員而言，逃亡計劃從此幾乎再也不是單打獨斗，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將在阿根廷與艾希曼重逢。

### 家庭聯系

艾希曼并沒有在呂訥堡石楠草原長久定居下來的打算。但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他在當地已覺得非常安全，甚至還在1947年應邀參加一位昔日伐木同伴的婚禮，并在婚禮照片上毫不畏縮地站在新娘身旁不遠。假使艾希曼乖乖留在這個地區，他很可能永遠都不會暴露行蹤。然而安全感取代不了自己的家庭。盡管內莉·克拉維茨那位有著美麗淺褐色頭發的少婦不時從南方前來造訪奧托·黑寧格，不但為他準備了像是“皇帝煎餅塊”（Kaiserschmarrn）之類充滿異地風情的餐點，也給村內的閑言閑語帶來蓬勃生氣。[[262]](#_262_1)盡管人們謠傳他在當地另有一二紅粉知己，但艾希曼還是想重新回到自己家人身邊。

首先嘗試重返舊生活的是薇拉·艾希曼。她在其臭名昭著的丈夫失蹤之后的行為，從一開始便泄露了一家人曾事先討論過他們的應急策略。薇拉不但表現得小心謹慎，更以驚人的毅力承受了偵訊、搜家，以及盟軍和幸存者組織的監視。多虧了艾希曼的妻子，在很長時間內，一張他的照片都找不到。與在林茨的其他家人一樣，薇拉一定也把所有文件都好好藏了起來，直到1952年出發前往阿根廷之前才又把它們拿出來。她在1946年11月接受美國陸軍防諜隊訊問時，表示已在1945年3月與丈夫離婚，最后一次見面是他在4月來阿爾陶塞與孩子們告別的時候。她宣稱自己對丈夫的罪行一無所知，說辭與艾希曼的父母和手足在一個月前做出的聲明驚人地如出一轍。[[263]](#_263_1)

艾希曼在戰爭結束之前向同志們灌輸的“家中黑羊”神話，從一開始就被有系統地傳播出去。薇拉·艾希曼依然得到丈夫家人接濟的事實，似乎沒有引起任何懷疑。[[264]](#_264_1)同時也沒有人注意到，卡爾·阿道夫·艾希曼根本不可能因為國家社會主義世界觀而與他的兒子在政治立場上產生歧異，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立場堅定的國家社會主義者。艾希曼的父親在20世紀30年代末加入了納粹黨，后來如薇拉·艾希曼所言，這在1945年給他帶來了一些麻煩。但那不僅“因為他曾經是一名納粹”，更因為他缺乏有效的財產證明，以致某些明顯不屬于他的物品遭到沒收。英國歷史學家大衛·切薩拉尼（David Cesarani）因而相當正確地提出警告，千萬不要低估了“父子之間的相互作用”。[[265]](#_265_1)

1947年4月，艾希曼的妻子邁出了下一步，試圖在巴特伊施爾（Bad Ischl）宣布她的丈夫已經死亡。她聲稱艾希曼已在1945年4月陣亡于布拉格。這樣做很可能事先已與艾希曼的父親商量過，而父親同樣早就與兒子討論過各種逃亡的可能性。假如這個嘗試成功，阿道夫·艾希曼或許真的有機會在歐洲安度余生，更何況我們從許多照片都可以看出來，此人具備多么強大的適應能力。除此之外，他的妻子還可以借此獲得領取撫恤金的資格。薇拉·艾希曼提出的證據乍看之下頗有說服力：她的證人麗莎·卡爾斯（Lisa Kals）是一名嫁給阿爾陶塞人并定居當地的女子，出示了一封由某個名叫卡爾·盧卡斯（Karl Lukas）的捷克上尉寫來的信函，信中提及了艾希曼的死訊。然而西蒙·維森塔爾立刻注意到，他曾經聽過那個名字：此人是薇拉的妹夫，而那位妹妹現在正與她們的母親居住在林茨附近。經過維森塔爾的提醒，阿爾陶塞警方立刻發現了另外一件荒唐事。原來，從薇拉的妹夫處收到信函的那位麗莎·卡爾斯，婚前的姓氏同樣為利布爾。[[266]](#_266_1)也就是說，薇拉·艾希曼試圖在她的兩個妹妹和一個妹夫的協助下，為自己的丈夫取得死亡證明。[[267]](#_267_1)

等到維森塔爾出示兩份宣誓證詞，指稱5月的時候還曾經有人在阿爾陶塞看見過艾希曼，薇拉·艾希曼便撤回了她的申請，但已經產生了與預期完全相反的效果。如今每個人都知道艾希曼還活著，否則他的家人根本沒必要如此大費周章。于是美國陸軍防諜隊再次搜查了艾希曼家人的房屋，以及他一個情婦的住處。除此之外，一名以色列特工甚至設法通過艾希曼的另一位女性友人瑪麗亞·莫森巴赫爾（Maria Mösenbacher），成功獲得了第一張艾希曼的照片。[[268]](#_268_1)維斯利策尼曾派調查人員調查另外一名男子，該人據稱是“艾希曼的司機”，因而能夠交出一份內容翔實的艾希曼女友名單。那個人其實就是約瑟夫·魏斯爾，“多普爾的猶太人皇帝”，一個臭名昭著的虐待狂，皮鞭已經成為他的標志，而且他還是威廉·霍特爾的連襟。[[269]](#_269_1)魏斯爾不久之后就在巴黎站上了軍事法庭，在那里講出更多關于其上司的細節，因為他自己只是“奉命成為虐待狂”而已。雖然艾希曼一家很可能并不知道那張照片，但阿道夫·艾希曼肯定從父親那里獲悉了搜查的事情。后來在阿根廷與同伴們談話時，艾希曼甚至知道維也納已經對他發出了拘捕令。[[270]](#_270_1)艾希曼的所有家人都清楚看出，阿道夫·艾希曼已經別無選擇。他必須啟動應急計劃：逃離德國。對薇拉·艾希曼來說，這意味著更多年的等待，而且其間不可做出任何啟人疑竇的行為。等到她終于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與丈夫重新相聚時，他們已經整整七年沒有見過面了。

### 艾希曼的猶豫不決

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斷，艾希曼為什么會把阿根廷列為可能的避難地點。他后來表示，自己曾經讀到“昔日克恩滕（Kärnten）[\*](#_359)的納粹省黨部領導如今生活在阿根廷”。[[271]](#_271_2)艾希曼指的顯然是西格弗里德·于伯賴特爾（Siegfried Uiberreither）。但嚴格說來，那人其實是施泰爾馬克（Steiermark）的省黨部領導，曾在1947年5月設法逃離達豪，后來與真正的克恩滕省黨部領導弗里德里希·賴納（Friedrich Rainer）一同被引渡到南斯拉夫。奧地利的報紙充滿了相關報道，而且很早便有人猜測于伯賴特爾已逃往阿根廷。[[272]](#_272_1)到20世紀40年代末，事實上許多人都已知道，昔日的納粹要員正置身阿根廷。因為不僅相關謠言甚囂塵上，更有杜勒出版社的書籍和雜志四處流傳，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向外傳播激進的國家社會主義思想，公然用一些非常著名的作家來招徠讀者。此外，德國極右派人士如饑似渴地閱讀的《路徑》雜志，明顯是所有戰后納粹刊物當中最右傾的一個，同樣出自杜勒出版社，自1947年開始發行。它公然宣揚反猶太主義、種族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仿佛第三帝國的崩潰從未發生。

埃伯哈德·弗里奇，杜勒出版社的年輕出版商，表現得積極又自信，在德國大打廣告，使這份來自國外的褐色宣傳刊物[\*](#_360)銷路持續上升，以致早在1949年就在德國新聞界激起了一波警告和撻伐的浪潮：人們撰文評論阿根廷的“納粹負隅頑抗中心”和“南美洲的希特勒們”，并且針對“通往深淵的‘路徑’”提出警告。慕尼黑的《新報》（Neue Zeitung）甚至把弗里奇形容成“第四帝國的明日之星”。[[273]](#_273_2)漢堡的《明鏡周刊》（Der Spiegel）進而聲稱，納粹要員紛紛逃往阿根廷一事，實乃出自國防軍最高指揮部當初的指令。[[274]](#_274_1)《路徑》雜志為一個聽起來讓人心生信賴的社團“同志工作會”（Kameradenwerk）以及各種旅行中介機構打出的廣告，更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對于像艾希曼這種信仰堅定的國家社會主義者而言，那樣的新聞聽起來想必宛如來自應許之地的信息。

威爾弗雷德·馮·奧芬是戈培爾曾經的下屬和不肯悔改的國家社會主義者，也在1945年以后來到德國北部。他毫不隱瞞地表示，正是杜勒出版社的刊物激起了他對阿根廷的好奇。當他還躲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的時候，就已經利用德國和布宜諾斯艾利斯之間顯然早已運作良好的通信網絡，直接在埃伯哈德·弗里奇那里出版了他關于戈培爾的專著。[[275]](#_275_1)艾希曼日后在阿根廷也會稱贊這個網絡的價值。

\*\*\*

阿根廷不僅聽起來相當不錯，更是真正現實可行的逃亡目的地。多虧阿根廷作家烏基·戈尼（Uki Goñi）利用第一手資料進行的開創性研究，現在我們對于是哪些人建立了這樣的網絡使那些渴望移民的人能夠潛逃出境，以及該網絡的組織結構有了豐富的了解。對于擁有像艾希曼那種履歷的人來說，個人臨時起意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剛開始的逃亡路線經過瑞典的海港，距離艾希曼在北德的住地只有咫尺之遙。可是自從這條路線在1948年被曝光之后，人們不得不完全轉向南方的替代路線。一個由德國幫手、阿根廷公務機關、奧地利邊防人員、意大利登記機構、紅十字會、梵蒂岡內部人員，以及航運巨子所構成的連鎖網絡，使逃亡成為可能。在開始行動之前，必須先備妥兩份文件。其一為阿根廷的短期簽證，由得到阿根廷總統胡安·庇隆默許的人口走私販子奧爾斯特·卡洛斯·福爾德納負責提供。其二是與短期簽證持有人姓名相同的身份證件。就艾希曼的情況而言，身份證件應由南蒂羅爾的泰爾梅諾（Termeno）核發。[\*](#_361)除了艾希曼之外，一些同樣特別有問題的人物——諸如集中營的“醫生”約瑟夫·門格勒（Josef Mengele），以及希姆萊的首席副官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都同時于1948年在那個小鎮取得了身份證件。艾希曼自己的證件核發于6月11日，編號為131，證件上的姓名則寫成了里卡多·克萊門特（Riccardo Klement）。[†](#_362)[[276]](#_276_2)以保護“被迫害者和受折磨者”（他指的是納粹黨人）為己任的阿洛伊斯·胡達爾主教，后來也將因為從羅馬為這名逃亡者安排證件而出名。[[277]](#_277_2)

值得注意的是，從這些身份證件的核發到艾希曼真正脫逃，時間上相隔了將近兩年。換句話說，艾希曼是在有效期兩年的短期簽證即將過期前的最后一刻才使用的。到底是什么事情讓他猶豫不決，遲遲未曾采取行動？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德國1947-1950年的政治動蕩。在1947年12月舉行的倫敦外交部長會議上，同盟國與蘇聯的歧見明顯日益擴大，昔日盟友的分裂已經勢所難免。許多納粹黨人甚至早在戰爭結束之前即已預見到這種東西方的沖突。他們寄望于西方列強的反布爾什維主義，期待它最終能夠勝過打垮希特勒德國的愿望。之后德國就可以重新成為一個主權國家。艾希曼的一位親密同僚后來報告說：“艾希曼對西方列強與俄國之間的爭端深信不疑，并將之視作他最后的機會。”[[278]](#_278_1)戈林也在紐倫堡多次表達了這種期待，甚至希望自己能夠因此重新掌權。[[279]](#_279_1)

期待中的東西方分裂在1948年逐步成為事實，于是對一個新的開始，尤其對全面大赦的希望也隨之而來。另外一個改變卻顯然不利于艾希曼：貨幣改革已于1948年6月20日開始生效。這不僅意味著失去工作，因為他在布爾曼公司之后所在的東家迅速走向破產。貨幣改革進而威脅到艾希曼辛辛苦苦存下來的錢。對于過著非法生活的人來說，“德意志馬克”[\*](#_363)的引進帶來了嚴重問題。如果完全逃避跟公家機關打交道，就既不能領取所謂“人人有獎”的40德意志馬克，也沒有辦法獲得新的貨幣。若無外界幫助，他也無法兌換攢下的“帝國馬克”，因為兌換新幣必須有銀行賬戶，以及供財政機關核可的相關證明文件。艾希曼卻二者皆無。他固然合法申報了戶口，并已取得有效證件，但他還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與官方有任何接觸。這個非法人士如今必須仰賴洗錢業者，但那些人的兌換匯率可想而知好不到哪里去。萬一受到訛詐，也無法尋求司法保護。像艾希曼這種曾經在維也納利用不公平匯率手段，為帝國聚斂了千百萬不義之財的人，自然對此有著特別深刻的體會。

除了剛好待在沒收得來、酒窖裝得滿滿的豪宅里面執行“公務”的時期，艾希曼終其一生都過著節儉的生活。貨幣改革難免給他在海外尋求新生活的計劃帶來了挫折，因為即使老同志也不會免費提供幫助。或許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理解他投資養雞場的原因。20世紀30年代，猶太人總是在被剝奪了一切之后才獲準離開這個國家。艾希曼從中得到的教訓是，如果想要保護資產，就必須投資于實物。但其先決條件是不道德的政權沒有頒布惡法，禁止購置實物資產。

沒有人阻止艾希曼把錢投資于養雞業，幾周之后，也沒有人阻止他用家禽換來新的貨幣。由于引進這種新型穩定的通貨，他獲得了不少投資收益。村內當時的孩子們還記得，艾希曼養了100多只雞，一枚雞蛋要價高達20芬尼（Pfennig）。[\*](#_364)相比之下，艾希曼每月的租金只有10馬克。[[280]](#_280_2)這樣一來，他不但賺到了錢，還能夠暫時觀望，期待戰爭結束五周年的時候能夠出現大赦。但另一個事件或許也對艾希曼的猶豫不決產生了影響。那就是1948年冬天，警方、以色列“訪客”和一名納粹獵人在奧地利試圖逮捕他未果。

### 探訪家人？

在1960年10月的一場新聞發布會上，西蒙·維森塔爾向驚訝莫名的觀眾宣布，他曾試圖利用阿道夫·艾希曼計劃在1949年圣誕節前往阿爾陶塞探訪家人的機會抓捕他：“那棟房子被團團包圍起來，可是艾希曼沒有現身。他顯然得到警告或者起了疑心，于是再次消失不見了。”[[281]](#_281_2)這不只是維森塔爾所講的諸多戲劇性故事中的一個，而是一次真正的行動，即便他給出的日期并不完全準確。

早在1948年秋天即已有線索表明，艾希曼打算在圣誕節和新年之間前往探訪他的家人。關于隨后發生的事件，有許多當事人的報告保存了下來。它們的內容并不總是一致，卻都可以歸結到一個共同的核心和日期。[[282]](#_282_1)根據消息，1948年12月的時候，林茨的奧地利刑事警察（萊奧·弗蘭克-邁爾[Leo Frank-Maier][[283]](#_283_1)等人），配合包括米迦勒·布洛赫（Michael Bloch）[[284]](#_284_1)在內的以色列特工人員，與西蒙·維森塔爾在阿爾陶塞布下了天羅地網。計劃是逮捕艾希曼，并把他交給以色列人。為此林茨刑事警察的負責人不但不用負擔行動開銷，還能另外獲得5000美元。于是他們試圖在那個人口稀疏的地區盡可能不令人起疑地進行部署，而當時正值深冬，夜間氣溫低達零下20攝氏度。所有參與人員都提到監視工作出現了紕漏，卻對失敗責任的歸屬莫衷一是，講不出究竟是誰的疏失導致艾希曼事先獲得警告。但最可能的解釋是，在一個像阿爾陶塞菲舍恩多夫（Fischerndorf/Altaussee）這樣小的地方，由那么多人共同參與的行動根本不可能不被發現。報告中甚至提到，小鎮上流傳著有關以色列人或納粹獵人西蒙·維森塔爾出沒的流言蜚語，后者在奧地利已不再無籍籍名。

艾希曼是否真的嘗試過在1948年圣誕節和新年之間前往探訪他的家人？他是否的確愿意冒著巨大的風險旅行穿越整個德國，還要以偽造的身份出境？我們從后來那些年發生的事情可以知道，不管艾希曼再怎么“虔信宗教”，圣誕節總是與強烈的家庭情感聯系在一起。更何況他的身份證明文件已經在意大利準備妥當，因此艾希曼若是提前展開逃亡行動的話，探訪家人正好讓他在半路上歇歇腳。可是如此一來，艾希曼勢必來不及變賣他在當地的資產就要從阿爾騰薩爾茨科特消失，這對他是一筆嚴重的財務損失。薇拉·艾希曼和孩子們后來并沒有提到過這樣的計劃，艾希曼在阿爾騰薩爾茨科特細心的鄰居們也都不曾觀察到他有長時間出遠門的跡象。艾希曼后來指出，自己至少曾經有過探訪家人的念頭，但他把時間定在1950年，也就是當他展開逃亡計劃，在距離妻兒幾公里外的地方穿越奧地利之際。那時他一度考慮是否該冒險與家人見面，卻還是很克制地決定不要那么做。[[285]](#_285_1)艾希曼不太可能偏偏在1948年喪失了自制力。同時他自己的思維方式非常接近調查人員，不太可能犯錯誤挑選這么一個具有標志性的日子，而且剛好是在謊報死亡的企圖失敗不久之后。

還有別的因素表明，艾希曼不可能企圖在這個時候接近他的家人。1948年9月底在林茨進行的一次采訪引發了一系列報紙專論。維也納的《世界晚報》（Welt am Abend）報道說：“艾希曼的父母自戰爭結束以來，便不曾聽到過有關他們兒子的消息。”然而在那一地區完成的調查卻指出，有謠言表明阿道夫·艾希曼在1946年以前曾是美軍戰俘。他已化名埃克曼，據悉目前正在中東“擔任耶路撒冷大穆夫提阿爾-侯賽尼的顧問，協助解決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問題”。以《帝國猶太專員》或《阿拉伯軍團之一員》等為標題，那個故事在1948年10月頑固地持續出現在新聞媒體上。[[286]](#_286_1)就連剛剛完成其戈培爾傳記的庫爾特·里斯（Curt Riess），也以“特約記者”的身份前往阿爾陶塞，尋找艾希曼的蹤跡。最后他只能勉強擠出一個嘩眾取寵的文章系列，來講述“阿爾陶塞的風流娘兒們”（Die lustigen Weiber von Altaussee）[\*](#_365)，里面當然也少不了提到納粹黃金的傳說。《新世界》（Die Neue Welt）在11月13日刊登了一份還算具有啟發性的文件，發布了兩頁艾希曼在1937年手寫的個人簡歷，出自其官方人事檔案。所有人都可以從中清楚地看到他真正誕生于何時何地，以及他的謀殺事業是如何開始的。里斯也詳細描述了艾希曼家人現在的居住地。然而一個信息反復出現于各篇文章中，想必也讓艾希曼的家人特別感到憂心忡忡：“艾希曼在所有戰犯名單上都排在第一位。”不管艾希曼考慮過怎樣的逃亡計劃，1948年年底都不是付諸行動的良好時機。因為人們顯然都還十分清楚地記得他是誰，知道他曾經一心夢想成為“帝國猶太專員”。

德國聯邦情報局（BND）的前身蓋倫組織（OrganisationGehlen）于幾年后獲悉，以色列駐維也納領事曾在1949年，也就是圣誕節抓捕行動失敗一年之后，提供5萬先令用于追捕艾希曼。[[287]](#_287_2)甚至還有人宣稱懸賞金額高達100萬先令。蓋倫組織的線人稱，有一個以色列特工小組曾經潛伏在奧地利，準備趁艾希曼在圣誕節探訪家人時綁架他，甚至已經在薩爾茨堡（Salzburg）機場租好了一架飛機。那么在維森塔爾抓捕行動失敗一年之后，是否有人再次嘗試圍捕艾希曼呢？

根據檔案資料，蓋倫組織的線人是約瑟夫·阿道夫·烏爾班（Josef Adolf Urban）。這個八面玲瓏的人物出生于1920年，1948年在林茨市內一間淪為假護照交易中心的咖啡館遭到逮捕。他的袋子里裝滿了厚厚一疊偽造證件，足夠讓林茨警方逮捕他了。萊奧·弗蘭克-邁爾是參與逮捕行動的警官之一，報告了偵訊烏爾班的情形。他甚至還允許西蒙·維森塔爾旁聽，因為被捕的那個人顯然意圖協助戰爭罪犯逃亡。盡管罪證確鑿，兩天之后他們卻不得不釋放約瑟夫·阿道夫·烏爾班。按照萊奧·弗蘭克-邁爾的講法，有兩名美國防諜隊的密探上門要求釋放那名嫌犯，因為烏爾班在一個針對蘇聯的間諜網中是不可或缺的協調者。邁爾很快發現，烏爾班其實是在向情報單位提供編造的“情報”，來源是同樣被他炮制出來的一些“在地特工”。他甚至還在東歐編造了若干武器工廠。[[288]](#_288_1)

邁爾顯然有所不知的是，極力避免讓烏爾班接受審判的不止美國諜報機構一家。那名情報制造者同時也是奧地利內政部國家安全部門的線人，萬一他出庭受審，這個事實將不可避免地被曝光出來。[[289]](#_289_1)事實上烏爾班向幾乎所有情報單位通風報信，從法國的第二局（Deuxième Bureau）到以色列的情報機構，無所不包，而蓋倫組織當然包括在內。[[290]](#_290_1)無怪乎在迄今關于德國聯邦情報局內容最詳盡的那本研究專著中，作者恰如其分地稱之為“一個浪跡天涯的特務機構雇傭兵”（ein vagabundierender Geheimdienstsöldner）。[[291]](#_291_1)萊因哈德·蓋倫（Reinhard Gehlen）更委托這名所謂的消息靈通人士，在1948年與布魯諾·考舍恩（Bruno Kauschen）一起，發展德國情報組織在奧地利的分支機構。[[292]](#_292_1)我們不確定蓋倫當時是否知道，烏爾班的爆炸性情報往往都是編造出來的，以及烏爾班究竟在哪里學會了這套功夫。

計劃綁架艾希曼的消息是否屬實？我們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就能從阿爾陶塞當地酒館主人的口中聽到有關1948-1949年冬天那場失敗行動的花絮。但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即烏爾班在1952年透露他的內幕消息時，虛構多過了事實。因為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蓋倫組織在1952年的時候對艾希曼非常感興趣。烏爾班甚至宣稱，他曾親自幫助艾希曼逃亡——這個招供似乎并沒有給他在戰后西德情報部門的職業生涯帶來負面影響。[[293]](#_293_1)然而與情報機構的典型做法一樣，對外公開的文件顯示不出什么東西來。不過我們還是知道，烏爾班到底在哪里學會了這種瞎編亂造的本事：先是在黨衛隊保安局，后來在匈牙利跟艾希曼一起。[[294]](#_294_1)

那名年輕的事業狂人在18歲時即已加入納粹黨（黨員編號6312927），很快就躍升為維也納黨衛隊保安局的負責人，被認為是瓦爾特·舍倫貝格（Walter Schellenberg）手下的一名巴爾干問題專家，最后成為黨衛隊保安局布達佩斯總部的負責人。而當時艾希曼正在那里向世人展示，在六周時間里可以將多少人“帶往毀滅”（der Vernichtung zuführen）。烏爾班關于魯道夫·卡斯特納的故事讓維森塔爾目瞪口呆。[[295]](#_295_1)無疑，萊因哈德·蓋倫對受過良好訓練的人別具慧眼。

但如此一來，烏爾班應該也是最不希望看見艾希曼重新現身的人之一，因為不僅烏爾班知道艾希曼在1945年以前做過什么事情，艾希曼當然也清楚烏爾班的過去。假如有機會的話，烏爾班甚至巴不得能夠把偽造的證件送交給艾希曼，即便艾希曼永遠不會依靠像烏爾班這樣的小罪犯。然而那名前任布達佩斯黨衛隊保安局首腦不愿背叛艾希曼，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動機：烏爾班終其一生都是信仰堅定的納粹黨人。根據其同僚的報告，烏爾班總是“以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之名任命屬下，因為他有可靠的情報指出，希特勒還活著，而且按照烏爾班的講法，就置身南極地區一個溫暖的綠洲”。缺少地理學知識顯然不是烏爾班的最大問題所在。[[296]](#_296_1)但他的政治觀點也沒有妨礙萊因哈德·蓋倫在1956年以后繼續雇用約瑟夫·阿道夫·烏爾班為聯邦情報局工作。他直到20世紀70年代都還一直出現在普拉赫（Pullach）的薪餉名冊上。[\*](#_366)

除了蓋倫組織的檔案之外，還有更多證據顯示，曾經有過第二次企圖將艾希曼從奧地利綁架出境的嘗試。除了西蒙·維森塔爾，還有另外兩名男子報告了1949-1950年新年之際可能的行動。那二人分別是不知疲倦的納粹獵人托維阿·弗里德曼，以及絕對知道內情的阿舍·本-納坦（Asher Ben-Natan），他當時仍然主管以色列外交部的政治司，亦即日后“摩薩德”的前身。然而這次行動也失敗了，因為艾希曼根本沒有過來。[[297]](#_297_2)

蓋倫組織的檔案里面不僅包括了烏爾班的胡言亂語，也顯示出兩次綁架企圖之間的一年發生了重大改變：按照烏爾班的講法，捉拿“猶太人的頭號敵人”的懸賞金額已經增加，可是明顯變得比較不值錢。金額從5000美元提高為50000先令，盡管多出一個0，實際的價值卻減少了一半以上。也有人提到100萬奧地利先令的巨額懸賞金，但這種不一致的情況證明消息未必可靠。

過了11年，等到以色列特工小組再度設法綁架艾希曼，并且果真把這名被追捕了那么久的罪犯送上飛機之后，美國中情局一口認定該計劃出自西蒙·維森塔爾之手。[[298]](#_298_1)顯然中情局也早已聽說了20世紀40年代末期失敗的綁架嘗試。

我們不知道究竟是誰暗中通報了艾希曼的探訪行程，讓西蒙·維森塔爾提高警覺，以及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逮捕行動會成功。但我們不得不懷疑那個通報是否值得被認真看待。說不定那出自誤會，是各種混淆所造成的結果，甚至是艾希曼家人的測試，以查明自己受監視的程度。但無論如何，艾希曼一定已經發現，人們依舊對他興趣不減。如果以色列人曾出現在阿爾陶塞的流言事后傳到了艾希曼那里，他想必會特別感到不安。在1960年遭到綁架之后，艾希曼曾表達過一種特別的恐懼：他擔心失去了許多孩子的猶太民族會把對此難辭其咎的人當成目標，派人針對他的孩子展開復仇行動。[[299]](#_299_1)可是鑒于戰犯名單廣為人知，加上奧地利警方已受到驚動，最好的對策還是盡可能遠離危險。所以他繼續冒充與世無爭的奧托·黑寧格，待在偏僻的阿爾騰薩爾茨科特養雞，再用高價將雞蛋出售給他來不及送上死路的那些人。艾希曼雖然在1950年的時候已經攢了一點錢，卻不得不認清一個事實，那就是新成立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并沒有讓他免遭起訴。他的阿根廷簽證即將到期，現在該是他上路的時候了。

### 有條不紊的脫逃行動

艾希曼即使在離開阿爾騰薩爾茨科特的時候也保持頭腦清醒。半夜偷偷溜走的做法只會引人疑竇，然后制造出各種故事傳進不該聽的人耳中。但另一方面，在國內遷徙甚至移居國外的人，在那些年頭并不少見。戰爭及其造成的后果，諸如逃亡、劫持、驅逐、難民營和城市住房短缺等，讓許多人仍在尋找一個能讓他們重新產生歸屬感的地方。艾希曼成功地使奧托·黑寧格也成為那些尋覓者當中的一員。他把雞賣給了弗賴斯萊本的森林管理員、告訴房東太太自己準備去斯堪的納維亞做機械工程師，并且寫信向內莉道別，以掩蓋在她那里留下的所有痕跡。[[300]](#_300_1)他宣稱自己打算向俄國人投案——跟今天人們想象的不同，此事在當時聽起來并不顯得那么突兀，因為有許多人揣測，一些蓋世太保高官（例如艾希曼的頂頭上司米勒）已經躲進了蘇聯占領區。只可惜至今還沒有系統化地研究，到底哪些人真的選擇了這條脫逃路線。那個搬家地址在當時還另有好處，因為查核起來不那么容易。總而言之，奧托·黑寧格沒有不告而別，或者像小偷一樣在夜里逃走，而是繳清房租，并且有模有樣地和阿爾騰薩爾茨科特道別。于是沒有人懷疑，也沒有人報警。在人們的記憶中，過去四年那位鄰居都是一位令人愉快的外來客。如果有誰懷念其不事張揚的作風或者他的小提琴演奏，仍舊可以在那張婚禮照片上看見他。要是能偶爾收到他的消息，知道他在遠方過得怎么樣，那就更好了。然而沒有任何人料到，那會是一張來自以色列的明信片。

\*\*\*

究竟是艾希曼自己想辦法與逃亡網絡取得了聯系，還是對方的代表主動找上門來，這個問題至今依然懸而未決。同樣，我們也無法排除艾希曼的父親在林茨提供協助的可能性：既然奧地利報紙上談論于伯賴特爾逃亡經過的文章能夠一直傳到德國北部，可見艾希曼一定與奧地利保持著密切聯系。不過艾希曼自己在談起這些事情的時候，卻說出了好幾個自相矛盾的版本。根據其中一個版本，他在當地報紙上刊登精心編成密碼的廣告，由此聯絡上蛇頭集團。[[301]](#_301_1)而根據艾希曼在1961年年初講述的狂野浪漫版逃亡故事，是他自己的冒險精神和一位值得信賴的同志，才終于促成了雙方的接觸：“我在石楠草原向一位密友透露自己打算前往海外，問他是否知道誰清楚與逃亡有關的各種事情。通過這種方式，我在1950年與漢堡的一位先生取得聯系。他從前是黨衛隊的人，現在經常來往于德國和意大利之間。我從自己的儲蓄（靠雞蛋生意賺來的2500馬克）當中給了他300馬克，于是從他那里獲得了關于經由‘潛水艇路線’（U-Boot-Route）前往南美洲的最精確信息。我了解到每一個細節、每一個停靠站、每一個聯絡點。”[[302]](#_302_1)

所有的故事版本都有一個共通之處，那就是盡可能轉移人們對實際參與者的注意。艾希曼直到被處決時都心懷感激，對每一個幫助過他的人展現出這種休戚與共的精神。時至今日，我們知道其故事中的一個關鍵要素完全無法成立：逃亡所需的第一份證件在1948年6月初即已核發，時間早于貨幣改革，甚至是在艾希曼從林區伐木工人變成雞農之前。他刻意在講述中把日期往后挪了。這種提供錯誤日期的做法旨在釋放假消息，艾希曼后來曾經對此做過詳細描述[[303]](#_303_1)，并且一再以驚人的完美手法實際加以運用。[[304]](#_304_1)通過推遲日期，他得以始終一貫地淡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一個人若是在某個機構揭幕時才首次現身，其角色自然不同于在籌備階段即已造訪該機構未來場地的人。他把這種策略應用于成立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和設置死亡集中營的時間。同樣，一個花了兩年多時間來安排自己逃亡計劃的人，給別人的印象自然迥異于一個在1950年才臨時決定前往意大利，手中只有幾個地址準備見機行事的脫逃者。類似這樣竄改日期的做法，可以掩蓋很長一段時間內發生的事情，借此規避各種令人不快的問題。例如，在1948年貨幣改革前夕，艾希曼從哪里獲得的金錢與聯系，以了解逃亡的各種細節？另一個問題就是，他如何聯系上相關教會機構，并在其協助下獲得了南蒂羅爾的身份證件和阿根廷的短期簽證？因為艾希曼顯然沒辦法親自過去。曾經幫助艾希曼逃亡的內莉·克拉維茨不是可能的人選，因為艾希曼顯然并不信任她。

建立新身份的過程非常復雜，短期簽證和來自南蒂羅爾的身份證件只不過是第一步而已。有了這些文件、照片，以及方濟會神父愛德華多·德默特爾（Edoardo Dömötör）出具的一份品行證明，艾希曼才得以向熱那亞的國際紅十字會申請護照。等到取得護照和短期簽證之后，才有辦法向阿根廷大使館申請長期簽證。長期簽證加上醫師出具的健康證明，以及更進一步的身份證明文件，是艾希曼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申請個人身份證件的基礎。除此之外，他還必須坐船過去。熱那亞只需要兩個多禮拜的時間來完成整套程序。即使是艾希曼那樣經驗老到的移民專家，也不可能臨時起意便如此高效率地利用這許多國家和機構的漏洞，至于約瑟夫·門格勒和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之類完全缺乏經驗，不知該如何靈活處理過境突發狀況的人士，自然就更不用說了。

從國際紅十字會保存至今的護照申請檔案中的照片，即可看出逃亡組織的專業程度：在那張照片上，艾希曼的化裝效果好得令人嘆為觀止。精心修剪得露出頭頂的發型、圓框眼鏡、八字胡、西裝和領結，都讓他看起來不僅明顯老了許多，并且就像刻板印象中的工程師模樣，完全不會讓人聯想到一名官員。艾希曼的照片并非特例。希姆萊的前任首席副官，身高將近兩米的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原本有著嚴重后退的發際線，如今卻戴著蓬松的遮禿假發、蓄著小胡子、雙肩下垂。那里的化妝師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艾希曼和其他許多流亡者一樣利用的體系得到很多方面的支持，其中更包括得到阿根廷總統胡安·多明戈·庇隆許可的專業人口走私集團。阿根廷對德國的專業人士極感興趣，希望借由他們推動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型的進程，這讓協助逃亡的工作看起來像是一筆合理的投資。戰后歐洲的局勢非常有利于這種技術轉移，由于整個地區都已淪為廢墟，人人都必須為自己尋找新的出路，因此很容易接受邀約。就爭取受過良好教育的移民而言，阿根廷并不是唯一這么做的國家，但很少有別的地方像它一樣為艾希曼這樣的罪犯提供移民機會。在阿根廷方面，德裔阿根廷人魯道福·弗洛伊德（Rudolfo Freude）與移民局密切合作，組織了援助逃亡者的行動。另一個之前已經提到過的德裔阿根廷人奧爾斯特·卡洛斯·福爾德納，在1948年前往歐洲，在阿根廷領事館的協助下，提供各種文件和組織架構幫助逃亡者脫逃。艾希曼的兒子將在許多年后表示，福爾德納是“父親最好的朋友”。[[305]](#_305_1)

敖德薩（O.D.E.S.S.A.）[\*](#_367)的神話——亦即認為有一個結構嚴密的前黨衛隊成員組織，在第三帝國土崩瓦解之后走入地下，如鐘表般繼續運作——長久以來扭曲了人們對現實的看法。其實“敖德薩”一詞最初只不過是戰俘營內的暗號，讓黨衛隊成員能夠認出彼此并相互扶持。[[306]](#_306_2)神話之所以歷久不衰，是因為它滿足了我們的想象力。這樣一個地下組織的神話，同時為兩個受到創傷的群體提供了滿足。一個是納粹獵人，他們和所有追捕者一樣，隨著時間流逝，高估了對手的實力，傾向于陰謀論。另一個是納粹黨人自己，他們在掌權期間早就理想化了黨衛隊之類組織的高效率，等到戰敗之后，覺得黨衛隊會以某種方式延續命脈的想法給他們帶來了安慰。認為存在一個地下組織，所有黨衛隊隊員在1945年后都自動成為其成員，而且該組織不受影響地繼續存在，仿佛當年5月什么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般，這顯然是恐懼或希望所引發的幻想。但同樣自然的是，即使一個建立于某種意識形態之上的國家已經分崩離析，該意識形態的堅定支持者們也不會停止忠于自己的信念，不會失去彼此休戚與共的歸屬感。德國的戰敗在國內創造了一個無所不在的新敵人——同盟國的軍隊，而這個共同的敵人又回過頭來強化了他們的凝聚力。對黨衛隊的浪漫想象并沒有消失在懷舊的記憶中，而是創造出一個適應新時代的網絡。昔日的黨衛隊成員從來都沒有過自己的大型地下組織，可是有不少藏身地下的前黨衛隊成員需要幫助，而且他們很容易就可以從正面看待黨衛隊的人士那邊得到幫助。這種權宜的聯盟有賴于私人引薦和良好的關系，非法的聯盟尤其如此。歸屬于一個意識形態色彩強烈的共同體，此種身份就是最好的“推薦函”，無論在安排住宿、代為聯系、郵寄服務或者提供更大幫助的時候都管用。其基本結構與帝國保安總局之類的納粹機構并無差別，但已經因時制宜。一個體制僵硬的逃亡協助組織，即使可行，也永遠沒辦法像這個靈活的利益共同體一樣高效，素昧平生的人也可以依賴彼此的幫助。艾希曼在歐洲的逃亡以及在阿根廷的生活都深受其影響，甚至連他在耶路撒冷出庭受審時的表現也不例外。因此我們若想查明和理解艾希曼在阿根廷的生活背景，就不能不先考察一下他的脫逃行動是如何組織起來的。在老同志和他們新的同情者相互支援扶持的背后，隱藏著一種特殊的思維方式，那就是不輕易公開自己的身份，因為這整個網絡都建立在不引人注意的作風之上。提供幫助必須悄悄地進行，因為敵人到處都是，而那些看似松散的網絡聯結，其價值主要就在于永遠不透露它們是如何運作的。艾希曼直到1962年也對此深信不疑，在回顧往事的時候一再對協助他和家人逃亡并展開新生活的“那個組織”表達深切的感激之情。[[307]](#_307_1)

### 自求多福的旅人

艾希曼的道路并沒有通向羅馬，盡管要是沒有與梵蒂岡關系緊密的教會機構從旁協助的話，他根本不可能逃跑成功。盡管如此，很長時間都一直有人懷疑艾希曼去了那座永恒之城。不過早在1961年春天，摩西·珀爾曼就已經提到了熱那亞港以及在當地接應艾希曼的方濟會神父——他通過特殊渠道獲得了艾希曼在審訊中的供詞。[[308]](#_308_1)珀爾曼的發現固然因為漢娜·阿倫特而廣為人知，但仍不足以撼動一個牢不可破的謠言，即艾希曼在羅馬會見了阿洛伊斯·胡達爾主教，并且在“圣拉斐爾協會”（St.Raphaels-Verein）[\*](#_368)的安東·韋伯（Anton Weber）神父那里通過了信仰測試。盡管胡達爾或許在安排艾希曼取得假證件方面提供了協助，但我們還是可以完全排除二人在羅馬見過面的可能性。不過話說回來，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胡達爾便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與協助納粹逃亡的行動密不可分。等到艾希曼被逮捕以后，最自然不過的不就是把艾希曼在教會協助下經由意大利逃跑一事，與人們所知道的唯一一個名字——阿洛伊斯·胡達爾——聯系在一起嗎？

盡管有證據表明，胡達爾主教曾在羅馬接見潛逃的納粹人士并在他們逃亡期間給予照顧，但艾希曼不是其中之一。他在1950年5月的逃亡路線，是從阿爾騰薩爾茨科特直接前往奧地利邊界附近。那段旅程既輕松又舒適。路易斯·辛特霍爾策從比勒費爾德趕過來，親自開車載著他的老同志，從策勒一直來到奧地利邊界上的巴特賴興哈爾（Bad Reichenhall）。至少按照這名前因斯布魯克黨衛隊領袖后來的講法，情況就是這個樣子，而他也為此給自己惹來一身腥。[[309]](#_309_2)這只是一個白天的車程，所以不需要另外找地方住宿。抵達巴特賴興哈爾之后，艾希曼在一名人口走私者的幫助下，抄小路偷偷來到奧地利的庫夫施泰因（Kufstein），接著坐出租車前往因斯布魯克，他在那里有一個聯絡地址。在納粹的圈子內，因斯布魯克是眾所周知的逃亡者歇腳點，尤其聚集了打算逃離自己過去的那些人。有許多跡象顯示，艾希曼在此還見到了他的父親，或者至少見到了一個中間人，因為他把自己賺來的錢留了一部分給他在奧地利的家人。[[310]](#_310_1)在職業蛇頭集團的協助下，艾希曼又從因斯布魯克向南來到布倫納山口格里斯（Gries am Brenner）的維納德爾斯客棧（Gasthaus Vinaders），然后越過邊境進入意大利。施泰青（Sterzing）[\*](#_369)的約翰·科拉迪尼（Johann Corradini）神父趕來與艾希曼會合，并把行李交還給他，之前這位神父親自騎車載運他的行李穿越邊界，現在還幫他安排了一名“出租車司機”。由于科拉迪尼的協助并非孤立事件，我們可以推斷，那名“出租車司機”也是局內人，靠特殊的乘客來賺取外快。不管怎樣，司機載著逃亡者繼續來到博爾扎諾博岑省（Bozen/Bolzano），也就是在艾希曼的新簡歷上，他于1913年作為安娜·克萊門特（Anna Klement）的私生子來到世上的地方。根據艾希曼自己的說法，他在當地免費取得了阿根廷移民局的短期簽證，而且他顯然還拿到了已事先幫他辦妥的證件——由南蒂羅爾的泰爾梅諾核發的身份證明，上面稱他是“無國籍者”。

離開博爾扎諾，行程繼續經維羅納（Verona）前往熱那亞，艾希曼就在熱那亞的一座方濟會修道院內避難。不過我們尚不清楚艾希曼在那里還遇見了其他哪些昔日的同志。艾希曼自己只提到過佩德羅·蓋勒，一位本名赫伯特·庫爾曼的前坦克部隊軍官。艾希曼甚至聲稱曾經借錢給那人以便他漂洋過海。但我們可以推測，別名蓋勒的庫爾曼并非艾希曼于逃亡途中異地重逢或首次見面的唯一對象，他在這段時間已為未來的海外生活建立了聯系。艾希曼在修道院內度過了他在歐洲的最后幾個星期，在前往紅十字會和阿根廷移民當局在熱那亞的駐外機構的空檔，靠下棋以及與“老僧侶方濟各”（alter Mönch Franziscus）討論世界觀來打發時間。有關艾希曼在此期間正式皈依天主教并受洗的謠言，是完全站不住腳的。[[311]](#_311_2)受洗既不明智也沒必要，因為泰爾梅諾頒發的假證件早已把他注記成了天主教徒。艾希曼后來一再把自己描述成“信神的人”，并且以個性鮮明的傲慢口吻表示，自己曾經接受東道主的請求一同參加了晨間的禮拜儀式：“方濟各神父在我出發的前一天懇求我過去望彌撒，因為他想要為我賜福。‘反正這不會有壞處。’他說。我伸手攬住他的肩膀，稱他是‘我的好老法利賽人’。”[[312]](#_312_1)艾希曼沒有因為護照上面捏造出來的宗教信仰而良心不安，還以令人不解的唐突方式描述了自己的態度：“我毫不猶豫地自稱為（但這并不表示我變成了）天主教徒。事實上我不屬于任何教會，但天主教神父們對我的幫助令我銘記于心，所以我決定成為榮譽教友，借此給天主教會帶去榮譽。”[[313]](#_313_1)希姆萊周圍那幫人的榮譽觀，本來就有些自成一格。[\*](#_370)

等到“喬凡娜C”（Giovanna C）號蒸汽船終于載著約莫15位逃亡者駛離熱那亞港的時候，艾希曼心中的解脫感不禁油然而生。即使當他在以色列回想起渡海經過時，那種感覺依然非常鮮明地溢于言表。[[314]](#_314_2)回顧了自己得救所經歷的艱辛之后，艾希曼立即十分不得體地與另一類難民做了對比：“從前是猶太人，如今是埃希曼！”[[315]](#_315_1)這種比較非但恬不知恥，同時也泄露了真相：艾希曼雖然試圖在1960年說服每一個人，他其實不過是個無名小卒，卻又一次在此突顯了“艾希曼”這個名字所具有的象征意義。那句話乍看之下像是荒謬可恥的挑釁，仿佛這名兇手妄圖把自己跟他的受害者混為一談，可是仔細思考，它卻精確地呈現出艾希曼的真正面目：一個自視與猶太人勢不兩立的人，而且知道別人也如此看待他，能夠馬上理解“猶太人-艾希曼”之間的對立性。任何人寫出這種句子，所基于的都是一個姓氏的名聲，亦即“艾希曼這個名聞遐邇的字眼”。艾希曼在追憶自己逃亡的最后階段時回想起那樣的感覺，這絕非偶然。畢竟正是其原有姓氏的響亮名聲，讓他認為自己能夠在新家園迎來新的開始：“我知道，在南美洲的這個‘應許之地’，有一些好朋友正等著向我伸出援手。我可以公開地、自由地、驕傲地告訴那些朋友：我是阿道夫·艾希曼。”[[316]](#_316_1)換句話說，那些朋友之所以愿意幫助他，正是因為他們知道他是誰。對艾希曼來說，里卡多·克萊門特從一開始就只不過是身份證明上面的另外一個名字而已。前往阿根廷的航程非但讓艾希曼重獲自由，更讓他重新獲得了自己的姓名。

[\*](#_18) NSDAP是“德意志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的正式德文縮寫。該黨黨名前兩個音節（Nati）的德語發音為“Nazi”（讀如“納齊”），于是“Nazi”變成該黨的俗稱或帶貶義的簡稱，漢語通用譯名為納粹。——譯注

[\*](#_19) “羅姆事件”亦名“羅姆政變”（Röhm-Putsch）或“長刀之夜”（Nacht der langen Messer）。1934年6月30日夜間，希特勒下令黨衛隊及蓋世太保（Gestapo）在全國各地誅殺沖鋒隊（Sturmabteilung，SA，也譯為“突擊隊”）的領導高層。黨衛隊從此以“黨內精英”之姿，取代了原為納粹街頭打手部隊的沖鋒隊。恩斯特·羅姆（Ernst Röhm, 1887-1934）乃沖鋒隊的“參謀長”和實際領導人，生前是希特勒唯一可稱兄道弟的朋友，因黨內路線之爭而被鏟除。——譯注

[\*](#_20) 禁止的理由是，他的希伯來文教師必須是雅利安人。——譯注

[\*](#_21) 黨衛隊保安局是納粹黨內部的情報單位，蓋世太保則是國家秘密警察。——譯注

[\*](#_22) 保安局的第二處（Amt II）負責國內事務，第二處第一科（Zentralabteilung II 1）負責“世界觀的敵人”，第一科第一組（Hauptabteilung II 11）負責世界觀，第一組的第二部門（Abteilung II 112）負責猶太人事務。二戰爆發后，黨衛隊保安局在1939年9月下旬與“安全警察”（Sipo）合并成為“帝國保安總局”。——譯注

[†](#_23) 尤利烏斯·施特萊徹（1885-1946）乃《沖鋒報》（Der Stürmer）發行人和紐倫堡地區（中弗蘭肯）的納粹省黨部頭目。《沖鋒報》自1923年起散播反猶太主義，以文字及漫畫極盡污蔑猶太人之能事。施特萊徹是1933年納粹抵制猶太人行動的負責人，最后在紐倫堡審判被判處絞刑并執行。——譯注

[\*](#_26) 約瑟夫·戈培爾是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部長，威廉·弗里克是內政部部長，瓦爾特·馮克是經濟部部長，威廉·施圖卡特是內政部的國務秘書。——譯注

[\*](#_36) 《人民觀察家報》是納粹的黨報。——譯注

[\*](#_43) 嗜血獵犬（Bluthund）也被翻譯為尋血獵犬。——譯注

[\*](#_44) 《猶太人蘇斯》（Jud Süß，Süß的發音其實接近“敘斯”）是納粹在1940年推出的著名反猶太電影。——譯注

[\*](#_56) “保護國”指的是納粹德國在1939年3月占領捷克斯洛伐克西部之后，建立的“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Protektorat Böhmen und Mähren）。東半部的斯洛伐克則成為納粹德國扶持的傀儡政權。——譯注

[\*](#_57) “黨衛隊高級突擊隊領袖”亦翻譯為“黨衛隊一級突擊中隊長”，相當于上尉。——譯注

[†](#_58) 瓦爾特·施塔勒克（1900-1942）當時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擔任安全警察與黨衛隊保安局的負責人，德蘇戰爭爆發后在列寧格勒郊外被蘇聯游擊隊狙殺。其生前最著名的事跡為擔任臭名昭著的“特別行動隊A支隊”（Einsatzgruppe A）第一任指揮官，曾因“功”晉升為黨衛隊旅隊長（警察少將）。——譯注

[\*](#_61) 黨衛隊二級突擊中隊長亦翻譯為黨衛隊上級突擊隊領袖，官階相當于中尉。奧地利在與德國合并之后，于1938年10月至1942年1月之間名為“東方邊區”（Ostmark）。——譯注

[\*](#_72) 第四局D處4科通稱為“艾希曼辦事處”（Dienststelle Eichmann或Eichmannreferat），在1941年改劃歸到負責“世界觀敵人”的四局B處，編號從此改成了第四局B處4科（Referat IV B 4）。——譯注

[\*](#_73) 瓦爾特高位于今日波蘭中西部，面積4.5萬平方公里，在1939-1945年之間劃歸納粹德國，首府是波森（今波茲南）。沃里尼亞位于烏克蘭西北部，比薩拉比亞大致相當于今日的摩爾多瓦共和國。——譯注

[\*](#_94) 即今波蘭什切青，斯德丁是它的德語名稱。——編注

[\*](#_96) R是德文Räumung（清除、清理、疏散、騰空）一詞的縮寫。——譯注

[\*](#_97) 施奈德米爾位于普魯士的波森省，一戰結束后波森被割讓給波蘭，施奈德米爾和波森北部及西部的邊緣地帶則繼續留在德國。二戰結束后施奈德米爾也被并入波蘭，更名為皮瓦（Piła）。——譯注

[\*](#_102) 亦翻譯為“黨衛隊突擊隊大隊領袖”，位階相當于少校。——譯注

[\*](#_104) 戈培爾除擔任納粹德國宣傳部部長之外，并在1926-1945年兼任大柏林地區的“大區長官”。——譯注

[\*](#_113) 納粹政權于1942年5月8日至6月21日在柏林舉辦惡意攻訐的“蘇維埃天堂”（Das Sowjet-Paradies）展覽。以德國籍猶太共產黨人赫伯特·鮑姆（Herbert Baum）為首的反抗小組于5月18日對該展覽進行了縱火攻擊。案發之后，該小組的成員有28人遭到處決，此外并有500名柏林猶太男性遭到逮捕——其中一半立刻被槍斃，另一半則被送入集中營（艾希曼組織了運送行動）。——譯注

[†](#_116) 海烏姆諾位于羅茲北方50公里，或音譯為“切姆諾”，是納粹最初設置的死亡集中營之一。其德文名稱為“庫爾姆霍夫滅絕營”（Vernichtungslager Kulmhof）。——譯注

[\*](#_119) 萊因哈德行動（Aktion Reinhardt）是納粹在1942年7月至1943年10月之間進行的消滅波蘭猶太人行動，主要在貝烏熱茨（Bełżec）、索比布爾（Sobibór）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三座死亡集中營。奧迪洛·格洛博奇尼克則是奧地利黨衛隊集團領袖（警察中將）、盧布林地區的黨衛隊與警察首腦，以及萊因哈德行動的總負責人。——譯注

[\*](#_121) 奧斯維辛這個譯名有可議之處。包括波蘭文在內的歐美語言均直接按照德語發音（奧許維茲）來稱呼該集中營。其所在地點固然今日名叫Oświęcim，但波蘭語讀音為“奧許文琴”。俄語雖稱該營為“Освенцим（Аушвиц）”，但讀音亦非“奧斯維辛”，而是“奧斯文齊姆（奧許維茲）”。——譯注

[\*](#_133) 毀滅營或按照英文被翻譯成“滅絕營”（extermination camp）。納粹德國雖然也說“滅絕猶太人”（Ausrottung der Juden），但對集中營的分類則主要為讓人勞動至死的“勞動營”（Arbeitslager），與直接用毒氣殺害的“毀滅營”（Vernichtungslager）。——譯注

[\*](#_141) 黨衛隊上級集團領袖，位階相當于上將。——譯注

[\*](#_151) 摩西·珀爾曼是出生于英國的以色列作家和記者，以色列軍方的首任發言人，并曾為以色列情報部門尋找艾希曼。——譯注

[\*](#_157) 奧托·斯科爾策尼（1908-1975）或音譯為“斯科爾茲內”等，是奧地利裔的武裝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其在二戰期間最著名的事跡為率領特種部隊營救被囚禁的墨索里尼。他在戰后擔任阿根廷和埃及總統的顧問，甚至還跟以色列的“摩薩德”合作。——譯注

[\*](#_160) 蓋世太保在1943年2月27日逮捕了柏林市內剩余的8000多名猶太人，并將其中與“雅利安人”通婚者（約2000人）拘禁于柏林市玫瑰大街（Rosenstraße）的猶太社區中心大樓，以便運往集中營。那些人的“雅利安”妻子和親友立刻開始聚集在大樓前方，于2月底3月初演變成納粹德國最大規模的自發性示威抗議行動。最后納粹政府做出讓步，釋放了那一批猶太人。——譯注

[\*](#_168) 瓦倫貝里是拯救了許多匈牙利猶太人的瑞典外交官，他的名字亦音譯成“瓦倫貝格”（按德語發音）或“瓦倫堡”（按英語發音）。——譯注

[\*](#_183) 艾希曼在1944年4月下旬提議把100萬名猶太人賣給約埃爾·布蘭德，用于交換一萬輛卡車和英美貨物，接著在5月把布蘭德送往伊斯坦布爾進行斡旋，結果以失敗告終。消息于7月中旬泄露后，《泰晤士報》稱之為“戰爭中最令人厭惡的故事之一”，是一種“敲詐、欺騙和分裂盟軍”的企圖，以及“新的幻想和自我欺騙”。——譯注

[\*](#_193) 艾希曼的這句話相當怪異：他在威脅恫嚇的時候使用了敬稱“您們”（Sie），而非“你們”（Ihr）。——譯注

[\*](#_206) 黨衛隊三級突擊中隊長的官階相當于少尉。布雷斯勞原為德國下西里西亞省的首府，下西里西亞在戰后被割讓給波蘭，當地居民遭到驅離，布雷斯勞則被更名為弗羅茨瓦夫（Wrocław）。——譯注

[\*](#_213) 匈牙利姓名姓在前，名在后。——譯注

[\*](#_214) 維斯利策尼在證詞中稱，艾希曼曾告訴他共有400萬猶太人遇害，有時則稱是500萬。——編注

[\*](#_223) 弗賴斯萊本（Freiesleben）這個姓氏具有強烈的象征意義，在德文意為“自由的生活”（freies Leben）。——譯注

[\*](#_225) 霍特爾、卡爾滕布倫納二人都來自奧地利（艾希曼反而只是在奧地利長大的德國人）。卡爾滕布倫納和艾希曼早在中學時代就已經彼此熟識，他們二人甚至是希特勒在林茨市同一所中學的晚輩校友。——譯注

[\*](#_228) 希特勒的秘書馬丁·博爾曼往往被誤譯成“鮑曼”或“包曼”（Baumann）。——譯注

[\*](#_230) 克里斯蒂安·維爾特是黨衛隊二級突擊大隊長以及萊因哈德行動的要角之一，負責督導該行動所涉及的集中營。維爾特很適合作為替罪羊，因為他已經在1944年死了（被南斯拉夫游擊隊擊斃）。——譯注

[\*](#_232) 艾希曼從未晉升至黨衛隊旗隊長。——譯注

[\*](#_256) 南蒂羅爾亦音譯為南提洛，原屬奧地利（當地居民使用德語），一戰結束后被割讓給意大利。——譯注

[\*](#_271) 克恩滕是奧地利最南方的聯邦州，亦音譯為卡林西亞（Carinthia）或克恩頓。——譯注

[\*](#_273) 褐色是代表納粹的顏色，納粹恐怖因而也被稱為褐色恐怖（Brauner Terror）。——譯注

[\*](#_276) 泰爾梅諾的德語名稱為特拉敏（Tramin）。——譯注

[†](#_277) 里卡多的意大利文拼法是Riccardo，西班牙文的寫法（艾希曼在阿根廷登記的名字）則為Ricardo。——譯注

[\*](#_280) 德意志馬克（Deutsche Mark, DM）亦翻譯為德國馬克或聯邦德國馬克。之前的貨幣則為國家馬克（Reichsmark）。1871-1918年之間的“國家馬克”通常被翻譯為“帝國馬克”。——譯注

[\*](#_281) 100芬尼等于1馬克。——譯注

[\*](#_287) 這個系列標題的靈感來自莎士比亞的戲劇，以及作曲家奧托·尼古拉（Otto Nicolai）的喜歌劇《溫莎的風流娘兒們》（The Merry Wives of Windsr/ Die lustigen Weiber von Windsor）。——譯注

[\*](#_297) 蓋倫組織于1956年改組為德國聯邦情報局，其總部位于慕尼黑南郊的普拉赫，普拉赫因而曾成為德國聯邦情報局的代稱（其總部已在2014年遷往柏林）。——譯注

[\*](#_306) O.D.E.S.S.A.是“前黨衛隊成員組織”（Organisation der ehemaligen SS Angehörigen）的德文縮寫。——譯注

[\*](#_309) 圣拉斐爾協會是協助德國天主教徒移民國外的組織，成立于1871年，總部在漢堡。——譯注

[\*](#_311) 施泰青是德語名稱，意大利名稱為維皮泰諾（Vipiteno）——編注

[\*](#_314) 納粹黨衛隊的座右銘是：“吾之榮譽即忠誠。”（Meine Ehre heißt Treue）——譯注

[[1]](#_1_2) Meine Flucht, 22. 1961年3月寫于以色列。Barch Koblenz AllProz 6/247.

[[2]](#_2_3) 最新和最值得注意的例子是Klaus W. Tofahrn, Das Dritte Reich und der Holocaust.Frankfurt a. M. 2008。該書在很多方面存在問題的4.22章《論艾希曼接受審判一事》中寫道：“艾希曼尤其靠他的不引人注目和不可見給世界公眾留下印象。艾希曼在戰前是一個不見其人的黨衛隊保安局官員，在戰時是一個不見其人的黨衛隊軍官，在戰后則是一個藏匿無蹤的納粹黨人，直到審判開始之前還是一個不見其人的以色列囚犯”（第359頁）。

[[3]](#_3_2) 艾希曼的一手知識反而能夠在這方面派上用場，因為人們直到1960-1961年仍然對保安局所知十分有限。其實當艾希曼在1934年申請進入保安局的時候，這個單位已經過了草創階段，除海德里希之外另有86名官員（根據1934年10月1日的黨衛隊編制表所計算出的人數）。

[[4]](#_4_3) 弗朗茨·邁爾（Franz Mayer）于艾希曼審判案第17次開庭時的證詞（Eichmann-Prozess,Session 17）。

[[5]](#_5_3) 薩森抄本24, 2（引用格式為：原始錄音帶編號，謄寫稿頁碼）。

[[6]](#_6_3) 在1937年12月18日的部門主管會議上，赫伯特·哈根詳細列舉了艾希曼在紀律和組織上的各種不足，并勒令他限期改善。見起訴文件T/108。

[[7]](#_7_3) 馬庫斯表示自己第一次和艾希曼見面是在1936年11月。不過他所描述的相遇，只能發生在1937年11月，隨即艾希曼做出了他所描述的行為。所以馬庫斯若非記錯了他們第一次見面的原因，就是記錯了見面的時間。或許馬庫斯在1937年11月之前已經見過艾希曼，所以他的日期是正確的，只是把見面的原因搞混了。Ernst Marcus, Das deutsche Auswärtige Amt und die Palästinafrage in den Jahren 1933-1939.Yad Vashem Archive O-1/11,1946.英譯版見Yad Washem Studies 2, 1958, 179-204，德文版見Kurt Jacob Ball-Kaduri,Vor der Katastrophe. Juden in Deutschland 1934-1939. Tel Aviv 1967, 69-72。

[[8]](#_8_2) 監視的照片已在艾希曼出庭受審時對外公開，相關檔案資料卻迄今仍未解密。

[[9]](#_9_2) 約阿希姆·普林茨移民美國前，在1937年6月26日受到盛大歡送。見Benno Cohn,Frankfurter Rundschau, June 1, 1960；以及艾希曼審判案第15次開庭的資料。艾希曼自己曾在1937年11月1日的演講中提到了那個事件（作為第16號文件收錄于Michael Wildt,Die Judenpolitik des SD 1935-1938. Eine Dokumentation. München 1995, 123f.）。到阿根廷之后，艾希曼依然為自己的行為做出辯護（《其他人都講過了，現在我想說話！》，見下）。

[[10]](#_10_3) 奧托·馮·博爾施溫竊聽恩斯特·馬庫斯和恩斯特·戈特利布（Ernst Gottlieb）關于艾希曼的對話以后，向艾希曼告發了二人。艾希曼對此的反應體現在告發信上的手寫評語中。Günter Schubert, “Post für Eichmann”, in Wolfgang Benz [Hrsg.], Jahrbuch für Antisemitismusforschung, 15, 2006, 383-393, Faksimile 392-393.

[[11]](#_11_1) 關于保安局的發展經過及其猶太事務部門工作人員的自我形象，可參見Michael Wildt,Die Judenpolitik des SD之引言部分。

[[12]](#_12_1) 艾希曼在奧托·馮·博爾施溫信函上的手寫評論，見Günter Schubert, “Post für Eichmann”。

[[13]](#_13_1) “II 112部門”的工作報告，特別是1937年2月17日的報告（起訴文件T/107）。

[[14]](#_14_1) 猶太人的少數民族地位于1937年5月15日被廢除。之后，艾希曼在5月22日前往布雷斯勞，監督反猶太措施及反猶太法案的執行。他在那里首度實地獲得了給猶太人登記和建立卡片檔案的經驗。參見黨衛隊保安局II 112部門1937年7月6日至10月5日的工作報告（SD-Hauptamt, II 112, BArch R58/991）, Dazu Wildt, Einleitung zu Die Judenpolitik des SD, A.o., 13-64, 34f.; David Cesarani, Eichmann: Bürokrat und Massenmörder. Berlin 2004, 76.

[[15]](#_15_1) 艾希曼的聯系人是《沖鋒報》在柏林的編輯保羅·武爾姆。艾希曼在請示上級之后（1937年8月3日），接受了武爾姆的邀請（9月2日），因為他們希望如此就能夠避開省黨部領導施特萊徹，直接獲得《沖鋒報》的檔案（BArch R58/565, Vermerk Il-1 Six）。艾希曼在1937年9月5日至9日參加了黨大會之后，會見了尤利烏斯·施特萊徹和一批甚至讓他都大吃一驚的美國反猶太主義者。見起訴文件T/121，黨衛隊II 112部門一級小隊長艾希曼1937年9月11日的報告（與BArch R 58/623相同）。Magnus Brechtken, “Madagaskar für die Juden”:Antisemitische Idee und politische Praxis 1885-1945. München, 1997, 72ff.

[[16]](#_16_1) 薩森抄本62, 1。

[[17]](#_17_1) 此次會面的時間迄今無法確定，我們只能把時間范圍縮小到1938年3月15日至25日之間。關于這個事件存在許多不同說法。阿道夫·伯姆緊接著神經崩潰，必須住進一家精神病院的隔離病房。Doron Rabinovici, Instanzen der Ohnmacht: Wien 1938-1945: Der Weg zum Judenrat. Frankfurt am Main, 2000, 70ff.

[[18]](#_18_1) 1977年3月22日赫伯特·羅森克蘭茨在耶路撒冷訪問葉胡達·布羅特博士（Dr. Jehuda Brott），談論“維也納‘青年阿利亞’咨詢中心”（Beratungsstelle der Jugendalijah Wien）的相關事宜。Yad Vashem o-3/3912. Herbert Rosenkranz, Verfolgung und Selbstbehauptung: Die Juden in Österreich, 1938-1945. München, 1978, 109f.

[[19]](#_19_1) 艾希曼在1939年12月14日成為特別全權代表，負責處理“東方邊區”猶太宗教社區的財產。ÖStA AdR Bürckel-Materie, 1762/1, 31: Anordnung des Reichskommissars für die Wiedervereinigung Österreichs mit dem Deutschen Reich, gez. Bürckel, 14.12.1939.引自Rosenkranz, Verfolgung und Selbstbehauptung, A.o., 221, 334.

[[20]](#_20_1) Thomas Mang, “Gestapo-Leitstelle Wien—Mein Name ist Huber”: Wer trug die lokale Verantwortung für den Mord an den Juden Wiens? Münster, 2004.該書雖然有些片面，但其著眼于蓋世太保所扮演角色的觀點令人印象深刻。

[[21]](#_21_1) 艾希曼1938年5月8日寫給赫伯特·哈根的信函，起訴文件T/130（與BArch R58/982,folio. 19ff.等同）。該報社的確在1938年5月20日至11月9日之間短暫存在過（由Emil Reich擔任總編輯），總共發刊25次。新聞審查者的直接影響顯而易見。

[[22]](#_22_1) 馬丁·羅森布盧特在倫敦與格奧爾格·蘭道爾的信件往來，引自Otto Dov Kulka, Deutsches Judentum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Bd. 1,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Reichsvertretung der deutschen Juden 1933-1939. Tübingen 1997, 381。此外亦見Leo Lauterbach，“The Jewish Situation in Austria.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Zionist Organization,” strictly confidential, April 19, 1938，引自Rosenkranz, Verfolgung und Selbstbehauptung, A. O.275ff.; Israel Cohen, “Report on Vienna”, Prague, March 28, 1938, ebd. 51ff.

[[23]](#_23_1) Israel Cohen, “Report on Vienna”.

[[24]](#_24) 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Eine Biographie. München 2010, 23.

[[25]](#_25) 本—古里安1939年11月30日的日記，BGA，見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Eine Biographie, 24 n511。

[[26]](#_26_1) 1938年11月11日的臨時指示，以及1938年11月12日的會議。起訴文件T/114，與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記錄IMT 1816-PS相同（見vol. 28, p. 499）。

[[27]](#_27) 參與制定《紐倫堡法案》的內政部官員伯恩哈德·勒澤納（Bernhard Lösener）承認自己曾經前往參觀，即便他在后來的報告中歪曲了自己的角色（Manuskript v. 26.6.1950,agedr. i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1961, 264-313, hier 292）。此外另有資料可證明海德里希以及財政部與宣傳部的人員亦前往參訪。

[[28]](#_28) 薩森抄本32, 8。

[[29]](#_29) 薩森抄本4, 3和60, 2等等。

[[30]](#_30) 薩森抄本32, 8。

[[31]](#_31) 黨衛隊集團領袖漢斯·欣克爾曾借此機會向艾希曼題贈了自己撰寫的《十萬人之一》（Einer unter 100 000）。艾希曼曾在薩森面前以及在《我的回憶錄》中驕傲地提及此事。

[[32]](#_32) 在此提及的兩座強制勞動營，分別是伊布斯河畔魏德霍芬附近的“桑德霍夫莊園”（Gut Sandhof bei Waidhofen a. d. Ybbs）以及林茨附近米爾塔爾山谷的“多普爾”（Doppl im Mühltal bei Linz）勞動營。二者以“猶太人手工藝及農藝職業強制訓練營”的名義，在1939年5月至1941年12月期間運行，工作人員來自維也納的中央辦公室。關于這項長期遭到忽視的反猶太人措施，可參考Gabriele Anderl具有開創性的研究，Die “Umschulungslager“ Doppl und Sandhof der Wiener 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 www.david.juden.at/kulturzeitschrift/57-60/58-Anderl.htm (2003)。

[[33]](#_33) 艾希曼被懷疑在向之前的地主購買房產時支付了過高的價錢，而那位地主恰巧是他的情婦。參見Gabriele Anderl, Die “Umschulungslager“ Doppl und Sandhof der Wiener 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 A. o.,以及本書第三章第三節。

[[34]](#_34) 薩森抄本，未編號磁帶的第2頁，此外另見54, 12。

[[35]](#_35) 此事的詳盡細節可參考Gabriele Anderl, Dirk Rupnow, Die 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 als Beraubungsinstitution. Wien 2004; Theodor Venus, Alexandra-Eileen Wenck, Die Entziehung jüdischen Vermögens im Rahmen der Aktion Gildemeester. Wien,München 2004.

[[36]](#_36_1) Wiener Völkischer Beobachter, 20.11.1938 (Sonntagsausgabe mit Fotos).

[[37]](#_37) Pester Loyd, 11.2.1939 (Artikel von Ladislaus Benes).

[[38]](#_38) 本諾·科恩在德國錫安主義團體的會議上報告，德國猶太人代表于1939年春被傳喚至蓋世太保（艾希曼）面前。1958年4月2日由巴爾—卡都里博士（Dr. Ball-Kaduri）記錄，Kurt Ball-Kaduri, Vor der Katastrophe. Juden in Deutschland 1934-1939. Tel Aviv 1967,235-239。亦參見Doron Rabinovici, Instanzen der Ohnmacht. Wien 1938-1945. Der Weg zum Judenrat. Frankfurt a.M. 2000, 151f.，但該書錯誤地引用了Yad Vashem no. 227（1940年與埃里希·弗蘭克的會談記錄）。如第14次開庭時的證詞所示，本諾·科恩已在1939年3月底移民出去。

[[39]](#_39) 艾希曼曾多次如此表示。見薩森抄本2, 4和6, 1。

[[40]](#_40) 《巴黎每日新聞報》是《巴黎日報》的后繼者，這解釋了為何相關人士在回憶時往往會把二者混淆。該報從一開始就以德文發行，而非某些人所稱的意第緒語。

[[41]](#_41) BArch ZA I, 7358, A.1, 1: 15.5(6!) , 1937.內容涉及黨衛隊一級小隊長艾希曼與二級小隊長哈根之間的一次討論。Theodor Venus, Alexandra-Eileen Wenck, Die Entziehung jüdischen Vermögens ..., A.o., 48ff.海因里希·施利1939年3月5日呈遞給艾希曼和利施卡的報告參見：Yad Vashem Archive O-51/0S0-41. Zit b. Avraham Altman and Irene Eber, “Flight to Shanghai, 1938-1940: The Larger Setting,” Yad Vashem Studies 28 (2000), 58-86, hier 59.

[[42]](#_42) 艾希曼在布達佩斯與猶太人委員會首次會面時所說的話。艾希曼曾向薩森承認，自己“同時帶著幽默和諷刺的口吻”講過那樣的話。薩森抄本72, 6。

[[43]](#_43_1) 安東·布倫納1945年10月3日所說。安東·布倫納是維也納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的文職人員（1946年在維也納被處決），與阿洛伊斯·布倫納沒有親戚關系。DÖW, Wien,Dok.19 061/2. See Hans Safrian, Eichmann und seine Gehilfen. Frankfurt a.M., 1995.

[[44]](#_44_1) 約瑟夫·魏斯爾寫給妻子保利娜（Pauline）的信，日期及地點不詳（多普爾）。見維也納地方刑事法院對約瑟夫·魏斯爾的審判，LG St Wien, Vg 7c Vr 658 / 46, Ord. Nr. 56,Bl. 2567 f. Zit bei Gabriele Anderl, Die “Umschulungslager”..., A. o.

[[45]](#_45) Zeugenaussage in Der Mördervater, Dokumentation von James Moll. USA 2006, Bayerischer Rundfunk 2006.

[[46]](#_46) 薩森抄本40, 1和32, 8。

[[47]](#_47) 薩森抄本72, 16：“遇見重要猶太人的時候，我有好幾次問他們：‘你們知道自己在哪里嗎？你們正在猶太人沙皇身邊。你們不知道此事？難道你們沒有讀過《巴黎日報》嗎？！’”

[[48]](#_48) 艾希曼出庭受審的時候，本諾·科恩再次重組了自己對此的記憶：“他對我們在報紙上發表一些關于他的事情感到很不高興。他向我們宣讀了這篇文章的摘要……例如他是‘嗜血獵犬艾希曼’（Bluthund Eichmann，我說的是當時的原話）、有著‘布滿血絲的眼睛’（blutunterlaufene Augen）、‘一個新的敵人’（ein neuer Feind）、‘猶太人的敵人’（Judenfeind）。我已經記不得所有的表達方式，但它們都非常尖銳。”（第15次開庭的證詞）。

[[49]](#_49) 本諾·科恩在艾希曼審判案第14-15次開庭時的證詞。

[[50]](#_50) 薩森抄本13, 5。

[[51]](#_51) 薩森抄本6, 1。

[[52]](#_52) 對“II 112部門”來說，與《沖鋒報》編輯部的公務往來已無意義可言，于是艾希曼顯然停止了雙方之間的接觸，更何況他跟《沖鋒報》在反猶太“啟蒙工作”的策略及觀點上還產生了歧見。結果武爾姆聯系了外交部的弗朗茨·拉德馬赫，并積極參與外交部所稱的“馬達加斯加計劃”。Magnus Brechtken, Madagaskar für die Juden ..., A. o., 72f.

[[53]](#_53) 薩森抄本6, 1。

[[54]](#_54) 弗朗茨·諾瓦克在艾希曼審判中的證詞（1961年4月3日至5日）：艾希曼“在猶太人中間給自己打出了名氣”。諾瓦克將此歸因于艾希曼與猶太人組織的負責人之間的接觸。

[[55]](#_55) 迄今沒有人設法還原那套剪報的原因有很多，諸如“躲在黑暗中的人”這種形象的吸引力、對艾希曼的吹噓所產生的合理懷疑（如果在此情況下它們被注意到的話），當然還包括報刊研究的根本問題。在此我檢索了下列德語版的流亡者報紙，時間從1938年直到它們停止發行為止：《建設》（紐約）、《巴黎每日新聞報》（巴黎）、《報紙》（倫敦）。《建設》雖然有關鍵字和姓名的卡片索引，但內容不夠完整并且存在錯誤，因而在查證時必須發揮創意。其他所有報紙則只能從頭瀏覽到尾。除了官方出版物上的內部信息之外，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在包括《人民觀察家報》（柏林版與維也納版）、《帝國周報》（Das Reich）、《攻擊報》與《黑色軍團》（Das Schwarze Korps）在內的任何納粹政權的報刊上發現艾希曼的名字。

[[56]](#_56_1) 薩森抄本6, 1。

[[57]](#_57_1) 阿洛伊斯·埃利亞什將軍（General Alois Eliáš）委派政府部門的一位處長法豪恩博士“針對設置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一事進行磋商。黨衛隊區隊領袖施塔勒克與黨衛隊高級突擊隊領袖艾希曼，之前曾親自向他說明相關事宜”。參見Státní ustŕední archiv Praha, PMR, Karton 4018. Zitiert bei Jaroslava Milotová, “Die 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 in Prag. Genesis und Tätigkeit bis zum Anfang des Jahres 1940”, in:Theresienstädter Studien und Dokumente, 1997, 7-30, 2f.

[[58]](#_58_1) 1939年7月19日在佩切克宮（Petschek-Palais）的會議記錄，SÚA, PMR, Karton 4018。1939年7月19日占領當局與保護領地行政當局“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的協商備忘錄，見SÚA, PP, Sign. 7/33/39, Karton 1903。Zitiert bei Jaroslava Milotová. A. o.

[[59]](#_59) 布拉格猶太宗教社群秘書長弗蘭蒂澤克·魏德曼已在官方代表團之前，于1939年7月20日奉命“按照黨衛隊一級突擊中隊長艾希曼先生的指示”前往維也納參觀考察。同時還有一名維也納猶太宗教社群的代表被派往布拉格接受“訓練”。起訴文件T/162：布拉格猶太宗教社群1939年7月23-29日的周報。

[[60]](#_60) 全文參見Stanislav Kokoska, “Zwei unbekannte Berichte aus dem besetzten Prag über die Lage der jüdischen Bevölkerung im Protektorat,” Theresienstädter Studien und Dokumente,31-49。

[[61]](#_61_1) 起訴文件T/526：1941年9月19日，施蒂勒（Stiller）從海牙發函給派駐荷蘭的國家專員，說明他在9月16日與內政部官員伯恩哈德·勒澤納會談的情形。艾希曼的“成就”所帶來的聲譽顯然相當持久，因為“移民中心”在1941年的時候已因為戰爭而失去實質意義，負責人也已不再是艾希曼本人，盡管他在柏林的猶太事務部門依然有權實行督導。

[[62]](#_62) 薩森抄本51, 7。

[[63]](#_63) 這樣的一篇文章出現在1939年10月26日《巴黎每日新聞報》的頭版：“根據《立陶宛回聲報》（Lietuvos Aidas）的報道，其初步構想是在盧布林省建立一個‘猶太國家’。但是該計劃并不完全符合希特勒所想要的對猶太人問題的全面‘解決方案’。希特勒上一次向國會發表演說時所宣布的‘和平綱領’當中，包含了猶太人問題的相關規定。其著眼點在于將全體猶太人從整個歐洲清除出去，把他們移居到海外的封閉地區。”——《立陶宛回聲報》的消息來源為柏林政府圈的人士。

[[64]](#_64) “Die Verschickung nach Lublin”, Pariser Tageszeitung, 18.11.1939, S.2.該文反映出人們對于當時情形及納粹黨人目標的不確定。

[[65]](#_65) 維也納猶太宗教社群的約瑟夫·勒文赫斯（Josef Löwenherz）在1939年10月10日從艾希曼的副手羅爾夫·金特那里接獲指令，維也納猶太人必須到摩拉維亞的俄斯特拉發向艾希曼報到，并做好停留三到四個星期的準備。起訴文件T/148：1939年10月10日勒文赫斯在維也納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與黨衛隊二級突擊中隊長金特先生會面的備忘錄。（T/153有相同的副本）。

[[66]](#_66) 若比較“艾希曼”（EICHMANN）和“愛爾曼”（EHRMANN）的手寫大寫字母，便不難理解為何二者區分不易。

[[67]](#_67) 漢斯·金特（Hans Günther）在1939年10月19日記錄了“在摩拉維亞的俄斯特拉發到處流傳的謠言”和各種示威游行活動，強調他們做出了極大努力，才借由安撫行動避免了動亂爆發。Vermerk Günther, “In Mähr.-Ostrau umlaufende Gerüchte“, vom 23.10.1939, SÚA, 100-653-1. Zitiert bei Miroslav Kárný, “Nisko in der Geschichte der Endlösung”, in Judaica Bohemiae XXIII, Prag 1987, 69-84.81.

[[68]](#_68) 起訴文件T/162：布拉格猶太宗教社群周報報道了1939年11月10-16日的報告。

[[69]](#_69) 薩森抄本68, 6。

[[70]](#_70) 為了保護最后不得不返回布拉格的埃德爾施泰因，文中沒有寫出消息提供者的姓名。該文僅僅聲稱，被遣送者當中有一人越過邊境脫逃到俄國，帶來了這些資料。這顯示出埃德爾施泰因和其他觀察者的消息相當正確：納粹黨人眼見在尼斯科的行動即將失敗，干脆把一群群的被遣送者驅趕到鄰近的俄國邊境，并且不忘在他們的背后開槍。撰寫該文的通訊記者（同樣沒有具名）是劉易斯·B.內米爾（Lewis B. Namier [BersteinNamierowski]）。那篇專文的完整內容可參見：Livia Rothkirchen, “Zur ersten authentischen Nachricht über den Beginn der Vernichtung der europäischen Juden”, in: Theresienstädter Studien und Dokumente, 2002, 338-40。該期還刊登了一小段原文的復印本。See also Margalit Shlaim, “Jakob Edelsteins Bemühungen um die Rettung der Juden aus dem Protektorat Böhmen und Mähren von Mai 1939 bis Dezember 1939: Eine Korrespondenzanalyse,”Theresienstädter Studien und Dokumente, 2003, 71-94.

[[71]](#_71) 薩森抄本57, 4。

[[72]](#_72_1) 艾希曼審判，第27次開庭。

[[73]](#_73_1) 克里斯托夫·霍夫曼（Christoph Hoffmann）于1871年建立了這個殖民地，之前他曾在土耳其有過一個詭異的定居點計劃，但沒有成功。薩羅納并非巴勒斯坦唯一的圣殿騎士聚落，可是表現得特別頑強。英國人最后在1943年將巴勒斯坦的德國圣殿騎士成員悉數驅逐出境。米爾登施泰因在兩份旅行報告中描述了他浪漫而理想化的印象：LIM（米爾登施泰因的化名）, “ Ein Nazi fährt nach Palästina”, Artikelserie in Der Angriff, 26.99.10.1934 (Buchausgabe: Rings um das brennende Land am Jordan, Berlin 1938); Leopold von Mildenstein, Naher Osten - vom Straßenrand erlebt. Stuttgart 1941, 114f.

[[74]](#_74) 例如阿道夫·伯姆主編的德文版《巴勒斯坦建設雜志》（Palästina. Zeitschrift für den Aufbau Palästina）在1934年8月號和1937年12月號都談到薩羅納。此外德皇威廉二世曾在1898年前往巴勒斯坦旅行時造訪該聚落，從而鞏固了它在殖民地文學上的地位。

[[75]](#_75) 海因里希·格呂貝爾在艾希曼審判案第41次開庭時的證詞。關于他對艾希曼的印象，參見Heinrich Grüber, Zeuge pro Israel. Berlin 1963。

[[76]](#_76) 阿道夫/多爾菲［·丹尼爾］·布倫納（Adolf/Dolfi [Daniel] Brunner），1938年“馬卡比聯合會”的青年組織領導人，還記得許多這樣的對話（磁帶錄音，Dr. Daniel Adolf Brunner über den “Makkabi Hazair Wien”, Jaffa, 1977, Yad Vashem Archive O-3/3914）。Zit b. Herbert Rosenkranz, Verfolgung und Selbstbehauptung ..., A. o., 111.

[[77]](#_77) 穆爾默斯坦如此告訴了西蒙·維森塔爾。參見維森塔爾1954年3月30日寫給納胡姆·戈爾德曼的信函，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

[[78]](#_78) Wisliceny, 22-seitige Handschrift “Bericht betr. Obersturmbannführer Adolf Eichmann”,Bratislava 27.10.1946.此即起訴文件T/84，所謂的“133號牢房文件”（Cell 133Dokument），第5頁：“艾希曼在1938年年底、1939年年初跟維也納猶太人打交道的時候，想用自己關于巴勒斯坦和猶太人問題的知識以及語言能力給他們留下印象，并且暗示他出身海法附近薩羅納一個屬于‘圣殿騎士教派’的德國家庭，所以‘誰也騙不了他’。從那時起，這個謠言就已經傳遍了猶太人的圈子，而艾希曼一直引以為樂。”但必須注意的是，維斯利策尼的這個講法套用了艾希曼的說辭，因為事發當時他跟艾希曼并沒有什么接觸，二人是從1940年夏末才變得關系熱絡起來的。除此之外，維斯利策尼并沒有什么說實話的嗜好，在涉及艾希曼的時候，往往更是看不見實話的影子。

[[79]](#_79) 夏洛特·扎爾茨貝格爾在艾希曼審判案第42次開庭時的證詞。

[[80]](#_80) Jüdisches Gemeindeblatt für die Britische Zone, “Der Mann den wir suchen”, 6.1.1947.Simon Wiesenthal, Großmufti—Großagent der Achse, Salzburg, Wien 1947, 46. 1952年的時候，這個謠言仍然在特拉維夫流傳。

[[81]](#_81) 維斯利策尼（133號牢房文件［起訴文件T/84］，第3頁）表示艾希曼從1935年開始對希伯來語感興趣，而且顯然完全復述了艾希曼自己當時的說法：“由于有很多空閑時間，他開始學習以希伯來語為主的一些古代語言，起因是他負責保管的猶太法器和錢幣。他通過自學掌握了相關知識。他具備良好的希伯來語閱讀能力和說得過去的翻譯能力。他能夠流利地閱讀和翻譯意第緒語，但無法流利地說希伯來語。”維斯利策尼還說，米爾登施泰因曾在巴勒斯坦“待過許多年”，這助長了他浮夸自大的傾向并導致維斯利策尼疏遠米爾登施泰因（以及艾希曼）。

[[82]](#_82) 由于早年在黨衛隊保安局的職務，艾希曼在阿根廷和以色列給出的日期引發了一些疑問。那也可能是一種謊稱。

[[83]](#_83) 第二次申請書中提到了第一次的申請。那位愿意效勞的老師是弗里茨·阿爾特（Fritz Arlt）。SD OA Südost am 3.7.1936. Barch Koblenz R58/991. Götz Aly, Karl Heinz Roth,Die restlose Erfassung. Volkszählen, Identifizieren, Aussondern im Nationalsozialismus.Frankfurt a.M. 2000，以及Hans-Christian Harten, Uwe Neirich, Matthias Schwerendt,Rassenhygiene als Erziehungsideologie des Dritten Reichs. Bio-bibliographisches Handbuch.Berlin 2006, 238-242.

[[84]](#_84) 艾希曼在1937年6月18日第二次提出申請，起訴文件T/55（11）；另一份更好的副本是起訴文件T/55（14），Dok. 13., Vermerk: Betr. Übersetzungen neu-hebräisch-deutsch.R.M.W. Kempner, Eichmann und Komplizen, Zürich, Stuttgart, Wien 1991, 39.這份申請書中提到了1936年六七月間提出的第一次申請。

[[85]](#_85) 該書可在一些德國圖書館找到，例如漢堡國家與大學圖書館（Staats-und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Hamburg, A1949/7278, Ausgabe 5. Auflage 1936）。至于艾希曼之所以在接受薩森訪談時還記得作者姓名和那個相當奇特的書名，可能有幾個原因：掃羅·卡萊科直到1938年都在柏林教授希伯來文（Yad Vashem Archive 01-132: Saul Kaléko [Barkali Shaul], Teaching Hebrew in Berlin, 1933-1938, Aufzeichnung 1957），而且《猶太環視報》（Jüdische Rundschau）曾經打廣告宣傳他那本書，并且印出了課程精選。

[[86]](#_86) 西蒙·維森塔爾在1954年3月30日寫給納胡姆·戈爾德曼的信中談到此事。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維森塔爾的消息來源是本亞明·穆爾默斯坦。

[[87]](#_87) 多爾菲·布倫納（曾經多次在維也納與艾希曼會面的“馬卡比聯合會”負責人）和布達佩斯猶太人委員會的艾爾諾·蒙卡奇斯（Ernö Munkácsis）十分確定，艾希曼只不過是賣弄一些短句罷了。磁帶錄音，Dr. Daniel Adolf Brunner über den “Makkabi Hazair Wien”, Jaffa, 1977, Yad Vashem Archive O-3/3914。Zit bei Herbert Rosenkraz, Verfolgung und Selbstbehauptung ..., A. o.; Aussage von Dr. Ernö Munkácsis (Judenrat Budapest),abgedruckt bei Jenö Levai, Eichmann in Ungam. Dokumente. Budapest 1961, 211.

[[88]](#_88) 薩森抄本2, 4。

[[89]](#_89) Otto Bokisch, Gustav Zirbs, Der Österreichische Legionär. Aus Erinnerungen und Archiv,aus Tagebüchern und Blättern. Wien 1940, 37.

[[90]](#_90) 薩森抄本22, 14。

[[91]](#_91) 維爾納·貝斯特在1946年6月28日的宣誓證詞中談到了“艾希曼辦事處”：“希姆萊把他自己在艾希曼辦事處的承辦人——金特——從柏林叫了過來。”（Dokument des Nürnberger Kriegsverbrecherprozesses IMT 41,166 [Ribbentrop-320].）亦參見Thadden (AA) in IMT 2605-PS。

[[92]](#_92) 魯道夫·米爾德納1946年4月11日的宣誓證詞，IMT vol. 11, p. 284。

[[93]](#_93) 薩森抄本14, 2。

[[94]](#_94_1) 斯特拉斯堡大學的奧古斯特·希爾特教授想要建立那個骨骼收藏，并通過“祖先遺產”協會（Ahnenerbe）的沃爾弗拉姆·西弗斯（曾在1941年的一項“雅利安化措施”中得到艾希曼的協助）說服艾希曼與黨衛隊“經濟與管理部”（WVHA）一同組織這個不人道的項目。起訴文件T/1363-1370。骨骼收藏的構想產生自1942年2月。艾希曼在1942年11月向希姆萊提出申請并獲得正式批準。

[[95]](#_95) 外交部的弗朗茨·拉德馬赫重拾舊日的馬達加斯加構想，并與保羅·武爾姆合作。直到海德里希開始擔心自己對猶太人政策的影響力之后，艾希曼的部門才被指派介入，委由特奧多爾·丹內克爾和埃里克·拉亞科維奇負責相關工作。然而所有參與者后來卻都講述了相反的版本。這個例子最有力地說明了，即使各方證人的陳述相互印證，也未必就是事情的真相。可參見：馬格努斯·布雷希特肯（Brechtken, Magnus）1998年和2000年令人印象深刻的兩部著作。

[[96]](#_96_1) 起訴文件T/526：施蒂勒給帝國在荷蘭的國家專員的信函（海牙，1941年9月19日）。他在信中說明了當天與內政部的伯恩哈德·勒澤納會談的情形。

[[97]](#_97_1) 德國方面雖曾試圖保密遣送上千名猶太人至波蘭總督轄區的行動，但相關消息還是傳到了世界各地。（起訴文件T/667，1940年2月15日記者招待會的德方人員內部參考資料：有關遣送上千名猶太人至波蘭總督轄區的消息是正確的，但“必須保密處理”；與IMT NG-4698相同。）《新蘇黎世報》（Neue Zürcher Zeitung）駐柏林通訊記者于1940年2月15日報道了相關細節，接著丹麥哥本哈根的《政治日報》（Politiken）在2月17日針對斯德丁的不人道驅離行動發出警訊：“德國遣送本國國民。老人和嬰兒被遣送出城——前往烏有之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線戰士也不例外。”許多人死亡，甚至連羅斯福總統都要求獲得一份報告。德國方面密切監視隨即出現的新聞報道并進行翻譯。（起訴文件T/666：替帝國保安總局準備的丹麥新聞稿德文譯本。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記錄IMT NG-1530：Deutsches Nachrichtenbüro Bern an des AA mit der Schweizer Presse,16.2.1940。）

[[98]](#_98) 埃弗拉伊姆（埃里希）·弗蘭克（Ephraim [Erich] Frank）的報告，主題為“1940年3月會見柏林蓋世太保（艾希曼）的柏林、維也納、布拉格猶太聯合組織代表”。1958年6月23日在德國錫安主義者會議上發表，由巴爾—卡都里博士記錄（Yad Vashem Archive O-1/227）。作為Dokument II（但使用了錯誤的記錄標題和日期）收錄于Kurt Jacob Ball-Kaduri, “Illegale Judenauswanderung aus Deutschland nach Palästina 1939/40: Planung,Durchführung und internationale Zusammenhange,” Jahrbuch des Instituts für deutsche Geschichte 4, 1975, 387-421。關于1940年3月27日和30日的會談，另有許多出席者的報告可供參考，例如同樣記錯了日期的Löwenherz-Bienenfeld Report（起訴文件T/154）。

[[99]](#_99) 薩森抄本2, 4和6, 1。

[[100]](#_100) 往來信件展覽：AGK, EWZ/L/838/1/2. BArch R 69/554. Dazu Götz Aly, “Endlösung”:Völkerverschiebung und der Mord an den europäischen Juden. Frankfurt a.M. 1995, 250.許多展品以照片的形式保存了下來。

[[101]](#_101) 《報紙》引述相同的消息來源，在10月28日報道：“10月21日展開了第三波運輸行動，將大約800名猶太人從格魯納瓦爾德鐵路貨運站（Güterbahnhof Grunewald）遣送至東部地區。位于選侯大街的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于同一日遭到關閉，但并未說明任何理由。”

[[102]](#_102_1) 艾希曼曾在薩森面前對此大開玩笑，表示曾經有人誤以為他是一位將軍。在以色列的時候，他卻稱之為“惡意的夸大其詞”。

[[103]](#_103) Peter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Eine Gesamtdarstel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nichtung. Zürich, München 1998, 282.

[[104]](#_104_1) 納粹黨全國宣傳總部（Reichspropagandaleitung Hauptamt Reichsring）1941年3月20日的會議記錄，整理于1941年3月21日。H. G. Adler, Der verwaltete Mensch: Studien zur Deportation der Juden aus Deutschland. Tübingen 1974, 152-153.

[[105]](#_105) Aufbau, 24.10.1941, “Die Austreibungen im Reich”.茲維·羅森在霍克海默檔案館找到了這篇文章。Zvi Rosen, Max Horkheimer. München 1995, 40.

[[106]](#_106)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Im Auftrag des Instituts für Zeitgeschichte und mit Unterstützung des Staatlichen Archivdienstes Rußland hrsg. von Elke Fröhlich. Teil II, Bd. 2.München u. a. 1996, 194.

[[107]](#_107) 根據記錄，1941年從柏林遣送猶太人出去的行動分別發生在10月18日、10月24日、11月1日、11月14日、11月17日，以及11月27日。

[[108]](#_108) 薩森抄本1, 4：“現在我無法準確記得，究竟是我還是米勒創造了它。”

[[109]](#_109) 維斯利策尼，133號牢房文件（起訴文件T/84）：“有了它以后（戈林在1941年7月31日委派海德里希‘全權解決猶太人問題’，海德里希于是將委派令積極運用于合法化“萬湖會議”之類的決議），艾希曼在猶太人問題方面的權力地位急劇上升。他能夠根據戈林的委派令……徑自排除其他部委和機關的一切異議與影響。”盡管這是維斯利策尼在自我辯解時講述的版本，但仍不難聽出艾希曼典型的口氣，很像艾希曼在薩森面前解釋為何“萬湖會議”對他個人來說是一個轉折點時的說法。甚至在以色列也可以聽到這種語氣，當時艾希曼在試圖解釋“萬湖會議”給他新發現的良心減輕了負擔。

[[110]](#_110) 薩森抄本17, 8。

[[111]](#_111) 《報紙》（倫敦）的標題故事，1942年3月6日。

[[112]](#_112) 從1942年五六月份開始，《紐約時報》、《每日電訊報》（1942年6月25日）、BBC（1942年6月30日）都報道了用毒氣進行的大規模屠殺。收集犯案者姓名構想的最先提出，見倫敦《泰晤士報》（1942年3月10日）。

[[113]](#_113_1) 19. Juni 1942, Die Zeitung, London.進行惡意宣傳的“蘇維埃天堂”展覽遭到鮑姆反抗小組的攻擊破壞之后，出現了大規模的逮捕和處決行動。艾希曼向猶太人組織的代表宣布將采取報復措施，并組織了將人犯運送到薩克森州豪森集中營的行動。官方文件證實了艾希曼在阿根廷的自我陳述（薩森抄本69, 1f），例如起訴文件T/899：Aktennotiz über die Vorsprache beim RSHA, IV B4, am Freitag, d. 29. Mai 1942 (Josef Löwenherz).Wolfgang Scheffler, »Der Brandanschlag im Berliner Lustgarten im Mai 1942 und seine Folgen. Eine quellenkritische Betrachtung«, in: Berli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Jahrbuch des Landesarchivs Berlin, 1984, 91-118.

[[114]](#_114) Newsweek, 10.8.1942.

[[115]](#_115) 艾希曼決定“兒童轉移可以開始滾動”。起訴文件T/439（內容與IMT RF-1233相同）：丹內克爾1942年7月20日與艾希曼和諾瓦克通過電話之后，在7月21日做的注記。Serge Klarsfeld, Vichy-Auschwitz: Die Zusammenarbeit der deutschen und französischen Behörden bei der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 in Frankreich. Darmstadt, 2007, 441. Faks.Kempner, Eichmann..., A. o., 212.新聞報道： Paris Soir, 19./20.8.1942; “Kinderschicksale”,Die Zeitung, London (4.9.1942).

[[116]](#_116_1) Jewish Frontier, 1.11.1942 (Chelmno und Gaswagen).

[[117]](#_117) 25.11.1942,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Times 26.11.1942.拉比史蒂芬·懷斯（Rabbi Stephen S. Wise）警告說，死難者恐怕多達400萬人。S. a. 2.12.1942, New York Times,4.12.1942, Times.

[[118]](#_118) 在幸存者的報告當中能夠找到關于認清納粹面目的時刻的沉痛證詞。從利奧·貝克（Leo Baeck）、本亞明·穆爾默斯坦、約埃爾·布蘭德或者魯道夫·卡斯特納等人全力克服自己的內疚感以及與厄運驚心動魄地糾纏在一起的過程中，更可特別清楚地看出此種艾希曼形象的產生。

[[119]](#_119_1) 希姆萊訪問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后，保羅·布洛貝爾（Paul Blobel）下屬的1005特別行動分隊受命尋找合適的方法。該特別行動分隊被編在艾希曼的辦事處下，并且在那里支領薪餉。艾希曼在阿根廷曾多次對此提出抱怨。

[[120]](#_120) 迪特爾·維斯利策尼的手寫供詞，主題：《邊境信使報》主編弗里茨·菲亞拉，1946年7月26日，布拉迪斯拉發，起訴文件T/1107。維斯利策尼的版本似乎可信，但不只是因為它與艾希曼講法一致的緣故。光是與艾希曼的講法一致，仍不足以成為斷定真假的標準，因為艾希曼會到處尋找他認為對自己有利的謊言，并且加以附和。例如馬格努斯·布雷希特肯在《馬達加斯加給猶太人》一書中，就巧妙地破解了攪成一團的謊言和虛假的確證，以及漫無邊際的歷史篡改。弗朗茨·拉德馬赫后來宣稱馬達加斯加計劃并非他的主意，而是艾希曼的構想，雖然該計劃的實施可以清楚地追溯到拉德馬赫。艾希曼卻欣然接受了這個謊言，因為跟事情的真相相比，“艾希曼在1940年所思考的不是把波蘭人和猶太人遣送到東歐，而是要建立一個猶太國家”的說法，對他的自我形象更有利。上述兩個故事當中，雖然雙方的講法配合得天衣無縫，卻與事實差了十萬八千里。有許多類似這種艾希曼利用他人為自保而編造的謊言的例子。

[[121]](#_121_1) 可以確定，艾希曼曾經在1942年8月11日與希姆萊見面，但不清楚他們是否曾利用這個機會討論了菲亞拉的報告。Dienstkalender Heinrich Himmler, Eintrag 11.8.1942.

[[122]](#_122) 希姆萊在1942年7月6日和7日前往布拉格視察（Dienstkalender Heinrich Himmler,606），第一篇專文刊登于1942年7月7日。

[[123]](#_123) Als Nummer 301, 302 und 304, Grenzbote - deutsches Tagblatt für die Karpatenländer,Bratislava.

[[124]](#_124) 艾希曼在1943年6月2日給馮·塔登的信函，其中提到了：《斯洛伐克政治報》（Slovenská politika）、《匈牙利新聞報》（Magyar Hirlap）、《巴黎報紙》（Pariser Zeitung）等等。此事獲得全體證人（包括檢方證人）的一致證實：起訴文件T/1108。

[[125]](#_125) 第一批報告早在1942年3月3日即已于倫敦的新聞廣播中播出。印刷媒體則一如慣例刊載得較晚，例如Neue Ghettopolitik. Theresienstadt anstelle Lublins - Das Martyrium der Juden im Protektorat, in Die Zeitung, London, 6.3.1942報道：

中立報社記者在柏林報道了希姆萊和海德里希的一項新計劃，擬將今日仍生活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領地的猶太人悉數運往特萊西恩施塔特那座要塞城鎮。當地百姓已被遷出，以便改造那里成為一個大型隔離區。這個計劃意味著，第三帝國原本的猶太人政策已因應新局勢而出現改變。其最初計劃是將所有來自德國和德國占領區的猶太人驅逐到波蘭東部，在那里的大型集中營與隔離區內過奴工的生活。——盧布林附近的猶太人中心便屬于這個惡毒計劃的第一批創造物。納粹指望靠異乎尋常的重度勞動和短缺的食物供給，在短時間內把從歐洲各地遷移過去的猶太人口消滅殆盡。剩余的部分—假如等到戰爭結束后還有剩余人口的話—將連同受德國奴役世界的其他猶太人一起被運往一個位于海外的保留地。暫時選定的地點為馬達加斯加島。

[[126]](#_126) 德國紅十字會的瓦爾特·格奧爾格·哈特曼（Walter Georg Hartmann）于1943年6月28日進行視察之后，起先寫出了一篇大致正面的報告（Aktennotiz über den organisatorischen Ablauf des Besuchs in Theresienstadt, 30.6.1943, Hartmann, DRK-Archiv Berlin 176/I, o.F. -vgl. Birgitt Morgenbrod, Stephanie Merkenich, Das Deutsche Rote Kreuz unter der NS-Diktatur 1933-1945. Paderborn, München, Wien, Zürich 2008, 386ff.）。然而過了幾天，他向安德烈·德·皮拉爾（André de Pilar）表達了不同的看法：“隔離區內的狀況慘不忍睹。那里什么都缺，人們嚴重營養不良，而且醫療用品完全不足。”不過哈特曼還是落入了有關當局最主要宣傳謊言的圈套，即使在皮拉爾面前也把特萊西恩施塔特說成一個讓人放心的“終點營區”。起訴文件T/853，Gerhart Riegner, World Jewish Congress, notes on his conversation with André de Pilar, July 7, 1943。

[[127]](#_127) 其根據的是阿爾弗雷德·約阿希姆·費雪（Alfred Joachim Fischer）1943年8月27日發表于倫敦《自由歐洲》的一篇文章。

[[128]](#_128) Aufbau, 3.9.1943, 21.

[[129]](#_129) Hannah Arendt, “Die wahren Gründe für Theresienstadt”, Aufbau, 3.9.1943, 21.

[[130]](#_130) 關于1944年6月23日視察情形的《海德坎普夫報告》（“Heydekampf Report”）。涉及組織情況的信函往來，見Deutsches Rotes Kreuz Archiv, 176/I, o. F. bei Birgitt Morgenbrod, Stephanie Merkenich, Das Deutsche Rote Kreuz unter der NS-Diktatur 19331945. Paderborn, München, Wien, Zürich 2008, 390f.國際紅十字會的代表莫里斯·羅塞爾（Maurice Rossel）則寫出了一份近乎盲目天真的報告，完全滿足了有關當局的期望。附導言的完整德文譯本參見：Theresienstädter Studien und Dokumente, 1996, 276-320.艾希曼的同僚們已設法在1944年9月22日看到了這份報告。

[[131]](#_131) 萊尼·亞希勒（Leni Yahil）在她那本令人印象深刻的書中，指出了大屠殺的流言與嘗試消滅證據之間的關系。Die Shoah. Überlebenskampf und Vernichtung der europäischen Juden. München 1998, 610f.

[[132]](#_132) 薩森抄本32, 8。

[[133]](#_133_1) Bettina Stangneth, Dienstliche Aufenthaltsorte Adolf Eichmanns, 12.3.1938 bis 8. Mai 1945. Annotierte Liste zur Sonderausstellung “50 Jahre Prozess gegen Adolf Eichmann”.Topographie des Terrors und Stiftung Denkmal, Berlin Juli 2010 (unveröffentlicht)

[[134]](#_134) 薩森抄本3, 5。

[[135]](#_135) 薩森抄本11, 13。

[[136]](#_136) 薩森抄本22, 14。

[[137]](#_137) 艾希曼因為無法從丹麥遣送猶太人出境而做出的激烈反應，迄今未得到充分清楚的解釋。由于艾希曼曾在1943年9月24日，也就是丹麥遣送行動預定的開始時間之前不久與希姆萊見過面，可以想見他自己對此行動的支持。Tatiana Brustin-Berenstein,“The Attempt to Deport the Danish Jews,” in Yad Vashem Studies 17, 1986, 191zitiert den Microfilm mit Himmlers Tagebuchblättern, Washington nach den Originalen im BArch Koblenz vom 24.9.1943, MF 84/25.根據埃伯哈德·塔登1948年4月16日在紐倫堡的宣誓聲明，羅爾夫·金特曾私下告訴他，那次行動“遭到了德國官方機構的破壞，很可能是大使館。艾希曼已向黨衛隊全國領袖報告此事……并要求追究破壞者的責任”。起訴文件T/584。

[[138]](#_138) 威廉·霍特爾和迪特爾·維斯利策尼異口同聲地指出（顯然已在紐倫堡獄中事先商量好），艾希曼會對攝影師做出有攻擊性的反應，甚至幾度在盛怒之下砸毀照相機，但事后賠償了損失。然而早些年卻出現了許多艾希曼這一時期的照片。

[[139]](#_139) 克勞斯·艾希曼在接受采訪時如此告訴美國《大觀雜志》（Parade, “My Father Adolf Eichmann”, 19.3.1961）。

[[140]](#_140) 伯恩哈德·勒澤納詳細談論了這種威脅恫嚇的策略。Lösener-Manuskript A. o.

[[141]](#_141_1) 關于此事沒有獨立的消息來源。艾希曼告訴薩森，沃爾夫出于個人原因，向他要求在遣送行動中破例。艾希曼基于原則上的考慮，嚴詞加以拒絕：“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表示反對，并且在他向我指出，我是黨衛隊一級突擊隊大隊長而他是黨衛隊上級集團領袖之后說：報告上級集團領袖，我當然知道這回事，可是我想提醒一下，您接通的是秘密警察的電話，跟您講話的人則是秘密警察的一位部門主管，一級突擊大隊長艾希曼。”艾希曼后來更要求與沃爾夫決斗，但希姆萊沒有同意（薩森抄本14, 8-9）。由于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跟沃爾夫之間的交情既深且久，而且前者也是薩森訪談會的成員，此一事實增加了那個故事的可信度。

[[142]](#_142) 時而是維斯利策尼交替宣稱艾希曼或者他自己是希姆萊的妹夫，時而則是艾希曼聲稱他自己或維斯利策尼以這種方式攀附上權勢。Der Kasztner-Bericht über Eichmanns Menschenhandel in Ungarn. München 1961，Der Bericht des Jüdischen Rettungskommittes aus Budapest 1942-1945, i. F. Kasztner-Bericht；以及維斯利策尼133號牢房文件，起訴文件T/84。

[[143]](#_143) 關于這個主題的敘述不多，它們或是參照了維斯利策尼矛盾百出的版本，或是依照了艾希曼的審訊供詞，卻往往沒有標明這些極不可靠的資料來源。例如Klaus Gensicke,Der Mufti von Jerusalem, Amin el-Husseini und die Nationalsozialisten. Frankfurt am Main,1988, insb. 164-167即完全采信了審訊供詞。但就連在其他著作中表現杰出的馬丁·屈佩斯（Martin Cüppers）和克勞斯—米夏埃爾·馬爾曼（Klaus-Michael Mallmann），也未加批判地引用了維斯利策尼的觀點。類似的還有Zvi Elpeleg, The Grand Mufti: Haj Amin al-Husseini, Founder of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London, 1993。甚至維森塔爾引人注目的早期著作，《大穆夫提——軸心國的大特務》（Großmufti—Großagent der Achse. Salzburg, Wien 1947），在第37頁以后也主要引述了維斯利策尼的說法，卻不曾標明出處。此外他還跟卡斯特納進行過談話，從他那里聽到了艾希曼的匈牙利故事。

[[144]](#_144) BArch R58/523‚ fol. 23: Adolf Eichmann an II-1, betr. Auslandsreise, 1.9.1939 (identisch mit Yad Vashem Archiv, M-38/194).

[[145]](#_145) 此次會面成了各式新聞報道的主題，出現在從《德國每周新聞》和《民族觀察家報》發端的各種新聞報道中。

[[146]](#_146) Jetzt veröffentlicht von Jeffrey Herf, “Hitlers Dschihad”, i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Heft 2 (April) 2010, 258-286.

[[147]](#_147) Kurt Fischer-Werth, Amin Al-Husseini: Großmufti von Palästina. Berlin-Friedenau, 1943.該書彩色的封面圖片是阿爾—侯賽尼特色十足的肖像。

[[148]](#_148) Vermerk Grobba (AA), 17.7.1942, PA AA R100 702 C/M S. 153.

[[149]](#_149) 祖爾的秘書見證了此次會議。Vernehmung Margarethe Reichert, 17.10.1967, BArch Ludwigsburg B 162/4172, Bl. 296.

[[150]](#_150) 4頁手寫報告Betr. Grossmufti von Jerusalem, Bratislava 26.7.1946 (T/89)，以及22頁手寫報告Bericht Betr. ehemaliger SS-Obersturmbannfiährer Adolf Eichmann, Bratislava, 27.10. 1946。（所謂的“133號牢房文件”，起訴文件T/84。）

[[151]](#_151_1) Moshe Pearlman, Die Festnahme des Adolf Eichmann. Hamburg 1961, 137.

[[152]](#_152) 安德烈·施泰納（Andrej Steiner）1946年2月6日在布拉迪斯拉發的證詞，并經過了其同事奧斯卡·諾伊曼（Oskar Neumann）和蒂博爾·科瓦奇（Tibor Kovac）的確認。維斯利策尼隨后在1946年3月5日做出的評論，則手寫在證詞的謄寫本上（起訴文件T/1117）。

[[153]](#_153) 阿爾—侯賽尼在1943年5月13日向里賓特洛甫提出抗議，并致書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外長。Gerhard Hoepp, Mufti-Papiere: Briefe, Memoranden, Reden und Aufsätze Amin al Husseinis aus dem Exil 1940-1945. Berlin, 2004, Dok. 78, 82, 83.

[[154]](#_154) 如今我們知道，阿爾—侯賽尼的消息來源并非艾希曼，而是他在倫敦的一個聯系人。

[[155]](#_155) 這個謊言的傳播途徑之一，是從艾希曼到維斯利策尼再到卡斯特納（接著通過戰后與卡斯特納的對談，經由西蒙·維森塔爾進入了各種歷史文獻）。從維斯利策尼未發表的報告與維森塔爾早期文稿在文字上的一致，便不難看出此事。另外一個傳播途徑是德國外交部，見Kasztner-Bericht s. z. B. 115.

[[156]](#_156) 他聲稱與反情報機構首腦威廉·卡納里斯有過接觸就是一個例子。

[[157]](#_157_1) Meine Memoiren, 119.

[[158]](#_158) Verhör, 564 f.

[[159]](#_159) 1944年3月25日，阿爾—侯賽尼在他的行事歷上用阿拉伯語寫道，他希望會見“猶太事務專家”。1944年9月29日還出現另外一個阿拉伯語的注記：“主題：意大利、法國和匈牙利的猶太人。到底誰是猶太事務專家呢？”1944年11月9日寫有艾希曼名字的條目使用的是工整的拉丁字母。我們因此至少可以假設，已經有人回答了阿爾-侯賽尼的問題。對這個注記的解釋依然眾說紛紜，但初步可以得出結論，阿爾-侯賽尼在1942年1月與艾希曼的見面乏善可陳，以致他根本沒有記住那個名字。所有這些頁面的復印本可在起訴文件中找到（T/1267-69，放大版：T/1394）。

[[160]](#_160_1) Gerhard Lehfeldt: Bericht über die Lage von “Mischlingen”. Berlin Mitte März 1943.Dokumentiert in: Antonia Leugers (Hrsg.), Berlin, Rosenstraße 2-4: Protest in der NSDiktatur. Neue Forschungen zum Frauenprotest in der Rosenstraße 1943. Annweiler o. J.(2005), als Dokument 6, 233-238. Hier 235.關于此事的背景，參見：Nathan Stoltzfus,“Heikle Enthüllungen. Gerhard Lehfeldts Bericht an Kirchenfürsten beider Konfessionen über den Massenmord an den Juden Europas“, in: Leugers, A. o., 145-180.

[[161]](#_161) 艾希曼在阿根廷曾詳細地談到金特，并且解釋說，金特曾利用他不在的機會，對與艾希曼有所接觸的猶太人執行了死刑，而艾希曼基于策略上的考量曾一再推遲那么做。艾希曼認為金特仍然活著，因此要求薩森移除相關記錄，因而在以色列警方筆跡鑒定專家哈加格的那一份拷貝和原始抄本（“艾希曼遺物”）當中都沒有發現這個部分。那幾頁文字如今保存在路德維希堡聯邦檔案館的“雜項”卷宗。此外可參見本書第七章《余波蕩漾》。

[[162]](#_162) 那些見證者即便在紐倫堡也有機會相互討論證詞，并調整自己的講述和給人的印象，這解釋了為何他們日后的說辭會出現一些奇特的相似之處。例如從霍特爾、卡爾滕布倫納、維斯利策尼、威廉·布魯諾·瓦內克等人的故事版本中——后來還加上了艾希曼的副官魯道夫·耶尼施（Rudolf Jänisch）——即可發現他們彼此有過接觸。漢斯·于特納（Hans Juettner）、奧托·溫克爾曼（Otto Winkelmann）和庫爾特·貝歇爾之間也有過類似的聯系。

[[163]](#_163) 關于艾希曼在匈牙利首次亮相時的情形，可參見他1944年3月31日向猶太人代表講話的速記記錄（起訴文件T/115）。

[[164]](#_164) 薩森抄本9, 10。艾希曼很喜歡這種說法，并經常這樣說。參見薩森抄本10, 6和33, 8。

[[165]](#_165) 薩森抄本9, 4。

[[166]](#_166) Kasztner-Bericht 110（約埃爾·布蘭德也做過相似的引述，但在此引述自卡斯特納）。

[[167]](#_167) Kasztner-Bericht 244.

[[168]](#_168_1) 艾希曼對瓦倫貝里的大肆威脅，甚至在柏林引發了外交抗議，不得不由德國外交部出面為艾希曼緩頰。不久之后，瓦倫貝里的一名雇員死于公務汽車遇襲，匈牙利人認為此事可能與艾希曼的威脅有關。起訴文件T/1232：德國外交部1944年12月17日寫給埃德蒙·維森邁爾的函件。BA Koblenz, Blue volumes, Dokumente des UD zu Wallenberg von 1944- 1965, 49 Bände, Nr. 800-2: Telegramm Nr. 438 vom 22.10.1944.此外參見Christoph Gann, Raoul Wallenberg: So viele Menschen retten wie möglich. München, 1999, 126。根據瓦倫貝里司機的妻子伊麗莎白·塞爾的回憶（Elisabeth Szel），以及埃里克·舍奎斯特（Eric Sjöquist）的報道。Bernt Schiller, Raoul Wallenberg: Das Ende einer Legende. Berlin, 1993,97ff.

[[169]](#_169) Kasztner-Bericht 135ff.

[[170]](#_170) 維斯利策尼告訴卡斯特納：“艾希曼擔心又鬧出新的丑聞。” ebd. 295.

[[171]](#_171) 維斯利策尼，133號牢房文件（起訴文件T/84），第8頁：“正如艾希曼1944年在匈牙利向我承認的那樣，這個計劃出自他和格洛博奇尼克的構想，由他向希姆萊提出建議，然后希特勒親自下了命令。”

[[172]](#_172) 薩森抄本34, 6。

[[173]](#_173) Der Weg: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s Judentums, Berlin, Jg. 1, Nr. 26, 16.8.1946.

[[174]](#_174) Kasztner-Bericht 139.

[[175]](#_175) ebd. 178.后來也出現于牢房文件中。

[[176]](#_176) 維斯利策尼甚至在1944年年底聲稱，艾希曼已被免職，由他——維斯利策尼——擔任特萊西恩施塔特的督察，以保護猶太人。后來他在布拉迪斯拉發試圖否認這兩個謊言，但沒有成功。Kasztner-Bericht / Wisliceny-Kommentar (25.3.1947, T/1116).

[[177]](#_177) 維斯利策尼早在1944年5月3日即已聲稱，他由于與猶太人的親密私人接觸而遭到艾希曼“排擠”，但這種說辭當然是謊言（Kasztner-Bericht, 85）。同年秋天他又表示：“我還想伸出援手阻止那個（讓匈牙利猶太人）集體步行離開布達佩斯的可怕行動。但即便讓艾希曼做出最小的讓步也困難得令人難以置信。”（ebd. 274）。

[[178]](#_178) 薩森抄本12, 6-7。

[[179]](#_179) 庫爾特·貝歇爾令人信服地成功扮演了救助者的角色，由于卡斯特納的一紙宣誓證詞而逃過一劫。卡斯特納對貝歇爾的支持固然惹人生厭，但他在1947年的時候顯然還完全無法看清貝歇爾涉案的程度，而且他不是唯一被騙的人。卡斯特納的副手安德烈亞斯·比斯（Andreas Biss）、亞歷克斯·魏斯貝格，以及約埃爾·布蘭德在1955年仍然試圖爭取貝歇爾的合作來撰寫一本書（Zeugenaussage zum Eichmann-Prozess Kurt Becher,Bremen, 20.6.1961）。貝歇爾自吹自擂的功夫明顯比艾希曼要高明許多。

[[180]](#_180) 例如曾深度卷入所有反猶措施的匈牙利警察首腦拉斯洛·費倫奇曾告訴卡斯特納，他非常害怕艾希曼。（Kasztner-Bericht, 155.）

[[181]](#_181) Kasztner-Bericht, 62.

[[182]](#_182) 約埃爾·布蘭德在1944年6月12日至10月5日期間被拘禁于開羅。其同行者班迪·格羅斯（Bandi Grosz）的審訊報告在1944年7月13日即已被提交到倫敦。

[[183]](#_183_1) 約埃爾·布蘭德的任務很快即告失敗。從1944年7月18日開始大量出現廣播報道和報紙文章。匈牙利在7月19日就有了全文翻譯，造成災難性的輿論反應（起訴文件T/1190）。當天《泰晤士報》的頭版標題為：《駭人聽聞的“出價”：德國的勒索，用猶太人換軍火》（“A Monstrous ‘Offer’: German Blackmail. Bartering Jews for Munitions”）。s. a.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vom 19.7.

[[184]](#_184) Shlomo Aronson, “Preparations for the Nuremberg Trial: The O.S.S., Charles Dwork, and the Holocaust,” in: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998, 2, 257-281.

[[185]](#_185) 薩森抄本73, 8。

[[186]](#_186) Höttl, Assuage zum Eichmann-Prozess, Altaussee 26.5.1961.

[[187]](#_187) 薩森抄本49, 8。

[[188]](#_188) Horst Theodor Grell, Zeugenaussagen zum Eichmann-Prozess, Berchtesgaden, 23.5.1961.Vgl. a. IMT NG-2190.

[[189]](#_189) 本—古里安在提出戰爭罪犯名單的時候，將艾希曼形容為“所有戰爭罪犯當中最惡劣和最危險的一個”；維森塔爾則直截了當地說他是“猶太人的頭號敵人”（Großmufti -Großagent der Achse. Salzburg, Wien 1947, 46）。

[[190]](#_190) 薩森抄本25, 5。

[[191]](#_191) Stefan Hördler, “Die Schlussphase des Konzentrationslagers Ravensbrück. Personalpolitik und Vernichtung,” in: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2008, 3, 222-248, hier 244.赫德勒指出，必須糾正之前有關“1945年3月30/31日最后一次用毒氣進行了大規模謀殺，此后毒氣室即遭到拆除”的講法。根據他的研究，大屠殺其實結束于1945年4月15日和4月24日之間，因為莫爾的別動隊也被部署到了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

[[192]](#_192) 夏洛特·扎爾茨貝格爾在艾希曼審判第42次開庭時的證詞。扎爾茨貝格爾女士將那次審訊的日期定在1945年3月3日。她在審判中用德語引述了艾希曼的說辭，這引發他做出了少見的明顯反應。

[[193]](#_193_1) 有關在特萊西恩施塔特修建毒氣室的謠言源自艾希曼（相當程度上也是因為維斯利策尼在卡斯特納面前針對艾希曼的說明）。艾希曼后來提到馬伊達內克，因為那里的毒氣室被歸咎于他，他表示這種事情不會再度發生在他身上（Kasztner-Bericht）。H. G.阿德勒指出，那樣的計劃確實存在過，但艾希曼被迫把它取消了（H. G. Adler, Theresienstadt,1941-1945. Das Antlitz einer Zwangsgemeinschaft. Tübingen, 1955, 201）。按照他的說法，艾希曼在3月初奉命停止一切有關大屠殺的籌備行動，并展開第二波“美化”工作（Adler,Der verwaltete Mensch ..., A. o., 354）。德國猶太協會最后一任主席莫里茨·亨舍爾（Moritz Henschel）也在1946年9月談到了那個計劃（起訴文件T/ 649：Ausschnitt aus dem Vortrag “Die letzten Jahre der Jüdischen Gemeinde Berlin” von Moritz Henschel, Tel Aviv,13.9.1946）。

[[194]](#_194) 起訴文件T/865：“L’activité des CICR dans les Camps de Concentration en Allemagne”。一個嚴重刪節的版本見Jean-Claude Favez, Warum schwieg das Rote Kreuz? Eine internationale Organisation und das Dritte Reich. München 1994, 193, 499f.阿德勒直接引用了另外一個法文版本，但內容也不完整（Theresienstat ..., A. o., 204.起訴文件T/866：Teilnehmerliste der Veranstaltung）。陪同前往參訪的人包括外交部的埃伯哈德·馮·塔登、埃里克·馮·盧克瓦爾德（Erich von Luckwald），以及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黨衛隊保安局的首腦埃爾溫·魏因曼（Erwin Weinmann）。

[[195]](#_195) 維斯利策尼和艾希曼都談到過升遷為黨衛隊旗隊長一事。維斯利策尼，133號牢房文件，起訴文件T/84，第8頁；薩森抄本4, 5。

[[196]](#_196) 薩森抄本11, 11。在之前的抄本中，艾希曼曾提到過“30個艾希曼”，薩森抄本3, 1。

[[197]](#_197) 迪特爾·維斯利策尼，133號牢房文件，起訴文件T/84，第14頁。維斯利策尼詳細講述了艾希曼散布的版本，并且還講述了霍特爾某次與艾希曼對話之后，在紐倫堡告訴他的類似信息。

[[198]](#_198) 艾希曼曾多次講述這個版本，而且其說法至少當時得到了齊施卡、格特舍（Goettsch）和瓦內克等人證詞的證實：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 17. June 1946,Information Date April 1945。

[[199]](#_199) 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

[[200]](#_200) 影印本見Manus Diamant, Geheimauftrag: Mission Eichmann, Wien 1995, 224; Simon Wiesenthal,Ich jagte Eichmann.Gütersloh 1961, 25。

[[201]](#_201) Robinson to Jackson, July 27, 1945, World Jewish Congress Collection (MS-361), American Jewish Archives, box C106, file 16. Nachgewiesen bei 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 A. 0.,24 f.

[[202]](#_202) 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 Arrest Report Wisliceny, Dieter, 25. und 27.8.45.

[[203]](#_203) 拘捕令見St. P. F. Bl., Art. 1654/46 (1946) wegen §§ 3 und 4, KVG。此次行動雖不成功，但相關檔案于十年后被轉交到法蘭克福，供弗里茨·鮑爾使用。

[[204]](#_204) 有一部分已依據1998年的《納粹戰爭罪行披露法》（Nazi War Crimes Disclosure Act 1998）對外公開。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 Box 14-15.

[[205]](#_205) 1945年的巴黎版本即已如此（無頁碼，Univ. Bibl. Kiel）。在1947年3月的柏林版本中，艾希曼總共被提及七次（其中一次是“埃克曼”）。其中稱他是美國和法國極力緝捕的戰爭罪犯、謀殺犯與酷刑犯。

[[206]](#_206_1) 薩森抄本10, 17。

[[207]](#_207) 艾希曼后來表示，阿道夫·卡爾·巴爾特是柏林市一位殖民地產物商的名字。艾希曼在烏爾姆的時候自稱空軍上等兵，被轉移到上普法爾茨魏登的收容營（Stalag XIII B）之后，他改稱自己為武裝黨衛隊的二級小隊長。參見：Die anderen sprachen …1945年8月后他又被轉移到上達赫施泰滕弗蘭肯。“埃克曼”這個名字最早出現于1945年6月的證人陳述（Yad Vashem Archiv, M.9, File 584a, Interrogation of Rudolf Scheide by L. Ponger）。同樣的證詞也出現于1946年12月3日的CIC報告中（NA, RG 319, Investigative Records Repository, Adolf Eichmann）。

[[208]](#_208) Sassen-Interview, Tonband Zählung BArch 10B, 1:14ff.（逐字抄寫，并標示出縮寫。）

[[209]](#_209) Aronson, “Preparations” …, A. o.

[[210]](#_210) 這種誤解的一個例子就是大衛·切薩拉尼，他總結道：“艾希曼在審判中被提到的次數不多，而且也不夠明顯，他的名字因而無法給審判觀察員留下深刻的印象，更不用說那些只是偶爾從媒體上讀到被過分刪節的報告的人了。”（第8頁）德國報紙的讀者也對戰犯的名字不感興趣，而且借口要關注日復一日的生活來為自己的缺乏興趣找理由。另一個問題是切薩拉尼指的是哪些審判觀察員。那些從前就知道艾希曼名字的人，例如他廣大的受害者以及同謀共犯，都有各種理由留意或忽略。

[[211]](#_211) 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第一次審判的英文抄本與相關文件已作為耶魯大學法學院阿瓦隆計劃（Avalon Project）的一部分對外公開：http://avalon.law.yale.edu/subject\_menus/imt.asp。在注釋中標明引文出處時，所列出的是開庭日期和審判中所使用的編號。

[[212]](#_212) 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起訴文件T/585，等同于IMT 2376-PS, Gestapo-62 (22.6.1945)。

[[213]](#_213_1) 3. Januar 1946. IMT 4, 412。

[[214]](#_214_1) Gustave M. Gilbert, Nürnberger Tagebuch. Frankfurt am Main, 1962, 109.

[[215]](#_215) 這項聲明馬上就被艾希曼的副官魯道夫·耶尼施傳播了出去，并且進入CIC的檔案，經常被引述。艾希曼親自在阿根廷詳細證實了這個花招（薩森抄本10, 17）。

[[216]](#_216) 經常出現在文獻中的“費爾斯萊本”（Feiersleben）這個名字是個打字或聽寫錯誤，最早是因為埃弗森（Eversen）戶口登記簿上的誤載，隨后經由1960年夏季在阿爾騰薩爾茨科特的采訪而傳播開來。中間的“馮”（von）在登記簿上被劃掉了（Stadtarchiv Berger, Fach 585 Nr. 2）。后來的文件寫對了名字。要感謝貝爾根市檔案館庫爾特—維爾納·澤博（Kurt-Werner Seebo）提供的專業幫助。

[[217]](#_217) 艾希曼曾兩次提到其逃亡路線上這個迄今未得到仔細研究的停留地點：一次是在1957年與薩森的談話中（僅出現在原始磁帶中，BArch Zählung 10B, 1: 22: 15）；另一次是在其手稿《我的逃亡》第21頁（März 1961）。后者間接指出，艾希曼是在萊茵蘭獲得了新的證件。

[[218]](#_218) 薩森抄本11, 2。

[[219]](#_219) 1960年的時候，這位兄弟的女管家在至今未受重視的一次采訪中提到了二人之間關于艾希曼逃亡的信件。她知道許多我們直到最近才得以驗證的細節，因此她的說法可信度很高。采訪稿見：Neues Österreich vom 2. 6. 1960, “Adolf Eichmann hob sein eigenes Grab aus. Eine Haushälterin der Familie erzählt”.

[[220]](#_220) 羅伯特·艾希曼過了很久以后終于承認，他的父親一直與其同父異母哥哥阿道夫保持聯絡，但他們全家于父親去世后才發現此事。Robert Eichmann an Leo Maier-Frank,Kriminaloberst i. R., 8. 3. 1990, gedruckt in Rena und Thomas Giefer, Die Rattenlinie. Fluchtwege der Nazis. Eine Dokumentation. Frankfurt a. M., 1991, 71-73.（信中包含了其他不盡可信的說辭。）

[[221]](#_221) “亨寧格”（Henninger）是聽寫錯誤，從埃弗森的戶口登記簿記錄即可明確看出此事（An-und Abmeldebuch Eversen, Stadtarchiv Bergen, Fach 585 Nr.2）。感謝庫爾特—維爾納·澤博提供的資料。

[[222]](#_222) 埃弗森的戶口登記簿，同上。

[[223]](#_223_1) 迪特爾·維斯利策尼，133號牢房文件，起訴文件T/84，第22頁。

[[224]](#_224) NA, RG 319, IRR, Adolf Eichmann, CIC Report und NA, RG 263, Adolf Eichmann Name File, SS Obersturmbannführer A.E. 1946.

[[225]](#_225_1) 1946年4月11日的宣誓聲明。

[[226]](#_226) ebd.

[[227]](#_227) IMT 11, 305, 11.4.1946.

[[228]](#_228_1) 艾希曼出現了十分明顯的記憶錯誤，在阿根廷，他引述杰克遜的話：“他（杰克遜）覺得必須利用此次審判的機會把我形容成……‘事實上是本世紀最邪惡的人物’。”（Betrifft:Meine Feststellung …）分別在兩處夸大了杰克遜的說法。

[[229]](#_229) IMT Gest-39, Eidesstattliche Erkläung Huppenkothen.

[[230]](#_230_1) 奧托·溫克爾曼（黨衛隊上級集團領袖以及在匈牙利的高級警察領導人）和漢斯·于特納（黨衛隊上級集團領袖與武裝黨衛隊上將）在庫爾特·貝歇爾的支持下，共同編造了一個令人發指的脫罪故事，證明自己與死亡行軍沒有任何關系——盡管溫克爾曼負責遣送行動，于特納則要求獲得更多奴工。于特納宣稱：“溫克爾曼當時（1944年11月）表示，他在這個問題上完全無能為力，如果我能提出異議的話，他將非常感激。”于特納嘗試那么做了，雖然“我完全知道，這種干預可能會對我個人產生非常不愉快的后果”。艾希曼卻宣稱，二人都明確稱贊他關于步行離開的構想。這并非沒有可能的事，唯一或許會讓于特納感到不滿的地方就是，行軍隊伍當中還能工作的人太少了。（Jüttner-Aussage, Nürnberg 3.5.1948.）三人后來在為艾希曼審判案作證時重復了同樣的把戲——溫克爾曼1961年5月29日在博德斯霍爾姆（Bordesholm），于特納1961年5月31日在巴特特爾茨，庫爾特·貝歇爾1961年6月20日在不來梅。

[[231]](#_231) Kasztner-Bericht, 194.對卡斯特納來說，這個詞指的是艾希曼的系統在每個占領國為猶太人政策建立的無上權力地位，最后沒有任何人能夠奈何得了它。

[[232]](#_232_1) Urteil 1, 298, verlesen am 30.9.1946.

[[233]](#_233) IMT 1, 283。

[[234]](#_234) 這個手寫注記出現在一份標題為《建議審判框架，簡略大綱（僅供參考和批判）》（“Suggested Frame of the Judgment, in bare outline (for consideration and criticism only)”）的內部文件上面。該文件的保密級別為“嚴格保密”，因為如果傳出風聲，法官們那么早就開始準備撰寫判決書，這個消息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后果。這顯示出它屬于非常早期的文件。Syracuse University, Syracuse, New York, Francis Biddle Papers, Box 14。謹在此感謝妮珂萊特·多布羅沃爾斯基（Nicolette A. Dobrowolski）發揮專才協助尋獲手寫注記，并對文件本身做出說明。布拉德利·史密斯的描述頗有問題（Bradley F. Smith, Der Jahrhundertprozeß. Die Motive der Richter von Nürnberg - Anatomie einer Urteilsfindung.Frankfurt a.M. 1979 (deutsches Original zuerst 1977), 132）。

[[235]](#_235) 起訴書的最終版本于1945年10月18日開庭時正式提交。

[[236]](#_236) 這個貼切的用語出自摩西·珀爾曼。

[[237]](#_237) 薩森抄本3, 3。

[[238]](#_238) 薩森抄本6, 1。

[[239]](#_239) 這個說法源自維斯利策尼。他為了自保而聲稱他的老板曾經秘密行事（Wisliceny, Cell 133-Dokument, Bratislava, 27.10.1946, T/84）。

[[240]](#_240) 以色列政府向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政府發出的照會。全文發表于1951年7月27日的《猶太通論周報》（Jüdische Allgemeine）。另外幾個人是海德里希、赫斯、弗蘭克，以及希特勒。艾希曼的名字在那份相當簡短的文件里面被提到了兩次。

[[241]](#_241) 當時見證者的報告一致認為，饑餓在那個地區并不是個問題。

[[242]](#_242) Argentinien-Papiere, Handschrift Die anderen sprachen ..., Randbemerkung zu Seite 57,BArch Ludwigsburg, Ordner Diverses.

[[243]](#_243) 艾希曼聲稱魯道夫·赫斯曾經告訴他，希姆萊講過這樣的話。Meine Memoiren, 110.另見艾希曼接受審訊和審判的過程記錄。

[[244]](#_244) 薩森抄本11, 2。艾希曼親筆修訂了這個段落，并且刪除了所有涉及幫手的部分。剩下的文字是“我在那里看見一大沓舊報紙，上面有些文章提到了我”。

[[245]](#_245) 艾希曼在薩森訪談中已經詳細地引述了那本書，雖然它并非共同的討論對象。他在以色列也得到了一本（第5版），并將用于最后一次為自己辯護的努力——《偶像》（1961年）。

[[246]](#_246) 那部著作是艾希曼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藏書之一。他的手寫批注也保存了下來。BArch Koblenz, Nachlass Eichmann N 1497-89.

[[247]](#_247) Meine Flucht, 11f.

[[248]](#_248) 薩森訪談，原始磁帶10B 1:22。逐字抄寫稿，未糾正語法錯誤。

[[249]](#_249) Meine Flucht, 22.

[[250]](#_250) Argentinien-Papiere, Handschrift Die anderen sprachen ..., Randbemerkung zu Seite 57,BArch Ludwigsburg, Ordner Diverses.

[[251]](#_251) 《明星周刊》羅伯特·彭道夫和《每日電訊報》理查德·基利安（Richard Kilian）對露特·特來梅（Ruth Tramer）的采訪，1960年6月（6月16-25日）被用于雷諾茲在《明星周刊》發表的文章中（Adolf Eichmann ..., A. o.）；Begegnungen mit einem Mörder, BBC/NDR 2002；雷蒙德·萊伊2009年和2010年7月24日采訪、2010年7月28日由北德廣播電視臺播出的Menschen und Schlagzeilen。證人姓名已按照當事人的要求加以省略。

[[252]](#_252) 關于小孩子們的回憶，參見2010年7月24日在阿爾騰薩爾茨科特采訪、7月28日由北德廣播電視臺播出的Menschen und Schlagzeilen。

[[253]](#_253) 1960年夏天時，已有記者率先在阿爾騰薩爾茨科特和周邊地區進行采訪（例如《明星周刊》的羅伯特·彭道夫）。包括沃爾德馬爾·弗賴斯萊本在內的許多人，則聲稱自己對此“毫不知情”（Spiegel, 15.6.1960）。關于艾希曼在那個人煙稀少地區的行為表現和扮演的角色，目擊證人的描述直到今天仍然相當一致。顯而易見，他們在發現自己曾經與誰為伍之后出現的恐懼反應都不是假裝出來的。同樣清楚的是，每人都對自己過去生活三緘其口的做法已然成為普遍的生存策略。卡斯滕·克呂格爾（Karsten Krüger）曾實地進行過廣泛調查（2002, teilweise abgedruckt in Frankfurter Rundschau, 30.5.2002; vgl. a. Neue Presse, 23.7.2009）。此外亦參見NDR/BBC-Produktion Begegnungen mit einem Mörder 2002, Interviews für die ARD-Produktion Eichmanns Ende 2009. Wichtige Ergänzungen liefern bis heute die Life- und Stern-Interviews mit Nelly Kühn, verw. Krawietz von 1960(Reynolds et.al., Adolf Eichmann ..., A. o., 185, Stern, 25.6.-16.6.1960).

[[254]](#_254) Meine Flucht, 12.

[[255]](#_255)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Ierusalem ..., A. o., 281.

[[256]](#_256_1) 如果消息正確的話，這位經常前往拜訪艾希曼的“維利叔叔”也曾經是黨衛隊成員，那么科赫與艾希曼二人想必早已熟識。維利·科赫出生于1910年9月22日，1940年10月曾在波森的中央移民辦公室任職，而后工作于其位于格內森（Gnesen）的分支機構。波森的中央移民辦公室當時歸艾希曼管轄。（SS-Dienstaltersliste 1.12.1938 und 15.6.1939,Nr. 4813, geführt unter SD-Hauptamt.）

[[257]](#_257) 參見本書第五章《我沒有同志》一節。

[[258]](#_258) 路易斯（阿洛伊斯）·辛特霍爾策1914年12月16日出生于因斯布魯克附近（黨衛隊編號308210，1944年7月1日武裝黨衛隊名錄編號2076，后備黨衛隊一級突擊中隊長）。BArch Berlin BDC-Akte. Vgl. a. Gerald Steinacher, Nazis auf der Flucht. Wie Kriegsverbrecher über Italien nach Übersee entkamen. Innsbruck, Wien, Bozen 2008, 50-52.該書亦引用了路德維希堡聯邦檔案館中央辦公室收藏的辛特霍爾策文件。

[[259]](#_259) Philipp Trafojer, “Die Spuren eines Mörders. Alois Schintlholzer (1914-1989) ”,Titelgeschichte in der österreichischen Zeitschrift Vinschgerwind, 8.9.2005.

[[260]](#_260) 辛特霍爾策將此事告訴了一位熟人，卻不曉得該人是西德情報部門的線人。資料發現于德國聯邦行政法院補充文件BVerwG 7A 15.10, Saure gegen BND, BND-Akten 121099,1664: Schreiben vom 3.6.1960 “auf AA-Anfrage”; 1784: 11.8.1960。感謝克里斯托夫·帕爾奇允許引述相關資料。

[[261]](#_261) 這句話僅出現在錄音帶上，被阿根廷的打字謄寫員省略了。Tonband Zählung BArch 10B, 1:22:30.

[[262]](#_262) 有拍攝客廳內老年婦女的影片，讓我們在今天仍可直接窺見那種談話方式。她們即便時隔數十年之后還能認真至極地爭辯，那位始終不事張揚、偏愛甜食、來自南方的黑寧格先生的眼睛究竟是藍色還是褐色。NDR/BBC, Begegnungen mit einem Mörder, 2002.（艾希曼的眼睛是藍灰色的。）

[[263]](#_263) Liebl, Vera, Ex-Wife of Eichmann, Otto Adolf, datiert auf den 26.11.1946 und Interrogation of Parents and Brother of SS-Obersturmbamaführer Otto Adolf Eichmann,NA, RG 263,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 datierbar Mitte Oktober 1946.

[[264]](#_264) 艾希曼后來表示，他的妻子在那整個時期都住在他叔父的房子里。根據阿爾陶塞地區警員瓦倫丁·塔拉1960年1月6日寫給弗里茨·鮑爾的報告，她的住處是一棟狩獵小屋。接著薇拉·艾希曼在1948年7月30日和孩子們遷居到菲舍恩多夫的一戶農家。見1960年6月奧地利《1960年1月1日的相關信函》，載于1960年6月的奧地利《新警世報》（Der Neue Mahnruf）。

[[265]](#_265) Cesarani, Adolf Eichmann ..., A. 0., 41; Interview Vera Eichmann, Daily Express,12.12.1961.

[[266]](#_266) 根據瓦倫丁·塔拉的記述，戰爭結束后，薇拉的妹妹在阿爾陶塞嫁給了利奧波德·卡爾斯。薇拉的另一個妹妹則與丈夫和母親居住在林茨附近的赫爾興。

[[267]](#_267) 維森塔爾列出的日期為1947年4月30日，見Ich jagte Eichmann…, A. o., 85。“CIA Name File”則日期不明：SS Obersturmbannführer Adolf EichmaIm‚ Report from Berlin 17.6.??（無法閱讀）。維森塔爾頻繁地報道了事件的經過，并將阻止薇拉·艾希曼的申請一事，看成他為追捕艾希曼行動做出的最大貢獻。關于阿爾陶塞警方的觀點，參見瓦倫丁·塔拉1960年1月6日的報告。

[[268]](#_268) 關于搜查的經過，參見：CIC Report on Adolf Eichmann, 7.6.1947, NA, RG 319, IRR Adolf Eichmann。英格麗德·馮·伊內位于巴特加施泰因（Bad Gastein）的住所也遭到搜查。獲得第一張艾希曼照片的經過，見Manus Diamant, Geheimauftrag Mission Eichmann.Aufgezeichnet von Mosche Meisels und mit einem Vorwort von Simon Wiesenthal. Wien 1995, 223。

[[269]](#_269) 約瑟夫·魏斯爾在1947年被引渡到法國，因為參與遣送人犯至奧斯維辛的行動而遭到起訴并被判處終身監禁。他在1955年回到奧地利重獲自由之身，不曾因為他的其余罪行而被繩之以法。Hans Safrian, Eichmann und seine Gehifen. Frankfurt a. M. 1997, 328.

[[270]](#_270) 薩森抄本3, 3。艾希曼的名字從1955年3月開始出現在奧地利的通緝名冊上。

[[271]](#_271_1) Meine Flucht, 12.

[[272]](#_272) 克恩滕總共只有過兩任納粹省黨部領導，分別為胡貝特·克勞斯納（卒于1939年）和弗里德里希·賴納（1947年被處決于南斯拉夫）。烏基·戈尼認為，一個名叫阿明·達爾迪約（Armin Dardieux）的“卡普里”員工其實就是于伯賴特爾，這意味著艾希曼和于伯賴特爾也在阿根廷見過面。Holger Meding, Flucht vor Nürnberg? Deutsche undösterreichische Einwanderung in Argentinien 1945-1955. Köln 1992, 150f., u. 217ff. und CEANA: Third Progress Report. Buenos Aires 1998.不過此說法先后遭到《科爾索月刊》（KORSO）的記者以及海因茨·施內彭的反對，他們認為于伯賴特爾化名弗里德里希·舍恩哈廷（Friedrich Schönharting）定居在辛德爾芬根（Sindelfingen）。就我們目前所知，艾希曼自己從未對于伯賴特爾的實際下落發表更多評論。但可以確定的是，艾希曼知道人們在1947年5月的猜測——當他在1960年寫下這個句子的時候仍然對此事記憶猶新，而且并未加以反駁。他跟于伯賴特爾在20世紀30年代即已彼此熟識。

[[273]](#_273_1) Neue Zeitung, München, 23.9.1949. S.a. Neue Zeitung vom 7.6.1949, “Der ‘Weg’, der in den Abgrund führt”; Lübecker Nachrichten, 11.6.1949; “lmportierter Wehrwolf”;Tagesspiegel, 28.9.1949, “Die Herrschaft der ‘Descamisados’”; Gronauer Nachrichten u.Volkszeitung, 5.11.1949, “Die Hitlers in Südamerika”.

[[274]](#_274) Der Spiegel, 2.6.1949. S.a. Lübecker Nachrichten, 11.6.1949.其中提到了魯德爾、加蘭德、鮑姆巴赫（Baumbach）和利茨曼（Lietzmann）等人。

[[275]](#_275) Mit Goebbels bis zum Ende. Buenos Aires: Dürer, 1949.亦參見他對自己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那幾年的生活所做的描述：Ein “Nazi” in Argentinien. Gladbeck, 1993.

[[276]](#_276_1) 那份證件和短期簽證都沒有保留下來，不過紅十字會難民護照申請書和護照本身都留下了詳細記錄。此外也登記在阿根廷移民局的檔案中，檔案編碼231489/48。Uki Goñi,The Real Odessa..., A. o., 126f. 284f.艾希曼的發件日期也有可能是1948年6月2日，因為紅十字會的檔案在羅馬數字和阿拉伯數字之間任意切換。現存約瑟夫·門格勒、恩斯特·米勒和“克雷姆哈特”（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等人的“泰爾梅諾證件”都核發于星期五至星期六之間。如果此類證明文件固定在那個時間核發的話，那么艾希曼的發件日期就是1948年6月11日。

[[277]](#_277_1) 艾希曼在納粹時期就已經知道了胡達爾的名字，因為他是德國天主教會在羅馬的“圣瑪利亞靈魂之母堂神學院”（Santa Maria dell’Anima）院長，顯然經常向德國外交部通報羅馬教廷的內情。艾希曼曾在1943年10月23日收到一份報告，胡達爾在報告中提出警告，切勿在羅馬的公共場所逮捕猶太人，以免迫使教宗公開表達立場（起訴文件T/620）。

[[278]](#_278) 迪特爾·維斯利策尼，133號牢房文件。起訴文件T/84，第18頁。

[[279]](#_279) 戰犯們在紐倫堡對東西方的沖突寄予厚望，在法庭外這也是一個被頻繁提起的話題。參見： G.M. Gilbert, Nürnberger Tagebuch. Frankfurt a. M. 1962.

[[280]](#_280_1) 根據林霍斯特太太（Frau Lindhorst）的陳述。NDR/BBC, Begegnungen mit einem Mörder,2002。

[[281]](#_281_1) 1960年10月24日在耶路撒冷舉行的新聞發布會。Allgemeine Wochenzeitung der Juden,28.10.1960, “Wie Eichmann gejagt wurde”.

[[282]](#_282) 湯姆·塞格夫對目前出現過的各種描述進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對，讓我們得以看出其中的差異。以下摘要若不另外注明出處，皆引自相關章節。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A. o., 31-41.

[[283]](#_283) Leo Frank-Maier, Geständnis - Das Leben eines Polizisten. Vom Agentenjäger zum Kripochef Oberst Leo Maier. Linz 1993, 25ff.

[[284]](#_284) 米迦勒·布洛赫在1949年1月3日針對該次行動寫了一篇報告。參見Segev, Simon Wiesenthal..., A. o.

[[285]](#_285) 艾希曼稱自己曾在1950年年中考慮過這種可能性，Meine Flucht, 17。

[[286]](#_286) 大部分文章出現在1948年10月初，并大部分逐字重復了《世界晚報》的報道。此處引自1948年10月2日和3日的《南方信使報》（Südkurier）和《上奧地利日報》，以及1948年11月13日的《新周報》（Neue Woche）。

[[287]](#_287_1) 聯邦情報局已在2010年11月把相關檔案移交給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BArch Koblenz B206/1986: Fall Adolf Eichmann. Gescheiterte Ergreifung durch Israel und Behauptungen Urbans zur möglichen Fluchthilfe）。《明鏡周刊》將這些文件用于2011年1月15日的在線報道《以色列人試圖從奧地利綁架艾希曼》（‘lsraelis wollten Eichmann aus Österreich entführen’），但沒有提及最新的研究結果。

[[288]](#_288) Leo Frank-Maier, Geständnis A.o., 21f.書中第24頁附有烏爾班的照片一張，以供辨認。

[[289]](#_289) Peter F. Müller, Michael Mueller, Gegen Freund und Feind. Der BND: Geheime Politik und schmutzige Geschäfte. Hamburg 2002, 226.

[[290]](#_290) CIC/CIA file, NA, RG 263, Name File Josef Adolf Urban (geboren am 14.6.1920).

[[291]](#_291) Müller, Mueller, Gegen Freund und Feind ..., A. o., 226.

[[292]](#_292) 布魯諾·考舍恩出身帝國保安總局第六局（黨衛隊保安局國外業務）C處2科。

[[293]](#_293) BArch Koblenz, B206/1986.

[[294]](#_294) 關于烏爾班的納粹事業，見Hermann Zolling, Heinz Höhne, Pullach Intern - General Gehlen und die Geschichte des Bundesnachrichtendienstes. Hamburg 1971, 217 Vgl. a.seine CIA -Akte, A. o.

[[295]](#_295) 維森塔爾于1948年12月5日旁聽審訊后曾寫信給卡斯特納，求證所聽到的是否屬實。引自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A. o. 131f.

[[296]](#_296) “Ursachen und Hintergründe der Angriffe gegen Dr. H”, Bericht vom 16. Juli 1952.Bericht vom 16. Juli 1952. Zitiert nach Müller, Mueller, Gegen Freund und Feind ..., A.o.,227.這篇報告來自威廉·霍特爾身邊的人士，下文還會對此加以說明。烏爾班是霍特爾販賣假情報的直接競爭者，而且烏爾班的立場也與他不同。

[[297]](#_297_1) 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A. o., 41.

[[298]](#_298) 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維森塔爾的名字曾被多次提及。

[[299]](#_299) 茲維·阿哈羅尼報告說，艾希曼曾向他問起有關自己孩子的事情。

[[300]](#_300) 艾希曼女房東之子奧托·林霍斯特（Otto Lindhorst）的說法，見BBC/NDR-Interviews 2002.此外參見卡斯滕·克呂格爾的報道，以及《生活》雜志1960年對內莉·克拉維茨的采訪。按照內莉的說法，艾希曼寫信向她表示：“如果你在四個星期里聽不到我還活著的跡象，那么就可以在我的名字上面打個叉了。”——這聽起來很像艾希曼的口吻。Quentin Reynolds, Ephraim Katz, Zwy Aldouby, Adolf Eichmann. Der Bevollmächtigte des Todes. Konstanz, Stuttgart 1961, 185.

[[301]](#_301) 艾希曼在1960年被捕之后，告訴以色列特工茲維·阿哈羅尼的版本。Agenten Zvi Aharoni. Zvi Aharoni, Wilhelm Dietl, Der Jäger. Operation Eichmann: Was wirklich geschah. München 1996, 228ff.

[[302]](#_302) Meine Flucht, 13.

[[303]](#_303) 例如薩森抄本21, 10。

[[304]](#_304) 時隔那么多年后，艾希曼固然有可能把某些日期搞混，但這個善意的推斷只適用于一些無關痛癢的日期。我們可以證明，艾希曼曾經為了自我表現（后來則是為了自我辯護）而刻意更改許多日期。這個做法早在納粹時期即已幫助他大獲成功。可以想象的是，黨衛隊保安局人員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便學會了官僚機構的這種作弊手段。

[[305]](#_305) 克勞斯·艾希曼1966年1月2日接受德國畫刊《快客雜志》（Quick）的采訪。

[[306]](#_306_1) 在早期CIC報告中已有跡象顯示，黨衛隊人員將那個無傷大雅的城市名稱用作相互識別的暗號。它帶來的好處非常實際，包括偶爾能夠借此在吃飯時獲得更多分量（CICfile Organisation Odessa, first document, October 25, 1946）。Heinz Schneppen, Odessa und das Vierte Reich: Mythen der Zeitgeschichte. Berlin, 2007詳細敘述了那個神話形成的經過，不過有時也過度拘泥于“敖德薩”那個字眼本身，以致對實際存在的組織結構視而不見。不幸的是，施內彭僅僅以艾希曼的少數言論作為依據，而忽略了逃亡到阿根廷那些人之間可觀的網絡與聯系。下面還會對此做出更多補充說明。

[[307]](#_307) 艾希曼并沒有向薩森提及同情者的姓名：“有人帶著我溜出德國……”等等。《我的逃亡》里面完全只提到“組織”。海因茨·施內彭固然非常正確地注意到，艾希曼連一次都沒有使用過“敖德薩”這個字眼（Odessa, 27），但沒有提及名稱并不表示那個組織真的不存在。艾希曼所說的那個組織，顯然是由昔日黨衛隊成員支撐的。但他對以色列顯然不會這樣說，因為那個“組織”還在繼續運作，其架構依然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艾希曼不在的情況下繼續照顧他的家人。因此與施內彭的描述恰恰相反，艾希曼即使在1960年談論此事也將“危及他本人或第三方”（Odessa, 23）。

[[308]](#_308) Moshe Pearlman, Die Festnahme des Adolf Eichmann. Frankfurt 1961.

[[309]](#_309_1) 德國聯邦行政法院補充文件BVerwG 7A 15.10, Saure gegen BND, BND-Akten 121099,1664: Schreiben vom 3.6.1960 »auf AA-Anfrage«; 1784: 11.8.1960。參見本書第五章《我沒有同志》一節。

[[310]](#_310) 西蒙·維森塔爾在1954年3月30日寫給納胡姆·戈爾德曼的一封信中表示，對艾希曼家的監視顯示，其財務狀況已在此際明顯獲得改善。艾希曼也在《我的逃亡》第16頁暗示了這次接觸。

[[311]](#_311_1) 格拉爾德·施泰納赫推測艾希曼接受了洗禮，因為在施特青的領洗登記簿里面出現了埃里克·普里布克再度領洗的記錄。然而在那里找不到任何有關艾希曼／克萊門特的記錄。Steinacher, Nazis auf der Flucht ..., A. o., 167.

[[312]](#_312) Meine Flucht, 18.

[[313]](#_313) ebd., 24.

[[314]](#_314_1) 經常被誤寫成“Giovanni C”，而這個錯誤源自艾希曼自己。阿根廷方面的檔案記載得非常清楚（更何況船名通常優先使用女性姓名）。

[[315]](#_315) Meine Flucht, 17.

[[316]](#_316) ebd., 22.

# 第二章 間奏曲：在中東的虛假蹤跡

阿道夫·艾希曼目前人在大馬士革。

——1952年后，德國情報機構艾希曼檔案中的說明文字

艾希曼后來在以色列寫道：“當‘喬凡娜C’那艘輪船離開熱那亞港的時候，我感覺像是一只被狩獵的鹿，終于成功擺脫了追捕者。一股自由的感覺將我淹沒。”[[1]](#_1_5)如果這真的是艾希曼在1950年夏天橫渡大西洋時的心境，那么他對自由的希望不無道理。他固然仍受到通緝，但追捕他的人當時怎樣都料想不到他正在前往拉丁美洲的途中。艾希曼把捉迷藏的游戲進行得如此天衣無縫，以至于直到他十年后被逮捕為止，都沒有人發現他在北德的棲身地點。所有關于他最初藏匿之處的猜測，都一直圍繞著最容易跟他聯想在一起的地區打轉，那就是奧地利。人們以為他會躲在離家人不遠、可與老同志們密切聯系的地方。自從艾希曼真正的逃亡路線在1960年曝光以來，西蒙·維森塔爾便不斷受到譏諷和嘲笑[[2]](#_2_6)，因為他始終堅信艾希曼“與‘雪絨花’（Edelweis）、‘六星座’（Sechsgestirn）和‘蜘蛛’（Spinne）之類的地下組織保持著密切聯系”，而且由于“蜘蛛”就把“自己的總部設在敘利亞駐羅馬大使館”，那些納粹秘密團體共同構成了“敖德薩”的支柱。[[3]](#_3_5)但維森塔爾絕不是唯一聽信了這種謠言的人，就連防諜隊的探員亦對此有所聽聞。[[4]](#_4_6)除此之外，同樣的故事還出現在位于林茨的上奧地利安全局的機密報告中。一名昔日的黨衛隊成員添油加醋地把艾希曼描繪成一個跨國組織的資助者，但其情節過于夸張不實，只會讓人不由得心生懷疑。例如他聲稱那些地下團體的領袖之一是黨衛隊將領保羅·豪塞爾（Paul Hausser），但美中不足的是，豪塞爾一直到1949年都還被囚禁在戰俘營內。盡管如此，這方面的記錄還是進入了聯邦德國的情報機構[[5]](#_5_6)和美國中央情報局[[6]](#_6_6)的檔案。但在1960年之前，任何地方都沒有提到北德。在呂訥堡石楠草原偽裝成奧托·黑寧格的做法，無可否認是逃亡的艾希曼的一大杰作。

1950年，除了艾希曼的家人和直接幫助他逃亡的人（但其中大多數人聲稱并不知道他們幫的是誰），沒有人料到阿根廷已成為艾希曼最新的目的地。除了艾希曼潛藏時始終如一和嚴格自律，以及總是只跟真正信得過的人打交道之外，主要還是因為他在1944年年底向最后的同伴們告別時便已經布下疑陣。等到艾希曼在1946年逃離戰俘營不知所蹤，而且有關奧地利的謠言也全部落空之后，每個人都認為他已經把自己的計劃付諸行動，逃往中東躲在耶路撒冷大穆夫提阿明·阿爾-侯賽尼那里。

人們迄今所聽說的有關艾希曼的一切，似乎都指向了那個計劃：他號稱具有的語言能力、所謂與大穆夫提和阿拉伯人的友誼、謊稱在薩羅納圣殿騎士殖民地出生的背景，再加上他對猶太人的狂熱仇恨，以及他一再強調的意圖，只要一息尚存就會使盡各種手段在全世界與“猶太集團”戰斗到底。艾希曼在他所講述的故事和自我呈現中，巧妙地運用了各種陳詞濫調。這個以謀殺猶太人為己任的兇手便用這種方式繼續云游四方，不斷跟著自己的任務走下去。從追蹤這名罪犯最初的嘗試，即可看出艾希曼多么成功地激發了那些幻想。

早在1946年8月16日，柏林探討猶太人問題的雜志《路徑》即已刊出第一篇內容非常豐富的專文《卡爾·艾希曼依然蹤跡全無》（‘Von Karl Eichmann fehlt jede Spur’）[[7]](#_7_6)，隨后被摘要轉載于其他報紙。這篇文章除了犯了那個著名的張冠李戴錯誤，即把艾希曼的名字（Otto Adolf）跟他父親的名字（Karl Adolf）搞混外，還詳細介紹了那名猶太事務主管的發跡經過。它還提到了艾希曼的語言習慣，以及他不斷改變的外貌。由此不難看出，該文參考了當時許多目擊者的報告。有人懷疑艾希曼可能躲進難民營冒充受害者，甚至認為他可能已經動過臉部整形手術。該文昭告天下，劫后余生的猶太人的任務就是要找到艾希曼，并把他送上法庭。

1947年1月，《英國占領區猶太社區周報》（Jüdisches Gemeindeblatt für die britische Zone）也發表了一篇內容詳盡的文章，并給它起了一個宣示意味十足的標題《我們正在找的人》（‘DerMann, den wir suchen’）。[[8]](#_8_5)“卡爾·艾希曼”被描繪為一名年約35歲的男子，“年輕、瘦長、高大、金發、藍眼、曾經研讀過神學”，而且是“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最有力工具”。那篇文章重復了有關“完美希伯來專家”的神話，稱他出生于薩羅納，曾在1936年舊地重游，以便在穆夫提、希姆萊和希特勒之間建立起聯系。他最后一次被人看見是在特萊西恩施塔特，現在可能正“偽裝成猶太人”藏匿在猶太人中間。“他也有可能已經返回巴勒斯坦，以非法移民之姿在那里繼續為非作歹，或許更已偽裝成猶太恐怖分子？”人們在戰爭結束后普遍擔心的是，兇手艾希曼可能已經在他的受害者中間找到了避難所。西蒙·維森塔爾也有同樣的憂懼。他在同一年發表了一本名為《大穆夫提——軸心國的大特務》（Großmufti-Großagent der Achse）的小冊子，其中用一章篇幅專門討論艾希曼，最后做出這樣的推斷：“猶太人的頭號敵人艾希曼仍未緝捕到案。無法排除的可能是，這名罪大惡極的犯人也許會利用自己的意第緒語和希伯來語能力，偽裝成猶太人藏在難民營內，或者甚至冒充非法的猶太復國主義移民，逃往中東投靠他的阿拉伯朋友們……”[[9]](#_9_5)在那本附有插圖的小冊子里，還有一張維森塔爾誤以為是艾希曼的照片。

第一張真正的艾希曼照片由萊昂·波利亞科夫（Léon Poliakov）于1949年在其關于艾希曼的專文《阿道夫·艾希曼或卡利古拉之夢》（Adolf Eichmann ou le rêve de Caligula）中發布。[[10]](#_10_6)由于該文以法文撰寫，在德國幾乎沒有引起注意，因此艾希曼竟然知道有人將他與那個瘋狂嗜殺且仇視猶太人的羅馬皇帝相提并論，就更令人驚訝。據說艾希曼會根據談話對象的不同而表現得憤憤不平或沾沾自喜。波利亞科夫駁斥了薩羅納的神話，并且引述了紐倫堡第一次審判的證詞和文件，但最重要的還是那張照片，因為它首度向世人展示了艾希曼的模樣——或至少是他加入黨衛隊之前的樣子。照片中那個神情懶散的青年既沒有穿制服也沒有擺出傲慢的姿態，反而引發人們對他那所謂的“典型猶太人長相”做出各種揣測。當威廉·薩森后來問起此事的時候，艾希曼堅稱那張照片顯然被修飾過了，因為他根本沒戴過那樣的領帶，而且他從來沒有過那種面部表情。[[11]](#_11_4)

一些果真逃往中東，不僅在當地尋求庇護，同時也在等待新任務的黨衛隊人員，使艾希曼逃往南方的推測顯得更加可信。于是《英國占領區猶太社區周報》在1948年夏天率先刊出專文，講述一名“替阿拉伯人效勞的黨衛隊將領”。該人“名叫漢斯·艾希曼（Hans Eichmann），生于巴勒斯坦”。[[12]](#_12_4)事實上，除了一個有組織的跨大西洋逃亡網絡之外，的確也有人幫助老納粹逃亡到中東。

對劫后余生的猶太人而言，在北非的納粹余孽顯然更加可怕。希特勒的“沙漠之狐”隆美爾（Rommel）率領部隊逼近耶路撒冷的時刻，仍然讓幸存者記憶猶新，以致他們仍然把阿拉伯人和德國人的聯盟視為莫大威脅。西蒙·維森塔爾后來承認，正是這種恐懼促使他在1948年刻意向世人散播假消息，宣稱艾希曼從開羅打了電話給他的家人。維森塔爾和一位任職于合眾國際社（United Press）的朋友認為，當時到了“塞給阿拉伯人一個合適的盟友”的時刻。他們于是通過奧地利廣播電臺把消息傳給以色列新聞界，然后從那里傳播到全世界，以便進行“有利于猶太人方面的宣傳”。[[13]](#_13_4)那個行動產生的效果，以及它對之前各種謠言的依賴，充分展現于1948年8月27日紐約《建設》刊登的一篇專文中：

艾希曼在開羅

早在開羅爆發對猶太人的攻擊之前，就有來自維也納的消息指出，臭名昭著的蓋世太保特務阿道夫·卡爾·艾希曼已化名逃往埃及，持假身份證件居住在開羅。艾希曼在從雷根斯堡（Regensburg）附近的一個戰俘營脫逃之后，便消失得無影無蹤。有一天，艾希曼住在林茨（上奧地利）的親屬收到一則消息，令人懷疑那名被通緝的罪犯一定藏在開羅。

根據沃爾夫岡·布雷特霍爾茨（Wolfgang Bretholz）的報道……在開羅恐怖期間，總共有數以百計的猶太人遇害。大屠殺進行得按部就班，顯然經過了長時間的籌劃。

此事很可能與艾希曼脫不了干系。艾希曼出生于特拉維夫附近的薩羅納，操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語，并且深諳阿拉伯習俗，因此能夠不引人注意地冒充阿拉伯人。大家也許還記得，當初正是艾希曼以穆夫提老友的身份，率先在穆夫提與希特勒之間建立起聯系。穆夫提目前定居開羅，而且來自維也納的報道同樣指出，他還為其他昔日的蓋世太保人員安排了住宿和工作。開羅如今已然成為眾多納粹罪犯的避難天堂。

會說意第緒語和希伯來語的艾希曼曾經被視為猶太問題的“專家”，組織了從柏林、維也納和布拉格遣送猶太人的行動，而且是各地死亡集中營謀殺600萬猶太人的罪魁禍首之一。

這種描述所反映出來的，已不只是昔日受害者身上常見的偏執，或者一種親以色列的宣傳技巧。艾希曼從前的若干下屬，例如阿洛伊斯·布倫納，果真走上了被艾希曼用作障眼法的逃亡路線，前往中東。德國新聞界從1952年開始，也再次以艾希曼為著眼點，探討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在埃及所扮演的角色[[14]](#_14_4)，而且這種角色現在已經無可辯駁（雖然還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德國和美國情報部門的報告中也出現類似的指控，一名中東的線人混淆了艾希曼與其他在逃的納粹分子，宣稱他已經改信了伊斯蘭教。[[15]](#_15_4)出現這種猜測的根源在于，沒有人知道艾希曼在哪里，以及他準備逃往何方。正是這種情況讓人焦慮不安，因為人們希望看見他被捕的愿望始終不減。他們追蹤每一條線索，而艾希曼已經巧妙地做好安排，讓其中的一條線索指向了阿拉伯世界。要是沒有這種蓄意誤導的話，維森塔爾的開羅神話就不可能產生這么大的影響。

關于艾希曼已逃往中東的猜測是如此牢不可破，以至于即使在1960年之后，在探討艾希曼的早期著作當中仍然能讀到類似論述。除此以外，其他版本的逃亡故事也不斷涌現，按照其說法，艾希曼在1948年即已離開德國，先去了西班牙或中東地區，最后才終于逃到阿根廷。1959年，有人向德國記者海因茨·魏貝爾-阿爾特邁爾（Heinz Weibel-Altmeyer）“兜售”大屠殺兇手阿洛伊斯·布倫納和阿道夫·艾希曼，這位曾與前任大穆夫提合影的記者聲稱，阿明·阿爾-侯賽尼在訪問中親口表示知道這兩位先生躲在哪里。[[16]](#_16_4)昆廷·雷諾茲（Quentin Reynolds）則在艾希曼被綁架之后報道說，艾希曼起先化名卡爾·布林克曼（Karl Brinkmann）去了敘利亞，跟阿洛伊斯·布倫納和瓦爾特·勞夫（Walter Rauff）待在一起。接著他穿越黎巴嫩、伊拉克、埃及、約旦、北非和沙特阿拉伯，其間使用了埃克曼和希爾特（Hirth）等等假名，最后才途經西班牙和熱那亞逃往布宜諾斯艾利斯。[[17]](#_17_4)這些故事雖然錯得離譜，卻明白顯示出來，相信它們的并非只有納粹政權的受害者。[[18]](#_18_4)

盡管艾希曼的逃亡故事充斥著連篇累牘的錯誤，但值得告慰的是，這些不正確的蹤跡最后還是促成了艾希曼的落網。1959年年底，當主事者們終于發現了艾希曼的確切藏身地點，并且開始籌備從阿根廷綁架他出境的行動時，他們必須先做好一件事情：要讓獵物和他的朋友們誤以為自己是安全的。面臨這個棘手局面，已追蹤到艾希曼下落的法蘭克福總檢察長弗里茨·鮑爾于是在其以色列盟友的配合下，聯手重新散播舊日的謠言。他們借由一系列的報紙文章，對外聲稱艾希曼如今身在科威特。這個策略利用艾希曼自己布下的謊言來抓捕他，最后果真收到了效果。

然而戰爭結束后的最初五年，無論在哪里都找不到艾希曼的蹤跡。但這絕不表示人們沒有竭盡一切手段來尋找他的下落。畢竟報仇的欲望實在太強烈了。復仇小組拿著死亡名單，四處尋找曾經折磨過他們的那些人。湯姆·塞格夫在訪談了若干昔日的小組成員之后，注意到“復仇者的方法很簡單。他們偽裝成英國憲兵，開著一輛軍車出現在復仇目標的家門前，車牌沾滿泥，難以辨識。接著他們敲門確定找到的是對的人，之后便以例行公事為借口，要求對方跟他們走，通常不會遭遇任何抵抗。等到把復仇目標拉到一個事先選好的地點，他們便宣布自己的身份，然后開槍射殺對方”。[[19]](#_19_4)

艾希曼當然也出現在了死亡名單上。熟識大衛·本-古里安和摩西·達揚（Mosche Dajan）的以色列作家米迦勒·巴爾-祖海爾（Michael Bar-Zohar），曾設法在1966年11月訪談了艾希曼追捕小組的負責人。那些人在監視薇拉·艾希曼的時候發現，她經常跟她的小叔一同前往一棟有些偏僻的別墅。他們于是跟蹤她和艾希曼的弟弟前往那棟房子。屋內住著四名顯然不喜歡在光天化日之下露面的男子，因為他們只在晚上才走到屋外，而且他們接受食物補給的方式也十分隱秘。有一天晚上，小組成員在他們誤以為是艾希曼的那個人出門散步時上前攔阻，告訴他他們來自巴勒斯坦。那人傲慢地回答說：“你們根本奈何不了我。”然而他才把話講完，就被一槍打死。[[20]](#_20_4)多年以后，湯姆·塞格夫與曾經是小組成員之一的希蒙·阿維丹（Shimon Avidan）交談。阿維丹告訴他說，當時每個人都相信已經逮到了那名“猶太事務主管”，卻只有阿維丹從一開始就不那么篤定。[[21]](#_21_4)幾年后，艾希曼從奧地利的報紙上讀到相關消息，之后總是帶著一種詭異的自豪談論此次處決行動。

\*\*\*

阿根廷暫時為艾希曼提供了保護。他迄今未被發現的原因，不僅在于藏身地點選擇得十分巧妙，更是因為沒有人想得到，阿道夫·艾希曼會有辦法長年生活在黑暗之中。其同僚與受害者們在他大權在握時所見到的那個機靈、傲慢、虛榮的自賣自夸者，想必會給自己尋覓一個新“任務”，因為隱姓埋名的平淡生活完全違背了他的本性。畢竟，他在捍衛國家社會主義世界觀時展現出的狂熱，讓人無法想象他竟然能夠默默適應新的時代及其法律規范。艾希曼喜歡出風頭和愛表現的欲望早就深深烙印在許多人的記憶中，以至于從1946年開始，便有謠言表示艾希曼已對他那張廣為人知的面孔進行了整容手術，以便改頭換面重新獲得具有影響力的位置。[[22]](#_22_4)尤其是艾希曼年輕時一場摩托車事故在他左眼上方留下的醒目疤痕[[23]](#_23_4)，更激發了別人的想象。[[24]](#_24_3)人們認為艾希曼根本不可能打算一直留在地下。這樣一個自視為“優等民族”的一員而如此逾越人性界限的人，怎么會樂意默默無聞地躲在世界的一個小角落里？阿道夫·艾希曼難道真有辦法停止為他的瘋狂理念繼續戰斗下去？盡管最初幾年，尋找艾希曼的努力總是誤入歧途，然而追捕者心中的懷疑終究被證明是正確的——艾希曼果真沒有辦法。1961年的時候，他在以色列的一間牢房里捫心自問，1945年以后，什么事情讓他最感到痛苦。他的答案直截了當：那就是“個人的隱姓埋名所造成的精神負擔”。[[25]](#_25_3)

[[1]](#_1_4) Meine Flucht, 18.

[[2]](#_2_5) 關于維森塔爾的錯誤判斷，參見Heinz Schneppen, Odessa ..., A. o., 12ff. Guy Walters,Hunting Evil. London, Toronto, 2009, 207ff.

[[3]](#_3_4) 維森塔爾引用來自林茨的報告，而且直到艾希曼被捕很久之后，他仍然對這個藏身之處以及和奧地利的聯系深信不疑。這種說法在他所有的著述和許多注記當中都能找到。亦參見Simon Wiesenthal, Recht, nicht Rache. Erinnerungen. Frankfurt, Berlin 1988, 99.此處引用了他最詳細的陳述，亦即維森塔爾在1954年3月30日寫給納胡姆·戈爾德曼的信件，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

[[4]](#_4_5) 有關奧地利納粹組織的消息來源之一，正是造謠專家威廉·霍特爾。NA, RG 263, CIA Name File Wilhelm Höttl.

[[5]](#_5_5) 來自林茨、關于一名想象力豐富的線人——米特胡伯（Mitterhuber）——所講述故事的報告，已在2010年11月由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B206/1986）向公眾開放。米特胡伯甚至宣稱，艾希曼在美國的資助下領導了一個武裝抵抗小組，以便因應共產黨的攻擊。

[[6]](#_6_5) 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關于“蜘蛛”，亦參見CIC Name File Otto Skorzeny。美國方面同樣也對那些神秘組織的金錢來源做出臆測，并且以為源于蘇聯。Guy Walters, Hunting Evil..., A. o., 207ff.

[[7]](#_7_5) 第25期。該文作者為阿爾弗雷德·費雪（Alfred Fischer），英文版的標題為“Karl Eichmann—Head of Gestapo’s Jewish Section”, Zionist Review, October 4, 1946。

[[8]](#_8_4) 1947年6月1日由黑布勒（R. B. Haebler）撰寫的文章。親納粹作家隨后幾年一再引用該文，試圖借此證明艾希曼本身就是猶太人。

[[9]](#_9_4) Simon Wiesenthal, Großmufti — Großagent der Achse. Salzburg, Wien 1947, 46.

[[10]](#_10_5) Leon Poliakov, “Adolf Eichmann ou le rêve de Caligula” , in: Le Monde Juif, Paris, 4. Juni 1949.刊出的那張照片來自20世紀30年代早期，亦轉載于David Cesarani, Adolf Eichmann ..., A. o.（柏林2004年版的第一張照片）。

[[11]](#_11_3) 薩森抄本22, 1。波利亞科夫轉載的那張照片雖然畫質粗糙，但并沒有經過修飾。

[[12]](#_12_3) Jüdisches Gemeindeblatt für die Britische Zone, 23. Juni 1948.到了1948年年底，維也納《世界晚報》的一篇專文更引發一連串的密集報道，例如其中一篇的標題為《阿拉伯軍團的成員之一》（“Einer von der arabischen Legion”），見《南方信使報》，1948年10月2-3日。

[[13]](#_13_3) 湯姆·塞格夫在他的維森塔爾傳記里描述了這個情節，并引用了維森塔爾在1948年6月22日寫給亞伯拉罕·席爾伯施恩（Avraham Silberschein）的信件。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A. o., 144.

[[14]](#_14_3) 例如Frankfurter Rundschau, 22.3.1952: “Massenmörder als Militärberater”; Die Gegenwart,April 1952 und AWJ, 18.4.1952: “SS-Generale im Nahen Osten”; AWJ, 25.4.1952: “Der deutsche Soldat im Mittleren Osten”; Welt am Sonntag, 23.11.1952: “Deutsche ‘Berater’in Kairo schüren gegen Bonn. Ehemalige SS- und SD-Führer in Verbindung mit Nagib und Mufti”.

[[15]](#_15_3) 參見BND的錯誤報告，其根據的是賽義達·奧特納關于艾希曼已在1947年抵達敘利亞的聲明。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亦參見BND在1958年3月19日向CIA提交的報告“New Eastern Connections”（迄今僅出現在CIA Name File Eichmann）。在真正皈依伊斯蘭教且與身處阿根廷的艾希曼保持聯絡的納粹當中，最著名者為約翰·馮·萊斯。就阿洛伊斯·布倫納而言，有證據表明他果真去了敘利亞。

[[16]](#_16_3) 關于背景細節的系列文章，參見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 A. o., 177。

[[17]](#_17_3) Quentin Reynolds u.a., Adolf Eichmann ..., A.o., 189ff.

[[18]](#_18_3) 這個錯誤可能是因為雷諾茲弄混了奧托·斯科爾策尼和瓦爾特·勞夫，因為后者的確選擇了這些逃生路線。雷諾茲的資料來源是花錢從海因茨·魏貝爾—阿爾特邁爾那里買來的采訪記錄，被采訪對象自稱是第三名合作伙伴，“福阿德·納迪夫”（Fuad Nahdif）。

[[19]](#_19_3) Tom Segev, Die siebte Million. Der Holocaust und Israels Politik der Erinnerung. Reinbek b.Hamburg 1995, 202.

[[20]](#_20_3) Michael Bar-Zohar, The Avengers. New York, 1970, 65ff.巴爾—祖海爾率先認識到弗里茨·鮑爾所起的真正作用，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消息非常靈通。他那本書被翻譯成多種語言，但沒有德文版。

[[21]](#_21_3) Tom Segev, Die siebte Million ..., A. o. ..., 203.塞格夫采訪了在華沙起義中幸存，并且在戰爭結束前即已建立復仇力量的阿巴·科夫納（Abba Kovner）。相關背景資料首見于米迦勒·巴爾—祖海爾的《復仇者》，而且他親自采訪過暗殺小組的成員。

[[22]](#_22_3) Vgl. den o. g. Artikel “Von Karl Eichmann fehlt jede Spur” in Der Weg, 16.8.1946 von Alfred Fischer.

[[23]](#_23_3) 1932年的一次事故造成艾希曼顱骨骨折、鎖骨骨折，以及前述他眼睛上方的傷痕。這些車禍遺跡在1960年被摩薩德用于確認被綁架者的身份。但與一般猜測不同的是，他臉部明顯的不對稱并非此次意外造成的結果，因為從艾希曼及其手足的兒時照片即可看出，他們都具有這個顯眼的臉部特征。

[[24]](#_24_2) 艾希曼做過整容手術的謠言出現于20世紀40年代末期，隨后幾年并偶爾見于通俗文章中。維森塔爾在1954年3月30日寫給納胡姆·戈爾德曼的信中提到了此事（NA, RG 263,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認得艾希曼的本亞明·愛潑斯坦（Benjamin Epstein）在針對艾希曼被捕一事接受訪問時，也傳播了這個謠言。Neues Österreich, 26. 5. 1960,“Massenmörder Eichmann hatte sein Gesicht operieren lassen”.一直要等到艾希曼被捕后的照片公布，證明實情并非如此之后，謠言才逐漸平息。艾希曼后來在以色列指出，他在南美洲遇見的某些納粹不只是改了名字而已—但這也可能是他一貫喜歡故弄玄虛和炫耀內幕消息的作風。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2 Fragebogen für Paris Match.

[[25]](#_25_2) Götzen, 589.

# 第三章 艾希曼在阿根廷

薇拉，你必須這樣想：假如戰爭期間的許多炸彈中，

有一顆把我帶走了，那將會如何呢？

命運給了我們這么多額外的歲月，

我們必須為此感謝它。

——阿道夫·艾希曼寫給妻子的訣別信，1962年5月31日

## 第一節 在“應許之地”過生活

1950年7月14日，“喬凡娜C”號載著第三帝國的貨物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港口，阿道夫·艾希曼首次踏上了阿根廷的土地。時隔多年之后，他依然清楚記得當時的感覺：“我心中充滿了喜悅。對被揭發的恐懼頓時煙消云散。我已經到了那里，并且獲得了自由。”[[1]](#_1_7)他關于該時期的評論，簡直讓人覺得那出自一個迷途知返的浪子，而非一名剛剛踏入陌生世界的亡命之徒。在艾希曼的記憶中，完全沒有出現其他移民出境者（尤其是那些使用偽造旅行證件的人）通常必須面對的不確定感，或者充滿期待的好奇心。畢竟他比大多數人都要輕松多了，不但與老同志們一同旅行、在港口得到更多愿意幫忙的人的歡迎，而且立刻被流亡者社區接納。艾希曼最初的下榻地點是一家小旅館，那里通常被用來接待新抵達的納粹分子。8月3日，艾希曼提交自己的證明文件，申請了阿根廷的個人身份證件：如今他比實際歲數年輕七歲、用西班牙文拼字法（只有一個c）改名為里卡多·克萊門特（Ricardo Klement），1913年5月23日出生于博岑（博爾扎諾），未婚，信仰天主教，職業為機械技師，而且無國籍。沒過多久，曾在1948年協助艾希曼辦理證件的德裔阿根廷人口走私犯奧爾斯特·卡洛斯·福爾德納，又幫他在市內富裕的佛羅里達區找到一棟公寓。艾希曼搬去和另外一位新阿根廷人費爾南多·艾夫勒（Fernando Eifler）同住。在一家金屬加工廠的過渡性工作，讓艾希曼很快就能維持生計。艾希曼的上司是一位工程師，先前擔任過黨衛隊上級集團領袖漢斯·卡姆勒（Hans Kammler）的專業顧問。卡姆勒主管黨衛隊的建設與公共機關部門，也負責集中營和滅絕設施的建造。[[2]](#_2_8)那位工程師甚至允諾繼續雇傭艾希曼，但艾希曼和其他許多德國逃亡者一樣，早就著眼于更好的前景。艾希曼后來講述：“一天，有一位前任武裝黨衛隊二級突擊大隊長與我聯系，告訴我‘組織’已幫我找到了一個職位。一家由阿根廷人和德國人共同領導的新公司，將在該國北部安第斯山腳下的圖庫曼市建造一座水力發電站來改善電力供應，而我將擔任管理職位，做領導組織方面的工作。”[[3]](#_3_7)那家新公司剛好注冊登記于艾希曼抵達一星期之后，名字簡稱為CAPRI - Compañia Argentina para Proyectos y Realizaciones Industriales，Fuldner y Cía（阿根廷工業規劃及執行公司，福爾德納公司）。根據烏基·戈尼的報告，阿根廷人把當時一首德國流行歌《卡普里漁夫》（Capri-Fischer）拿來開玩笑，將卡普里（CAPRI）公司貶稱為“Compañia Alemana para Recièn Immigrad”（為新移民開設的德國公司）。[[4]](#_4_8)事實上正如人們所猜測的，那是一家得到庇隆支持，專為第三帝國技術專家而設的化名公司，其設立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承接發展大型水力發電站的政府合同，同時也被用于新移民的就業輔助方案，即便他們當中只有極少數人具備相關工作資格。[[5]](#_5_8)

艾希曼在一個勘測隊的項目辦公室工作。隨后幾年，那個團隊在僻遠的圖庫曼省雇用了多達300名員工。對這樣的一家公司來說，圖庫曼不只是具有優越的地理條件而已。直到1955年為止，該省一直由費爾南多·列拉（Fernando Riera）和路易斯·克魯斯（Luis Cruz）等庇隆主義黨成員統治。這個當時已有70多萬人口的省份位于阿根廷西北部，一直延伸到安第斯山脈東麓。其自然景觀從安第斯支脈地區的稀樹草原先是轉變為丘陵地，然后變為起伏的山區。除了亞熱帶氣候以及夏季在25度左右、冬季在14度上下的氣溫之外，那里的許多方面都讓艾希曼回想起在奧地利的時光。然而當地的生活條件遠不如他的家庭在林茨所處的中產階級生活優渥。圖庫曼的主要產業是甘蔗種植，而水力發電旨在把高科技帶往那個降水量充沛的地區。當地的生活環境雖然簡單，卻并不簡陋。艾希曼起初住在該省南部、項目辦公室的所在地拉科查（La Cocha），公司為他在那里租了一棟房子，還安排了兩名女管家。[[6]](#_6_8)那種生活一點也不與世隔絕，因為前往1200公里外的首都，也屬于艾希曼新生活當中的一部分。每當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停留的時候，科爾多瓦大道374號（Avenida de Córdoba 374）的辦公室里面都有一張寫字桌供他使用。前黨衛隊旅隊領袖漢斯·菲施伯克（Hans Fischböck）也在同一棟建筑里上班，比艾希曼高一層樓。菲施伯克曾任納粹在奧地利的財政部部長，在系統化搶劫猶太人財產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7]](#_7_8)除此之外，與艾希曼重逢的老熟人應該比我們今日所知道的還要多出許多。例如貝特霍爾德·海利希也通過卡爾·克林根富斯在“卡普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海利希在此之前還曾求助于希姆萊昔日的首席副官和阿根廷最高階的納粹分子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以及幾年前擔任里加（Riga）猶太人隔離區負責人的愛德華·羅施曼（Eduard Roschmann）。[[8]](#_8_7)在那些移民圈子里面，找到正確人物的門道根本不是秘密。克林根富斯曾經任職于納粹德國外交部的“猶太人事務處”，之后直到1967年都擔任德國阿根廷商會的負責人。艾希曼在薩森訪談會上直截了當地稱之為“埃伯哈德·馮·塔登（Eberhard von Thadden）的代表”。[[9]](#_9_7)克林根富斯曾參與了遣送一萬名比利時猶太人的行動——盡管他在戰后聲稱，自己正是為了此事而主動申請調職。克林根富斯是納粹宣傳家約翰·馮·萊斯的好友，當然不但清楚艾希曼是何許人也，而且知道艾希曼長什么模樣。[[10]](#_10_8)

艾希曼后來在薩森訪談會上，親口說明了他1952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與埃里克·拉亞科維奇（Erich Rajakowitsch）重逢的經過。那人是艾希曼昔日的密切合作伙伴，在1938年由他親自為維也納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招募。作為一名律師，拉亞科維奇在榨取猶太人旅行護照的商業利益方面有著杰出表現，是艾希曼那個部門所急需的理想黨衛隊隊員和法律專家。[[11]](#_11_6)艾希曼的眼光非常正確，作為艾希曼派駐荷蘭的“猶太事務顧問”，拉亞科維奇曾共同負責將大約十萬人“成功地”遣送出去。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街頭講德語的人顯然為數不少。[[12]](#_12_6)

艾希曼在圖庫曼也遇見了老同志和昔日熟稔的同僚。例如圖庫曼項目的科學總監阿明·蕭克利契（Armin Schoklitsch），曾任格拉茨工業大學的院長、黨衛隊隊員和保安局線人。這個如今重返平民之身的科研工作者，并非唯一來自施泰爾馬克的逃亡者。昔日施泰爾馬克省黨部領導的若干成員，如今也在圖庫曼工作。納粹黨布倫瑞克省黨部的領導人貝特霍爾德·海利希和其他一些普通黨衛隊人員也在那里找到了新家。[[13]](#_13_6)海利希的孩子們一直還記得艾希曼——他們的父親偶爾會與艾希曼共飲啤酒，共同商討未來的計劃，但海利希在“卡普里”的職位一直比不上艾希曼。[[14]](#_14_6)昔日林茨省黨部領導人的秘書赫伯特·哈格爾也在當地工作。他曾在1944-1945年的時候，參與將從匈牙利猶太人那里掠奪來的財物運送到阿爾陶塞。哈格爾后來在1999年的一次采訪中公開指出，他曾經在圖庫曼向艾希曼問起被殺害猶太人的真正數目。艾希曼順口回答說：“我不知道死了多少人——頂多50萬人吧。”[[15]](#_15_6)

在這個情節中，比艾希曼謊稱的數字更饒有趣味的地方是：他此時顯然已經開始以他的真實身份亮相。他之所以可以那么做，是因為周遭的人們無論如何都會重新認出他來。像哈格爾之類的人便清楚，如果想要更加了解滅絕猶太人的細節，以及受害者數目，艾希曼正是不二人選。艾希曼作為幸存的謀殺細節知情者，他的名聲甚至在本人抵達之前就已經傳到了阿根廷。另外一位“卡普里”的員工海因茨·呂爾（Heinz Lühr）需要跟那批第三帝國的重要人物打交道，但是沒能融入他們的圈子，他將圖庫曼的“卡普里”社區描述為一個“每個人都藏起自己的過去的地方”。可是艾希曼寡言少語的態度引發了他的好奇心，問了太多問題，結果蕭克利契太太把他拉到一旁，告誡他說：“呂爾先生，您就不必再提從前的事情了，那個人一生當中遇到的麻煩已經夠多了。”[[16]](#_16_6)這個圈子里的人在藏匿自己的過去時并非孤軍奮戰，而是心有靈犀地相互提供保護，提防過于好奇但對他們一無所知的人。對茍延殘喘的大屠殺兇手來說，“卡普里”是理想的避隱之處。

艾希曼在船上同行的赫伯特·庫爾曼是“卡普里”項目的設備管理人，并在公司內得到迅速晉升。艾希曼自己的工作要靠搜集水位資料完成，而這意味著要與一群男性在馬背上長距離跋涉。總有人帶著照相機，而艾希曼對照相已不再回避。他寫道：“圖庫曼成為一段幸福的時光。我同時也有機會追求我最大的樂趣之一：騎馬。出外跋涉的時候，我要在馬鞍上度過許多個小時。”[[17]](#_17_6)艾希曼無拘無束地在鄉間、在纜車中，甚至在馬背上擺姿勢，他披著斗篷在同事們的簇擁下合影，在阿根廷最高峰前方的高原登山，身穿白衣在雨中工作，在艷陽高照下騎著灰馬馳騁——那一切與香煙廣告中的情景幾乎難分軒輊。阿根廷的生活消除了艾希曼對于被看見和被揭發的恐懼。他非常喜歡自己的新生活，以及周遭人們對他的認可。

“管理專家”的職位不僅意味著率領一隊人馬進行田野測量，同時也需要定期造訪圖庫曼大學。艾希曼有一些更專業的難友在此任職，同時也遇見了新的朋友，例如何塞·達爾馬寧（José Darmanín）教授。[[18]](#_18_6)達爾馬寧直到1993年都還記得那名定期把測量數據交給其同事蕭克利契，并且用“杰出的法語”講述風土民情的男子。艾希曼顯然沒有荒廢自己引別人注意的本事，再度成功地將些許語言能力拿來炫耀賣弄。他雖然小時候在學校上過法語課，實際上卻講不了幾句話，而且根本聽不懂多少法語。[[19]](#_19_6)艾希曼無疑也曾利用這個功夫，盡可能快速地學習西班牙語，他渴望融入那個國家。1950年10月2日，又一次在“我的朋友們”的協助下，他獲得了第一張阿根廷身份證件和永久居留資格。[[20]](#_20_6)阿根廷的熱情好客給艾希曼留下了深刻印象。作為一名納粹黨人，他并不習慣有國家如此對待外來者。

### 里卡多叔叔的圣誕賀卡

老朋友和新朋友、一個新身份、一份工作和財務上的穩定，這一切都構成了采取下一步動作、恢復舊日生活的先決條件。艾希曼在圖庫曼找了一棟房子，并且給奧地利寫了一封信。他后來回憶說：“距離我告別妻子和三個兒子已經過去了六年的時間。我不得不把他們留在祖國阿爾卑斯山區的那個湖畔小鎮。我沒有忘記，別人為了找出有關我下落的蛛絲馬跡，會對他們進行嚴密監控。不過如今或許已經到了冒險聯絡他們的時候。通過同樣由‘組織’建立起來的一種連環交換（Ringtausch）體系，我和妻子能夠互相寫信給對方。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納粹黨高層人士更在1952年做出安排，由德國的特定聯絡人為我妻子提供前往南美洲所需的旅費。”[[21]](#_21_6)

艾希曼在以色列寫下的這些字句，暗示存在著一個星羅棋布的網絡，其業務范圍已遠遠超出單純的溝通交流。來自德國的大批難民不僅創造了郵遞業務，還形成了自己的旅行社、轉賬渠道、社會福利機制，并且針對各種證件問題提供服務。

幫助逃亡在阿根廷也是一本萬利的生意，許多移民者主要就靠它來維持生計。例如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希特勒旗下最高騎士十字勛章獲得者，以及在全世界都備受尊崇的空戰英雄[\*](#_379)——于1948年6月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不久后便加入了這個行業。魯德爾和康斯坦丁·馮·諾伊拉特等人共同創辦了“同志工作會”。諾伊拉特是法學博士，與他父親同名。父親是在紐倫堡審判中被判刑的戰犯和德國前外交部部長。同志工作會是一個法律協助和急難救濟基金會，向那些因第三帝國沒有獲得“最終勝利”而地位一落千丈的人伸出援手。服務項目包括遞送包裹、安排匯款，以及代為處理法律事宜等等。魯德爾與阿根廷總統庇隆維持著親密的友誼，而且能夠提供專業知識幫助建設阿根廷空軍，這讓他的業務開展起來更加容易，而且能夠獲得政府的合同和進口許可。諾伊拉特一路晉升至西門子阿根廷分公司的負責人，利用這個職位繼續幫助他的老同志們。[[22]](#_22_6)其他人則各盡所能，承擔郵遞職責或者解囊相助。

魯德爾迅速聯絡上了阿根廷最成功的德國網絡，所謂的“杜勒之家”（Dürer-Haus）。在它背后隱藏著一個復雜的多級組織，領導人是1921年出生于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德國僑民埃伯哈德·弗里奇。弗里奇是一個激進的國家社會主義者，雖然他從來沒有機會把自己的信念轉化成犯罪行為，而只能在阿根廷經歷國家社會主義的興亡。弗里奇僅去過德國一次，而且是為了參加1935年在柏林市郊一個巨大露營地舉辦的“希特勒青年團世界大會”。當時希特勒政權建立未久，仍想擺出對世界開放的姿態。[[23]](#_23_6)我們可以想象，納粹舉辦的這次宣傳活動，給時年14歲的阿根廷希特勒青年團領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不過弗里奇沒有參加戰爭，而是回到世界的另一端繼續上學，之后在腓特烈小學擔任德語教師。在1946年開始建設杜勒旗下的事業之前，他已經有過主編一本青少年雜志的經驗。[[24]](#_24_5)在資助人的幫助下，弗里奇買下一家德文書店的剩余部分，開設了一間同時作為借閱圖書館、舊書店和工藝品店的商鋪。[[25]](#_25_5)但最重要的是，那里對滯留海外、思鄉情切的納粹來說，是一個理想的聯絡點。

這些方面的業務隨著弗里奇創辦出版社而繼續擴大。杜勒出版社隨之變成了新來者的聚集地，一些人甚至可以擔任“編輯”來賺錢，直到更好的工作機會出現。例如漢斯·黑弗爾曼（HansHefelmann），擁有博士學位的農業專家、“兒童安樂死”（Kinder-Euthanasie）的組織者之一，以及“精神病患者”（Geisteskranke）判定委員會的負責人，便在這里找到了工作。黑弗爾曼日后在親自出庭受審時宣稱，他來到杜勒出版社純屬意外，以致參與發行了“戰后全世界最具破壞性和犯罪性”的出版物。這么看來，不久之后格哈德·博內（Gerhard Bohne）目標明確地去那里敲響大門并成為編輯一事，想必同樣“純屬巧合”。博內曾擔任“T4中央辦公室”（Zentraldienststelle T4）的主任，該辦公室按計劃謀殺了七萬人，那些人正是黑弗爾曼的“全國委員會”從各地醫療與護理機構篩選出來的。[[26]](#_26_4)

弗里奇不僅吸收被迫離開德國的罪犯，還有目標地積極爭取納粹的“同路人”（Mitläufer），也就是那些雖然能夠繼續留在德國，卻再也無法發表作品的著名極右派作家。弗里奇的方法很簡單：寫信給他們。今天還能在那些過氣作家在德國各地檔案館留下的遺物當中找到弗里奇的招徠信件。他在信中把自己描繪為一個具有政治雄心的團體的發言人，以此激起對方的興趣，并強調只想為自己的出版社爭取最杰出的人士，從而維護“德意志民族精神”。弗里奇進而奉承他們：“時至今日，幾乎再也聽不到昔日那些美好的名字了。當務之急莫過于使之重新膾炙人口。”[[27]](#_27_3)弗里奇同時還技巧十足地附上他已經聯絡過的其他作家所寫的各種推薦[[28]](#_28_3)，挑起那些希特勒樣板作家們的好奇心。維爾納·博伊梅爾堡（Werner Beumelburg）曾向他的同行、《沒有生存空間的民族》（Volk ohne Raum）的作者漢斯·格林（Hans Grimm）問起弗里奇，格林回答說：“像他那樣待在外面的人，似乎不僅是老黨員，更是有脊梁的德意志人。”[[29]](#_29_3)弗里奇于是成為被這些作家寄予厚望的對象，積極地不斷收集地址。此外，弗里奇還能夠提供與眾不同的東西，那就是《路徑》——該雜志從20世紀40年代末期開始，已成功地在德國新聞界引發畏懼，讓人對“第四帝國”即將到來和阿根廷的強大納粹勢力擔憂不已。對堅定不移的國家社會主義者來說，這份刊物以其納粹意識形態和最駭人聽聞的人種理論，以及夾雜著阿爾卑斯媚俗文藝、圣誕節情懷與日耳曼浪漫主義的“褐色鄉愁”，具有一種令人難以抗拒的吸引力，就跟帶有納粹卐字標志的蕾絲花邊桌巾沒什么兩樣。[[30]](#_30_3)

極右派的作家都巴不得能夠為《路徑》撰稿。威爾弗雷德·馮·奧芬雖然已成為杜勒出版社的作者，卻始終找不到進入《路徑》雜志的門路，于是滿懷憧憬地贊嘆：“這份世界聞名的新國家社會主義雜志具有公認的高水準。誰會不希望成為其寫作團隊的一員，躋身諸如維爾納·博伊梅爾堡、漢斯·弗里德里希·布隆克（Hans Friedrich Blunck）、赫伯特·伯內（Herbert Böhne）、漢斯·格林、斯文·赫定（Sven Hedin）、米爾科·耶盧西希（Mirko Jelusich）、漢娜·萊契（Hanna Reitsch）、威爾·費斯佩爾（Will Vesper）、安東·齊施卡（Anton Zischka）等等杰出作家之列呢？那還只是……最重要的一些名字而已。可惜我從來無緣登上這座第三帝國的帕納塞斯山（Parnass）。”[[31]](#_31_3)艾希曼將在那里變得更加成功。

除了對右派民族主義論調的迷戀之外，讓弗里奇產生如此巨大吸引力的，還有更具體的原因：他提供報酬。他寄出的詢問信函甚至往往都會附上一個“家樂牌包裹”（Knorr-Paket）“聊表心意”。杜勒出版社主要以食品包裹而非貨幣形式支付海外作者的報酬，甚至受到許多人的歡迎：他們只學會了寫“血與土文學”（Blut-und-Boden-Literatur），因此在被禁止教學和出版著作的情況下，名副其實地不知該如何維持生計。讓他們填飽肚子的食品包裹卻并非來自想象中無所不能的O.D.E.S.S.A.，而是由E. R. O. S.愛心郵包服務社（E. R. O. S.-Liebesgaben-Dienst）交付的。[[32]](#_32_3)

起初，弗里奇也通過明愛會（Caritas）、瑞士巴塞爾的Pax救濟機構（Hilfswerk Pax），以及基督徒互援會（Christliche Hilfe）來發送包裹，但后來則是由那家總部設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雷孔基斯塔大街680號（Reconquista 680）的企業獨占鰲頭。E. R. O. S.旅行社所在的位置恰巧鄰近“卡普里”和奧爾斯特·卡洛斯·福爾德納的銀行辦事處，這絕非偶然，我們有充足的理由把它稱作一個“納粹機構”。[[33]](#_33_3)E. R. O. S.的經營者是海納·科恩（Heiner Korn），他曾經領導納粹黨在阿根廷的海外分部，是該分部第一任領導——法本公司（IG Farben）海外分公司負責人海因里希·福爾貝格（Heinrich Volberg）的繼任者。[[34]](#_34_3)科恩曾在《路徑》上大打廣告。弗里奇和科恩因為共同為納粹黨工作而相互熟識，如今互為匿名合伙人。科恩直到老年都還繼續經營著他的公司[[35]](#_35_3)，打造了一家同時兼具銀行、匯款機構、救援組織、旅行社和郵遞服務的企業，既能隨機應變又十分靈活。其存儲“慈善”援助用品的中央倉庫位于杜塞爾多夫，但他們在瑞士也設有前哨基地，用于來回發送手稿和贈送本。[[36]](#_36_4)通過這種方式，弗里奇能為他的作者們提供不少東西：除了咖啡、可可、罐頭肉、油脂和巧克力等供不應求（而且也是黑市通貨）的稀缺商品之外，還有皮鞋與定做的西裝。同時也有聯絡人提供匯款服務，訂閱戶可以把款項直接匯到作者的戶頭。因此杜勒出版社的自由撰稿人們寄來的感謝函也相應地充滿了熱情，雖然偶爾也會因為轉運站收取額外費用而出現投訴。縱使在最好的納粹圈子里面，人們似乎也喜歡從別人的困境中盤剝獲利。

艾希曼在阿根廷的新家園，一切都顯得充滿可能。《路徑》為必須外逃的人們提供了非常實用的路線指南，宣傳介紹了旅行社、同志工作會與法律援助、它自己的尋人服務，以及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各種聯系地址，從ABC餐廳一直到專門銷售高品質德國制品的專門商店。當然，那里也有“地道的德國服務”。

弗里奇最大的幸運，是在1948年遇見了荷蘭籍黨衛隊戰地記者威廉·“威姆”·薩森。弗里奇不僅租了一間房屋給薩森及其妻兒[[37]](#_37_3)，而且立刻為自己的出版社簽下了那個充滿魅力、天賦非凡、善于自我表現的人。薩森具備海外老派作家們所欠缺的功夫，能夠以一種風格清新、現代感十足的德文寫作，讀來讓人精神為之一振。薩森使用各種不同的筆名，還為昔日的納粹要員捉刀代筆，幾乎單槍匹馬地將杜勒出版社的銷量提升到難以置信的高度。當他應弗里奇的要求，協助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寫作他的第一本書《盡管如此》（Trotzdem），并擔任他的司機的時候，這個年輕又雄心勃勃的三人組合終于完整了。[[38]](#_38_3)魯德爾、弗里奇和薩森，帶著他們大相徑庭的接觸對象，構成了一個聯系緊密的團體。其凝聚力來自個人的好感、共同的國家社會主義世界觀，以及對利潤的追求。這個團體存在的時間甚至超過杜勒出版社，他們共同參與的項目還包括日后為艾希曼辯護。

空軍英雄魯德爾打開了通往世界各地重要聯系人的大門，并且借由向落難的同志提供法律援助，繼續維持與德國的聯系；出版商弗里奇提供自己的出版社用作避難所和聯絡站；薩森則用他那蠱惑性的語言為“褐色懷舊感”發聲，喚醒了對國家社會主義復興的希望。極右派德國移民獲得了從奧爾斯特·卡洛斯·福爾德納一直到庇隆總統的阿根廷最高階層人士的支持，有強大勢力在旁撐腰，無怪乎他們在接下來幾年大大高估了自己的政治影響力。

1950年的時候，《路徑》在聯邦德國的訂閱人數就已經達到了五位數。由于大部分的銷售業務已經在前一年遭到禁止，弗里奇因而委托他的一位作者胡安·馬勒——出生于漢堡附近的哈爾堡（Harburg bei Hamburg），原名萊因哈德·科普斯的納粹黨人——按照秘密情報機構的方式來重建發行網絡。通過這種方式創建了各種不再依賴官方郵政服務的分銷方法，這意味著再也不會遭到壓制或監控，而且派送的速度更快。我們現在知道德國有兩個配送中心，而且聽起來格外熟悉：分別位于呂訥堡和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39]](#_39_3)若考慮到在1953年的時候，這個網絡就有辦法定期向聯邦德國的1.6萬名非法訂戶和南非的2500名非法訂戶派送，即可看出它的運轉有多么高效。只可惜埃伯哈德·弗里奇在20世紀60年代已經交代他的妻子，把手寫的訂戶姓名卡片全部拿去生火燒了。[[40]](#_40_3)

在魯德爾的《德國和阿根廷之間》（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Argentinien）一書中，可以間接找到艾希曼所謂的那個“小圈子”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書中寫道：在阿根廷，“與故國的聯系既頻繁又活躍，因為幾乎每個星期都會有熟人前往歐洲，同樣幾乎每個星期都有人‘剛從德國回來’。”[[41]](#_41_3)弗里奇和魯德爾善于讓人們對他們產生依賴，那些旅行者顯然很容易就被說服，除了自己的行李之外再多帶一些東西。對于艾希曼之類的人來說，自己的履歷使他們再也回不了德國，于是像E.R.O.S.那般掌握在可靠同志手中的企業和那些自告奮勇當信差的人，便成了向家里寄信和送錢的唯一可靠途徑。艾希曼也利用了這個網絡，因為它是迄今為止最健全的一個。艾希曼曾經為“卡普里”和奧爾斯特·卡洛斯·福爾德納工作，威廉·薩森有時顯然也為他們效勞。[[42]](#_42_3)接下來的幾年，埃伯哈德·弗里奇周圍那些人將在艾希曼的阿根廷生活中一再發揮重要作用。[[43]](#_43_4)他們相互之間極為信任，以至艾希曼在1952年委托弗里奇代為關照他心中最珍視的東西：他的家庭。艾希曼不必獨自臨時想辦法建立與妻子和孩子們的聯系，有許多現成的組織結構可以代為效勞，而艾希曼顯然清楚地知道該如何運用它們。

1950年圣誕節的時候，阿爾陶塞的薇拉·艾希曼收到了一則消息：“雖然大家都以為你孩子們的叔叔已經去世，但他其實還好端端地活著。”[[44]](#_44_4)從那時起，薇拉開始向孩子們講述她自己版本的救贖故事：遠方有一位叔叔養了一匹名叫“勇士”（El Bravo）的馬兒，他們有朝一日肯定會過去拜訪他。我們可以推測那封信是她在林茨的公公轉交給她的，因為正如阿道夫·艾希曼所懷疑的那樣，仍有各式各樣的人物在嚴密監視他的妻兒。自迪特爾·維斯利策尼和威廉·霍特爾在1945年年底的審訊中告訴防諜隊，艾希曼的家人住在阿爾陶塞地區之后，薇拉·艾希曼就習慣了搜家調查和持續不斷的監視。起初還只有盟軍的代表，但其他獵人們很快也跟著過來探查。阿舍·本-納坦所委派的一名“羅密歐”探員，亨里克·“馬努斯”·迪亞曼特（Henryk “Manus” Diamant），非但從艾希曼的一名情婦那里弄來了這名通緝犯的第一張照片，而且在追蹤線索的過程中接近了艾希曼的妻子和小孩。最晚從1947年開始，在西蒙·維森塔爾阻止了薇拉·艾希曼宣布丈夫死亡之后，監視行動便從來沒有停止過。他們一家人在1948年7月遷居到阿爾陶塞行政區下地方更小的菲舍恩多夫，讓秘密監視行動變得更不容易。[[45]](#_45_3)20世紀40年代末期的圣誕節追捕行動無法瞞過任何人。那個小聚落太過一目了然，根本隱藏不了任何事情。[[46]](#_46_3)若直接從阿根廷寄信到那個小村子，完全就是跟自己過不去，更何況刑偵警員瓦倫丁·塔拉會定期詢問郵差。[[47]](#_47_3)而林茨則是暗中交換信息的理想地點，尤其是艾希曼的家人在市內的主要購物街上開了一家電器行；相形之下，在小小的阿爾陶塞，任何來訪的陌生人都會受到密切關注。由于艾希曼的父親那時已將兒子安全抵達阿根廷的好消息告訴了他住在萊茵蘭的兄弟，我們同樣可以篤定地認為，這個令人高興的圣誕節信息最初也是傳到林茨。[[48]](#_48_3)

薇拉·艾希曼這一回也極度小心行事，刻意沒有向孩子們透露全部的真相，免得他們不小心說漏了嘴。畢竟孩子們已經多次向她談起“一些友善的先生們”。克勞斯·艾希曼時隔多年之后仍然記得：“他們送巧克力和口香糖給我們吃，想要知道父親在哪里。”[[49]](#_49_3)當瓦倫丁·塔拉向時年九歲的迪特爾問話時，那個男孩不經意地順口散播了一個精心炮制出來的假情報：“他告訴我說，他們即將前往德國北部的一座莊園，然后他會重新有一位父親。那位住在北德的叔叔將送給每個男生一匹馬兒來騎，而且他們會變得非常有錢。”[[50]](#_50_3)薇拉·艾希曼必須為他們的旅程做好準備，她的丈夫則早已安排妥當，確保他們能夠得到必需的金錢和幫助，從而拿到相關的證明文件。她再度依靠艾希曼家族的奧援。塔拉注意到：“艾希曼在林茨開電器行的弟弟來得更頻繁了。”[[51]](#_51_3)

1952年2月12日，薇拉·艾希曼在德國駐維也納大使館領到了她和孩子們的臨時旅行護照，因為她有辦法出示他們的“祖籍證明”（Heimatschein）。這種文件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在德國和奧地利都被用作籍貫證明，表示持有者曾在某個特定社區享有公民權。祖籍證明直到今天都還被承認為取得德國國籍的依據。[[52]](#_52_3)薇拉·艾希曼自1935年結婚以來，便有權獲得丈夫出生地即索林根的籍貫資格，她的婚生兒子們也享有同等權利。她在申請臨時護照時向德國大使館出示的是1952年1月2日由科隆地區主管當局核發的祖籍證明。由于她不曾親自前往科隆，這想必也是由“組織”提供的“服務”之一。他們一家隨即在1952年夏天，以最不引人注目的方式消失得無影無蹤。密切關注他們的刑偵警察塔拉后來報告說：“艾希曼太太沒有向警方辦理戶口遷出手續、沒有注銷糧食配給券，更沒有去巴特奧塞（Bad Aussee）的學校為克勞斯·艾希曼辦理離校證明，因為她不想告訴任何人新的住址。房租也繼續支付。”到1953年1月1日，塔拉總算獲得了更詳細的信息。他寫信給西蒙·維森塔爾：“我在一個鐘頭以前獲悉，薇羅妮卡·利布爾-艾希曼似乎已經在1952年7月帶著兒子們移居南美洲。”[[53]](#_53_3)離開阿爾陶塞地區而不引人注意，并非一件簡單的事情。然而，這一家人卻像艾希曼在兩年前所做的那般，以精湛的技巧完成了驚人的逃亡壯舉。薇拉·利布爾與她的三個兒子克勞斯、霍斯特和迪特爾，拿著阿根廷駐羅馬大使館核發的簽證，用真名從維也納經熱那亞前往阿根廷。[[54]](#_54_3)

2011年年初以來，我們已經知道艾希曼一家的旅行準備工作并非完全沒有受到注意。1952年6月24日，他們在意大利登船之前不久，曾有人向德國聯邦情報局的前身蓋倫組織報告：“黨衛隊旗隊長艾希曼并不在埃及，而是化名克萊門斯（Clemens）待在阿根廷。阿根廷德文報刊《路徑》的總編輯知道艾希曼的地址。”[[55]](#_55_3)不同于情報機構之前收到的有關艾希曼“置身大馬士革或埃及”的消息，這回關于阿根廷的報告精確得令人難以置信，即使到了今天，仍然能夠讓我們從中發現一些值得注意的內情。此情報明顯不是來自阿根廷的線人，因為如今我們知道，報告中所指稱的官階是錯誤的。雖然在1944年年底時，艾希曼曾得到許諾，即將被晉升為黨衛隊旗隊長，他的下屬甚至曾經為此舉辦過慶祝會，可是他再也無法得到那個官階了。“黨衛隊旗隊長”一詞雖然僅在法庭的判決書中出現過，但由于紐倫堡審判的判決過于著名，因此這個信息已經傳遍了整個歐洲。[[56]](#_56_4)而艾希曼在阿根廷自我介紹時，使用的卻是與其變態名聲聯系在一起的那個官階：他是來自猶太事務部門的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艾希曼，他在為新老同志們寫贈言時也如此自稱。他堅持使用曾經連續四年讓他成為恐怖象征的那個官階。至少在阿根廷，其用意并非試圖讓自己看起來不那么重要，而是剛好相反。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艾希曼刻意賣弄地使用這個官階，宛如商標一般。在阿根廷，不會有人想到報告“黨衛隊旗隊長”的消息。“克萊門斯”這個聽寫錯誤也顯示出那是二手消息。不過情報機構的檔案卡片還泄露了更多細節。

雖然艾希曼在阿根廷聯絡人的幫助下，能夠為妻子提供逃亡所需的金錢和信息，不過薇拉·艾希曼還需要一個地址，以便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上岸之后即使在緊急情況下也能獨自找到門路。畢竟在四個星期的行程當中，隨時都可能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情，而他的妻子不會當地語言，恐怕很難獨自找到一棟位于偏遠省份的小屋。因此最聰明的做法莫過于不僅告訴她艾希曼的化名，同時也告訴她布宜諾斯艾利斯那位可靠的德國新移民接待主任的名字：埃伯哈德·弗里奇。結果正是這個消息，被某位接近那個“小圈子”的人士通報給了蓋倫組織。[[57]](#_57_4)

對艾希曼的藏身地點幾乎不可能再做出更精確的提示了。1952年時，若想知道阿根廷那份德文報刊的總編輯是誰，在每一期的刊頭都找得到答案，因為那里大剌剌地寫著“總編輯：埃伯哈德·弗里奇”，并且附上了正確的通信地址、街名和電話號碼。[[58]](#_58_4)因此若有誰體諒地解釋說，聽寫錯誤和不正確的官階名稱讓這個信息無法精準地用于搜捕，以致“1952年的時候不管再怎么努力都會徒勞無功”，更何況艾希曼根本就不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59]](#_59_3)，那么這種體諒只會變成對情報組織的嚴重侮辱。畢竟人們理所當然會期待它的工作人員至少能勝任新聞機構的實習生會做的工作。官階名稱根本不足以成為“持懷疑態度”的理由，因為紐倫堡審判的各種相關文件就是如此描述艾希曼的。“雙重拼寫錯誤”同樣不足掛齒，因為每一個在西班牙語地區活動的人都知道C的讀音就是K，因此在查閱居民登記簿的時候最好C和K都找一遍。[[60]](#_60_3)然而最重要的是，官方已經有了準確的聯絡地址。讀到刊頭都不需要接受特別訓練，頂多只需要打一通電話給聯邦憲法保衛局的同僚，因為那里早就收集了全套《路徑》，蓋倫組織甚至都沒有再買一本的必要。

唯一的障礙就只在于如何讓弗里奇開口說話。但其實從艾希曼周遭那些德國移民的行為表現即可看出，為此并不需要采取特別激進的手段，只需要一點智慧和一個好的托詞就夠了，而那正是情報人員所擅長的功夫。杜勒出版社是一個交通方便的“中央車站”，而非精心隱藏在小巷子里面的秘密組織。人們在那家出版社進進出出，以便重新找到遍布全國各地的舊識，那里的人當然都知道“克萊門斯”和“艾希曼”意味著什么，即便這個化名突然多出了一個“S”。聽錯名字在阿根廷也是常見的現象，因為人們彼此之間很少使用化名。因此讓德國當局尷尬的內情是：只要巧妙地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進行一次檢查，便足以在1952年找到艾希曼的下落。我們不知道是否曾經有人如此嘗試過，但我們非常清楚，無論是那則消息本身還是隨后對此的反應，都沒有帶來任何結果。

當然，有人可以反駁說，除此之外還有各種報告指示艾希曼在中東，這許多相互矛盾的信息讓人根本無所適從。盡管此類線索通常在本質上都難得“準確”，但實際的情況卻是，與中東有關的各種報告當中，沒有任何能夠比得上薇拉·艾希曼離開奧地利之前傳出的風聲，都不像它那么精確又容易查證。在敘利亞和埃及進行的查證工作最后當然都不得要領，但這個結果仍然顯示出，長年以來，德國情報組織不管遇見多么荒誕不經的謠言，也都會仔細核查。因此我們沒有理由懷疑蓋倫組織在面對阿根廷線索的時候變得比較漫不經心。如果我們仔細檢視檔案卡片，一個細節就會躍然眼前：“克萊門斯”不僅出現在1952年6月24日的報告中，甚至也被用于卡片索引和檔案本身的名字。[[61]](#_61_4)雖然在艾希曼接受審判之前，那名前任一級突擊大隊長曾被懷疑在中東使用了其他許多化名，然而在檔案卡片上，艾希曼的“DN”（Deckname——化名）卻并非魯道福·施佩（Rudolfo Spee）、埃克曼、希爾特、阿爾弗雷德·艾興瓦爾德（Alfred Eichenwald）、恩斯特·拉丁格（Ernst Radinger）、斯穆爾（Smoel）、維瑞斯（Veres）、阿扎爾（Azar）、卡爾·布林克曼，或者埃里克等。[[62]](#_62_3)卡片上的標題文字既簡單明了又接近事實：“Eichmann, Adolf DN Clemens”（阿道夫·艾希曼，化名克萊門斯）。

那則消息和這個化名就停留在蓋倫組織的一張檔案卡片上，從此石沉大海。其他公開搜尋艾希曼下落的人直到1957年都還只能想方設法，用西德情報機構在1952年即已牢牢掌握的那些信息，拼湊謎題的答案。一直要等到1958年，美國中央情報局才赫然注意到，德國聯邦情報局早就有報告指出，艾希曼正化名“克萊門斯”在阿根廷過生活。盡管如此，當萊茵蘭-普法爾茨州（Rhineland-Pfalz）憲法保衛局在1959年年底提出具體詢問時，德國聯邦情報局依然回復說：可惜還沒有關于艾希曼居住地點的確切消息，只能推測他曾在1952年前往埃及，而后去了阿根廷。[[63]](#_63_3)

2009年，導演雷蒙德·萊伊（Raymond Ley）在拍攝《艾希曼的末日》（Eichmanns Ende）時，曾經詢問以色列綁架小組的負責人拉斐爾·埃坦（Rafael Eitan），為什么摩薩德需要兩年的時間，才終于確認了一條正確的線索并加以運用？埃坦難掩尷尬地回答，他們不幸地忽視了那條線索兩年：“我們什么事情都沒有做！直到兩年以后，我們才開始注意到它。”事到如今，聯邦德國有關當局的負責人也應該同樣鼓起勇氣，通過完全開放艾希曼檔案來公開承認其已故前任領導們所犯下的錯誤，而非留待靠一家八卦小報才讓大家終于得見那些令人汗顏的文件。西德方面曾經至少在八年的時間里沒有采取任何行動，直到以色列人和一位勇敢的德國總檢察長挺身而出，才阻止了我們繼續因為無所作為而丟人現眼。

1952年7月28日，薩爾塔號輪船（Salta）[[64]](#_64_3)在國喪期間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港——被視為圣人一般的總統夫人艾薇塔·庇隆（Evita Perón）在兩天前去世。艾希曼在阿根廷的幫手們非常嚴肅地對待自己的任務，確保沒有人想要跟蹤那家人尋獲艾希曼的下落。克勞斯·艾希曼回憶道：“在下方的碼頭邊站著幾位紳士。他們對我們非常友善，但我一個都不認得。后來在旅館里又來了一位先生。母親說：孩子們，這是里卡多叔叔。他給了我們100比索，那在當時是很多錢。[[65]](#_65_3)我們買了冰激凌和糖果，我還買了我的第一支香煙。”[[66]](#_66_3)與此同時，那對夫婦則有機會單獨相處。艾希曼終于大功告成。歷經七年的分離、地下生活、努力工作以籌措逃亡經費之后，他不但有了新的生活，而且家人也重新回到他身邊。時隔多年之后，艾希曼反常的寡言也隱藏不住他的興奮之情：“團聚實非言語所能形容。”[[67]](#_67_3)那名耶路撒冷的囚犯滔滔不絕地散播一種論調，表示他甚至不能向孩子們解釋他到底是誰：“我無法成為自己兒子們的父親。對克勞斯、霍斯特和迪特爾來說，我就是‘里卡多叔叔’。”但其實除了在各種文件上，以及當著陌生人的面時繼續使用假名外，這種情況并沒有維持多久。艾希曼只不過以此作為借口，試圖通過“沒有人知道里卡多·克萊門特的真實身份”的講法來保護他在阿根廷的朋友和幫手們。這個再度團圓的家庭一起用罷晚餐，在旅館度過一夜之后，便共同搭乘普爾曼快車（Pullman-Express）前往圖庫曼，然后繼續從那里來到里約波特雷羅（Rio Potrero），艾希曼已經在那里租了一棟房子。等他們終于安頓妥當，艾希曼便向孩子們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克勞斯·艾希曼還記得當時的情況：“他只是說：‘我是你的父親。’就此而已。”[[68]](#_68_3)

### 休戚與共

在多年的獨居之后，重新開始的家庭生活很可能并不像當事人后來所形容的那么和諧。荒郊野外一棟沒有電力供應的房子，與薇拉·艾希曼從前在丈夫身邊所習慣的生活水平相差甚遠。而對分別時年16歲、12歲和10歲的兒子們來說，這種充滿南美牛仔風味的生活卻緊張刺激極了，盡管那位嚴格的父親逼迫他們盡快學會西班牙語，每天必須學會100個單詞——嚴格100個單詞。艾希曼的妻子不僅帶來了往日的記憶、相冊[[69]](#_69_3)和家人的問候，一同帶來的還有來自歐洲的新消息。薇拉·艾希曼回憶道：“我把剪報拿出來給他，上面寫著‘謀殺犯、大屠殺兇手艾希曼’。他看見后忍不住說道：‘難道他們發神經了嗎？我可不是什么兇手，我不能接受這樣的說法，現在我要回德國去。’”可是他妻子的反駁十分具有說服力：“那可不成！現在我帶著孩子們過來了，我們要怎么辦呢？不如再等一段時間，等孩子們長大了再說。”他回答道：“好吧，那我就等著。”[[70]](#_70_3)

這些新聞剪報再次喚醒了艾希曼潛藏在北德地下時一直折磨著他的無力感，但他卻沒有因此變得更加溫和。奧地利的納粹圈子里很快便有傳言，稱艾希曼已經發下誓言，要因為威廉·霍特爾在紐倫堡的證詞殺了他。[[71]](#_71_3)艾希曼的名字早已有了自己的生命。如今艾希曼必須想出一套說辭，向他的妻子，有朝一日也必須向他的兒子們解釋，為什么會出現那樣的新聞標題。沒有人比他自己更清楚，這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盡管如此，艾希曼說他想回德國投案的講法卻并不只是意氣用事，想要證明自己的“無辜”而已。雖然艾希曼曾經努力打造了自己的狼藉聲名，但他也清楚，自己并非單獨行動，而他從前的共事者之所以多少能夠在德國逃過一劫，是因為他們也跟著夸大了艾希曼所扮演的角色。在圖庫曼山區快樂地與家人團圓是一回事，但知道他昔日的同僚們能夠若無其事地繼續在德國生活下去，甚至可以領取退休金和養老金，還是讓艾希曼重獲的幸福蒙上了濃厚的陰影。那些健忘的同志們還要再等好幾年，才會因為想到艾希曼而寢食難安。然而，艾希曼卻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就已經無法擺脫對自己的聲譽名望和歷史形象的憂慮。假如他能夠忘記這一切，能夠不那么斤斤計較的話，說不定從此可以用里卡多·克萊門特那個清白的德國移民身份幸福地生活，然后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頤養天年。

不過艾希曼在開始捍衛自己的“榮譽”之前，先利用在圖庫曼的時光向孩子們展示了這個剛被征服的世界。他用自己的新職業給兒子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并不是每一個孩子都有一個率領人們穿山越嶺、管理炸藥，并且為總統修筑水壩的父親。[[72]](#_72_4)他們還聽他講述遠征安第斯山脈最高峰的故事，盡管他只到了高原，不像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雖然有一條假腿，依然登頂了阿空加瓜山，并且在薩森的幫助下，把這件事寫進了書里。[[73]](#_73_4)孩子們也認識了父親的新同事和新朋友，其中就包括赫伯特·庫爾曼，他顯然在阿根廷總統府附近過著精彩的生活。貝特霍爾德·海利希的女兒至今依然記得，他們全家人“去艾希曼家烹煮橘子果醬”。[[74]](#_74_3)如果當時還有誰對克萊門特就是艾希曼持懷疑態度的話，看到他的妻子和孩子來到圖庫曼以本名過日子之后，便完全消除了疑慮。

艾希曼后來自豪地寫道：“我教會了孩子們怎么騎馬。我們好幾次一同坐車前往壯觀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我在那里認識了庇隆總統，他對我們德國人總是照顧有加。”[[75]](#_75_3)從前艾希曼能夠直接接觸到黨衛隊全國領袖，如今又是阿根廷總統的熟人。乍看之下，這個說法似乎異想天開，但事實上卻完全不然。庇隆對德國移民的支持不僅限于慷慨地授予“卡普里”政府合同，他還不時讓這些新國民出現在自己身旁，無論是在官方的招待會上，還是當他親自前往視察“卡普里”工作團隊的時候。他也曾跟那名集中營“醫生”約瑟夫·門格勒進行過對話，雖然后者用的是他的新名字赫爾穆特·格雷戈爾（Helmut Gregor）。由此，庇隆完全有可能真的跟“里卡多·克萊門特”見過面。

然而圖庫曼的田園生活沒有持續很長時間。艾希曼的家人過來還不到一年，“卡普里”就在1953年陷入了破產危機。盡管艾希曼和他的同事們失去了穩定的工作，但“卡普里”團隊并未于一夜之間解散。[[76]](#_76_3)該公司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依然是他們的根據地，例如貝特霍爾德·海利希和漢斯·菲施伯克都宣稱自己直到1955年還為“卡普里”工作。奧爾斯特·卡洛斯·福爾德納甚至在1960年依然告訴警方，他是“卡普里”公司的總經理——該公司仍在進行破產談判，而且已改名為“福爾德納&漢森”（Fuldner & Hansen）。[[77]](#_77_3)福爾德納公司的實際規模和業務范圍直到今日還不清楚。

艾希曼自己想必也繼續在“卡普里”的環境里待了一段時間，因為貝特霍爾德·海利希的大女兒曾短暫地跟艾希曼的兒子霍斯特在學校同班。[[78]](#_78_3)海利希的女兒們僅在1953年3-12月之間生活在阿根廷，大致相當于阿根廷的學年期間。她們先是與父親住在圖庫曼，后來遷居到位于布宜諾斯艾利斯西北300公里的阿根廷第三大城羅薩里奧（Rosario）。羅薩里奧以良好的學校教育聞名，當地同樣有一大批德國移民定居。根據海利希的說法，“卡普里”也在羅薩里奧設置了辦事處。但圖庫曼的人馬對那個地區產生興趣還有其他原因。從1952年開始，德國西門子公司便在當地開始初步規劃一個非常類似的大型項目：建造圣尼古拉斯發電廠（Kraftwerk San Nicolás）。[[79]](#_79_3)施工階段許諾了工作機會，對具有“卡普里”背景的那些男性而言尤其如此。從1953年開始，康斯坦丁·馮·諾伊拉特正式出現在了西門子的薪餉名冊上。諾伊拉特是“同志工作會”的創始人之一，因此那些人能夠合理地期待獲得他的奧援。曾經犯下多起謀殺罪行的前任猶太人隔離區指揮官約瑟夫·施萬伯格，便在他的庇護下長年任職于西門子阿根廷分公司。諾伊拉特承認，自己從1950年便開始雇用施萬伯格。[[80]](#_80_3)由于艾希曼至少把一個兒子送去了羅薩里奧上學，因此在他帶著家人搬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之前，很可能也曾經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工作。

但很明顯的是，在福爾德納公司破產后，艾希曼沒有考慮繼續留在圖庫曼，開一家咖啡館或者以其他方式過一種不起眼的生活。其實那個北方省份即便在當時也已經屬于阿根廷人口較多的地區，想在那里維持生計并非難事。但艾希曼對那種前景顯然興趣缺缺，其中原因可能也在于他先前的收入還算相當不錯。他曾經提到，自己在短時間內便獲得加薪。他的兒子則記得，艾希曼在“卡普里”的最后工資為每月4000比索。那在當時相當于800馬克或190美元，遠遠高于西德的平均收入。[[81]](#_81_3)可以理解，他希望繼續維持這個收入水平。他們一家人于1953年7月遷居到布宜諾斯艾利斯，里卡多·克萊門特在那里正式登記并獲得了新的身份證明（編號1378538）。[[82]](#_82_3)赫伯特·庫爾曼早已在當地站穩腳跟，而且生活得比較無憂無慮，在他的擔保下，艾希曼一家人在城市北部的奧利沃斯（Olivos）租了一棟有花園的小房子。屋主是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施米特（Francisco Schmitt）的奧地利人。跟圖庫曼比較起來，艾希曼的新住址“查卡布科街4261號”（Chacabuco 4261）絕不會相形見絀。奧利沃斯屬于布宜諾斯艾利斯較高級的社區之一，他們一家可以充分利用市內的基礎設施，讓孩子們就讀良好的學校，而且同樣重要的是，屋內終于有了電力供應。對艾希曼來說，那里有ABC咖啡餐館（ABC Café-Restauran）和橡樹餐廳（Die Eiche），可以讓他跟老同志和新朋友們坐下來小酌一杯葡萄酒。一直要等到艾希曼后來于返家途中被以色列人綁架，以致和他的交情可能會帶來危險之后，這位善于交際的先生才開始在別人口中變得內向害羞。[[83]](#_83_3)

1953年，庇隆時代的輝煌歲月即將成為過去。像阿根廷這樣依賴世界市場原材料價格的國家，深受朝鮮戰爭結束之后價格崩跌的打擊，經濟狀況全面惡化。艾希曼曾設法與兩位“卡普里”的同事一起開洗衣店，但很快就在這個傳統上被中國人占據的行業里一敗涂地。進入紡織業的嘗試也被證明是同樣糟糕的投資。[[84]](#_84_3)但艾希曼并非孤立無援，在這些項目都失敗后，他的同志們又一次過來鼎力相助。1954年年初，艾希曼在“艾菲弗”（Efeve）公司獲得了運輸主管的職務。那是一家大型衛生器材公司，總部設在市內高檔的佛羅里達區，出資者之一是另外一位來自德國的難民，弗朗茨·威廉·普法伊費爾。這位精力充沛的先生據悉曾在戰爭最后幾個月參與了帝國黃金的運送工作，但最重要的是，他是薩森和魯德爾的朋友。[[85]](#_85_3)

據艾希曼的兒子回憶，他的起薪是2500比索，明顯低于之前的水平，但也絕對算不上微薄。[[86]](#_86_3)1953年下半年無疑是艾希曼經濟最拮據的時期，不過這種情況沒有持續多久，顯然也不是他在阿根廷的典型生活狀態。艾希曼雖然日子過得簡樸，但這并不表示他沒有揮霍的機會。當他還是一名黨衛隊事業狂人的時候，就已經不熱衷于奢侈的生活方式了。盡管每當他進駐一棟被沒收的宅邸時，都不會錯過里面的食物貯藏室和葡萄酒窖，而且他也不會反對別人邀請他參加社交活動，或者拒絕乘坐既舒適又配備裝甲的公務轎車，可是在私人生活中，講排場的作風顯然從未對他產生過吸引力。與其他同僚不同的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艾希曼曾經濫用職權來自利自肥。艾希曼后來回想從前的情況時，卻為此責備自己：假如他當時也把口袋塞滿的話，家人就能過上好得多的生活。盡管如此，讓他引以為傲的卻是，他在處于權力巔峰的時候仍然每天早晨親自沖泡薄荷茶，始終親自擦靴子。他幾乎要崇尚使用行軍床和寄物柜的節儉生活。[[87]](#_87_3)就連迪特爾·維斯利策尼那個在1946年不放過任何機會，務必要把責任推諉給自己昔日上司的人，也報告說：“艾希曼的生活方式基本上非常樸素。他的需求不多。”維斯利策尼甚至補充道：“就財務方面而言，我相信艾希曼是干凈的。”[[88]](#_88_3)

阿道夫·艾希曼雖然是大屠殺兇手，但他貪求的對象是死亡人數，而非奢侈與財富。有關納粹罪犯流傳甚廣的刻板印象顯然并不適用于艾希曼，他并沒有因為對屠殺肆無忌憚，而在別的方面也跟著失了規矩。養尊處優的生活從來都不是艾希曼追求的人生目標。若非這樣的話，他在之前那些年其實早就可以經由各種途徑來達到目的了，畢竟艾希曼的職務使他能夠全權掌管許多裝滿被沒收錢財的銀行賬戶，他自己也一再有機會敲詐受害者。盡管他在1945年以后過著非常節儉的生活，甚至連摩薩德特工也對其破舊的衣服和磨損的內衣感到驚訝[[89]](#_89_3)，但我們不能忽略一個重要事實：艾希曼成功地把家人接到阿根廷并且讓他們生活無虞，供三個孩子上學接受教育，好幾次帶他們出外旅行，一起前往馬德普拉塔（Mar del Plata）享受假期，最后還買了一塊地蓋起自己的房子。失意落魄的生活看起來應該與此不同。那種“匱乏而孤獨的日子”的說法，源于他在以色列編造出來騙取同情的謊言。這種說法很容易傳播，因為它完美契合了艾希曼周圍那些人在他被捕之后推諉責任的故事，聲稱自己完全不認得艾希曼，當然更不可能跟他一起度假。[[90]](#_90_3)

就財務而言，艾希曼在滿足希姆萊有關“得體”的要求方面，一向沒有遇到任何困難——他只不過是專門代表帝國盜竊、勒索、掠奪和揮霍罷了。阿根廷的艾希曼雖然無論如何算不上一個有錢人，但也沒有落魄潦倒。無論是在鄉間還是在首都，他從來不必自力更生，而是受惠于一個共同體，人們在其中彼此認識并且相互幫助。如果說艾希曼缺少了點什么的話，那就是不再握有公務職位帶給他的大權，不再過著被晉見希姆萊和巡視集中營填滿的緊張刺激生活，不再能夠搭乘公務車出行，以及無法再歡快地與下屬來往，而他們都知道那名一級突擊大隊長不高興的時候是何種模樣。

艾希曼后來一再喜歡表示，“我是個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者為使命和榮譽而工作，并非著眼于獲取金錢和浮華——至少在理論上如此。但實際上，艾希曼從來不曾讓人覺得，德國公務人員默默耕耘的職業生涯即可令他滿足，因為他想要成為一個重要的人物。他在阿根廷所缺少的，是一項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任務。而更令他痛心疾首的，則是他的上一項工作未能成功進行到底，世界上仍有猶太人活著。里卡多·克萊門特或許在阿根廷已經適得其所，阿道夫·艾希曼卻還有志難伸。若非如此，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將無法得到解釋。因為里卡多·克萊門特返回布宜諾斯艾利斯之后，很快便從其他搬去那里的前“卡普里”成員當中傳出了一個流言，而這則信息再也無法被歐洲的情報機構鎖起來了：艾希曼還活著，人就在拉普拉塔河畔。

## 第二節 國內戰線

因此不能認為，1953年的時候，

以色列就已經知道艾希曼在阿根廷了。

其實只有檔案知道。

——湯姆·塞格夫[[91]](#_91_3)

根據一個經常被引述的故事，1953年，納粹獵人西蒙·維森塔爾不疑有他地前往因斯布魯克，拜訪某位準備賣給他一些有趣郵票的貴族紳士。他們二人恰巧談起有關納粹的話題。維森塔爾聽從醫生的建議，開始收集郵票，以便至少能夠偶爾將注意力從他所專注的獵捕罪犯行動上轉移開來。那位收集同好隨即拿出朋友借給他的一個信封，上面貼著一些特別漂亮的彩色郵票。維森塔爾花了一些時間才注意到，那封來自阿根廷的信上有一段引人注目的附言：“你肯定猜不到我在這里看見了誰……我看見了艾希曼那頭可憐的豬，那個對猶太人頤指氣使的家伙。他就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附近，為一家水力發電公司做事。”維森塔爾立刻把醫生推薦的散心活動拋諸腦后。他還試圖買下這封信，但那位同好沒辦法配合，因為這封附有美麗郵票的信——可惜！——屬于他的朋友所有。對維森塔爾來說，這個鐵一般的事實終于確認，有關艾希曼在中東的線索是錯誤的，因為那名猶太人滅絕行動的組織者——他在戰爭結束后就一直尋找的那個人——正躲在阿根廷。維森塔爾隨即連忙趕回家中，在1953年3月24日寫了一封信給維也納的以色列領事阿里·埃歇爾（Arie Eschel），告訴他這個經歷。[[92]](#_92_3)

幾個月后，維森塔爾又寫了一封信給紐約世界猶太人大會的主席納胡姆·戈爾德曼（Nahum Goldmann），他在信中更清楚地描述了那個事件，但是把時間往后挪了一些：“在1953年6月，我結識了一位馬斯特男爵（Baron Mast），他曾是奧地利聯邦軍的情報官員，后來為美國和聯邦德國的情報單位服務。馬斯特骨子里是個君主主義者，既反對納粹主義又反對共產主義……他拿出一封信給我看。那封信是一位住在阿根廷的退役軍官寄給他的，寄出的時間為1953年5月。信中稱寄信人當時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遇見了艾希曼，還說艾希曼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附近一個發電站的工地工作。”[[93]](#_93_3)正如我們今天所知道的，西蒙·維森塔爾確實在摩薩德突擊小組捕獲艾希曼七年前就已經掌握了真相。唯一不清楚的地方在于，他是否已經意識到，這個消息之所以會傳到他那里，并不是因為對集郵的喜愛或者純屬意外。

\*\*\*

時年65歲的海因里希·“哈里”·馬斯特男爵并非熱衷收藏的退休老人，而是一名經驗老到的情報官員。他不但曾相繼為維也納的情報部門和納粹德國軍事情報機構的首腦威廉·卡納里斯海軍上將（Admiral Wilhelm Canaris）工作，更在戰后把大部分卡納里斯檔案及其包含的國家機密一同保存下來。戰爭剛一結束，這位“鮑比伯爵”（Graf Bobby）[\*](#_380)就被美國情報部門招募過去。他和一位朋友在巴特奧塞投資了一家出版社，并在1951年開始建立蓋倫組織的奧地利分支機構。蓋倫組織是德國的情報部門，在1956年脫胎成為德國聯邦情報局。維森塔爾對此并非一無所知，因為與兩位集郵愛好者偶然相遇的故事相反，他之前早就見過海因里希·馬斯特，而且馬斯特介紹自己是蓋倫組織的員工。[[94]](#_94_4)

海因里希·馬斯特是被一個人帶進蓋倫組織的，那個人和馬斯特一樣野心勃勃，在當時就以納粹歷史見證者的身份，成為最成功的故事兜售者之一。這個人就是威廉·霍特爾，曾被艾希曼當成朋友看待的那個威廉·霍特爾。二人在生意上也有往來，因為馬斯特受雇于霍特爾的出版社。霍特爾和馬斯特在為蓋倫組織工作之后不久，便在1951年雙雙去了海因茨情報處（Heinz-Dienst，FDHD）。那個跟蓋倫組織打對臺的機構由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茨（Friedrich Wilhelm Heinz）在1950年創立，并得到了聯邦總理康拉德·阿登納的直接支持。[[95]](#_95_3)阿登納需要一個獨立于盟軍的情報來源，尤其是在涉及東部地區，也就是昔日蘇聯占領區——民主德國——的時候。但海因茨情報處顯然也不可能完全獨立于西方盟國之外。然而其林茨分支所面臨的真正問題，卻是霍特爾和馬斯特自己：二人把他們的小俱樂部稱作“XG”，并且常常自行其是。霍特爾更是非常熟練地平衡各種關系并設下騙局，以致有時候恐怕他也不確定自己到底是在為誰工作。對他而言，金錢比忠誠更加重要。他的野心幾乎沒有邊界。在維森塔爾那段插曲發生的前一年，霍特爾還試圖在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西班牙建立一個情報基地，以之作為北非間諜活動的橋頭堡，但同時也用于偵查阿根廷的政治團體。[[96]](#_96_4)霍特爾的專長就是說大話，因此他將約瑟夫·阿道夫·烏爾班視為主要競爭對手并非沒有緣由。美國中情局和其他情報單位最后之所以跟霍特爾分道揚鑣，原因就在于這名顧問所提供的“情報”往往被證明是按照需求憑空捏造出來的。對于后來許多求助于霍特爾的歷史學家來說，這種不值得夸耀的經驗有時給他們的工作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例如彼得·布萊克（Peter Black）就很沮喪地表明：“在許多情況下，現有的第一手材料并不支持他的猜測，甚至還揭示出他的不少故事根本出自捏造。”[[97]](#_97_4)

可是太多人完全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因為霍特爾總是顯得不可或缺。在西蒙·維森塔爾報告馬斯特那封附有彩色郵票的信之后僅一天，威廉·霍特爾便遭到逮捕[[98]](#_98_3)，因為有人懷疑他參與了“蓬格-韋貝爾事件”（Ponger-Verber-Affäre），亦即涉嫌與兩名蘇聯間諜一起工作。有關當局顯然認為他無所不能。在以閑聊口吻進行的審訊過程中，霍特爾告訴美國情報人員，庫爾特·蓬格（Curt Ponger）代表美國猶太人聯合分配委員會或“其他什么猶太人組織”聯系了他，并且愿意為捉拿艾希曼的行動提供十萬美元經費。但霍特爾并不想跟以色列的特工合作。[[99]](#_99_3)中央情報局卻認為，打算付錢給他的人并非蓬格，而是威森塔爾，因為庫爾特·蓬格據悉是西蒙·維森塔爾的朋友。[[100]](#_100_3)蓬格是一名逃離奧地利的猶太人，在戰后為美國陸軍防諜隊進行審訊工作，維森塔爾便是通過他取得維斯利策尼關于艾希曼的供詞的。海因里希·馬斯特后來曾寫信給霍特爾，稱他一直認為蓬格是以色列的特工。[[101]](#_101_3)在美國中情局看來，蓬格卻是蘇聯特工，維森塔爾則是以色列的間諜，有傳言說維森塔爾親自幫防諜隊招募了霍特爾。[[102]](#_102_4)德國情報部門曾收到關于霍特爾的警告[[103]](#_103_3)，盡管海因茨認為該人“粗暴鄙俗且沒有格調”，但至少有一段時間還是認為霍特爾不可或缺。最后海因茨終于也放棄了他。[[104]](#_104_4)在寄出那封信一個月之后，維森塔爾就可以讀到德國《明鏡周刊》如何運用美國中情局的材料，在眾目睽睽之下終結了霍特爾及其朋友馬斯特的情報工作之路。[[105]](#_105_3)人們普遍擔心霍特爾最終會為蘇聯從事間諜活動，或者像西蒙·維森塔爾那般與以色列特工合作。

如果有人讀到這里已經被一大堆姓名和關系搞得七葷八素的話，應該不難想象戰后時期的間諜活動紛亂到了什么地步。被四個強國占領的奧地利更是如此。人們彼此熟悉又彼此懷疑，任何兩個人坐在一起喝咖啡，都無法避免有第三者正在監視他們，此外還有第四者已經滲透到了他們三人中間——那一切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架設起間諜設備的大型兒童生日派對。湯姆·塞格夫非常貼切地形容說：“在這種爾詐我虞、關系網絡糾纏不清的背景下，馬斯特完全有可能出于某種原因向維森塔爾透露，艾希曼就在阿根廷。”[[106]](#_106_3)倘若再加上另外一塊拼圖，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接近事情可能的原因。威廉·霍特爾后來宣稱，他正是那位來自奧地利的朋友，是他因為威森塔爾而把那封信交給了海因里希·馬斯特。[[107]](#_107_3)

如果情況的確如此——而且確有跡象證實此種說法——那么這則重要消息就來自一個自稱曾是艾希曼朋友的人。[[108]](#_108_3)艾希曼和霍特爾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我們必須先弄明白這種關系，才有辦法理解以上事件的來龍去脈和大屠殺的整個歷史。霍特爾是紐倫堡缺席審判艾希曼時的檢方主要證人之一，因此同時也成為關于大屠殺規模的關鍵證人。正是霍特爾宣稱，艾希曼在1944年發生于匈牙利的那場臭名昭著的談話中，講出了總共高達600萬人的遇害者數字。正是這個說法使霍特爾一舉成名。霍特爾自己也想要這樣的名聲，并利用每個機會大肆渲染一番，盡管他總是擺出一種姿態，好像知道這些是命運的選擇。在馬斯特讓維森塔爾不經意地看見那封密報信之后不久，霍特爾便利用自己在薩爾茨堡被美國防諜隊逮捕的機會，再度強調了自己扮演的特殊角色。《明鏡周刊》在報道中對此發表評論：“（艾希曼告訴霍特爾的）這項陳述直到今天仍然是600萬猶太人被納粹殺害的唯一確鑿根據。”[[109]](#_109_3)然而這個評論并不正確，因為艾希曼不只在霍特爾面前提到過這個數字，但它完美地呼應了霍特爾的自吹自擂。在戰后時期，艾希曼和霍特爾儼然不可分割的兩面：霍特爾獨一無二的內幕消息導致艾希曼成為特別被通緝的罪犯，艾希曼的故事則使霍特爾成為炙手可熱的人物。盡管如此，他們的私人關系卻并不是一直充滿了對立。[[110]](#_110_3)

艾希曼在1938年3月前往維也納組織驅逐猶太人的行動時，認識了比他年輕九歲的霍特爾。霍特爾主管黨衛隊保安局在維也納的猶太事務部門，因此他們二人從一開始就密切合作。每當艾希曼需要鑰匙來打開被查封的猶太機構時，他便去找負責保管鑰匙的霍特爾。二人在那個時期于公于私都經常來往，艾希曼曾愉快地回憶起當時與霍特爾的談話，并且非常贊賞霍特爾的學識。此后他們的聯系有限，因為霍特爾繼續待在維也納，最多每月返回帝國保安總局第四局一次報告進度。霍特爾即便在1943年被調到帝國保安總局之后，也沒有在柏林停留很長時間，而是推動他的辦公室搬到維也納。直到1944年3月，艾希曼和霍特爾的關系才又重新密切起來，當時二人都被派駐匈牙利，分別執行不同的任務。艾希曼負責將數十萬猶太人送上死路；霍特爾則被國外情報部門派任為帝國全權代表埃德蒙·維森邁爾（Edmund Veesenmayer）的顧問，將被謀殺的人數回報給柏林。艾希曼和帝國保安總局的首腦卡爾滕布倫納后來都曾經表示，當時沒有任何人比威廉·霍特爾更加了解匈牙利的情況。[[111]](#_111_3)艾希曼于1944年年底回到柏林，1945年4月才在阿爾陶塞與霍特爾重逢。然而等到戰爭結束之后，他們二人僅在一件事上達成了共識，即他們真的曾經是朋友。他們兩個人甚至在同一天過生日。霍特爾的妻舅恰好是艾希曼在奧地利最親密的同事之一，“多普爾的猶太人皇帝”約瑟夫·魏斯爾。魏斯爾曾擔任指揮官，在艾希曼親手建立的第一個猶太人營區橫行霸道，隨即以“遣送行動專家”的身份在法國有過不同凡響的表現——最后他卻聲稱自己只不過是艾希曼的“司機”。不管怎樣，喜歡自我吹噓的魏斯爾隨時都能夠向他的妹夫通報艾希曼的行動。但霍特爾卻設法隱瞞了那一切，技巧十足地把自己包裝成艾希曼罪行的關鍵證人，并且有目的地混淆視聽，使得直到今天都很難還原他1938年在維也納以及后來在匈牙利的活動。相反，霍特爾假冒成抵抗運動的斗士，從一開始就以他自己根本不可能知道，當然也不符合事實的數據和細節，炮制了艾希曼的形象。他運用自己所知道的關于猶太人大屠殺的知識，以及從別人那里聽來的艾希曼逃亡信息，建立起自己內部知情人士的聲譽。[[112]](#_112_3)因此在1953年的時候，霍特爾已經不是第一次泄露艾希曼的逃跑計劃了，盡管他最初提供的有關中東的各種線索都大錯特錯。

霍特爾這樣做，絕非出于對真相不同尋常的熱愛，或是受到了正義感的驅使。每當涉及瓦爾特·舍倫貝格、恩斯特·卡爾滕布倫納等與他有過密切接觸的對象時，霍特爾也會三緘其口，甚至還傾向于說謊。他保護朋友和自保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前后一貫地把罪責推給一小群昔日的同事。艾希曼首當其沖，而且霍特爾終其余生都以非凡的投入，竭盡一切努力來充實他的艾希曼形象并加以傳播。他不但技巧純熟地與情報機構周旋，同時也十分擅長跟歷史學家、新聞記者和電影制片人打交道。于是直到今天，那名興高采烈、身穿奧地利短上衣的男子，以阿爾卑斯山地為背景，面露狡黠地微笑著侃侃講述艾希曼的軼事，并傲慢自大地自我標榜，都是相關電視紀錄片的固定內容。他戰時的一位朋友甚至把媒體界人士對這名職業證人的熱衷稱為“霍特爾奴”（Höttelhörig）。[[113]](#_113_4)

霍特爾不僅利用其虛實參半的消息，建立起了自己作為時代見證者的名聲，還向不同情報機構大肆兜售，甚至從一開始就像作家一樣處理那些消息。他以瓦爾特·哈根（Walter Hagen）為筆名，在1950年出版了《秘密戰線：納粹特工局黑幕》（Die geheime Front. Organisation, Personen und Aktionen des deutschen Geheimdienstes）一書[[114]](#_114_3)，從德國情報機構的角度天馬行空地講述了色情與犯罪的故事。該書隨即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并迅速造成轟動。它在阿根廷也引發了讀者們的批判和焦慮。筆名后面那個人的真實身份從來都不是秘密。霍特爾的八卦消息為數小時的討論提供了材料，甚至還成為薩森訪談會中嘉賓長篇演講的主題。繼維森塔爾關于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的那個小冊子之后，該書是第一本專門用一章篇幅來講述艾希曼的上司們——海因里希·希姆萊、萊因哈德·海德里希、海因里希·“蓋世太保”·米勒——以及“猶太人問題”的書。艾希曼不僅在霍特爾的書中讀到，他所屬的一個小團體在“海德里希邪惡萬分與草菅人命”的秘密領導下，幾乎獨力完成了海德里希邪惡的杰作——“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115]](#_115_3)；此外他更只能眼睜睜看著霍特爾向公眾兜售“內幕故事”，而那些故事其實都是艾希曼從前在維也納、柏林和匈牙利閑談時告訴霍特爾的。[[116]](#_116_4)當霍特爾靠著犧牲別人一躍成為暢銷書作家的時候，艾希曼正準備穿越半個歐洲逃往阿根廷。對老同志的“友情相助”看起來可不是這個模樣。

維森塔爾據稱在1953年夏天看見的那封霍特爾信函，直到今天還沒有再被發現。[[117]](#_117_3)霍特爾和馬斯特似乎都沒有把它交出來，甚至也沒有公開副本，盡管這樣一封信即便在1960年之后也能賣個好價。如果我們不認為這封信純屬偽造，那么二人遮遮掩掩的原因想必在于這封信的其余內容，因為里面一定包含了在阿根廷的其他人名，即便只是寄件人的姓名。與馬斯特不同，霍特爾名聲響亮又引人注目，更有資格收到這樣一封來自阿根廷的信件。況且經常有人向霍特爾打聽有關各種老同志們可能下落的消息，次數多得已經到了泛濫成災的地步。1953年的時候，霍特爾甚至計劃跟弗里德里希·施文德（Friedrich Schwend）那個負責制作偽鈔[\*](#_381)、在戰后逃往秘魯的昔日同僚合作，聯手進行瑞士和南美洲之間的生意。[[118]](#_118_3)無論是誰在1953年寫了那封信給霍特爾，都絕對知道自己把這個爆炸性的信息寄給了一個什么樣的人：一個通過銷售此種情報來賺錢，因此絕對不會對此守口如瓶的人。即使在出版他的第一本書之前，霍特爾就已經在納粹圈子內被視為安全隱患，因為每個人都知道，他在戰后的職業生涯是用背叛建立起來的，老同志們都相信他早就把自己賣給了戰勝國。像奧托·斯科爾策尼之類的人，甚至主張霍特爾是基于純粹的機會主義而“杜撰了那600萬人”。[[119]](#_119_4)在霍特爾的書和報紙文章紛紛出爐之后，即使從未跟情報機關打過交道的人也必定知道，把機密消息傳給威廉·霍特爾，就好比是把它貼到街頭廣告柱上一樣。不管當初是誰向霍特爾通報了艾希曼的下落，都一定知道自己是在告發他。

許多人都可能是那個消息的來源。但阿道夫·艾希曼的家人從一開始就已經認定是誰出賣了他們的父親（他們甚至對那封信一無所知）：跟艾希曼一同乘船漂洋過海的赫伯特·庫爾曼。克勞斯·艾希曼在1966年說道：“我的父親為他支付了渡海旅費，他卻背叛了我的父親。他到處嚷嚷：‘你們可得當心那個克萊門特。他其實就是艾希曼。艾希曼是一頭豬。’”[[120]](#_120_3)相似的用字讓人很難視而不見。盡管如此，庫爾曼顯然不是唯一一個喜歡使用激烈字眼，并泄露艾希曼在阿根廷行蹤的人。即使在1953年的時候，也有辦法通過其他許多渠道獲得這個消息。不僅因為阿道夫·艾希曼變得越來越不小心，也因為早有他的熟人帶著關于他的消息回到德國，而且不光是出于私人原因。

### 德國-阿根廷關系

在20世紀50年代初，杜勒出版社圈子內的人不光是出于懷舊感傷之情，才密切關注聯邦德國的事態發展的。他們明目張膽的政治野心早已反映在《路徑》的文章當中。那些文章越來越直接地討論年輕的民主體制，而且其字里行間無法隱瞞的是，雜志背后的那些人所關心的并非其他任何國家，甚至也不是阿根廷的一個特殊德國社區，而是想要喚回另外一個德國。他們試圖干預德國政治，越來越把一般德國大眾視為訴求對象。盡管在20世紀50年代初時，他們的想法聽上去就像在今天一樣脫離現實，但薩森、魯德爾、弗里奇，以及其他所有作者一心想要的，就是在德國發動一場革命。其國家社會主義立場主要是通過他們所反對的事情定義的：反對聯邦德國加入西方陣營、反對重整軍備、反對美國。正因為如此，他們反對代表了這一切的那個人：康拉德·阿登納。《路徑》雜志新的副標題雖然改成了“一份為了自由與秩序的月刊”，但他們的目的不僅限于此。他們想要在特定自由下擁有一種具體可見的新秩序，亦即“建立一個新的德國”。他們甚至一度還想成立一個德國流亡政府。[[121]](#_121_4)

若仔細檢視那些早已好端端地在阿根廷安身立命的人的不可理喻的行為，便無法不注意到激發這種政治野心的一個主要原因：誰要是曾經受到迷惑，自視為未來世界的精英，并且參與塑造了曾撼動世界長達12年之久的德意志帝國政治，那么他將無法再滿足于正常的生活。在薩森筆下，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曾令人印象深刻地表示：

我們活著，在物質上肯定比我們千百萬戰敗的同胞們生活得更好。可是我們果真能夠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就把自己的視野縮小到如此狹隘的范圍嗎？我經常……不得不回想起不久前最后一次和希特勒對話時的情景，回想起在戰爭最后幾個月里讓我們屹立不搖、奮身向前的那些理念，回想起我畢生的偉大目標：祖國的繁榮與幸福。然而我現在的生活看起來是這么的可悲、這么的渺小而沒有意義！難道人們能夠一下子改頭換面，變得只為自己、只為最親近的家人和同志的小圈子著想嗎？[[122]](#_122_3)

戰爭的結束和隨之而來的逃亡，把那些人拋回了對他們而言從來都不是常態的日常生活。這種生活想必只會讓他們覺得瑣碎，因為布宜諾斯艾利斯令人清醒的流亡生涯，使“統治世界之夢”做起來更加困難。這種改變讓他們尤其難以接受的地方在于，他們都還相當年輕。戰爭的結束使他們的職業生涯在半途戛然而止。魯德爾出生于1916年，薩森出生于1918年，弗里奇出生于1921年。40多歲的艾希曼已經屬于老一輩了，而聯邦德國卻選了一個年逾古稀的人出馬擔任總理。從流亡者的角度來看，所有那一切都讓人回想起魏瑪共和國時期，“年輕人”成功地從年邁的國家總統興登堡手中奪走權力，并廢除了受人憎恨的民主體制。他們正打算做同樣的事。對那些人來說，國家社會主義是他們尚未完成的使命。[[123]](#_123_3)

不僅阿根廷有人夢想著第二次“奪權行動”（Machtergreifung）。20世紀50年代初期，所有具有影響力的右翼極端分子都試圖招兵買馬擴大規模。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昔日戈培爾的國務秘書維爾納·瑙曼（Werner Naumann）所領導的小組。他們試圖滲透進北萊茵-威斯特法倫（North Rhine-Westphalia）的自由民主黨，在西德追求讓人摸不著頭緒的政治目的，進而最晚從1952年開始，還串聯了其他歐洲國家的法西斯政黨。與此有關聯的一些最重要的人名，也出現在埃伯哈德·弗里奇的作者與通訊員名錄中，例如英國人奧斯瓦爾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和法國人莫里斯·巴代什（Maurice Bardèche）。幾乎在同一時間，杜勒出版社的圈內人也設法擴大自己在德國的政治影響力，因此與國家社會主義政黨社會主義國家黨（Socialist Reich Party, SRP）建立了聯系。該黨由奧托·恩斯特·雷默（Otto Ernst Remer）和“民族”作家弗里茨·多爾斯（Fritz Dorls）領導，兩人都是激進的反猶太主義者，具有潛在的歷史影響力。[[124]](#_124_3)盡管他們言不由衷地對希特勒的方法表示了批評，但“解決猶太人問題”是他們競選綱領中的公開內容。他們的直接目標是在即將于1953年舉行的聯邦議會選舉中贏得大量選票，阻止阿登納獲得勝利，并由此使自己成為保守派陣營的要角。杜勒出版社的圈內人以及雷默和他的同黨都認為，大多數百姓私下里毫無疑問都是偏右的，也就是站在他們一邊。地方層級的初選結果更是讓他們對此滿懷憧憬。[[125]](#_125_3)早在1951年的時候，極右派的《路徑》就已經和當年成立的、立場同樣鮮明的《國族歐洲》（Nation Europa）雜志公開合作了。威廉·薩森為此發表了一篇尖酸刻薄的文字批評美國與重整裝備，使雜志在德國的銷量暴增，以致包括《明鏡周刊》在內的其他媒體業者都開始留意到它。[[126]](#_126_3)甚至也有證據顯示，阿根廷那批人通過維爾納·瑙曼與哥廷根的普雷瑟出版社（Plesse-Verlag）取得了聯系。[[127]](#_127_3)因此同樣不能排除的是，弗里奇或許果真像他在寄給作者們的信中所宣布的那般，曾經前往德國，親自與《國族歐洲》的聯合創辦人卡爾-海因茨·普里斯特（Karl-Heinz Priester）達成協議，今后應如何繼續像這樣制造輿論。

1952年夏天，的確曾有若干名阿根廷陣營的成員前往聯邦德國。他們在那里締結了密切的合作關系，尤其給弗里奇的網絡帶來了積極的影響。社會主義國家黨原有的聯絡體系被納入《路徑》的訂戶名錄中，此舉不但意味著3000名新訂戶，更為“小圈子”增加了3000個聯絡地址。政治事業從一開始就是計劃當中的一環。空戰英雄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更被視為潛力十足的國會選舉候選人，曾在聯邦憲法保衛局的密切監視下多次前往德國。[[128]](#_128_3)新聞報道甚至聲稱，同樣出現在聯邦憲法保衛局監視名單上的埃伯哈德·弗里奇，也曾經悄悄進入德國。[[129]](#_129_3)有證據表明，弗里奇最親密的合作伙伴迪特爾·福爾默在1953年永久搬回德國，之后繼續與杜勒出版社保持密切聯系，并且對他們的計劃和項目知道得一清二楚。[[130]](#_130_3)至少所有這些旅客都知道艾希曼藏在阿根廷，而誰若是想給志同道合的新朋友留下深刻印象，通常不會對這種聳人聽聞的舊識保持沉默。

隨著社會主義國家黨因違憲而遭到禁止，以及雷默在聯邦議會大選前由于誹謗1944年7月20日的反希特勒團體而被判有罪，那批新阿根廷人又把目光投向了漢諾威，寄望于同樣反民主的德意志國家黨（Deutsche Reichspartei，DRP）。該黨還有一個優勢，就是完全不反對市場經濟，符合那些積極從事經濟活動的海外移民的立場。魯德爾的新聯系對象是阿道夫·馮·塔登（Adolf von Thadden）。他和埃伯哈德·弗里奇一樣年輕，是戰后最活躍的納粹人士之一，后來更積極促成德國國家民主黨（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NPD）的崛起。塔登在1952年12月就已經和魯德爾見過面，之后更資助了他在1953年的下一次行程[[131]](#_131_3)，以便他前來為德意志國家黨的選戰助力。塔登希望這位空戰英雄跟雷默一樣，散發出昔日國家社會主義的光芒。維爾納·瑙曼也加入了德意志國家黨。他曾被《法蘭克福環視報》（Frankfurter Rundschau）形容為“盤踞在有計劃的滲透網上的蜘蛛”。[[132]](#_132_3)魯德爾在跟他初次面談后，就立刻興奮莫名地聘請他擔任自己的政治顧問。塔登則對重新引進阿根廷的魯德爾一事頭腦清醒：“就個人方面而言，他似乎是非常適當的人選。然而他對德國國內的政治往往有著完全錯誤的看法，這顯然是因為他始終只跟某一類型的昔日同志打交道所造成的結果。”盡管塔登本身也對德國的未來抱持奇怪的看法，但他對魯德爾關于“復興一場真正的民眾運動”的想法大不以為然。他認為更切實際的做法是滲透新的民主政體，通過一個政黨使國家社會主義者進入政府。這個目標在迫不及待的魯德爾看來“過于含蓄保守”。不過塔登也看到了“他的名字所產生的吸引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立刻看出了魯德爾的強烈欲望：“無論如何，他有政治野心，而且想要在德國扮演重要角色。”[[133]](#_133_4)此外杜勒出版社圈內人的統籌能力也令塔登印象深刻。

阿道夫·馮·塔登后來的筆記顯示，魯德爾跟他會面時的態度非但一點也不保留，反而毫無顧忌地暢所欲言。艾希曼被捕之前很久，塔登就已經知道那名“猶太人事務主管”生活在阿根廷，且與杜勒出版社圈子內的人有聯系。[[134]](#_134_3)魯德爾雖然名列德意志國家黨的候選人，最后卻不了了之，因為他甚至不滿足作為被選舉人的條件，并且由于其鮮明的國家社會主義言論，一再被禁止公開發表演說。聯邦憲法保衛局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制作的魯德爾和弗里奇的文檔，至今仍不對外公開，盡管其中至少一部分應被分類為“可歸檔”。德國外交部同樣密切關注此類新右派活動，因為自1950年以來，魯德爾和弗里奇就奔波于南美洲各地，為同志工作會募款，并為即將到來的革命進行宣傳。聯邦德國在智利的代辦處甚至傳回警訊，面對如此廣泛的對納粹的公開懷念，有人擔心德國在海外的名聲恐將受到損害。然而布宜諾斯艾利斯大使館對相關詢問的回答讓外交部感到放心不少：它表示在1953年年底的時候，公開懷念納粹的總共只有50～100人，而且他們都毫無重要性可言，根本不值一提，也無須列舉出來。[[135]](#_135_3)美國中情局的看法顯然與此大相徑庭。同一年他們關于阿根廷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和新納粹主義者活動的報告長達58頁。[[136]](#_136_3)我們至今還不清楚聯邦德國情報部門的報告到底有多長。

盡管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國家社會主義者和形形色色法西斯主義者所進行的各種活動看起來像是一場巨大的全球性納粹陰謀，但它最后沒有成功。其實進行這種陰謀行動的外在環境并非完全不利。聯邦德國在戰后最初幾年并未像戰勝國所希望的那般，通過“啟蒙”（Aufklärung）和“再教育”（Umerziehung）等措施達成民主共識。可即便如此，那批心懷奪權夢想的納粹忠實信徒在戰后世界還是欲振乏力。如果仔細觀察一下這個詭異戲碼中的那些角色，便可以明白為什么會這樣。那些人來自截然不同的世界，更何況一個“國家社會主義國際”在本質上即已矛盾百出。不管再怎么期盼推動陰謀，他們缺乏一致的宣誓效忠對象，除了負面目標之外并無共識，更何況他們對舊時代的記憶也千差萬別。最根本的，他們是著眼于舊日圖景的陰謀家，因此沒有關于現在究竟該如何奪權的實際想法。這樣一個純粹感時傷情的團體無法激發對自身力量的信心，無論在彼此之間還是對潛在的選民來說都是如此。

盡管如此，逃往阿根廷的納粹黨人與德國和奧地利的同黨之間維持著多方面的聯系，遠不止寄送貼著彩色郵票的航空郵件而已。即使沒有像霍特爾這樣的情報販子，以及他與許多情報機構的聯系，1953年時仍有許多人知道艾希曼的藏身之處和庇隆的水力發電項目。假如蓋倫組織繼續追蹤了1952年6月那條線索的話，那么其探員可能已經查明了艾希曼在哪里工作，這是原始消息中沒有提到的。西德各個機構對弗里奇和魯德爾政治野心的緊張反應表明，他們至少已經意識到，還有哪些人可能在阿根廷。他們其實根本不必向馬斯特和霍特爾支付大筆金錢，就能夠獲得相關情報。

### 艾希曼被雙手奉上

不管有關艾希曼下落的消息是如何傳到霍特爾和馬斯特那里的，決定要把這個消息透露給西蒙·維森塔爾的做法還是引人深思。1953年年初，任何跟情報部門打過交道的人都知道霍特爾會怎么處理各種消息，也知道集郵愛好者西蒙·維森塔爾究竟是何方神圣。他一直張揚地熱切參與追捕納粹的行動，1947年即已在林茨成立“猶太文獻中心”，并且與美國和以色列的情報機構保持聯系。霍特爾和馬斯特一定已經充分意識到了自己在干什么——那就是告發阿道夫·艾希曼。關于水電站建設工程的線索是如此精確，僅需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隨便問一下即可追蹤到“卡普里”，畢竟該公司正在進行阿根廷政府最大規模的工程項目之一。這次揭發工作最終沒能成功，原因在于二人秉持典型的反猶太主義納粹思維方式，以致過分高估了西蒙·維森塔爾的影響力。在那種相信“猶太世界陰謀”的教義當中，“猶太人”（der Jude）只可能被想象成一個群體。[[137]](#_137_3)按照國家社會主義的狂想，街角隨便一個猶太小販所具有的影響力，實際上便已遠遠超過大型猶太組織。此外，“猶太人”所思所想的事情，當然就只有統治世界和復仇。從表面上來看，二人的做法簡直是向“猶太人”奉上一個大銀盤，在里面裝著他們的敵人阿道夫·艾希曼。這不禁讓人提出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到底誰在1953年會希望借此獲利？

當一個人想要傷害另一個人的時候，其背后的個人動機可能是畏懼、報復，或者是幸災樂禍的心理。霍特爾無疑知道艾希曼曾發誓要殺死他，因為是他把艾希曼承認殺害600萬人的說辭公之于世的。可是艾希曼遠在天邊，更何況霍特爾對此類威脅并不陌生，畢竟他與盟軍的合作早就給自己制造了為數眾多的敵人。薩森訪談會成員之一朗格爾博士（Dr. Langer）曾告訴阿根廷的人，早在1945年5月的時候，維也納地區就已經到處都能聽到對霍特爾的威脅了：“每個人心中都懷有對霍特爾的莫大恨意。我從許多人——而不只是一個人——那里聽到‘如果逮到那家伙，我非把他殺掉不可’之類的話。”[[138]](#_138_3)盡管威廉·霍特爾顯然十分樂意通過自己的言論盡可能抹黑艾希曼，甚至在艾希曼被處死之后仍然對他的名氣嫉妒不已，但我們實在很難想象霍特爾需要如此大費周章。如果霍特爾自己真的想要揭露艾希曼的蹤跡，或者不管是誰促使霍特爾走上這一步，那么他其實只需要把這封信復制幾份，然后發給國際新聞媒體即可。然而據我們所知，霍特爾和馬斯特在1953年并沒有向維森塔爾以外的任何人出示那封信件。但由于德國安全機構的檔案處大門緊鎖，我們所知的非常有限，只能猜測霍特爾和馬斯特是否果真有辦法在蓋倫組織、海因茨情報處、聯邦憲法保衛局等單位都不知情、不參與，或者至少事后也沒有得到消息的情況下采取那樣的行動。

對于懷抱無限野心的人而言，采取這樣行動的原因當然有可能是為了在情報界揚名立萬。但如果真有人打算通過追蹤戰爭罪犯來給自己加分的話，那么自己所屬的情報機構肯定會成為遞交消息的首選對象。然而霍特爾在美國和德國情報單位那里已經名譽掃地，曲線救國可能反而是最好的出路。早在1952年11月的時候，霍特爾就已被列入聯邦憲法保衛局的警告名單。所有德國和美國的情報機構都把他視為不可靠的聯系人，因為他編造了一系列假情報。[[139]](#_139_3)但如果繞路繞到了一個被懷疑替以色列搞情報的人那里，這種思路未免太過復雜。貪財的動機同樣也可以排除，因為那封信從未出售過，至少維森塔爾從未支付過十萬美元，而且他從來也沒有過那么多錢。就算有另外一方為此行動向馬斯特和霍特爾支付了豐厚的報酬，問題依舊存在：為什么會有人對公開艾希曼的地址感興趣？

假如那個信息不只是讓維森塔爾心頭一驚，而是果真成功地告訴了“猶太人”艾希曼躲在哪里，結果又會怎樣呢？馬斯特和霍特爾，或者其幕后主使者，期待看到納胡姆·戈爾德曼（“猶太世界陰謀”那種鬼話的支持者認定他是全體猶太人的專制頭目）做出何種反應？“那些猶太人”會做出怎樣的事情？站在今天來看，可能出現的情況有二：要不就是當時仍然積極活動的復仇小組果真悄無聲息地把艾希曼殺了，否則就像后來那樣把他帶上法庭，除非艾希曼及時獲悉自己行蹤敗露，并且及時找到新的躲藏地點。可是除了身為受害者的猶太人之外，還有誰會對這些可能有興趣呢？

霍特爾作為唯一能夠直接引述艾希曼原話的人，借此過上了很不錯的生活。除非霍特爾和馬斯特打算讓關于猶太人大屠殺的情報隨艾希曼一起離開人世，不動聲色借刀殺人的做法才會帶來好處。換句話說，讓猶太人執行這項骯臟的工作干掉艾希曼，從而使真正的關鍵證人再也無法證實受害者數字。然而這種解釋具有一個重大缺陷：假如二人果真這么想的話，那么他們必須先認為艾希曼所引述的數字符合真相。除非相信艾希曼會說出讓人難堪的事情，否則殺人滅口就沒有意義。在1953年的時候，德國和奧地利沒有幾個人相信此事，甚至連威廉·霍特爾自己也不信。[[140]](#_140_3)

今天我們簡直無法想象，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人們究竟對納粹罪行知道多少，或者想知道多少——他們幾乎一無所知。在德國和奧地利所能獲得有關猶太人大屠殺的資訊——假如人們在重建和新生之余還有閑暇顧及于此的話——差不多全部來自新聞界，亦即來自對戰爭罪行審判的報道。然而在一個剛剛戰敗的國家，這些審判并沒有什么好名聲。諸如“勝利者的正義”（Siegerjustiz）、“宣傳說辭”（Propaganda-Aussagen）、“用來嚇人的故事”（GreuelGeschichten）、“集體罪責”（Kollektivschuld）、“報復性判決”（Racheurteil）等等字眼流傳甚廣，而且“600萬”這個數字更是顯得完全不可思議，需要各種解釋說明和證據資料才可讓人勉強理解。然而此類解釋說明和證據資料在1953年的時候完全付之闕如，當時雖已開始出現第一批討論希特勒和國家社會主義的書，但還沒有關于滅絕猶太人的出版物。戰爭結束八年之后，獲得對大屠殺初步印象的唯一途徑就是研究審判文件，然而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接觸到它們。在這種情況下，最常見的反應莫過于懷疑和排斥。大屠殺否定論者很容易就能得逞，甚至連幫兇們都可以安慰自己，“沒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今天我們能夠讀到集中營指揮官魯道夫·赫斯的供詞、萬湖會議的記錄、各個特別行動隊指揮部的報告、對集中營的描述、謀殺統計數據，當然還有艾希曼的供述。除此之外更有各種精心編輯的文獻選集、汗牛充棟的專題報告文學，以及多得令人難以忍受的圖像資料。可是在1953年的時候，除了紐倫堡的判決書之外，一本這樣的書也找不到，相反只有企圖模糊一切、否認一切的犯案者和知情者，以及幾乎沒有重新找到自己聲音的幸存者。即使在新成立的聯邦共和國，其議員針對國家社會主義罪行所發表的聲明，讀起來往往也像照本宣科，說出政治正確的言論——實際上只是講一些自己知道不得不講的話，而并沒有真正認同它們的含義。[[141]](#_141_4)除了曾經直接參與犯罪，因而確切知道發生過什么的人以外，大多數人甚至不知道艾希曼還能透露什么更糟糕的事情：另一個沒人想要聽到的、令人難以置信的證詞？所以何必繼續動腦筋，推測為何會有人想要掩蓋他的證詞？只有知道內情的人，才會希望在艾希曼講出更多名字之前就讓他閉上嘴巴。然而相比于干脆讓他不受干擾地騎馬穿越圖庫曼的崇山峻嶺，泄露艾希曼的行蹤是危險萬分的事情。

在狂熱的大屠殺否認者看來，亦即在固執地相信另一種真相的人們眼中，事情卻顯得截然不同。《路徑》的撰稿者們、退役的奧托·恩斯特·雷默將軍，以及數目多得嚇人的不可救藥的反猶太主義者，他們一方面對猶太人恨之入骨，熱衷于滅絕猶太人的想法，同時卻又把多達數百萬的遇害人數視為謊言，或至少盡可能地加以淡化。從此角度觀之，最清楚事情真相的艾希曼就有了迥然不同的意義。在否認者的世界里，艾希曼只可能說出他們想要的真相，那就是一切都不像大家在紐倫堡所聽到的那樣，是“猶太人”自己杜撰了屠殺的規模。艾希曼的證詞可望減輕德國人的罪責，并表明是猶太人自己一如既往地顛倒了事實，從謊言中牟利。《路徑》最成功的文章之一就叫《600萬人的謊言》（Die Lüge von den sechs Millionen）。[[142]](#_142_3)用吉多·海曼（Guido Heimann）這個假名，該文作者聲稱，只有36.5萬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反對者遇害，而且既沒有系統化的大屠殺，更沒有毒氣卡車或毒氣室。其他與此不同的講法都是對歷史的大肆篡改。需要一名關鍵證人來駁斥這種“謊言”，而且即使在這種粗糙的歷史觀中，那個證人同樣也是艾希曼。

1953年聯邦國會選戰期間，這個所謂“謊言”在政治層面所產生的意義將給國家帶來改變。僅僅兩年前，康拉德·阿登納才終于痛下決心，在聯邦國會公開承認德意志民族因為國家社會主義罪行所應承擔的罪責與責任，以及全體德國人對以色列國家和猶太民族所應承擔的義務。[[143]](#_143_3)西方盟國在賠償問題上施加的壓力，讓人無法再繼續沉默下去。西德不得不公開承認自己的過去，否則就不可能重新加入國際社會。聯邦政府在與猶太人“要求賠償聯合會”（Claims Conference）的代表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談判之后，于1952年針對賠償事宜簽訂了《盧森堡條約》，分12年向以色列償付總值34.5億德國馬克的金錢、實物和服務。這個條約在許多人眼中是一個丑聞。為了獲得聯邦議會的批準，阿登納需要社會民主黨的選票支持，因為在他自己的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中有太多議員拒絕這個條約。與納胡姆·戈爾德曼簽訂的條約所引發的激辯，導致基督教民主聯盟-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內部出現巨大危機，阿登納似乎已岌岌可危。不僅極右翼的圈子否認以色列有權獲得任何賠款，民意調查更顯示，只有11%的德國人支持《盧森堡條約》。[[144]](#_144_3)假如在這種情況下，能像陰謀論者所期待的那般，有一個像艾希曼一樣懂得詳細計算的人挺身而出，表明納粹的罪行沒那么嚴重，或至少不是由德國人犯下的，后果將極為驚人。不僅可以抹黑阿登納，讓那個條約再也站不住腳，令猶太人因為自己的“欺騙”在全世界顏面盡失，而且——最重要的是——讓德國人擺脫罪責。真相終于可以大白，原來是“猶太人”自己炮制出的那一切，為的就是獲得巴勒斯坦和攫取金錢。

從各種五花八門的論述即可看出，當時人們確實是這樣想的（其實今天也還有人如此認為[[145]](#_145_3)）。那些不斷推陳出新的陰謀論所涉及的范圍，從簡單否認大屠殺到精心炮制理論，宣稱猶太人在希特勒的背后滲透進蓋世太保，并且自導自演了一場大規模猶太人自相殘殺的戲碼。在此褻瀆事實的胡言亂語中，兇手阿道夫·艾希曼轉變成為希望的象征，變成了那種奇特“真相”的關鍵證人。艾希曼被捕之后，媒體——不只是右翼報刊——的反應立刻以駭人聽聞的方式呈現出，這種偏執的救贖希望在20世紀50年代盛行到了什么程度。那些新聞報道充斥著對以色列的警告，強調艾希曼恐怕會“披露對他們不利的事實”。例如《紐約時報》預言說，對艾希曼巨細靡遺的公開審判“對以色列弊大于利”，并且不可避免地“會對以色列產生負面影響”。《明鏡周刊》則在事情發生之前就引述了“最初讓人意想不到的反應”。極右派的《國族歐洲》月刊津津有味地列出了每一個這樣的警告——或至少幾乎每一個，因為《明星周刊》（Stern）提出的警告——“以色列國恐有成為納粹繼承人之虞”——就被置之一旁，《國族歐洲》顯然不想給自己的國家社會主義讀者們添堵。[[146]](#_146_3)

荷蘭籍黨衛隊隊員威廉·薩森更在1960年年底的一次采訪中將那種妄想表達得淋漓盡致。他解釋說，以色列政府根本不可能卷入綁架艾希曼的行動，因為以色列當局是最不愿意讓艾希曼開口的人，免得他揭穿了以色列賴以立國的謊言。顯然是一小群自行其是的猶太“狂熱分子”（elementos fanáticos）綁架了艾希曼，有人一心想要隱瞞的事實如今終于到了重見天日的時候。[[147]](#_147_3)阿道夫·馮·塔登作為年輕的聯邦德國最具影響力的極右派人士之一，甚至直到1981年都還希望出版艾希曼的阿根廷隨想：“那‘600萬人’將被證明是個謊言，是35年來一直被惡意傳播的不實陳述。”[[148]](#_148_3)可是這一團胡言亂語有一個關鍵的問題：猶太人大屠殺并非猶太人的謊言，而是完全出自德國人的策劃，德國人艾希曼更因為能夠實施謀殺行動而沾沾自喜，絕不可能矢口否認。如果寄希望這個人能以某種方式幫助德國洗脫罪責，那根本是異想天開。畢竟艾希曼的言論向來只揭露了一個事實，即德國所犯下罪行的巨大規模，以及成為德國人狂妄的受害者的人所承受的無法估量的痛苦。

今天我們會覺得許多事情難以想象，因為我們確切地知道艾希曼實際講過哪些話，而且可以參考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各種文獻記錄與研究成果，但在1953年的時候，仍有許多人相信，艾希曼將把他們想象中的真相公之于世，因此光是他的存在就足以對以色列的地位和康拉德·阿登納的和解政策構成威脅。年輕的聯邦共和國與戰后的德國社會都還遠遠稱不上穩定，一旦“揭露了事實”（如果真有那種事實的話），必然會受到巨大沖擊。這種對王牌證人艾希曼的偏執信賴，很可能就是馬斯特向維森塔爾出示阿根廷來函的隱藏動機。他們以為這樣便有辦法用艾希曼的證詞來威脅“猶太人”，進而釋放出爆炸性的政治后果。既然他們的想法錯得如此離譜，行為自然也就脫離了現實。

維森塔爾現在確信，他之前關于艾希曼下落的線索全部誤入歧途，更何況他從威廉·霍特爾和海因里希·馬斯特那里得知的艾希曼下落，并非當時接獲的唯一線索。薇拉妹妹的一個朋友住在林茨附近，同樣告訴維森塔爾薇拉已經移民到了南美洲。不止于此，“1953年7月，我在維也納……與公安總長帕默博士（Dr. Pammer）會談，恰好談起了艾希曼。帕默也告訴我，他有情報顯示……艾希曼正藏在阿根廷。”此外，維森塔爾還間接通過另外一封信件，獲得了至少同樣可疑的暗示，而且寄件者就是阿明·阿爾-侯賽尼本人。[[149]](#_149_3)收件人是維森塔爾住在慕尼黑的一位朋友，名叫艾哈邁德·比吉（Ahmed Bigi）。[[150]](#_150_3)比吉幫維森塔爾把那封信的內容翻譯了出來，穆夫提在信中直接提及“有關艾希曼去向的問題”。維森塔爾自己聽得半信半疑，畢竟那也有可能是“穆夫提聰明的一步棋”，試圖通過維森塔爾的朋友，轉移別人對艾希曼可能置身中東一事的注意力。維森塔爾本身不懂阿拉伯文，但他與比吉的私人關系令他相信，信中真的包含了比吉翻譯給他的內容。即使后來有人發現，提出問題的人并非阿爾-侯賽尼，而是曾經為希特勒的外交部工作過的另一個穆斯林，維森塔爾仍然沒有改變態度。他寫信告訴納胡姆·戈爾德曼，他“當然不能百分之百保證艾希曼在阿根廷”[[151]](#_151_4)，但可以確定的是，諸如“艾希曼在特拉維夫重新現身”、“黨衛隊將領在中東”，或者穆夫提的“德國顧問”之類的大標題都錯得離譜。[[152]](#_152_3)

在相當短的一段時間，維森塔爾已經獲得了好幾條線索，紛紛指出艾希曼根本不在中東，只能去南美洲找。但與這個事實一樣令人驚訝的是，盡管維森塔爾把他的新發現通報給了包括以色列駐維也納領事館和納胡姆·戈爾德曼在內的所有聯絡對象，而且這個消息甚至還傳到了美國中情局那里[[153]](#_153_3)，對艾希曼的搜捕卻并沒有因此加強。相關信息幾乎無處不在，卻一直被置之不理。與蓋倫組織在前一年的表現一樣，非德國的情報機構對于將那名戰爭罪犯繩之以法同樣興趣缺缺。

不管是誰曾經打算借由透露艾希曼的行蹤來產生回響，結果都只會大失所望。維森塔爾更因為其他人興趣寥寥而深受打擊。他在回憶錄中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孤軍奮戰的正義斗士，但幾乎沒有人對他感興趣，“感覺自己與少數幾個志同道合的傻瓜一起孤立無援”。[[154]](#_154_3)日常的政治事務更加重要。時值大國進行冷戰、朝鮮爆發熱戰之際，“在此背景下，阿道夫·艾希曼的形象已經褪了顏色。每當我試圖和美國朋友們討論他的時候，他們總是略顯疲態地回答：‘我們還有其他問題。’”[[155]](#_155_3)康拉德·阿登納雖已承諾要負起責任，但這并不表示他會鍥而不舍地揪出那些該負責任的人。相反，正當外交部某些人員背景可疑的爭議甚囂塵上時，阿登納在簽訂《盧森堡條約》之后立刻向聯邦議會宣布：“在我看來，我們應該停止到處搜尋納粹了。”[[156]](#_156_3)接下來幾年，總理的這句話將對德國官方機構產生法律般的效力。

## 第三節 友情相助

請您明白，我無意讓艾希曼這樣的專家能手離開總局，而且今天他對我來說更是無可取代。

——弗朗茨·阿爾弗雷德·西克斯（Franz Alfred Six）評論其下屬，1938年[[157]](#_157_4)

雖然艾希曼在阿根廷，完全不可能知道那封寄給他昔日奧地利朋友威廉·霍特爾的信，但他絕對清楚杜勒出版社圈內人的野心。魯德爾公然計劃搬回德國，以便在那里投身政治；薩森因為寫給美國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_382)總統的公開信鬧得滿城風雨，以致凡是在這個流亡者圈子內走動的人，都無法不注意到焦點已重新轉向德國；弗里奇已在歡慶《路徑》的成功，而且目標明確地與一些德國報刊積極合作，宣揚幾乎原封不動的納粹意識形態。他們都密切關注1953年的聯邦議會選舉，因為那將影響到未來的發展。德國經濟復蘇并顯露出經濟奇跡的端倪也是一個吸引力，因為阿根廷正日益陷入危機。

我們尚不清楚艾希曼、弗里奇和薩森第一次見面究竟是在什么時候——基于顯而易見的理由，他們三人都難得對此做出可靠的說明。一名曾在納粹國防軍服役、在阿根廷不時幫德國有錢人工作的波蘭男子，作為獨立證人宣稱：薩森在圖庫曼就已經和艾希曼打過交道，但要等到艾希曼于1953年回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之后，倆人才經常見面。[[158]](#_158_3)艾希曼自己則宣稱，他是在歡迎奧托·斯科爾策尼的一個大型社交場合首次遇見弗里奇和薩森的，但要等到弗里奇以出版商的身份邀請他合作出書之后，他才真正與薩森成為朋友。[[159]](#_159_3)這兩種情況都不無可能，因為威廉·薩森非但知道奧爾斯特·卡洛斯·福爾德納和“卡普里”，還是各種社交活動上廣受歡迎的常客。人們因為其國家社會主義者的身份對他產生興趣，而他與許多團體和個人有所交往，更可一直上達阿根廷的庇隆總統。奧托·斯科爾策尼關于他在1954年才把薩森介紹給艾希曼的講法，則根本是無稽之談，因為所有參與者在那個時候早就相互認識了。斯科爾策尼顯然是想轉移別人的注意力，忽略他與阿根廷德國人群體的深層羈絆。[[160]](#_160_4)斯科爾策尼很可能是在1949年年初第一次來到阿根廷的，比艾希曼的抵達時間早了很久，之后幾年往返于布宜諾斯艾利斯和馬德里之間。這名所謂的“墨索里尼營救者”和希特勒手下的破壞工作專家，直到老年都在右翼圈子內極受敬重，因此從防諜隊到摩薩德之類的所有情報機構都跟他是老相識。艾希曼和他至少在柏林的一次宣傳活動上就已相識，所以斯科爾策尼確實有可能把薩森和弗里奇介紹給艾希曼，不過艾希曼和弗里奇最晚在1952年6月就已經彼此認得了。此外他們也有可能是因為安排艾希曼一家團圓的那個組織建立了交情。但不管怎樣，任何認識弗里奇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也會認識威廉·薩森。

薩森這位荷蘭武裝黨衛隊志愿者、昔日的戰地記者，想必對艾希曼產生了特別的吸引力，因為他致力于艾希曼也非常想做的事——著書立說。薩森用威廉·斯勞瑟（Willem Sluyse）那個廣為人知的筆名發表過許多聳人聽聞的文章，并吹噓自己作為記者在國際新聞刊物上的成功表現，但最重要的是，他協助魯德爾和阿道夫·加蘭德（Adolf Galland）等人撰寫了回憶錄。[\*](#_383)薩森在1953年年底、1954年年初更是忙得不可開交。他不但重新包裝了魯德爾關于德國的報道以利行銷，并在魯德爾回來以后立刻用“磁帶錄音機”[[161]](#_161_3)將其內容保存下來，此外薩森還在撰寫自己的小說。兩本書后來都在1954年發行，那本小說甚至在年中即已出版。

魯德爾的《德國和阿根廷之間》一書，主要以緊張刺激的細節來講述他時而非法進行的德國之旅，以及在當地的政治活動；薩森的小說則設法勾勒出國家社會主義者的戰后心態。薩森的新作也用筆名“威廉·斯勞瑟”發表，那個筆名早已因為《給艾森豪爾將軍的公開信》有了名氣。《門徒與婊子》（Die jünger und die Dirnen）這本小說包含七個樣板角色。當最后的勝利化為泡影后，他們必須決定自己到底是誰，以及真正想成為什么樣的人：是國家社會主義理念的門徒，還是敵人——也就是占領國——的婊子？因為占領國正在折磨、羞辱、引誘和驅逐那些可憐的希特勒理念的追隨者，更打算通過“再教育”來根除薩森一心所系的國家社會主義精神。

這部小說的各種元素被包裹在一種呼吁奮戰不懈的贊美詩當中，其感傷的語言力量遠遠勝過了尋常的納粹文學。寫出這本書的人，宛如演奏家熟練運用樂器一般精湛地控制著德國語言鏗鏘有力的節奏。薩森信手拈來的豐富語言卻讓人覺得格外不幸，因為他把這種天賦浪費在如此讓人難以忍受的胡言亂語上面。他寫出來的并非文學作品，而是一場由淫穢暴力、偷窺狂熱、反猶主義陰謀論、誹謗一切意識形態“敵人”，以及懷舊感傷的納粹八股所共同構成的狂歡。不過我們還是必須感謝薩森，讓我們得以借此直接窺見那一代人的內心世界——他們不但事業生涯在半途戛然而止，而且帶著一個徹底失敗了的意識形態，擱淺在現實的或心靈的流亡生活中。由于薩森毫無保留地套用他自己[\*](#_384)以及他周圍那些人的生平事跡，這本當然也由杜勒出版社發行的小說提供了不少關于那個小圈子的寶貴資料。艾希曼認出第二章的一個人物是自己，很難讓人相信此事純屬偶然。

書中的埃爾溫·霍爾茨（Erwin Holz）曾是黨衛隊旗隊長和集中營指揮官，在精神病院向托馬斯·鮑爾（Thomas Bauer）醫生解釋了自己的想法和行為。鮑爾醫生的任務是鑒定這名來自美國戰俘營、已經“被拷打得半死不活”的病患是否具有責任能力。其鑒定結果將決定霍爾茨是繼續留在醫院，還是必須接受死刑。醫生對這名“最終解決者”（Endlöser）的態度先是厭惡，后是冷淡，最后卻反而被其吸引。最終，霍爾茨在西德蘭茨貝格（Landsberg）監獄執行死刑前自盡身亡。除了醫生清醒的聲音外，這一章由主人公埃爾溫·霍爾茨的話貫穿全局。薩森讓霍爾茨發表了一篇獨特的辯解演說——其“充滿穿透力的聲音”宛如“解剖刀”那般讓人一聽難忘，其“時而相當粗糙的論點和主張”令人心煩意亂，卻都是硬道理。

弗里奇似乎也很喜歡這一章，把它作為該書的試讀篇發表在《路徑》上。[[162]](#_162_3)任何曾經聽過艾希曼講話錄音、觀察過他的論證方式的人，都會注意到他與書中人物的相似性，甚至連個別措辭用語都相同！[[163]](#_163_3)即便人物的外貌形象讓人聯想起薩森也熟識的那位集中營“醫生”約瑟夫·門格勒，但門格勒長篇大論的自我辯護有著截然不同的風格，這從他的日記就可以看出來。[[164]](#_164_3)當我們閱讀薩森筆下的霍爾茨的言論時，艾希曼的聲音如在耳畔：“我們只不過是死神的簿記員罷了”、“我沒有什么好后悔的”、“我們想把猶太人從我們中間趕出去，可是失敗了。”[[165]](#_165_3)實在很難想象薩森在見到艾希曼之前就能寫出這種文字。[[166]](#_166_3)假使果真如此的話，那么這個埃爾溫·霍爾茨就驚人準確地預言了一個即將與薩森共同度過一生中最緊張工作階段的人物，而且薩森早在1954年即已充分理解了那個人的想法，所以才有辦法加以模仿。

\*\*\*

然而還有另一段插曲清楚地顯示，弗里奇、薩森和艾希曼最晚在1954年年中就已經往來密切：在那年8月期的《路徑》上，艾希曼讀到他和妻子已在1945年5月離開了人世。這個來得過早的死亡公告被偽裝成一封來自一位“美國名人”的冗長讀者來信，而其標題《在真理的道路上》（‘Auf den Straßen der Wahrheit’）下面出現的卻是一個完全無人知曉的名字——沃里克·赫斯特（Warwick Hester）。那篇冗長的文字著眼于摧毀一切涉及系統化滅絕猶太人的證據，是海曼在同年7月大獲成功的《600萬人的謊言》一文的直接延續。該文作者將每一個可能的證人都詆毀成說謊者或騙子，為的是在第三頁“駁斥”了毒氣卡車的存在之后，隨即幾乎不經意地提到艾希曼已經死亡的消息：

一名低階黨衛隊軍官聲稱自己認識一個名叫艾希曼的高級官員，曾在其手下做事。戰爭結束前不久，那位猶太人事務專家艾希曼曾私下向他透露，迄今共有大約200萬猶太人遭到特別行動隊殺害。等到投降的時候，艾希曼和他的妻子便服毒自盡了。這個信息同樣無法驗證，但我找不到任何誘使他說謊的動機。[[167]](#_167_3)

這是第一次，同時也是唯一一次出現此種有關艾希曼全家自殺的消息。此外很少有人認為艾希曼有可能自尋短見，盡管威廉·霍特爾顯然曾在1947年年初散播過這樣的消息，甚至在英國追捕人員那里還獲得了些許成效。[[168]](#_168_4)對迪特爾·維斯利策尼來說，那根本是不可思議的事情。[[169]](#_169_3)那場“戈培爾式落幕”[\*](#_385)的“見證”，與《路徑》那篇文章中的許多所謂“事實”一樣，都是公然杜撰出來的。該文作者的意圖，擺明是要讓艾希曼及其家人在世上享平安，免于繼續受到追捕。但這種做法也不無風險，因為艾希曼的名字迄今從未在《路徑》上出現過。此刻突然談論起他的“專業領域”，難免讓人明顯地察覺到，最近刊出的各種相關主題報道都有意沒有提及艾希曼，即便他的名字本應在那里有一席之地。霍爾格·梅丁（Holger Meding）曾對《路徑》進行過系統研究，并采訪過《路徑》昔日的工作人員迪特爾·福爾默，同樣得出結論，認為“《路徑》在此之前極力避談艾希曼，以免間接泄露任何有關其停留地點的線索”。[[170]](#_170_3)但似乎沒有人意識到這個自殺公告露出了馬腳，尤其對維森塔爾和霍特爾之類后來還見過艾希曼或其妻子的人來說，那根本就是個謊言。杜勒出版社的工作人員，以及知道里卡多·克萊門特是誰的新阿根廷讀者們，或許會與那個“死人”在ABC餐廳共飲一杯葡萄酒，痛快地嘲笑一番這個詭計。但那篇文章還有更多含義，泄露了作者與艾希曼之間的許多關聯。

《路徑》上的那篇文章試圖把所有涉及滅絕猶太人的證詞都一筆抹殺。因此同一篇文章當中還出現了詆毀“霍特爾博士”的文字，稱他為防諜隊跑腿、把自己賣給了猶太人、為蘇聯搞間諜活動、勒索了“一大筆錢”、有計劃地撒謊，現在更以他“遍及西德、奧地利和東南歐的諜報組織”挑撥所有各方相互對抗。但由于他知道“600萬人的謊言”的實際內情，結果卻沒有人敢對他怎么樣。[[171]](#_171_3)作者令人目瞪口呆地計算，證明“猶太人的”人口結構使大規模滅絕事件根本不可能發生。為求保險起見，他還引述了與“一位我非常敬重的北美猶太裔人士”私下談話的內容。那位想必還是心理學家的先生向沃里克·赫斯特坦承，600萬這個數字是一場騙局：“我們認為600萬雖不至于多得看起來不可能，但足以在一個世紀的時間里讓人毛骨悚然。希特勒給了我們這個機會，我們只不過是加以利用，并且正如您所看見的那樣，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172]](#_172_3)由于這位沃里克·赫斯特對猶太人“一片好意”，他在文末特地向猶太人提出警告，千萬不要把這種游戲玩得太過火，因為謊言被揭穿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然后“對謊言的內在抗拒”將會演變成外在的反抗。他總結說道：“讓我擔心的是，這恐怕會激起對謊言編造者的事后報復，那時，在事件以一種既悲劇又諷刺的方式發生翻轉后，謊言將成為事實。”換句話說，如果再有數百萬猶太人遭到謀殺的話，那他們就是自作自受。不管躲在沃里克·赫斯特這個名字背后的到底是什么人，他都出色地掌握了犬儒主義。

除去關于艾希曼死訊的部分之后，《在真理的道路上》通篇都像是篡改歷史的典型范例，亦即習稱的修正主義。修正主義的支持者們聲稱1945年以后的整部歷史都是政治宣傳，必須從根本上修改。但這篇文章的意義不僅于此。它恰恰就是大屠殺修正主義的主要立論根據，而這一事實長期以來一直未被注意。僅僅幾個月后，所謂的《赫斯特證人報告》（Hester-Zeugenbericht）便與據稱來自薩爾茨堡的“吉多·海曼”撰寫的那篇專文緊密結合，在德國廣泛流傳開來。極右派作家與出版商赫伯特·格拉貝特（Herbert Grabert）在其同樣以化名發表、題為《缺乏領導的民族》（Volkohne Führung）的一本小冊子中，也談到了“美國記者沃里克·赫斯特”，以及36.5萬名納粹政權的受害者，而且猶太人在其中僅占了很小一部分。[[173]](#_173_3)除此之外，巴特沃里斯霍芬（Bad Wörishofen）的新納粹主義刊物《控訴：被剝奪權利的戰爭受害者的聲音》（DieAnklage: Organ der entrechteten Kriegsgeschädigten）也刊登了一篇文章，試圖駁斥“最卑劣的篡改歷史行為”，并且引述了一位新專家的話，一位“舉世聞名的北美人士”。那位專家不是別人，同樣還是沃里克·赫斯特。[[174]](#_174_3)文章還配上了一份臭名昭著的虛構紅十字會報告，確證納粹政權敵對者的受害人數為36.5萬——多么湊巧的數字！極右翼的圖書和雜志，以及故意發表在嚴肅刊物上的目標明確的讀者投書，共同機巧地配合，構成了否認猶太人大屠殺的主要“證據來源”，而且直到今天都還構成歷史修正主義的核心內容。[[175]](#_175_3)一名杜撰出來的美國專家、一個據稱來自薩爾茨堡的“內部人士”，而且二人都幫同一家阿根廷納粹刊物撰稿，以及一份據稱來自德國的虛構紅十字會報告，巧妙地交織在一起并相互引證，已經足以通過媒體網絡掀起鋪天蓋地的報道。

赫斯特那篇文字在1990年又被重新翻出，但如今宣稱隱藏在沃里克·赫斯特背后的人，其實是同樣著名的“美國律師史蒂芬·平特（Stephen F. Pinter）”。從此這份偽造文件以《平特博士報告》（‘Der Dr. Pinter-Bericht’）之名肆虐于相關出版物和互聯網。[[176]](#_176_3)史蒂芬·平特據說對什么都一清二楚，因為這位來自美國圣路易斯的先生是“達豪審判案的公訴人之一”。除此之外，不時還有人為了保險起見而稱他自己就是猶太人。一個猶太裔美國律師出面作證駁斥猶太人大屠殺的說法，這當然是不容置疑的事情——至少跟納粹一樣想法的人必定如此認為。但其實從來沒有過一個名叫史蒂芬·平特的美國起訴人，這是否令人驚訝？這個名字在1959年年底、1960年年初時首次出現在兩封讀者來信里，內容幾乎逐字逐句地重復了赫斯特與海曼的胡言亂語。其中一封來信出現在廣受歡迎的美國雜志《我們的星期日訪客》（Our Sunday Visitor）上，隨即被《國族歐洲》刻意收錄轉載。《國族歐洲》也刊登過斯勞瑟的公開信，而且與《路徑》有著長久的合作歷史。[[177]](#_177_3)

分析過這種協調一致的行動，即可理解小團體如何發揮出巨大的力量，以及弗里奇和他的小圈子為何有信心夢想再次奪取權力。多虧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這個偽造工坊，系統化滅絕猶太人行動的否認者獲得了他們最常引用的基本材料。阿根廷曾有其他國家所不可能具備的新聞自由，并且被有目的地充分利用。老同志之間跨大西洋的出版物交流以驚人高效的方式運作，那批人顯然在“賠償”條約簽訂之后已經絕望至極，以至不惜使用這樣的欺瞞伎倆。

至今仍然無法完全確定，究竟是誰躲在“沃里克·赫斯特”這個名字背后寫出了那篇文章。雖然它所使用的隱喻手法和夸張效果像極了薩森，但也可能出自約翰·馮·萊斯之手，因為他同樣以各種不同的筆名為《路徑》撰稿，后來還很不情愿地承認自己在阿根廷曾經問過艾希曼遇害者的人數。杜勒出版社在偽造讀者來信和為杜撰的作者炮制駭人聽聞的履歷等方面很有辦法。此外可以確定的是，這位“著名的美國人”就來自杜勒出版社和艾希曼的周圍。原因不僅在于該文充滿了典型《路徑》風格的表達方式，而且只有這樣才能解釋那個離奇的死亡通告。艾希曼自戰爭結束后就試圖讓自己被宣布死亡或者遭人遺忘，可惜一直徒勞無功。1954年8月，他終于能夠白紙黑字讀到自己已經完全消失的信息。這也向他證明了，弗里奇和杜勒出版社的確具有足夠的影響，能夠左右政治。至少對艾希曼而言，他再次置身一個新運動的中心。[[178]](#_178_3)另一個額外的好處是，艾希曼可以慶祝威廉·霍特爾的人格宣告破產，看著那個處心積慮讓他活得艱難的人名譽掃地。這是骷髏頭同志們做出的另一次“友情相助”。

\*\*\*

有趣的是，1954年在奧地利也出現了一則死亡通告。林茨和維也納的報紙在6月初引用倫敦路透社的錯誤消息，稱1946年年中的時候，黨衛隊二級小隊長沃爾夫岡·鮑爾（SS Oberscharführer Wolfgang Bauer）在薩爾茨卡默古特山區（林茨附近的特勞瑙恩[Traunauen]）被一個猶太復仇小組槍殺，因為對方誤以為他就是艾希曼。他的尸體被草草掩埋在樹林里，結果等到幾個星期之后才發現殺錯人了。最初的一些文章卻讓人心生疑竇，認為搞不好真有可能是艾希曼遭到槍殺。艾希曼在阿根廷收到這些專文報道（或至少是《上奧地利日報》[Oberösterreichischen Zeitung]的版本），很可能是得到了他父親的幫助。按照他一貫的做法，艾希曼很快就用這個故事編制了神話，然后在薩森面前兜售。艾希曼從此宣稱，當他還待在呂訥堡石楠草原的時候，就已經聽說過那個處決的消息，并且還沾沾自喜地引用文章中的說法：“驚人的是，艾希曼死得相當體面。”艾希曼表示，“那讓我非常開心”，并且興高采烈地繼續撒謊，“我把剪報保存了很久，然后才將它燒毀”[[179]](#_179_3)，畢竟艾希曼不得不預防有人想要親眼看看那篇文章。等到薩森質疑他究竟是在什么時候讀到時，艾希曼才閃爍其詞地回答說：“大概是在戰爭結束四五年之后吧。”[[180]](#_180_3)

西蒙·維森塔爾一如既往地高度關注有關艾希曼的風吹草動。他立即駁斥了這篇9月也出現在以色列報紙上的錯誤報道[[181]](#_181_3)，以免艾希曼的死訊被信以為真。維森塔爾于是通過奧地利猶太宗教社群發表了反駁聲明，卻仍然無法阻止這個假消息進入研究文獻。阿爾騰薩爾茨科特一名與世無爭的養雞人，在奧地利報紙上讀到自己被暗殺身亡的消息，這樣的故事實在是太誘人了。[[182]](#_182_3)

同樣保持警覺的阿爾陶塞刑事調查員瓦倫丁·塔拉，也在1960年向弗里茨·鮑爾談起那篇報紙文章，并表示他懷疑是“倫敦的納粹圈子”散播了消息，以結束對艾希曼的搜尋。但那個消息的真正來源至今依然不詳。

蓋倫組織這時卻在努力不懈地繼續散播截然不同的消息，稱它收到了關于艾希曼在中東事業的新細節。消息來源是賽義達·奧特納（Saida Ortner），前黨衛隊成員費利克斯·奧特納（Felix Ortner）的新妻子。她聲稱艾希曼在1947年從意大利的一座美國戰俘營逃脫之后，便潛赴敘利亞，并于1948年改宗伊斯蘭教。1951年，他在開羅嘗試與鼎鼎有名的阿爾-侯賽尼大穆夫提取得聯系，但后者拒絕提供幫助，于是艾希曼被迫在同年離開了埃及。[[183]](#_183_4)如果我們認為賽義達沒有說謊，那么可能會認為這位見慣了阿拉伯姓名的女性或許搞錯了，把艾希曼和常被稱為“艾希曼最得力助手”的阿洛伊斯·布倫納混為一談。后者殺害了超過12.8萬人，如今搖身一變為格奧爾格·菲舍爾（Georg Fischer）博士，在大馬士革代表一些德國公司的利益，并且還是西德情報部門的非正式雇員。蓋倫組織盡管知道真相，卻還是將那個消息傳給了它的美國朋友。這表明德國情報收集人員之間一定存在著若干內部溝通問題。

1954年，相當多人開始猜測艾希曼的死亡。于是那個渴望被宣布死訊的人把相關消息告訴了家人。克勞斯·艾希曼在1966年依然印象鮮明地記得，“不斷有人帶著報紙文章過來”，上面寫著他如何在林茨附近遭到槍殺。[[184]](#_184_3)一個父親，給孩子們讀關于自己被處決的描述，在長達七年的時間里，讓年幼的孩子們以為永遠再也看不到自己的父親了，這恐怕不符合人們對一位體貼入微的家長的期待。難怪他的孩子們一直對此難以忘懷。

1954年8月，就在《路徑》宣布艾希曼夫婦已于1945年5月自殺的同一個月，西德駐布宜諾斯艾利斯大使館延長了兩名德國青年人的護照。他們在母親的陪伴下接受面試，并出示了來自科隆和維也納的身份證件，證件的持有人分別名叫克勞斯·艾希曼和霍斯特·艾希曼。[[185]](#_185_3)那位據稱已經自殺身亡的薇羅妮卡·卡塔琳娜·艾希曼（Veronika Katharina Eichmann），以法定監護人的身份幫兩個男孩簽了名——她婚前的姓氏為利布爾，當時居住在市內的奧利沃斯區，查卡布科街4261號（Chacabuco 4261, Olivos）。那兩個男孩在接受詢問的時候，能夠正確說出他們出生時父親的官階。[[186]](#_186_3)記錄中沒有表明他們離開時是否有人請孩子們代向他們的父親問好。然而鑒于西德大使館工作人員在接下來幾年里的表現，我們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

即使不惡意揣測，艾希曼一家對德國大使館的造訪也已經強烈地令人懷疑，那里沒有人真正愿意參與挖掘德國的過去。1954年時，阿道夫·艾希曼不僅愉快地發現，周遭都是愿意幫助他、認為他夠重要、值得一寫的人，同時還意識到，自己不僅在偏遠的圖庫曼安全無虞，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也沒什么危險，聯邦德國的法定代表機構完全不對他構成威脅。僅僅兩個月前，他們才按照真實姓名發了一本新護照給他的一位老朋友，曾經擔任過猶太人隔離區指揮官的大屠殺兇手約瑟夫·施萬伯格。[[187]](#_187_3)

### 不同的頭條標題

與各種關于艾希曼戰后生活的混淆視聽的做法同時存在的，是一個不利的發展：艾希曼之前的所作所為已經不可避免地暴露無遺。1953年的時候，格拉爾德·賴特林格（Gerald Reitlinger）在倫敦出版了《最終解決方案》（The Final Solution）一書，首次嘗試全面描述德國對猶太人犯下的罪行。雖然那本大部頭著作起初只有英文版，但它不僅包含了各種統計數字、地圖和豐富的細節，還有整整一章關于阿道夫·艾希曼的內容。那本書一開始在德國找不到出版商，慕尼黑的當代歷史研究所先是拒絕翻譯該書，然后又拒絕在《當代歷史季刊》上發表該書的書評。[[188]](#_188_3)盡管如此，賴特林格的《最終解決方案》即使在1955年德文譯本出版之前，就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討論的方式。賴特林格設法計算出種族屠殺的規模，為日后的研究定下了標準。1954年8月的時候，赫爾穆特·克勞斯尼克（Helmut Krausnick）已經在聯邦政治教育中心主編的《國會周報》（Das Parlament）增刊上發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專文，當然，文中詳細地討論了艾希曼。[[189]](#_189_3)

但當時更令艾希曼煩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情：1954年1月1日在耶路撒冷開始、將以“卡斯特納審判案”（Kasztner-Prozess）這個具有誤導性的名稱被載入史冊的那場司法審判。[[190]](#_190_3)那其實是針對一位名叫瑪結·格林瓦爾德（Malchiel Grünwald）的作者而發的誹謗官司，因為格林瓦爾德把魯道夫（“賴熱”）·卡斯特納形容成納粹在布達佩斯的狗腿子。如今普遍認為，正是由于本亞明·哈列維（Benjamin Halevi）法官做出的誤判，整個案件很快離奇地翻轉成為對卡斯特納自己的控訴。卡斯特納不得不公開辯解，當初他是為了拯救匈牙利猶太人才設法與艾希曼進行“談判”的。[[191]](#_191_3)由于對當時的實際情況認識不足，再加上卡斯特納在以色列的政黨身份早已讓那起官司淪為了政治事件，結果使整個訴訟演變成一場聚焦于卡斯特納做過什么的全球新聞報道，尤其關注一場為拯救人命而進行的戲劇性對決——卡斯特納與阿道夫·艾希曼的會面。在接下來的幾年里，世界各大報刊一再詳細報道了初審和上訴的過程及后果。[[192]](#_192_3)甚至布宜諾斯艾利斯自由派的——杜勒出版社圈內人則稱之為“猶太人的”——《阿根廷日報》（Argentine Tageblatt）[[193]](#_193_4)也對此做出了報道。而特別留意閱讀報紙的艾希曼，將會不斷讀到一些熟悉萬分的表達和人名，諸如“用貨物換鮮血”、約埃爾·布蘭德、卡斯特納，以及特別是他自己的名字。全世界的其他人還必須努力理解各種全新的事實，諸如猶太人與猶太人屠夫之間的不對等談判、在短短幾個星期內集體遣送了40多萬人，以及二戰末期的混亂情況等等，艾希曼卻從一開始就清楚將有哪些案情被公之于世。艾希曼密切關注公眾對每件事的反應，而且很早就認識到，信息上的優勢使他有辦法利用那場官司的災難性發展，讓各種事件轉而變得對自己有利。那位法官后來在判決中表示：“艾希曼擅長把人們變成叛徒。卡斯特納把自己的靈魂賣給了魔鬼。”新聞標題更有助于艾希曼鞏固自己的防線——“卡斯特納是艾希曼的合作伙伴”。三年后，當薩森訪談會開始高強度工作時，這正好就是第一個要討論的主題。當艾希曼開口向驚訝莫名的聽眾解釋時，心中已做好充分準備：“卡斯特納和我，我們全面控制了匈牙利地區的局勢。請原諒我的用詞，可是它有助于澄清真相。”[[194]](#_194_3)

### 納粹的黃金

1954年秋天，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艾希曼的名字重新成為奧地利報紙詳細討論的對象。有傳言指出，艾希曼與傳說中失蹤的納粹寶藏有關。那些在柏林斂來的財富，最后被人看見在裝箱運往“阿爾卑斯堡壘”的途中，現在想必就存放在施泰爾馬克的某個地方。或許是對艾希曼已經死亡的各種猜測在奧地利引發了調查，新聞界很快便認為他還活著，用假名生活在上奧地利。1954年10月1日，八卦小報《晚報》（Der Abend）以《黨衛隊大屠殺兇手阿道夫·艾希曼今何在？》為標題，刊出了來自阿爾陶塞地區的謠言，稱那名通緝犯藏匿在奧地利山區：“阿爾陶塞地區公認的事實是，前黨衛隊將領阿道夫·艾希曼——東歐猶太人的屠夫——目前還活著。”根據那篇報道，在他的妻子試圖宣告他死亡的那段時間，艾希曼曾經多次前往阿爾陶塞探訪妻子。1954年夏天，有人看見艾希曼待在他妻子的公寓內，盡管她早在1953年就已不知所蹤。那棟空置公寓的租金還是照常支付。記者采訪的那些人大概是把艾希曼與他同父異母的弟弟混為一談了，因為后者的確在一段時間之后，悄悄幫薇拉·艾希曼辦理了公寓解約手續，但此事并沒有逃過偵查員瓦倫丁·塔拉的法眼。[[195]](#_195_3)

新聞報道引起了維也納州刑事法院的注意，于是在年底要求提供一份報告，隨后更實地進行了相關調查，并披露了鄰居中關于艾希曼的各種傳言，像是艾希曼據稱擁有的巨大財富，以及他改變外貌之后在周邊地區的秘密生活。[[196]](#_196_3)那些傳言經久不衰。直到1955年1月10日，奧地利的《星期一世界報》（Die Welt am Montag）還在刊登以《神秘情事：一個幽靈在阿爾陶塞游蕩》為題的文章，聲稱艾希曼回來取走他的金子了。

以失蹤的納粹寶藏為主題的傳說比比皆是。據說一個又一個箱子被沉入山中湖泊，或被大費周章地運往世界各地。那些故事不但激發了人們的貪念，同時更滋養了有關納粹繼續在地下進行陰謀活動的神話，并且契合了“戰爭無法完全打敗國家社會主義”的夢想。1954年的種種臆測，使原本不想跟那名“猶太人屠夫”有所瓜葛的人，也對艾希曼的見證者身份產生了興趣。對艾希曼來說，那些故事讓他放下心來，因為人們顯然以為他正置身完全不相干的地方，所以他在庇隆的國度安全無虞。即使那些對黃金貪得無厭、正在追逐贓物的納粹分子，也不至于對他構成威脅，因為隨便誰都可以從艾希曼的生活水平看出來，他并不是一個坐擁財富的人。盡管如此，當人們在ABC餐廳遇見他，或者當新成為阿根廷人的老同志們聚會時，還是會有人向他問起此事。艾希曼曾經一度為弗朗茨·威廉·普法伊費爾工作，而該人正好被懷疑是納粹財富的實際守護者，這給那些謠言在阿根廷額外增添了分量。

### 再度成為專家

在整個罪惡的職業生涯當中，艾希曼都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公眾形象來獲取利益。到了20世紀50年代中期流亡阿根廷的時候，明顯甚至連他的戰后形象也能夠帶來好處。證人陳述、報紙文章和各種謠言流傳得越多越廣，那位前任一級突擊大隊長在埃伯哈德·弗里奇和威廉·薩森等人的眼中也就變得越有趣。尤其是對出版商弗里奇而言，他除了參加過希特勒青年團國際大會之外，完全沒有關于納粹德國的經驗，因此每一個流亡者在他看來都是內部消息人士。但即使是薩森，他作為黨衛隊戰地記者，看到的也是與艾希曼很不一樣的事情，而且他出入的圈子與艾希曼截然不同。例如他從來沒有見過海因里希·希姆萊、赫爾曼·戈林，甚至萊因哈德·海德里希，而艾希曼卻認識他們每一個人，并且對納粹的各個辦公室和機構所知甚詳，因為他必須一再像操作許多小齒輪一樣協調這些機構的工作，從而使滅絕的機器順利運轉。20世紀50年代中期，那些流亡者重新向聯邦德國伸出觸角，他們想知道他們的聯絡對象究竟是何許人也。這時最好的辦法莫過于相互詢問到底誰認識誰。威廉·霍特爾的書讓他們感到緊張，因此杜勒出版社的圈內人希望能夠找到對霍特爾有所認知的人，更好地評估他所帶來的危險。可是魯德爾和薩森、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約翰·馮·萊斯，或者約瑟夫·門格勒等人都從來沒見過霍特爾。變化的時代需要匯集知識，于是專家再度變得炙手可熱。

甚至最受規避和最被畏懼的題材——猶太人問題——也需要專家。新聞媒體的各種活動，尤其是巨大的市場需求，已經在在顯示出，即使逃亡中的納粹黨人也日益需要更多信息，而且要來自他們這些陰謀論愛好者所信任的源頭：其他納粹黨人。凡是過度沉迷于國家社會主義陣營的片面想法，以致不肯相信薩森訪談會所稱的“敵方文獻”的人，都想要在自己的隊伍當中找到答案。雖然大多數人起初可以毫無困難地把一切關于集中營和大屠殺的報告都斥之為敵方宣傳和恐怖神話，可是積年累月下來，許許多多的小故事和他們自己記憶中的各種細節，已經濃縮為一幅令人不安的畫面，更何況他們還必須面對自己子女所提出的問題。盡管這些人沒有資格宣稱“我什么都不知道”，然而他們的確有著很大的知識空白，因為他們總是只想知道自己想知道的“事情”。他們或許堅持謊言、偏執一詞，但最終，即使是最堅定的國家社會主義者也免不了面對一個讓人不安的問題：在他們自己的推測和各種新聞報道中間，到底有哪些是真相，哪些是謊言呢？希特勒對那一切真正知道多少？確實存在毒氣室嗎？毒氣卡車呢？真的槍斃過游擊隊員嗎？究竟有多少人被殺？

盡管每個人基于自己的立場有不同的疑問，但最后都想把事情弄個一清二楚，因為“最終解決方案”當時正影響著全球政治，已經成為任何人都逃避不了的一個問題。德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取決于它對猶太人大屠殺持有明確立場、支付“賠償”，并承諾奉行對以色列友好的外交政策。中東發生的事情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凡是想了解新的結盟關系的人，都必須具備相關知識，否則走不了多遠就會讓自己的事業受損。更何況人們一如既往地懷疑“猶太人”就躲在每件事情和每個人的背后，并將他們視為主導美國的力量，而美國正是《路徑》編輯部所宣稱的敵對力量之一。

艾希曼很快博得名聲，被視為唯一幸存的當事人，掌握著猶太人大屠殺規模和滅絕執行過程的可靠信息。這使他成為越來越受歡迎的交談對象。他的確跟“敵人”打過照面、與猶太社區和機構代表進行過談判。跟約埃爾·布蘭德和魯道夫·卡斯特納等人都很熟悉，而不是只在報紙上見過這些名字。他把自己推銷成“知名專家”的本事進一步發揮了作用。盡管在艾希曼被綁架之后，沒有人會主動承認聽說過他的名字，但被證明曾與艾希曼討論猶太大屠殺的人數還是相當可觀。早在艾希曼藏身圖庫曼時，蕭克利契夫婦與赫伯特·哈格爾就曾直接問過他被害猶太人的數目。即便據悉艾希曼回答得閃爍其詞，但事實仍然是，他們都清楚里卡多·克萊門特實際上就是阿道夫·艾希曼，而且知道艾希曼正是這方面問題的專家。在阿根廷一個北方省份，沒有人會隨隨便便在晚宴上問他們遇到的第一個德國移民對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看法。

我們所知道的另一個直接與艾希曼攀談過的流亡者是約翰·馮·萊斯。他比艾希曼年長四歲，是一名法學家，曾經寫過諸如《立法中的血統與人種》（Blut und Rasse in der Gesetzgebung，1936年）之類的書，并借此獲得了耶拿大學的全職教授職位。萊斯在該校講授的課程之一是“基于人種的法律、經濟及政治史”，并在擔任國家宣傳部人種問題顧問的間隙，撰文描述了“猶太人的犯罪本質”（1944年）。1950年，他經由意大利逃到阿根廷。[[197]](#_197_3)他在那里可以繼續被貼切地描述為職業反猶太主義者，忙著為《路徑》撰寫讓人大倒胃口的文章。20世紀50年代中期，他離開布宜諾斯艾利斯前往開羅。他在埃及改名阿明·奧馬爾·馮·萊斯（Amin Omar von Leers），并且讓德國老同志們大吃一驚地搖身變成一個伊斯蘭宣教者。不過在此之前，他曾抽空與艾希曼談話，所問事項之一就是猶太遇難者的確切人數。在被指責為“艾希曼在阿根廷最要好的朋友”之后，萊斯曾講述這段插曲來為自己辯解：“我從來不認得艾希曼，1955年才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第一次聽到他的名字。我在那里和他簡單交談了一下，并試圖從他口中得到有關死于集中營的猶太人人數的歷史真相。但他沒有告訴我任何相關信息。”[[198]](#_198_3)

盡管萊斯宣稱自己之前從未聽說過“艾希曼”這個名字，卻顯然清楚地知道艾希曼是誰：那名遇難者人數專家。萊斯把見面時間挪后的做法，更凸顯了他的意圖。由于萊斯在1954年就已經離開了阿根廷，所以他當時一定早就知道自己問的人是誰，并且帶著極大的負罪感清楚那意味著什么。[[199]](#_199_3)這可以有兩種解釋。或者萊斯宣稱自己沒有聽過那個名字是在撒謊，否則就是別人在介紹艾希曼給他時使用了自紐倫堡審判以來便與艾希曼的名字連在一起的那種描述。既然萊斯在辯護時承認自己認識艾希曼，由此可以推斷，他們二人談話的時間顯然不像萊斯所描述的那么短暫。萊斯曾是《路徑》的主要撰文者之一，自然不可能看不出他的出版商正在極力爭取艾希曼。萊斯在1954年遷居開羅時，也一同帶上了那次與艾希曼見面的記憶。萊斯明顯推遲那次談話的日期的做法，更讓人得以從一個有趣的角度一窺威廉·薩森的訪問開始之前，艾希曼在阿根廷的公共生活。

\*\*\*

然而，并非所有納粹流亡者都要詢問艾希曼才能了解大屠殺的規模。例如埃里克·米勒（Erich Müller）、約瑟夫·弗特爾、庫爾特·克里斯特曼（Curt Christmann）等人，在這方面都有自己的豐富經驗。他們加入了特別行動隊，從1941年開始躲在前線后側展開大規模槍殺，后來則用毒氣卡車施行屠戮。格哈德·博內和漢斯·黑弗爾曼是“安樂死”謀殺的專家，昔日猶太人隔離區指揮官約瑟夫·施萬伯格更相當清楚“通過勞動來毀滅”意味著什么。他們多半有機會彼此見面，而且這不僅是因為移民者的圈子通常都很小的緣故。以迪特爾·門格為例，他和魯德爾一樣是德國前空軍飛行員，不但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外擁有一座富麗堂皇的莊園，還經營著獲利頗豐的廢金屬生意。他有一個奇怪的嗜好，喜歡讓那些可怕的同儕簇擁在自己身邊。在他家舉行的社交活動直到今天仍被稱為“集納粹崇拜之大成”，并特別偏好讓人脊背發涼的元素。在那些活動中，當然不會有人用假名或其他形式的遮掩，而艾希曼和約瑟夫·施萬伯格之類的人物則成為吸引人的所在。那些人之間最流行的一個笑話，就是拿東道主和他的座上嘉賓來玩名字游戲——門格（Menge）尤其喜歡招待門格勒（Mengele）。[[200]](#_200_3)

薩森后來聲稱，當初是他介紹艾希曼與那位對《希波克拉底誓言》有自己獨特解讀的集中營“醫生”相互認識的。許多猶太幸存者都無法忘記門格勒，因為他就是那個在奧斯維辛進行“篩選”的人。人們怎能忘記一個大手一揮就可以決定千百條性命的人？[[201]](#_201_3)這兩個人進行謀殺事業的過程中未必相互熟悉，盡管艾希曼在1944年頻繁造訪奧斯維辛的時候，他們說不定有過一面之緣。然而，他們經由相同的路徑來到阿根廷，都使用了來自泰爾梅諾的假身份證明文件，甚至連簽發時間也相差無幾。門格勒比艾希曼早一年抵達阿根廷，而且與艾希曼不同，他的優勢在于得到了自己父親的慷慨財務支援。但盡管如此，兩人在阿根廷的發展道路一再交匯。薩森是門格勒的密友，直到1991年仍然高度贊揚后者的“醫學實驗”。他相信艾希曼和門格勒幾乎沒有什么可談的，因為“他們體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類型”。[[202]](#_202_3)就二人的經濟能力和教育背景而言，這種說法或許不錯。因為門格勒不但財力雄厚，而且除了醫學博士之外還有哲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關于四個種族群體下頜前段部分的種族形態調查》（‘Rassenmorphologische Untersuchung des vorderen Unterkieferabschnitts bei vier rassischen Gruppen’）。但薩森并非完全正確。1962年艾希曼被處決后，他的老朋友當中只有一人對那名種族屠殺的組織者表達了欣賞和令人驚訝的同情，這個人就是“奧斯維辛死亡天使”門格勒。他們二人想必曾經有過不少共同話題。

在開始與薩森共同錄制磁帶之前很久，艾希曼就已經再度成為他感興趣的一個團體的一員，而且更重要的是，那個團體也對他非常感興趣。盡管少數談起此事的人后來表示，那種好奇僅僅源自對恐怖事物的著迷，但這種說法相當值得懷疑。人們普遍的健忘和審慎的沉默顯然是艾希曼被綁架一事所產生的直接后果。20世紀50年代中期，那位公認的專家吸引了廣泛的興趣，令人無法忘記，畢竟人類生來就喜歡談論難忘的經歷。然而這種興趣卻給艾希曼帶來了危險。在戰爭結束十年之后，許多逃亡的難友已經逐漸失去對被起訴的恐懼，并且不斷加強自己與德國和奧地利的聯系。有人直接在德國報紙上刊登征婚廣告[[203]](#_203_3)，許多人甚至考慮搬回聯邦共和國。經濟奇跡之父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親自在1954年12月訪問阿根廷。早已為情報機構工作的奧托·斯科爾策尼，則以克虜伯工業集團官方代表的身份晉見了庇隆總統。1954年，門格勒甚至大膽地在德國正式辦理離婚手續。[[204]](#_204_3)連有著駭人過去的昔日同志們也開啟了驚人的新職業生涯。比艾希曼年輕四歲的薩爾茨堡人約瑟夫·弗特爾，也曾經拿著紅十字會的護照逃亡。他在擔任刑事警察和邊防警察的時候，不但與特別行動隊D支隊的10A行動分隊“在東邊”有過瓜葛，接著又致力于“綏靖邊區”和“清剿游擊隊”。盡管如此，他已于1955年返回德國停留三年。他在聯邦憲法保衛局找到了工作[[205]](#_205_3)，稍后我們還會再遇見他。

艾希曼出門與新老同志們見面時，總是把家人留在家里。他很可能是想避免妻子產生疑問，她顯然相信她的丈夫是無辜的。然而他無法完全避免家人接觸到那些人，因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圈子很小。“有一天，父親說道，上個星期你和門格勒握過手。”但如果我們相信克勞斯·艾希曼的說法，那么這樣的信息透露其實是例外情況而非常態：“父親把保密看得非常重要。每逢有人過來拜訪，他就會賞給我們這些小家伙一巴掌，提醒我們第二天早上不可以在學校把事情張揚出去。”當記者詢問訪客都有哪些人的時候，那種教育方法仍然奏效，因為克勞斯·艾希曼回答說：“我只記得那些耳刮子。”我們若仔細查看后來那些年的采訪內容和證人陳述即可發現，綁架艾希曼的行動也對阿根廷知曉里卡多·克萊門特真實身份的那些人產生了類似效果。

### 人生的勝利

婚姻：兩種不同性別之間為物種繁衍而進行的結合。

——艾希曼的心理評估，1961年年初[[206]](#_206_4)

1955年開啟了一段動蕩不安的時期。對德國人關愛有加的阿根廷總統丟了官職。阿根廷海軍軍官在6月16日發動政變，很快便導致庇隆黯然下臺。1960年的時候，《生活》（Life）雜志的記者聽到謠言，艾希曼化名“恩斯特·拉丁格”（Ernst Radinger）當了牧人，相繼在巴拉圭、智利、烏拉圭和秘魯等國停留，庇隆被罷黜之后又在玻利維亞待了好幾個月。[[207]](#_207_3)這個傳言顯然是認錯了人，卻生動地反映出德國移民所處的環境。沒人知道此類政局動蕩對自己的處境意味著什么，更何況新政權正采取行動打擊庇隆獨裁時期的腐敗行為，并在此過程中關閉了七家涉嫌的德國公司。

1955年12月，警方在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位于科爾多瓦省的住宅前按響了門鈴，因為他被視為庇隆的親信。在搜查房屋時，調查委員會發現了許多文件、三本不同名字的護照，以及他參與政治活動的證據和聯絡信息。[[208]](#_208_3)雖然眾所周知，魯德爾在庇隆的保護下，多年來一直試圖建立一個法西斯運動的國際網絡，但其聯系范圍之廣泛仍然令人驚訝，尤其是魯德爾在倉促離境之前已經燒毀了許多其他文件。不幸的是，被查繳的文件至今還沒有重新出現，但調查委員會已在報告中提及一些初步的發現，其中包括一本紅十字會護照，以及這本假護照上的各種出入境登記戳，證明了魯德爾在何等努力地兜售極右派夢想。此外在他的文件中還找到了向同志工作會求助的信件，有一些來自聯邦德國熱心的聯絡人，例如正在為希特勒的妹妹募款的漢斯·雷興貝格（Hans Rechenberg），二人日后都將為艾希曼出庭辯護。這一事件在阿根廷引起的最大轟動，無疑還是發現魯德爾竟有辦法把英國法西斯領袖奧斯瓦爾德·莫斯利帶進國內，并安排他跟庇隆總統私下會面。德國大使館在震驚之余甚至采取預防措施，將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報紙文章寄往波恩。[[209]](#_209_3)但在最初的激動之后，人們得出結論，“庇隆納粹主義”只不過是一場“鬧劇”而已，魯德爾“則代表了許多‘英雄人物’典型的戰后職業生涯，他們早就已經沒有角色可演，卻依然不肯退場”[[210]](#_210_3)。魯德爾的盟友們甚至不得不在報紙上看到他們名義上的領袖被描述成一個“相當可笑和傲慢的人物”，而且他們的政治計劃與聯系網絡已被公之于世。魯德爾一度躲到巴拉圭暫避風頭。無法忽視的事實是，阿根廷顯然已不再如庇隆時代那樣具有吸引力了，對于不像魯德爾那般有辦法逃跑的人而言更是如此。

在阿根廷，對通貨膨脹的恐懼已經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反庇隆的政變也部分源于對日益惡化的局勢的反應。不難想象，艾希曼新近換工作的舉動也與此有關。在動蕩時期，實物便重新成為最穩當的投資方式。艾希曼于是在3月接手了“七棕櫚”（Siete Palmas）兔子農場的管理工作，地點位于距離布宜諾斯艾利斯45公里的華金-戈里納。那家企業同樣歸弗朗茨·威廉·普法伊費爾所有。他正打算返回歐洲，想要就地尋找一個可靠的代理人。[[211]](#_211_3)克勞斯·艾希曼曾經談論起和父親一同管理那座農場的“兩位伯伯，現在（1966年）他們已經回到了歐洲”。“他們擁有大約5000只雞和1000只兔子”，那些兔子是安哥拉兔。

那些可愛的白色毛茸茸的動物不僅能提供昂貴的兔毛，還能生產廣受歡迎的肥料。兔子的糞便中含有高濃度的氮、磷和鉀，是一種非常有用的混合物，在阿根廷需求量很大（該國直到今天仍然是柑橘類水果的主要出口國）。在這樣一個農場的日常生活相當枯燥乏味，就是喂食兔子、清理兔籠和收集糞便，此外每年還要修剪兔毛三到四次。但此種自力更生的方式在經濟上是可行的，并且可以帶來成功。艾希曼在戰時很喜歡告訴他的謀殺同伙，他已經向黨衛隊全國領袖表達意愿，希望在贏得最終勝利之后擁有一座位于波希米亞的莊園，成為一名農民。[[212]](#_212_3)那些“黑太陽符號（Sonnenrad）的門徒”自稱崇尚簡樸生活，可是當他們掌握權力的時候，卻不曾有任何人放棄自己的職業生涯去務農。因此對艾希曼而言，自己曾經有過養雞成功的經驗，以及甚至黨衛隊全國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也喜歡講他曾經是養兔人的經歷，這實在無法令他產生欣慰的感覺。他的家庭生活也出現了重大變化。艾希曼后來喜歡稱之為“牧場上的生活”，而這種生活也意味著在鄉下過日子。即便艾希曼時而能夠把家人一起帶過去，但在大多數時間里，他還是與他們分隔兩地。畢竟他時年13～19歲的三個兒子都必須繼續上學。艾希曼的札記以及孩子們的回憶都顯示，他們低落的學習意愿讓他憂心不已。艾希曼在札記中寫下自己的想法，表達出對“三個兒子在知識上的傲慢”和“無知”感到無奈，因為他們都懶得分清宗教信仰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差別。[[213]](#_213_4)

如今情況又變得跟在阿爾騰薩爾茨科特的時候一樣，艾希曼再度無法照顧自己的家庭，只能忙著賺錢和沉溺于自己的想法。然而這個兔子農場比呂訥堡石楠草原上的那個小村落還要來得偏僻，這意味著艾希曼甚至無法在溫暖的晚上用舒伯特和吉卜賽旋律讓村姑農婦們為之傾倒。在那些漫長的夜晚，昔日遣送行動的主導者如今卻頂多只能為數以千計的母雞，以及毛茸茸的白兔拉拉小提琴。但待遇顯然相當不錯——艾希曼說他的收入為每月4500比索，大約相當于1000馬克。[[214]](#_214_4)他們一家急需這筆錢，因為發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事件：薇拉·艾希曼又懷孕了。五年以后，艾希曼講了一些奇怪的話形容他的感受：“第四個兒子的誕生，讓我們的幸福達到了巔峰。對我來說，這不僅合理地讓我感到成為父親的驕傲。在我眼中，這更是自由與生命的象征，是對抗意圖毀滅我的那些勢力所取得的勝利。即便現在，當我在牢房里想到此事的時候，兒子的誕生仍然讓我充滿了勝利的滿足感。”[[215]](#_215_3)

一個孩子的誕生變成了令人振奮的勝利？考慮到艾希曼在1955年時的處境，首先占據他頭腦的想必是其他的擔心。從許多方面來看，這次懷孕都有很多風險：46歲的薇拉·艾希曼在那個年代屬于非常高齡的產婦，而且她因為長年罹患嚴重的膽囊疾病而很不健康。再加上是在異國，面對一個不同的醫療體系，更何況薇拉·艾希曼還有語言上的問題。這位準父親有充分的理由擔心自己的妻子，與此相關的各種額外開銷就更不用說了。

妻子和孩子在艾希曼眼中具有真正重要的意義，這是難以忽視的事實。對他來說，沒有家人的逃亡生活根本無法想象。艾希曼與妻子都有著堅定的決心要生活在一起，他的妻子也同樣堅忍不拔地為共同生活而奮斗，并且全力支持他的逃亡。當然，讓他們的婚姻變得困難的不僅是外在環境，但有各種跡象顯示，他們在1935年純粹是因為愛情而結婚的。艾希曼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前往波希米亞的時候，認識了年紀小他三歲的薇拉·利布爾。薇拉的母親在那里有一座農場。后來成為艾希曼朋友與部屬的迪特爾·維斯利策尼，曾經描述薇拉“矮小肥胖，有光滑的黑色直發、深色的眼睛和圓圓的斯拉夫臉孔”。但話要說回來，維斯利策尼自己就胖得足以讓身邊任何人都顯得像竹竿一樣纖細，更何況他擺明對艾希曼充滿了嫉妒（而且通常不是因為女性的緣故）。薇拉年輕時的一張全身照片顯示她是一位頗具魅力的女性，留著時髦的童花頭發型（Pagenkopf-Frisur），眼睛大而靈活，嘴唇豐滿，打扮優雅，并且圍著皮草披肩，在外形方面完全合乎艾希曼的口味。艾希曼曾親口告訴薩森，他從來都不熱衷莉娜·海德里希（Lina Heydrich）和瑪格達·戈培爾（Magda Goebbels）等人所代表的國家社會主義理想女性形象——金發碧眼、高大、苗條，因為他覺得這樣的女人“太冷漠、太拒人于千里之外了”。[[216]](#_216_3)威廉·霍特爾所說艾希曼因為妻子來自農家而感到羞愧的故事則根本是胡扯。因為一方面，按照納粹“血與土”的意識形態，沒有比這更好的出身背景；另一方面，艾希曼總是帶著尊重和敬佩來描寫和談論自己的妻子，那位“來自姆拉代的驕傲的農家女”。從艾希曼的婚禮也可看出他是出于個人原因而不是為了事業選擇他的妻子的。由于他的新娘無法出示黨衛隊所要求的各種必備文件，艾希曼為了獲準結婚必須略施小計。此外艾希曼為了遷就他那特別虔誠的妻子，甚至愿意在教堂舉行結婚儀式，盡管黨衛隊不喜歡看到這樣的事情。

艾希曼一家起先住在柏林，然后在維也納，最后定居布拉格，而且薇拉的姐妹之一也住進了布拉格的同一棟房子——艾希曼飛黃騰達的事業使此事成為可能。艾希曼接受了妻子在柏林感覺不舒服的事實，于是同意家人留在布拉格。這意味著他必須在周末往返于柏林和布拉格之間。另一方面，布拉格正好位于艾希曼的公務途中，因為他必須經常前往維也納和特萊西恩施塔特，此外他的單位很快就在布拉格市比利時巷25號（Belgische Gasse 25）設立了自己的分支辦事處。盡管他的婚姻生活有個幸福的開端，但艾希曼的工作人員從1938年的維也納時期即已知道他們的上司有一位情婦。這段婚外情還跟公務有所關聯。艾希曼用維也納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的經費向瑪麗亞·莫森巴赫爾購買了一塊地產，這引來了流言蜚語，人們懷疑他為了讓自己的女友有利可圖，支付了過高的購地價格。[[217]](#_217_3)他的同事們顯然還有很多話要說，因為他們把瑪麗亞和附近一家小客棧的經理“米齊”（Mitzi）混為了一談，艾希曼應該也跟她有過一段關系。[[218]](#_218_3)

薇拉·艾希曼想必至少也聽到過一些風聲，但他們的婚姻顯然并沒有因此受到傷害。1939年復活節薇拉過生日的時候，這對夫婦還聯袂前往意大利度假。[[219]](#_219_3)對艾希曼來說，周末、結婚紀念日、生日和母親節都非常重要，不過有關他在1960年婚禮紀念日購買花束時終于被捕的故事，卻是個美麗的錯誤。[[220]](#_220_3)不管怎樣，這對夫婦生了三個孩子，是二人共同的生活中心。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女性或短或長地出現在艾希曼的生命中。固然我們不必過于認真地看待維斯利策尼所說的艾希曼“拈花惹草的故事”，但確實有證據顯示，艾希曼對自己的妻子并不怎么忠誠。無論是在其部門工作的女性還是他的情人，都將他形容成“有吸引力”、非常“迷人”、一個既風趣又喜歡室內游藝和演奏音樂的人——就是“一個很棒的男人”。[[221]](#_221_3)男人們同樣也記得“艾希”（Eichie）“人緣很好，在哪里都很受歡迎”，至少集中營指揮官魯道夫·赫斯在被問起時是這樣回答的。[[222]](#_222_3)有一卷來自阿根廷的錄音帶，可讓人稍稍感受艾希曼在女性面前的表現。它記錄了艾希曼與薩森“同志”的妻子見面時的情景：她拿香煙給艾希曼，并且充滿歉意地表示他喜歡的那個牌子已經賣完了。艾希曼原本尖銳刺耳的聲音立刻變得低沉柔軟，他為“尊貴的夫人不辭辛勞”而表達的“由衷謝意”，怎么聽都顯得非常謙遜。[[223]](#_223_4)根據資料，艾希曼在納粹時期至少曾經跟三位女性有過婚外情。在阿爾騰薩爾茨科特也有傳聞表示，除了那位來自基姆湖畔普林的金發內莉之外，他還跟一位獨自撫養小孩的寡婦和他的女房東有染。無論我們如何看待此類鄉村八卦，它都揭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盡管艾希曼只穿著破舊的國防軍外套，而且不再擁有權力地位，卻仍被認為具有足夠魅力來引發那樣的閑話。

就艾希曼而言，他始終努力設法隱瞞自己的那些艷遇，因為中產階級的表面功夫在他眼中非常重要。只有在匈牙利的時候，這種雙重生活才變得不那么遮遮掩掩。艾希曼同時與瑪吉特·庫切拉（Margit Kutschera）和英格麗德·馮·伊內（Ingrid von Ihne）有過緋聞。前者來自維也納，維斯利策尼曾經很不屑地稱之為“職業情婦”；后者則是一位來自上流社會的離異貴婦，是國家社會主義女性的理想代表：金發碧眼、身材高挑、苗條纖細，而且有著冷艷的美感，這使她成為社交場合的完美伴侶。大衛·切薩拉尼總結道：“艾希曼并不像后來報紙所描繪的那樣，是一個殘暴的好色之徒，但他同樣也不是一名麻木不仁的公務員或者宛如機器人一般的官僚。權力——決定生死的權力——腐蝕了艾希曼。時至1944年，權力已經讓他從內到外完全爛透了。”[[224]](#_224_3)

但他的婚內出軌行為是否果真為從根本爛透的結果，仍然相當令人懷疑。那種出軌看起來反而更像是擺脫壓抑之后的結果，而且酒精在其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維斯利策尼寫道：“最后幾年，艾希曼在女人方面完全不加節制，在布達佩斯更是每天晚上都喝得醉醺醺。”[[225]](#_225_4)光是在匈牙利對權力的狂熱還不足以讓這名出身中產階級家庭的男子變成一個不“循規蹈矩”的墮落浪子。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回憶錄中，以及在阿根廷的訪談會上，艾希曼能夠毫無窒礙地夸夸其談他在匈牙利的“有力”措施，如何以“大師”之姿安排了整個納粹時期最高效的遣送行動，并自豪地講述了惡劣的運輸條件，以及駭人聽聞的死亡行軍等故事，但他在婚外拈花惹草之事，卻讓他難堪得顧左右而言他。那位貴族出身的社交名媛只不過是他的“晚餐伴侶”罷了，而且只在他某天舉辦晚宴的時候出現過一次。他大費周章地解釋說：“我家中沒有女主人，而那時必須要有一位女主人。所以我請求馮·伊內女士代勞。就是這樣。”為了穩妥起見，艾希曼又重復說道：“我既沒有女主人，更沒有小妾，絕不像此處（他指了指面前的一本書）某人所宣稱的那般。你知道嗎？她只不過是一位偶爾能夠跟我一起出去吃晚餐的熟人而已，而且我跟她從來沒有過親密的關系。”等到再度出現需要女主人的情況時，“我邀請了另外一位跟我沒有親密關系的女士”，即當時已有婚約的庫切拉小姐，“所以當天晚上就由她扮演女主人的角色”。[[226]](#_226_3)

艾希曼當然一直只是和女性維持純粹的友誼，甚至在阿爾騰薩爾茨科特也一樣。此外，他更假道學地極力撇清任何有關婚外情的暗示，并且避免回應薩森喜歡的含沙射影和淫穢細節。[[227]](#_227_3)在女性方面的成功，并不是艾希曼引以為傲的事情。被捕之后，關于其愛情生活的傳言很快登上新聞媒體的版面（其中多半出自編造）。讀到維斯利策尼的毀謗后，艾希曼再次極力強調自己從來沒有過情婦，除了自己的妻子之外，他與所有女性都只維持著“純粹柏拉圖式的關系”。[[228]](#_228_4)不過艾希曼對這種自我表現也相當不滿意，因為他隨即加上了一個“保險機制”，補充說道：“有機生命的承載者普遍得自大自然的那種能力，也被大自然賜給了我。我可不是進行無性繁殖的木賊。”[[229]](#_229_3)

這種尷尬的聲明不僅是男性虛榮心的告白，同時還深刻表達出國家社會主義的信念：性能力與對性欲“順其自然”的態度，屬于納粹對黨衛隊成員的人種生物學定義之一。按照希姆萊的理解，黨衛隊是一個由全新的、純凈人種精英組成的核心。正是為求實現這個夢想，才進行了精心的挑選。[[230]](#_230_4)未來的黨衛隊隊員妻子（黨衛隊隊員本身也一樣）都必須先接受徹底的身體檢查，然后黨衛隊人種與移居部（RuSHA）才會批準他們結婚。性無能或任何異常的性傾向，都會阻斷通往黨衛隊陣營的道路。

對阿道夫·艾希曼而言，面對性欲不加限制的態度與其說是機會，倒不如說是一種挑戰。當希姆萊因為情婦幫他生了孩子，下令巧取豪奪一條珍貴項鏈作為送給她的禮物時，目擊此事的艾希曼感到驚駭不已。原因有二，除了腐敗之外，另外讓艾希曼十分反感的是，黨衛隊全國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竟然沒有對部下保密其重婚生活中發生的這個“項鏈事件”。因為“如此高階的上級官員”不應該讓別人有機會洞悉這種“最棘手的問題”，以致在被看穿之后淪為知曉內情者的“囚徒”。[[231]](#_231_3)艾希曼擺明并不贊同希姆萊在這方面的觀點：黨衛隊必須破除“舊有的道德觀”，因為那只不過是“建立在基督教義之上的所謂道德法則”而已，現在必須跟“虛偽作風”一刀兩斷。[[232]](#_232_4)至于他對薩森那種逢場作戲態度的看法，自然就更不用說了。即使在薩森訪談會那樣全男性的聚會上，艾希曼也不贊成使用下流的言語。薩森卻喜歡非常明顯的性暗示，這種做法經常導致艾希曼無言以對。他在其他方面很喜歡緊跟話題，能夠毫無困難地針對死亡集中營內的環境侃侃而談，發表令人無法忍受的冷嘲熱諷，但在談到集中營妓院（Lagerbordell）之類的話題時卻支支吾吾，表現得跟別人問起他的婚外情時一模一樣。艾希曼不喜歡這類男性話題。在以色列接受心理檢查時，這名通常非常合作的囚犯卻表現出與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時相同的反應。負責檢查的心理學家什洛莫·庫爾恰爾（Shlomo Kulcsár）指出：“他在訪談中第一次和唯一一次拒絕合作，就是在我們詢問他的性經歷之際。在艾希曼的案子中，性行為是如此遭到壓抑、隱瞞和掩飾，以致很難重建事實的真相。”[[233]](#_233_3)庫爾恰爾的妻子也是那個經驗豐富的心理學家團隊的成員之一，在評估了進行過的各種測試之后，他們得出結論如下：艾希曼“在性生活這個主題方面非常拘謹”。參與檢查的三位心理學家都推測那是一種“性虐待情結”（sadomasochistischer Komplex）。[[234]](#_234_3)他們確信艾希曼的情況不同于那一代人所特有的對私密行為的拘謹不安。然而他們所能進行的各項研究，仍不足以在他們一致判定的“潛在攻擊性”（latente Aggression）方面更進一步。

在此背景下，艾希曼公開強調自己性能力的做法顯得特別引人注目。他甚至多次對監獄工作人員做出這樣的暗示。在被提供了納博科夫的《洛麗塔》作為牢房里的休閑讀物之后，艾希曼便拒絕接受其他小說，因為它們“能引發性欲”。鑒于他是以囚犯身份待在一間燈火通明、隨時有守衛在側的牢房里，那種念頭未免顯得異想天開。另一次，艾希曼更直截了當地強調，這么長時間沒有女人對他而言是多么困難的事情。[[235]](#_235_3)若只考慮這些言論以及艾希曼的多次婚外情，我們就很容易陷入一些小說和最近的某些電影的危險，認同關于“大屠殺禽獸”（Holocaust-Bestie）的常見說法，把艾希曼看成一個沉湎于謀殺、罔顧道德的縱欲狂魔，在受害者的墳墓上滿足自己的性癖好。[[236]](#_236_3)但艾希曼的性格跟這種媚俗的納粹色情八股完全格格不入。他關于“得體”的觀念允許他謀殺猶太人，卻在個人生活領域將自己限制在嚴格的資產階級框架內。若想突破那個框架，就必須求助于納粹意識形態，援用其分類方式，尤其是套用其詞匯。雖然關于自己生理需求的討論讓艾希曼陷入雙重標準和拘謹不安，生殖繁衍那方面的話題卻讓他拋開一切禁忌，侃侃談論所謂“對抗猶太種族直到獲得最終勝利的生存斗爭”。正是此種將生殖繁衍極度政治化的粗俗做法，以及對“維系種族延續的動力”的夸夸而談[[237]](#_237_3)，才使這樣一個非常放不開的人，在與薩森那種惡名昭著的登徒子交談時承認自己有過一段婚外情，并且大肆炫耀自己上了年紀還能夠生出第四個兒子，以及自己仍然具有的繁衍后代的能力。

海因里希·希姆萊曾要求他的黨衛隊成員，每個人至少要生四個孩子。盡管艾希曼沒有辦法把所有猶太人都殺掉，但在1955年11月喜獲第四個兒子之后，他至少已經圓滿貫徹了上述命令。若不以此自我標榜一番，就未免太強人所難了。在這方面，他能夠與薩森那樣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取得共識。薩森同樣把自己在成功脫逃之后生下的孩子自夸為“對敵人的世界做出的挑戰，對遭到敵人踐踏和唾棄的生活和價值觀做出的狂熱贊同”。[[238]](#_238_3)只有信奉種族生物學的死硬派反猶太主義者，才會把生小孩看成對“一心一意要摧毀我方的敵對勢力”所取得的勝利。因為只有一場不折不扣的全面種族戰爭，才會在軍事失敗后仍要繼續下去，并從兒子的誕生中獲得“勝利的滿足感”（triumphierende Genugtuung），借此自我安慰。在一場種族戰爭中，繁衍后代的能力是無與倫比的長效武器。那名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雖然已經退役，卻仍全心全力恪盡職守。

\*\*\*

1955年11月，薇拉·利布爾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家天主教醫院產下一子。[[239]](#_239_3)艾希曼后來嚴肅至極地說道：“我無法正式成為我兒子的父親，因為按照官方說法，我和我的妻子根本就沒有結婚。”[[240]](#_240_3)他這么講的時候，活像大家都不清楚那是因為不方便拿出結婚證書的緣故。令人驚訝的是，護士們已經堂而皇之將那個嬰兒稱為“艾希曼寶寶”。[[241]](#_241_3)但即便如此，如果真用這個聞名遐邇的姓氏去辦理戶口登記的話，就未免太粗心大意了。艾希曼的兒子被登記為薇羅妮卡·卡塔琳娜·利布爾的非婚生子。[[242]](#_242_3)名字當中除了包含他父親的化名“里卡多”之外，還加上了一個中間名“弗朗西斯科”，借此向熱那亞的那位神父表示敬意[\*](#_386)，是他使這次“勝利”成為可能。這種被迫采取的低姿態讓艾希曼陷入窘境。他后來寫道：“必須采取這種處理方式，這讓我備感痛苦。”[[243]](#_243_3)而且艾希曼十分清楚誰應該為他的忍氣吞聲負責：“政治環境造成了這種復雜情況，使我們在婚姻關系中生出的合法兒子只能被登記為私生子。”[[244]](#_244_3)

### 一群失落者在失落的崗位上

是的，親愛的朋友，

我們是一群失落者，在失落的崗位上。

這就是我們的力量所在，

因為我們沒有比我們的絕望更壞的敵人。

——威廉·薩森，1955年圣誕致辭[[245]](#_245_3)

艾希曼本來其實可以對事情的發展感到滿意。他有了一份新工作、妻子產后復原良好、孩子非常健康，而且他自己即將過五十大壽。所有這一切通常都足以成為慶祝的理由。然而對艾希曼來說，所有這些都變成了一場噩夢。不僅因為孩子的出生與50歲生日常常讓許多人產生危機感。即使沒有大屠殺兇手那種背景的人，也不免因為孩子的出生而聯想到許多問題，最起碼會捫心自問，孩子將如何看待自己的父親？而艾希曼清楚地知道他的孩子們在任何地方都能夠讀到，他曾經是一名戰爭罪犯和大屠殺兇手。雖然艾希曼有一位忠實的好妻子，但對外卻只能把她講成自己的情婦，否認了她應得的贊許。艾希曼有一個健康的骨肉，卻不能正式宣稱那是他的孩子。艾希曼的五十大壽是1956年3月19日，里卡多·克萊門特的生日卻在5月，而且年紀還小了七歲。除此之外，艾希曼昔日的“偉大事業”只留給他一個自己完全無力影響的姓名。艾希曼想要做出改變，而且不只他周圍的人樂見其成。他后來將表示，“我是自作孽才會被猶太人抓到”。[[246]](#_246_3)我們若仔細觀察艾希曼在1955年以后所過的生活，一定會得出結論：他講得沒錯。

1955年的大環境不只給艾希曼帶來了改變。無論是待在前納粹德國還是流亡在外的國家社會主義夢想家，這一年都必須面對不少壞消息：奧地利簽訂《國家條約》而重獲獨立、聯邦德國結束被占領狀態且成立了聯邦國防軍、西德加入了北約組織并根據哈爾斯坦主義（Hallstein-Doktrin）聲稱自己是德國利益在海外的唯一代表。對仍然心懷國家社會主義的那些人來說，這意味著放棄大德意志的一切利益，轉而投靠戰勝國，即可恨的美國。此外，選舉的夢想也未能實現。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在1954年時還一廂情愿地幻想著，假以時日，“頭腦清醒的少數人”將會說服愚蠢的其他人。結果德意志國家黨在下薩克森州（Niedersachsen）——也就是極右派政黨此前獲得最大成功的聯邦州——的議會大選中，只得到了3.8%的選票。老百姓顯然還沒有辦法理解“一張由謊言構成的羅網正籠罩在德國上方”，不明白“那些自認為已經支配了世界的團伙，正肆無忌憚地跟我們玩著多么邪惡的把戲”。[[247]](#_247_3)相反，德國人在開心地享受繁榮的生活，更為了康拉德·阿登納總理在莫斯科成功談妥釋放德國戰俘一事而歡欣鼓舞。聯邦總統特奧多爾·豪斯（Theodor Heuss）在一次演說中直接對杜勒出版社那幫人開門見山地表示：《路徑》“依然是一份令人汗顏的刊物”，可是“在過去幾年的選舉中，百姓用選票十分清楚地表現出，盡管有人大放厥詞——或許正因為有人大放厥詞的緣故——他們已經具備相當的免疫力”。那個“在庇隆的太陽下取暖的團體”大可繼續“用老掉牙的詞匯來傳播灌輸他們關于未來德國的愚蠢看法”。可是德國人，豪斯說，早就已經走上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248]](#_248_3)

1955年夏天，以色列在科隆設立了代辦處，即大使館的前身，而阿根廷的德意志愛國同志們卻必須繼續等待大赦的機會。若有誰像薩森那般樂觀地在1955年年初宣布，德國的民主只不過是一個沒有前途的臨時狀態、一個“過渡時期”（Interregnum）[[249]](#_249_3)而已，將只會發現自己錯得離譜。如今幾乎完全看不到“帝國的意志”和“德國人不屈不撓的精神”，重新奪取權力與重新返回德國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黯淡。接下來幾年，在阿根廷唯一能夠期待的事情，就是鼓舞故國僅存的最后一批英勇同志，寄望于某種虛無縹緲的種族勝利。經過上一次失敗的“最終勝利”，薩森再一次重新拾起他所熟悉的堅持到底的口號寫道：“我們的奮斗是一個夢想。我們體內的血統追尋著那個夢想，我們的肉體生活無足輕重，因為我們的血統將在我們的子女身上繼續夢想下去，直到許許多多個世紀以后。”[[250]](#_250_3)這么一來，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剩下的就只有血統，而沒有了土地。如果繼續這樣發展下去的話，艾希曼新生下的兒子甚至將得不到恰當的名字，來匹配他那“正確的血統”。

但情勢甚至還會變得更加不利，因為到了1955年年底，人們關于艾希曼曾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反人類罪行的討論已經發生了轉變。在很短的時間內，第一批講述國家社會主義迫害猶太人的書籍陸續發行。法國紀錄片《夜與霧》（Nacht und Nebel）更展現了納粹政權如何有計劃地讓反對者消失于集中營，以及集中營內的恐怖日常生活。觀眾大為震驚，以致聯邦德國政府甚至試圖阻止該片公開放映——不僅在德國電影院禁映，而且阻止其登上戛納電影節。盡管德國歷史學界只是不情愿地展開其實早該全力投入的工作，有關應該如何面對過去的公開辯論，還是連續幾個月登上報紙頭條。[[251]](#_251_3)薩森在向艾希曼談論起這部片子的時候，也顯得非常心煩氣躁。

有關滅絕猶太人的各種著作，以及聯邦德國討論風向的轉變，也影響到杜勒出版社圈內人的討論。萊昂·波利亞科夫和約瑟夫·伍爾夫（Josef Wulf）二人在1955年年底推出的《第三帝國與猶太人》（Das Dritte Reich und die Juden）更宛如平地一聲驚雷，為一切掀開了序幕。該書出版后不久，西德外交部的奧托·布羅伊蒂加姆（Otto Bräutigam）便被暫時停職，因為書中收錄的一份猶太人問題相關文件上有他的簽名。[[252]](#_252_3)該書令人無法忽視的強大力道讓薩森及其同伴深受其苦，因為書中主要收錄了各種文件：元首關于搶掠和迫害的指令；戈林沾沾自喜的評論和筆記；萊因哈德行動的搶劫和謀殺統計數字；關于金牙、國家銀行存款、強制勞動、毒氣室計劃的報告；以及《格斯泰因報告》（Gerstein-Report）的摘要；希姆萊下令清除華沙猶太人隔離區之后，對此做出總結的《斯特魯普報告》（Stroop-Bericht）——尤其是關于“特殊處置”（Sonderbehandlungen）和“滅絕”（Ausrottung）的各種統計數字；迪特爾·維斯利策尼有關“最終解決方案”的報告；萬湖會議的記錄；還有多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有關奧斯維辛集中營、種族狂熱、人體實驗和強制絕育的各種內部消息。通過書中附有評論的資料節錄、完整抄本、照片和影印文件，讀者得以一窺國家社會主義的猶太人“政策”，而且這一切都不像之前發表的各種回憶錄或報紙文章那么容易反駁，因為有可辨認的信箋抬頭和各種簽名。此外更有一整章文字專門獻給了那名“沒有魔法的大審判官”，阿道夫·艾希曼。

如此大量的詳細原始資料很難再被斥為不值一辯的敵方宣傳，“赫斯特”和“海曼”之類的虛構專家們再也無力反駁。更重要的是，懷疑開始在己方陣營內部滋長。連杜勒圈子內最后一批固執己見的人，也逐漸驚覺確實發生過滅絕猶太人的行動。甚至從前在納粹時期習慣于視而不見、置若罔聞和把一切都大事化小的那些人，如今也無法忽視這些證據。那本書很快成為所有報紙談論的對象，而艾希曼的名字跟著頻繁出現。7月號的《路徑》也提到了《第三帝國與猶太人》。[[253]](#_253_3)如今就連這份最死硬的戰后納粹刊物，也開始出現他們之前極力避免或嗤之以鼻的字眼：“奧斯維辛”、“馬伊達內克”、“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萬湖會議”，以及“大規模殘害國家社會主義的政治對手”和“遣送四萬法國猶太人”等等。[[254]](#_254_3)其中還談到“不明就里被送入集中營、被推向死亡的人們”，以及“集中營恐怖”和“對猶太人的暴行”。[[255]](#_255_3)甚至一些最重要的名字也被提及，諸如萊因哈德·海德里希、海因里希·米勒、阿圖爾·內貝（Arthur Nebe）、奧迪洛·格洛博奇尼克，以及特奧多爾·丹內克爾（Theodor Dannecker）——第四局B處4科在法國的“猶太事務顧問”。[[256]](#_256_4)真相如此不可阻擋，以至于人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也開始實話實說，唯有艾希曼的名字值得注意地不曾出現在1956年的文章系列當中，一次也沒有。

但“正視”仍遠不意味著“承認”。納粹滅絕猶太人是“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死亡之舞”[[257]](#_257_3)這個事實非但沒有被接受，反而出現了一種新的陰謀論。如果事實不容否認，那至少可以歪曲解釋一下。于是一系列文章在“蓋世太保的角色”這個綱領性的標題下，渲染出一幅“自1933年以來不斷肆虐的陰謀”圖景。盡管文中充滿令人不解的胡言亂語，但還是清楚地呈現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還在夢想拯救國家社會主義的人的無奈絕望。[[258]](#_258_3)他們用來蒙混的謊言可以概述如下：應該負起罪責的不是黨衛隊本身。不，一切都是蓋世太保的錯！因為后者“從來都不是純粹的國家社會主義警察機構”，完全有異于當時和現在人們給它貼上的標簽。蓋世太保自創立以來便不斷進行“顛覆活動”，它“偽裝成一個由正直公民組成的小團體”，事實上一心一意想要“抵制、阻撓和破壞第三帝國的政策”。其目的不僅在于推翻“深受他們憎惡的希特勒全民政府（！）”，更打算對德國的世界聲譽造成永久傷害，因為他們試圖遏止希特勒大力推動的“德意志民族精神”繼續勝利前進。該文并以各種捕風捉影的細節來說明，這一切苦難的罪魁禍首乃是德軍情報機構的首腦威廉·卡納里斯海軍上將，因為是他提拔了詭計多端的萊因哈德·海德里希。所有暴行都必須記在這兩個人的賬上，而且“今天可以合理地懷疑曾經存在一個非常特殊的系統，執意破壞新政府并到處為其樹敵”。顯然，等海德里希發覺卡納里斯利用他做了什么勾當之后，卡納里斯就派人把他暗殺掉。實際上根本不是國家社會主義者的海因里希·米勒隨即取而代之，在東方地區組織起滅絕猶太人的行動。“蓋世太保領導階層的犯罪集團”是一群無所不用其極的家伙，他們毫不猶豫地將人們送入集中營、送上死亡之路，為的是最終徹底打垮國王——阿道夫·希特勒。由于還必須說明為何至今沒有人注意到這么明顯的事情，于是作者繼續解釋道：這是因為一個謊言被制造出來。“戰勝國非常清楚蓋世太保行動的真實背景。他們只能協助掩飾真相，以免受到欺騙的世人有朝一日赫然發現，組織了那些事情的人并非希特勒，而是他的對手。”最后一切都沉冤得雪，尤其是希特勒、德國以及國家社會主義。

該文的作者署名保羅·貝內克（Paul Beneke） ，宣稱撰文地點是在馬德里。而真正的保羅·貝內克生活于15世紀。根據立場不同，他或被看成一位無私忘我的偉大英雄，在1468年擊敗英國艦隊，收復了漢薩同盟的貿易權；或被視為一名殘暴的海盜，對每一艘沒能逃脫的帆船強取豪奪。作家古斯塔夫·弗賴塔格（Gustav Freytag）因其《來自德國過去的圖像》（Bilder aus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一書和各種反猶太立場鮮明的著作而深受納粹重視。他曾為上述來自但澤（Danzig）的漢薩同盟海軍將領樹立了一座文學的豐碑，并由軍事出版社推出豪華精裝本供人購買。在但澤當地，保羅·貝內克更享有獨特的英雄地位，許多街道和公共設施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凡是了解但澤百姓與那座城市之間特殊關系的人[[259]](#_259_3)，都可以得出結論，那篇揭露所謂“蓋世太保秘密”的作者是一個來自東普魯士的人。但我們直到今天都不知道那名否認現實的作者究竟是誰。文章內容清楚指出該作者曾經是黨衛隊的成員。其行文方式、文體風格和文章背后的細節知識，則無論如何都對薩森、萊斯或弗里奇等嫌疑人不利。[[260]](#_260_3)雖然艾希曼自己也用過“史上最偉大和最暴戾的死亡之舞”這種有力的講法，但迄今無法斷定究竟是誰“啟發”了誰。更何況那篇文章質疑了艾希曼認為正確的一切事物，因此不可能得到他的歡心。[[261]](#_261_3)

無論是誰試圖將同志們的心靈從承認罪行的噩夢中拯救出來，他都不是孤軍奮戰，也不愁后繼無人。有關那一小撮罪犯如何蒙騙希特勒及其同仁，將他們的畢生志業和整個國家帶入戰爭和大屠殺的虛構故事，至今仍不斷以各種新版本出現于特定的文學作品和互聯網網站。然而早在1956年的時候，這個故事就已經奠下了陰險的基石。當保羅·貝內克被問到到底是誰躲在那一切的背后時，答案已經呼之欲出。1956年德意志國家黨在柏林舉行大會的時候，11月30日的會議記錄中一名黨員斬釘截鐵地指出：艾希曼，蓋世太保的猶太人事務處處長，是“全猶太人”（Volljude）。他在希姆萊和外國猶太人的幫助下混入黨衛隊，并帶去了反猶太主義。今天他早已重新生活在特拉維夫。[[262]](#_262_3)最頑強的阿道夫·艾希曼“反傳記”[[263]](#_263_3)由此誕生，看似堅不可摧地在那些尋求心靈慰藉的反猶主義者中長久流傳。艾希曼自己不是喜歡說他來自薩羅納，而且能夠講流利的希伯來語和意第緒語嗎？難怪他有辦法以猶太人事務專家的身份大展宏圖，因為他本身就是猶太人……甚至連約翰·馮·萊斯事后也認為這個觀點頗具說服力，他最后一次見到艾希曼是在1954年移居開羅前。[[264]](#_264_3)這種完全脫離現實的“猶太人艾希曼”論調，是歷史扭曲者在既無法回避屠殺猶太人的事實，又不愿承認“那是德國人的罪行”的情況下，所自然得出的最終結果。這種無稽之談背后唯一可以利用的根據，就是艾希曼偽稱自己與猶太事物在精神上的親密關系，以及1945年之后有關其受害者擔心艾希曼可能偽裝成猶太人逃避追捕的報紙文章。無怪乎陰謀論者喜歡一再引用《我們正在找的人》那篇老掉牙的文章，因為在意圖篡改事實者的眼中，它可以被扭曲成猶太人承認艾希曼是自己人。這種否定論調甚至把猶太人描繪成猶太人大屠殺的主謀，可是直到今天，它在支持者那里都難以撼動，并且以駭人聽聞的方式在世界上流傳。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那批人固然非常樂意相信“卡納里斯理論”，認為元首又一次成了毫不知情的蠢蛋，但有關這位前任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出身背景的說法，就比較難以接受了。盡管如此，薩森和他的同仁們仍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至少也要讓這位老同志親口承認自己“不德意志”（undeutsch）。

萊昂·波利亞科夫和約瑟夫·伍爾夫的文獻匯編甚至一度讓薩森立場動搖。他告訴《路徑》的讀者們：“近來，我以嚴格的自律精神讀完了一本厚書，書中收錄了涉及第三帝國與猶太人之間關系的文章和文件。它有時令我感到窒息，我仿佛被掐住了喉嚨一般掙扎，直到我再次天真地大聲喊出：‘這不是真的！’我知道這喊叫十分愚蠢，純粹來自我的無助感。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徑自把一切都斥為謊言，無論是那本可怕的書里面的各種東西，還是每一聲‘這不是真的’。”[[265]](#_265_3)但如果有誰期待這種閱讀體驗能夠持久動搖薩森的世界觀，將只會大失所望。其所承認的因書而起的驚惶，已隨著一段指責原子能的文字而化為烏有——原子能的發明正好就是“猶太人”的過錯，因為一個真正的雅利安人是不會去分裂原子的。于是薩森發揮自己的修辭技巧，向讀者說明自己如何擺脫了那本“可怕的書”帶來的負擔：“真相很可能是相對的”，畢竟毀滅營內施放毒氣的未受訓練的“小”輔助工，“跟諾貝爾獎得主以及讓全人類無奈屈服的科學毀滅技術大師比起來，只不過是可憐的侏儒罷了”。通過影射相對論的發明者，薩森只用了幾行文字，就把之前短暫意識到的危害人類罪行加以淡化，使它在真正的“猶太人毀滅計劃”面前重新顯得微不足道。

盡管評論試圖粉飾太平，但《路徑》的編輯部門顯然已經采取新的政策。短短幾個月前，還可以讀到“海曼”和“赫斯特”等人的文章，宣稱“在德國境內和境外的任何一座集中營或拘留營地，從來都不曾使用毒氣室、毒氣卡車或焚尸爐來滅絕人類。”[[266]](#_266_3)如今該雜志中卻出現了貝烏熱茨、洛倫茨·哈肯霍爾特（Lorenz Hackenholt）和克里斯蒂安·維爾特等名字——分別為一座毀滅營、一名柴油毒氣車技術人員，以及負責實地監督的人。一時之間，事實真相降臨了布宜諾斯艾利斯，讓費盡功夫粉飾太平的薩森再也不得安寧。他沒有讓自己局限在血腥夢想的陳詞濫調里面，反而前往德國，并在那里報了戶口：威廉·安東尼烏斯·瑪麗亞·薩森·范·埃爾斯洛（Willem Antonius Maria Sassen van Elsloo），德國籍記者和作家，1956年8月25日正式從阿根廷移居博登湖畔的康斯坦茨（Konstanz am Bodensee）。看來如果能夠找到替代的安身之處的話，崗位被拋棄顯然也變得更容易忍受一些。[[267]](#_267_3)

波利亞科夫和伍爾夫進而在1956年推出了第二部文件匯編，《第三帝國及其仆從》（Das Dritte Reich und seine Diener），重點關注外交部、納粹司法機構和國防軍。重要的是，很快又相繼出現了兩本深具影響力的著作。一是格爾拉德·賴特林格所著、包羅萬象的《最終解決方案：1939-1945年滅絕歐洲猶太人的企圖》（Final Solution: The Attempt to Exterminate the Jews of Europe, 1939-1945）終于在德國出版，這是第一本試圖從各方面探討猶太人大屠殺的研究報告。第二本是亞歷克斯·魏斯貝格（Alex Weissberg）撰寫，伴隨耶路撒冷“卡斯特納審判案”（Kasztner-Prozess）所引發的廣泛討論而推出的《約埃爾·布蘭德的故事》（Die Geschichte des Joel Brand）。相關書評當中多半也都出現了艾希曼的名字，亦即那個派遣約埃爾·布蘭德前往國外，要求他“用卡車換取猶太人鮮血”的國家保安總局猶太事務主管。即便那些作者有時會因為自己的猶太人身份而被批評不夠客觀[[268]](#_268_3)，但在波利亞科夫和伍爾夫文件匯編的烘托之下，他們的著作仍然相當令人不安。

杜勒出版社的圈內人仔細閱讀了那些書籍，而每翻過一頁就帶來更多對真相的懷疑，因為他們不愿相信的確發生過那種事情。薩森訪談開始之前不久，《路徑》刊出了最后一篇以此為主題的文章，以《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為題發起反擊，表示猶太人大屠殺的真正目的是要建立以色列國，而這個罪行“以巧妙的手法被嫁禍給希特勒”。[[269]](#_269_3)“從來都沒有過阿道夫·希特勒下令的謀殺猶太人方案”，因為希特勒被參加萬湖會議的一小撮人組成的陰謀集團蒙在鼓里——在這里，《路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直接提到艾希曼[[270]](#_270_3)——對此一無所知。希特勒自己所在的元首指揮總部，是一個“集中營修道院”（KZ-Kloster，瞧瞧用字多么圓滑），被隔絕于真正發生的事情之外。“陰謀集團脫胎自警方，這更揭露出猶太秘密特工已經腐蝕了表面上尊奉國家社會主義的蓋世太保。”因此，是猶太復國主義者自己殺害了他們“所痛恨的同化主義者”，從而迫使國際社會允許他們成立自己的國家。這使得猶太人大屠殺最終看上去好像是猶太人內部的事情，可憐的元首在地堡里面根本無能為力。

這種令人無法忍受的狂言囈語出自“沃爾夫·西弗斯”（WolfSievers）。這個筆名也被用于《路徑》的其他文章，而且本身就已經非常耐人尋味：沃爾弗拉姆·西弗斯（Wolfram Sievers）是在蘭茨貝格監獄被絞死的戰犯之一，杜勒出版社的圈內人視之為烈士。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在1953年返回德國的時候，曾經特地前往蘭茨貝格監獄的絞刑架朝圣，并激動地寫道：“自從回國以來，我從來沒有像在這里一樣感覺如此接近德國。”[[271]](#_271_4)沃爾弗拉姆·西弗斯作為一個名為“祖先遺產”（Ahnenerbe）的“研究團隊”的管理者，對人體實驗和謀殺負有罪責，因此在紐倫堡醫生審判中被判處死刑。他曾經為了一些非常不人道的計劃——例如臭名昭著的“骨骼收藏”——聯絡過艾希曼，因為他需要有人安排運送仍然活著的“展覽物件”。我們尚未查明躲在這個筆名背后的人究竟是誰。然而從風格、內容，以及從所舉出的例證看來，該文很可能出自薩森之手。薩森在1960年的一次采訪中，明確無誤地再次重復了文中的基本論點。他告訴《理性報》（La Razón）的記者，真正該對猶太人大屠殺負責的另有其人，甚至“艾希曼無疑也只不過是那個邪惡計劃發起人手中的工具罷了”，而且那個計劃并不是希特勒想出來的。[[272]](#_272_3)筆名也暴露了作者的身份，因為薩森另外兩個筆名的縮寫同樣是其姓名縮寫字母W. S.。[[273]](#_273_4)總而言之，即將構成艾希曼訪談核心的那些主題和論點，都已經出現在了《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一文當中：元首的指令和“猶太復國主義的陰謀”、為希特勒平反恢復榮譽、在蓋世太保內部尋找叛徒、幸存的文件和各種相關書籍。

盡管嘗試用盡了各種新聞手段進行反擊，這些如洪水般涌來的事實陳述仍然難以阻擋。盡管薩森這樣的人自蘇德戰爭起就聽到過很多傳聞，而且知道的事情遠比他自己愿意承認的多出許多，但他關于納粹領導層的知識仍不足以令他提出可信的反駁。他從來沒有見過那些文件、從來沒有聽說所提到的那次會議，而且根本窮于應付這么多的材料。盡管有各式各樣的陰謀論狂言，但關于猶太人大屠殺的書籍還是讓流亡在外者和置身昔日第三帝國的人，同樣感到詞窮力竭。但與聯邦德國的讀者不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那批人知道能夠回答所有這些問題的先生住在何處，況且他的知名度夠高，可在這場“意識形態戰爭”的下一回合發揮公共影響力來揭穿一切。他將讓陰謀如肥皂泡一般破滅。不同于其他小心翼翼的時代見證者，例如希姆萊昔日的首席副官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或者集中營“醫生”約瑟夫·門格勒，這位先生非常樂意接受此一要求。對艾希曼來說，訪談主要有兩大優點：一則杜勒出版社可提供他無法獨力購買的新書，因為來自德國的圖書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十分昂貴。此外更重要的是，只有這些懂得跟新聞界打交道的同志們，才能幫助艾希曼實現他迫切渴望的事情，那就是掌控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從而他的孩子們能夠公開、自由和驕傲地表示，他們是艾希曼的兒子。

[\*](#_371) 魯德爾是空軍上校，主要駕駛Ju87俯沖轟炸機（Junkers Ju 87）。總共出任務2530次（被擊落32次），擊毀519輛坦克、150多個炮兵陣地、800多輛軍車、2艘軍艦，并擊落敵機9架……納粹德國為他特制了“金橡樹葉雙劍鉆石騎士十字勛章”。——譯注

[\*](#_372) 鮑比伯爵是奧匈帝國末期開始出現于維也納笑話中的丑角人物。他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但常常神氣活現地擺出貴族氣派。——譯注

[\*](#_373) 施文德乃黨衛隊保安局偽鈔制造計劃“伯恩哈德行動”（Unternehmen Bernhard）的組織者之一，負責差遣猶太囚犯大量制作高品質的英鎊偽鈔。據悉在1945年的時候，市面上流通的英鎊有三分之一出自偽造。——譯注

[\*](#_374) 艾森豪威爾亦音譯成“艾森豪”，但更準確的譯法是“艾森豪爾”，那位美國將軍和總統是德國后裔，其姓氏的英語發音保留了德語Eisenhauer（艾森豪爾）的讀法，原意為“打鐵人”（采鐵工人）。——譯注

[\*](#_375) 加蘭德回憶錄中譯版的標題為《鐵十字戰鷹》。——譯注

[\*](#_376) 例如第六章的題材，是薩森帶著身懷六甲的妻子和他們的小孩從愛爾蘭逃往阿根廷的經過。——原注

[\*](#_377) 戈培爾夫婦于1945年5月1日在毒殺六名子女之后雙雙自盡。——譯注

[\*](#_378) 艾希曼的小兒子在阿根廷的全名為里卡多·弗朗西斯科·利布爾（Ricardo Francisco Liebl）。方濟各神父（Pater Franciscus）的名字則使用了“弗朗西斯科”的拉丁文形式。——譯注

[[1]](#_1_6) Meine Flucht, 22.

[[2]](#_2_7) 艾希曼自己談起了這層關系，但一如既往地沒有說出該人的姓名。Meine Flucht, 23.顯然那些人彼此相互介紹時透露的是自己昔日的身份，而不使用新的化名。

[[3]](#_3_6) Meine Flucht, 23.

[[4]](#_4_7) Uki Goñi, Odessa. Die wahre Geschichte, Hamburg, Berlin 2006, 283.

[[5]](#_5_7) 其300名工作人員當中顯然只有40人是專業工程師。參見Ernst Klee, Persilscheine und Falsche Pässe: Wie die Kirchen den Nazis halfen. Frankfurt am Main, 1992; Uki Goñi, Odessa ...,A.o.

[[6]](#_6_7) 艾希曼在以色列的筆記中曾經多次提及此事，在《我的逃亡》手寫稿和其他地方也有提到。

[[7]](#_7_7) 艾希曼在薩森訪談會上提到了漢斯·菲施伯克，并在薩森抄本59, 9寫下手寫注記：“他還活著！”菲施伯克的太太曾于艾希曼被捕后表示，她是最后與艾希曼說話的人之一，而且自從她的丈夫也任職于“卡普里”以來，他們便彼此熟識。

[[8]](#_8_6) Eckhard Schimpf, Heilig: Die Flucht des Braunschweiger Naziführers auf der Vatikan-Route nach Südamerika. Braunschweig 2005, 110.

[[9]](#_9_6) 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10 C, 1:28:00。

[[10]](#_10_7) 保存至今的信件、談話記錄，甚至還有一通電話記錄，清楚證明了他們之間20次左右的聯系。

[[11]](#_11_5) 拉亞科維奇在1940年加入黨衛隊。參見：艾希曼1940年7月19日關于拉亞科維奇的員工考核報告，起訴文件T/55（6）。有證據顯示，拉亞科維奇曾在1952年2月和8月之間藏身布宜諾斯艾利斯，這同時也表明了，艾希曼即使在圖庫曼時期也不時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

[[12]](#_12_5) 所謂有關德國人害怕被人認出來的悲慘故事——例如后來在胡安（漢斯）·馬勒筆下出現的情景——根本純屬虛構。布宜諾斯艾利斯有德國人的基礎設施，有他們自己的餐館、電影院、劇院和許多商店，構成了市內一個自然的組成部分。更何況阿根廷人還對德國人特別友好。

[[13]](#_13_5) 烏基·戈尼指出，其中包括阿明·達迪約（Armin Dadieu）、貝特霍爾德·海利希、埃爾溫·弗萊斯（Erwin Fleiss），以及弗朗茨·施泰青格（Franz Sterzinger）等人（Odessa,284）。戈尼和霍爾格·梅丁雖然都曾提及西格弗里德·于伯賴特爾（施泰爾馬克的省黨部領導）也出現在當地，但此事仍然眾說紛紜。不過艾希曼曾在《我的逃亡》中明確提到于伯賴特爾，并稱他逃亡到阿根廷對自己產生了直接影響（第12頁）。

[[14]](#_14_5) 根據其女兒卡琳·海利希的回憶。Eckhard Schimf, Heilig ..., A. o., 111.海利希在1951年1月17日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其子女則在1953年跟來。他告訴他們，自己曾在羅馬與艾希曼見過面。這個謊話顯然是為了避免向家人解釋，他究竟怎么會認得那名“猶太人事務主管”。在羅馬見面的講法比較不會啟人疑竇。

[[15]](#_15_5) 1998年與1999年接受約書亞·戈爾茨（Joshua Goltz）和亞伯·巴斯蒂（Abel Basti）的采訪。引自Goñi, Odessa ..., A. o., 267, 494 n.哈格爾（黨衛隊編號112171）是林茨省黨部領導、黨衛隊上級集團領袖奧古斯特·埃格魯伯（August Eigruber）的秘書。

[[16]](#_16_5) Interview Heinz Lühr in NDR/BBC 2002, Adolf Eichmann - Begegnungen mit einem Mörder.呂爾將此次談話的時間定在薇拉·艾希曼1952年7月抵達之后不久。

[[17]](#_17_5) Meine Flucht, 24.

[[18]](#_18_5) 偶爾會錯拼成“Davmanin”。

[[19]](#_19_5) 在以色列的時候，艾希曼已被證明無法閱讀法文資料。阿根廷的錄音更清楚顯示出，艾希曼絕對不是什么語言天才，他講的西班牙語帶有濃重德國口音。

[[20]](#_20_5) 身份證件編號1378538，由布宜諾斯艾利斯省警察局簽發。圖庫曼省不久之后又發給艾希曼兩張身份證件：編號為341952的身份證件（1952年2月8日），以及編號為212430的身份證件（1952年4月3日）。復印本見Gideon Hausner, Justice in Jerusalem.New York 1966.

[[21]](#_21_5) Meine Flucht, 25.

[[22]](#_22_5) 康斯坦丁·馮·諾伊拉特（1902-1981）甚至一度擔任過“同志工作會”的主席。見黑森二臺對威爾弗雷德·馮·奧芬的采訪（Gaby Weber in hr2 Kultur, Wissenswert, gesendet am 8.5.2008），以及霍爾格·梅丁對路德維希·林哈特（Ludwig Lienhardt）和約瑟夫·揚科（Josef Janko）的采訪（Holger Meding, Flucht vor Nürnberg? ..., A. o., 176）。諾伊拉特1953年正式任職于西門子公司，1958年成為西門子阿根廷分公司負責人，1965年在慕尼黑總部工作，1966年退休。感謝慕尼黑西門子檔案館的弗蘭克·維滕多爾弗（Frank Wittendorfer）先生提供資料，但該館對這位昔日同僚的知識少得令人出奇。關于諾伊拉特對在逃戰爭罪犯的協助，參見本書第五章《我沒有同志》一節。

[[23]](#_23_5) 魯德爾曾經（在其代筆者薩森的協助下）談過弗里奇的生平，見Hans-Ulrich Rudel,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Argentinien. Göttingen 1954, 220。該書同時也由杜勒出版社發行，書中出現了右翼人士對那名出版商的大吹大擂。有關弗里奇曾經涉入戰爭罪行和在德國擔任過要職的不實傳聞，其唯一根據就是這次短暫的德國之行。畢竟弗里奇年紀太輕了，根本不可能在希特勒統治下開拓具有影響力的職業生涯。此外那種“世界大會”只舉行過一次，很容易即可斷定確切的時間。

[[24]](#_24_4) Holger Meding, Der Weg: Eine deutsche Emigrantenzeitschrift in Buenos Aires 1947-1957. Berlin, 1997.這本一流研究的用處遠遠超出了其標題所指出的范圍。對于想了解德意志民族主義團體之本質的每個人來說，這本書都是必備讀物。其意義不僅限于阿根廷，并且開啟了一個令人興奮的研究領域，直到今天仍未將所有曾在《路徑》工作過的人找出來。當然，若要進行更深入的探索，就不能不親自閱讀杜勒的出版品以及《路徑》本身。以下敘述正是基于對這類第一手資料的研讀，此外必須感謝埃伯哈德·弗里奇的孫子愿意與我交換意見。

[[25]](#_25_4) “縫紉用品店”（Kurzwarenladen）是一個不時可見的翻譯錯誤。從弗里奇自己在信件中的描述即可清楚看出此點。

[[26]](#_26_3) Aussage Hefelmann 28.12.1960, Js148/ 60 GStA Frankfurt a.M. gegen Prof. Werner Heyde,Hefelmann u. a. Zu den Personalien vgl. Ernst Klee, Persilscheine ..., A. o.

[[27]](#_27_2) 弗里奇在1948年8月19日寫給維爾納·博伊梅爾堡的信函。Rheinische Landesbibliothek Koblenz, Nachlass Werner Beumelburg. Zitiert nach Stefan Busch, Und gestern, da hörte uns Deutschland: NS-Autor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Kontinuität und Diskontinuität bei Friedrich Griese, Werner Beumelburg, Eberhard Wolfgang Müller und Kurt Ziesel.Würzburg, 1998.

[[28]](#_28_2) 今日可確定的人士包括維爾納·博伊梅爾堡、漢斯·格林、庫爾特·齊澤爾（Kurt Ziesel）、埃伯哈德·沃爾夫岡·默勒（Eberhard Wolfgang Möller）、弗里德里希·格里澤（Friedrich Griese）、埃哈德·維特克（Erhard Wittek）、保羅·阿爾韋德斯（Paul Alverdes）和海因里希·齊利希（Heinrich Zillich），而且他們都曾為杜勒出版社撰稿，參見《路徑》。此外從弗里奇在1948年2月10日和1949年2月9日寫給博伊梅爾堡的信件中，亦可從其吹噓的表現間接看出此事。Rheinische Landesbibliothek Koblenz,Nachlass Werner Beumelburg.

[[29]](#_29_2) 弗里奇在1948年2月10日寫給博伊梅爾堡，以及格林在1948年3月5日寫給博伊梅爾堡的信件。Rheinische Landesbibliothek Koblenz, Nachlass Werner Beumelburg.

[[30]](#_30_2) 這絕非文學修辭想象。杜勒出版社的確還銷售相應的鉤針編織指南。一位同時代的見證者聲稱自己還擁有那樣的東西。由于她不愿讓自己的姓名被公之于世，使此事顯得更加可信。

[[31]](#_31_2) Wilfred von Oven, Ein “Nazi” in Argentinien. Gladbeck 1993, 19.

[[32]](#_32_2) 關于實際使用E. R. O. S.旅行社服務的方式，可參見弗里奇和維爾納·博伊梅爾堡的信件往來。例如從中可以看出，博伊梅爾堡的稿費也是以實物支付的。Beumelburg Estate,Rheinische Landesbibliothek Koblenz.

[[33]](#_33_2) 以下資料不僅來自我自己進行的采訪和檔案研究，同時也要感謝娜塔莎·德·溫特（Natasja de Winter）杰出的實地研究工作。

[[34]](#_34_2) 福爾貝格在其回憶錄中不太成功地否認了自己的領導地位。Heinrich Volberg,Auslandsdeutschtum und Drittes Reich: Der Fall Argentinien. Köln, Wien 1981.關于阿根廷海外分部的背景資料以及留存下來的人員名錄，主要可參考Frank-Rutger Hausmann,Ernst Wilhelm Bohle, Gauleiter im Dienst von Partei und Staat. Berlin 2009.

[[35]](#_35_2) 海納·科恩的繼任者埃里韋托·科爾希（Heriberto Korch）不愿接受采訪。該公司似乎在不久前才被德迅公司（Kühne & Nagel）并購。

[[36]](#_36_3) 弗里奇在信函中提到過各種名稱和地址。

[[37]](#_37_2) 魯爾夫·范·提爾（Roelf van Til）1999年對英格·施奈德的采訪。

[[38]](#_38_2) 魯爾夫·范·提爾1999年對英格·施奈德的采訪；雷蒙德·萊伊2009年對薩斯基雅·薩森的采訪；薩斯基雅·薩森和弗朗西斯卡·薩森與作者的信件往來。

[[39]](#_39_2) 1959年2月4日，呂訥堡地方法院第四刑事庭對古斯塔夫·弗洛爾（Gustav Flor）提起刑事訴訟，罪名是傳播國家社會主義著作。弗洛爾那里有大量杜勒出版物和一份訂戶名單遭到沒收。杜勒出版社已在前一年停止運行。弗里奇也被傳喚，但沒有出庭。參見1959年2月4日《斯圖加特日報》（Stuttgarter Zeitung）和《世界報》的專文，以及漢堡各家地方報紙的報道。可惜法院的證據迄今仍未找到，很可能是因為已過保留期限而被銷毀。貝希特斯加登則是弗里奇在信函中提到的。

[[40]](#_40_2) 感謝丹尼爾·弗里奇（Daniel Fritsch）提供的信息。

[[41]](#_41_2) Rudel,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Argentinien, 206.

[[42]](#_42_2) 薩森在1953年中情局的一份報告中被指認為“卡普里”的員工。由于那名線人來自阿根廷，我們至少可以確定，局外人將薩森視為“卡普里”的工作人員。German Nationalist and Neo-Nazi Activities in Argentina, July 8, 1953, declassified on April 11, 2000 (CIARDP620-00 856 R000 3000 30004-4).佩德羅·波比耶辛在2009年宣稱，薩森因此曾多次前往圖庫曼。

[[43]](#_43_3) 埃克哈德·申普夫（Eckhard Schimpf）描述了貝特霍爾德·海利希所使用的信息傳遞渠道，那就是通過他在羅馬的舊識為其家人取得護照，同時借用黨衛隊的組織“沉默援助”（Stille Hilfe）。海利希的信件也經過許多假地址來傳遞。Schimpf, Heilig, p.111.由海倫·伊麗莎白·伊森堡侯爵夫人（Helene Elisabeth Prinzessin von Isenburg）積極領導的“沉默援助”與魯德爾的“同志工作會”也保持著密切接觸。

[[44]](#_44_3) 艾希曼在摩薩德團隊捕獲他的審問專家面前，第一次親口說出了這個版本。引自Zvi Aharoni, Wilhelm Dietl, Der Jäger. Operation Eichmann: Was wirklich geschah. München 1996, 103.

[[45]](#_45_2) 根據社區的記錄，薇拉·艾希曼在1948年7月30日移居菲舍恩多夫。參見瓦倫丁·塔拉1960年1月1日寫給弗里茨·鮑爾的信件。

[[46]](#_46_2) 1960年10月24日在耶路撒冷舉行的新聞發布會。引自Allgemeine Wochenzeitung der Juden, 28.10.1960, “Wie Eichmann gejagt wurde”.

[[47]](#_47_2) 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 A. o.塞格夫曾有機會過目塔拉的遺物，并且分析研究了他寫給維森塔爾的信件（126f.）。

[[48]](#_48_2) 多虧了艾希曼叔叔在萊茵蘭家中的女管家，讓我們知道這封信的存在。Neues Österreich vom 2. 6. 1960, “Adolf Eichmann bob sein eigenes Grab aus. Eine Haushälterin der Familie erzählt”.當埃伯哈德·弗里奇于1958年離開阿根廷前往奧地利的時候，他從艾希曼那里獲得了其家人在林茨的地址。參見本書第七章《余波蕩漾》。

[[49]](#_49_2) 克勞斯·艾希曼接受《快客雜志》的采訪，1966年1月2日。

[[50]](#_50_2) 瓦倫丁·塔拉1960年1月1寫給弗里茨·鮑爾的信件，刊載于1960年6月的奧地利《新警世報》。

[[51]](#_51_2) 從上下文可以看出，所指稱的對象是弗里茨·艾希曼（Fritz Eichmann），艾希曼父親第二段婚姻的同父異母弟弟。

[[52]](#_52_2) 只需要看一下今日的聯邦德國入籍申請書即可確認此事。

[[53]](#_53_2) 塔拉在1953年1月19日寫給維森塔爾的信函。維森塔爾私人文件，引自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A. o., 128.

[[54]](#_54_2) 克勞斯·艾希曼接受《快客雜志》的采訪，1966年1月2日。

[[55]](#_55_2) 《圖片報》于2011年1月8日刊登了德國聯邦情報局艾希曼檔案卡片第一頁的復印本，其標題為“Eichmann/Aichmann, Adolf DN Clemens”。德國聯邦行政法院補充文件BVerwG 7A 15.10, Saure gegen BND, BND-Akten 100 470, 1。

[[56]](#_56_3) 在南斯拉夫對威廉·富克斯的審判中，富克斯也稱艾希曼為“黨衛隊旗隊長”。這表明艾希曼已經提前把自己的晉升拿來大肆招搖。

[[57]](#_57_3) 約瑟夫·阿道夫·烏爾班無疑是最可能的信息提供者。然而涉嫌的人太多，很難做出有意義的推斷。這個消息可能來自整個情報鏈當中的任何一名線人，其中也包括艾希曼在林茨的家人的員工。

[[58]](#_58_3) 只有在1947年推出最初幾期的時候，弗里奇才隱藏在其印刷技師古斯塔夫·弗里德爾（Gustav Friedl）的背后。接著他不但固定撰寫發刊詞，并且還把詳細信息清楚列在刊頭。偶爾會有人錯誤地宣稱約翰·馮·萊斯才是總編輯，這個錯誤源自西德駐布宜諾斯艾利斯大使館在1954年向德國外交部提交的一份報告，而萊斯剛好就在提出那份報告的同一天離開了阿根廷。大使館內的人員顯然知道，萊斯在編輯會議上有很大的影響力。Botschaft an AA, 11.6.1954, PA AA, Abt. 3, Bd. 74, Polit. Bez. zu Argentinien Az. 81.33/3.Gefunden vo Holger Meding, Der Weg ..., A. o., 125.

[[59]](#_59_2) 這是《世界報》（網絡版）對2011年1月8日德國聯邦情報局公開檔案卡片做出的反應。

[[60]](#_60_2) 豪爾赫·卡馬拉薩（Jorge Camarasa）甚至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電話簿上找到了里卡多·克萊門特的名字。Odessa al Sur: La Argentina Como Refugio de Nazis y Crimmales de Guerra. Buenos Aires 1995, 157; Uki Goñi, Odessa ..., A.o., 376, n.539.可惜這條線索迄今無法驗證。

[[61]](#_61_3) 那個化名不僅出現在檔案卡片上，同時也出現在1960年之前僅有的22頁檔案中。參見德國聯邦行政法院補充文件BVerwG 7A 15.10, Saure gegen BND, BND-Akten 100 470,1-18。

[[62]](#_62_2) 艾希曼潛逃期間謠傳的化名多得嚇人。審判開始之前，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報告、報紙文章和書籍當中，總共有大約20個化名，其中包括艾希曼確實使用過的那些。

[[63]](#_63_2) 1959年9月1日提出的詢問，以及1959年9月8日做出的回復。參見德國聯邦行政法院補充文件BVerwG 7A 15.10, Saure gegen BND, BND-Akten 100 470, 17-18。感謝克里斯托夫·帕爾奇。

[[64]](#_64_2) Salto是印刷錯誤。

[[65]](#_65_2) 按照當時的官方匯率，100比索折合將近5美元或略多于20德國馬克，那確實是很多錢。下面還會有更多關于匯率的說明。

[[66]](#_66_2) 克勞斯·艾希曼接受《快客雜志》的采訪，1966年1月2日。

[[67]](#_67_2) Meine Flucht, 25.

[[68]](#_68_2) 克勞斯·艾希曼接受《快客雜志》的采訪，1966年1月2日。

[[69]](#_69_2) 光是從薇拉·艾希曼在1960年通過薩森出售給《生活》雜志和《明星周刊》的大量圖像資料即可看出，她把丈夫的照片藏得有多好。

[[70]](#_70_2) 薇拉·艾希曼接受《巴黎競賽畫報》的采訪，1962年4月29日。原始文檔見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2, 23。

[[71]](#_71_2) 臭名昭著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埃里希·克恩邁爾（Erich Kernmayr，化名Kern）早在1952年3月的時候，便曾如此告訴一名美國中情局的線人。CIA report, NA, RG 263, CIA Name File Wilhelm Höttl.

[[72]](#_72_3) 即使在1966年，克勞斯·艾希曼描述他的父親時仍然充滿敬佩之情——他“能做很多事情”。克勞斯·艾希曼接受《快客雜志》的采訪，1966年1月2日。

[[73]](#_73_3) 艾希曼在以色列的信件中仍然提到他的阿空加瓜之旅。對德國移民來說，這種壯舉顯然攸關榮譽。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自豪地發表了他攀登時的照片。

[[74]](#_74_2) Eckhard Schimpf, Heilig ..., A. o. 111.

[[75]](#_75_2) Meine Flucht, 25.

[[76]](#_76_2) 1959年艾希曼向梅賽德斯—奔馳阿根廷公司應聘時表示，他在1953年4月30日結束了與“卡普里”的勞務關系。復印本參見Heinz Schneppen, Odessa und das Vierte Reich.Mythen der Zeitgeschichte. Berlin 2007, 160-61.

[[77]](#_77_2) 阿根廷聯邦警察針對艾希曼被綁架一事做出的報告，1960年6月9日。Archivo General de la Nacion/Argentinisches Nationalarchiv (AGN), DAE, Bormann-Akte, S. 77-79.引自Uki Goñi, Odessa ..., A. o., 296.

[[78]](#_78_2) 貝特霍爾德·海利希的家人安內格雷特（Annegret）、卡琳，以及漢內洛蕾·“利希維茨”（Hannelore “Richwitz”）于1953年3月25日抵達阿根廷，但在1953年12月21日即已離開該國，因為貝特霍爾德·海利希（化名為漢斯·利希維茨）無法在他的舊家庭和新情婦之間做一取舍。安內格雷特的年齡與艾希曼的次子相同，按照后者的講法，海利希直到1955年都為福爾德納和“卡普里”工作。參見Eckhard Schimpf, Heilig..., A. o.,110f., 129.漢斯·菲施伯克的妻子于艾希曼被綁架后宣稱，她的丈夫和艾希曼直到1955年都受雇于“卡普里”。

[[79]](#_79_2) 西門子阿根廷分公司正式成立于1954年。羅薩里奧的工作是在分公司成立之前。諾伊拉特從1953年12月1日開始出現在西門子的薪餉名冊上。感謝西門子檔案處的弗蘭克·維滕多爾弗先生提供資料。

[[80]](#_80_2) 諾伊拉特成功說服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德國大使館，不把施萬伯格引渡到聯邦德國。請參閱下文。

[[81]](#_81_2) 1950年的時候，聯邦德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為500馬克。謹在此感謝德意志聯邦銀行的員工提供關于歷史匯率的有用資料。此處的計算依據為法蘭克福的股票價格。就艾希曼的工資收入而言，相關資料來自《快客雜志》1966年1月2日的克勞斯·艾希曼采訪稿。由于艾希曼的兒子在財務方面的態度傾向于保守，我們可以假設那就是他父親告訴他的金額。艾希曼在1959年向梅賽德斯—奔馳阿根廷公司提出求職申請時，表示他在“卡普里”的工資是3500比索，在艾菲弗公司則為4500比索。海因茨·施內彭（Odessa ...,A. o., 159）似乎混淆了德國馬克和美國美元。從杜勒出版社支付給德國作家們的實際金額可以看出，在此提出的匯率符合實情。參見弗里奇的信件往來。

[[82]](#_82_2) 轉引自納粹在阿根廷活動調查委員會（CEANA）的總結報告：Carlota Jackisch,Cuantificacion de Crimmales de Guerra Según Fuentes Argentinas. Informe Final, 1998, 9.

[[83]](#_83_2) 令人吃驚的是，仍然有許多目擊者表示自己曾經親眼見過艾希曼，盡管他們強調他的表現并不引人注目。見雷蒙德·萊伊2009年對ABC餐廳負責人的采訪，以及BBC在2002年對佩德羅·波比耶辛的采訪。

[[84]](#_84_2) 阿根廷《理性報》于1960年5月底發表了第一篇關于艾希曼在阿根廷生活的報道。就德國而言，《法蘭克福匯報》以此為基礎，通過其未署名的“駐布宜諾斯艾利斯記者”在1960年6月2日刊出了《艾希曼逗留在阿根廷的證據》（Frankfurter AlIgemeine,2.6.1960,“Beweise für Eichmanns Aufenthalt in Argentinien”.）。

[[85]](#_85_2) 位于布宜諾斯艾利斯圣羅莎的艾菲弗冶金廠。參見Uki Goñi, Odessa..., A. o., 376 n. 541。艾希曼在1959年向梅賽德斯—奔馳阿根廷公司求職的時候，曾提及該公司。

[[86]](#_86_2) 艾希曼在向梅賽德斯—奔馳提交的求職申請書中報出了更高的薪資金額，即4500比索。但這是用來作為討價還價的基礎，因此克勞斯·艾希曼的記憶似乎更加可信。

[[87]](#_87_2) 艾希曼在審判開始之前撰寫的15頁文字《我的存在與作為》對此做出了最清楚的描述。AllProz 6/253, 12。

[[88]](#_88_2) 迪特爾·維斯利策尼，133號牢房文件，起訴文件T/84，第12、16頁。沒有任何關于艾希曼的證人證詞對此提出反駁。

[[89]](#_89_2) Zvi Aharoni, Wilhelm Dietl, Der Jäger ..., A. o., 216 f.

[[90]](#_90_2) 阿根廷《理性報》在1960年5月底就已經找到了證人，承認艾希曼的妻兒于1952年到達之后，便有人知道里卡多·克萊門特其實就是阿道夫·艾希曼。引自：Frankfurter Allgemeine, 2.6.1960, “Beweise für Eichmanns Aufenthalt in Argentinien. Seit 1950 unter dem Namen Ricardo Clement. Erkundigungen bei seinem Arbeitgeber und seiner Familie. ”證詞的細節顯示，被引述的證人之一是奧爾斯特·卡洛斯·福爾德納。

[[91]](#_91_2) 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134.

[[92]](#_92_2) 這個故事的不同版本見Wiesenthal, Ich jagte Eichmann. Gütersloh 1961, 224ff. und Recht,nicht Rache. Frankfurt 1988, 65.寫給阿里·埃歇爾的信函保存在維森塔爾的私人文件當中，湯姆·塞格夫曾對此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因此今天我們可以確定，這個故事不是摩薩德的負責人伊塞爾·哈雷爾后來所聲稱的那樣，是由維森塔爾編造出來的。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A. o., 129ff.

[[93]](#_93_2) 西蒙·維森塔爾1954年3月30日寫給納胡姆·戈爾德曼的信函，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

[[94]](#_94_3) 維森塔爾在1952年4月18日寫給尤尼區曼（Juniczman）的信中如此表示。維森塔爾私人文件，引自Segev, Simon Wiesenthal..., A. o., 131.

[[95]](#_95_2) 關于海因茨情報處，參見開創性研究：Susanne Meinl und Dieter Krüger, “Der politische Weg von Friedrich Wilhelm Heinz,” Vierteljahrsheft für Zeitgeschichte 42, Heft 1, 1994 und“Im Mahlstrom des Kalten Krieges”, in: Wolfgang Krieger, Jürgen Weber [Hg.], Spionage für den Frieden? München 1997.關于德國情報組織之間的聯系，參見Peter F. Müller,Michael Mueller, Gegen Freund und Feind ..., A.o., insb. das Kapitel “Parallelaktion inÖsterreich”,166 ff.蓋倫早在1952年年初即已獲悉，霍特爾正在為海因茨情報處工作。參見CIA Pullach Operations Branch to Special Operations, January 9, 1952, NA, RG 263,CIA Name File Wilhelm Höttl.

[[96]](#_96_3) 1952年3月1日的XG報告，Betreff: Einrichtung einer ND-Linie für Spanien - L909。引自Müller, Mueller, Gegen Freund und Feind ..., A. 0., 195, n653.

[[97]](#_97_3) Peter Black, Ernst Kaltenbrunner: Ideological Sodier of the Third Reich (Princeton, 1984), p.xiii

[[98]](#_98_2) 霍特爾試圖將此事輕描淡寫為“邀請”（Interrogation of Dr. Wilhelm Hoettl, transcripts and notes from February 26-27, 1953 [first interrogation], April 3, 1953, April 9, 1953,NA, RG 263, CIA Name File Wilhelm Höttl）。此外亦參見Norman J. W. Goda, “The Nazi Peddler: Wilhelm Höttl and Allied Intelligence,” in U.S. Intelligence and the Nazis, ed.Richard Breitman. Washington, D.C., 2004, 265-292.

[[99]](#_99_2) CIA Report, April 3, 1953, NA, RG 263, CIA Name File Wilhelm Höttl.

[[100]](#_100_2) 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 A. o., 133.

[[101]](#_101_2) ebd.

[[102]](#_102_3) 1950年1月16日的一份CIA報告中包含了一系列傳聞。那些傳聞應該出現于維森塔爾招募霍特爾之后，其來源顯然并不可靠，只能被歸類為道聽途說。但這并不表示維森塔爾沒有為防諜隊招募霍特爾，只意味著不能把它用作確鑿的證據。NA, RG 263, CIA Name File Wilhem Höttl。感謝馬丁·海丁格爾（Martin Haidinger）交給我一份拷貝。

[[103]](#_103_2) “The elimination of HOETTL … would be to the general good of intelligence in Austria.”August 11, 1952, NA, RG 263, CIA Name File Wilhelm Höttl.

[[104]](#_104_3) April 9, 1952, NA, RG 263, CIA Name File Wilhelm Höttl.

[[105]](#_105_2) Der Spiegel, “Intermezzo in Salzburg”, 22.4.1953, S.17.

[[106]](#_106_2) 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A. o., 134.

[[107]](#_107_2) 參見威廉·霍特爾后來接受采訪的內容（巴特奧塞，1996年與1998年），以及斯坦·勞里森斯的采訪，但其內容不盡可信。那封信件直到今天仍然未能找到。感謝維也納的馬丁·海丁格爾讓我過目他對霍特爾的采訪稿，并指導我查閱奧地利國家檔案處的霍特爾遺稿，ÖStA, B1226。

[[108]](#_108_2) 霍特爾從未暗示馬斯特做出了違背其意愿的行動。鑒于馬斯特和霍特爾之間的信任關系，這種行為也不太可能出現。

[[109]](#_109_2) Spiegel, 22.4.1953.

[[110]](#_110_2) 詳細內容參見Bettina Stangneth, Quellen- und Datenhandbuch Adolf Eichmann 1906-1962, Kapitel Wilhelm Höttl.關于霍特爾的文獻直到今天仍然不盡人意，納粹時期的部分更是如此。內容最全面，但有時批判性不足的一本出版物是Thorsten J. Querg, “Wilhelm Höttl — vom Informanten zum Sturmbannführer im Sicherheitsdienst der SS”, in: Barbara Dankwortt, Thorsten Querg, Claudia Schönigh (Hrsg.), Historische Rassismusforschung.Ideologie - Täter - Opfer. Hamburg 1995, 208-230.關于他在戰后的活動，尤其是與防諜隊/中情局相關的活動，參見Norman J.W. Goda, “The Nazi Peddler. Wilhelm Höttl and Allied Intelligence”, in: Richard Breitman (Hrsg.), U. S. Intelligence and the Nazis.Washington D.C. 2004, 265-292.內容和材料最豐富的，是Martin Haidinger, Wilhelm Höttl, Agent zwischen Spionage und Selbstdarstellung, Wien.謹在此感謝作者將它郵寄給我。

[[111]](#_111_2) Goda, “The Nazi Peddler” ..., A. o.

[[112]](#_112_2) 霍特爾兜售艾希曼故事的復雜網絡，今天可以精確地一直追溯到源頭。霍特爾通過其同伙魯道夫·耶尼施獲得關于艾希曼在戰俘營內的消息，但在對外傳播的時候隱瞞了消息來源。其他用于添油加醋的材料則來自庫爾特·貝歇爾和迪特爾·維斯利策尼。霍特爾發揮自己講故事的才華，讓自己講得比原始來源更加有趣。細節過于多樣，在此無法窮盡列出，但誰要是不怕麻煩地比較原始文本并留意它們的日期，就會發現是誰盜用了誰的信息。

[[113]](#_113_3) 那位朋友是弗里德里希·施文德，偽鈔制造計劃“伯恩哈德行動”（UnternehmenBernhard）的組織者之一。施文德曾在流亡秘魯之后協助霍特爾推出他的第二本書，并在當地進行一些（有時是犯罪的）經濟活動。參見施文德1964年7月15日寫給馬德（Mader）的信件。HIS, Sammlung Schwend, Lose Mappe I 2.

[[114]](#_114_2) 由尼伯龍根出版社（Nibelungen-Verlag）1950年在林茨和維也納發行。書中充滿了離譜的八卦故事，其中有些更完全偏離了事實，只會讓人瞠目結舌。例如威廉·卡納里斯海軍上將曾用海德里希的猶太祖母來勒索他（其實根本沒那回事）；是海德里希誘使希特勒消滅猶太人，而希姆萊根本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為避免有人讀了覺得無聊，霍特爾還巧妙地穿插了妓院故事，并且影射他所討厭的那些人物的性癖好。不用說，那批罪犯當中與霍特爾臭味相投的人，也得到了熱情溢于言表的評語。以下引文參見第37頁。

[[115]](#_115_2) Walter Hagen, Die geheime Front ..., A. o, 37 f.

[[116]](#_116_3) 如果把艾希曼在阿根廷所講述的有關莉娜·海德里希——尤其是有關海因里希·米勒與海因里希·希姆萊——的故事，拿來跟霍特爾的書進行比對，相似之處就顯而易見了。由于我們確切知道艾希曼第一次閱讀霍特爾那本書的時間，所以二者的依賴關系不可能相反。

[[117]](#_117_2) 霍特爾的遺物仍有待進行真正徹底的調查。Nachlass Höttl, ÖStA B1226.

[[118]](#_118_2) HIS, Sammlung Schwend, Lose Mappe I 2.施文德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與布宜諾斯艾利斯有所來往，但是除了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之外，并未直接接觸“卡普里”或杜勒出版社的圈內人。從施文德的資料來看，他自己不太可能是告密者，因為他對艾希曼一無所知，甚至也完全不曉得有關阿爾文斯萊本的事情。

[[119]](#_119_3) Otto Skorzeny, Meine Kommandounternehmen. Wiesbaden, München 1976, 405ff.其1956年12月14日[！]的一封信件更明白表示，霍特爾是在紐倫堡那批“防諜隊猶太人”的引誘之下做出了這樣的陳述。

[[120]](#_120_2) 克勞斯·艾希曼接受《快客雜志》的采訪，1966年1月2日。

[[121]](#_121_3) 引自Der Weg, Jg. VIII, 1954, Heft 1, 28.該刊1952年第1期的第51頁，甚至針對流亡政府可被接受的程度進行了讀者問卷調查。

[[122]](#_122_2) Hans-Ulrich Rudel,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Argentinien. Buenos Aires 1954, A.o., 34.

[[123]](#_123_2) 魯德爾曾表示：“我們最強大的盟友，就是我們年輕的歲數，敵方的幾位先生們已陷入了被進球前的恐慌，因為即將舉行的選舉將是他們最后一次或者倒數第二次機會。” A. o.,246-247.

[[124]](#_124_2) 關于當時聯邦德國極右派政黨的背景資料，參見Kurt P. Tauber, Beyond the eagle and swastika. German nationalism since 1945. Middletown, Conn. 1967.此外參見Peter Dudek, Hans-Gerd Jaschke,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des Rechtsextremismus in der Bundesrepublik. Opladen 1984; Henning Hansen, Die 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 (SRP).Aufstieg und Scheitern einer rechtsextremen Partei. Düsseldorf 2007; Oliver Sowinski, Die Deutsche Reichspartei 1950-1965. Organisation und Ideologie einer rechtsradikalen Partei.Frankfurt a. M. 1998.以下關于聯絡對象的信息除非另有說明，否則都來自阿道夫·馮·塔登內容豐富的遺稿。

[[125]](#_125_2) 社會主義國家黨在1951年5月的下薩克森州議會選舉中驟然獲得了11%的選票，但很快便失去選民支持，因為開始起飛的經濟使“民族社會主義”的構想失去了說服力。等到社會主義國家黨在1952年10月被禁止的時候，它早已走上末路。

[[126]](#_126_2) 與在《路徑》一樣，薩森以他的筆名“威廉·斯勞瑟”發表了這篇文章，并諷刺地加上了許多博士頭銜：“Offener Brief an den europäischen Oberbefehlshaber General Dwight D.Eisenhower von Dr. Dr. Willem Sluyse, Obergefreiter a. D. ” In: Der Weg, 1951, Heft 2 und Nation Europa, Jg 1, 1951, Heft 7, Juli 46-56.該文并附上插圖以單行本的形式印出。

[[127]](#_127_2) 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也以德國授權版的方式，在該社出版了他的書籍。

[[128]](#_128_2) 聯邦憲法保衛局對此十分震驚，以致在第二年仍然密切關注弗里奇和魯德爾與巴西的聯系。見德國外交部政治檔案，聯邦憲法保衛局1953年12月8日致外交部的公函：BfV (i. A.Nollau) an das Auswärtige Amt, 8.12.1953, PA AA, Abt. 3, Bd. 87, 81.11/2.感謝霍爾格·梅丁。

[[129]](#_129_2) 弗里奇現身一事，甚至成為一篇專文的主題：“Der Weg des Obersten a. D. Rudel”, in Hessische Nachrichten, 3.7.1952.但我迄今仍無法找到有關此次旅行的可靠證據，即便弗里奇自己曾在寫給維爾納·博伊梅爾堡的一封信中預告了他的第一次德國之旅（參見博伊梅爾堡遺物）。不過與卡爾—海因茨·普里斯特和《國族歐洲》的合作也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實現，未必需要他親自前往德國。感謝《黑森/下薩克森廣訊報》檔案處（HNA-Archiv）的克萊因（Klein）女士協助尋找這篇文章。

[[130]](#_130_2) 霍爾格·梅丁撰寫《路徑：1947-1957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份德國移民雜志》（“Der Weg”: Eine deutsche Emigrantenzeitschrift in Buenos Aires 1947-1957, Berlin, 1997）一書時，曾采訪過迪特爾·福爾默。福爾默自己則在后來的文章和著作中讓人一窺其聯系對象，例如可參見Nation Europa, Jg. 11, 1961, Heft 11 (November), 37-42.另請參見本書第七章《余波蕩漾》。

[[131]](#_131_2) 相關資料見于阿道夫·馮·塔登的遺物，其中包括一封在1953年8月4日發送到科爾多瓦的電報，確認已獲得的財務方面的協助。參見Landesarchiv Niedersachsen, VVP 39 Nr. 45 II, Bl. 508。

[[132]](#_132_2) Frankfurter Rundschau, 9.6.1953.

[[133]](#_133_3) 阿道夫·馮·塔登遺物，Akten-Notiz “Über eine Besprechung mit Oberst Rudel in Düsseldorf am 6.12. (1952)”, Nachlass Adolf von Thadden, VVP 39 Nr. 45 II, Bl. 505-507.新右派的會議記錄出現在許多不同文件當中。

[[134]](#_134_2) 塔登對薩森錄音帶的了解，比《生活》雜志和《明星周刊》等知名的薩森客戶還要多許多。見下文。

[[135]](#_135_2) 德國駐智利大使館1953年4月18日向外交部呈遞的報告，PA AA Abt. III b 212-02,Bd. 3；駐阿根廷大使館1953年12月28日向外交部呈遞的報告，PA AA Abt. 3, Bd.74。引自Holger Meding, Flucht vor Nürnberg? ..., A. 0., 177.

[[136]](#_136_2) “German Nationalist and Neo-Nazi Activities in Argentina,” July 8, 1953, declassified on April 11, 2000 (CIA-RDP620-00856 R000 3000 30004-4).

[[137]](#_137_2) 若有誰不認為霍特爾屬于那種至死都相信“猶太世界陰謀”的納粹反猶太主義者，那么不妨參考一下他的最后一本自傳。在那本書里面幾乎找得到各種陰謀論點——例如宣稱萬湖會議記錄乃出自偽造。Wilhelm Höttl, Einsatz für das Reich. Im Auslandsgeheimdienst des Dritten Reiches. Koblenz 1997.

[[138]](#_138_2) 那個誓言已在1952年3月被列入CIA的文件記錄（來源：埃里希·克恩邁爾），NA,RG 263, CIA Name File Wilhelm Höttl。關于朗格爾博士的講法，參見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03A, 10:00（相當于薩森抄本64，但錄音帶上面有更多細節）。

[[139]](#_139_2) 根據中央情報局1952年9月29日的一份報告，海因茨與阿希姆·奧斯特（Achim Oster，西德軍事保安局前身組織的負責人——譯注）也將他們的線人霍特爾斥為消息杜撰者和騙子。霍特爾最晚在1952年的夏天就已經聲名狼藉。他雖然被正式禁止自稱為海因茨情報處在維也納的代表，卻似乎沒有遵守禁令，而引起了一些擔心。參見中情局從法蘭克福發出的報告：NA, RG 263, CIA Name File Wilhelm Höttl, declassified on March 20, 2009.

[[140]](#_140_2) 霍特爾終其一生都在書中使用反猶太主義的陳詞濫調，盡管是以一種不那么直接的方式，就像他靠著公開承認種族屠殺而過上好生活。盡管他并不是一個大屠殺的否認者，卻還是用自己的最后一本書巧妙地讓人對猶太人大屠殺的規模產生懷疑。霍特爾的目的是把對猶太人的謀殺描述成一個小團體做出的行為，質疑其規模，并認為相關文獻是為了圖利以色列而偽造出來的——而他這本書寫于1997年！Wilhelm Höttl, Einsatz für das Reich. Koblenz 1997, hier insb. 410 ff.

[[141]](#_141_3) 康拉德·阿登納本人就是其中一個代表。他關于猶太人大屠殺的言論不多，而那少數言論是如此生硬，即使考慮到他慣常的風格也顯得非常例行公事。其回憶錄、演說，以及相對較少的信函中也是如此。

[[142]](#_142_2) Autor “Guido Heimann”, Jg. 1954. Heft 7, 479-487.這本雜志直到今天都是舊書店里面的搶手貨，可惜在大多數圖書館都付之闕如。感謝漢堡當代史研究中心的卡洛·許特（Carlo Schütt）從科隆大學圖書館取得這篇文章。

[[143]](#_143_2) 第一屆聯邦議院第165次會議上的報告。波恩，1951年9月27日，第6697頁。

[[144]](#_144_2) 阿倫斯巴赫研究所（Allensbacher Institut）在1952年8月的調查結果。44%的德國人認為該協定是“多余的”；24%認為它原則上正確，但金額過高；只有11%的人明確贊同。Elisabeth Noelle, Erich Peter Neumann [Hrsg.], Jahrbuch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1947—1955. Allensbach 1956, 130f.

[[145]](#_145_2) 許多激進右翼網站罔顧艾希曼的數千頁證詞，繼續宣稱要不是以色列人急著把艾希曼殺掉的話，“真相”早就出來了。這種說法也廣泛流行于阿拉伯世界對此事的看法。另請參見本書第四章《老罪犯與新戰士》一節和第七章《余波蕩漾》。

[[146]](#_146_2) New York Times, 29.5.1960; Der Spiegel, 15.6.1960; Stern, 25.6.1960.關于《國族歐洲》的新聞綜述，參見第七期及以后各期的《探照燈》（Suchlicht）。

[[147]](#_147_2) La Razón, “Eichmann Fue un Engranaje de la Diabólica Maquinaria Nazi, Dice el Hombre que Escribió sus Memorias en Buenos Aires”, 12.12.1960.

[[148]](#_148_2) Adolf von Thadden, “Eichmanns Erinnerungen”, in: Nation Europa, 31, 1981, Heft 2, 6061.

[[149]](#_149_2) 維森塔爾在1954年3月30日寫給納胡姆·戈爾德曼的信中也曾提及此事，RG 263,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湯姆·塞格夫設法稍微闡明了這個在威森塔爾的生平中普遍不為人知的角色，并確定艾哈邁德·比吉寫信給維森塔爾的時間為1952年9月28日。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A. o., 113f.

[[150]](#_150_2) 比吉是一位著名的伊斯蘭知識分子的兒子，并且是維森塔爾的密友。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A. o., 113ff.

[[151]](#_151_3) 維森塔爾1954年3月30日致納胡姆·戈爾德曼的信函。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

[[152]](#_152_2) 這些是從1952年開始的報紙文章的標題：《柏林電訊報》（Telegraf, Berlin）的星期日增刊“伊路斯”（Illus），在1952年2月24日報道了艾希曼在特拉維夫重新現身。1952年3月22日《法蘭克福環視報》的標題為《大屠殺兇手擔任軍事顧問：迪勒汪格和艾希曼在埃及陸軍服役》（Massenmörder als Militärberater. Dirlewanger und Eichmann dienen in der ägyptischen Armee）。《猶太通論周報》在4月18日和25日宣稱“有一些黨衛隊將領在中東”，據悉其中還包括了一位“卡爾·艾希曼”。1952年11月23日的《星期日世界報》（Welt am Sonntag）更把艾希曼指稱為穆夫提的親信之一：“德國‘顧問’在開羅密謀反對波恩：前黨衛隊保安局領導人與納吉布（Nagib）和穆夫提的合謀”。

[[153]](#_153_2) 納胡姆·戈爾德曼后來承認他把那封信轉交給了中情局。中情局關于艾希曼的檔案則顯示，戈爾德曼將相關信函交給了紐約的卡爾馬諾維茨拉比（Rabbi Kalmanowitz），后者隨即試圖說服中情局（甚至美國總統）展開搜捕艾希曼的行動。NA, RG 263, CIA Name File Eichmann, Appeal to DCI by Mr. Adolph Berle and Rabbi Kalmanawitz。他與西蒙·維森塔爾的信件往來及其反應，參見Segev, Simon Wiesenthal..., A. o, 189.

[[154]](#_154_2) Simon Wiesenthal, Recht, nicht Rache Erinnerungen. Frankfurt a.M., Berlin 1988, 104.

[[155]](#_155_2) ebd., 102f.

[[156]](#_156_2) 第一屆聯邦議院第234次會議上的報告。波恩，1952年10月22日，第10736頁。

[[157]](#_157_3) 弗朗茨·阿爾弗雷德·西克斯在1938年5月16日回復維爾納·瑙曼，主旨：黨衛隊三級突擊中隊長艾希曼（Betr. SS UStf Eichmann），起訴文件T/133。亦參見1938年7月19日臭名昭著但較少被引用的人員報告：“在其負責領域內公認的專家”（起訴文件T/55-3）。有跡象表明,西克斯在戰爭結束后不久即已為蓋倫組織招募諜報人員。Mueller, Müller, Gegen Freund und Feind,... A. o.

[[158]](#_158_2) 對佩德羅·波比耶辛的采訪。Neal Bascomb, Hunting Eichmann: How a Band of Survivors and a Young Spy Agency Chased Down the World’s Most Notorious Nazi. Boston and New York, 2009.

[[159]](#_159_2) 艾希曼于第150次開庭時的證詞。1960年6月20日，德文筆錄，Y1。

[[160]](#_160_3) 斯科爾策尼于艾希曼被綁架后向美國情報部門透露了這個故事版本。NA, RG 263, CIA Name File Otto Skorzeny（亦見艾希曼的檔案）。

[[161]](#_161_2) 魯德爾在其書中自豪地提到了對這種新工作技術的運用。Hans-Ulrich Rudel,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Argentinien, 224.

[[162]](#_162_2) Heft 10, 1954, 679-685.那一章在雜志中遭到刪節，而且經過了稍微“溫和化”的處理。

[[163]](#_163_2) Willem Sluyse, Die Jünger und die Dirnen. Buenos Aires 1954.有一些重復出現的表達方式可為例證：“我對此不感興趣”（第55頁）；“既然你問我……，那么我回答你說……”（第56頁）；“我不是為了自己的緣故，現在才告訴你……”（第66頁）；“我，我這個……”（第68頁）。而且霍爾茨跟艾希曼一樣，將“摩根索計劃”和“考夫曼計劃”混為一談，參見本章《不合時宜的結束語》一節。

[[164]](#_164_2) 關于門格勒，參見本書第五章《我沒有同志》一節。

[[165]](#_165_2) Sluyse, Die Jünger und die Dirnen, pp. 55, 63, 64.

[[166]](#_166_2) 斯坦·勞里森斯聲稱，艾希曼覺得書中那個人物角色與他自己非常契合，于是想認識薩森。這種講法無法成立，因為除了勞里森斯使用資料很不嚴謹之外，薩森和艾希曼在該書出版的時候早就已經彼此認得了。

[[167]](#_167_2) Heft 8, 1954, 574f.

[[168]](#_168_3) 聯合國1947年2月一份納粹關鍵人物的通緝名單中，在有關艾希曼的部分注記道：“根據防諜隊的消息來源，據信已經自殺。”Archives of the UNWCC, UN Archives New York，引自Guy Walters, Hunting Evil. London, Toronto, 2009, 115, 598.英國戰爭罪犯小組一份同樣來自1947年2月的文件顯示，英國方面同樣相信了那種講法。沃爾特斯據此推斷，英國人因而從未積極參與搜捕艾希曼的行動。

[[169]](#_169_2) 迪特爾·維斯利策尼，133號牢房文件，起訴文件T/84。

[[170]](#_170_2) Meding, Der Weg..., A. o., 131.

[[171]](#_171_2) Der Weg, 1954, Heft 8, 575.

[[172]](#_172_2) Der Weg, 1954, Heft 8, 578.

[[173]](#_173_2) Hugo C. Backhaus [Herbert Grabert], Volk ohne Führung. Göttingen 1955.該書在1956年已有第二版，在此引用的是1955年版，第233頁。格拉貝特乃“不在職（被強迫離職）大學教師協會”的創辦人（1950年）、《德國大學教師報》出版社的負責人（1953年起），以及極右派網絡的積極分子。Martin Finkenberger, Horst Junginger [Hrsg.], Im Dienste der Lügen. Herbert Grabert [1901-1978] und seine Verlage. Aschaffenburg 2004.

[[174]](#_174_2) 有兩篇雖未注明出處，但明顯援引了《路徑》的文章宣稱，遭到納粹黨殺害的反政府人士（猶太人也包括在內）總共有30萬人。這個數字甚至還低于海曼那篇文章所稱的35.3萬人（Der Weg, Juli 1954, 485）。Die Anklage: “Die gemeinste Geschichtsfälschung”, Januar 1955 und “Beweis aus der Schweiz. Was nun, Herr Staatsanwalt? ”, 1.4.1955.二者都引自沃爾夫岡·本茨，但他顯然沒有注意到它們與杜勒出版社之間的關聯，因此無法確定沃里克·赫斯特的姓名。Wolfgang Benz, “Realitätsverweigerung als antisemitisches Prinzip.Die Leugnung des Völkermords” in Antisemitismus in Deutschland: Zur Aktualität eines Vorurteils. München 1995, 121-139, hier 130f.

[[175]](#_175_2) 對這種偽造的解構，以及從歐洲視角看待其傳播出去的方式，參見Wolfgang Benz nachzulesen. A. o.

[[176]](#_176_2) 烏多·瓦倫迪（Udo Walendy）重復了這種無稽之談，并炮制了史蒂芬·平特這個出處。“ Der Dr. Pinter-Bericht” in: Historische Tatsachen, 1990, Nr. 43, 20-23.

[[177]](#_177_2) 霍爾格·梅丁曾徒勞無功地在美國尋找一個名叫平特的律師，但不知道沃里克·赫斯特和檢察機關之間的聯系（Holger Meding, Der Weg ..., A. o., 64f.）。關于平特，參見Nation Europa, X 4.4.1960, 68.該刊引用平特1959年6月14日在天主教周刊《我們的星期日訪客》發表的言論，否認了毒氣室的存在（尤其是達豪）。雖然那其實是一封讀者投書，后來卻被引用為一篇文章。感謝《我們的星期日訪客》今日的主編約翰·諾頓（John Norton）先生提供消息，告訴我他們報社里面沒有人注意到那封信函受到了右派的歡迎。不幸的是，讀者投書的原件似乎已經不復存在了。

[[178]](#_178_2) 從艾希曼在以色列極為低調的言論可以看出他如此認為——他將薩森稱贊為“獲得阿根廷官方認可的新聞記者”，并把弗里奇描述成“受人尊敬的出版商”。審訊記錄，第397頁，第105次開庭時的證詞等等。

[[179]](#_179_2) 薩森抄本3, 4。

[[180]](#_180_2) 薩森抄本6, 2。我在許多文章中都找不到艾希曼宣稱讀到過的那個句子，但如果有人獲得了更多成功的話，我會欣然接受任何線索。

[[181]](#_181_2) Ha’aretz, 17.9.1954.

[[182]](#_182_2) 雷諾茲等人聽信了艾希曼，把那篇文章出現的時間定在20世紀40年代，并宣稱鮑爾曾經在古斯塔夫·諾斯克（Gustav Noske）的第12行動分隊（Einsatzkommando 12）以及奧托·奧倫多夫的黨衛隊特別行動隊服務。雷諾茲引用了相關報紙文章中的一個句子，“他死得至少像個男人”，出處是薩森抄本。這些構成了《生活》雜志那篇大雜燴的基礎（Quentin Reynolds, Ephraim Katz, Zwy Aldouby, Adolf Eichmann. Der Bevollmächtigte des Todes. Konstanz, Stuttgart 1961, 30 ff.）。彭道夫稱自己曾研究過這件事，卻同樣相信了艾希曼的神話，因為他顯然無法在報紙上找到相關文章。此后，這個故事一再出現于艾希曼的相關文獻中，只有西蒙·維森塔爾發現了正確的日期。

[[183]](#_183_3) 1958年3月19日聯邦情報局報告。BND-Bericht Near Eastern Connections，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

[[184]](#_184_2) 克勞斯·艾希曼接受《快客雜志》的采訪，1966年1月2日。

[[185]](#_185_2) 核發日期皆為1954年8月20日，相關細節在1960年曝光。參見德國外交部政治檔案：Aufzeichnung Raab für Staatssekretär und Minister, 27.7.1960, PA AA, Bd.55.引自Das Amt, 2010, 603, 792.

[[186]](#_186_2) 這是霍斯特·艾希曼自己的說法。1961年3月7日弗里茨·鮑爾與霍斯特·艾希曼談話的抄本，1961年3月10日通過黑森州司法部部長轉交給聯邦外交部部長。BArch B82/432.

[[187]](#_187_2) 護照核發于1954年6月23日。這不是最后一次，因為即使在斯圖加特總檢察署對大使館展開調查之后，施萬伯格仍然在1962年獲得了第二本護照。參見維爾納·容克（大使）1962年12月13日給西德外交部的報告，見Dokument 483, Akten zur Auswärtigen 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62. München 2010, 2060-61.施萬伯格和艾希曼很早就已經彼此熟識，他們甚至在同一個營區接受了軍事訓練。

[[188]](#_188_2) Nikolas Berg, Der Holocaust und die westdeutschen Historiker. Erforschung und Erinnerung. Göttingen 2003, 284-289.理事會會議于1954年6月25日舉行。

[[189]](#_189_2) Helmut Krausnick, “Zur Zahl der jüdischen Opfe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11.8.1954.

[[190]](#_190_2) 細節描述可參見Anna Porter, Kasztner’s Train: The True Story of an Unknown Hero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2007, 324f.該書在很大程度上參考了一本非正式翻譯的希伯來文作品： Yechiam Weitz, The Man Who Was Murdered Twice，以及紀錄片Mishpat Kastner, Israel Broadcasting Authority, 1994。此外亦參見Ladislaus Löb, Rezsö Kasztner.The Daring Rescue of Hungarian Jews: A Survivor’s Account. London 2008 und Tom Segev, Die siebte Million. Reinbek b. Hamburg 1995, 341-424.

[[191]](#_191_2) 這件事也讓哈列維失去了1961年艾希曼審判中的首席法官位置，不得不讓位給摩西·蘭多。

[[192]](#_192_2) 例如《時代雜志》（“On Trial”, 11.7.1955）、《紐約時報》（“Zionist Ex-Leader Accused of Perjury”, 8.7.1955 und “Israeli Case Revived”, 1.8.1955）。更大的回響出現于1957年3月3日卡斯特納遇刺身亡后，此事也成為薩森訪談會的另一個話題（見下）。

[[193]](#_193_3) 威爾弗雷德·馮·奧芬在1993年仍然稱之為一份“主要由猶太人和左翼知識分子閱讀的”報紙。Wilfred von Oven, Ein “Nazi”..., A. o., 9.

[[194]](#_194_2) 薩森抄本12, 4。

[[195]](#_195_2) 瓦倫丁·塔拉1960年1月1日寫給弗里茨·鮑爾的信件，刊載于1960年6月的奧地利《新警世報》。

[[196]](#_196_2) 調查報告和剪報都來自艾希曼的通緝檔案，當初它們是在1956年被送往法蘭克福交給弗里茨·鮑爾的。不幸的是，相關檔案現在已經消失不見，只留下少數幾頁附注和摘要。這幾頁文字現藏于維斯巴登黑森州總檔案館，維也納州刑事法院1954年11月18日致調查法官，HHStA Wiesbaden, Abt. 461, Nr. 33 531, 118 ff.謹在此感謝維斯巴登黑森州總檔案館的曼弗雷德·普爾特（Manfred Pult）先生協助尋找相關頁面，并積極找到了更多資料。依爾姆特魯德·沃亞克的兩本著作（《艾希曼回憶錄》和《弗里茨·鮑爾》），在關于這些資料的腳注中有一個打字錯誤。

[[197]](#_197_2) Eintrag “Johannes von Leers”; Die deutschsprachige Presse, Ein biographischbibliographisches Handbuch, bearbeitet von Bruno Jahn. München 2005, Band 1, 617.

[[198]](#_198_2) 讀者來信：“Johann von Leers: Eine Richtigstellung”, in Nation Europa, 11, 1961, Heft 4,68.

[[199]](#_199_2) 聯邦德國駐布宜諾斯艾利斯大使館向德國報告了萊斯離開德國一事，Botschaft der Bundesrepublik, Buenos Aires an AA, 11.8.1954 unter 212, Nr. 2116/54。外交部在1954年8月25日將此消息轉交給聯邦憲法保衛局（306212-02/5.20973/54）。

[[200]](#_200_2) 佩德羅·波比耶辛接受烏基·戈尼（1997年）、魯爾夫·范·提爾（2000年），以及紀錄片《阿道夫·艾希曼——邂逅謀殺兇手》（Begegnungen mit einem Mörder, BBC / NDR，2002年）的訪問。波比耶辛偶爾為迪特爾·門格工作，并且顯然對他的客人感到不滿。謠傳門格所收藏的紀念品和訂閱的相關極右派刊物至今仍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感謝烏基·戈尼和娜塔莎·德·溫特對此的幫助和提供信息。

[[201]](#_201_2) “在阿根廷的所有猶太人都會談到的是門格勒。”——2009年對布宜諾斯艾利斯猶太人社區領導人何塞·莫斯科維茨的采訪，摘錄自Eichmanns Ende, NDR / SWR 2010.

[[202]](#_202_2) 威廉·薩森在《追捕門格勒博士》（The Hunt for Dr. Mengele, Granada Television,1978）中接受訪問。關于薩森針對門格勒的“研究”所做出的陳述，可參見他的專訪：Edicion Plus, Telefe Buenos Aires, 1991）。

[[203]](#_203_2) Schneppen, Odessa..., A. o., 139.

[[204]](#_204_2) ebd., 153.

[[205]](#_205_2) ebd., 136.

[[206]](#_206_3) Dokumentiert in I. S. Kulcsár, Shoshanna Kulcsár, Lipot Szondi, “Adolf Eichmann and the Third Reich”, in: Ralph Slovenko (Hrsg.), Crime, Law and Corrections. Springfield (Illinois) 1966, 16-32, hier: 28.

[[207]](#_207_2) Quentin Reynolds, Ephraim Katz, Zwy Aldouby, Adolf Eichmann ..., A. o., 197.

[[208]](#_208_2) Argentinisches Tageblatt, 17.12.1955, “Peron als Beschützer Rudels und der braunen Internationalen”.

[[209]](#_209_2) 諾貝特·弗賴（Norbert Frei）的研究小組最近在外交部的檔案中發現了一篇來自《阿根廷日報》的文章（1955年12月17日）。Eckart Conze, Norbert Frei, Peter Hayes,Moshe Zimmermann,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München 2010, 596.

[[210]](#_210_2) 1955年12月19日的《阿根廷日報》刊登了一篇由退役海軍少校赫爾曼·布倫瑞克（Hermann Brunswig）撰寫的評論，《庇隆納粹主義》（“Peronazismus”）。其主要目的是保護德國移民免受集體指控，因此文章帶著清醒的現實主義意味，常常傾向于粉飾太平。

[[211]](#_211_2) Zvi Aharoni, Wilhelm Dietl, Der Jäger..., A. o., 107.艾希曼稱自己從1955年3月1日開始在農場工作，但由于這個日期出現在求職申請書上，其準確性無法證實。Personalbogen Mercedes Benz Argentina, 20.3.1959, Faks. Schneppen, Odessa..., A. o., 160.

[[212]](#_212_2) 維斯利策尼，133號牢房文件，起訴文件T/84，第16頁。

[[213]](#_213_3) 弗里茨·卡恩《原子》一書（蘇黎世，1948年）扉頁上的艾希曼手寫札記。引自Stern,9.7.1960.艾希曼在1960年6月15日接受審訊的時候證實了它的真實性。

[[214]](#_214_3) 向梅賽德斯—奔馳阿根廷公司提出的求職申請，復印本參見Schneppen, Odessa ..., A. o.

[[215]](#_215_2) Meine Flucht 25.

[[216]](#_216_2) 艾希曼對莉娜·海德里希的評價，參見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29:05（內容與64號錄音帶相同，但抄本有刪節）。

[[217]](#_217_2) 維也納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維也納移民基金”的資產管理部門在1939年5月8日收購了上奧地利林茨附近位于多普爾（米爾山谷）的一家造紙廠。內政與文化部的檔案注記為：“該地產無購買必要”。AdR, Ministry for Interior and Cultural Affairs, Dept.II, Gr. 4, Office: Foundations and Funds, Emergency Matters, Vienna 1, Ballhausplatz 2,Zi. II / 4-127.517, 1939. Object Emigration Fund (AWF), Acquisition of Property, May 11,1939; attachments: purchase contract between M. Mösenbacher and the AWF, May 8, 1939:Gudrun Rohrbach, file no. R76/39. Gabriele Anderl, Die “Umschulungslager” Doppl und Sandhof der Wiener 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 Beitrag www.doew.at (2003).

[[218]](#_218_2) 一名以色列特工在戰后聽說了這個傳聞，20世紀90年代記者們在倫貝格（Lemberg）進行調查時仍然能夠聽到這種說法。所涉及的對象是瑪麗亞（“米齊”） ·鮑爾，魏斯旅館的經理。那家小旅館是艾希曼手下聚會的地點，后來在他們的逃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Manus Diamant, Geheimauftrag ..., A.o., 209ff. Georg M. Haffner, Esther Shapira, Die Akte Alois Brunner, Warum einer der größten Naziverbrecher noch immer auf freiem Fußist. Hamburg 2002, 73 ff.

[[219]](#_219_2) 薩森抄本59, 3。艾希曼只提到了復活節的旅行，但薇拉·艾希曼那一年剛好在復活節過生日。

[[220]](#_220_2) 茲維·阿哈羅尼令人信服地根據自己的行動日志反駁了這一點。當天艾希曼根本不在家里，按照其子的說法，他已前往圖庫曼拜訪友人。

[[221]](#_221_2) 這些描述來自該部門的兩名秘書（Interviews Rosemarie Godlewski, Emilie Finnegan,NDR/BBC 2002），他的情婦瑪麗亞·莫森巴赫爾、米齊·鮑爾和瑪吉特·庫切拉（Manus Diamant, Geheimauftrag ..., A. o., 210-228），以及艾希曼在阿爾騰薩爾茨科特的女性友人（Interviews Stern Juni/Juli 1960, NDR/BBC 2002）。

[[222]](#_222_2) 艾希曼的昵稱出現在第一防諜隊的報告中，而且從上下文可以看出，該信息來自維斯利策尼和霍特爾。Arrest Report Interrogation Wisliceny und CIC Report Eichmann, NA,RG 263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 Höß, Kommandant von Auschwitz, A. o., 336.

[[223]](#_223_3) 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02 A,開始于8:25（阿根廷錄音帶編號68）。

[[224]](#_224_2) David Cesarani, Adolf Eichmann, A.o., 267.

[[225]](#_225_3) 迪特爾·維斯利策尼，133號牢房文件，起訴文件T/84，第13頁。

[[226]](#_226_2) 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9C, 27:30-29:30。謄寫稿刪除了這一長串話中經常出現的結結巴巴部分。

[[227]](#_227_2) 這方面的例子可參見薩森抄本，17號錄音帶（集中營內附設的慰安所）以及67號錄音帶（聯邦檔案館編號05B，開始于20:00）等等。

[[228]](#_228_3) 在以色列，艾希曼甚至宣布了他的世界和平計劃：婦女必須掌握權力。Götzen, 199 f.但艾希曼并沒有提到他其實認為世界和平是“非雅利安的”（unarisch）。

[[229]](#_229_2) 引自艾希曼在以色列撰寫的15頁的《我的存在與作為》（第10頁），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AllProz 6/253。

[[230]](#_230_3) 隆格里希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這種做法其實與希姆萊的理論沒有多少關系。Peter Longerich, Heinrich Himmler. Biographie. München 2008, 382ff.

[[231]](#_231_2) 薩森抄本10, 7。庫爾特·貝歇爾曾向艾希曼展示過一條貴重的珠寶項鏈，而那是他奉希姆萊之命在匈牙利勒索過來的。艾希曼還親眼看見貝歇爾把那件贓物交給希姆萊。

[[232]](#_232_3) 希姆萊1936年4月和1937年6月的備忘錄，引自Longerich, Heinrich Himmler, A. o.,382f.

[[233]](#_233_2) Kulcsár, Kulcsár und Szondi, “Adolf Eichmann and the Third Reicht” ..., A. o., 30f.

[[234]](#_234_2) ebd., 17.有三個人參與了心理評估：庫爾恰爾親自進行訪談和測試，他的妻子（有一次是利波特·松迪[Lipot Szondi]）則對此做出評估。多年后對個別測試結果采用盲目試驗做了進一步的分析，所得出的結果與庫爾恰爾并沒有很大差異。在專業圈子之外，此事迄今不為人所知。

[[235]](#_235_2)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München 1964, 77，以及阿夫納·萊斯1961年2月7日的筆記，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當代史檔案館，ETH Zürich - AfZ, NL Less, 4.2.3.2。

[[236]](#_236_2) 這方面的例子是早期發行的一些小冊子，諸如：Dewey W. Linze, The Trial of Adolf Eichmann. Los Angeles, Calif., 1961；Comer Clarke, The Savage Truth: Eichmann,the Brutal Story of Hitler’s Beast. London, 1960（以及各種翻譯本）；John Donovan,Eichmann.Man of Slaughter. New York 1960。最極端的例子來自電影界：Eichmann, dir.Robert W. Young (UK/Hungary, 2007)。

[[237]](#_237_2) 薩森抄本39, 3。

[[238]](#_238_2) 其小說《門徒與婊子》的第六章以表面上虛構的方式記述了薩森逃亡至阿根廷的經過。此處引自第168頁。

[[239]](#_239_2) 大衛·切薩拉尼等人所稱的1953年，其實是印刷錯誤。1962年5月29日艾希曼的親子關系聲明和其他文件皆可證明此事。BArch Koblenz AllProz 6/237.

[[240]](#_240_2) Meine Flucht, 26.

[[241]](#_241_2) 艾希曼于被處決前不久接受法國《巴黎競賽畫報》的書面采訪，在回答他對自己家人的憂慮時無意中透露了這一點。參見《巴黎競賽畫報》1962年5月的書面問題及艾希曼的答復，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2, 20。該雜志于艾希曼被處決后立即刊出了部分采訪內容。

[[242]](#_242_2) 有些資料稱那個兒子登記戶口時的姓氏為艾希曼，此說并不正確。

[[243]](#_243_2) Meine Flucht, 26.

[[244]](#_244_2) Fragebogen von Paris Match, A. o.

[[245]](#_245_2) Willem Sluyse（= Willem Sassen）, “Brief an einen verzweifelten Freund, Weihnachten 1955”, in: Der Weg, Heft l, 1956, 12.

[[246]](#_246_2) Meine Flucht, 26.

[[247]](#_247_2) Hans-Ulrich Rudel,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Argentinien ... A.o., 259 und 157.

[[248]](#_248_2) Theodor Heuss, “Der deutsche Weg - Rückfall und Fortschritt”. Ansprache zur Jubiläumsfeier der Evangelischen Akademie, Bad Boll, Druckfassung in: Das Parlament, 19.10.1955 (Nr.42), 9-10, hier 9.

[[249]](#_249_2) 薩森把1945-1955年稱為“瘋狂的過渡時期”（Interregnum Furiosum），見Der Weg,1955, 295-299, hier 299。

[[250]](#_250_2) Willem Sluyse (= Willem Sassen), “Brief an einen verzweifelten Freund, Weihnachten 1955”, in: Der Weg, Heft 1, 1956, 14.

[[251]](#_251_2) Ewout van der Knaap and Nitzan Lebovic, “Nacht und Nebel”: Gedächtnis des Holocaust und internationale Wirkungsgeschichte. Göttingen 2008.

[[252]](#_252_2) 對奧托·布羅伊蒂加姆的第一次起訴在1950年就已經停止。盡管有文件顯示，布羅伊蒂加姆不僅詳細了解謀殺計劃，而且還曾經實際參與制訂，但停職處分也在1958年隨著他的重新聘用而結束。紐倫堡審判期間已經出示過一份文件，顯示他曾與艾希曼進行會談（IMT 3319-PS, Ribbentrop material collection，與起訴文件T/1003一致）。他甚至很可能親自主持了萬湖會議的后續會議。然而布羅伊蒂加姆卻在1959年8月獲頒聯邦大十字勛章。Michael Schwab-Trapp, Konflikt, Kultur und Interpretation. Eine Diskursanalyse des öffentlichen Umgangs mit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Opladen 1996[=Studien zur Sozialwissenschaft 168]）.

[[253]](#_253_2) Der Weg, Heft 7/8, 1956, 240.

[[254]](#_254_2) 全部按順序引用自1956年的《路徑》（Der Weg, Jahrgang 1956: 480, 480, 240, 242, 357,610）。

[[255]](#_255_2) Der Weg, 1956, 477, 610.

[[256]](#_256_3) Der Weg, 1956, 608.

[[257]](#_257_2) Der Weg, 1956, 477.

[[258]](#_258_2) Paul Beneke (Ps.), “Die Rolle der ‘Gestapo’ ”, in: Der Weg, Jahrgang 1956, Teil 1: Heft 7/8, 353-358; Teil 2: Heft 9, 476-480.

[[259]](#_259_2) 這幾行文字的作者本身就出身但澤。

[[260]](#_260_2) 我無法完全排除萊因哈德·科普斯（筆名胡安·馬勒）的嫌疑。他出生在漢堡附近，由于漢薩同盟城市的背景，使他也與保羅·貝內克產生了關聯。但整體而論，那篇文章即使對胡安·馬勒而言也過于學術化。文中有許多注釋，這在《路徑》中是相當罕見的。

[[261]](#_261_2) Meine Memoiren (1960), 108f.《路徑》的那篇文章徹底攻擊了艾希曼認為正確的一切事物，因此它不可能是與艾希曼合寫的。但除了別的內幕知識之外，其內容可能也立基于和艾希曼的討論。

[[262]](#_262_2) 1956年11月30日德意志國家黨的報告，參見柏林納粹政權受害者協會（BNV-Berlin）檔案。感謝雷費爾德女士（Frau Rehfeld）協助研究這份沒有包含在阿道夫·馮·塔登遺物（Staatsarchiv Hannover, Magazin Pattensen, VVP 39）當中的文件。

[[263]](#_263_2) 最詳細的講法參見昔日納粹青年領袖阿爾弗雷德·雅舍爾（Alfred Jarschel）化名撰寫的：Werner Brockdorff, Flucht vor Nürnberg: Pläne und Organisation der Fluchtwege der NSProminenz im “Römischen Weg”. München-Wels 1969, inbs. Kapitel XVII.關于更早期的各種狂想，請參閱本章其余部分。

[[264]](#_264_2) Johann von Leers, Leserbrief in Nation Europa, A. o.

[[265]](#_265_2) Willem Sluyse, “Müllkutscher her! Eine Bilanz unserer Atomzeit”, Der Weg, 1956 Heft 11/12, 673-676.

[[266]](#_266_2) Der Weg, 1954, Heft 7, 487.

[[267]](#_267_2) 感謝康斯坦茨市檔案館提供資料。薩森在康斯坦茨的紹滕街61號（Schottenstraße 61）一直待到1959年2月4日，然后才搬至慕尼黑的霍恩斯陶芬街21號（Hohenstaufenstraße 21）。目前仍不清楚薩森為何會選擇康斯坦茨。但該市當年重新調整了戶口登記制度，這種重大變化當然有利于想要隱瞞過去的人。這也是艾希曼在逃亡期間為何選擇布雷斯勞作為出生地的原因。

[[268]](#_268_2) 反猶太主義并不總是像在阿根廷那般暢行無阻，但這第一批以迫害猶太人為主題的著作都面臨著此類責難。難得有任何一篇書評不強調作者是猶太人。

[[269]](#_269_2) Wolf Sievers (Ps.), “Die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 in: Der Weg, 1957, Heft 3, 235-242.以下引文皆來自該文。

[[270]](#_270_2) ebd. 239：“參加（萬湖會議）的人員包括：海德里希、蓋世太保米勒、艾希曼、薛恩加特（Schöngarth）、蓋世太保朗格、外交部的路德（Luther）……”。《路徑》1957年之前發表的所有文章中只提到了阿道夫·艾希曼兩次，另一次就是所謂他自殺的消息。后來他只再出現過一次（在一封“讀者來信”中，見下）。

[[271]](#_271_3) Hans-Ulrich Rudel,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Argentinien ..., A. o., 260.

[[272]](#_272_2) La Razón, 12.12.1960, “Eichmann Fue un Engranaje de la Diabolica Maquinaria Nazi ... ”, A. o.

[[273]](#_273_3) 薩森的筆名迄今只發現了部分。我們所知道的有威廉·斯勞瑟、史蒂文·維爾（Steven Wiel），以及薩森在《明星周刊》等高級刊物所使用的威廉·S.范·埃爾斯洛。此外偶爾還會使用安德烈·德梅特（Andre Desmedt）和胡安·里奧（Juan del Rio），不過薩森恐怕在《路徑》以及其他一些德國雜志使用了更多不同的筆名，見下文薩森在訪談中所述。

# 第四章 所謂的薩森訪談

薩森先生是一個為了寫下我的人生故事，

經常拿著錄音帶到我家串門的記者。

我允許他在我一命嗚呼或者落入以色列人的手中之后，

對外公開這些訪談內容。

但正如我所看到的，如今他發表了一些東西，

讓人以為那是我的回憶錄。

在美國發表的一切都是純粹的謊言。

只有瘋子才會相信那是我寫的。

——艾希曼，《我的逃亡》，1961年3月

針對《生活》雜志發表的專文寫于以色列

多年以來，威廉·薩森被認為立下了汗馬功勞，因為他尋獲了大屠殺劊子手艾希曼并說服他開口講話。除了新聞記者對同行天然的同情心理之外，還有另一個事實有助于解釋為何這種論調會如此成功：那名來自荷蘭的前黨衛隊戰地記者深具個人魅力。表面上看，薩森結合了“明星作者”、“冒險家”和“生活達人”三種角色，恰好是完成此項壯舉的不二人選。他自己也竭盡全力維系此一形象。但其實，他根本不必特別迷人、善解人意或者令人信服，就足以讓阿道夫·艾希曼暢所欲言。讓艾希曼住口反而才是更大的問題，因為當那名前任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真的打開話匣子之后，就幾乎沒有辦法讓他停下來。直到今天，這仍然令人匪夷所思，因為在我們的印象當中，潛逃者必定會盡可能不引人注目，小心翼翼地緘口不言。但這并不適用于國家社會主義黨人在阿根廷所過的生活。相反，緘默和隱秘的迷思本身就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偽裝手段，在艾希曼被綁架之后成為一堵共同的圍墻，讓那批人基于不同的理由集體保持緘默。聲稱自己不認識那名正在接受審判的大屠殺兇手，這樣的說法難道真會有人相信嗎？然而時值一位昔日同儕剛于返家途中遭以色列人綁架之際，有誰愿意承認自己不久前還跟那位同僚舉杯對酌，并與他共同撰寫一本有關國家社會主義的書呢？畢竟他們都希望盡可能避免在回家的路上陷入同樣遭遇。于是最穩當的做法莫過于把艾希曼描繪成一個隱居者，從不開口說話，但在薩森面前除外，畢竟那個人曾經當過記者，正好有必要跟“那一類”對象攀談。但只要看一看艾希曼在以色列收到的諸多來自阿根廷的花束和祝福，他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的印象馬上就會改觀。[[1]](#_1_9)

在阿根廷的時候，艾希曼不吐不快的沖動從一開始就蓋過了他的小心謹慎。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只要遇到信得過的人，他就絕對不會隱瞞自己是誰。不過無論是在社交場合的應景客套話，還是共同工作結束后的聚餐閑聊，都無法與埃伯哈德·弗里奇和威廉·薩森如今計劃做的事情相提并論。他們想要系統地討論有關大屠殺的歷史書籍和當時正在進行的討論，并鄭重其事地做著籌備。艾希曼自己最晚在1956年年底就開始打算寫書，希望能交由杜勒出版社公開發行。我們因而可以推斷，此前他們已經進行過初步討論，不只是為了草擬工作計劃、思考其他哪些人也應參與項目，同時更著眼于財務方面的因素。威廉·薩森、埃伯哈德·弗里奇，以及阿道夫·艾希曼后來都分別承認，他們在那個時候已經簽訂了合約，由三人平分共同工作所得。[[2]](#_2_10)盡管他們是因為“血統的夢想”團結在一起的，但馬上賺大錢的夢想仍然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生活總是有著“投機碰運氣”的一面。

正式錄音最早在1957年4月開始，在此之前薩森家中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時年十歲左右的薩斯基雅·薩森[[3]](#_3_9)看見有人在客廳的天花板上鉆孔，并在里面藏了一些麥克風。薩森的女兒于2005年回憶，當時屋內能感覺到緊繃的氣氛和緊張的忙碌。等到艾希曼抵達，并跟她的父親一起消失在客廳里，便有一名陌生男子躲進二人上方的閣樓全程偷聽。薩斯基雅·薩森確信當天的談話對象就是阿道夫·艾希曼，而且她只在那天見過閣樓里面的那個人，因為這顯然是一次性的行動。

孩童的回憶往往是不很可靠的消息來源，因為人在那個年紀難免喜歡“探秘”，或許那只是鋪設電線安裝電燈的簡單動作。不過在此還有第二個人的回憶可供參照。薩森全家的舊識，一位在愛爾蘭即已結交的女性友人指出：薩森的妻子密普·薩森曾經向她抱怨，自己“被接了電線”（verkabelt）。[[4]](#_4_10)只可惜我們并不曉得，她對電線的抱怨是否果真與天花板上的麥克風有所關聯。反正連續好幾個月下來，密普·薩森只能任由丈夫在每個周末霸占客廳、祭出他的錄音機，并且把許多支麥克風架設得像是絆腳索一般，以便花上好幾個鐘頭跟老同志們大擺龍門陣。若不敲門便無法進入自家客廳，而且務必要讓孩子們保持安靜[[5]](#_5_10)，即使沒有人在天花板上鉆孔，這種“被接了電線”的待遇也讓人很難不發火。但話說回來，薩斯基雅·薩森的回憶難免讓人懷疑，威廉·薩森的確有可能在正式開始錄音之前的某個日子，在艾希曼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讓別人躲在他家的閣樓內偷聽。

薩斯基雅·薩森從來沒有忘記那次詭異的竊聽行動，后來她努力設法為自己觀察到的蛛絲馬跡尋找解釋。她所能想到的最合理的可能，涉及她父親當時交往熱絡的一位熟人：曾與薩森共事過的《時代》/《生活》雜志駐拉丁美洲特派記者菲爾·佩恩（Phil Payne）。甚至連孩子們都記得“《時代》/《生活》的佩恩先生”。盡管躲在閣樓里偷聽的那個人未必是佩恩自己[[6]](#_6_10)，可是對薩森的女兒來說，只有這樣才能夠解釋她所觀察到的現象。她對此的說明是，薩森在正式開始錄音之前已經準備和《時代》/《生活》簽訂合同，因此必須提出證據，證明擬采訪對象的確就是前任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阿道夫·艾希曼。這種說法看似也呼應了法國《快報》（L’Express）雜志的一篇專文（但其內容泰半出自想象）。[[7]](#_7_10)該文自稱引述薩森的講法，說他在艾希曼被綁架之前“四年”，就試圖把采訪內容推銷給《時代》/《生活》，結果未能成功。但薩森為這篇報道大動肝火，相當令人信服地否認自己曾講過那樣的話。[[8]](#_8_9)《快報》文章中提及的日期確實大有問題，因為采訪開始的要晚得多，因此在《快報》所聲稱的時間，采訪還沒有完成，甚至還沒有開始。所以讓我們保持謹慎，先從確實無誤的地方講起。

菲爾·佩恩確實是《時代》/《生活》雜志的南美洲特派記者。他在庇隆被推翻前不久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并在不遠途出外采訪的時候定居當地，直到1958年搬去羅馬待了幾年。威廉·薩森則向《時代》/《生活》提供研究材料，并普遍被視為阿根廷爆發政變之后，1955年11月《生活》雜志一篇關于庇隆和佩德羅·阿蘭布魯（Pedro Aramburu）的長篇文章的主要消息來源。[[9]](#_9_9)不過在1960年關于艾希曼的長篇報道發表之前，他從未被指名道姓地提到過。佩恩應該是薩森在《時代》/《生活》的聯系人，因此亦為薩森家里受歡迎的訪客。所以如果薩森的確在1957年4月之前就想把艾希曼的故事或者猶太人大屠殺的內幕出售給那家美國雜志的話，他一定會向菲爾·佩恩透露此事。而佩恩則必須說服自己的老板，薩森的消息值得投資。這么一來，薩斯基雅·薩森記憶深刻的那個竊聽行動就成了很好的保障措施，既能夠查證薩森聯絡人的真實性，又不至于驚動艾希曼。從薩森的角度來看，他更可以防止新聞界潛在的競爭對手與他最重要的消息來源直接接觸。[[10]](#_10_10)就如此敏感的故事而言，這未嘗不是明智的安全保護手段。但盡管如此，當時佩恩對艾希曼的故事意興闌珊也不無可能，因為他自己對探索過去并沒有很大興趣。菲爾·佩恩擅長報道最熱門和高風險的事件：他報道了哥倫比亞的內戰和尼加拉瓜的軍火交易，曾經前往哥斯達黎加尋訪游擊隊，并且探索了拉丁美洲從危地馬拉直到玻利維亞的幾乎每一個動亂地區。他的興趣在宏大的事件，像是革命家和大起大落的國家領導人的故事，例如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Jacobo Arbenz Guzmán）和胡安·多明戈·庇隆。1957年，佩恩結束了自己在南美洲的工作，隨后幾年在羅馬撰稿。1961年的時候，他將親自前往耶路撒冷報道對那名“最終解決方案”組織者的審判案。[[11]](#_11_8)佩恩這樣的人之所以重視薩森提供的消息，原因并不在于其怪誕的想法和他那些令人難以忍受的朋友，而是看重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內幕資訊，以及他與仍在西班牙流亡的前總統庇隆之間一直維持的密切關系。老納粹的故事在佩恩眼中反而沒有這樣的吸引力，即便“艾希曼”這個名字當時已隨著一篇關于魯道夫·卡斯特納的文章進入了《時代》雜志。[[12]](#_12_8)如果佩恩果真在1956年年底、1957年年初拒絕了艾希曼的故事，那么他最晚在報道艾希曼審判的時候想必就會為之懊悔不已。

盡管如此，這個故事仍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首先產生的疑問是，為什么要為了艾希曼如此大費周章。艾希曼沒有絲毫不情愿地接受了薩森和弗里奇的提議，甚至完全沒有擔心泄露自己的身份。相反，剛開始錄音的時候，一次有人問艾希曼是否曾經想過，“該如何讓人們相信這本書的作者真的就是那位艾希曼”。他回答說：“可從以下幾方面著眼。材料本身無可辯駁，因為人們要么知道相關細節，要么不知道。如果那些先生們有任何疑問，不妨把成堆成沓的現成文件檔案拿來比較。萬一有必要的話，我還能夠親自……交出一張那個時期的照片，雖然我并不想這么做。”[[13]](#_13_8)我們若回想一下，艾希曼及其家人多年來如何煞費苦心地不讓任何一張他的照片落入追捕者手中，便不難看出艾希曼面對新朋友時的開放姿態有多么不同凡響。后來他甚至在送給威廉·薩森的一張照片上面簽名寫道：“阿道夫·艾希曼。退役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不管弗里奇、薩森和艾希曼計劃對外公開發行什么內容，他們顯然是一致行動的，而無論是筆名還是其他任何掩護艾希曼的措施都不在計劃當中。除此之外，我們甚至無法確定，麥克風是否當真是為艾希曼裝設的。如果考慮到薩森還邀請了哪些人來參加訪談會，便無法排除薩森與艾希曼一同測試竊聽設備的可能性，畢竟他們必須預先做好準備，以防有人拒絕公開錄音。[[14]](#_14_8)

看見有人在墻上鉆洞拉電線，不只小孩子會覺得其中的巨大秘密讓人難以抗拒——因為平淡無奇的解釋顯然無法說明，為什么要有人躲在閣樓偷聽。我們甚至可以想象，那次竊聽莫非根本沒有財務方面的背景，反而是秘密情報單位的行動？關鍵的問題因而在于，當時是否有人確實對阿道夫·艾希曼感興趣。在美國，潛逃的國家社會黨人早就不被注意，更何況還有人已經被中央情報局招募了去。[[15]](#_15_8)在以色列，該國年輕的情報部門正忙于應付1956年10月爆發的蘇伊士運河危機，顧不上追蹤維森塔爾提供的線索。

那么在德國呢？黑森聯邦州的總檢察長弗里茨·鮑爾剛剛開始一項既困難又不受歡迎的任務：著手起訴納粹罪犯。他已經請維也納方面寄來了阿道夫·艾希曼的緝捕文件。[[16]](#_16_8)1956年11月24日，法蘭克福地方法院終于向“目前所在地不詳的阿道夫·艾希曼”發出逮捕令。這項追捕行動屬于“克魯邁等人案”當中的一環。根據逮捕令的內容，艾希曼涉嫌“在1938-1945年間，出于卑劣的動機，在許多歐洲國家陰險、殘忍地殺害人命，受害人數無法精確確定。艾希曼曾經擔任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和帝國保安總局IV B4部門的主管，負責在德國以及戰爭期間遭德國占領的國家‘重新安置猶太人’。在所謂‘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的框架下，艾希曼曾下令將數以百萬計的猶太教社群成員運往集中營，用毒氣消滅”[[17]](#_17_8)。于是從1957年起，艾希曼的名字也出現在德國的通緝名單上。然而弗里茨·鮑爾的調查工作在德國根本不受歡迎，以致直到今天仍無證據顯示其他機構曾經積極配合追捕艾希曼。聯邦刑事調查局（Bundeskriminalamt, BKA）甚至指出，出于原則上的考量，通過國際刑警組織來搜捕艾希曼是不可能的事情。[[18]](#_18_8)鮑爾自己起初忙于追捕下落已知的那些涉案人，例如艾希曼昔日在匈牙利的副手赫爾曼·克魯邁。可是在一個有著如此濃厚納粹褐色背景的司法體系內，工作開展得極為困難。克魯邁總算在1957年5月1日被逮捕。如我們將會看到，阿根廷的那些人也在密切關注這個事件。但即使到了這個地步，也沒有立即展開訴訟程序。那時鮑爾顯然還無法在阿根廷采取任何行動。但可以確定的是，與鮑爾的調查行動毫無關聯的聯邦憲法保衛局，已經開始密切注意魯德爾和弗里奇。[[19]](#_19_8)稍后會對此做出詳細說明。

至于薩森屋頂下的密探是否為相關信息的來源，那就純粹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了。總之，像薩森這樣一個詛咒“殘余德國”（Rumpfdeutschland）及其各種機構，并且試圖摧毀之的人，竟然會允許聯邦德國那個部門的人進入他家閣樓，看起來是極為不可能的事。他自己恐怕也將非常得不償失。換個角度來看，假如德國情報部門的人員想要知道那些老同志在薩森的客廳里干了些什么勾當，就一定會自己想辦法混到他們中間去。這應該不是特別困難的事，至少比大費周章地在薩森那里竊聽要簡單多了。

那么我們到底該如何看待有關薩森家中竊聽事件的童年記憶呢？以我們今天所知的來看，那的確最有可能是一個新聞行動，因為菲爾·佩恩至少于1955-1957年之間多次前往阿根廷，而且有證據表明1957年5月10日當天他就在布宜諾斯艾利斯。[[20]](#_20_8)不過在發現更多相關文件或目擊證人，或者至少是公開《時代》/《生活》的檔案記錄之前，那也依然只是猜測而已。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與艾希曼在家中進行小組討論的準備工作，讓孩子們感到非常刺激和神秘。薩森自己從未進行過如此大規模的計劃，所以他想必和其他參與者一樣興奮不已。假如薩森家中果真有過竊聽行動的話，那一定經過了他的首肯。可是這么做的目的何在，以及究竟是誰執行了該項任務，今天已經無從查證。[[21]](#_21_8)艾希曼對自己如何被認出的解釋很清楚地顯示，從一開始就有一些并非杜勒出版社圈內核心分子的人參與那項共同計劃。不過艾希曼逐漸才發現薩森對他并不總是坦誠相待。無論閣樓上面有沒有人躲著偷聽，薩森都可能在他不明就里的情況下采取行動。而艾希曼卻熱情洋溢地接受了這項新任務，全然忽略了防范措施。

## 第一節 作者艾希曼

封面和書衣應該是單色的，例如珍珠或鴿子那種灰色，

用清晰的線條和美麗的字體。

我當然不想使用筆名，因為那有違事情的本質。

——艾希曼，1961年[[22]](#_22_8)

艾希曼究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產生了把自己的想法寫下來的念頭，現在已經無法考證。他自己后來表示，早在戰爭剛結束不久——顯然是在阿爾騰薩爾茨科特的時候——他就已經做出最初的嘗試，成文據說結合了謀殺統計數字和組織結構描述。這份文件隨即變得對他太過危險，于是艾希曼把它燒掉了。今天我們或許覺得十分奇怪，艾希曼那樣的人怎么可能會在戰敗后不久，在自己還不怎么安全的時候，就已經感到務必要寫下自己的想法。然而這種可能性的確無法排除。作為對可能面臨的審判的準備，在紙上先練習一下絕對不是個餿主意。總之，即使艾希曼果真在德國北部寫了手稿，那也并非他第一次這樣做。

今天我們有成千上萬頁艾希曼的言論可供參考和引用，這不僅要感謝各種審判記錄，更是由于艾希曼和許多納粹黨人一樣，有一個惹人注意的嗜好：他在人生的任何階段都著迷于寫作，并且喜歡扮演作家的角色。一想到有出書的可能，艾希曼就興奮得不能自已。1961年，甚至當他剛在以色列接受完一場災難性的審判，還在等待判決的時候，就已經迫不及待地談論起封面的顏色、可能的審稿人、字體和版式設計，以及贈送的樣書，盡管當時根本不確定是否真能出版這樣的一本書。[[23]](#_23_8)至今很少有人嘗試直接研讀艾希曼撰寫的文字。一方面，艾希曼孜孜不倦筆耕不輟的行為被視為他渴望為自己辯解的表現。另一方面，哈里·穆里施（Harry Mulisch）和漢娜·阿倫特等作者則強調，這是艾希曼的矯情賣弄和故作姿態。對于正好也在施展自己寫作才華的人來說，艾希曼自視為“我們中一員”的挑釁態度未免令人發指。必須眼睜睜看著艾希曼擺出史學泰斗姿態的歷史學家們，也有同樣不愉快的感受。于是作家和史學家都有強烈的沖動，讓艾希曼寫作的形象顯得滑稽可笑，或者將之貶低為小資產階級希望當作家的白日夢。

納粹黨人對公開焚毀堆積成山的圖書的熱衷，轉移了我們的注意力。其實國家社會主義非常重視——或許過于重視——書面文字的力量。他們之所以燒書，正在于他們認為書籍能夠產生巨大的影響力。換句話說，因為他們對書籍心生畏懼。對詮釋主導權的害怕，就是國家社會主義者的主要行為動機之一。20世紀初期的人們早就對圖書這個大眾媒介有了豐富的經驗，足以明白歷史不只是發生而已，更是為后世后代撰寫出來的。這吻合了希特勒侵略性的基調，“創造性”總是以對現有創造物的抗爭和破壞為前導。

納粹黨人改寫歷史的意圖不僅著眼于行動，從一開始就更是一個文化與文學的項目：他們將文化產業詆毀為“被猶太化”（verjudet），把整個學術分支貶斥為“被過度異化”（überfremdet）。于是書籍被視為敵人——尤其是猶太人——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把書籍挑出來加以焚毀，正如后來用同樣的方式對待人類一般，不過是第一步而已。第二步則是維護和培育自己的種族，以及建立自己的文化和科學。于是納粹在科學和藝術方面都需要自己的書籍，因為他們相信以國家社會主義特有的方法為基礎，終究能夠把科學和藝術創造成為德國的科學和德國的藝術。國家社會主義的圖書生產規模因而異常龐大，并且從一開始就非常粗暴地重新詮釋了現有的各種科學成就。

這種新文化的承載者，當然就是那批自稱的“世界觀精英”，亦即黨衛隊保安局（Sicherheitsdienst [SD] der SS）圈子里面的人。

那些人想要“具有創造性”（schöpferisch），因為“具有創造性的人”是當時的官僚人員和老是坐辦公桌的人的反面，而后兩者正是他們所要消滅的。艾希曼在柏林的“工作”同樣從一開始就跟文字撰寫息息相關。根據他自己的報告，他的第一項任務就是總結特奧多爾·赫茨爾（Theodor Herzl）猶太復國主義經典著作《猶太國》（Der Judenstaat）的摘要。與艾希曼不同，這種工作對他的同僚來說并不新鮮，因為他們許多人都接受過大學教育。例如艾希曼最初的上司之一利奧波德·馮·米爾登施泰因，就是一位相當出名的作家。1933年，米爾登施泰因在前往中東旅行之后，于納粹黨的《攻擊報》（Der Angriff）上發表了文章《一個納粹的巴勒斯坦游記》，引起轟動。該報甚至鄭重其事地為那個報道系列制作了紀念幣，其正面和背面分別令人震驚地印著卐字標記與大衛之星。[[24]](#_24_7)艾希曼非常欽佩他的上司，并且（至少在記憶中）試圖仿效之。米爾登施泰因的繼任者赫伯特·哈根，更在1937年帶著艾希曼前往中東展開自己的行程。他還舉辦晚間讀書會并規定了巨大的閱讀量。此外，書評、新聞評論，以及時而為公務目的和教育用途制作的“導報”（Leitheft）也不斷增加。艾希曼對這些小冊子非常著迷，以致堅定地聲稱自己也寫過一本，而且還被“印刷”了出來。[[25]](#_25_7)“我在那篇報告中客觀介紹了猶太復國主義世界組織的架構、猶太復國主義的目標、它的支持來源和困難，并強調了其所面臨的挑戰——因為猶太復國主義本身也在尋求解決辦法，它在這方面符合了我們自己的意愿。”然而“導報”原則上不會被印刷出來，因為它是用打字機打印的。這種“導報”是專供黨衛隊保安局內部使用的機密冊子，不要與同名的雜志《黨衛隊導報》（SS-Leitheft）或出版物混為一談。[[26]](#_26_6)艾希曼提到的那本冊子迄今還未發現，但其架構聽起來相當接近一本反猶太主義著作：1939年以“迪特爾·施瓦茨”（Dieter Schwarz）這個筆名出版的《世界猶太集團：組織、權力和政治》（Das Weltjudentum:Organisation, Macht und Politik）。但維斯利策尼聲稱，那個冊子是哈根與弗朗茨·阿爾弗雷德·西克斯合力編撰的。他們的部門為此感到驕傲。雖然艾希曼巴不得自己就是作者，但其語言風格顯示，該書與艾希曼無甚關聯。隨著對所謂“寫作活動”回憶的展開，艾希曼自稱由他撰寫的黨衛隊保安局“導報”數目也跟著不斷增加。[[27]](#_27_5)

但即使在納粹時代，艾希曼的野心也已經遠遠超出了內部參考手冊的范圍。艾希曼曾告訴薩森（以及以色列的審訊官），他在1942年5月“出于培訓目的”寫了一本厚達100頁，題為《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的作品。該書計劃由北國出版社（Nordland Verlag）印刷發行五萬冊，除卻關于“猶太人問題”和運輸過程的一般論述之外，書中還包含了統計數字資料。艾希曼告訴薩森，他原本提議以海德里希的名義來發表那份手稿。等到海德里希在6月遇刺身亡之后，他想至少也可以把它獻給海德里希，可是事情最后不了了之，等到戰爭結束的時候，他奉命把稿子燒毀了。

艾希曼關于這本書的講法出現許多矛盾之處，這表明他至少也是過分夸大其詞。[[28]](#_28_5)自1939年以來，黨衛隊旗下的北國出版社便一直為帝國保安總局第七局發行兩個享有聲望的叢書系列：《猶太人問題叢書》（Bücher zur Judenfrage）和《猶太人問題的原始資料與論述》（Quellen und Darstellungen zur Judenfrage）。事實上，叢書確實計劃推出一本有關“猶太人統計數字”的專著。第七局的領導人弗朗茨·阿爾弗雷德·西克斯曾在一次會議后與艾希曼討論此事。然而西克斯也表述得非常明白，那無論如何都將是一個“由我方主導的共同項目”，嚴格來說，他從艾希曼那里想要獲得的只是統計數字資料而已。[[29]](#_29_5)

然而，想到有機會在那個著名的系列中推出自己的冊子，還是不免讓艾希曼受寵若驚。時隔多年之后，他仍然清楚記得當年的日期和出版社，以及他如何獲選成為這套著名叢書的作者之一。

盡管艾希曼一再宣稱自己對“聚光燈”不感興趣，但他的行為卻清楚表現出他是多么地沉迷于出風頭。他不僅在內部會議上侃侃而談，還定期在黨衛隊保安局位于貝爾瑙（Bernau）的學校舉辦講座。[[30]](#_30_5)至于他在受害者面前發表的惡劣講話，那就更不用說了。他喜歡裝腔作勢，想要流芳后世而不僅僅是書寫大屠殺的歷史，這些都并非只是對流亡做出的反應。然而在阿根廷，有三件事情進一步強化了他的動機。首先，從1955年開始，出現了第一批關于滅絕猶太人的書籍，艾希曼將之斥為“敵方文學”，是和許多報紙文章相同的“挑釁行為”。其次，在第三帝國垮臺之后，這名“世界觀戰士”只剩下了一件武器，那就是公眾寫作。第三，他首度發現還有人在用手中的筆繼續這場戰斗，而且他們擁有一家出版社。尤其重要的是，他們對他所知道的事情非常感興趣。那些人就是威廉·薩森和埃伯哈德·弗里奇。嚴格說來，杜勒出版社只是一小批烏合之眾，在自己的讀者群之外沒有任何吸引力和潛力。不過艾希曼這種圖書市場上的新手顯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或許他也掉進了每一個內向型社區都面臨的陷阱：過于自我中心式的思考，最終導致外在的一切都被邊緣化而顯得微不足道。但從艾希曼的角度來看，《路徑》在右翼出版界所處的地位想必非常令人印象深刻：薩森不但認識庇隆、寫過一本小說，還在《國族歐洲》和阿道夫·馮·塔登的《帝國呼聲報》（Reichsruf）上發表文章。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不僅寫了回憶錄和其他短文，還是一個德國政黨的候選人。萊斯則從開羅寄稿件過來，甚至還帶來了大穆夫提的問候。諸如德魯費爾出版社之類的德國和奧地利出版商在《路徑》刊登廣告，埃伯哈德·弗里奇更積極收集德國媒體的反應，范圍從《明鏡周刊》、《時代周報》（Die Zeit）一直到廣播節目[[31]](#_31_5)，甚至聯邦德國總統特奧多爾·豪斯也曾提到過他。對艾希曼而言，成為這個駭人團體一員的念頭顯然無法抗拒。

### “阿根廷文稿”

艾希曼的高產甚至會讓具備寫作經驗的人感到驚訝。即使只看保存至今或者對外開放的那部分，情況依然如此。今日可供學術界使用的艾希曼“阿根廷文稿”散布在三個檔案館。其中不僅包括著名的“薩森抄本”，以及艾希曼附在上面的注記（光是這個部分已有100頁左右），還有1957年之前艾希曼出于自身目的撰寫的同等規模的文字。任何想要一讀艾希曼故事的人都必須具有足夠的耐心和良好的記憶力，以便從分散各地、有時難以辨認、不完整，而且往往深鎖在柜子里的頁面中找出關聯，拼湊出原始文稿。艾希曼手稿的開頭和結尾之間不僅充滿了難以閱讀的筆跡，而且還有240公里的距離。[[32]](#_32_5)這或許解釋了為何至今沒有人試圖閱讀它，甚至沒有人想到還有大批“阿根廷文稿”擺在那里——更別說意識到我們至少能夠重建艾希曼大型手稿的其中之一了。但把這個謎題的各個碎片拼起來以后，我們立即可以看到，除了上千頁的薩森訪談錄之外，我們還有其他材料可供運用：一份厚達107頁的獨立手稿（其綱領性的標題為《其他人都講過了，現在我想說話！》）、許多初步的嘗試和附帶注記，再加上大約100頁關于書籍的注記和評論。

另一份艾希曼的手稿雖然還沒有對研究者開放，但顯然亦已保存下來，即現在仍歸艾希曼家人所有的《圖庫曼小說》（Roman Tucumán）。據悉在260頁的篇幅中，艾希曼試圖特別向孩子們詳細描述自己的生平和事跡，從而向家人和他非常重視的“未來世代”做出解釋。迄今只有艾希曼的家人知道這份文本的細節[[33]](#_33_5)，而我們只能通過艾希曼與其律師羅伯特·塞爾瓦蒂烏斯之間的對話，以及他自己在審判期間的發言來掌握一些線索。塞爾瓦蒂烏斯宣布把這份文稿提交給了法庭，用于證明艾希曼已經跟國家社會主義一刀兩斷，“以之作為被告真實態度的證據”。[[34]](#_34_5)我們因此不妨認為，那本“小說”是艾希曼在變相地要求兒子們。克勞斯·艾希曼對此也記憶猶新：“父親說，‘我希望你們永遠不要從軍，不要涉足政治’。當他那么‘說話’的時候，根本是在命令我們。”[[35]](#_35_5)然而只有等到相關文稿公之于世之后，這個問題才會真相大白。由于阿根廷文稿已公開的部分至今仍未被仔細閱讀過，所以在那最后一份不對外開放的艾希曼文稿露面之前，我們可以把時間用于解決其他問題，因為閱讀艾希曼的文字絕非易事。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字跡非常自成一格，當時就已經給薩森雇用的打字員們帶來了很大麻煩，以致現在若不核對原稿，保留下來的副本便無法使用。[[36]](#_36_6)

艾希曼或許確實有著異常強烈的秩序感，但至少在書寫方面并非如此，因為無論是其筆跡還是他隨意使用各種尺寸紙張來寫字的習慣，都一點稱不上有序。而他的表達與想法至少同樣古怪，顯示出他是一個對語言本身和用字遣詞沒有特別感覺的人。漢娜·阿倫特帶著她被德國古典文學訓練出來的對語言和概念的敏感，將艾希曼的語言形容成一種由欠考慮的恐怖、玩世不恭的思想暴力、自怨自艾的牢騷、無心的鬧劇，以及難以置信的人類苦難構成的“冷熱水交替浴”（Wechselbad）。什洛莫·庫爾恰爾更進一步指出，艾希曼的文體并不屬于典型的納粹風格或官樣文章。[[37]](#_37_5)就兩方面而言，閱讀他的文字需要特別集中注意力：讀者必須不斷運用自己的判斷力，并時刻記住作者是誰以及他在寫作之前做過什么事情。但正如對歷史事實的了解不可或缺，若不想低估了艾希曼，光是有效利用阿根廷文稿這樣的資料還不夠。像艾希曼那樣的人，他們寫作的理由與我們其他人完全不同，因為他們想要妨礙歷史研究，誤導它轉向對他們有利的方式。

在解讀艾希曼的阿根廷文稿這種自我辯解之詞的時候，我們不能期待直接從中獲得對歷史事件的新認識，因為寫下辯解詞的那個人既非歷史學家，也不是編年史家。更重要的，任何為了如此明確的個人利益而公開“思考”的人，根本無法作為可靠的時代見證者，因為每一個日期、每一個細節都有可能是謊言。這些文稿只可靠地證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每一次寫作甚至說謊時所泄露出來的思維方式。因為即便是彌天大謊，也必須建立在寫作者所認為的真理之上。通過解讀艾希曼的自我陳述和他對歷史的篡改所能發現的新歷史事實，就是他自己的思維方式本身。

艾希曼自稱是從“待在牧場期間”開始寫作的，也就是始于1955年3月，而在107頁手稿的最后部分，他明確提到了當時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因此我們至少可以斷定，最后三頁完成于1956年10月和11月之交。等到1957年4月訪談終于開始的時候[[38]](#_38_5)，艾希曼曾帶了一份手稿給他的東道主過目。[[39]](#_39_5)因此“待在牧場期間”的說法看來符合實情。艾希曼在每星期的工作日與家人分離，因此有足夠的時間來閱讀那些書籍，看著別人千方百計指摘其行為表現和人生目標，并且對他一貫自認的畢生最大成就發出譴責：“那些作者們很早就開始講我的壞話，創造出一個神話來散播他們關于600萬人或800萬人被害的謊言”，甚至“非猶太人也對我說三道四”。艾希曼在“通論”（Allgemein）這個大標題下面單獨注記道，所有那一切充其量只不過是“真相與虛構的混合物”。他完全沒來由地被當成了替罪羊，或者按照艾希曼很不得體的措辭，他成了“被冠以這種光環的人”。[[40]](#_40_5)他想要引爆這種“謊言炸彈”。寫作在他看來是正確的方式，正如他曾向妻子解釋的：“這本書將為我辯護。這將是一本書，將成為我的辯護詞，然后我會返回德國并在德國投案。”[[41]](#_41_5)盡管我們今天會覺得此事非常荒謬，但艾希曼希望能夠借著那本書不但重新恢復自己的姓名，而且回歸他在德國的生活。

如果考慮到聯邦德國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刑事執法現實，那么我們必須承認，艾希曼的種種盤算并非全無指望。當時已經廢除死刑，而且對納粹罪犯的起訴往往以相當輕的判決告終。在盟軍和美國主持的紐倫堡審判結束之后，刑事追訴權已轉交到新成立的德國機構手中，而管理這些新機構的往往還是老員工。艾希曼自己就知道許多昔日同僚，他們如今在德國生活得無憂無慮。戰爭罪犯如今也可望從輕發落，甚至罪大惡極的納粹罪犯很快也可以期待追訴期失效，畢竟第三帝國已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但如果艾希曼真的以為，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也會允許希特勒旗下大名鼎鼎的“猶太事務主管”坐完幾年牢后在德國自由自在地活動，那他就未免太天真了。許多人有千百萬種理由無法接受一個活蹦亂跳的艾希曼。因此即便服刑期滿，艾希曼也永遠不可能安全地以自己的姓名過日子——至少在民主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無法如此。更何況艾希曼并不怎么支持這種民主政體，他屬于那種想象要重返另一種政治環境的人。艾希曼講述自己過去的努力很快便顯示出，他其實是在進行“化圓為方”（Quadratur des Kreises）[\*](#_443)的困難嘗試。一方面，他希望重返的“民族共同體”，已是一個在1945年5月以后徹底改頭換面的法治共同體（Rechtsgemeinschaft）。另一方面，艾希曼想替自己的行為，甚至替自己的罪行辯護，而且他一如既往地認為別無替代做法。這兩個目標都不可能實現，而艾希曼自己最晚在開始寫作的時候就已經認清了這一點。

### “開潛艇的匿名流浪者”

在犯罪者腦海中所發生的一切

——即使在他沒有說實話的地方——

都對理解歷史的這一篇章至關重要。

——摩西·齊默爾曼（Moshe Zimmermann），1999年[[42]](#_42_5)

“阿根廷文稿”當中最常被引用的文字，經常被看成是艾希曼的結束語，卻迄今無法得到證實。[[43]](#_43_6)此外凡是仔細看過原始手稿的人都可以確定，它和“匿名流浪者”那段朗朗上口的引文不完全吻合——這很可能純粹只是相關段落極難辨識的緣故。艾希曼非但沒有官僚應有的工整字跡，更缺乏文學表達的語感，反而在胡亂堆砌字詞方面有著驚人的天賦。他正經八百地在一份題為“私事”（‘Persönliches’）的札記中表示，“我逐漸開始厭倦這種宛如開潛艇的匿名流浪者一般，在不同世界之間過日子的生活”。艾希曼試圖為自己的書找到恰當的開場白，他繼續寫道：“我內心的聲音，沒有人能逃脫得了的那種聲音，不斷地喃喃要我追求和平，甚至與我昔日的敵人和平相處。或許這也是德國人性格中的一部分，而我將不會是最后一個愿意向德國當局投案的人，假如……”[[44]](#_44_6)

艾希曼的這個“假如”，所指的并不在于沒人記得他和他的同僚們有過任何和平的表現，或者德國人的性格曾在1933-1945年間展現出特別愛好和平的一面。他也沒有想到，單數形式的“敵人”（der Gegner）是納粹詞匯的一部分，清楚明白就是“猶太人”（derJude）的同義詞。如果還有人期待艾希曼意識到他過去的行為已讓這種尋求和平的做法變得強人所難，或者至少對自己追求和平的能力表現出懷疑的跡象，那只會大失所望。艾希曼的“假如”并沒有怪罪自己，反而把責任歸咎給別人：“……假如我不是必須顧慮到此事在政治層面牽涉利益過大，以致無法帶來明確、客觀的結果。”[[45]](#_45_5)在這份札記中，艾希曼自行宣布了那個“明確、客觀的結果”——亦即判決——仿佛那是不爭的事實：他問心無愧，而且“既非殺人犯也不是大屠殺兇手”。如果他真有可被指摘之處，那么頂多是奉命行事“在戰爭期間協助殺人”，以及“傳達了我所收到的關于疏散或遣送的命令，并監督這些收到和傳達的命令確實得到遵守與執行”，即便他從來都不清楚究竟哪些被遣送者遭到了殺害。[[46]](#_46_5)

艾希曼曾經多方面參與制定和實施納粹的驅逐和滅絕政策，肯定不只是“傳達命令”而已。這份札記不過是他在信口雌黃。但更讓人感興趣的，是他為什么甚至無法勉強自己做出最微不足道的供認：“我之前已經講過，如果要嚴厲、不留情面地評斷自己的話，那么我不得不指責自己在戰爭期間協助殺死敵人。但我不清楚自己是否也有權如此批評我當年的直接下屬，或者在對其他人做出全面考量前下這樣的評價，因為直到目前我都還沒有聽說——請原諒我這樣比較——我在敵方的同行們，那些如今位高權重樂享養老金的人，曾經因為協助殺人而受到追究，或者對此表示自責。”[[47]](#_47_5)這個光是在1944年一年就把成千上萬名猶太人送上死亡行軍，甚至在1945年還繼續參與新的毒氣計劃的人，隨即臉不紅心不跳地把滅絕猶太人一事，拿來跟“多半在戰爭結束后”遭到驅逐的“千百萬人”相提并論，進而要求“對所有人一視同仁”。[[48]](#_48_5)“除此之外必須明白的是，當初我身為奉命行事的小人物，不可能表現得比教皇本身更像教皇”。人們不應該把這句話理解成“玩世不恭”或者“冷嘲熱諷”[[49]](#_49_5)。當然，艾希曼沒有告訴我們還能怎么理解那種講法。反正對任何曾經被拿來跟沙皇或其他帝王相提并論的人而言，顯然羅馬教廷也不成問題。不管怎樣，艾希曼接著表示，他所做的一切都秉持著“純凈的良知和虔敬的心靈”，因為他確信“民族正處于危急狀態”，而且“當時德意志國家領導人”向他“灌輸”的“總體戰之必要性”，促使他恪盡了自己的愛國本分。“基于這些考量，我與生俱來的愛國主義道德（！）根本不允許我像我相信應該做的那樣，承認自己在戰爭期間協助殺人是有罪的。所以就像對方奉命執行相同任務的先生們顯然所做的那樣，我也應該以相同的方式聽從自己內心的道德。”[[50]](#_50_5)

我們大可懷疑艾希曼是否果真曾經“相信”自己應該承認任何罪責，因為他明顯是要“做出判決”（Urteilsbildung）[[51]](#_51_5)，而非“達成判決”（Urteilsfindung）。

衡量這種“內在道德”（innere Moral）的尺度并非某個正義觀念或者普世的道德規范，甚至也不是一種自我檢視。對艾希曼來說不言自明的是，任何對其行為的非難都是基于錯誤的政治觀點，亦即建立在超出了“祖國道德觀”（Vaterlandsmoral），因而也超出了德意志民族視角的標準之上。那乍看之下仿佛是對普遍正義的要求，以及對人權平等基本原則的呼吁，但仔細觀察將顯示出，那赫然是一種完全不同的“人人享有同等權利”。艾希曼并沒有因為自己是人類的一員，就要求同樣適用于他的普世人權，反而要求承認被國家社會主義者視為無可辯駁的那種信條：每一個民族都有同等權利采取任何必要措施自衛，尤其是德意志民族。這種自衛無論如何都沒有結束，只是最終勝利的時間必須向后推延，因為軍事手段行不通了。可是人們并沒有放下意識形態的武器。艾希曼依然深信“民族緊急狀態”（Volksnotstand）存在，而且它合法化了一切，因為自己民族的利益高于其他任何民族。只有“豬狗不如的雜種和叛徒”（Schweinehund und Verräter）才不這么認為。[[52]](#_52_5)那么良心呢？良心只不過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愛國主義”，艾希曼也稱之為“血統的呼聲”。在我們心中并沒有人類的普世法則，就好比每個人都無權擁有星空一樣。對德國人來說，法律就只是德國的法律。

因此對艾希曼來說，“良心”絕非某種足以糾正所有行動和想法，甚至能讓人們質疑主流社會風尚的權威機制，更不是追尋完善與正確行為方式時的準繩。恰恰相反，凡是那樣理解“良心”的人，就背叛了“血統的呼聲”。尤其是聽從“心中的聲音”，只會表現出情感上的軟弱，而這正是國家社會主義者眼中的根本罪惡之一。盡管艾希曼的內心可以恣意低聲向他呼吁和平，但他總是可以強大地不理會這種“非德意志”教育的殘留。顯然艾希曼依舊深信，“要不就是打贏這場總體戰，否則就是德意志民族的衰亡”，在獲勝之前，亦即民族的法則壓倒真正的普遍正義法則之前，“尋求和平”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獲得德意志民族道德的最終勝利之前，艾希曼干脆把自己的認罪丟到一邊：“我越是頻繁、集中地考慮這些事情……就越是確信即便按照今日的法律，我也不曾犯下任何罪行”[[53]](#_53_5)，因為“敵人”同樣沒有承認自己的罪行。這里唯一通用的并非法理，而是“罪責”：在它的名義下，戰爭期間的一切行為都變得平等。真正的戰爭罪犯和反人類罪犯總是喜歡集體罪責的論調，因為這讓他們得以消失在犯罪者的茫茫人海當中，并讓其他人相信，每一個人都是他們的共犯。同樣，普遍的罪責在這里也成為艾希曼脫罪的借口。首先，其他每個人都應該明白并且承認，他們都和艾希曼一樣有罪，然后他才會跟著認罪。因為當每個人都有罪的時候，也就不再有人有罪，于是任何形式的招認都淪為空話，根本不會帶來刑法上甚或道德上的后果。我們大可將這種逃避的花招稱為“用指控來幫自己辯護”，于是優等民族再一次制定了規則。這份以“通論/私事”為題的簡短手寫思路大綱，奠定了一份大型手稿的框架，并將作為其導言出現。

### 《其他人都講過了，現在我想說話！》[[54]](#_54_5)

現在是我從匿名狀態走出，介紹一下自己的時候了：

姓名：阿道夫·奧托·艾希曼，國籍：德國

職業：退役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

——艾希曼，《其他人都講過了，現在我想說話！》，1956年

在107頁的《其他人都講過了，現在我想說話！》原稿中，目前主要是它的中間部分比較出名，因為只有該部分的少數幾頁來到以色列被用于審判。[[55]](#_55_5)整篇文字共包括三個部分。最開始的10頁是具有導言性質的序文，緊隨其后的部分題為《我關于“猶太人問題”以及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國家政府在1933-1945年間為解決此復雜問題所采取措施的調查發現》，結尾部分有26頁，內容涉及對罪責問題的思考。

艾希曼計劃重返公共生活的方式，看起來自信十足，甚至有些傲慢無禮。那位作者把自己描繪成誹謗中傷和不實陳述的受害者。他一直用幾乎超人般的耐心面對一切，但現在終于不得不停止那么做了，因為惡意攻訐甚至對他而言也太過分。現在輪到他了，人們必須明白這一點。那位勇敢的英雄于是慷慨激昂地宣示：“我希望真相大白。我要揭穿別人的謊言。”[[56]](#_56_6)接著艾希曼再度宣布，他或許愿意按照自己的條件承認罪責，但不是馬上、很快那么做。他神秘兮兮地表示：“我不想搶先行動。”

艾希曼對其文稿的目標讀者有著非常清晰的想法：這些“陳述”寫給“我的朋友和非朋友們”，但特別是朋友們。他愉快地繼續指出，讓他感到驚訝的是，他發現自己已經擁有“為數多達幾百萬的一大群朋友”。不過若想知道艾希曼在此指的是哪些人，還必須再等上100頁。在第二段文字中，艾希曼解釋他對自己的評斷從一開始就不可動搖：“我既非殺人犯也不是大屠殺兇手。為了證明這一點，現在我打算跟自己對簿公堂。”正如后來在以色列對其進行心理診斷的心理學家所講的那樣，艾希曼主義的本質就是一種獨角戲。當艾希曼補充說，他“不想為了辯解而美化任何東西”，或“回避”自己所做過事情時，即便不知道接下來幾頁內容的人也能看得出來，那根本是冠冕堂皇的空話。給人同樣印象的還有他關于自己“平庸性格”的謙稱，以及模仿自文學語言的“人之作為與抱負”和他所承受的“試煉與磨難”。[[57]](#_57_6)

艾希曼拿來為自己辯護的理由早已眾所周知，例如這個墮落的世界，以及他“絕對沒有做過任何”比其他奉命行事者“更壞的事情”。這篇文字更有趣味之處，反而是他重新恢復自己姓名的戲劇化方式。艾希曼巧妙地制造了緊張氣氛。他問：“我究竟是什么人”[[58]](#_58_6)，然后把自己展現為救贖者，來拯救他那些陷入良心困境的同儕。“你這個人，曾經是我的上司；你這個人，曾經和我地位平等；你這個人，曾經是我的下屬，你們在戰爭時期當然都跟我一樣，沒有任何罪責。”[[59]](#_59_5)我要消除你們的罪惡感，“正如我”原諒自己一般。德國歷史博物館館長拉斐爾·格羅斯（Raphael Gross）指出：“顯然，神學修辭特別適用于建立對德國人的普遍共識，而不必太過關注過去的事件，甚至無須承認對受害者應負的具體責任。”[[60]](#_60_5)這顯然適用于當下這名犯罪者與其同伴們的交談。艾希曼自己寫得如癡如狂，宣告“邏輯”和“清晰的思維”將被壓迫的德國人從其受害者的夢魘中解放出來，仿佛掙脫了桎梏一般。雖然在這里講幾句體諒受害者的話也于事無補，可是連一句這樣的話也沒有，這讓艾希曼的安慰又變成了指控。這名大屠殺兇手只會為他自己，或許還有他的同黨感到遺憾，而受害者卻如艾希曼所一直認為的，被影射成真正的罪魁禍首。

從對其真實姓名精心設計的介紹方式即可看出，這位護照上名為里卡多·克萊門特的先生是多么渴望重返公眾視線。他在文章第一部分制造的懸疑高潮之后立刻寫道：“現在是我從匿名狀態走出，介紹一下自己的時候了。姓名：阿道夫·奧托·艾希曼……”。[[61]](#_61_6)專家已然重返，可以開始糾正那些自稱是其受害者的人所說出的歷史謊言了。我們如果想象一下艾希曼是在何種情況下寫出這篇文稿的，那么即使在今天也不難體會寫作給他帶來的勝利感。一名兔子飼養員在結束一天的工作之后，又回到了他昔日“聲名顯赫”的時代。從這份文稿可以看出艾希曼如何隨著寫作而欣喜若狂：第一頁的字跡還很細小、難以辨識，第二頁卻已經變得更大、更寬和更自行其是。圓珠筆顯然是在紙上飛舞，書寫者排列文字的方式則如我們后來在錄音帶上聽到的那般，充滿了效果顯著的暫停（段落）、用于突出強調的符號，這是演講者手稿上常見的特點。即使在手寫稿上，艾希曼也想打造出他一貫給人的印象：堅決果斷、精力充沛、專業內行。這些字句將被出版發行，埃伯哈德·弗里奇和威廉·薩森制訂了宏大的計劃，艾希曼也使盡全力做出相應的表現。

### 圓融的歷史

愿今日和未來的歷史撰寫者足夠客觀，

不會偏離在此確立的真理之路。

——艾希曼，1956年[[62]](#_62_5)

在開宗明義的導言以及硬著頭皮要說出“實情”，并氣勢洶洶地威脅了所有“說謊者”之后，艾希曼轉而將精力放在了重建歷史過程上面。他把自己的“記錄報告”取名為《我關于“猶太人問題”以及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國家政府在1933-1945年間為解決此復雜問題所采取措施的調查發現》。艾希曼希望“理性且實事求是地”描述“真相”，不帶個人判斷地說明“事情是如何發生的”，只是講述自己的親身經驗。[[63]](#_63_5)他急于向薩森和讀者闡明，他這位作者才是唯一幸存的真正內部人士，其他人都已經死了。只有他能夠幫助“今日和未來的歷史撰寫者”，獲得“圓融、真實的圖景”。[[64]](#_64_5)為了證明自己杰出的專業知識，艾希曼補充說道，從黨衛隊保安局到第四局B處4科，他都“必須指導和管理這個復雜問題的很大一部分”，而“即使在我管不到的地方——例如從肉體上毀滅猶太人——我也不可避免地必須了解事情的全貌”。[[65]](#_65_5)這種自我形象呈現已經顯示出了艾希曼后來在薩森訪談會上以及在以色列都采取了的雙管齊下策略：把自己呈現為一個無可辯駁的關鍵證人，并且盡可能巧妙地避開了納粹統治時期的最后階段、他的猶太事務部門改稱為IV A4b的那段時期。自我推銷和瞞天過海的手法理應使他重獲對書寫歷史的控制權。只有他一個人可以“客觀地”永遠確立真理的道路。此類將自己的解釋表述為客觀真理的做法，傳統上被稱為“布道”（Verkündigung）。

艾希曼自稱做出“實事求是的描述”，在文稿中刻意避免談論“有罪或無罪”的問題，反而呈現出如此“圓融”的納粹時期圖景，讓人只能疑惑，為什么我們直到今天還有那么多的疑問？若按照艾希曼的講法，一切都非常清楚、平淡無奇，甚至簡單得出人意料：處理“猶太人問題”的責任完全落在德國政府身上，意即“阿道夫·希特勒及其部長們，或者他下面的那些全國領袖（Reichsleiter）”。其余都不過是宣誓和服從的問題罷了。但即便那位“前元首”當然也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而已，畢竟當時戰事方酣，參戰各方的“口號”都是“敵人必將被消滅”。更何況還有一個十分特殊的敵人，“全世界猶太人通過其領袖們（！），尤其是通過哈伊姆·魏茨曼博士，公然向德意志帝國宣戰”，而他們也得到了一場戰爭。這位自稱的編年史家于是以平靜的語氣，描述他起先如何努力和平地讓猶太人移居國外，但由于外國的不合作而未能成功。接著才有了在特萊西恩施塔特的嘗試，而且這項嘗試讓“猶太人的領袖們”興奮莫名，因為桀驁不馴、最自私自利的猶太人在該地“第一次不得不投入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紅十字會成員在實地參訪之后，甚至到1945年還對此津津樂道。總之一切都嚴格依法行事、與“猶太人”相互協商，以一種可控、“正確無誤”、完全非暴力的形式進行。然而隨著戰爭的爆發，移民遭到禁止。那個時候，他——阿道夫·艾希曼——立刻驚覺情況不妙。盡管如此，卻偏偏是他在紐倫堡審判中被稱為“本世紀最邪惡的人”。顯然，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艾希曼沒有獲知美國首席起訴人羅伯特·杰克遜的原話，因為杰克遜只不過稱艾希曼為“這個負責執行滅絕計劃的邪惡人物”，既無“本世紀”也沒有“最”。[[66]](#_66_5)艾希曼繼續道，不管怎樣，他都不必對滅絕猶太人一事負責。他寧愿執行馬達加斯加計劃，直到這個“夢想”也因為與俄羅斯的戰爭而破滅。不幸的是，對俄軍事行動“并沒有進展得像‘上面的人’所期望的那般快速”，于是德國陷入了雙線作戰。再加上“世界猶太人”也跟著向他們宣戰，因此“我推測”，“最后的顧忌也被丟掉”，希特勒隨即下令進行“肉體上的消滅”。那位“編年史家”表示：“我當時的感受很難用言語來形容，而且我也不想這么做。”畢竟艾希曼曾經對著帝國旗幟宣誓效忠，可是他隨即看見了空襲并意識到：“我的工作就本質而言，跟那些把炸彈丟過來的人驚人地類似，其實是一樣的。”暗中破壞——亦即偷偷用火車把猶太人運往國外——根本無濟于事，因為“誰會從我這里把他們接走呢？”艾希曼于是指出，除了殺戮之外還能做什么呢？他為自己和讀者省略了“肉體上的消滅”的相關細節，仿佛那只是微不足道的小插曲一般。他寧愿談論與卡斯特納“談判”的傳說，表示一切都進展得十分順利，直到敵人再次橫加阻撓。“甚至連這100萬個”猶太人都沒人想要接納[[67]](#_67_5)，然后戰爭就結束了。艾希曼總共花費了65頁的篇幅來鋪陳這個“真理的道路”，仿佛一切都不容置疑似的。

艾希曼當然明白，有一件事情尤其可能讓他前功盡棄，那就是受害者的人數。于是艾希曼用一個統計數字來粉飾自己的敘述，說出了他所講過的最背信棄義的謊言。艾希曼說，一位統計學家在1944年年底為希姆萊和希特勒計算了一個數目，他現在就以此為參考對象，“尤其因為當年我曾對那份‘呈交給元首的報告’做了兩處修改”。[[68]](#_68_5)后來艾希曼卻一再否認自己與這份臭名昭著的《科赫爾報告》（Korherr-Bericht）有過任何瓜葛。不過謊言隱藏在細節中。艾希曼稱那個統計報告是1944年年底做出的，但其實數字在1943年3月就已經計算出來了。艾希曼非常擅長這種篡改時間的手段，并多次這樣做來讓事情顯得對他比較有利。艾希曼那么做的時候早已預先想好退路，萬一數字把戲被拆穿，他還可以利用別人的善意推測——時隔這么多年，難免可能把事情搞混。艾希曼有一次不經意地在薩森訪談會上詳細談論起這種做法，犯下了跟魔術師泄露自己戲法竅門一樣的錯誤。把1943年年初的數字算作最后的總賬，即使那個數字正確無誤，也讓艾希曼得以抹去將近兩年時間和100多萬起謀殺。

但艾希曼與科赫爾的故事，與他在阿根廷玩弄的篡改日期把戲大不相同。那位統計學家的名字已然成為艾希曼職業生涯當中最大丑聞之一的同義詞。1943年1月18日，海因里希·希姆萊怒氣沖沖地發了一封公函給海因里希·米勒，正式解除阿道夫·艾希曼提供謀殺統計數字的職責，此前這一直是艾希曼的工作：“帝國保安總局……不得再繼續自己進行這方面的統計工作，因為該局迄今提交的統計資料缺乏專業準確性。”希姆萊任命里夏德·科赫爾（Richard Korherr）取而代之，作為唯一的官方統計學家，擔任“黨衛隊全國領袖辦公室統計督察”，并有權直接使用第四局B處4科的各種數據。科赫爾還擁有一間辦公室，就在艾希曼領地的正中央。[[69]](#_69_5)在接下來的時間里，艾希曼甚至還必須協助科赫爾匯整編列數字。像艾希曼那樣在乎自己職業前途的人，不可能輕易就忘記或混淆了這段經歷。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艾希曼在1956年提出過一個完全不同的謀殺統計數字：遇難者人數甚至還不到100萬。他把移民配額和幸存者人數狠狠地提高了許多倍，并且強調有很大一部分猶太人是死于盟軍的轟炸。當涉及謀殺統計數字時，這種缺乏誠意的數字游戲總是讓人難以忍受。而在艾希曼的案例當中，那卻厚顏無恥得令人無法置信。那個人曾驕傲地在辦公大樓設有一間“卡片室”，墻壁上掛滿各種圖表，展現他自己的“功績”和整個國家社會主義的“成就”。他曾熱情地向訪客展示那些圖表，而其副手更宛如獵人把鹿角掛在墻頭一般，把遣送行動示意圖貼在他背后的墻上供每個人觀賞。[[70]](#_70_5)現在偏偏是這個人想要讓我們相信，這些謀殺統計數字根本不值得他的部門大費周章！正是艾希曼自己在1944年年底1945年年初使用了“500萬到600萬人之間”這個如今我們知道非常接近事實的數字，現在卻試圖淡化他對自己“工作”的變態自豪感，讓國家社會主義滅絕計劃顯得好像只是歷史上一個令人遺憾的附注罷了。他的否認是如此牽強，我們只能驚訝艾希曼可曾有片刻相信如此便足以取信于人？事實上，即便在阿根廷那批逃避事實的人中間，這種扭曲事實的做法也難以持久奏效。雖然艾希曼提出的數字非常符合薩森及其同僚正在進行的項目的需求，可是最后就連在他們那里都無法站得住腳，因為《科赫爾報告》被收錄在萊昂·波利亞科夫和約瑟夫·伍爾夫的那本文件匯編中，就在薩森訪談會每個人的面前。關于受害者人數的辯論因而占據了訪談會很大一部分時間。[[71]](#_71_5)

然而，艾希曼最大的信任危機，其實是他自己在納粹末期樹立起來的，亦即他在同僚們面前自我標榜的時候。他顯然清楚地知道，如果不想一開始就引人懷疑，就必須自己談起這個問題。反正無論如何，他在“記錄報告”的倒數第二頁決定迎難而上：“戰爭已接近尾聲。在這場戰爭的最后階段——我幾乎要說是最后幾小時——我曾告訴一些屬下：‘……如果有必要的話，我會快樂地[\*](#_444)跳進坑里，因為我知道有大約500萬名帝國的敵人[[72]](#_72_6)跟我們一起被殺死。’”[[73]](#_73_6)艾希曼繼續解釋，他是在戰爭即將結束、面對著戰爭帶來的毀滅之際，在那種心情下說出的這句話。畢竟“竭力夸大敵人的損失”也是對方的“立場”。艾希曼因此堅決否認他所指稱的對象是“猶太人”（Juden），將之斥為威廉·霍特爾和迪特爾·維斯利策尼編造的版本。他再次斬釘截鐵地重復：“那不是真的！”但他無論如何也無法解釋，那兩個人怎么會做出這種荒謬失實的陳述。[[74]](#_74_5)不管在薩森訪談會上面對怎樣的質疑，艾希曼都捍衛自己的版本，而且要等到五年之后他才承認，自己當然沒有講過“帝國的敵人”（Reichsfeinde）一詞。

\*\*\*

今天我們很容易就能識別出艾希曼的謊言和歪曲，因為50多年來的研究提供了足夠的論證和抵抗力，讓人得以在謊言發揮作用之前認清其背后的事實，更重要的是看清艾希曼的動機。然而在1956年時，落入艾希曼陷阱的危險卻相當大。更讓人感興趣的是仔細觀察這個人用何種方法來混淆視聽和操弄真相。畢竟這篇文字是艾希曼在戰后第一次做出聲明，因而也是他重新奪回歷史解釋權的首次嘗試。這第一份文稿當中的一些細節泄露了內情，可以幫助我們觀察艾希曼的手段是如何發展和精進的。

這篇文字因為內心的沖突而搖擺不定，顯示出艾希曼在扭曲歷史的過程中所遭遇的幾個兩難窘境。第一個基本問題涉及艾希曼勾勒的希特勒形象。艾希曼一方面明確宣稱元首下令完全消滅德國勢力范圍內的猶太人，另一方面卻又盡可能壓低遇害者的人數。想要同時強調這兩點，就必須設法解釋，為什么一個極權國家的元首會下達一道始終不起作用的命令。這要么意味著，元首的話并不像艾希曼所宣稱的那樣具有約束力，因而使他“只是服從命令”的辯解站不住腳；否則便意味著艾希曼給出的數字太低，于是反而相應放大了他所直接涉入的罪行。艾希曼在1956年干脆解釋說，希姆萊“不急于執行元首的命令”，因為他在很長時間內仍然相信“戰爭將出現還算可喜的結局”。[[75]](#_75_5)除此之外，對奴工（“勞動力”）的需求仍然非常巨大，以至于黨衛隊經濟行政總局（Verwaltungs- und Wirtschaftshauptamt）沒有遵守元首的滅絕令。然而這種說法清楚顯示出艾希曼“圓融的歷史圖像”當中的一個缺陷。他將繼續利用薩森訪談會的討論和相關書籍，設法找到一種更好的布局。

艾希曼首篇論述中的第二個結構性問題源于文稿的目標讀者，但也源于他的自我形象。杜勒出版社圈內人要找的，是一個盡可能見多識廣，并且服膺于國家社會主義基本理念的人。這兩項要求都與“完全置身事外者”的形象格格不入。因此有別于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1956年時的阿道夫·艾希曼在說“我”的時候并沒有多少困難。結合了虛榮心和偶爾迸發的誠實態度，他也向讀者證明了自己作為不可或缺證人的資格，從而合理化其在薩森訪談會中的地位。他的文字因而讓人聯想起求職申請，特別強調了自認為能夠給他帶來積極影響的方面。然而這不會改變一個事實，那就是他將自己展現為一個既成功又得到認可的國家社會主義者。艾希曼確實曾經如此，于是為了避免受到負面影響，他又不得不繼續做出解釋。艾希曼既以他“為元首和民族取得的畢生成就”為傲，同時又必須為自己做出辯解，這種進退兩難的處境將使艾希曼有懈可擊。

艾希曼的歷史版本的第三個根本問題，在于他無法準確評估周遭人士的知識水平。任何想要操縱事實和說謊的人，不但需要過人的知識，更必須熟悉觀眾所掌握的事實和假設——就歷史認知而言，這被稱為“對相關原材料的熟悉程度”。1956年的時候，艾希曼最多僅聽聞過剛開始出現的各種研究著作的書名。與埃伯哈德·弗里奇和威廉·薩森不同，他必須依靠媒體上的書評來合理地回避尖銳問題。艾希曼固然因為“曾經親身經歷”而知道得更清楚，但他也因為清楚還有哪些恐怖的行為可能會被揭露出來而產生了別人所沒有的顧慮。說謊者在講故事的時候，沒辦法像奇幻文學的作家那般天馬行空，而是必須千方百計讓自己顯得可信。但如果聽眾的背景知識隨時可能在他事先不知情的情況下大幅增加，事情就變得更加困難了。薩森將會看到這個小小的優勢，并至少試圖利用它跟艾希曼過招。

艾希曼在撰寫文章時所面臨的第四個矛盾，源自其所犯罪行背后的根本的惡：他的激進反猶太主義立場。為了替自己以及替納粹政權開脫罪責，艾希曼特別強調了他與所謂猶太“談判伙伴們”之間的良好關系。這種據稱完全和諧、相互尊重、尋求共同解決方案的做法，與激進的種族反猶太主義具有不可調和的對立沖突，因為后者堅持必須取得一個種族對另一個種族的“最終勝利”。畢竟國家社會主義猶太政策的目標是“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而希特勒統治世界的計劃甚至在月球也沒給猶太人留下立足之地。在與“世界猶太集團”談判的世俗外交，以及激進世界統治者與“敵對人種”的斗爭之間，根本沒有中間地帶。這使艾希曼在打算調和兩者的時候陷入窘境。如果不想承認罪惡的滅絕計劃，就必須宣稱自己與“猶太人代表”進行過非暴力的政治談判，而這又讓他在薩森和弗里奇等立場堅定的反猶太種族主義者面前顯得可疑。

如果阿道夫·艾希曼真想創造一個“圓融的歷史圖像”，就必須消除他1956年第一份長篇手稿中所包含的矛盾關系，因為那正是其理想圖景中的弱點。接下來幾個月的緊張訪談，為1960年他在以色列時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即便根本的問題始終無法克服，但艾希曼在處理那些問題方面已經積累了嚇人的經驗。針對事件經過撰寫的“明確而客觀”的描述，以及許多個小時的訪談過程，都為艾希曼重返公眾視野做了更好的準備，這是紐倫堡審判的那些被告，或者其他被送上法庭的戰爭犯和危害人類罪犯所難以企及的。與人生中的其他階段一樣，艾希曼也抓住機會驚人高效地從困境中獲利。然而這一次可能也因為，對艾希曼來說，1956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回到公眾的聚光燈下已經越來越成為一個現實的選擇。

### 給聯邦總理的一封公開信

我不希望以任何方式進入公眾的聚光燈下。我沒有野心。

——艾希曼，薩森訪談會[[76]](#_76_5)

直到原始手寫稿的第二部分被發現，以色列艾希曼審判中所使用的低質量拷貝——亦即1961年起所稱的“第17號文檔”（File 17） ——上面無法辨認的部分才被揭示出來。艾希曼的《我關于……》原本計劃是一封公開信，而且是寫給聯邦德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本人的。標題上方有艾希曼手寫添加，但后來被劃掉的一句話：“鉛筆補充的文字僅適用于給聯邦總理的‘公開信’。”[[77]](#_77_5)

公開信當然多半是以假名發表，因為其內容比作者甘受追究的范圍更加“公開”。在20世紀50年代，公開信已成為右翼雜志圈特別流行的一種文體。誰要是認為這種以“不妨坦白表示”的名義進行自我推銷是今天才出現的現象，只需要翻閱一下相關出版物即可一目了然。“公開信”與所謂“讀者投書”共有的好處是，出版商能夠以言論自由的名義把它們刊出來，同時又與之保持距離，宣稱內容是作者發表的個人意見，未必得到編輯部的支持。對于《路徑》、《國族歐洲》、《觀點》（Der Standpunkt）和《帝國呼聲報》之類的刊物而言，它們由于不難理解的原因一再面臨被沒收與禁售的威脅，更可用這個招數寫出自己想要說的話而免受追究，因為名義上那些話都是別人寫的。來自所謂“猶太讀者”的信函尤為惡毒，他們借此發表最粗暴的反猶仇恨言論，并把它標榜為“讀者意見”。艾希曼曾見到威廉·薩森如何以這樣一封寫給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讀者投書而引起很大騷動，于是準備自己也寫一封“公開信”，這個事實特別表明了杜勒出版社圈內人與阿道夫·艾希曼之間的合作計劃。一方面，艾希曼當然絕不可能冒著暴露自己身份的危險，獨自發表這樣的文字。他需要關系良好的中間人來配合。另一方面，這個計劃尤其顯示出，與威廉·薩森的合作計劃絕非只是為了后代子孫。第一個借由給康拉德·阿登納寫公開信來產生影響的機會，就是即將在1957年秋季舉行的大選。畢竟蟄伏在阿根廷的那些人依舊夢想著終結阿登納時代。但這也意味著，艾希曼不滿于寫一本只有在他死后才可以出版的書，并且愿意為公開信冒很大的風險。畢竟，即便是匿名發表，這封公開信的主題和內容仍不可避免地把線索導向那名“猶太事務主管”，而這種公然挑釁的行為更令人不由得想追究撰寫者的責任。艾希曼十分確信自己掌握獨家的內幕知識，不會認為化名能為他提供保護，在《路徑》發表公開信將直接導致他行蹤暴露。由此得出的唯一合理結論就是，艾希曼在知情的情況下接受了這種風險。我們甚至可以想象，艾希曼或多或少有意希望自己被人發現。

艾希曼早在1952年就告訴妻子，他打算回德國接受法庭審判。接下來的幾年，他更一再向家人重申了這個計劃。艾希曼的兒子后來回憶：“他考慮把自己交給歐洲的一個國際法庭。他很清楚自己免不了懲罰，但并不認為會被判重刑。他甚至相信，四到六年之后就可以獲釋。”[[78]](#_78_5)鑒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聯邦德國法院的判決情況，艾希曼的期望并不脫離實際。他必定曾經告訴過自己，現在50歲，出獄之后仍然有辦法與家人一起安度晚年，但那時就是一個自由之身了，用真實姓名在自己的故國度過余生。這個行為也使艾希曼距離另一個夢想更近了一步：家庭的富裕。與薩森的合作從一開始就著眼于獲取最大可能的利潤，而且他當然明白，一本阿道夫·艾希曼撰寫的書的市場價值將因審判而急劇飆升。[[79]](#_79_5)出庭受審甚或被扣押收監，于是成為艾希曼對自己家人的服務，而家人的安危正是他一直念茲在茲的事情。坐幾年牢又算什么呢？艾希曼的兒子回憶說：“他告訴母親：‘你們可以在那么長的時間內過著沒有我的日子，沒問題的啦。’”然后世界說不定會重新走上軌道——至少，要不是因為艾希曼的名字與謀殺數百萬人的行動無法分割地聯系在一起，導致他無法回到聯邦德國的正常生活，真有可能一切回歸正軌。

然而不管艾希曼再怎么對現實視而不見，“給聯邦總理的公開信”這個計劃無疑顯示出，無論艾希曼還是他身邊的那些人，都不只是借此消磨阿根廷流亡生活中的無聊周末時光而已。他們每一個人，包括艾希曼在內，都有著明確的政治野心。他們希望有所行動，并非只是埋頭故紙堆或者伏案辦公桌前默默地工作，而是要返回歐洲，參與到聯邦德國的日常政治中。從遠處看仿佛純屬瘋狂的盤算，卻是基于艾希曼的生活經驗：15年以前，他所提出的草案和建議能夠直通黨衛隊全國領袖希姆萊，甚至經由該人一路上傳到希特勒。赫爾曼·戈林與萊因哈德·海德里希都曾根據艾希曼的草案發表講話和演說[[80]](#_80_5)，艾希曼自己則因中央辦公室、再教育營地、死亡行軍等新措施的示范嘗試，用他的方法在世界歷史上留下了印記。艾希曼與他的上司們一起，推行了所有這些超出文明世界想象的兇殘計劃。難怪這名退休的一級突擊大隊長有信心通過這種歷史概述，在聯邦總理府實現類似的事情。況且他所提供的草案正是許多德國人真正渴望的：把那個煩人的罪責問題一筆勾銷。理論上講，由局內人對納粹猶太政策做出簡明扼要的解釋，是一個有趣的提議。信念相近的老同志們不只存在于阿根廷一國。因此驅使艾希曼動筆的一281個誘因，或許就是通過挑釁促成自己回到德國的機會，而且有相同信念的朋友們說不定還會歡迎他重返故土。畢竟艾希曼非常清楚地知道，即使在德國政府內部，也有少數人認為他的想法和那名前任“猶太事務主管”一樣，既熟悉又誘人。

### 那么道德呢？

自我保護的本能強過一切所謂的道德要求。

——艾希曼，1956年[[81]](#_81_5)

艾希曼在第二部分“客觀而清楚”——實則完全是粉飾和誤導——地闡明其所謂“圓融”的歷史圖景之后，就按照事先聲明的轉向了一個與“今日”——也就是1945年之后——密切相關的問題。顯然，這是一個從前不曾有人提出過的問題。艾希曼問道：“有罪還是無罪？”[[82]](#_82_5)任何熟悉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自我描述的人，都會期待在關于阿根廷這章里，看到徒勞的自憐自艾和對昔日上司傷心的幻滅。這名被告曾在耶路撒冷沒完沒了地試圖向全世界——當然也向他自己——解釋，為什么盡管他從一開始就表示反對，卻眼睜睜看著那些苦難發生，并親自參與其中。但令人驚訝的是，艾希曼在阿根廷講的與此截然不同。在《其他人都講過了，現在我想說話！》這一章節，艾希曼以明顯帶有指責的語氣和煽動者的自信，向我們展現了他那不容辯駁的真理。

\*\*\*

阿道夫·艾希曼出身一個中產階級家庭，雖然國家社會主義思想在那里也占了上風，但他還是對傳統中產階級價值觀和一般道德觀念有著足夠的了解，知道絕大多數人會譴責他的所作所為。艾希曼當然也知道“道德”、“良心”、“正義”等概念，并且不想忽視與這些概念有關的基本問題。艾希曼的言論顯示，他自己對世界觀的要求沒有那么低，遠非粗淺的國家社會主義思想要素所能滿足。以色列法庭的心理學家什洛莫·庫爾恰爾后來出于其他理由，推斷艾希曼的個性使他完全不可能無條件臣服于任何既定的機制。事實上，艾希曼的文稿也證實，他對國家社會主義的價值判斷范疇進行了反思，并使之適應他自己的想法。例如，1956年當他還是自由身的時候，便不想只是鸚鵡學舌地跟著重復“可恥的凡爾賽條約”那種流行說法。按照該論調，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不平等和約實乃萬惡之源，最后把群眾帶向了國家社會主義。艾希曼試圖與之區分：“或許我已經追隨了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然后才真正體會和理解了凡爾賽的恥辱。”他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選擇了這條政治路線，事后回看，國家社會主義為他提供了一種理解：“在某種程度上，那變成了超級民族主義。”[[83]](#_83_5)這不是唯一一次艾希曼重塑國家社會主義世界觀，使之成為自己的觀點。

艾希曼在這一部分的開頭，立即向我們表明了其關于個人罪責問題的答案：“我完全不必擺出比拉多（Pontius Pilatus）[\*](#_445)那樣的姿態就可以宣布，我在法律面前和我自己的良知面前都沒有罪，因此戰爭期間作為我下屬的那些人也沒有罪。因為我們全部……都是帝國保安總局機器上的小齒輪，從而在當時成為戰爭那個殺人機器的巨大傳動系統里面的小齒輪。”[[84]](#_84_5)“不論在我方還是敵方”，約束所有人的效忠誓言都“成為個體之最高義務”，因此是人人必須服從的規范。[[85]](#_85_5)畢竟全世界的指揮官都只下達一道命令：“消滅敵人。”[[86]](#_86_5)對艾希曼來說，這是一場旨在消滅敵人的全球性總體戰的說法是一個事實。那源自激進的生物主義，嚴格說來更像是一種對“最終勝利”的信念，認為一場各種族彼此對抗的戰爭必不可免，而且最后只有一個種族會勝出。

艾希曼自己提出了“那么道德呢？”（Und die Moral?）這個問題，而他給出的回答驚人地挑釁：“道德價值觀有許多種，有基督徒道德觀、倫理道德觀、戰爭道德觀、戰斗道德觀。到底哪一種才對？”艾希曼接著運用熟練的修辭技巧，徹底顛覆了哲學的提問方式，而且還援引哲學家支持他的論證。首先，道德與權力的相對重要性究竟為何？連蘇格拉底自己，在接受死刑判決之際，不也必須服從法律和命令嗎？“蘇格拉底的智慧必須服從國家的法律，這是人文主義者教導我們的事情。”人文主義者指的正是被國家社會主義思想斥為軟弱無能的思想家們——靠那些人是不可能打勝仗的，因為他們拒絕承認戰爭的必然性。艾希曼接著解釋說，國家領導人的地位始終凌駕于個人思想之上。為了說明這一點，他同時引證了《舊約》和現代科學：甚至教會都承認國家權力是地球上的最高準則，連蟻丘之內都有等級制度。只有在面對“尼采和康德這樣的思想家是否支持他的論證”這個問題時，艾希曼才陷入了窘境。他們二人是否“具有明確的德意志屬性”？“我對此表示懷疑”，艾希曼繼續答道，他用一句話概括了國家社會主義對各種學術思想的根本不信任（Urmisstrauen）：“我的意思是，哲學是國際化的。”[[87]](#_87_5)因此，艾希曼在接下來尋找答案時寧愿不考慮他們二人：個人的“內在道德”[[88]](#_88_5)固然好之又好，但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仍然只是國家領導人的意志。原因不僅在于他有權強迫人們服從，更因為只有他代表人民行事。所以個人不可以讓自己的內在道德與所接受的命令產生沖突，而應該看清這些命令是為了民族的大義，并且信念堅定地執行命令。他，艾希曼，已經毫不費力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很容易就可以在大自然中找到與我類似的情況。因為即使我的思考和探索對于政府的意志和目標可能最終會產生負面的影響，但宣誓效忠并不禁止個人固執己見（！）的想法——盡管個人的想法本應居于次要地位。但我越是關注自然界發生的事件，無論是微觀世界還是宏觀世界，我在政府的要求中看到的不公不義就越少。這不但適用于我所屬民族的政府向百姓提出的要求……就連我們昔日敵國政府及其領導人所設立的目標也是一樣。每個人從他自己的立場來看其實都是對的。”[[89]](#_89_5)換言之，每個人都想要總體戰，而這一事實為每個使用一切“常規和非常規”手段發動總體戰的人提供了合法化的理由。[[90]](#_90_5)一場全面毀滅戰爭的想法也釋放出了肆無忌憚的暴力思維。包括死亡集中營在內的任何構想，都因為“一切有機生命所面臨的永恒、持久的嚴酷命運”，搖身一變成為必要的創造性戰爭手段。艾希曼可以毫不困難地認同這種詮釋方式，更重要的是，他能夠全無滯礙地把它看成自己行為的理想框架。具有“國際性”的不再是思想或道德，而僅剩下戰爭狀態。勝利只能是民族的，只有明白這一點的人才能在戰斗中存活下來。

在以色列時，艾希曼告訴震驚不已的聽眾，自己一輩子都把康德的“絕對律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奉為圭臬。艾希曼一本正經地表示“我相信康德”[[91]](#_91_5)，只可惜所接受的命令讓他無法一直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在進一步追問之下，他甚至為“絕對律令”提出了一個差強人意的定義，并極力贊揚其所蘊涵的智慧。[[92]](#_92_5)1956年，當艾希曼還是自由之身的時候，事情聽起來卻迥然不同。[[93]](#_93_5)艾希曼寫道：“自我保護的本能強過一切所謂的[！]道德要求。”[[94]](#_94_6)一旦意識到那不過是輕率的謬論，還有誰會愿意聽從康德所勸勉的個人責任和普遍人性律令那種國際觀點呢？“從哥白尼和伽利略之前的地球世界觀，到今日智人（homo sapiens）的超銀河世界觀，法律都創造并要求人們遵守秩序，只有病人和頹廢者是例外。”[[95]](#_95_5)這種創造秩序、摧毀病態和“頹廢”的法律，與人文主義理想或其他軟弱無力作風絲毫沒有關聯。“我必須服從，這樣大我和大我之中的小我才能夠活下去。正是這樣的想法促使我聽信并服從。”[[96]](#_96_6)幾周之后，艾希曼在薩森訪談會上把任何良心的沖突都形容成“方便的謊言”：若有誰在事后，也就是在環境改變之后，宣稱自己當初只是按照命令行事，“那都是便宜的廢話，不過是一個借口”。[[97]](#_97_6)而人道主義的觀點呢？那只不過是幫助人們“舒服地躲在規定、命令和法條的后面”罷了。[[98]](#_98_5)

艾希曼徹底摒棄了傳統的價值觀，而主張自然所要求的不擇手段的命運斗爭。他完全在這種思維方式的框架內打轉，認為任何忽略了“血與土”的想法不僅已經過時，而且非常危險。人類社會共生的主導原則并非理性、公義和自由，因為在艾希曼和他的元首看來，光是全人類能夠取得共識的想法就是一種背叛。一方面，德國人獲得的優勢力量來自他們的種族，另一方面，世界沒有足夠的空間容納所有人。種族之間的斗爭在本質上是對資源的斗爭——今天許多談論石油和飲水分配將在未來引發戰爭的人，都不會對此基本觀點感到陌生。然而艾希曼未曾考慮到的是，即便人們有這樣的想法，仍有可能共同找到解決辦法。對他來說，唯一重要的就只有自己的民族。“能夠幫助自己民族的事情才是正確的事情”[[99]](#_99_5)，凡是不屬于本民族的人就不享有任何權利。從這種觀點來看，古典意義的哲學，即搜尋超越文化的律令和全世界的基本信仰，正好走上了歧途，因為它非但不承認個體對民族的依賴，反而還尋求普世的價值。艾希曼非常正確地看出，此種意義的哲學基本上是以“國際化”為取向的。因此，哲學沒有祖國，但是——意識到這一方面至關重要——納粹意識形態下的哲學完全具有民族性。根據納粹意識形態和希特勒的煽動演說，有一個“種族”沒有自己的祖國，推崇精神上的無限自由，并且積極在國際上采取行動，那就是猶太人。一本典型的納粹出版物指出：“猶太知識階層脫離了其扎根的土壤，使自己成為無根的存在。”尤有甚者，其思維方式“撕裂了德國社會、侵蝕了德國人的生活”，因為它不是一個“以種族為本的思想”。[[100]](#_100_5)只有以種族為本的思想才能夠建立民族性格，而人道主義空談只會混淆和削弱民族性。這種世界觀認為，唯一可能的生存之道就是回歸到“血與土”之上，任何國際化的做法都被異化成最終的威脅，因此必須在其著眼于全人類的道德理念摧毀民族主義觀點、破壞德國人的防御力量之前，及早鏟除此一隱憂大患。或者就像納粹黨人種政策局負責人在1939年明確表達的：“根本不可能與任何具有國際性質的思想體系達成一致，因為它們實際上既不真實也不誠實，而是完全根植于一個巨大的謊言，亦即人人平等的謊言。”[[101]](#_101_5)在阿根廷，艾希曼無疑讓人看出，他以這種思維模式為依歸。

在耶路撒冷，艾希曼談論哲學和哲學家時完全不同，尤其是康德，艾希曼宣稱康德一直為他的思考提供了指引。這樣的話居然出自一名大屠殺兇手的口中，實在讓人有些難以接受。盡管艾希曼確實表現出對康德基本道德觀念相當豐富的了解，但在1961年出庭期間，他對哲學和國家社會主義的看法還是遭到審判觀察者的嘲諷。漢娜·阿倫特描寫了艾希曼“相當有限的才智”，以及他在哲學層面對“服從”這個問題只有“模糊的看法”。[[102]](#_102_6)歷史學家和其他人追隨她的腳步，將艾希曼的各種言論斥為自相矛盾的胡言亂語和偽哲學，只是勾起好奇的次要現象。然而，這種態度不僅草率，而且危險。阿倫特自己的判斷根據，其實只是艾希曼在審訊時的供詞和在審判期間發表的一些陳述，而對艾希曼在這方面發表的長篇大論并無所知。她既不知道艾希曼在以色列用文字詳細闡述了自己“對康德的偏好”，也不清楚艾希曼與激進神學家威廉·赫爾（William L. Hull）就宗教哲學進行的辯論。不像我們現在，這些文件以及其他一手資料都是審判觀察者接觸不到的。因此阿倫特根本不可能知道，艾希曼在法庭上的總結陳詞本打算幾乎完全以康德為依據，直到他的律師勸他打消這個念頭。[[103]](#_103_5)阿倫特正確觀察到，艾希曼刻意擺出哲學學習者的姿態。她只不過是得出了錯誤的結論，認為擺出這種姿態主要是出于浮夸的虛榮心，以及欠缺推理能力和哲學知識。一個本身從事哲學的人，通常不愿接受會有人熟悉哲學基本知識卻不愿遵從它的指引，這也使得漢娜·阿倫特認為除此之外艾希曼的行為別無其他解釋。然而以色列的記錄已經顯示，艾希曼其實能夠提出有力的論證。阿夫納·萊斯花了將近300個小時審訊艾希曼，形容他是“一個自學有成的人，知識淵博、非常聰明、非常有技巧……他總是仔細觀察我的詢問方式，并相應地調整自己的回答”。[[104]](#_104_6)艾希曼所熟悉的哲學思想絕非通識教育所覆蓋的。除了康德、尼采和柏拉圖之外，他還提到了叔本華，甚至還有斯賓諾莎那位最偉大的猶太哲學家。艾希曼曾在牢房里和一個務必要勸他皈依正確信仰的原教旨主義基督徒辯論宗教哲學的原則。他時而甚至展現出非常過人的論辯能力，以致那位神學家忍不住激動地大聲喊道：“假如您堅持了孩提時代的信仰，而沒有涉獵斯賓諾莎和康德哲學思想，那么現在本可以過著幸福正常的生活。”[[105]](#_105_5)宗教在開明國家被視為私事，所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不必隱瞞自己的想法，更何況這場宗教辯論是在審判結束之后才開始的。與撰文討論罪責問題時不同，艾希曼在此不必充滿策略地思考以防說漏了嘴。與阿根廷文稿進行比對后可以發現，如果艾希曼在其他文字中顯得比較謹慎和木訥，那主要是因為他在以色列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為了設法隱藏他自己顯然真實存在的思維體系，并在人人面前偽裝成一個人文主義者、慈悲為懷者和哲學崇拜者，亦即他當初掌權時企圖消滅的對象。只不過他沒有太多機會來演練這樣的角色。

認真傾聽和分析阿道夫·艾希曼那種人大放厥詞談論哲學思想，的確是一件強人所難的苦差事。但這也給了我們一個難得的機會，得以窺見他在耶路撒冷帷幕后的情況。艾希曼的真實想法可以在“阿根廷文稿”中找到。那是一種了無生氣的哲學，充斥著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則，因為只有民族主義的思維才可能在所有生物的戰斗中取得最終勝利。如果將之斥為“偽哲學”，則不僅不能糾正這種不允許自由、只講純粹自然因果關系，以及把啟蒙運動一筆勾銷、讓科學擺脫道德要求的教條的危險，更容易使我們自己被指責過于理想化哲學，以致未能看見它也有走上危險歧途的可能。而帶來這種危險的人，則遠不只是艾希曼那樣穿著黨衛隊制服的業余愛好者。1933年時有個人說：“我們已經擺脫了對一種沒有土壤、沒有力量的思想的盲目崇拜。我們看見了從屬于它的那種哲學的終結……”說這話的人非但鼓吹“民族的科學”，并且將“一個民族的精神世界”形容成“在最深處維護民族源自土與血的元氣、從最內在激勵人心和從最深遠處震動民族存在的力量”。這個人叫作馬丁·海德格爾。[[106]](#_106_5)阿道夫·艾希曼甚至對這個名字也不陌生。在被處決之前不久，他曾請弟弟協助弄清這位德國哲學家對“臨終傅油圣事”（Sterbesakramente）的看法：“我絕對無意自抬身價，自比成這位偉大的思想家，然而此事對我與基督教義的關系卻非常重要。”[[107]](#_107_5)不知道海德格爾到底給出了什么樣的答案。

\*\*\*

對艾希曼而言，世界觀絕非閑暇的娛樂或理論上的多余枝蔓，而是對他所作所為的重要許可。因此解釋、傳播和落實世界觀的工作，從一開始就是掌握權力的一種手段。艾希曼想要權力，但既不是通過專橫的行動和猖狂的侵犯，亦不是憑借制服或命令，而是經由一套思想和價值體系的合理化，讓其所作所為看上去是“正確的事情”。他所想要的就是自我授權，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但事情并沒有因此變得更簡單，因為他的合法化理論并不只是遵從了慣用的納粹口號。艾希曼1956年的文稿中提出的國家社會主義世界觀，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明顯不同于其他國家社會主義者。與試圖把所有德國名人都為納粹所用的阿爾弗雷德·羅森貝格（Alfred Rosenberg）和官方宣傳不同，艾希曼并不認為康德這位大思想家可以被簡單地納入新的“德意志思維”之中。艾希曼并不贊同羅森貝格那個自封的第三帝國思想領袖所說的，“絕對律令”意味著“按照你的本性過生活，捍衛你自己種族的價值觀”[[108]](#_108_5)，而是相當清楚地意識到，康德的學說，或者其他任何哲學，根本無法與種族生物斗爭相調和。對艾希曼來說，康德同樣代表著“所謂的”道德要求，只會讓滅絕政策的執行變得困難重重，因為那種要求不是“民族的”，而是“國際的”。這表明了艾希曼多么始終如一地堅持國家社會主義，更顯示出他一直多么渴望掌握絕對權力。原教旨主義思想的力量遠遠超過了上級命令，因為即使在昔日的上司們已經死亡殆盡，而他自己身處阿根廷的一間兔子養殖場時，那種權力仍然繼續有效。從這方面來看，西蒙·維森塔爾的看法就大錯特錯了。他認為，倘若有人命令艾希曼迫害紅頭發或藍眼睛的人，他也會同樣狂熱地那么做，因為艾希曼已經沉溺于極權思想，所以很容易接受極權制度。其實最蔑視人性的世界觀同樣可能極具吸引力，只要一個人恰好是對之大肆宣揚的“優等民族”的一員，并且可以用它合法化一切受到傳統正義和道德觀譴責的行為。艾希曼固然打算自行其是，但他更希望能夠得到認可，承認他做了正確的事。他之所以如此執著不休地談論自己的世界觀，正是因為有這種“彌賽亞般”的傾向。

艾希曼一直把希望寄托于“未來的世代”，并且不厭其煩地一再重申。他想要改變他們的想法，即便那只是為了避免他們和“那些還沒有真正理解國家社會主義、還在被外國勢力牽著鼻子走的人”一樣，對他做出指責。對于相信種族最終決戰的人來說，只要還有一個敵人活著，這場戰斗就不可能成為過去。由于艾希曼成天待在農場的數千只雞和兔子中間，不再有多少機會從肉體上消滅敵人，能做的只有致力于反對他所認為的猶太“精神教育”。于是1956年的時候，艾希曼重新回到他在30年代初期開始的陣地，展開了“對抗世界觀敵人的戰斗”（weltanschaulicher Gegnerkampf）。他希望以“常規和非常規的手段”，打贏這場爭奪解釋權的戰斗。他所炮制的大量文字無疑展現了自我辯解的迫切需求，但至少同樣顯示出煽動性的意圖，想要用具有說服力的言辭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別人。這種意圖也起源自種族理論的封閉性。嚴格說來，在一個封閉體系內，強有力的論據無異于“論據暴力”，而艾希曼在銷聲匿跡狀態下所懷念不已的，顯然正是用暴力操縱別人的機會。

1960年以前，艾希曼認為“所謂的”道德要求只不過是敵人扔進你眼睛里的危險沙子，用來削弱你的戰斗力。等到他被關在以色列監獄里的時候，這種沙子卻開始變得大有用處。為了避免被要求為他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負責，艾希曼于是也想用這種障眼法遮蓋別人的清晰視線。他毫不猶豫地擺出一副康德崇拜者的模樣，也同樣肆無忌憚地說謊。當以色列法庭的心理學家向他問起般雀·比拉多[\*](#_446)的時候，這個在1956年還“完全沒有擺出比拉多姿態”宣稱自己無罪的人，卻友善地表達了感謝之意，因為他從未想過把自己和那位歷史人物相比。艾希曼興奮地喊道：“我的情況正是如此！比拉多在洗手時表示，自己并不認同那樣的行動，而是被迫為之。如果我有資格與這樣一位偉大的歷史人物相提并論的話，他的處境正好跟我的一模一樣。”[[109]](#_109_5)當艾希曼有求于別人的時候，他總是巧舌如簧，說得人們就范，直到為時已晚。即使當艾希曼只是寫作時，我們也萬萬不可低估他不擇手段來操縱別人從而獲得權力的意愿。

1956年，在《其他人都講過了，現在我想說話！》中，艾希曼公開表達了對自己忍受戰斗“冰冷的合法性”所表現出的意志力的驕傲：面對戰斗“顫抖地聽天由命”[[110]](#_110_5)，不但認同了戰斗法則，更進而領悟了其自成一格的“熱忱”。弗里茨·卡恩在《原子》（Das Atom）一書中談到了艾希曼在其書稿里使用的“宏觀世界”和“微觀世界”等概念。艾希曼在自己的那一本《原子》上批注道：“我在精神上‘吸收’了這本書和其他相關書籍，并發現了對國家社會主義‘神的信仰’（Gottgläubigkeit）的奇妙確認。”那種“信仰”“發乎內心、十分自然，而且一直生氣勃勃”。[[111]](#_111_5)“對神的虔誠信仰”于是成為必不可免的種族最終決戰所信奉的教義，進而為種族屠殺以及民族內部的“篩選”——亦即艾希曼同樣毫無保留地支持的“安樂死”計劃[[112]](#_112_5)——提供了理論基礎。任何想要罔顧一切地排斥和消滅他人的人，都必須充滿了對生命懷有敵意的念頭，以免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有多么卑劣。艾希曼就是這種情況。

世界觀不僅意味著權力，同時更是一種宗教，在兇手自己都對罪行感到驚恐的時候帶來安慰。按照艾希曼的看法，唯一的希望寄托就是“在自然界中找到或許能夠通往慰藉的路徑”。[[113]](#_113_6)從魯道夫·赫斯的札記中即可看出，艾希曼并非唯一有此想法的人。那名昔日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指揮官回憶道：“1942年春天，在農莊花開正艷的果樹下，數以百計年華正茂的人不疑有他地走向毒氣室，走向死亡。這種生長與消逝并存的畫面，直到現在都還清楚地浮現于我的眼前。”[[114]](#_114_5)想到這種生長與消逝并存的永恒循環，讓數百萬人的毀滅變成了一個自然事件，兇手本身則儼然成為一種自然力量，變成了自然法則的執行者。根據這種法則，參與屠殺的兇手們非但沒有永遠遭到正直人類社會的唾棄，反而通過他們的行為證明了自己是民族共同體的一員。對此的任何懷疑都是“一種感情用事的道德觀的殘余”，可以通過對自然法則的省思來克服。在后來的文章中，特別是他在以色列寫下的內容涉及最廣的《偶像》草稿當中，艾希曼舉出了具體的實例，說明他如何通過這種方式尋求慰藉。在白天前往奧斯維辛集中營視察的行程之所以變得可以忍受，是因為艾希曼的勤務兵會準時在傍晚現身，開車載著這名勇敢的猶太人問題專家離開，以便準時參加他自己的“宗教活動”，讓謀殺行為充滿“天經地義”的味道。“一級突擊大隊長先生，太陽在15分鐘以后就要下山了！”[[115]](#_115_5)

與我們所期望的不同，艾希曼面對獨處完全沒有問題。在阿爾騰薩爾茨科特、在圖庫曼、在阿根廷的彭巴草原，他都很享受遼闊的空間、在陽臺上獨酌葡萄酒，以及獨自騎馬馳騁原野的樂趣。對他來說，大自然的美學絕不至于引發道德上的反思。恰恰相反，盡管我們只會把他的行為看成對文明不可饒恕的冒犯，但他卻在自然之美中看到了對其行為的反映和認可。當初本可以把這個人囚禁好幾十年，從而避免他的自言自語像今天這樣引起讀者反感。我們很容易聳聳肩膀，對那種毫無依據的胡謅不屑一顧，因為它毫無疑問就像所有教條一般，終究只是拙劣的哲學罷了。但實際上正是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思想邏輯架構，為歷史上最高效的大屠殺兇手之一提供了內在的支持，而我們無法僅通過理性思考就動搖它。

### 老罪犯與新戰士

我根本不會做出懺悔。

——艾希曼，1956年[[116]](#_116_6)

1945年5月，艾希曼顯然已經非常清楚地意識到，許多人并不認同他的思維方式，而且在獲悉更多關于猶太人大屠殺的細節之后會感到驚駭不已。他的名字跟這個問題聯系得過于密切，以至于若不說出究竟是誰必須為這一切負責，就根本不可能全身而退，甚至在自己家中也一樣。在1962年接受采訪時，薇拉·艾希曼回想起丈夫當初轉入地下之前的臨別話語：“‘薇拉，我只想告訴你一件事，我的良心和雙手都是干凈的。我沒有殺過任何猶太人，也沒有下過任何命令殺人。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然后他用孩子的性命向我發誓，就是這樣。”[[117]](#_117_5)艾希曼還像念咒語一般再三重復這個保證。可是對他在1956年計劃撰寫的那本書而言，光是強調自己“良心干凈”似乎還嫌不夠。艾希曼繼續補充了兩個解釋：“其次，敵對各方都不是溫順的羔羊，因此不能說只有德國人是壞人。第三，難道我就是這個血腥的最終解決方案之罪魁禍首嗎？”[[118]](#_118_5)艾希曼寫到這里就收不了筆了，他還必須向讀者說明誰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哪些人是大屠殺真正的罪魁禍首，以及誰應該成為處決這批罪犯的行刑人。

“罪魁禍首”這個問題的答案不會讓任何人感到意外。艾希曼解釋說，罪魁禍首是從一開始就躲在入侵波蘭行動背后的那個戰爭販子。“若非一些在經濟上嫉妒德意志民族的人硬是想挑起戰爭，德國對波蘭之戰原本完全沒有必要。”[[119]](#_119_6)畢竟“波蘭肯定不想打那場仗，而德國同樣也不想。”兩個民族都是這個“經濟嫉妒者”（Wirtschaftsneider）的無辜受害者，那個人“進一步醞釀了戰爭”并“導致戰爭爆發”。若有人對這里所說的是誰還存有疑問的話，可以在艾希曼的文章中讀到：“散居全球各地的猶太人的代言人、住在倫敦的猶太復國主義領袖哈伊姆·魏茨曼博士”，阻撓德國與波蘭之間取得任何諒解，以便“用猶太人的名義向德意志民族宣戰”。艾希曼隨即重申了納粹最大的宣傳謊言之一：希特勒只是出于這個原因才宣布，即將到來的戰爭將意味著猶太種族的滅亡。艾希曼繼續道：“好吧，今天我們知道，他在這里可是大錯特錯了。”[[120]](#_120_5)那名昔日的猶太事務主管接著告訴我們，猶太人僅承受了相當微小的犧牲，就借此獲得了“民族獨立”。德國人卻是真正的受害者，光陣亡就有700萬人，戰后被驅逐期間又有數百萬人被殺害。艾希曼一連控訴了三次：“德國人是受害者”，卻沒有人將謀殺兇手繩之以法。艾希曼怒不可遏地寫道：“是啊，真是天殺的！給這批戰犯和危害人類罪犯的絞刑架如今又在哪里呢？”[[121]](#_121_6)總之由此可見，紐倫堡審判并沒有為促進和平做出任何貢獻，舊日的侵略者仍然一再繼續發動新的戰爭。

死硬的反猶太主義者阿道夫·艾希曼寫下他的國際集體罪責理論之后，仍然覺得意猶未盡。對他來說，淡化自己的謀殺統計數字，把死亡集中營的遇害人數跟士兵陣亡總數相提并論還嫌不夠，艾希曼再次把猶太人描述為全部有罪者當中罪孽最深重、躲在一切壞事背后的作惡者。帶著自己看法得到證實后的那種勝利感，艾希曼談到了蘇伊士運河危機：

當我們這樣的人還在絞盡腦汁，想弄清楚自己是否——若然，則在多大程度上——幫助促成了那場真正該死的戰爭時，當前發生的事件卻把我們擊倒，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因為以色列的刺刀剛剛侵犯了從沉睡中驚醒的埃及人民。吐著火焰的以色列坦克和裝甲車撕裂西奈半島，空軍中隊朝著平靜的埃及村莊和城鎮投擲炸彈。此乃1945年以后的第二次入侵行動……這里誰是侵略者？誰才是戰爭罪犯？[[122]](#_122_5)

猶太問題專家艾希曼以從來不曾為其受害者表達過的悲憤激情，打造了一個新的聯盟：“受害者是埃及人、是阿拉伯人、是穆罕默德的信徒。阿蒙（Amon）[\*](#_447)和安拉，我擔心效仿1945年對德國人采取的先例，禰的埃及子民將被迫贖罪，向所有以色列人、向危害阿拉伯各民族的頭號侵略者與頭號戰爭罪犯、向中東地區的頭號危害人類罪犯、向穆斯林的謀殺者贖罪。如我所說，禰的埃及子民將不得不贖罪，因為他們竟然厚顏無恥地想要生活在自己祖先留下來的土地上。”德國人清楚地知道他們為什么會把猶太人視為最大的敵人，必須加以消滅。德國人從一開始就是對的：“大家都知道，為什么從中世紀以來，猶太人與其東道主民族德國人之間便不斷產生齟齬。”[[123]](#_123_5)所以他，阿道夫·艾希曼，沒有做錯任何事情。猶太人從一開始就有罪，而阿道夫·希特勒正確地看出了這一點。

那個后來在以色列聲稱自己一直只是違心地奉命行事的人，在1956年寫作的文稿卻符合所有最惡劣煽動文學的定義。當時距離全面戰敗已經過了11年，盡管艾希曼親身經歷過種族屠殺的各種可怕細節，但同樣的仇恨依舊在他心中燃燒，照舊毫不妥協地抱持著永久戰爭的理論。正因為世界上大多數人還不明白這個道理，像他這樣的人才只能用假名生活在世界的另一頭，而非在德國領取養老金并被稱贊為英雄。至于那些為自己信念而死的人就更不用提了。艾希曼解釋，是救贖的激情促使他再度走出隱姓埋名的狀態：“我和昔日的同志們不一樣，我還能夠講話而且現在必須講話。我要向世人大聲疾呼：我們德國人也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而已，我們沒有罪！”[[124]](#_124_5)在對公平正義的呼喚背后，從一開始便隱藏著典型納粹意義的“各得其所”（Jedem das Seine）：根據“猶太世界陰謀”的教條，唯一可想象的“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辦法”就是“徹底消滅”。在阿根廷的艾希曼不想懺悔，原因并不是他在交叉審訊時所宣稱的，懺悔是小孩子才會做的[[125]](#_125_5)，根本毫無用處，而是因為艾希曼想讓自己的孩子看到與他們父親的罪孽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在艾希曼對中東所發生事件的吹噓中，除了確證舊的怨恨之外，另有一件截然不同的事情也在起作用。一如既往，艾希曼立刻在當前的政治事件中發現了自己的優勢所在。假如他自愿出庭受審，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事先確定將獲得輕判。艾希曼堅持認為，他只會“因為政治理由”才被宣判有罪，因為案件事實使有罪判決“按照國際法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正因為如此，“我永遠不會承認的那種有罪判決”只不過是“荒謬”、“蠻橫”的。但艾希曼隨即坦白說出了心中的盤算：然而他相當懷疑，自己“是否能在所謂的西方文化中獲得正義對待。真正的原因恐怕在于，被西方主流思想奉為圭臬的基督教《圣經》里面——這一次是在《新約》（約翰……[[126]](#_126_5)）——已經明確表明，所有神圣的事物都來自猶太人”。在阿拉伯世界，那又會是什么模樣呢？不，他絕對不會把自己交給一個德國法庭或者國際法庭。西方世界仍然懵懂不清，而基督教義在他眼中已徹頭徹尾遭到猶太人的腐蝕。因此艾希曼試著至少象征性地求助于他整份書稿的訴求對象，那個意外發現的、“有千百萬朋友的大圈子”。[[127]](#_127_5)他寫道：“但是你們，3.6億穆罕默德的信徒，自我結識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以來，就和你們有著非常強烈的內在聯系。你們從《古蘭經》的章節中發現了更多真理，我請求你們對我做出判決。真主安拉的子民，你們比西方更早認識猶太人，而且對他們了解得更清楚。愿你們偉大的穆夫提和律法學家們齊聚公堂，至少象征性地對我做出判決。”[[128]](#_128_5)1956年，依然被許多人懷疑藏身中東的艾希曼，至少“象征性地”在阿拉伯文化圈尋求救贖，而且他以為那里和猶太教一樣，也是一個如磐石般不可分割的整體。艾希曼認為自己在那里至少不必像日后在以色列那樣，假裝回心轉意，而是能夠公開并且自豪地作為一級突擊大隊長艾希曼，以及一個毫不通融的反猶太主義者。1960年的事情尤其清楚地顯示出，艾希曼曾何等坦率地熱情談論他與阿拉伯人所謂的深厚友誼：艾希曼的綁架令家人對他的二兒子擔心不已。警方的報告指出：“由于霍斯特很容易情緒用事，艾希曼一家擔心他獲悉父親的命運后，很可能自愿投效阿拉伯人，參與打擊以色列的行動。”[[129]](#_129_5)那位父親顯然已經告訴了孩子們，哪里可以找到他的新戰斗力量。

在阿根廷，寄望于阿拉伯人的并不只有艾希曼。《路徑》在出版的最后一年，也把重心轉移到中東：它在1956-1957年公開發表親伊斯蘭的言辭，并且毫不掩飾對埃及總統納賽爾（Nasser）的同情。然而人們忍不住會覺得，這個新的取向看起來更像是絕望中抓住一根稻草，而非基于某種政治理念。但布宜諾斯艾利斯與中東之間確實存在著具體的聯系。約翰·馮·萊斯已經在開羅生活了一年多，不但改宗伊斯蘭教，而且寫下了新皈依者的各種狂熱言論。這不可避免地讓他開始疏離了包括《國族歐洲》編輯部在內的聯邦德國右翼民族主義圈子，而且影響不僅限于德國境內。盡管如此，流亡阿根廷的納粹黨人也聽到了有關昔日黨衛隊及保安局同僚們在埃及開拓新事業的傳言。那些人的名字甚至還出現在報紙上，其中也包括利奧波德·馮·米爾登施泰因——當初他在調任宣傳部主管之前把艾希曼帶進了猶太事務部門，如今在一家阿拉伯廣播電臺大吹大擂，甚至美國中情局都對他產生了興趣。[[130]](#_130_5)此外在阿根廷偶爾也能遇見一些去過中東的昔日同志。例如曾為帝國保安總局搞出毒氣卡車的專家瓦爾特·勞夫，客居敘利亞之后曾在1950年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待過好幾個月，然后才前往智利安家落戶，而艾希曼顯然對此所知甚詳。[[131]](#_131_5)但就連奧托·斯科爾策尼那個自賣自夸的破壞英雄，想必也曾吹噓過自己在中東的工作。據推測艾希曼在中東也有自己的聯系人，特別是已經在大馬士革工商業界打響了名號的阿洛伊斯·布倫納，亦即被艾希曼譽為“我最好的伙計”的那名昔日同僚。從艾希曼關于布倫納的各種言論可以看出，他清楚知道布倫納還活得好好的——但假如艾希曼知道他最好的伙計正在為西德情報部門工作的話，恐怕就不會那么開心了。艾希曼昔日外交部的一位同僚也有類似情況：弗朗茨·拉德馬赫[\*](#_448)在臨審判之前，于1952年公然逃往中東地區。可是艾希曼談起那個人就一肚子氣，因為拉德馬赫曾在紐倫堡出示一份昔日的電話記錄，上面寫著一個非常危險的句子：“艾希曼建議槍斃他們！”[[132]](#_132_5)

盡管有那些私人關系，但沒有跡象表明艾希曼、弗里奇或薩森曾認真考慮過自己也移居中東。他們離不開德國式的環境，因此搬去一個截然不同的文化的念頭只能停留在空想階段。布宜諾斯艾利斯至少還有大型德國移民社區，有他們自己的餐館和商店，而且在阿根廷的生活并沒有那么不舒服。中東的想法之所以還具有吸引力，是因為聯邦德國的政治形勢并沒有按照他們預期的發展，或許也因為他們需要為其粗暴的世界觀找到一塊共鳴的空間，而非只是感覺自己待在世界的另一端，困守著一個不再有人問津的理論。艾希曼非但不愿悔改，反而還想得到掌聲。但最重要的是，他還希望能夠從“阿拉伯朋友們”那里獲得一些完全不同的東西，亦即繼續他對抗猶太人、對抗永遠的“主要戰爭罪犯”和“頭號侵略者”的戰斗。既然艾希曼自己沒有辦法完成其“徹底消滅”的任務，那么穆斯林就應該幫他完成。

### 自圓其說與樂在煽動

艾希曼主義就是一種獨角戲

——什洛莫·庫爾恰爾[[133]](#_133_6)

1957年在薩森家中舉行的討論開始時，艾希曼帶去了自己已寫好的長篇大論。薩森至少讓艾希曼感到，這份手稿頗有可為。薩森讓人盡可能把手稿打字出來，討論的過程更顯示，艾希曼的言論曾經被反復提及，并在薩談訪談會的參與者之間傳閱。人們的反應表明，艾希曼的文稿和其中包含的大量想法給每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一再對此發問。艾希曼想必讓那些曾經聽過他講話的人大吃一驚，因為他表達得言簡意賅、犀利有效，而且有足夠能力駕馭這么一本鴻篇巨制——盡管偶爾會出現海底居民在陸地上流浪的寫法，而且有人被加上了光環，畢竟隱喻并非他的強項。不管怎樣，艾希曼把人們對其作品的反應看作一種激勵，因為他還寫作了其他更多短篇手稿，并且一再為他計劃中的那本書尋找措辭合適的開場白。薇拉·艾希曼經常看到她的丈夫奮筆疾書，后來卻向人保證，自己從來沒有讀過那些文字。由于艾希曼把自己的大部分手稿都留在了薩森家里，她的說法甚至很有可能。但不管怎樣，與這位一家之主往日工作領域有關的話題顯然非常不受歡迎。艾希曼的兒子回憶說，他總是強調：“孩子們，那是在打仗，而我們想要忘記那一切。戰爭就是戰爭。”他常說：“我們生活在和平社會，現在我們不想操心戰爭中曾發生過的事情。”[[134]](#_134_5)但艾希曼自己什么都沒有忘記。他只是不厭其煩地根據所面對的人變換故事版本，使自己敷衍搪塞的策略愈發純熟。薩森向艾希曼提供的每一本書都促使他寫下更多文字，并讓談話伙伴心生不滿地帶著冗長的講稿來到薩森訪談會。因為正如薩森抄本所顯示的那樣，一個照稿宣讀的艾希曼比即興發言的艾希曼更難打斷。

艾希曼偏好的談話形式明顯是獨白，一通不會被別人打斷的演講。在獨白中，他可以不受干擾地闡述對世界自成一格的看法，并沉浸于自己語言的激情之中。審訊時，阿夫納·萊斯也曾在艾希曼簡短發言后觀察到這種效果：“毫不夸張，結果那個人被他自己的話感動得熱淚盈眶。”[[135]](#_135_5)艾希曼之所以有辦法快速寫滿幾百張紙，原因很可能就在于這種獨白式的思想框架。艾希曼的寫作，并不是通過把想法付諸筆端，來建立或檢驗自己的思想框架，而是為了表達他那種極度僵化、早就定型的思路，并且就像其筆跡和聲調所顯示的那樣，恣意對“敵人”展開攻擊。寫作如此便成了他對自己的永久性掩護。

這種訓練將使以色列時的艾希曼從兩個方面獲益。一方面，艾希曼可以用他假裝樂意提供的大量信息，讓調查當局和國家檢察機關應接不暇；另一方面，寫作為他提供了內心的穩定，尤其是在必須寫下與內心動機完全不同的違心之論時。在耶路撒冷，艾希曼寫下的當然不是那個永遠罪孽深重的“主要侵略者”，通過引誘不明就里的希特勒落入圈套，使德國人淪為犧牲品。他關于猶太知識分子天生具有顛覆傾向的思想，都改頭換面成了對法庭的阿諛奉承。艾希曼不過是定期以文稿作為申請函，這一次的角色是樂于招認的模范囚徒。雖然不像在薩森訪談會上那么成功，但新的文稿足以造成混亂。

艾希曼一直寫個不停。他一抵達以色列，就開始寫作自己的回憶錄，一本128頁的生平故事。隨后又針對各種資料、書籍、人物，以及別人向他提出的問題，寫下了大量評論。正如精確記錄在案的審訊過程所顯示的，盡管被迫早睡且每天都排滿了調查詢問，艾希曼依然能夠在耶路撒冷每次審訊之間的空檔毫不費力地寫滿多達80頁文字。針對每一個可能的主題，他都為自己的辯護創作了大量文檔卷宗，以及供新聞界使用的通俗文稿。在交叉審訊和宣布判決之間的空檔，艾希曼為一本大書整理了1000多頁的文字。那本書又是為他辯護的，盡管這次的目標對象是那些聲稱不是他朋友的人。題為《偶像》（Götzen）的這本書讀起來仿佛是對《其他人都講過了，現在我想說話！》的反駁。艾希曼一度考慮將哲學家的信條GnothiSeauton（希臘文的“認識你自己”）用作標題。即使在死刑判決宣布之后，艾希曼也沒有因為震驚而停擺太久。他很快就開始寫滿更多的文字：《我的存在與作為》（Mein Sein und Tun）、感想集《即使在這里面對著絞刑架》（Auch hier im Angesicht des Galgens）、信件、采訪回答，以及關于宗教哲學的文稿。他寫了又寫，名副其實地死而后已——當人家把他帶去處決的時候，艾希曼還在寫他的最后一行字。[[136]](#_136_5)我們固然可以將艾希曼的寫作解釋為自我辯解的迫切需要，但任何真正把這一大堆文字讀過一遍的人都無法忽略另一個寫作動機：艾希曼屬于那種陶醉于論辯游戲的人，享受文字的力量，也同樣享受自己的操控能力。到處都可看出他渴望文字產生作用、誘導讀者，并強迫他們接受自己的思想體系。艾希曼曾經歷過那樣的時代，用他不符合一切文明社會規則的呈文、提案和計劃成功地影響官方政策。正是艾希曼的想法影響了猶太人政策的發展，促成它走上滅絕之路。如果有人能夠真正體會白紙黑字的力量，那個人就是艾希曼。文字足以決定生死，而在以色列的時候，艾希曼正希望借此拯救自己的性命。相比之下，他在面對威廉·薩森和埃伯哈德·弗里奇時，一心想的只是獲得脫離匿名狀態的回程車票。然而薩森和弗里奇將意識到，與獨白者進行對話是多么困難的事情。

## 第二節 談話中的艾希曼

……先生們，這對您們來說想必非常明顯，

其實這對每個人來說應該都是顯而易見的……

——艾希曼在薩森訪談會上的發言[[137]](#_137_5)

### 簽約各方

在阿根廷，沒有人比阿道夫·艾希曼更清楚“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這個術語的背后真正隱藏著多大的恐怖。他因而也完全明白，歷史研究和任何形式的調查結果會帶來多大危險。即使是約瑟夫·門格勒或前任猶太人隔離區指揮官約瑟夫·施萬伯格那樣的人，其所見所聞跟艾希曼比起來都相當有限。他們二人遠離柏林的決策過程，更遠離決策高層，僅僅在末端經歷了滅絕計劃。我們若讀過魯道夫·赫斯的回憶錄便可清楚觀察到，在草菅人命、親身參與虐待和謀殺成為常態的生活中，數字、事實和概念會如何變得模糊起來。而艾希曼的職位卻使他既可以保持距離，又能看清一切。希姆萊的任命讓他成為匯總千頭萬緒的協調員，在希特勒統治時期就已經成為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能夠真正看清納粹滅絕猶太人程度的極少數人之一。時至1957年，當他的所有上司都已經一命嗚呼之后，艾希曼的相關知識更非旁人所能及。想必正是這種對自己權威性的認識，讓艾希曼態度篤定地參與了杜勒出版社圈內人的訪談會。他享有無與倫比的優勢，能夠在對話者的好奇心觸及特定事項，可能威脅到他一廂情愿描繪的歷史版本時，立刻控制風險。因為可以理解的是，艾希曼最不感興趣的事情就是揭露真相。他時年51歲，已在阿根廷生活了將近七年，有足夠時間四處打聽埃伯哈德·弗里奇和威廉·薩森的消息，并形成對他們的印象。等到1957年4月底前后訪談錄音開始時，艾希曼相信他對自己的談話伙伴們已有了充分了解，可以放心地參與那個計劃了。

### 出版商：埃伯哈德·弗里奇

從艾希曼的角度來看，所有參與者當中最不具危險性的人，毫無疑問就是這一位先生。他利用自己的出版社，以及與各種新舊納粹黨人團體的良好關系，為他的著作的有效出版提供了基本條件。埃伯哈德·路德維希·凱撒·弗里奇1921年11月21日出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138]](#_138_5)，比艾希曼年輕15歲，因此也就不具備任何內幕知識。弗里奇自己從未親身經歷過德意志國（Das Deutsche Reich）[\*](#_449)、它的元首，以及受誤導的日常生活，更遑論戰爭與滅絕。盡管有謠言稱弗里奇曾在柏林為戈培爾工作，但他其實只去過傳說中的第三帝國一次，亦即在1935年前往柏林郊外參加希特勒青年團國際大會。[[139]](#_139_5)對一個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長大的希特勒青年團領導人而言，經濟快速復蘇時期的希特勒德國令人著迷的程度，甚至勝過了一年后柏林奧運會的盛大場面在國際上對成年人產生的吸引力。在普遍對德國友好的阿根廷，沒有什么可以阻止年輕的埃伯哈德·弗里奇沉迷在他對希特勒的狂熱之中，將一切不符合這一“崇高理念”的東西斥為惡意宣傳。德國戰敗后傳出的消息也無法扭轉這種熱情。如此偏激的政治觀點并沒有阻礙這位年輕人成為腓特烈小學（Fredericus-Schule）的德語教師。然而當涉及弗里奇的青年工作時，情況就有些不同了：他在學校放假期間組織的露營活動過于熱切地效仿希特勒青年團，甚至讓薩森夫婦也覺得過火，在女兒參加活動沒多久之后，就把她從營地接回家了。盡管這次父母解救行動的背后推力無疑來自薩森的妻子密普，她始終無法與丈夫那些極端主義的朋友們和平相處，但仍然明白顯示出弗里奇工作過火的本質。[[140]](#_140_5)薩斯基雅·薩森回憶，弗里奇甚至比納粹還要納粹，既不知克制又沒有幽默感。可是弗里奇所處的位置使他遠比那批流亡者更容易堅持理想，因為他從未見過那些恐怖的事情。對他而言，國家社會主義仍是那個從未被玷污的夢想，是他青少年時期在營地里夢寐以求的對象，如今更因為新移民關于那個偉大時代的各種英雄故事而豐富了內涵。阿根廷視角意味著對德國普遍友好、對美國非常懷疑的態度，這使得同盟國針對希特勒犯罪政權做出的任何說明都顯得不可信。相反，弗里奇被來自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包圍，每當他們談到戰爭暴行和危害人類罪行的時候，指責的對象實際上都是他們自己的受害者。弗里奇聽說過“紐倫堡勝利者正義”以及“防諜隊戰俘營的酷刑”，而且正如他在《路徑》發表的那些文章所展現的，他把對希特勒政權的批評一概視為反德宣傳。他以極大的奉獻精神致力于改善被監禁“同志們”的處境，參加了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的“同志工作會”，同時協助傳播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弗里奇在1948年寫信給他的一位作者，強調他絕不希望文章“抹黑許多德國人心之所系的過往”。[[141]](#_141_6)其目標是要建立一種“能夠治愈我們的民族，因而也治愈歐洲和全世界的思想”，去除普遍存在的“反民族觀點所造成的無力狀態”。[[142]](#_142_5)他在周游拉丁美洲，特別是在巴西面對“憤怒的半黑人暴徒”時，就已經發現這樣的“民族觀點”不可或缺。[[143]](#_143_5)遭逢不幸和受到迫害的人除非是納粹流亡者，否則弗里奇根本不會對他們產生興趣。來自德國的其他難民，例如移民阿根廷的猶太人，弗里奇根本漠不關心。

弗里奇的援助并非完全大公無私，因為他當然也會通過向納粹流亡者提供許多服務來賺錢。若套用我們今天的說法，弗里奇是一個成功的關系網搭建者（Netzwerker）。雖然弗里奇與政府沒有直接聯系，也不像奧爾斯特·卡洛斯·福爾德納或者魯道福·弗洛伊德那樣，有辦法從歐洲救出納粹分子并幫助他們在阿根廷另起爐灶，但他還是能夠讓陷入困境的納粹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重新起步，并且得到了各方的支持。[[144]](#_144_5)“杜勒之家”成為剛剛抵達的人們的第一個見面地點，他們可以在那里交換地址、不引人懷疑地與親友團聚，以及購買德文書籍。通過張貼廣告、提供郵遞和旅行服務，以及更重要的，向流離海外的德國人供應媚俗的褐色“家鄉味”，弗里奇建立了一個可謂利潤豐厚的流亡納粹服務中心。美國情報機構的檔案指出，弗里奇得到了最高階層的支持：奧爾斯特·卡洛斯·福爾德納據稱是杜勒之家的出資者之一。[[145]](#_145_5)是否真的獲得了財務上的支持，這倒還是其次。但如果沒有足夠強大的政治后盾，那種生意是無法維持下去的。例如，許多猶太移民閱讀的自由派報紙《阿根廷日報》，在1955年之前一再面臨印刷禁令或進口紙張配額限制的困難，弗里奇卻能夠不受阻礙地自由出版。[[146]](#_146_5)我們對其財務背景知之甚少，但弗里奇至少有段時間必定手頭相當寬裕，因為他不但設法讓出版社在艱難的環境下繼續運轉，而且自己還擁有房產。威廉·薩森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租下的第一棟房子不是別人的，恰好就屬于他的出版商。[[147]](#_147_5)

埃伯哈德·弗里奇是一個奇怪的混合體。一方面，他是個納粹狂熱者，在南美洲保持安全距離，時而喜歡喋喋不休地談論“第四帝國”，并且對納粹黨人懷有無限崇敬；另一方面，他卻是個深諳生意之道的剝削者，善于利用那些對第三帝國的崩潰悵然若有所失者的感傷情緒。后來的事件也顯示出弗里奇是一個輕信可欺的人，他欽佩威廉·薩森，事實上對他簡直言聽計從。[[148]](#_148_5)要承認，埃伯哈德·弗里奇在這方面并不孤單，因為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也對薩森忠誠不渝，讓他周遭的人有時覺得難以理解。[[149]](#_149_5)

從兩個細節可以特別清楚看出阿道夫·艾希曼對弗里奇所持的態度：艾希曼稱那位出版商為“弗里奇同志”。這種稱呼通常只留給艾希曼認為是戰斗伙伴的那些人，亦即黨衛隊隊員，以及在逃亡期間和在阿根廷幫助過他的聯系人，其中當然包括“親愛的薩森同志”。如果艾希曼不認為某人跟他地位相當，就只會用姓氏來稱呼對方。更重要的是，艾希曼在以色列受審時竭力淡化弗里奇在阿根廷出書計劃中所起的作用[[150]](#_150_5)，盡管杜勒出版社的小圈子當時至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已經完全不復存在。此外還有種種跡象表明，當弗里奇在1958年與妻子和孩子一起移居奧地利時，艾希曼甚至安排弗里奇與他在林茨的家人認識。[[151]](#_151_6)

### “合著者”：威廉·薩森

在逃往阿根廷的納粹黨人當中，沒有任何人能夠像威廉·薩森那樣符合人們對“生活達人”一詞的刻板印象：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花花公子，喜歡享樂也充滿天賦，卻無法專精于任何事物。他總是尋求大干一場、掙快錢，可是缺乏持久力，不論在個人生活還是職業生涯方面皆如此。如果薩森的生命當中有一個恒久不變的要素，那就是他對國家社會主義的迷戀。與弗里奇不同，他對國家社會主義有過親身經歷。威廉姆斯·安東尼烏斯·瑪麗亞·薩森[[152]](#_152_5)來自荷蘭布拉班特省（Brabant），1918年4月16日出生于海特勒伊登貝赫（Geertruidenberg）的一個羅馬天主教家庭。高中畢業以后曾考慮研習神學，后來決定攻讀法律。他在大學時與國家社會主義有了密切接觸。18歲那年的奧運會之旅，引發了薩森對阿道夫·希特勒的癡狂，以致在回去之后因為發表了一篇強烈親德的演說而被驅逐離開根特（Gent）[\*](#_450)，并且失去了大學學籍。薩森最初的新聞記者經驗來自報社，1938年之后也報道軍隊，因為他被征召入伍了。他在烏得勒支（Utrecht）[†](#_451)炮兵營的日子沒有持續很久，德軍入侵之后，薩森短暫地成了戰俘，接著重返平民生活，繼續做記者。他在1940年第一次結婚、成為父親，然后開始環顧尋覓第二任妻子。對俄戰爭爆發后，薩森主動加入荷蘭志愿黨衛軍，以戰地記者的身份成為武裝黨衛隊庫爾特·埃格斯中隊（SS-Staffel Kurt Eggers）的一員。那里聚集了包括亨利·南寧（Henri Nannen）[‡](#_452)和維圖斯·德·弗里斯（Vitus de Vries）在內的各種宣傳工作者，為最終勝利撰寫新聞稿并發布新聞廣播。薩森當時已經認識他倆。按照作家斯坦·勞里森斯（Stan Lauryssens）的說法，薩森還是戰爭罪行的見證者，曾親眼目睹27名猶太人在黨衛隊的逼迫下互毆致死。[[153]](#_153_5)他的路線經波蘭前往俄羅斯，直到1942年的高加索攻勢為止。在那次戰斗行動中，薩森于7月26日身負重傷，隨后八個月不得不相繼在克拉科夫、慕尼黑和柏林的軍醫院接受縫合治療。這一經歷不但促成他晉升為黨衛隊下級小隊長，更讓他成為志同道合者眼中的戰斗英雄。和艾希曼不同的地方在于，薩森不但隸屬武裝黨衛隊，更有傷疤和前線經驗可以示人，艾希曼卻出身受到前線戰士們鄙視的一般黨衛隊。他身上唯一的傷疤來自一場摩托車事故，手部的骨折則是一塊過于光滑的拼花地板造成的。即使在逃亡海外的黨衛隊成員圈子里，缺乏戰斗經驗仍是一個明顯的污點，艾希曼也痛苦地意識到了這一點。[[154]](#_154_5)

康復之后，薩森在1943年4月開始了他的第一份事業。他被獲準進行現場直播——那實際上違反了新聞審查的相關規定——并使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廣泛的歡迎，就連不來梅（Bremen）的廣播電臺也轉播了他的新聞報道。薩森直到1944年年中都在布魯塞爾廣播站工作，用他那狂放、驚悚、催淚的風格，為激進的反盟軍廣播樹立了一個新的標桿。這種同時糅合了暴力色情、憂時感傷和悲愴情懷的風格，也出現在薩森阿根廷時期的寫作中。他熟練地迎合大眾口味，炮制出大量的報道，并賺取相應的收入。其戰地記者生涯的最高點，是1944年6月6日在諾曼底的前線現場，實況播報盟軍登上歐洲大陸的情形，他甚至時而發現自己位于敵軍戰線的后側。奉命撤回德國之后，薩森相繼為機動戰地廣播站、宣傳小報和無線電臺工作，但他自己也因為搶劫補給倉庫和不服從命令等丑聞，越來越成為話題人物。全靠他的良好關系才使他免于承受嚴重后果。1945年3月，薩森逃往烏得勒支，在那里凄慘地播報堅持到底的口號，直到4月7日電力中斷為止。這時薩森似乎也已經意識到，是時候追尋其他目標了。薩森加入了他的兄弟，后者不僅在1944年同樣加入武裝黨衛隊，而且已經建立了網絡，協助荷蘭納粹黨人潛入地下逃跑。換句話說，他們有系統地偽造各種證件來證明新的身份，并且把流動電臺用作聯絡工具。希特勒死后，兩兄弟逃往阿爾克馬爾（Alkmaar），在那里躲了起來。

薩森成功完成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脫逃行動：1945年6月5日，他被英國憲兵隊囚禁在烏得勒支的藍教堂堡（Fort Blauwkapel）并接受審訊，而后在12月使用偽造的文件，帶著金錢和食物逃離營地。過了沒多久，他又在比利時遭到逮捕和審訊，不過很快就被遣返荷蘭。薩森于是利用遞解出境的機會進行最后的逃亡。1947年5月，薩森踏上了愛爾蘭之旅。幾天以后，薩森的第二任妻子密普·薩森（婚前姓van der Voort——范·德·沃爾特）帶著他們共同的女兒過去與他會合。薩森因為認識雙桅縱帆船船長施奈德的女兒們——其中一人甚至在薩森家住過一段時間[[155]](#_155_5)——因而有機會逃往阿根廷。英格·施奈德在許多年后說，她在愛爾蘭始終摸不著頭緒，薩森究竟靠什么賺錢謀生。不過薩森經常四處奔波，到最后一年已經擁有了一棟相當像樣的公寓。1948年9月，薩森與他身懷六甲的妻子和女兒薩斯基雅在都柏林登上了“老鷹號”（De Adelaar）雙桅縱帆船，接著在11月5日踏上了阿根廷的土地。薩森在逃走時也使用了假名，以雅各布斯·揚森（Jacobus Janssen）的身份踏上旅程。同行者包括兩名比利時戰犯和他們的家人。風度翩翩、具有語言天賦的薩森不但在船上學會了他的第五門外語，而且對船長的二女兒安切·施奈德（Antje Schneider）展現出極大的興趣。這段婚外情并沒有妨礙薩森后來在小說中以一位孕婦忠實的丈夫的視角描述那一段艱辛的航程，通過許多驚悚的細節讓人對暈船留下非常生動的印象。[[156]](#_156_5)那整船人都持有阿根廷移民當局核發的入境許可。[[157]](#_157_6)抵達阿根廷之后，薩森與妻子和兩個女兒甚至有段時間與施奈德姐妹一同住在皮拉爾（Pilar）。由于手頭很不寬裕，他們亟須相互扶持。[[158]](#_158_5)英格·施奈德回憶，他們剛抵達不久，薩森就已經開始為聯邦德國的一些雜志工作了。其收到的第一個任務顯然是為《明星周刊》撰寫兩頁調查報告，而且薩森曾告訴家人，他為《明星周刊》《明鏡周刊》和《生活》雜志撰稿。[[159]](#_159_5)

等到1950年年中，阿道夫·艾希曼也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時候，薩森已經站穩腳跟。[[160]](#_160_6)薩森很快就與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一同投入逃亡救援行動，并擔任他的司機和捉刀人。薩森還為另一個被迫來到阿根廷的空戰英雄阿道夫·加蘭德撰寫了回憶錄，并得到了阿根廷所有親納粹圈子的信任。薩森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德國人舞臺上是一個才華橫溢的演員，無論公開還是私下里都是個讓人難以抗拒的風流浪子。他有著勃勃的政治野心，是阿根廷總統的朋友、幾家歐洲雜志社的通訊員，還是一位頗有才華的作家，像喜歡打撲克牌一樣喜歡玩名字游戲：他是Wilhelm、Willem、Wim、Willy、Sassen，以及W. S. van Elsloo，此外還有其他許多筆名。這名逃亡者已經出人頭地。他們一家人很快就負擔得起一棟位于布宜諾斯艾利斯最炙手可熱街道上的小房子——佛羅里達區自由大道2755號（2755 Liberdad in Florida）。盡管他們一家人始終過著拮據的生活，但那純粹是因為薩森不懂得如何理財的緣故。回過頭來看，我們簡直會因為薩森的學識和語言天分，對這個愛飲酒、喜歡交際的活命主義者產生好感，只可惜他一如既往地狂熱崇拜希特勒、支持德國統治世界的計劃和對猶太人不共戴天的仇恨，并且偏愛陰謀論，此外還擅長不道德地操弄他人，靠這種手段欺騙每個人、每件事。甚至薩森非常不尊重自己妻子的表現，也部分展現了其說謊天賦，因為目擊證人的說辭很快會讓人產生這樣的印象，即沒有任何女性抵抗得了薩森的攻勢，即便他朋友們的妻子也不例外。[[161]](#_161_5)不管怎樣，薩森從事任何活動都很少顧及他的妻子和孩子們。密普·薩森所想要的生活，恐怕不是跟一個出名不忠的丈夫過著寅吃卯糧的日子。她尤其不贊同威廉·薩森陷入歧途的政治觀點，更反對他與黨衛隊的同志們接觸，其中部分原因也在于密普的哥哥曾在被占領期間加入了比利時的抵抗運動。[[162]](#_162_5)盡管如此，她還是容許阿道夫·艾希曼和其他人待在她的家中，即便她對那些人在星期天家庭時光日來訪感到不快。不過在1957年的好幾個月里，密普·薩森還是證明了自己是一位殷勤的女主人，招待了至少兩名大屠殺兇手，從而以自己的方式支持了薩森-弗里奇的計劃。

對艾希曼來說，“薩森同志”成了他在杜勒出版社圈子內最重要的照料者之一。即便有跡象顯示薩森已經背叛了他和他的家人，艾希曼談起薩森時語氣中仍然帶著欽佩，而且非常不情愿才相信了負面的報告。艾希曼在以色列將薩森稱為他的“合著者”，并且補充說他們“長年下來”已經發展出了“友誼”。[[163]](#_163_5)薇拉·艾希曼也認為“薩森先生”樂于助人，看上去盡其所能地幫助了她和她的家庭。[[164]](#_164_5)此外她不可能注意不到薩森訪談會給她的丈夫帶來的巨大變化，即便她在周末看見丈夫的機會少了許多。對她的丈夫來說，與薩森的交往，最重要的意義在于開啟了一扇大門，讓他重返政治生活，在他看來也是重獲活力和重要地位。

### 薩森訪談會

杜勒出版社圈子內的人直到1957年春天才做出決定，要把他們關于納粹滅絕猶太人的談話內容記錄下來。這種方法已經在杜勒出版社的其他出書計劃中證明了可行。例如，1953年的時候，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已在錄音帶上口述了回憶錄《德國和阿根廷之間》的內容，以便接著由薩森將之打磨得光芒四射。佩德羅·波比耶辛是一位和迪特爾·門格有過生意往來的波蘭裔前國防軍士兵，他后來回憶，薩森特地跟他買了一臺他從美國走私到阿根廷的新式磁帶錄音機。[[165]](#_165_5)威廉·薩森也把錄音帶用于自己撰寫文章，顯然對這種在當時非常現代的技術十分著迷。他很自然地把錄音帶用于私人消遣，像是錄制話劇、跳舞音樂，以及他自己的歌聲和口哨，在少數保存至今的原始錄音帶上面仍可聽到這些聲音。

20世紀90年代末期重新出現的錄音資料，再加上薩森抄本和艾希曼做出的修正，使我們能夠準確地了解他們的工作方式：錄音內容在很短時間內由不同助手迅速打字記錄下來，然后再把磁帶拿回去繼續錄音，因為當時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新的錄音帶非但所費不貲，而且不易取得。今天我們共有大約1000頁的薩森抄本（包括修正頁），以及29小時的磁帶錄音，其中包括后來翻錄，以致內容重復的錄音帶。這些磁帶不僅證明了抄本有可靠的依據，更是一扇通往1957年的窗口，讓人直接來到薩森家舒適的客廳。[[166]](#_166_5)

一群中年男子匯聚在薩森家底層一個整潔的房間里。這棟位于市內熱門地段佛羅里達區、充滿“荷蘭舒適性”[[167]](#_167_5)的宜人房間，布置得十分符合他們那項共同計劃的熱望：一座宅邸里擺滿了書籍、唱片、藝術品、圖畫以及歐式家具，那種氛圍烘托出他們談話的分量。薩森喜歡按他所能負擔的最好的標準生活，除了國家社會主義之外，他喜歡美好的事物、重視文化教育、熱衷昂貴的威士忌酒。甚至在孩子們還很小的時候，作曲家猜謎游戲和書籍討論就已經成為家庭餐桌文化的一部分。[[168]](#_168_6)薩森的生活條件雖然稱不上奢侈，但與艾希曼所習慣的依然大不相同。艾希曼一星期的大多數時間都“待在農場里”悉心飼養照顧安哥拉兔，在家也沒有類似薩森的那種房間。然而對他來說，并不只是因為這些，才讓在薩森家度過的周末顯得像是前往另一個世界的旅行。

聚會本身才是真正重要的：與昔日同儕們的重聚，有機會接觸各種文本資料，以及參與討論，使他的人生重新有了不一樣的樣貌。薩森圈子內的政治傾向明顯具有極右派色彩，那些人使艾希曼覺得，自己的知識和判斷是新運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不僅是曲意奉承，因為他們確實需要這名唯一幸存的內部人士。尤其在極右派人士激烈爭論受害者人數的問題時，普遍認為艾希曼是唯一整體掌握大規模槍決行動，以及通過勞動、饑餓和毒氣殺害猶太人所造成的死亡總數的人。這個名聲其實是艾希曼自己通過不斷招搖過市建立起來的，更從一開始就成為艾希曼在阿根廷進入戰后納粹圈子的入場券。

四年后，當艾希曼在以色列出庭受審時，他成功地設法掩蓋了薩森訪談會的真實面目。辯護策略主要基于這樣的事實：他已不再是國家社會主義者，在過去15年里都是一個無可指摘、不引人注目、完全不關心政治的良好公民，早就把昔日的所有怨懟——尤其是反猶太主義——都拋諸腦后了。一旦薩森訪談會的背景曝光，艾希曼的這種謊言將變得站不住腳。因此艾希曼向他的律師編了一個關于薩森的故事，講述那名追逐頭條新聞成癮的記者如何在咖啡廳偶然認識了無辜的阿根廷公民克萊門特，而后定期拿著錄音機登門拜訪，并且說服他這些談話有助于撰寫他的傳記。然而薩森不時會借助酒精的作用，誘使他重新陷入往日的語言習慣，然后用記者的手段歪曲談話內容。反正按照艾希曼的說法，現存材料當中沒有任何一句話與他真正講過的東西相符。這個故事版本完全契合了其他證人捉迷藏的游戲，因為顯然沒有人愿意承認自己曾和艾希曼坐在同一張桌子邊。薩森更是努力讓他的國家社會主義信仰隱藏在專業記者的面貌背后。

事實證明，訪談會的地點從來都不在艾希曼那里，而是在薩森家中。從1957年4月開始，他們在周六日[[169]](#_169_5)定期聚集在薩森的房子里，討論“最終解決方案”。[[170]](#_170_5)頗有可能其他人也作為主人招待了類似的訪談，例如當時阿根廷的見證者也提到家境富裕的前黨衛隊成員迪特爾·門格或杜勒出版社組織的談話會，然而那些談話內容恐怕沒有被錄下來。磁帶明確顯示出，錄音地點是在薩森家中。我們能在背景音中聽到薩森的女兒和他的妻子的聲音、來自相同門窗的噪音，最重要的是記錄了薩森一家日常生活中一些相當私人的片段。每個房間都有自己的獨特聲響，錄音帶上面不曾出現薩森家以外其他任何房間的聲音。

酒精并沒有像艾希曼后來在以色列所極力宣稱的那樣，在訪談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盡管磁帶和抄本都記錄了軟木塞離開瓶口發出的聲音，卻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酒精曾經影響到談話的進行。一切線索反而都表明，他們消耗的酒精飲料只是20世紀50年代各種社交聚會上的常見水平。酒精飲料屬于發展成熟的咖啡文化的一部分，難以想象“紳士間的談話”會沒有酒精。煙草制品也是咖啡文化的一部分，對老煙槍艾希曼來說，那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錄音里沒有聽到任何典型的醉酒跡象：沒有人大著舌頭講話，即便在爭論最激烈的時候，每個人也都頭腦清醒、聚精會神。錄音中的談話從頭到尾冷靜克制，完全有別于刻板印象中酩酊大醉的納粹分子彼此一面敬酒一面高呼“勝利萬歲！”（Sieg Heil!），直到酒杯碎裂為止的場景。那里既沒有敬酒，也沒有叮當碰撞的玻璃杯，反而只有紙張的沙沙聲，而且即使在激烈的口頭爭斗之后，每個人都還是小心遵守最基本的禮數。這些人非常認真地看待他們的討論。把薩森訪談會描述成“酒館談話”顯然是一名被告的辯護策略，我們不該繼續幫艾希曼傳播這種說辭。

除了一個例外，這些人都以“您”（Sie）相稱，有時則稱呼“先生們”（meine Herren），只不過是以一種放松，偶爾甚至是友好的口吻，這可以從他們舊日熟悉的稱呼中表現出來：艾希曼經常使用的講法是“薩森同志”、“我親愛的薩森同志”，或者“弗里奇同志”。[[171]](#_171_5)缺席的訪談會成員則像老朋友一般，直接以他們的姓氏來指稱。[[172]](#_172_5)只有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和薩森在談話時以非正式的“你”（du）彼此相稱。一般情況下人們使用的都是真名，而非假名或化名。薩森家中沒有里卡多·克萊門特，始終清楚地稱呼阿道夫·艾希曼。[[173]](#_173_5)

討論的氣氛和談話的過程讓人聯想起專題研討會：每次不同的成員連續幾個小時探討歷史理論、一同詮釋文件、針對依據個人經驗做出的評估進行爭辯（時而還是激烈的爭吵）、孜孜不倦地閱讀和討論任何能夠獲得的專業書籍。薩森甚至經常提前布置下次談話會的任務，并敦促與會者努力做好準備。[[174]](#_174_5)那些人抄寫筆記、朗讀自己的書評、共同研擬新的問題，甚至還發表演講。保留至今的原始錄音清楚地顯示，他們講話時通常速度很慢，而且抑揚頓挫。朗格爾博士的一篇演說同時以抄本和錄音的形式保存了下來。他念完那一頁半的文字需要將近20分鐘時間，這讓人能夠對他們的討論需要持續多長時間有個印象。

盡管出席者所處的狀況偶爾會有變化，但他們彼此交談的時候多半全神貫注。參加訪談會的人會相互提供資訊材料。薩森借書給艾希曼，分發重要文件的謄本[[175]](#_175_5)；艾希曼帶來他從歐洲收到的報紙文章[[176]](#_176_5)，薩森則為在座的人翻譯了美國雜志上的一篇文章。那些人彼此交流自己在阿根廷新聞媒體上讀到的事情，同時也討論世界政治局勢，以及西德如何付出更多司法努力來面對德國的納粹歷史。有些討論持續進行了四個多鐘頭，完全不會讓人覺得是一種輕松愉快的休閑活動。從現存抄本的每一頁都看得出，就連最荒謬絕倫的論調也得到了認真對待。

### 確定時間與門外漢的優勢

談話中提到的日常政治事件讓我們甚至可以精確地斷定錄音是在哪幾個星期進行的。例如艾希曼自己在3號錄音帶里提到了錄音的年份——1957年。在8號和9號錄音帶記錄的對話中，艾希曼的助手赫爾曼·克魯邁在德國被捕一事才剛剛發生不久（克魯邁被捕于1957年4月1日）。艾希曼在同一天還談到卡斯特納遇刺案（3月3日遇刺，死于3月15日），但這一定已是舊聞，因為他自言自語道：“我相信他死于今年年初，不會更早。”[[177]](#_177_5)他們還詳細討論了1957年4月15日《阿根廷日報》上的一篇文章。[[178]](#_178_5)在37號錄音帶，薩森翻譯了最新一期《時代》上的一篇英文報道（1957年8月）。在39號錄音帶，艾希曼引述了他剛剛在《阿根廷日報》讀到的紀念阿爾貝特·巴林（Albert Ballin）百年冥誕的報道（也是1957年8月）。[[179]](#_179_5)72號錄音帶有一個段落直接提到了費迪南德·舍納爾（Ferdinand Schörner）將軍在慕尼黑被判刑一事（1957年10月15日）。[[180]](#_180_5)艾希曼時而說出的一些日期，讓我們獲得了更進一步的了解，例如“昨天晚上”、“已經四個月了”、“幾個星期之前”等等。[[181]](#_181_5)薩森則談到了下個星期舉行的另一場訪談會。我們根據這一切可以知道，錄音工作最早開始于1957年4月，至少一直持續到同年10月中旬。

雖然錄音帶的轉錄本制作得相當不專業，但已經可以看出，除了薩森和艾希曼彼此的交談之外，還有其他一些人加入討論。除了談話者之外，現存的錄音帶還記錄了其他旁聽者的聲音，因為沒有人能夠一連聽好幾個小時的談話而不發出任何聲響：清嗓聲、咳嗽聲、紙張的沙沙聲、腳步聲、喃喃道歉聲、匆匆告別聲、房門嘎吱聲、窗子拍打聲，以及喝東西與打火機打火發出的聲音。在某些地方甚至可以清楚分辨出房間里有六個不同的人發出了這些雜音。當時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見證者一再指出，許多人都知道與艾希曼的訪談，而且能夠宣稱自己曾參加過訪談的人更會隱約流露出自豪之意。當然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不少在其他場合遇見過艾希曼的人會把他們的經歷跟薩森訪談會混為一談，或者有人想要以此自抬身價。但保存下來的抄本和錄音帶都可以證明，薩森訪談會確實通常是一個大事件。

然而，抄本的一個特點卻大大增加了閱讀的難度：聽寫錄音帶的人通常不在每個段落前標示發言者，既不寫出姓名或首字母縮寫，也不指明那是發問還是回答。有些地方能看到手寫的標識，例如F代表問題（Frage），A表示回答（Antworten），但也有些完全是錯誤的。[[182]](#_182_5)此種前后一貫的“低調”態度明白顯示出，他們刻意避免提及人名。小心謹慎無疑是有必要的，因為這樣一個持續數月的長期項目，相關的抄本不無可能落入他人之手，更何況并不是每個人都像艾希曼那樣，希望看見自己的名字被印刷出來。因此這些抄本至少乍看之下都保持匿名。不標明發言者的談話記錄，讀起來必須打起十二分精神，尤其當好幾個人攪在一起說話時更是如此。更糟糕的是，謄寫者偶爾還忘記分段，這意味著我們只能通過內容和語言風格來推斷發言者的變化。此外，引文也完全沒有標示，于是每當薩森或他的同伴按照慣用的做法，從書中引述一大段文字的時候，只有知道那是引文的人才能把它跟發言人自己的話區分開來。直接引自書中的文字占了薩森抄本全部內容的10%以上。[[183]](#_183_6)這一切都使快速瀏覽薩森抄本變得不可能。不過愿意花時間的人，還是能夠明確分辨出不同的發言者。因為艾希曼和薩森的語言都極具特點，只要熟悉了便可以認出，更何況至少還有一些錄音帶保存了下來。這意味著我們并非只能依靠自己的語感和閱讀經驗。[[184]](#_184_5)

從談話內容與上下銜接部分可以看出，錄音順序幾乎完全與錄音帶編號相吻合。[[185]](#_185_5)只有一個周末（58號至61號錄音帶），薩森似乎不小心拿錯了錄音帶，以致正確的順序必須重新排列如下：1號至54號錄音帶中間、58號至61號錄音帶、54號中間至57號錄音帶，然后直接是62號至69號和72號至73號錄音帶。[[186]](#_186_5)（在一卷“沒有編號，錄滿音樂和一出佛拉芒語話劇”的“W. S.私人錄音”的中間部分，卻出現了短短一段明顯屬于61號錄音帶的薩森與艾希曼的談話錄音。[[187]](#_187_5)）盡管存在小的疏失，但仍可看出那些人連續幾個月設法有條不紊地進行工作，使我們今天至少能在很大程度上遵照“錄音帶編號”的順序。不過那些材料也證明，參與者當中沒人有過這種大規模項目的經驗，或者熟悉對此有幫助的科學工作方法。

雖然聽起來奇怪，但相比于專業抄本，拙劣的抄本具有不可否認的優勢。它們泄露了許多關于制作者的信息，因為那些人正是在錯誤——例如一再重復出現的拼寫錯誤——中留下了可供辨識的身份標記。因此如果細心閱讀，從中甚至能夠看出每個打字員的特質。整套抄本總共使用了三臺不同的打字機，但主要部分是用同一臺機器打字出來的。由于每個人在打字謄寫的時候都會留下易于辨識的個人標記，因此可以清楚辨認出三名不同的打字員。最初和最后的那些錄音是由具有豐富經驗的打字員謄寫的。段落劃分清楚，包括發言者語法錯誤在內的一切都照實轉錄。然而從人名、地名和納粹內部事務的拼寫錯誤可以發現，那兩名打字員對德國歷史并不在行。同時代的見證者還記得，薩森在許多事情上都喜歡求助于杜勒出版社的女秘書們，由此不難想象他很可能在剛開始的時候把錄音帶轉錄工作交給了她們。相反，大部分抄本的謄寫者是一個明顯具有納粹背景的男子。這不僅表現在文中使用了符合納粹官僚用法的階級、人名和機構縮寫，更可從他個人的特殊怪癖中看出。那人不但在打字的同時刪減重復的部分，而且還跟薩森溝通抄本的內容——加了上百個括號，有些是直接的抱怨，但也顯露出明確的政治基調。他像訪談參與者那樣，直接稱呼薩森為“薩森同志”，而且所有括號中的補充文字擺明都是寫給薩森看的。那些文字遠不只是抒發感想，例如“恐怕不能說得更快了”、“口齒不清”、“講得不清不楚，實在讓人受不了！”，或者“感謝提供錄音帶信息”，艾希曼的言論后面更出現了冷言冷語，例如“啦啦啦”、“胡扯一通”，以及針對艾希曼而發的情緒化評論，比方“冥頑不靈的奧地利人”或“沿街叫賣的小販”（作為對艾希曼借用另一個發言人常用的一個外文詞的回應）。同樣顯而易見的是，那名打字員至少想要遠遠地加入討論，因為他在抄本中散布了插科打諢的評論。于是艾希曼的發言后面經常能看到“啊哈”、“Buenas Noches”[\*](#_453)之類的評注，或者在艾希曼講的一個關于戈林的故事后批注“可憐的海因里希”。甚至還有熟人之間針對薩森好色開的玩笑。這個打字員還記錄了各種噪音（例如“背后有一只公貓在鬼哭狼嚎”），以及明顯有些羨慕地留意到，他剛剛聽見“一瓶酒”的聲音，過了四頁（大約兩個小時）之后，“又再度聽見開瓶聲”。專業的打字員當然不可能如此自行其是并寫下私人的注記。抄本與錄音帶的對比也清楚顯示出，薩森為什么選擇主要依靠一位老戰友擔任助手。那個人與他思想一致，分辨得出哪些談話對項目具有重要意義，哪些則派不上用場，而且本身熟悉談話的內容。他顯然清楚那個項目的目的何在，并自行按照需要來精簡談話內容，省去了艾希曼個人的奇聞軼事，更完全略過了重復的部分。此外，納粹的歷史對他既不陌生也不遙遠。不然的話，謄寫錄音帶中詳細描述的戰爭罪行和暴力行為只會讓他活受罪。因此薩森主要依靠一位“新手打字員”來完成大部分轉錄，并容忍了他專橫霸道的評論。一盤錄音帶記錄了薩森的一段口述說明，對謄寫轉錄工作給出了明確的指示。他希望記錄下來的談話是“經過編輯的”，并解釋說，“這意味著任何不正確的句子結構、任何沒有講完的句子、任何亂七八糟的句子——我指的是過于冗長的句子——都必須縮短，當然不得改變語意或措辭”。[[188]](#_188_5)盡管薩森的指示還包括了拼寫和縮寫方式，但抄本的內容表明，那名打字員通常有自己的想法。我們至今還不清楚那名男子的身份。

盡管存在各種刪減和評論，但在比對了我們同時擁有原始錄音和抄本記錄的內容后，一個事實變得非常清楚：我們今天能夠獲得的抄本固然對錄音轉錄做了部分刪減，但絕非經過編輯后的版本。抄本雖不完整，而且被插入了部分內容，但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它遭到了刻意的篡改或扭曲。換句話說，這是一份忠于原意的可靠抄本。盡管從學術的角度，我們希望它更完整，但沒有理由懷疑這個內容廣泛的原始資料的真實性。

### 一個社交事件

艾希曼在阿根廷看過大部分的抄本，并加上了自己的修改和注釋，直到最后一卷錄音帶。因此他非常明白，閱讀這種形式的文稿是多么困難的事情，并在以色列利用這種情況盡可能降低這一書面證據構成的危險。他最希望營造出來的圖景，是借酒澆愁的前納粹艾希曼與充滿好奇心的記者薩森，在自家廚房進行的遠離世人的一對一談話。然而這個故事版本一定早已啟人疑竇，因為不僅艾希曼的妻子堅決否認曾在自己家中錄音[[189]](#_189_5)，保留至今的錄音抄本更清楚地顯示，還有其他人參加了訪談。因此流傳至今的有關薩森訪談會參與者的謠言，多半都源自艾希曼的蓄意誤導。除了薩森之外，唯一艾希曼明確提及并出席訪談會的，就是“那位出版商”，亦即埃伯哈德·弗里奇。但盡管我們可以在47號錄音帶上清楚地辨識出弗里奇，艾希曼卻謊稱他只參加過最初幾次會議。至于艾希曼講出的其他名字，都只不過是厚顏無恥的障眼法罷了。

按照艾希曼的講法，魯道夫·米爾德納曾以專家身份“被邀請參加會議”。米爾德納自1941年起擔任過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政治部門負責人，以及卡托維茲的蓋世太保頭子，后來還出任安全警察和黨衛隊保安局在丹麥的負責人。米爾德納的名字的確在薩森訪談會中被提到好幾次，但并非因為他在場，恰恰相反，與會者們都想知道是否有人清楚他的下落。錄音帶和抄本上有許多跡象顯示，他們認為米爾德納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190]](#_190_5)艾希曼有顯而易見的動機在1960年撒謊，宣稱自己“直到大約三年前才再一次與米爾德納說話……當著一位薩森先生的面，逐點反駁了”其關于納粹的說辭。[[191]](#_191_5)艾希曼跟魯道夫·米爾德納還有幾筆賬要算。他不但認為米爾德納妨礙了在丹麥遣送猶太人的行動，因此必須對他最大的挫折之一（也是對他個人的羞辱）負有責任[[192]](#_192_5)，更因為米爾德納在紐倫堡法庭對他不利的證詞而非常不滿。米爾德納的故事還可起到轉移注意力的效果，因為艾希曼當然清楚，既然像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這樣的納粹高層曾經在薩森訪談會上發言，那么有人在抄本中發現這個事實將只是時間問題。只有利用另一個納粹高層的名字，艾希曼才可能有效地掩護阿爾文斯萊本。一切跡象都表明，艾希曼選擇米爾德納這個名字的動機也是為了給他找麻煩。[[193]](#_193_6)

一般來說，艾希曼在以色列的供詞不會背叛任何昔日同僚——只要他不覺得他們曾經背叛過他的話。艾希曼通常只會提到一些早已死亡的人的名字，但即便如此，他還是盡可能地混淆視聽。艾希曼在接受審訊的時候曾設法保護阿洛伊斯·布倫納，在對方誤以為那人就是已被處決的安東·布倫納（Anton Brunner）時故意不加糾正。他還保護了薩森訪談會的另外一名成員，沒有更正其姓名的錯誤拼寫。波蘭記者曾于1961年在薩森抄本中發現了“朗格爾”（Langer）的名字。等到艾希曼在法庭上被問及此事時，他處心積慮地把那個名字曲解成“朗格博士，化名克蘭博士”（Dr. Lange alias Dr. Klan），并表示自己只在與薩森交談時偶然見過該人，由此把搜尋工作引向了臭名昭著的魯道夫·朗格博士（Dr. Rudolf Lange，他曾參與“特別行動隊”的大規模槍殺行動，并且參加了萬湖會議）。[[194]](#_194_5)對該人的搜尋行動始終不得要領，因為那個朗格在1945年2月被一枚反坦克榴彈擊中之后，就沒能活下來。因此若想知道更多關于訪談會的事情，恐怕無法期待從艾希曼自己的陳述中得到多少幫助。幸好文字記錄和錄音帶能夠透露更多事情。

我們雖然仍不清楚薩森訪談會參與者的全部細節，但薩森抄本所透露的內容遠比人們迄今已經看到的更多。除了艾希曼、薩森和弗里奇之外，至少還有另外兩人已可得到明確證實，分別是朗格爾博士以及那位來自科爾多瓦、此前不知何故完全被忽略的客人：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抄本中的一些線索甚至表明還曾經有女性訪客在場。薩森家舉辦訪談會的消息顯然很快已不脛而走，并變成一種社交活動。人們對此抱有很高的期望，于是那個計劃完全不再偷偷摸摸，而是引起了很大的關注。艾希曼自己對這種發展毫不以為意，甚至在有不認識的人參加訪談會時也照舊口無遮攔。他只是偶爾會對他們提出的問題感到不快。有一次，艾希曼在閱讀打字完畢的抄本時，忍不住寫下了自己對一名與會者的抱怨：“當我繼續讀到第三頁的時候，非常氣憤地感到自己被暗諷。我感謝布勞博士（Dr. Blau）編了這個選集，因為它能夠向那名奇怪的提問者證明，當你在這個問題上不具備專業知識時，亂做假定是多么愚蠢的事情。”[[195]](#_195_5)但艾希曼似乎并沒有問那個奇怪的提問者究竟是誰。在另外一次訪談會的錄音中，我們能夠聽見艾希曼小聲說，他不喜歡剛剛離開的那個他不知道名字的旁聽者。一個擔心自身安全和暴露身份的人，是絕不可能看起來如此輕松自在的。

薩森也不是總對來賓感到滿意。甚至可以聽到薩森有一次難掩怒火，他對正在轉錄一卷剛錄音完畢的錄音帶的打字員說，“今天下午”他遇見了一個“巴塔哥尼亞（Patagonia）的吹牛大王”。“私下里說，”他表示，“這回又有一點倒霉。”薩森不愿輕易放過那名惹人厭的訪客，又繼續補充道，吹牛大王“開著一輛蹩腳的汽車過來……那看起來可不像是巴塔哥尼亞人通常會開著跑來跑去的豪華新車”。[[196]](#_196_5)事實上果真有一個與薩森長年不和的人，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搬到了巴里洛切（Bariloche）：漢斯·胡安·馬勒，原名萊因哈德·科普斯。

馬勒比薩森年長四歲，和他一樣也是個多產的作家。在《路徑》創辦之初，馬勒即已成為杜勒出版社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尤其善于找到非法的門路來銷售刊物，其中之一就是在馬勒的家鄉漢堡附近設置的分發點。[[197]](#_197_5)后來，《路徑》編輯部出現了一些分歧，因為那個偽造“共濟會問題”的專家越來越偏離了弗里奇、萊斯和薩森的路線。馬勒發展出一種瘋狂的理論，要不是他已經陷入被迫害妄想之中，原本非常適用于創立一個狂熱的異教團體。他感到自己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已經不再安全，正受到兇手的追殺，還把自己想象成一個不世出的天才。[[198]](#_198_5)馬勒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搬到巴塔哥尼亞，打算在巴里洛切與杜勒出版社分庭抗禮。盡管馬勒在當地創辦了自己的旅館和旅行社，但出版事業并沒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樣繼續發展下去，反而變成了他一個人的自助出版機構，推出一些基本上無法銷售的書籍。但這個事實并沒有阻止馬勒在回憶錄中吹噓自己的巨大成就。巴里洛切是流亡納粹所喜愛的地點，位于距離布宜諾斯艾利斯大約1300公里的安第斯山腳下，令人想起瑞士山地的風景，這讓它非常受來自阿爾卑斯山區的移民的歡迎。弗朗茨·魯巴徹爾（Franz Rubatscher）、古斯塔夫·蘭切納爾（Gustav Lantschner）和昔日因斯布魯克黨部的高官弗里德里希·蘭切納爾（Friedrich Lantschner），在當地熱門的旅游區擔任滑雪教練。埃里克·普里布克（Erich Priebke）在城內經營一家名叫“維也納美食”的肉店。魯道福·弗洛伊德也在那里有一棟房子。[[199]](#_199_5)巴里洛切是一座時髦的城市，因此符合薩森提到的“豪華新車”的刻板印象。弗里奇顯然一直與馬勒保持聯系，所以很可能曾邀請他過來了解正在進行的計劃。我們甚至很可能有馬勒的談話錄音，因為在錄音帶一個簡短的片段里出現了有濃重漢堡腔的低地德語口音。[[200]](#_200_5)但不管怎樣，的確曾有人不遠萬里過來，想看看薩森到底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搞些什么名堂。可是就那個“開著一輛蹩腳汽車過來的吹牛大王”而言，薩森聽起來不像還會再度邀請他大駕光臨。

抄本和錄音帶也讓我們確定某些人不可能是聽眾。例如各種跡象都顯示，集中營“醫生”約瑟夫·門格勒從來都不在場。艾希曼和薩森一樣，也認識門格勒，而且就像他對待其他參與者那般，絕不至于錯過任何讓門格勒加入談話的機會。例如每當討論到霍特爾的時候，艾希曼就會轉向“朗格爾博士”，畢竟他“因公認識霍特爾”。有時艾希曼則擺出一副熱絡的姿態，以免所有問題都指向他一個人。比方說，他會反問：“您總該認得海德里希吧？”鑒于門格勒掌握關于奧斯維辛和納粹“醫學”的內部知識，而且艾希曼想要竭盡所能地避開這兩個主題，所以他絕不可能放過把發言的重大責任交給門格勒的機會。艾希曼甚至好幾次因為沒有幫手而表達遺憾：“可惜沒有曾和我并肩作戰的那個時期的同志，因為現在我開始意識到，由于這么多年沒有再回想過那些事情，我已經忘記了許多東西。”[[201]](#_201_5)尤其明顯的事實是，薩森曾讀過一篇關于門格勒的很長的文字，在相應的抄本中卻可發現，打字員竟然不認識“門格勒”這個姓氏，于是就像對待其他不知道的名字一樣，只留下了一個空格。從門格勒的日記可以看出，他是一個生性多疑且非常小心謹慎的人。正因為如此，他永遠不可能參加像薩森訪談會那樣的公開活動。不過薩森一定曾在其他場合，與門格勒討論了他在奧斯維辛的時光。因為薩森在1991年接受阿根廷電視臺的采訪時，仍然為門格勒在集中營進行的“人體實驗”進行辯護，并極力夸贊他的“文化素養”。他表示，門格勒一直試圖通過觀察“處于特殊情況下的”人，來發現人類存在的“本質和哲學”。薩森把毫無意義和理由的殘酷折磨看成“一種人性的展現”。[[202]](#_202_5)1991年時，薩森很明智地沒有告訴采訪者，他在艾希曼被綁架之后曾經接受摩薩德的報酬，用于查明門格勒的下落。

在1957年的時候，并不是每個人都像門格勒那樣怯于公開露面。阿根廷作者烏基·戈尼在進行廣泛調查的時候，遇到數目驚人的人自稱曾親眼見過艾希曼跟薩森交談。即便不得其門進入杜勒出版社圈子內的人也會這樣說，純粹是人性使然。例如戈培爾的崇拜者威爾弗雷德·馮·奧芬曾經夸口，當初是他介紹薩森和弗里奇相互認識的。但他其實在1951年才抵達阿根廷，明明比薩森晚了許多。但即使這些自我吹噓也清楚地表明，薩森家中令人毛骨悚然的聚會及其出席者曾經多么具有吸引力。凡是認為自己是個人物的人，都想躬逢其盛。在最初幾次的錄音中，艾希曼曾經表明他為什么愿意成為右翼極端主義圈子的公眾焦點：“今天早就沒有人追捕我了，這是很清楚的事情。”[[203]](#_203_5)

### 女性來賓

我們早已習慣了納粹逃犯過著隱秘生活的形象，以至于當我們閱讀比較困難的第一手材料時，往往會忽視一些顯而易見的事情。[[204]](#_204_5)因而薩森訪談會不僅規模宏大，而且甚至是個允許女性參加的社交活動，聽上去未免令人匪夷所思。即便如此，最初的一份抄本卻詳細記錄了此事，讓我們得以徹底推翻艾希曼日后對薩森訪談的描述，更何況那次的女性來訪還演變成了一場災難。最后，在艾希曼怒氣爆發之前，“女士們”被禮貌地請了出去：“全靠我克制住了自己的脾氣，才得以合乎禮數地跟那些女士道別。”[[205]](#_205_5)那么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

我們并不清楚那次訪談到底是怎么開始的，因為錄音帶出了問題，過了好一會兒才開始錄音。可是根據我們所能讀到的內容，訪談以一種相當俗氣的方式開始，即以歌德的“葛麗卿問題”（Gretchenfrage）開場：“阿道夫，說來聽聽，你怎樣看待宗教？”[\*](#_454)艾希曼則談起他那篤信宗教的妻子：“我的妻子也讀《圣經》，我讓她讀的。”他談起自己的婚姻生活：“有一次我撕爛了一本《圣經》，并扔掉了它，結果我的妻子很不開心。接著她又拿來第二本《圣經》，因為我們家還有另外一本。有一次，我把它也撕了，不過只撕成兩半……從此我的妻子閱讀那前后兩半，而且我已經發誓同意她繼續讀下去，讓她能夠快快樂樂。”艾希曼衷心希望自己的家人能夠過上比他更好的生活。就在別人開始認為他已經忘記政治前景之前，艾希曼補充說道：“我為我的妻子竭盡所能，就像我為德國竭盡所能。我自己的家庭不過是德國的一小部分而已。”[[206]](#_206_6)

盡管有過所描述的損毀《圣經》事件，但艾希曼確實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他妻子的虔誠宗教信仰，即便在黨衛隊對此表示鄙夷不屑之后也一樣。他自己家庭的宗教背景很可能起了一定作用。艾希曼的父親是搬到林茨市的新教徒少數派，不但積極參與教區活動，甚至還擔任過長老。在第一任妻子去世后，卡爾·阿道夫·艾希曼刻意選擇了自己教會的一位女性加入其子女眾多的大家庭。艾希曼在1957年仍然充滿孺慕之情地稱呼瑪麗亞·艾希曼（Maria Eichmann）為“我的新媽媽”。她是一位信仰虔誠的女性，不但自己經常閱讀《圣經》，更在繼子遵從父親意愿在礦場工作的一段時間，也送了他一本。艾希曼后來曾私下里告訴薩森，自己“在當時非常虔誠”。無論是出于自己的家庭教育，還是因為山區采礦工人傳統的虔誠信仰，16歲的艾希曼都讀了《圣經》，只不過是用他特有的方式來讀的：“我每天晚上都閱讀我那本《圣經》，用紅色和藍色鉛筆劃出特別讓我感興趣的段落，即《舊約》中的各場戰役……”[[207]](#_207_5)這種用顏色鉛筆劃來劃去的禮拜方式，很快就被他對一種特殊宗教的皈依所取代。艾希曼變成了“神的信徒”（gottgläubig），追隨國家社會主義所倡導的那種基于種族的宗教。然而艾希曼一直要等到結婚三年以后、1938年年初時才永遠脫離了基督教會。[[208]](#_208_5)當艾希曼與信仰天主教的薇拉·利布爾結婚時，他違逆黨衛隊的意愿在教會舉行了儀式，后來并一再捍衛妻子不放棄自己宗教信仰的決定。但艾希曼很可能沒有告訴薇拉，他在1943年11月正式向上級報告說，他的妻子“如今已是神的信徒”。[[209]](#_209_5)當艾希曼在以色列的審訊中被指出謊報妻子的宗教信仰時，相關文件證據顯然讓他感到很不舒服。艾希曼對宗教的看法，是他在余生中能夠坦率且前后一致地闡釋的少數幾個主題之一。在人生最后幾個月，艾希曼甚至還拒絕了要求他皈依基督教信仰的提議。但不管再怎么忠于自己的決定，艾希曼非常清楚，他的妻子有不同的需求。于是他不僅如其所愿讓最小的兒子上天主教學校，并且接受獄中牧師赫爾先生的提議，把他在監獄里使用過的《圣經》寄給了薇拉。[[210]](#_210_5)因此我們可以推斷，艾希曼確實如他在1957年向發問的女性來賓所宣稱的那樣，對曾經撕毀的《圣經》感到非常抱歉。

除此之外，艾希曼還努力對其“職業”生涯做出生動的描述。艾希曼聊起猶太事務部門辦公大樓內的一個房間，那里是他們完成謀殺工作之后演奏音樂的地方：“我的見習官彈鋼琴，我拉第二小提琴，我的士官拉第一小提琴，他拉得比我好太多了。”艾希曼也談起自己在最后時刻的英雄行為。戰爭即將結束之際，當他的所有同事都簇擁在負責偽造身份證件的那些人身邊時，他卻表示自己不需要新證件，因為在戰敗的情況下，他寧愿自殺。視死如歸的人竟然能夠活著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講述那番慷慨激昂的告白，此事似乎一點也沒有讓艾希曼感到羞愧，反而把上級對他的諸多贊賞拿來夸耀：“海因里希·米勒有一次對我說，假若我們有50個艾希曼的話，就一定能夠打贏這場戰爭。那讓我感到自豪。”此種大言不慚的態度顯然讓艾希曼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于是他接著說：“這只不過是為了讓你們一窺我的內心世界，因為你們還不了解我，不了解我的內心，而這是很重要的事情。”[[211]](#_211_5)

大屠殺兇手的內心生活似乎的確讓女士們非常好奇。她們想知道更多關于艾希曼的事情，于是有人繼續問道：“既然您是這么一位狂熱的國家[社會][[212]](#_212_5)主義者，那么是否有任何神秘主義、教義信條或民族主義生活的世界觀，也在您身上起了作用呢？”盡管錄音機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又出了毛病，但從后續的抄本仍可看出艾希曼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多么熱情。的確有過，艾希曼的第一任上司格雷戈爾·施瓦茨-博斯圖尼奇（Gregor Schwartz-Bostunitsch）教授便是一位神秘主義者。嚴格說來，那名身高180公分、扁平足、留山羊胡的男子形象古怪，是一個頂著唬人教授頭銜的煽動家。一旦他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述共濟會的危險，就沒有人能讓他停下來，因為他的耳聾幫他擋掉了一切反對聲音。施瓦茨-博斯圖尼奇甚至在希姆萊的圈子里也是個怪胎，盡管黨衛隊全國領袖希姆萊自己也曾經命人研究中世紀的女巫迫害案并制卡建檔，將德國西部的“艾克斯特恩巖石”（Externsteine）視為“原生日耳曼”（urgermanisch）的象征，而且還崇拜各種像是圣杯和騎士團之類只能勉強被稱為“神秘主義”（Mystik）的瞎胡鬧的東西。[[213]](#_213_6)艾希曼對這種東西不感興趣。他說：“我一點也不喜歡神秘主義……我們應該想方設法讓自己的后代能夠過上體面的生活，僅此而已。我不得不根據反抗的力道來鍛造我的武器。”但艾希曼的世界觀中也可看到激情和使命所產生的吸引力，即使在殘缺不全的抄本中仍可一覽無遺：“必須融入整體，因為在整體中存在著一個民族，一種血緣關系。”

艾希曼在此確實沒有撒謊，因為他一直認為有關猶太人活人祭祀的恐怖故事只不過是宣傳伎倆罷了，而且從一開始就斷定《錫安長老會紀要》其實是贗品，這讓薩森感到驚訝不已。艾希曼當然利用了這種蠢話在外國代表面前混淆視聽，但他并不需要用這樣的東西來說服自己實施謀殺。

錄音抄本打字員在接下來的段落插入了五個刪節號。雖然我們只能繼續讀到艾希曼在女士們離開之后所講的話，但還是可以大致明白事情的經過。艾希曼怒不可遏地說道：“我們為此付出了一切，付出了青春，付出了一切，付出了自由。有些人甚至還付出了更多，甚至包括他們的生命。所以我無法忍受有人告訴我說，還有什么事情會比國家社會主義在1933年1月30日掌權更糟呢？那讓我氣得發火！”[[214]](#_214_6)“女士們”中的一位顯然敢于冒大不韙，觸及了薩森圈內人在隨后幾個月的討論中都不愿重新提起的話題：1933年在德國“攫取政權”（Machtergreifung）后已經顯露出來的，那個極權主義政府的犯罪本質。我們不需要發揮太多想象力就能猜到，在艾希曼耗盡耐心之前，與那些女性訪客告辭得多么虛應故事。“全靠我克制住了自己的脾氣，才得以合乎禮數地跟那些女士道別。”[[215]](#_215_5)

這段插曲值得注意，是因為它表明訪談會那批人一開始就不怎么在意來賓的身份，以及是否有與他們相同的信念。我們不知道這些具有理性觀點的女性究竟是誰，不過有跡象顯示，其中之一或許是杜勒出版社一位來自比利時、與薩森有過一段情的女秘書。[[216]](#_216_5)此外，來自呂訥堡石楠草原的帆船船長女兒、與薩森一同橫渡大西洋的英格·施奈德也記得，她的妹妹安切曾告訴她，自己親自到過錄音的訪談會。安切·施奈德在與拜爾公司的南美洲代表結婚后改姓隆斯（Löns），但仍然為薩森傾倒，還收集了他的照片和戲劇評論。英格·施奈德后來則嫁給了曾任潛艇艇長的海因里希·萊曼-威倫布羅克（Heinrich Lehmann-Willenbrock）——約爾根·普羅赫諾（Jürgen Prochnow）曾在1981年的電影《從海底出擊》（Das Boot）里扮演過那位艇長的角色。英格·施奈德明顯比較保持距離，堅稱自己從未參加過薩森訪談會，而且只在其他社交場合見過艾希曼。[[217]](#_217_5)無論如何，讓艾希曼火冒三丈的那些女士們顯然并非像他那樣的“狂熱國家社會主義者”，卻仍然領教到他的狂熱。艾希曼毫不隱瞞自己的想法，并主動讓別人見識了他的“思維方式”（Denkungsart）（附帶說一下，這是康德哲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無論艾希曼、薩森，還是弗里奇，顯然都對想法不同的人缺乏戒心。反正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那些女性見證者還能把她們聽到的事情告訴誰呢？阿根廷有不可救藥的納粹分子，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他們的名字顯然更非秘密。而且必須承認的是，沒有人有興趣聽到這樣的話：“假若我們有50個克萊門特，就一定能夠打贏這場戰爭。”

### 不知名的助手：朗格爾博士

請繼續追問下去！

——薩森對朗格爾博士說的悄悄話[[218]](#_218_5)

來賓不是偶爾才出現在訪談會，因為薩森很少單獨和艾希曼進行錄音談話。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還有一位被所有人稱作“朗格爾博士”的先生在場。[[219]](#_219_5)我們不但能找到大量他提出的問題和意見，錄音帶中甚至還清楚保存了他所發表的一通長篇演講。因此令人不解的是，既然這個人在塑造所謂的薩森訪談上起了很大作用，為何他所扮演的角色迄今一直沒有受到注意。從朗格爾博士略顯遲疑的聲音中可以聽出他的激動不安，而他就以這種聲音描述了威廉·霍特爾的性格特征——在維也納的公務往來使他非常熟悉那個人。此外他與艾希曼也有過一些激烈的言語交鋒。以免有人產生疑問，這里先聲明：這個人的身份直到今天仍舊是一個謎，盡管他顯然曾經有過不同凡響的納粹職業生涯。

正如艾希曼經常沾沾自喜地指出的，朗格爾一直只待在維也納的黨衛隊保安局，而且同樣沒有服過兵役。在一次激烈的討論中，艾希曼質疑他，為什么要插手干預自己顯然完全不了解的事情。或者直接引用艾希曼的原話：“你這個可笑透頂的小子，你上前線打過仗嗎？”[[220]](#_220_5)但朗格爾博士熟知法律規定，當艾希曼談起他在德奧“合并”之后在奧地利的生活時，朗格爾強調了自己的經歷：“當時我在奧地利的另一個黨衛隊保安局部門工作，我們必須根據那項法律來執行評鑒公務人員的任務，亦即確認他們是否為猶太人。”[[221]](#_221_5)換句話說，朗格爾博士是負責在奧地利執行1933年頒布的“終身公務員制度”（Berufsbeamtentum）相關法案的人員之一，可以決定哪些人能夠繼續留任公職，哪些人不能。

由此可見，維也納黨衛隊保安局的這位朗格爾博士絕非泛泛之輩，至少曾經擔任過那樣一個職務，讓艾希曼在1957年仍然艷羨不已。當艾希曼解釋說，他的上司海德里希在布拉格過于忙碌，以致難得有時間顧及帝國保安總局在柏林的事務時，朗格爾一口反駁回去：“我可不相信這種事情，他至少總該有簽字的時間吧。”艾希曼怒氣沖沖地回應說：“既然您不相信，那我必須說，您是運氣好才會待在保安局……要不然的話，當時其他一切事項都是在第四局由米勒簽署的。”但朗格爾博士絕不輕言讓步：“在第四局？可我還清楚記得，我們收到的許多東西上面都有海德里希的簽字。”接著他又挑釁意味十足地補上一句：“當我在布拉格的時候，他總是空得出時間來。”艾希曼只能尷尬地說，“我在布拉格也和他一起”[[222]](#_222_5)，仿佛擔心在座會有人懷疑他一樣。這種愚蠢的“我的海德里希/你的海德里希”游戲揭示出，艾希曼的攻擊，其目的在于貶低朗格爾博士明顯具有的重要地位。海德里希被認為是第三帝國內部最野心勃勃的人之一，他可不會隨隨便便接見每一個人。朗格爾博士被視為知道猶太人在黨衛隊內部所占比例的專家。他表示：“比例很低，如果按‘雅利安證明’（Ariernachweis）來算的話，或許會高一點，但百分比無法確定。奧地利的比例很可能高于舊領土（Altreich）。”[[223]](#_223_6)此外他可以提供自己對漢斯·勞特爾（HansRauter）以及阿圖爾·賽斯-英夸特（Arthur Seyß-Inquart）[\*](#_455)等納粹要員的個人印象[[224]](#_224_5)，就連艾希曼偶爾也會求助于朗格爾的過人見識，只要能夠有助于他的目的。例如：“我們必須詳細詢問一下朗格爾博士，海德里希在1939年是否也擔任國際刑警組織的主席[†](#_456)。”[[225]](#_225_6)

如前所述，我們不知道朗格爾博士究竟是何許人也。但他的官階想必不會很低。“在我的部門有一位黨衛隊三級突擊中隊長。后來發現他有四分之一猶太血統，他恨不得殺了自己，但是我勸阻了他。后來他加入空軍，并在那里干得很漂亮。……據我所知，今天他在奧地利戰后新的民族主義運動中再次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226]](#_226_5)朗格爾博士對屬下明顯的自豪還有另外一層意義。在回答關于其手下人員的問題時，朗格爾直接向艾希曼抱怨，他不斷失去最好的干將：“讓我苦惱不堪的是，帝國保安總局總是把最好的人手從我這里調走。”[[227]](#_227_5)

盡管存在競爭關系，朗格爾博士還是掌握了一些就連艾希曼也渴望聽到的消息。在一次訪談會上，艾希曼簡直是在催促薩森針對一個讓他頭疼不已的問題詢問朗格爾，即戰爭結束時艾希曼自賣自夸言論的關鍵目擊證人。艾希曼強調“朗格爾博士……因公認識霍特爾”[[228]](#_228_6)，所以不妨請他對此發表一下意見。朗格爾隨即真的針對威廉·霍特爾發表了將近20分鐘的報告，完全就像在進行專題講座一般，因為聽得出來朗格爾用了事先準備的筆記，其中甚至包含對霍特爾那本書的解讀。盡管采取了這種既矯揉造作又裝腔作勢的姿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朗格爾變得輕松自在，以幽默的口吻談論起霍特爾的狼藉聲名和詭計多端的行為方式。然而這讓艾希曼覺得他的競爭對手受到了太多關注。他變得不耐煩，開始插話進來：“現在說完了嗎？”然后開啟了自己的一段冗長說明。那段陳述的內容是如此空洞，以致不禁讓人覺得，艾希曼只是在阻止朗格爾博士繼續占用他的發言時間。

朗格爾博士向艾希曼提出了一些相當尖銳的問題，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他有時候可能會產生負罪感。但我們如果因而認為，這名昔日維也納黨衛隊保安局人員是薩森訪談會上僅存的道德良知，那可就大錯特錯了。原始錄音帶泄露了阿根廷的打字員選擇略去的事項：朗格爾博士有權進入毛特豪森集中營（KZ Mauthausen）。他曾在薩森訪談會上表示：“我經常到訪那里，一次剛好有荷蘭猶太人被帶到了我的面前。”[[229]](#_229_5)朗格爾博士還因為與該集中營指揮官弗朗茨·齊賴斯（Franz Ziereis）的密切關系，得知有一道命令要通過勞動消滅荷蘭猶太人。他回想起“一次親身經歷，集中營指揮官向我解釋說，這批猶太人被分配完成這項工作，而實際上那項活計一個人最多堅持幾天”[[230]](#_230_6)。在薩森訪談會上，那些人興味盎然地討論了各種令人忍無可忍的通過勞動來毀滅的辦法。

就其他方面而言，朗格爾博士也絕非薩森圈子里的異類。他同樣對“猶太人的世界陰謀”深信不疑，并且像薩森一樣密切保持警惕，以免出現任何有助于“猶太學術”的事實。當艾希曼相當坦率地談論其上司恣意妄為的傾向時，朗格爾博士立刻嗅到其中的危險：“這樣一來，您當然就給了敵人更多現成的把柄，得以聲稱恣意專斷的態度占了上風。”[[231]](#_231_5)

關于朗格爾博士自己卷入猶太人大屠殺的各種陳述，幾乎全都沒有被轉錄成抄本，由此可見薩森已經向他的這位助手保證，會慎重保密。其他種種跡象也表明，薩森之所以邀請朗格爾博士參加訪談會，并非出于對其具體陳述內容的興趣。不同于薩森和弗里奇，朗格爾至少能夠對艾希曼所講的一小部分內容做出判斷。但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朗格爾和艾希曼在納粹時期竟然彼此完全不認識。畢竟艾希曼曾在1944年的最后幾個月組織了從布達佩斯到維也納的可怕的死亡行軍。這種在大屠殺方面的響亮名號，應該很難不傳入朗格爾博士那樣級別的黨衛隊保安局人員的耳中。朗格爾能夠提出質疑，并在薩森不明白的地方對答案做出判斷，因此朗格爾是在幫助薩森制衡艾希曼。一名前《路徑》工作人員強調，艾希曼在薩森訪談會上受到了真正的審訊。[[232]](#_232_6)當我們在艾希曼和朗格爾進行的一場高強度討論中，突然聽見薩森悄悄說“請繼續追問下去！”，便不難理解這意味著什么了。可是艾希曼很快就發現該如何應對朗格爾博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運用法令和法規。就此而言，艾希曼特別喜歡引述薩森訪談會上曾逐頁討論過的一本書，并巧妙地運用他在知識上的優勢。例如，為了證明其半真半假的理論，艾希曼曾經說：“朗格爾收到布勞博士的那本法規選集時，也是第一次看到它。”[[233]](#_233_5)

此外，艾希曼還使用了當年在柏林進行部際協調時貫徹自己意圖的技巧：擺出一副吹毛求疵的官僚模樣。例如在錄音帶上可以聽到，某次有人拿來一份資料，上面把艾希曼的部門表示為“IV A 4”。艾希曼起初變得非常緊張，然后斤斤計較地說道：“慢著，IV A 4，怎么回事？我能瞧一瞧嗎？您看，您只需要瞧一眼就能看出這個作者的愚蠢，是吧？那些作者自以為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您現在所見的只有幾個拼湊在一起的羅馬數字和大小寫字母，那些蠢蛋卻用它們來魚目混珠。那其實是IV A。IV A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個單位！”然后艾希曼滔滔不絕地解釋，為什么根本不可能存在IV A 4這樣一個部門名稱，表現得十分篤定、自信和傲慢。[[234]](#_234_5)但事實上，從1944年3月開始，艾希曼部門的名稱確實是IV A 4。嚴格說來，他的部門多年來總共有過四個不同的名稱：IV R、IV D 4、IV B 4，最后是IV A 4。[[235]](#_235_5)他知道得一清二楚，各部門的檔案文件只能通過單位編號來查詢，如果隱瞞編號，就能讓堆積成山的文件消失不見，并否認許多事情。后來以色列審訊官阿夫納·萊斯幾乎被艾希曼逗笑，看著他如何以“不可思議的頑固和狂熱”，否認了除IV B 4之外的所有部門名稱，并一再利用官方術語和單位內部名稱來故弄玄虛，直到有人拿出文件，提醒他所有混淆視聽的策略都無濟于事。[[236]](#_236_5)可是當艾希曼握有實權的時候，情況卻大不相同。以謀殺為工作目標的人不必設法說服別人，只需要爭取時間。有不少文件證明，艾希曼也玩弄把戲為他想做的事情創造先例。官僚的刁難并不等同于官僚主義本身，沒有人比艾希曼更了解這一點，因為他發現一切官僚主義都讓人討厭，而專門的工作人員就是為此而設。他曾向薩森吐露內情：“凡是與官僚主義有關的事情，我都交給手下的官員來辦理。”艾希曼的那些手下——例如恩斯特·莫斯和弗里茨·沃恩（Fritz Wöhrn）——就是“活生生的法律條文”，后來被他用作“官僚主義的制動器”（bürokratische Bremse）。[[237]](#_237_5)在與朗格爾爭辯的時候，只要對他有利，他也會自稱為“活生生的法律條文”；但如果朗格爾博士問出了讓艾希曼不舒服的問題，他馬上就改變方向：“您無法設身處地從我的角度來看事情，您永遠都沒有辦法那樣做，因為您直到最后一刻都一直待在黨衛隊保安局。”[[238]](#_238_5)

朗格爾博士究竟是誰？錄音帶上是誰帶著輕微的維也納口音，在別人遞給他飲料時彬彬有禮地說出“愿神賜福！”[\*](#_457)，卻可以面不改色地回憶毛特豪森集中營的恐怖行為？再一次，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幫不了我們。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表示，當他與薩森在廚房談話的時候，曾經跟一位名叫“朗格”的先生有過點頭之交。他聲稱那人曾擔任過奧地利某個大區的首長，真正的名字其實是“克蘭博士”（Dr.Klan）。[[239]](#_239_5)值得注意的是，艾希曼身邊確實有個人擁有那個帶有異國情調的姓氏，即摩薩德行動小組的醫生，在艾希曼被綁架后立即負責照顧他的健康。然而在阿根廷，姓克蘭或朗格的人都沒有找到。除此之外，不同于黨衛隊的層級結構，保安局并沒有在奧地利下面另外設置大區，因為整個奧地利都屬于一個單獨的保安局——“多瑙大區”（Oberabschnitt Donau）保安局。

朗格爾博士的身份直到今天仍然是一個謎。我們所能確定的只有他的故事、聲音與名字，因為人們在薩森家中不使用化名，而且艾希曼和朗格爾的確有可能在工作中遇到過，在艾希曼面前隱瞞身份是沒有意義的事情。[[240]](#_240_5)無論是黨衛隊隊員名錄[[241]](#_241_5)，還是維也納大學頒發法律或政治學博士學位的記錄[[242]](#_242_5)，還是許多同儕們杰出的專業知識[[243]](#_243_5)，迄今都還沒有帶來更進一步的認識，只留下一長串不可能人選的名單。“朗格爾博士”的例子再次清楚顯示，關于薩森訪談會還有事實尚待發現，以及我們對流亡納粹人士的了解有多么不足。

### 武器：言語暴力

薩森：您能用它打中蒼蠅嗎？

講話聲：能！

拍打聲和笑聲。

薩森：一只具有猶太秉性的蒼蠅……

一陣拍打。

薩森：蒼蠅尸體。

——薩森訪談會[[244]](#_244_5)

讓薩森抄本成為如此強有力的原始資料的主要因素，是我們在閱讀——以及尤其在聆聽——時直接面對的那些人的語言。凡是聽過艾希曼接受阿夫納·萊斯審訊或者庭審過程的人，都知道艾希曼如何以一種混合了自怨自艾、冷漠無情，時而還帶著挑釁抗拒的獨特方式，談論他自己以及他參與猶太人大屠殺、犯下危害人類罪行的經過。他沒完沒了的句子中充滿了扭曲迂回的想法，用所謂“錯綜復雜的層級結構和職權范圍”，以及“責任心重”和“必須奉命行事”之類的老掉牙借口，讓每個人都疲憊不堪。相形之下，艾希曼在阿根廷置身志同道合者的圈子內時，卻給人一種截然不同的印象，而且更讓人難以忍受。如果想要知道1957年的時候，那些人連續幾個月在阿根廷搞了些什么名堂，我們就必須花些時間，不但剖析他們的想法，還必須剖析他們的語言，即使不考慮其他因素，這也是相當罕見的第一手資料，讓人得以一窺這些自稱的“世界啟蒙者”所使用的行話。[[245]](#_245_5)所以我們不得不勉為其難，至少也要對阿根廷時期艾希曼在人前的樣子有一個基本印象。

乍看之下，艾希曼肆無忌憚、口無遮攔的言辭在談話中占了主導地位。艾希曼對其受害者有自成一格的劃分方式。他只關注“對國家具有重要意義的有一定地位的猶太人”，“對投閑置散的一般猶太人則根本不感興趣”。[[246]](#_246_5)他認為除了“有價值的猶太人”之外，還存在著那些“年邁且已被同化”、不管對誰都派不上用場的猶太人。這名狂熱的種族主義者如此解釋，仿佛這是世上最理所當然的事情。猶太人自己當然也想要保存“具有生物學價值的猶太血統”。[[247]](#_247_5)“就好比今天我有一個養雞場，需要100只或10000只下蛋的母雞，那么我實際上必須在孵化器內孵出20萬只雞，因為其中會有一半公雞，一半母雞。”[[248]](#_248_5)任何靠養雞為生的人應該都明白這檔子事。

艾希曼在執行遣送行動的時候當然費盡心力，“因為如果交付給集中營的勞動材料無法立刻投入工作，反而成為需要修理、完全無用的廢物，那是不符合我們利益的”。[[249]](#_249_5)艾希曼為自己經常在這方面取得成功而感到自豪：“您想想看，您該如何讓25000名猶太人，無論是人還是……就說25000頭牛吧，該如何讓25000只動物在路上消失不見呢？……您可曾看見過25000人聚集在一起嗎？……您看見過10000人擠成一團嗎？那是五列運輸火車，而且即便按照匈牙利警方讓運輸火車擠到爆的那種方式，頂多也只能在一列火車塞進3000人。”[[250]](#_250_5)艾希曼的對談者們無法真正想象，滅絕行動的組織者究竟會面對哪些困難。他又解釋說：“裝火車是非常麻煩的事情，不管裝的是牛還是一袋袋面粉……載人更是難上加難，尤其是你還必須應付各種問題。”[[251]](#_251_5)反正情況總是一樣的。起先一切都“非常充滿希望”，車輪“開始轉動，那種場面可以說是壯觀極了”。[[252]](#_252_5)遣送行動進展得“十分順利，沒有任何困難”。[[253]](#_253_5)有些行動甚至還“特別漂亮和出色，伴隨著各種附加的好處”[[254]](#_254_5)，然而接著就出現了那些“該死的問題”。[[255]](#_255_5)

艾希曼曾在戰爭的最后幾個月，命人在深冬徒步行走好幾百公里。但這個謀殺創舉在艾希曼自己口中卻并不叫作“死亡行軍”。“我所說的那些猶太人徒步旅行”[[256]](#_256_6)，是以“最優雅的形式”完成的。[[257]](#_257_5)接著他毫不猶豫地補充說道：“今天我可以告訴您，我在整個路途中只看見過兩具尸體，都是年邁的猶太人，畢竟‘哪兒要刨光，哪兒就會落刨屑’[\*](#_458)。難道1945年后，規模大得多的德國百姓隊伍從東方長途跋涉過來的時候就沒有‘落過刨屑’嗎？”艾希曼覺得，把數十萬匈牙利猶太人送上死亡之路是完全正常的事情，因為運輸行動“對每個人都有好處，包括猶太人自己在內”。[[258]](#_258_5)庫爾特·貝歇爾那樣的人之所以想讓猶太人活下去，僅僅是為了搶劫他們。艾希曼可不是這樣，“我們跟猶太人合作解決猶太人問題，其他人卻把猶太人當成實現目的工具，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壓榨他們”。[[259]](#_259_5)寧愿要一個規規矩矩的最終解決方案，也不要卑劣下賤的勒索——艾希曼自己當然從未出此下策。盡管他沒有給他的家庭帶來任何財富，不過：“謝天謝地，我沒有變成一頭豬。”[[260]](#_260_5)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并非每個人都認清了這一點，“因此還有許多本應已經聞過毒氣的猶太人，今天還在享受生活”。[[261]](#_261_5)

當然，艾希曼只著眼于大局，對個別人的命運完全不感興趣，因為“不管這個或那個抱怨鬼……扮演過怎樣的角色”，那根本就無足輕重。[[262]](#_262_5)“少數殘余分子或殘余團體”[[263]](#_263_5)——亦即他們未能殺害的那些猶太人——并不值得大驚小怪。但盡管如此，還是必須小心翼翼地避免出現任何例外。“在如此龐大的群體當中，單獨的個人就再也算不上什么了。然而我不能在那些法律專家面前這樣做，因為他們必須仔細查閱相關規定。”[[264]](#_264_5)在系統性滅絕行動中被忽略的那些人就是“保住一命”的人，他們“既沒有感染斑疹傷寒，也未曾受到肉體毀滅的波及”。[[265]](#_265_5)不過艾希曼的同僚們有時會“完成這些剩下的故事”[[266]](#_266_5)，例如維斯利策尼“后來還是殺死了斯洛伐克的猶太人”。[[267]](#_267_5)

如果猶太人的代表們還以為能夠通過會談來挽救任何東西的話，那么他們早就沒有了指望。因為對艾希曼來說，與猶太人代表的見面只不過是一個智力挑戰而已。“我很喜歡光明正大地跟所有那些猶太政治代表玩游戲”[[268]](#_268_5)，因為“正大光明是我的口頭禪”[[269]](#_269_5)。例如艾希曼相當坦白地承認，當他在匈牙利跟魯道夫·卡斯特納玩這個“游戲”的時候，實際目的只不過是為了“讓那個人繼續在他自己的猶太社區里面扮演綏靖大員（Beschwichtigungshofrat [!]）的角色”。[[270]](#_270_5)艾希曼談起他為了實現目標而運用的詭計和謊言時毫不掩飾自己的驕傲：“多年的經驗讓我學會了該用哪些釣竿來抓魚。”[[271]](#_271_6)這些“游戲”當中也包含了肆無忌憚的勒索：“當然，我曾利用勃蘭特一家向卡斯特納施壓。那不難理解是一場防御游戲。”[[272]](#_272_5)——至少，薩森和其他在場者立刻就明白了那是怎么一回事。

為了人道主義而自己冒生命危險的人，在艾希曼的世界里只有挨罵的份。例如拉烏爾·瓦倫貝里曾竭盡全力在匈牙利為受迫害的人們提供庇護和瑞典的證明文件，但他對艾希曼而言卻只是一個“假冒的外交官”，在那里“推廣自己”。[[273]](#_273_6)任何為猶太人挺身而出，阻擋“毀滅機器”[[274]](#_274_3)運轉的人都是不明事理的“干預主義者”，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因為每禮拜天上教堂而變得目光狹窄”。[[275]](#_275_3)誰要是像撰寫《格斯泰因報告》的庫爾特·格斯泰因那般，甚至在滅絕計劃上替敵人幫腔，那就是“ein A... mit Ohren”[\*](#_459)。[[276]](#_276_4)錄音帶謄寫者體貼入微地在此做出省略，因為有別于對酷刑和屠殺活動的詳細描述，他認為粗俗的表達是非常不得體的。至于那些未能完成遣送配額的下屬，艾希曼則影射地說道：“那是因為人道主義的觀點讓他們可以舒舒服服地藏在命令、規定和法條背后。”畢竟人道主義除了作為“借口”之外，還有什么用呢？[[277]](#_277_4)

當艾希曼用扭曲的比喻、溫柔的生活意象形容驅逐行動和屠殺項目時，其言語已經到了完全變態的程度。對艾希曼來說，那個強制移民的機構是他的“第一個孩子”[[278]](#_278_3)，可以讓他“在工作中具有創造性”[[279]](#_279_3)。在奧地利采取的各種掠奪與驅逐措施，全部都是為了向那個國家“注入猶太人問題的解決辦法”[[280]](#_280_4)。甚至連滅絕與遣送行動也是“誕生”出來的。[[281]](#_281_4)于是當他再也不可能把人遣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后，他感覺自己在布達佩斯已經變得完全多余，因為“我知道自己再也做不出有成果的事情了”。[[282]](#_282_3)如果工作成果就在于不斷向上攀升的謀殺數據統計柱，那么他對“成長”和“生命”也需要有稍微不同的理解。在艾希曼眼中，他送入死亡集中營的并非人類，而是向集中營“供應的材料”[[283]](#_283_3)。

“最終解決方案”根本沒有預期可能發生抵抗。當抵抗確實發生時，艾希曼覺得那完全不可思議，竟然集中營的工作人員“被一個發瘋的猶太人給打死了”[[284]](#_284_3)。任何有辦法從那個地獄中幸存下來的人，都是“偷偷溜走的人”。[[285]](#_285_3)

艾希曼和他的對談者都毫無顧忌地有話直說：猶太人“被毒氣毒死”、“白癡被燒掉”、遣送過去的人“像上了傳動帶一般在集中營不停被殺死”[[286]](#_286_3)他們顯然像希姆萊那樣，感覺自己在不拐彎抹角說話的時候更加強大。艾希曼無動于衷地表示：“我完全不在乎那些猶太人去了什么地方。對我而言，他們可以去馬達加斯加，或者去格洛博奇尼克那里聞毒氣，也可以去奧斯維辛，或者去里加。”[[287]](#_287_4)由于格調低俗的方式也可以因人而異，所有出席者都有自己的特殊偏好：在面對集中營的暴行時，薩森喜歡做出“繁殖本能的技術執行”和“男人的欲望”等等性暗示[[288]](#_288_3)，凡是猶疑不信的人都被講成是“白癡”或“蠢貨”。阿爾文斯萊本喜歡大肆強調，“猶太人成群結隊出現時會變得難以置信的殘暴”[[289]](#_289_3)，以及“血統中”流淌的“責任”[[290]](#_290_3)。朗格爾博士則喜歡詳細描述毛特豪森集中營所使用的折磨手段。[[291]](#_291_3)

但這并不表示那些人沒有細膩的情感。艾希曼告訴他在座的同志們，他感覺自己“真心為帝國擔憂”，“為帝國而戰栗”[[292]](#_292_3)，而且人們從中可以看出，“我是多么義無反顧地投身到這場斗爭中”。[[293]](#_293_3)第一次聽到有關滅絕計劃的消息時，他感到驚懼不已，并用希姆萊的話來安慰自己：“這種話說說很容易，做起來卻非常困難”[[294]](#_294_3)，以及“最終解決的整個工作”[[295]](#_295_3)，是一項“殺人的行當”[[296]](#_296_3)——艾希曼這么說的時候絲毫沒有反諷的意味。只有希姆萊的呼吁，在殺戮時盡量“避免不必要的痛苦”，聽起來宛如“管風琴的音樂聲”。[[297]](#_297_4)正是基于這個緣故，一些猶太人獲準進入他的“特萊西恩施塔特養老院”[[298]](#_298_3)，因為“他們在那里獲得最輕松的工作，那些工作是留給不慎還沒有死亡的老人的”。[[299]](#_299_3)

1957年在阿根廷的時候，艾希曼仍然能找到許多讓他感到自豪的理由。殺戮是必要的，因為“只有死掉的帝國敵人才是好的敵人。特別需要補充的是，接獲命令之后，我總是把命令交由行刑者執行，而且我直到今天仍然為此感到自豪”[[300]](#_300_3)。“如果我沒有這么做的話，他們就不會去到行刑者那里。”[[301]](#_301_3)最后，在匈牙利，幾個星期遣送40多萬猶太人的大規模行動，成了艾希曼的杰作。“那真稱得上是一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成就。”[[302]](#_302_3)要是之前沒有老是遇到一些困難的話，就更好了！最讓艾希曼受到打擊的是火車沒有裝滿，“在比利時這項工作非常糟糕”[[303]](#_303_3)。可是在丹麥發生了更糟糕的事情，因為艾希曼無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把猶太人送上死亡之路。“我不得不把運輸列車叫回來，那對我來說真是一個極大的恥辱。”[[304]](#_304_3)

\*\*\*

玩世不恭、無同情心、蔑視人性、道德淪喪、不知收斂與節制——這些用語都不足以形容艾希曼、薩森和他們的同儕在1957年時所表現出的模樣。它們完全無法讓人聯想起什洛莫·庫爾恰爾筆下那名耶路撒冷的囚犯：“進行調查的心理學家非常熟悉納粹文獻的風格。艾希曼的風格卻截然不同，枯燥許多，缺乏強有力的表達。他選擇這種風格并不是要引起情緒反應。”[[305]](#_305_3)漢娜·阿倫特雖曾非常正確地指出其“駭人的荒謬”（makabre Lächerlichkeit），導致恐怖有時會因此變得滑稽，不過基于阿根廷的文件，她關于艾希曼“缺乏思考能力”以致“無法表達自己”的說法卻顯然站不住腳。[[306]](#_306_4)艾希曼在阿根廷的發言與其他談話人一樣，并非沒有思想的胡言亂語，而是基于一套完整思想體系的邏輯一貫的言論。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說，這些判斷言過其實。在此缺少的并非論據基礎，而是批評極權主義結構的基本意愿。其原因正在于這些人自己的自以為是。這些人強調暴力的一致性，無論承受暴力的是自己還是別人。暴力本身成了目的。戰爭結束12年之后，他們仍未意識到與暴力保持距離的必要性，至少弗里奇、薩森和艾希曼依舊是正在戰斗中的世界觀戰士。然而他們除了語言和夸夸其談之外，已經失去了所有武器。正因為如此，直面他們的語言可以幫人打開思路，以便處理那些僅靠對歷史事實的認知與想象力無法解讀的文件。從這種語言中可以清楚看到對文明的拋棄，讓國家社會主義者對人類犯下可怕的罪行。正如系統化的大規模屠殺不能用一連串偶發事件和零星暴行來解釋，而是一個徹底扭曲的政治思想所造成的后果，薩森家客廳內進行的訪談也嚴重偏離了一切道德準則。如果“無存在價值”一詞[\*](#_460)果真有適用對象的話，那就是這些人在阿根廷的言論所依據的思想體系。這正是為什么相比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言論，薩森抄本讀起來甚至更加費力。在接受審訊和審判的過程中，不僅艾希曼明顯收斂了許多，而且另一方的聲音至少都是以理性和正義為導向，例如來自審訊官、法官和檢察官的聲音，更何況還有對這一切做出評論的新聞媒體。他們讓我們有機會重新找回自己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讓我們感到自己和他們一樣是多數人。而在阿根廷的訪談中，我們完全只能依靠自己。

在薩森訪談會上，已有的材料中沒有一次顯示曾經有人對討論的基調提出反對。對那些先生們來說，討論的基調顯然與主題配合得天衣無縫。沒有誰覺得必須呼吁尊重人權和講求人道、停止胡言亂語，或者至少離席以示抗議。根本沒有人心生反感或者感到害怕。所爭論的始終只是德國人的自我形象，而任何不得不離開訪談會的人，都對自己的中途離席表示遺憾。[[307]](#_307_3)承認謀殺之后，緊接著毫無窒礙地討論其他項目和安排日常事務。[[308]](#_308_3)薩森在會議結束后繼續開著錄音機，趁整理收拾之際對打字抄本做出一些指示，或者針對剛離開的客人發出刻薄的評論，這時就能聽見他吹著快樂的口哨與家人交談，仿佛一個辛苦做完工作的人愜意地回到家中。[[309]](#_309_4)“最終解決方案的工作”在此就是例行公事，正如謀殺也不只是一個討論話題。但對這個群體所用語言的分析讓我們能夠對納粹黨人向他們宣布為非德國人的人所施加的暴力有一了解：剝奪他們的一切法律地位，最終剝奪他們的生存權。我們的價值規范在薩森訪談會上根本沒有發言權，因為只有來自無底深淵的聲音在主導對話，而且它未曾給任何人帶來困擾。沒有什么更令人信服地表明了及時傾聽話語的重要性，因為正是在此類言語中，一個道德的世界最終可能走向消亡。一旦思想陷入了這種窠臼，便不再有任何論證能夠阻止它產生謀殺行為。

### 敵人：書籍

那些作者們撒起謊來信口雌黃，信口雌黃，我就是這么講的。

不管那人是叫波利亞科夫還是張三李四——他叫什么來著？

對了，賴特林格！他說謊的程度更甚于波利亞科夫，

或者科貢，或者那些叫什么名字的家伙……

——艾希曼，73號錄音帶[[310]](#_310_3)

從一開始，薩森訪談會的主要工作就是共同閱讀和評估書籍，因為在1957年的時候，關于納粹滅絕猶太人的專業文獻還是有限的。值得注意的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那批人設法獲得了關于這個主題的每一本德語書籍，盡管其中一些的發行量并不大。因此薩森和他的同伴們對此進行了徹底的研究，當然也花了一些錢，因為德語書籍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自然不便宜。盡管《路徑》有自己的書評部門，杜勒出版社通常卻無法指望獲得評論贈書。因為多次在聯邦德國被禁止銷售已讓該出版社名譽掃地，以致不太可能有人看重來自世界那個角落的書評，更遑論自己耗費重金寄書過去。于是埃伯哈德·弗里奇一再利用《路徑》的社論向忠實的讀者求救，請他們寄送與討論主題有關的報刊文章或書籍。在個別情況下，弗里奇當然也曾求助于他的作者們，以及迪特爾·福爾默那位昔日的同事。反正不管怎樣，他們在尋找文獻方面花了很多功夫。討論會的書單則進一步展現出薩森與同伴們從事那個新興歷史研究的系統化方法。

在第一次錄音時，艾希曼和薩森就已經開始引用相關著作中的文字。艾希曼引述了紐倫堡審判的記錄[[311]](#_311_4)，薩森則詢問起亞歷克斯·魏斯貝格《約埃爾·布蘭德的故事》[[312]](#_312_3)以及格爾拉德·賴特林格《最終解決方案》[[313]](#_313_3)的關鍵詞句。他們用了將近30卷錄音帶來討論那兩本書，接著也花了很多時間討論萊昂·波利亞科夫和約瑟夫·伍爾夫的文獻叢刊《第三帝國與猶太人》。從39號錄音帶開始，他們詳細討論了不久前才首次整理出來的國家社會主義立法匯編：1954年由布魯諾·布勞（Bruno Blau）推出的《德國猶太人的例外法規，1933-1945年》（Das Ausnahmerecht für Juden in Deutschland 1933-1945）。[[314]](#_314_4)由于布勞曾是柏林猶太醫院的非自愿病患，艾希曼或許還記得他。該醫院被用于拘留暫時無法被遣送的猶太人，而且有證據表明艾希曼曾經前往視察，因為那里也屬于他那個部門的管轄范圍。威廉·霍特爾的《秘密戰線：納粹特工局黑幕》一書更具有特殊意義，但這主要是因為霍特爾個人的緣故，以及他作為大屠殺主要見證人的角色——當然，也因為朗格爾博士和艾希曼都認得作者本人。不過他們最關注的還是賴特林格的《最終解決方案》，而且在討論時一再回到這個主題。就連最后的錄音也在處理這本大部頭著作。[[315]](#_315_3)為了讓在座者共同參與討論，有時部分書籍會制作副本以便帶回家閱讀。但是從朗格爾博士為關于霍特爾的討論所做的準備工作可以看出，至少他也有自己的書。

除卻這些被集體討論的書籍之外，艾希曼和其他人還單獨閱讀了其他相關圖書和文章。艾希曼提到過歐根·科貢的《黨衛隊國家》，以及由美國起訴人羅伯特·肯普納作序推薦的《紐倫堡審判》。我們知道，艾希曼幾乎讀遍了關于這個主題一切找得到的資料。[[316]](#_316_3)他還帶來報紙文章的消息，因為艾希曼可以通過自己的家人獲得德國和奧地利報紙上的文章。此外與薩森不同，他還閱讀《阿根廷日報》，布宜諾斯艾利斯那份具有悠久傳統、被視為自由派（尤其是猶太人）的德文日報。閱讀“敵方出版物”顯然是他在阿根廷繼續從事的專業職責之一，但話說回來，艾希曼當然也想借此查明是否有人掌握了他的行蹤。艾希曼在薩森訪談會上選擇談論的那些文章，清楚表明他仍在監視著“敵人”。薩森家中除了堆滿的圖書之外，還奢侈地提供了大量最新的歐洲報紙和雜志，而且不局限于塔登的《帝國呼聲報》（薩森也曾為之撰稿）或《維京號召》（Wiking-Ruf）之類來自極右派陣營的刊物，更有《明星周刊》《明鏡周刊》，以及荷蘭的《人民報》（De Volkskrant）。有時，房子主人還會為其他人翻譯當期《時代雜志》中的文章。[[317]](#_317_2)在20世紀50年代末，或許沒有其他任何人像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這些人一般，在這樣一個知識豐富的團體中，充分鉆研有關“最終解決方案”的文獻。盡管如此，他們卻幾乎沒有理解任何事，因為其首要目標并非通過一起閱讀來拓寬自己的視野。

三年后在以色列，艾希曼想必曾多次感激地回想起這段閱讀時光。艾希曼最著名的照片之一，顯示他在審判開始前坐在牢房內堆滿書的桌邊。那些都是他早已非常熟悉的書，標示特定頁面的許多字條更表明艾希曼完全知道如何運用它們。[[318]](#_318_2)負責審訊艾希曼的以色列警長阿夫納·萊斯憂心忡忡地注意到：“結果發現他對那個領域了若指掌，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319]](#_319_2)萊斯也談到自己和同事們必須在短時間內熟讀文獻是多么困難的事情，還精辟地總結道：“賴特林格對我們來說就是圣經。”甚至在審訊者把書買來之前，那名被審訊的囚犯就早已對那本“圣經”倒背如流了。艾希曼試圖隱瞞此事，這表明他已經充分意識到，阿根廷的薩森訪談讓他獲得了什么樣的重要地位。艾希曼假裝感激終于能夠獲準讀書，并且撒下彌天大謊，表示十分遺憾自己從前沒有機會閱讀此類書籍。其實他不但早就在阿根廷讀過了這些書，甚至還練習了如何反駁它們。我們簡直可以說，艾希曼在反駁那些專業書籍的時候，已經預先演練了日后等待著他的審訊，因為沉思式閱讀從來都不是艾希曼讀書的方式。

薩森訪談會的成員在一件事上取得了共識：專業文獻“來自敵人”[[320]](#_320_2)、“來自敵對方面”[[321]](#_321_2)、是“敵人的宣傳”[[322]](#_322_2)、是由“敵對作者”[[323]](#_323_2)所撰寫的“敵對文學”[[324]](#_324_2)、是“敵對刊物”[[325]](#_325_2)，而且最主要是“敵方的論證”[[326]](#_326_2)。或者簡言之，人們所能讀到的一切都出自“猶太敵人”之手。[[327]](#_327_2)仿佛理所當然地，他們指責受害者一方竟然針對這個主題著書立說，而昔日的加害者一方卻迄今沒什么人對此主題感興趣，以致未能寫出自己的書來。貼上“猶太”的標簽，就等于暗示任何相關作品都不是正經學術研究，只不過是宣傳罷了。艾希曼解釋道：“對這些猶太人來說，事情非常簡單。他們只需要在事件發生后信筆胡謅，隨性寫下對他們有利的東西就好。”[[328]](#_328_2)遇到不合己意的內容，艾希曼就聲稱“作者要么無知要么心懷惡意”[[329]](#_329_2)。今日我們公認為大屠殺歷史研究先驅的那些作者們，在艾希曼及其同志的眼中可并非如此，“職業寫手”[[330]](#_330_2)、“半瓶醋”[[331]](#_331_2)、“蠢貨”[[332]](#_332_2)、“豬狗不如的東西”[[333]](#_333_2)是艾希曼對他們的慣常稱呼。薩森訪談會的全體參與者都對那一類研究持保留意見，稱之為“所謂的學術成果”。[[334]](#_334_2)

這種不尊重學術研究的態度，并非只是為了保護自己不受指責而胡亂出口傷人。國家社會主義基于其粗糙的種族理論，拒絕一切具有“國際”性質，亦即不以種族為依歸的思維方式。這最終意味著科學也無法脫離種族而存在。相應的，存在著“德國物理學”和“猶太物理學”。就連公認具有普世性質的科學也無法幸免于此類劃分：對國家社會主義者而言，甚至還有“猶太數學”。[[335]](#_335_2)甚至科學也攸關著種族斗爭的最終勝利，于是任何學術活動都被貶低為純粹的戰術手段。換句話說，對真理的追求必須讓位給“與世界觀敵人的戰斗”。當然，他們認定每一個種族集合體也都“抱持同樣的態度”。到頭來每個人都在玩弄戰術技巧，尤以猶太人為甚。“猶太人布蘭德既然是那本書的作者，怎么可能不符合猶太人的心態而少說謊呢？畢竟他是半個拉比的兒子。”[[336]](#_336_2)專家艾希曼說。

書是誰寫的其實并不要緊。威廉·霍特爾的那部作品也同樣遭到艾希曼的無情貶損。霍特爾的文字“荒唐可笑，是癡人說夢，是蓄意欺騙。這么寫的人抓住任何機會躍躍欲試、嘩眾取寵，1945年以后更全是為了撈取個人利益”[[337]](#_337_2)。

他們閱讀此類書籍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找出作者們如何操弄事實，生產出他們想要的真相，以便學會如何揭穿那種“把戲”，并在必要時自己也依樣畫葫蘆一番。因為阿根廷的那批人深信，每個人都在這場解釋權爭奪戰當中進行操弄——至少他們竭盡所能說服自己相信這種鬼話。但他們的努力并不總是成功，因為即使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讀者，也無法抵抗大量信息的強大說服力。

薩森和朗格爾越是鉆研那些著作，就越頻繁地產生令人不安的疑問：他們所讀到的東西說不定是真的。有這么多讓人根本無法懷疑的細節，而且即使艾希曼主動承認的事情，也遠遠超出了那些人想要聽到的內容！艾希曼看出了這個問題，于是從歌德那里借來最具德國特色的語言描述他對那些書的看法：“正如我所說，從那些不幸的日子直到今天，出版的一切圖書都是由杜撰與事實（Dichtung und Wahrheit）[\*](#_461)構成的大雜燴。”[[338]](#_338_2)但艾希曼沒有想到的是，有些人認為另一些日子比戰爭結束更加不幸。像艾希曼那樣多話的人，有時難免說溜了嘴。因此，在激動之余，艾希曼也泄露了他區分“杜撰”與“事實”的標準：“書中一切講我壞話的內容只會惹我生氣……我把它們都當成謊言。”[[339]](#_339_2)

艾希曼向敵方文獻的宣戰，實際上讓他自己陷入了雙線作戰。其他人可以集中精力攻擊那些研究成果，捍衛他們幻想中的歷史。艾希曼除此之外，卻還必須設法應聲說出薩森訪談會成員想聽的話，因為他確切地知道，他的對話者們并非戰友，而是對手。他不但必須做出各種歪曲的解釋，而且更要轉移注意力，讓大家避開他所熟知的事實。薩森和弗里奇或許可以拒絕承認歷史事實，艾希曼卻不得不隱瞞自己遠遠超出專業文獻范圍的知識。他為此付出的努力簡直難以衡量。艾希曼首先必須根據自己對罪行嚴重程度的認知，找出書中寫了什么。接著要考慮如何轉移別人對危險內容的注意，同時從與其他人一樣的角度否定書中的說法。然后這位備受追捧的專家還必須不斷在訪談中添加“新的”信息，卻又不至于過多地暴露自己。尤其重要的是，他在這樣做的時候必須避免被抓住把柄。無怪乎艾希曼在1960年接受以色列警方審訊時能夠處于極佳狀態了。

除了已經相當復雜的情況之外，薩森訪談會的另一個困難在于，剛開始時大多數書對艾希曼而言都是新的，因為他基本上只了解書評而不知道書本身。薩森經常利用這個優勢，至少稍微抵消一下艾希曼在信息方面的巨大優勢。他向艾希曼提出具體的歷史細節，卻不直接透露消息來源是哪一本書。薩森與書本結成的這種同盟關系當然沒有瞞過艾希曼，從他不斷提出與書中內容有關的具體問題即可清楚看出這一點。最重要的是，薩森喚起了艾希曼的好奇心，想知道書中究竟針對他和他的罪行寫了哪些內容。從薩森借給他第一本書《約埃爾·布蘭德的故事》開始，整個過程就總是大同小異。艾希曼在早期的談話（6、8、9、10號錄音帶）中曾親口表示，他到目前還不知道那本書：“我也沒有讀過那本書。可惜我沒辦法弄到它，因為它在幾個月前才剛剛出版。不過我曾在許多報紙上看到過一些書評。”[[340]](#_340_2)薩森故意忽略艾希曼的暗示，反而強調他自己對那本書非常熟悉。艾希曼沒敢直截了當地詢問薩森是否可以把書借給他，不過他經常引人注意地強調，如果什么時候有機會“研讀一下”該書的話，肯定有助于喚起他的記憶[[341]](#_341_2)：“如果能通過書中的解釋，或者其他書籍對該書的引述刺激我一下，那么我或許能說出更多東西。”[[342]](#_342_2)盡管如此，薩森還是拖延了艾希曼好幾個星期，而且只在討論期間共同閱讀了那本書。一直要等到24號錄音帶的時候，艾希曼才終于獲準獨自看那本書，并且在不被別人打斷的情況下念出自己的讀書筆記。[[343]](#_343_2)艾希曼很快便意識到，薩森其實一點也不天真，而且基本上不能算是一位朋友。

但這些書也不僅僅是敵人。艾希曼最危險的天賦之一，就是能夠有效利用各種解讀，即便這意味著必須濫用它們。作為訓練有素的世界觀戰士，他本能地在每一頁都擔心會出現“敵方”的攻擊，即為了“猶太人”的政治目的而操弄歷史。但令人驚訝的是，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從同樣的書本中獲得幫助。光是閱讀魏斯貝格《約埃爾·布蘭德的故事》出版后的書評，便足以讓艾希曼燃起這種期待。他告訴薩森：“如果現在要我討論有關卡斯特納博士的事情，我可以做得到。因為如今，在約埃爾·布蘭德那本書出版以后，人們會相信我說的。但我非常懷疑，在猶太人布蘭德的書出版之前會有誰相信我。”[[344]](#_344_2)這個期待雖顯得魯莽輕率，其實卻并不像乍看之下那樣天真得瘋狂。畢竟艾希曼已經練習了許多年，如何扭曲書中的內容和作者原意來支持自己的說法。他在1938年的時候，已經把一部關于猶太復國主義歷史的開創性著作挪為己用，導致作者沒辦法再繼續寫下去。所以艾希曼很早便已學會，只要掌握一種詮釋技巧，而不是著眼于通過閱讀來學習，就可以讓書籍一直成為自己的盟友。即使薩森也總是嚴重低估了艾希曼的這種本事，一次又一次試圖通過引用書中文字讓艾希曼方寸大亂，結果都未能成功。薩森和其他所有為學習而讀書的人一樣，沒有認清一個事實：艾希曼在資訊方面的領先優勢，是永遠無法借由書籍或文件來迎頭趕上的。對曾經“躬逢其盛”的人而言，書是一種記憶輔助器；對缺乏親身經歷的人來說，書卻只會描述他們所不知道的事物。當薩森還在設法從書中勾勒出艾希曼行為的大致輪廓時，艾希曼早已從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來閱讀了。他了解得比作者們更多，看得出他們的缺陷和誤解，于是有辦法不公正地利用學術研究的公正來以矛攻盾。這正是戰爭的運作方式：利用對手的弱點來打擊其一切可能的優勢。于是艾希曼的一個辯解與撒謊策略，就是反復引述實際上是譴責他的書籍。艾希曼喜歡說：“我相信有位作者已經在書中這樣說過了。”[[345]](#_345_2)當有人對他的陳述提出嚴重質疑時，他會給出建議：“我請您仔細查閱一下在戰后出版的相關文獻。”[[346]](#_346_2)任何白紙黑字印出來的東西，總是可以被詮釋得與原本的意圖大相徑庭。

如果艾希曼真的想從通過閱讀學到任何東西，那就是戰斗技巧。他似乎一直在尋找適用于自己論述的技巧和噱頭。例如他在《約埃爾·布蘭德的故事》的導言中讀到了一項坦誠的聲明，表示魏斯貝格和約埃爾·布蘭德當然只能設法還原當初的各種對話內容，因此它們盡管接近事實，卻未必是可靠的第一手資料。艾希曼在其中看到的卻并非努力開誠布公，而是“猶太人的滑頭作風”，并對這種“寫作上的自由”印象十分深刻，從此開始在這方面動腦筋探索各種可能。他在相關錄音帶的抄本上寫給薩森：“過了這么長時間之后，重新回憶起那許多事情顯然非常困難。但如果我們堅守真相，還是必須在書中把它們說出來。約埃爾·布蘭德和他的作者也做過類似的事情。”[[347]](#_347_2)四年后，當艾希曼寫作《偶像》的草稿，也就是他最后一篇為自己辯白的長文時，就仿佛理所當然地用了這種方法，從一開始就讓自己免受攻擊：“這篇文字創作是無法用法律條文的尺度來衡量的。”[[348]](#_348_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經指出，我們可以從對待讀者的方式來判斷一位作者。艾希曼卻展現出，我們也可以反過來。畢竟艾希曼對待書本的方式與對待他的受害者的做法類似，同樣都倨傲不恭、肆無忌憚、粗暴蠻橫，最終產生了毀滅性的效果。艾希曼的閱讀習慣因而也讓我們可以有所體會，為什么他在擔任“猶太事務主管”期間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艾希曼沒有完成高中學業，也絕對算不上知識分子，卻靈活游走于文字的世界。這與那名昔日銷售代表搖身變成在毀滅人命方面前所未見、駭人聽聞的即興創作大師同樣令人驚嘆。造成這種高效率的謀殺，至少有一個原因是顯而易見的，艾希曼在開始對話或閱讀之前很久就已經打定了主意，那就是爭斗與毀滅。猶太團體代表與艾希曼打交道時犯下的致命錯誤，就在于他們確實相信自己能夠影響艾希曼的決定，而艾希曼早已設下了“謀殺猶太人”（Judenmord）的目標，且不允許置疑。艾希曼閱讀文獻的方式與此如出一轍，這正是他能夠如此快速而有效地利用書面文字的原因。艾希曼在翻看一本書的時候，就仿佛竊賊闖進一個住家那般：順手拿走任何自己用得著的物品，而且只根據這種功利的標準來判斷一切。其間有什么會受到破壞，或者會留下什么東西，這已不是他感興趣的問題。艾希曼并不是要在書里面確認自己的想法，而是要為其謊言找到有用的憑據。這是一個重要的差異，因為后者在一開始就排除了疑問。真正的讀者卻可能心生疑竇，即使這也意味著懷疑自己。這種開放的懷疑——亦即與自己心中的想法保持距離——需要花時間才得以促成，因為作者的興趣與文本內在的連貫性需要慢慢顯現。簡而言之，讀者通常是在尋求與作者進行對話，而艾希曼卻只在乎如何讓這個對手變得無害，并且用表面上對文獻的興趣來掩飾自己的意圖，還假裝出對其他各種理論的開放態度和對其作者的尊重。正因為如此，艾希曼讀得比其他任何想要認真討論的人都快。不過最重要的是，這也讓艾希曼變得對歷史撰述而言非常危險。因為學術研究著眼于誠實和可靠，而它面臨的最可怕對手，莫過于一個僅僅把學術研究看成一種策略的人。在對書籍的關注中，艾希曼再次顯露了自己的毀滅意志，務必摧毀一切擾亂其對真相的設想和對其自我形象構成威脅的事物。無論是在選侯大街116號的辦公室，還是在薩森家的起居室，任何人若以為自己有辦法通過事實或論據影響艾希曼的判斷，那么在那么想的時候他就已經輸掉了。對那個參加過總體戰的人來說，對話就像其他東西一樣，到頭來也只不過是一件武器罷了。然而艾希曼在阿根廷所面臨的問題是，他無法決定是要用這件武器對付薩森，還是應該向他做出解釋。

### 認知：滅絕

我本質上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

對我來說，看見這樣的東西并不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因為我會緊張得顫抖起來。

——艾希曼，薩森訪談會[[349]](#_349_2)

我們很難判斷，對于像薩森和弗里奇這樣的人來說，與艾希曼的這次經歷究竟多么令人咋舌。他們原本雖然希望通過談話來了解實情，卻怎么也料想不到竟然會發現這種規模的納粹滅絕行動，甚至還直接面對了恐怖的真實面貌。正如1961年在以色列接受審判時所做的那樣，艾希曼在阿根廷也談到了他親眼目睹的謀殺暴行：被大規模集體槍殺的男女和兒童、被驅趕到一起遣送的人群、用毒氣卡車進行的殺戮、死亡集中營、“篩選”的過程，以及焚燒尸體。一切在不久前還被《路徑》斥為戰勝國恐怖宣傳的事物，現在都經由艾希曼的字句而得到了確認與證實。他對此知道得相當清楚，盡管他不愿意——例如在奧斯維辛——仔細關注工業化大規模屠殺的詳情，寧可保持距離讓集中營指揮官向他做出“最繪聲繪色的”細節描述。“我從來沒有從頭到尾看過整個滅絕的過程，我不是那樣的人。”[[350]](#_350_2)對他來說，結束時的公開焚燒尸體就已經足夠了。艾希曼雖然認為滅絕猶太人是正確的事情，但他并不樂意直接面對受害者的恐懼、痛苦和死亡。艾希曼令人信服地重申：“我去集中營是辦事情，不是出于我個人的好奇心。”他還講述了集中營指揮官如何“興致盎然地向一個坐辦公桌的人實地展示了他日復一日的職責”[[351]](#_351_2)。艾希曼的一些描述讓人不禁覺得，他在薩森訪談會上向出席者描繪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時，表現得其實很像赫斯那名昔日的集中營指揮官。他未經美化的報告既詳細又坦率，沒有談到所謂“運轉順暢”的殺人機器或快速的死亡，也沒有提及德國人的高效率或者在謀殺時的井然秩序。相反，艾希曼描述了大規模謀殺多么令人難以忍受——當然主要是對他而言，讓他這個奉派過去的旁觀者感到不舒服，而且“膝蓋顫抖”。但問題并不在于兒童也必須死去，而是因為當艾希曼必須看著那種事情發生的時候，他自己已經有了兩個小孩。他向薩森訪談會的參與者承認：“我是那種沒辦法看尸體的人。”[[352]](#_352_2)艾希曼的敘述中充滿了令人無法忍受的自憐自艾，因為他不得不眼睜睜看著別人承受他一心想要，并且一手促成的苦難。盡管如此，艾希曼成功通過這些敘述扮演了時代見證者的角色，成為恐怖事件的編年史家，試圖說服自己和其他人，他與滅絕行動沒有任何關系，他無力改變一切，而且此類“公務旅行”讓他變成了“一個不快樂的人”[[353]](#_353_2)。

但這些描述當中還夾雜著其他的意涵。海因里希·希姆萊曾經告訴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指揮官，他必須戰斗，以便后代子子孫孫不必再進行同樣的戰斗。由此，滅絕猶太人的行動被提升到另外一個層次，變成了對赫斯和艾希曼之類的人一輩子所欠缺的東西——實地在前線作戰的經驗——的彌補。這并不是說，艾希曼的手下或者其他占據此類“免服兵役職位”（Unabkömmlichkeitsstellung）的人，樂意與斯大林格勒的士兵們交換位置——反正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艾希曼的部門真的曾有人主動請纓調往前線。但他們依然缺乏廣受歌頌的戰爭經歷，無法親身體驗何謂袍澤情誼、戰火考驗、視死如歸和英勇戰斗，因此前線作戰部隊從來沒有真正承認他們是同志。武裝黨衛隊對一般黨衛隊的厭惡與嘲笑更是格外引人注目。畢竟可以理解的是，必須在前線幸存下來才有辦法得到晉升的人，自然不樂意見到別人在柏林的辦公桌后面也能獲得同等獎勵。艾希曼在阿根廷也清楚表明了這種差異。[[354]](#_354_2)于是他除了念念不忘希姆萊的認可之外，更有必要向別人表明，參訪死亡集中營時所面臨的考驗甚至比前線更為嚴酷。泉涌的血液與碎裂的骨頭，克服自身恐懼和面對暴力行為——艾希曼也經歷過那一切，同樣明白何謂袍澤情誼，以及與戰友的同舟共濟。因此他保護了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指揮官赫斯，表示赫斯是個完全不同的人，截然不同于人們想象中擔任那種職務者所該有的模樣。艾希曼為他那位死去的袍澤辯護道：“假如我必須奉命擔任集中營指揮官的話，我也不會做出任何不同的表現。若是有命令要求我用毒氣殺死猶太人或者槍斃猶太人，那么我就會執行命令。此外之前已經講過，我不會為沒有接到那樣的命令而感謝命運或者對命運不滿，因為不管怎樣都沒辦法對著風撒尿。”[[355]](#_355_2)當他在薩森家的客廳沖一名對話伙伴吼道，“您這個可笑的家伙！您在前線打過仗嗎？”的時候[[356]](#_356_2)，艾希曼顯然已經開始相信自己的“前線經驗”了。他繼續罵道：“想想看，我已經告訴過您，當時我們正在進行一場總體戰，前線跟后方的界限已經完全模糊了。我必須清楚地反對和駁斥一些不可救藥的腦袋瓜，包括德國人自己，因為他們宣稱上一場戰爭只發生在前線……一旦宣布了總體戰，消滅敵人就不再有任何分別。”[[357]](#_357_2)雖然艾希曼確實親眼見到了一些可怕的事情，可是他顯然已經完全忘記，他的“敵對勢力”是手無寸鐵、驚恐萬狀的人，而他自己卻穿著溫暖的冬大衣，由司機開車載著去看他們被消滅。他想向別人證明，他自己也曾吃盡苦頭，而且只為德國受苦受難。這種渴望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艾希曼會如此坦率地描述恐怖事件。

他的聽眾表現出了不同的反應。朗格爾博士談起自己至少在毛特豪森集中營所聽聞的酷刑和毀滅，薩森和弗里奇則在真相面前瞠目結舌。基本上沒有人追問，因為他們聽見的內容已經足夠消化了。薩森指示轉錄員把對滅絕行動的重復描述省略掉。聽眾的驚駭與厭惡顯而易見：作為小說家的薩森在描繪所謂“戰勝國”的拷打時，能夠把極度暴力描繪得淋漓盡致。可是面對猶太人的苦難，他卻只能默不作聲。但這并不表示薩森不愿意相信艾希曼和朗格爾博士，而是恰恰相反。那兩個人都跟集中營有所關聯，因此能夠彼此分享自己的所見所聞和自憐自艾，而薩森明顯是被嚇壞了。與此同時，艾希曼期盼被認可的愿望卻實現了。薩森精準地說了一句話，想必讓艾希曼聽得心有戚戚焉：“這場戰爭的戰場叫作毀滅營。”[[358]](#_358_2)那正是艾希曼為自己的“前線服役”所要求的尊重。然而在記錄了薩森想法的長篇口述記錄中，他認為艾希曼、赫斯，以及奧迪洛·格洛博奇尼克所參與的危害人類罪行“不可原諒”。[[359]](#_359_2)雖然薩森接下來還是急忙表示，他們的行為“可以理解”，因為艾希曼和包括直到希特勒在內的其他人都“受到了操弄”；但他并沒有為此改變自己的看法，始終認為那些罪行是不可原諒的。當后來有人在報告中找到關于兒童運輸（Kindertransporte）的說明，而艾希曼一本正經地稱之為“兒童故事”（Kindergeschichte）的時候，連薩森的“諒解”也至少暫時地消失了。[[360]](#_360_2)艾希曼清楚注意到薩森的驚恐，于是厚顏無恥地改口否認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您已經找到了這么多文件和報告，現在我想知道關于小孩那檔子事的文件在哪里。當然，我的意思是可以信得過的文件。否則現在我對這件事情就沒什么好說的了。”[[361]](#_361_2)我們不知道這種說法是否讓薩森放下心來，但他至少提不出反面證據，而且他也不打算反駁艾希曼。然而在以色列，艾希曼終于有機會看到關于這些罪行的文件。他自己當然非常明白，那些文件不但存在，而且當初就是他自己下令讓兒童運輸列車的車輪“滾動起來”的。[[362]](#_362_2)

將薩森和弗里奇——甚至還有阿爾文斯萊本——與朗格爾博士和艾希曼區別開來的，就是對集中營的親身經歷。不過根據我們對朗格爾的了解，他只知曉并親歷了與艾希曼有關的罪行的一小部分，而且他所知道的內容多半來自與毛特豪森指揮官的談話。盡管如此，朗格爾和艾希曼在某個方面還是驚人地團結一致：在描述那些親身經歷的時候，他們都以受害者的身份自居。朗格爾在毛特豪森集中營親眼見過像“死亡階梯”（Todesstiege）那般可憎的東西。他為自己必須面對這樣的負擔哀嘆不已，卻跟艾希曼一樣，無法為真正的受害者流露出同樣的感傷情懷。朗格爾博士和艾希曼都給人一種印象，即他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協助創造出來的這一切如何得到了完全實現。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自我中心態度，在其他許多作惡多端者的敘述當中都可以找到，一直到希姆萊都是如此，其著名的“波森演說”（Posen-Rede）里充滿了對那些既可憐又受盡折磨的謀殺兇手的體諒話語。

這種加害者與受害者角色的翻轉，從精神動力學的觀點來看是一個減輕負擔的做法。它不僅攸關犯罪者事后的回憶（亦即事后的抑制），而且正是這種對意識的抑制，當初才使犯罪者得以付諸行動。艾希曼清楚地意識到，必須盡可能保護自己不受這種恐怖行為的影響。他解釋說：“但大自然給了我一樣好本事。我能夠很快轉移注意力并把事情忘記，卻不必刻意這么做。”[[363]](#_363_2)艾希曼有一些有效的手段來促進這個過程，尤其是飲酒。然而就像他對自己的了解一般，艾希曼對那種抑制機制的知識也遠遠超出了這種簡易麻醉劑的功用。[[364]](#_364_2)意識也可以被刻意轉移，而且不是只有之前提到過的“遁入大自然”那種做法。艾希曼在薩森訪談會上解釋說：“我從小就學會了一篇非常虔誠的箴言，每當遇見一些讓我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時，我就會止不住地想起它來。為了強行轉移注意力，你們知道我會自言自語些什么嗎？你們聽了會笑的！我心中想著：我相信天主圣父、圣靈和圣子，由圣母瑪利亞所生，死于般雀·比拉多手下，曾經吃盡各種苦頭，然后從死者中復活，等等。”[[365]](#_365_2)

安東·韋伯神父是納粹在羅馬的逃亡幫手之一，曾經運用一些手段，來確定他協助取得新身份的那些國家社會主義者，是否真的已經找到了回歸信仰之路。“我讓他們背誦《天主經》（Vaterunser）[\*](#_462)。這樣馬上就可以辨別出到底誰是真的，誰不是。”[[366]](#_366_2)艾希曼至少在速度上給韋伯神父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因為他連珠炮式地背誦教義，在五秒鐘之內就把事情搞定了：“我很小的時候就已經會這么做，那時我當然還是一個虔誠的信徒。當我說出來的時候，其他什么也沒想。”[[367]](#_367_2)

### 背信棄義

我在這份報告中只看到了一個動機，

一個單一的行動理由：他像憎恨瘟疫一樣地討厭您。

——薩森談論維斯利策尼[[368]](#_368_2)

薩森在訪談的過程中一定注意到了，談話并沒有真正縮小他與艾希曼之間的距離。他的那位對話伙伴總是比他快上一步，處理文件和信息的時候總是動作更迅速一些，其消息靈通的程度更是讓人望塵莫及。與其他旁聽者的交鋒，以及朗格爾博士提出的批判性法律問題，顯然都沒有讓艾希曼感到不安。但薩森與日俱增的挫敗感也是源于他根本不想聽到有關危害人類罪行的真相，因此認為那方面的事實一定是謊言。薩森幻想著真相被隱藏起來了，并且一心想要接近它。但當艾希曼表現得過于自信，甚至在41號錄音帶發表了一篇小感言之后，薩森在8月底決定改變自己的戰術：他為艾希曼設下了一個陷阱。[[369]](#_369_2)

談話如往常一樣地開始了。薩森拿起波利亞科夫和沃爾夫的那本書，卻沒有告訴艾希曼，他們即將討論的文件并非出自“敵人”之手，也不是猶太人的“信口雌黃”——而是由艾希曼自認為最好的朋友之一迪特爾·維斯利策尼所寫。[[370]](#_370_2)

艾希曼在1934年秋天第一次遇見比他年輕五歲的維斯利策尼，但他自己并沒有說明，首次見面的地點究竟是慕尼黑還是柏林。盡管起先接觸很少，不過自從維斯利策尼調職到II 112部門之后，亦即從1937年2月開始，二人便交往得比較密切，而且天天聯系了。維斯利策尼曾短暫擔任過艾希曼的上司，但因為未能獲得晉升而在1937年4月離開柏林，一直到1940年8月都待在但澤市的黨衛隊保安局。等到他回到柏林，并成為艾希曼的下屬之后，二人之間的聯系再次變得更加規律。但隨著維斯利策尼被任命為巴爾干地區的“猶太事務顧問”，他們親自見面的機會又變得有限。一直要等到1944年3月，當維斯利策尼加入艾希曼在匈牙利的特別行動分隊時，兩人之間才重新建立起密切的關系，但這種關系又隨著維斯利策尼在1944年年底枉費心機地想為自己建立較好的戰后形象而受損。艾希曼后來反駁了他們鬧掰的說法，而且這回他可能講的是真話，因為維斯利策尼直到1945年4月都還待在艾希曼身邊，即便后來他極力否認此事。[[371]](#_371_2)

艾希曼和維斯利策尼之間有著復雜的私人交情。艾希曼顯然對維斯利策尼相當友好，他的第三個兒子迪特爾就是以維斯利策尼的名字命名的，而且艾希曼曾公開稱贊過維斯利策尼的教育水平與才智。維斯利策尼曾在大學攻讀神學，可是因為家中財力匱乏而中斷了學業。艾希曼甚至在二三十年后，都還記得他們當初共同討論的內容。對維斯利策尼來說，二人之間的關系卻有著不一樣的面貌。1946年被囚禁在布拉迪斯拉發的時候，當局要求他寫下關于艾希曼的報告，結果他光是針對那個人就密密麻麻寫下了22頁文字。此外還有100多頁關于“最終解決方案”、“大穆夫提”、“菲亞拉新聞事件”等主題的報告，其中出現了更多關于艾希曼的細節。[[372]](#_372_2)盡管企圖貶低艾希曼，但那些文字也流露出仰慕和依戀的跡象：維斯利策尼多年來似乎觀察了艾希曼身邊的每一件事和每一個人，而且即使在不利于自我辯護的情況下，仍然繼續宣稱自己對艾希曼了若指掌。維斯利策尼甚至對他根本不在艾希曼身邊時所發生的事情也消息靈通。這種密切關注明顯具有癡迷的色彩。維斯利策尼不但記得艾希曼的眼睛顏色、傷疤、呼吸聲和動作方式，甚至還記得他的牙齒：“即使在他的尸體上，我也有辦法認出他的黃金牙橋。”[[373]](#_373_2)

維斯利策尼曾多次自告奮勇要幫忙在短時間內找到艾希曼，以便也將他繩之以法。盡管當局不肯釋放維斯利策尼，他還是煞費苦心地寫下每一個能想到的搜尋地點，而且這份清單也展現了他對艾希曼的卓越了解。盡管所有建議的地點都不正確，但那只是因為艾希曼并不像每個人所以為的那么容易預測。維斯利策尼的證詞顯然受到兩個動機的影響：自衛的本能，以及與艾希曼的強烈情感聯系。這種情感聯系時而正面地表現為理想化的依戀，時而又負面地表現為一股報復的沖動。在布拉迪斯拉發，當維斯利策尼企圖撇清關系時，這種強烈的情感聯系演變成一種盲目的仇恨，除了常見的扭曲事實之外，還驚人地宣泄出大量的謊言、誹謗和侮辱，幾乎到了難以理解的地步。這種行為無法僅僅用自衛來解釋。

1957年的時候，艾希曼知道維斯利策尼早已在布拉迪斯拉發被處決，更知道維斯利策尼在紐倫堡說出了對他不利的證詞，因為所有報紙都曾經進行了報道。[[374]](#_374_2)盡管艾希曼在薩森面前駁斥了那些證詞，但他當然明白，維斯利策尼講的是實話。這固然令人不快，卻還可以理解。可是艾希曼萬萬沒有料到，維斯利策尼接著竟然又會寫出那樣的東西。他認為，他的那位朋友受害于“勝利者的司法”，或許還曾遭到“刑訊逼供”。艾希曼自己從前也經常采用此種做法，非常清楚可以通過它達到什么目的。[[375]](#_375_2)艾希曼在阿根廷很喜歡談論維斯利策尼，并且經常這么做。當初艾希曼組織匈牙利別動隊的時候，維斯利策尼便自告奮勇參加，而且一直是其最可靠的人手之一。艾希曼原本非常想提拔他，只可惜他無法滿足黨衛隊的一項標準——維斯利策尼無論如何就是不想結婚。即便艾希曼在匈牙利極力設法說服他，卻始終不得要領。艾希曼從來沒有弄明白是為什么。

當薩森開始朗讀維斯利策尼的《最終解決方案》（該文被收錄于《第三帝國與猶太人》一書而首次出版）時，艾希曼還完全沒有起疑心。他像往常一樣跟這名所謂的“作者”唱反調，批評該人撒謊和“幼稚無知”[[376]](#_376_2)，借此為自己和昔日的伙伴們辯護。以至于到了最后，艾希曼甚至是為保護維斯利策尼而反對他所不知道的維斯利策尼的證詞。薩森當天幾乎用了兩卷錄音帶來玩那個奇特的游戲[[377]](#_377_2)，連續數小時看著艾希曼全情投入到文本中，越來越暴跳如雷。只見他用破綻百出的論點，一句接一句地攻擊那名天生讓他覺得危險的作者。在薩森的不斷挑動下，艾希曼最后聲稱：“這其中固然有很多真實的地方，可是那個作者不求甚解。”[[378]](#_378_2)結果他不得不從薩森口中聽到，那名作者對事實了解得多么徹底深入：“這份報告來自維斯利策尼。”薩森抄本清楚地顯示出，這個消息給艾希曼帶來了多大的震撼：“什么是真相？您知道真相是什么嗎？我知道，您可不知道。他是怎么被審訊的？”[[379]](#_379_2)薩森聽他結結巴巴說了好一陣子，然后補充道：“我只能告訴您我的個人感覺。我認為在完成這份報告的時候，絕對沒有人受到任何直接、迫切的威脅、折磨或類似的手段。我在這份報告中只看到了一個動機，一個單一的行動理由。那不是一般所稱的為自己‘洗脫罪名’，因為這對知識分子——我如今逐漸了解的像維斯利策尼那種知識分子——來說并不會起太大作用。他有一個基本的動機，而且是一個非常原始的動機：他像憎恨瘟疫一樣地討厭您。”[[380]](#_380_2)除此之外，“嫉妒……已轉變成非常明確的仇恨，尤其因為他被抓到了，而艾希曼沒有”。[[381]](#_381_2)最后，薩森詳細說明了維斯利策尼如何積極設法協助同盟國搜捕艾希曼。艾希曼顯然已經疲憊不堪，回答說：“那是搖尾乞憐。”[[382]](#_382_2)讀到這里不禁讓人懷疑，那是不是或多或少也在講他自己。當天訪談的結束是一個很少見的時刻，讓我們直到今天都還能窺見那個不戴面具的艾希曼——精疲力竭、失望透頂、不知所措，而且非常受傷：“我對這一切都搞不明白……這一切都讓我很不明白。”[[383]](#_383_2)

薩森故意在談話中讓艾希曼陷入尷尬的處境，導致他明顯深受打擊。可惜薩森對審訊技巧了解得還不夠，否則他一定會知道這種方法只在一種情況下會成功，那就是要有充分的時間利用這種局面接連追問下去。這樣的戰術只有在持續不斷的審訊中才可能奏效，亦即在拘留別人的時候。但假如那個深受震動的人有辦法回家休整，并且意識到發生了什么事情，結果就會完全顛倒過來。這正是發生在阿根廷的事情：艾希曼清楚意識到薩森蓄意玩弄了他的情緒，還把他引入一個陷阱。于是在接下來的訪談中，他的發言變得猶豫遲疑，并且或暗或明地呈現出攻擊性。前幾次訪談中充滿信賴的氛圍頓時消失不見了。[[384]](#_384_2)

薩森這位狂熱的撲克玩家已經“叫牌過高”。他自己的錄音給了我們一條線索，說明他為什么要冒這么大的風險。原來薩森堅信維斯利策尼還活著。他在磁帶上口述道：“我想在此重申一次，我不相信維斯利策尼已經死了。只要他們對艾希曼還沒有把握，維斯利策尼就會被留下來當預備隊。”[[385]](#_385_2)薩森所稱的“他們”不言自明，當然又是“猶太人”，還有他們的陰謀詭計，向世人謊稱維斯利策尼已被處決于布拉迪斯拉發。薩森的謊言繼續稱，其實“國際猶太人”需要有人能夠按照他們的要求反復宣稱數百萬猶太人遭到了謀殺，以便以色列繼續勒索德國付款。由于那幾百萬人的講法只不過是一個“傳說”罷了，因而“他們”不確定艾希曼是否會證實它。值得注意的是，艾希曼從未向薩森談過這個瘋狂的理論，結果真正對艾希曼“感到不確定”的人反而是薩森自己。他竭盡全力想弄清楚艾希曼到底站在哪一邊，同時用盡辦法孤立艾希曼。薩森試圖抹黑艾希曼的每一個上司和同僚：海德里希只是一個為暗黑勢力跑腿的聽差，蓋世太保米勒根本不是真正的國家社會主義者，艾希曼的屬下則是說謊的叛徒或者庸碌無能的跟班，而艾希曼自己卻完全沒有注意到這一切。薩森試圖強化自己的陰謀論，而根據其理論，艾希曼只是國際陰謀集團手中的一個傀儡而已。于是薩森首先必須讓艾希曼清楚意識到他迄今所相信的一切都是錯的。對于薩森扭曲歷史的做法而言，最大的威脅莫過于存在一群立場堅定的納粹黨人，確實曾經清醒并一致地對猶太人進行了大屠殺。為了讓艾希曼成為其篡改后的歷史圖景的關鍵證人，薩森必須讓他方寸大亂，完全失去對自己的確信，直到他認同并支持薩森的“真理”。這個過程也被稱為洗腦，但在艾希曼身上沒有成功。艾希曼立刻意識到存在著一份非常危險的文件，甚至已被公開發表，他卻對此一無所知。此外他還意識到，他曾經認作最好朋友的那位昔日同僚已竭盡全力地把他出賣給敵人。艾希曼更意識到，他在阿根廷視為新朋友的那個人正肆無忌憚地想要操弄他。艾希曼知道他被兩個所謂的朋友背叛了，一個老朋友和一個新朋友。主導下一次訪談的人已非薩森，而是朗格爾博士，主題也相對安全無害：他們繼續共同閱讀國家社會主義“猶太立法”匯編。然而，這種避免沖突升級的策略卻沒有起到什么作用，恰恰相反，在接下來幾次會議中，討論從一個爭議轉向另一個爭議。艾希曼開始極力強調自己的觀點，盡管有些地方是薩森并不想聽到的。不對，艾希曼當然是遵照希特勒的命令行動；不對，消滅猶太人并不是“非德意志的”，反而從根本上是一個德意志的行動，必須繼續為之辯解，而艾希曼自己曾是負責執行該任務的德國官員。作為猶太人問題專家，他所執行的正是希特勒想要的。“您不妨仔細讀一讀那些演講、咨詢一位精神病專家，然后您就會發現我是對的。”[[386]](#_386_2)錄音帶上清楚呈現出一個咄咄逼人、頑固強硬，并且前后一貫的艾希曼，但人們在以色列卻最多只隱約感到這一點。這個人都不需要穿上制服，就能夠在老同志們之間散播焦慮和恐懼。薩森、弗里奇和朗格爾博士幾乎無力與他抗衡，討論內容有時完全偏離了原先的方向，整個項目甚至面臨失敗的危險。艾希曼抱怨道：“我的想法對你們毫無疑義，至少今天如此，因為我生氣了，因為有人試圖把這整件事情帶離正軌……是的，先生們，既然有人不保持客觀，那只好由我來保持客觀。但接著我會保持沉默。”[[387]](#_387_2)

仲裁者：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388]](#_388_2) （獻給烏基·戈尼，無論如何本章的一部分內容必須歸功于他）

在薩森抄本的最后三分之一，我們突然遇見一位全新的發問者。在一次溫和、懇切的談話中，有人設法勸說艾希曼。例如他開口就客氣地表示，“我無意聲稱我完全了解您”，接著小心翼翼地詢問那名大屠殺兇手的感受，畢竟他“一定有過自己的想法”。[[389]](#_389_2)發問的那群人于是反復試圖誘導艾希曼承認他曾是一個受外來勢力操縱的工具。這位新加入者的身份，在56號錄音帶薩森對他本人的長時間訪談中得以揭曉[[390]](#_390_2)，原來那個人是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391]](#_391_2)

在阿根廷的最高級別納粹也參加了薩森訪談會，這個事實與另一個現象同樣令人困惑：盡管薩森對阿爾文斯萊本的詳細采訪內容多半已對外公開，卻直到今天都難得有人注意到他也在場。1957年的時候，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居住在約莫600公里外的科爾多瓦（Cordoba），那里是有特定某種過去的逃亡者的另一個群聚中心，多年來因為極右派人士在此舉辦“仲夏節慶祝活動”（Sonnenwendfeiern）而臭名昭著。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也曾在那里有一棟房子。盡管相距600公里，阿爾文斯萊本卻無疑經常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薩森家中參加訪談會，并協助他讓艾希曼開口講話。有一派觀點主張，納粹逃犯之間很少或根本沒有接觸，因為他們之前多半彼此不認識，或者在逃亡以后難得相遇。但這個看法很難站得住腳，尤其在阿爾文斯萊本的例子中，即使在逃亡期間，他仍然與阿道夫·艾希曼和約瑟夫·門格勒之類的人物保持聯系。[[392]](#_392_2)

威廉·薩森與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之間的對話是這么開始的：“你想知道我對海德里希的看法嗎？我想試著用幾句話表達……”于是兩個朋友聊起天來，熱絡地以“你”相稱，十分愜意，談笑風生地講述往日時光，但也談到未來，以及所有在座者依然熱衷的理念：一種淺顯易懂、被稱為“國家社會主義”的世界觀。對缺少經驗的薩森抄本讀者來說，我們掌握的談話部分開始得相當詭異——上來就是負責聽寫打字的那個人絕望的注記，表示磁帶出了問題。結果是一堆雜七雜八的文字，讓人深刻體會到何謂“攪帶”（Bandsalat）。不甘心就此放棄的人（以及熟悉他們在阿根廷所讀書籍的人），卻很快會明白那究竟是什么名堂：他們正在閱讀威廉·霍特爾的《秘密戰線：納粹特工局黑幕》一書。為了與阿爾文斯萊本的談話，薩森選取了關于萊因哈德·海德里希的那個章節，以便詢問阿爾文斯萊本對那個人的看法。幸好錄音帶從這一刻開始恢復正常，我們又得以跟上討論的內容。討論涉及了海德里希、希姆萊、納粹的陰謀、國家社會主義的世界觀、猶太人大屠殺及其背后的原因、黨衛隊道德觀，以及元首的夢想。

就這些主題而言，薩森不可能在阿根廷找到比阿爾文斯萊本更好的人選，因為那名薩克森人除了1.98米的高大身材之外，更曾位居要津。阿爾文斯萊本打一開始就是納粹“運動”的成員，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就與戈培爾有所往來，并長年擔任黨衛隊全國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的首席副官。接著他前往波蘭和克里米亞，在那里推動納粹政策及其各種罪惡的施行。最后，他在德累斯頓黨衛隊和警察領導人的崗位上結束了自己的職業生涯，走上流亡之路。根據阿爾文斯萊本自己的說法，他熟識“在這個樂團里表演的大多數先生”。他們在公函中以昵名相稱，納粹圈子內的每個人都曾經知道（而且現在仍然知道）“布比”[\*](#_463)是何許人也。阿爾文斯萊本的受害者們也都無法忘記他的傲慢與專橫，更別提他在波蘭和克里米亞的殺戮所造成的災難性影響了。他領導的“境外德意志人自衛團”（Volksdeutscher Selbstschutz），甚至讓鐵石心腸的黨衛隊兇手們都覺得過于殘暴。據估計在四個月的時間里，曾有兩萬到三萬人受害，其中包括了波蘭的知識分子、神職人員、猶太人，以及任何被阿爾文斯萊本視為“游擊隊員”的人。他在波蘭直接參與了4247起謀殺案，這足以讓他在缺席審判中被判處死刑，并促使聯邦德國于1964年簽發對他的逮捕令。而對薩森與他的朋友們來說，阿爾文斯萊本和家人在戰后逃往布宜諾斯艾利斯，卻毫無疑問是一大幸事。阿爾文斯萊本曾經向他那位“親愛的黨衛隊全國領袖”寄上諂媚的信件和自己孩子們的照片，甚至從來沒有因為言語侮辱戈培爾一家和針對希特勒發表一些尖銳的批評而受到處分。在全世界幸存的納粹分子當中，他是知道最多內幕消息的人士之一，更是阿根廷級別最高的納粹：黨衛隊和警察的中將，1944年即已成為黨衛隊的第147號人物[[393]](#_393_2)（希姆萊排在第一），并且在武裝黨衛隊排在第90位[[394]](#_394_2)——必須注意的是，那是在整個第三帝國的排名。

作為希姆萊的首席副官，他的影響范圍和他的知名度同樣驚人：副官負責安排“黨衛隊全國領袖”的日常例行活動，包括其所有參觀和出訪。因此在許多表現希姆萊出門視察的紀錄片當中，都能看到阿爾文斯萊本那個大個子的身影。他從一開始就位于權力的中心，而且正如1938年他的一份考核報告所言，阿爾文斯萊本“知道如何讓他自己和他的工作處于最顯眼的位置”。[[395]](#_395_2)

阿爾文斯萊本在薩森抄本中透露了許多關鍵信息，根據其中的三個，即可容易地辨認出他的身份：他出生于薩勒河畔的哈勒市（Halle an der Saale），曾經擔任過國會議員，并且是武裝黨衛隊的中將。其余細節都只不過是確認了他的身份而已：他與希姆萊的親近關系、1942年被調到俄羅斯、他在關于納粹時期的故事中所強調的尊貴地位與權威、明顯的階級意識，尤其是他提到與保羅·范·肯彭（Paul van Kempen）和赫伯特·馮·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等音樂大師的交情。阿爾文斯萊本更不無驕傲地說：“美國人在達豪由于找不到別的東西，便拿起我的照片掛到一棵樹上，然后對著它開槍。”阿爾文斯萊本的照片確實并不難找，例如1933年以來的每一本德國國會手冊里面都有。

在訪談阿爾文斯萊本的時候，薩森并非唯一發問的人。但是艾希曼可能沒有參加此次訪談會。一方面，當別人占用太多討論時間時，艾希曼常常毫無顧忌地插嘴打斷[[396]](#_396_2)；另一方面，當艾希曼在某個故事中的角色與他的自我描述相抵觸時，他會反射性地打斷別人說話。然而，那些與會者們卻毫不留情地發表了許多直接冒犯艾希曼的言論。阿爾文斯萊本更是口無遮攔，傲慢地辱罵那些野心家和事業狂。按照他的標準，艾希曼想必也屬于其中之一。阿爾文斯萊本以一種艾希曼通常無法容忍的方式，談論起艾希曼的“英雄”海德里希和米勒；他對猶太人政策的看法更是飽受非議，甚至薩森都覺得有必要公開反駁。等到與會者們以輕蔑的口吻講起強迫猶太人外移的“成就”時，艾希曼肯定會極力反駁。因為那件事情，亦即他所謂讓猶太人“移民出去”的“建設性”工作，正是他吹噓炫耀的主要支柱之一。

迄今還沒有證據表明，阿爾文斯萊本與艾希曼當初是什么時候在什么場合首次相遇的。但二人很可能在納粹時期就已經見過面，因為當阿爾文斯萊本在1938-1939年任職希姆萊的副官時，艾希曼剛好憑借其“維也納模式”，以及強迫猶太人移民離開奧地利而取得的所謂“成就”，開始在納粹圈子里建立起“專家”的名聲。1941年4-5月，阿爾文斯萊本在帝國保安總局實地見習其組織和工作方式，而那正好也是艾希曼的部門變得日益重要的時期。此外，阿爾文斯萊本和艾希曼在戰爭末期都屬于能夠前往齊騰宮晉見希姆萊的最后一批人，阿爾文斯萊本甚至專門提到過當時的情況。[[397]](#_397_2)因此他們之前有很多機會見面，再加上阿爾文斯萊本是希姆萊的隨從，而艾希曼則是希姆萊最喜歡項目的事務主管，因此我們可以推斷，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時候，他們彼此都一清二楚，自己是在跟誰打交道。

對薩森來說，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大收獲：作為時代見證者，他能夠憑借自己與位高權重者的關系，闡明其他流亡納粹分子都不曉得的事情。對阿爾文斯萊本自己而言，大多數歷史關鍵角色都不僅僅是名字而已，更是他打過照面的人物。這讓他得以從不同層面來看待事情，而非只是采取由下而上的角度進行觀察——例如那名職位特殊、擁有自己事務部門的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或者那名只遙遙望見過一次戈培爾的荷蘭戰地記者，或者那名來自維也納、有權進入毛特豪森集中營的黨衛隊保安局法律專家。阿爾文斯萊本是一名納粹要員，具有相關的內幕知識。對薩森和他的圈子而言，這勝過了他因為權高位重而脫離現實的缺點。薩森和阿爾文斯萊本之間顯然存在著友誼的紐帶，薩森也確信自己和阿爾文斯萊本都有“崇高”的國家社會主義理想[[398]](#_398_2)，這使后者成為一位可靠的盟友。

但薩森和阿爾文斯萊本之間的對談也并非一直和和氣氣。阿爾文斯萊本對希姆萊一如既往的仰慕，即便在阿根廷的右派圈子內部也被認為不可救藥，并且造成了無法化解的分歧。[[399]](#_399_2)比這種個人的依戀更嚴重的問題是，阿爾文斯萊本承認大屠殺是歷史事實，而且是明確的犯罪行為。1957年時，阿爾文斯萊本認為納粹的猶太政策不但是一個錯誤，而且很不人道。盡管他本身具有明顯的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傾向，卻把大屠殺描述為“極其殘暴”、“非德意志”，以及“很不光彩”。他把卡拉揚的奇聞軼事和種族主義迫害行動相提并論，卻沒有意識到作為一場兇殘的“黨派斗爭”的共謀和辯護者，上述那些詞語同樣也適用于對他的形容。他還向薩森解釋說：“我個人反對僅僅因為別人的出身，就把手無寸鐵的人（即便他們是我最大的敵人），以及沒有對我做過任何事情的手無寸鐵的人趕進焚燒爐。”[[400]](#_400_2)

其令人驚訝的鮮明立場讓艾希曼陷入了窘境，因為他被迫聽到，他自視為畢生成就的殺死數百萬“國家敵人”的壯舉，突然在其他納粹黨人眼中變成了“非德意志的”。這種“過分的舉動”不但把艾希曼逼到了忍無可忍的邊緣，也讓薩森因為阿爾文斯萊本對國家社會主義猶太政策的看法而感覺受到了挑釁。阿爾文斯萊本的各種言論都明白顯示出來，他并非典型的納粹反猶太主義者，而是代表了19世紀那種相當老派、基于嫉妒的反猶太主義。阿爾文斯萊本毫不隱瞞自己的立場——出于對波蘭人的仇恨，他能夠毫不猶豫地下令槍殺數千人，并且利用每一個機會自肥，卻認為滅絕猶太人的企圖根本荒唐透頂。

種族反猶太主義圈子內出現的這一點人性的殘余，卻促使通常隱瞞自己觀點的薩森做出了激進的反猶主義告白：他，威廉·薩森，認為光是猶太人的存在就已經構成明顯的威脅。因此他認為國家社會主義的猶太人政策不是錯誤，而是當務之急。與阿爾文斯萊本的談話揭露了我們在抄本的其余部分只能猜測的事情，即薩森和艾希曼之間的共通點。他們二人都有一種瘋狂的想法，認為種族斗爭確實存在，而且仍然相信會發生一場只有一個種族能存活下來的“最后戰斗”。這就是薩森的研究動機之所在，也是他與艾希曼交往的原因。盡管阿爾文斯萊本也對“如水晶般清澈”的國家社會主義世界觀和黨衛隊的“理念”充滿熱情，但在這一點上面他與薩森的看法背道而馳。從薩森和艾希曼的角度來看，阿爾文斯萊本絕非他自己所標榜的高尚的納粹貴族，反而看起來就像一個直到今天都還沒有認清“真正危險”的人。阿爾文斯萊本能夠想象與猶太人生活在同一個世界，艾希曼和薩森卻沒辦法做到這一點。

\*\*\*

1957年在阿根廷，把艾希曼和阿爾文斯萊本聯系在一起的，不只是二人對希姆萊共同的崇拜。他們在逃亡的時候，都使用了同一個南蒂羅爾城鎮核發的身份證明文件。嚴格說來，曾有三個著名的納粹人物使用過泰爾梅諾的旅行文件：約瑟夫·門格勒（核發于1948年4月）、阿爾文斯萊本（1948年5月），以及艾希曼（1948年6月）。我們還遠遠不清楚阿爾文斯萊本的完整逃亡經歷，可是已知的部分就已經足夠令人驚訝，并且透露了許多逃亡路線及組織方式的信息。在與阿根廷記者和歷史學家烏基·戈尼共進午餐后，我終于能夠至少講述這個錯綜復雜故事的一小部分。用餐時我和他談起阿爾文斯萊本的訪談，他則向我透露了自己的想法。奧地利歷史學家格拉爾德·施泰納赫（Gerald Steinacher）曾設法查明某個名叫“克雷姆哈特”（Kremhart）的紅十字會護照持有者究竟是誰，結果徒勞無功。[[401]](#_401_2)戈尼自己則懷疑，那根本就是阿爾文斯萊本的化名。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對筆跡和照片的仔細比對證明戈尼的懷疑非常正確。

一封來自德國北部呂貝克（Lübeck）的信件，開啟了阿爾文斯萊本逃亡的序幕。1946年11月30日，一位“洛娜·克雷姆哈特”（Lona Kremhart）寫信給博岑的警方，詢問她的丈夫“特奧多爾·克雷姆哈特”（Theodor Kremhart），但他的姓氏也有可能被拼作“克萊因哈特”（Kreinhart）。[[402]](#_402_2)他在1905年9月18日出生于波森（Poznan，波茲南）。她收到的關于丈夫的最后一條信息，來自因斯布魯克。除此以外，他們有三個孩子。這封有些奇怪的信很快就得到了答復：克雷姆哈特自從1946年9月以來一直居住在博岑的“十二村客棧”（Gasthaus Zwölfmalgreien）。仔細觀察克雷姆哈特太太的筆跡，我們會驚人地發現：那毫無疑問就是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自己的筆跡。[[403]](#_403_2)根據卡爾·沃爾夫的講述，阿爾文斯萊本在被關進諾因加默（Neuengamme）的戰俘營之后，于1946年9月11日成功脫逃。起初有人懷疑他藏在北方。由于阿爾文斯萊本的家人住在呂貝克，因此無怪乎他從那里寫信到南蒂羅爾的博岑，而那里剛好亦為艾希曼領取新證件的地點。可是一個男人何必假扮成女人寫信到博岑、按兩種不同的拼寫方式詢問一個姓名，并且表示他有三個小孩呢？顯然，此人正在設法偽造一個身份，并且打算帶著三個孩子離開歐洲。[[404]](#_404_2)一封寫給南蒂羅爾官方的信件竟然就幫他獲得了身份，此事甚至讓那些花費數年功夫研究納粹逃亡路線的人感到詫異。事實上，在“特奧多爾·克雷姆哈特”的紅十字會護照申請表上面，直到今天仍然貼著一張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的照片。而且尤有甚者，護照申請人“特奧多爾·克雷姆哈特”的簽名字跡，與呂貝克“洛娜”的筆跡一模一樣。[[405]](#_405_2)紅十字會的記錄顯示，該人出具了1948年5月核發于泰爾梅諾的身份證件，此外和艾希曼一樣，他的護照申請擔保人也是那位天主教神父愛德華多·德默特爾，表明他同樣是獲得優惠待遇的潛逃者。[[406]](#_406_2)“克雷姆哈特”計劃乘坐“好望角號”（Cabo Buena Esperanza）出航，這也就是幾年以后梅利塔·馮·阿爾文斯萊本（Melitta von Alvensleben）在申請阿根廷護照時所報出的同一個船名。那艘輪船于1949年12月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靠港。烏基·戈尼進而在乘客名單上找到了他的名字，阿根廷最高級別納粹的逃亡路線于是首度獲得確認。

我們只能猜測那個詭異的寫信行為背后隱藏著什么。阿爾文斯萊本是打算以這種方式開啟逃亡路線嗎？艾希曼和門格勒是否也做過同樣事情來安排自己的逃亡，還是阿爾文斯萊本打算另辟蹊徑呢？若想澄清這些問題，或許還需要專門前往博岑市的檔案館，尋找更多憂心忡忡的妻子們以男性筆跡寫出的尋夫啟事，并在詢問函中列出了丈夫姓名的不同寫法。但現在已可確定的是，阿爾文斯萊本在逃亡途中使用了與約瑟夫·門格勒和阿道夫·艾希曼相似的證件，而且三份證件核發的時間分別只間隔了一個月。面對這些信息，只有勇氣可嘉的人才會宣稱他們當初是通過各種不同途徑“即興逃亡”。逃亡行動的組織安排，看來比之前認為的還要完善許多。

當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加入薩森訪談會的時候，他見到的不只是一批黨衛隊的老同志，還跟至少一個人重聚了。他們二人不但都崇拜昔日那位共同的上司，并且在同一批人的幫助下獲得了新生命。這肯定不是僅僅出自巧合，即便他后來覺得艾希曼這樣的人對他來說太常見了。阿爾文斯萊本在1952年為自己和家人申請并獲得了阿根廷公民身份，這有效地保護他免受聯邦德國的起訴。在科爾多瓦省，他搖身成為卡拉穆奇塔縣圣羅莎鎮（Santa Rosa de Calamuchita）一座養魚場的負責人、阿根廷漁獵局在該地區的主席，并且作為“運動聯盟足球俱樂部”總裁出現在照片上。胡安·馬勒甚至表示，阿爾文斯萊本曾經在鄰近的納粹聚居地“貝爾格拉諾將軍鎮”（Villa General Belgrano）擔任過好幾年鎮長。[[407]](#_407_2)盡管波蘭因為數千起謀殺案對他做出缺席死刑判決，而且聯邦德國也試圖在1964年刑事起訴他，但阿爾文斯萊本仍然不受干擾地于1970年在阿根廷安逝。在一次電視采訪中，家里的一名晚輩主張阿爾文斯萊本很可能在流亡阿根廷期間有所改變，像拋棄故土一樣迅速拋棄了他的國家社會主義信仰。[[408]](#_408_1)可是當阿爾文斯萊本在1957年設法接近薩森、弗里奇、朗格爾和艾希曼，整天與他們討論猶太人大屠殺，重溫共同的掌權時光，以及奢談純凈的國家社會主義理念時，他顯然還沒有改變信仰。

在提問艾希曼的時候，祭出阿爾文斯萊本的做法只在短時間內有效，因為艾希曼很快就針對這位新的交談對象做出調整，捍衛其“斗爭的神圣性”、反駁陰謀論者有關死亡集中營的說法，并且他相信自己是為了執行“元首”的命令，于是——再一次——無懼納粹最高階官員的威嚇。最重要的是，阿爾文斯萊本在薩森訪談會的出現，清楚表明了那些人對這個項目的野心。其主旨既不是一名“猶太事務主管”的回憶錄——艾希曼甚至都不是阿爾文斯萊本采訪的主題，也不是一個讀書小組，而是帶有明確目標地修改歷史：要把國家社會主義和希特勒一起洗白。就連阿爾文斯萊本也想參與其中，盡管表現得有一點矜持收斂，而且顯然更加謹慎小心。后來當薩森挑選錄音抄本出售的時候，他幾乎將出現阿爾文斯萊本訪談內容的錄音抄本悉數剔除。這意味著我們之所以能知道訪談的第二部分內容，完全是因為薩森已經記不得它，于是忘了把它剔除。他應該曾向阿爾文斯萊本保證會嚴格保密，就像他對朗格爾博士許諾的。總之薩森堅守了承諾，從未把相關的訪談稿拿去出售，盡管希姆萊前任首席副官的個人告白很容易就能賣個好價錢。即使到阿爾文斯萊本死后，他仍然沒有試圖那么做。薩森對金錢的貪婪顯然受到了個人情誼的約束。艾希曼也從未背叛過阿爾文斯萊本，反而還編造了魯道夫·米爾德納的在場，成功為他提供掩護。盡管如此，我們還是難免懷疑，艾希曼始終對阿爾文斯萊本那種高高在上的納粹貴族作風耿耿于懷，以致曾在以色列抱怨那批“戴著白手套的沙龍軍官”（Salonoffiziere mit den weißen Handschuhen）——亦即不了解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精髓的那些人。

### “600萬人的謊言”

我曾經非常頻繁地跟霍特爾交談，這是真的，

而且很可能也討論過有關消滅猶太人的事宜。

不然我們還能說些什么呢？

——艾希曼，1957年年中[[409]](#_409_1)

最讓杜勒出版社圈內人受刺激的話題，莫過于猶太受害者的人數。到了1957年，即使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也沒有人認為還能用《600萬人的謊言》或《赫斯特證人報告》之類的文章來否認系統化的屠殺行動。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杜勒出版社那幫人正好就是此偷天換日策略的主要炮制者。新出現的資料讓他們只剩下一條路可走，那就是盡可能把種族屠殺的規模限縮至最低程度。結果直到今天，死難者的人數依然是舊納粹、新納粹和新右派分子爭論不休的問題。這種情況著實令人費解，因為納粹迫害猶太人一事所衍生出的法律與道德責任，并不取決于一個絕對的數字。更何況在進行所謂“賠償”談判的時候，即使將統計數字換成400萬或800萬人，談判的結果也幾乎不會有什么不同。這看起來就好像是，那批人靠著“元首崇拜”掌握了象征符號的力量，于是對“敵人”的有力象征符號——600萬這個數字——害怕得無以復加。這個問題其實很容易回答：誰是1945年之后所有證人的引述來源？是誰首先說出了這個難以置信的數字？《路徑》月刊甚至在1957年自行預示了那名證人的現身。該刊7月號再次以讀者來信的形式宣稱：“特別令人遺憾的是，大家始終無法成功找到那個人，那個根據所有猶太人出版物和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Nürnberger IMT-Prozess）中的證人陳述，唯一有能力就整個復雜情況發言的人：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阿道夫·艾希曼。自從阿道夫·希特勒、黨衛隊全國領袖希姆萊、海德里希，以及卡爾滕布倫納等人去世之后，他很可能是唯一真正知曉到底發生過什么事情的可信見證人。”[[410]](#_410_1)這位細心的“讀者”還不忘詢問，是否有人對那個“至今無法找到的”關鍵證人掌握更多信息。

自1955年年底出版以來，任何人皆可在萊昂·波利亞科夫與約瑟夫·伍爾夫編纂的文獻叢刊里面，讀到三頁未經刪節的宣誓聲明，記錄著威廉·霍特爾與艾希曼的談話內容。文件編號“PS-2738”，是紐倫堡審判最重要的文件之一。[[411]](#_411_1)霍特爾說，艾希曼曾在1944年8月底來到他位于匈牙利布達佩斯的公寓，像往常一樣想要獲得關于戰局的消息。霍特爾于是利用這個機會，向艾希曼詢問遇害猶太人的確切數目。艾希曼回答說：“在各個不同的毀滅營，大約有400萬猶太人被殺，此外另有200萬人以別的方式死去，其中大多數是在俄羅斯戰役期間被安全警察的一些殺人小隊槍決。”霍特爾還不厭其煩地強調了艾希曼這個消息來源的可信度：“我只能推斷，艾希曼向我提供的資訊正確無誤。因為在所有相關人士當中，他絕對最清楚被殺害猶太人的數目。首先，可以說他是通過他的特別行動分隊把猶太人‘供應給’各個毀滅營的，所以一定確切知道這方面的數字。其次，他身為帝國保安總局第四局負責猶太人事務的部門主管，絕對最了解有多少猶太人以其他方式死亡。”艾希曼甚至還曾向希姆萊呈遞一份報告，但后者認為他給出的數字太低了。

杜勒出版社圈內人當然對霍特爾的聲明不陌生，《路徑》月刊甚至還為了它而大打筆仗。可是瀏覽偶爾出現的報刊文章，畢竟完全不同于仔細閱讀聲明內容。薩森顯然立刻意識到，必須駁斥這份聲明，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話，更要全盤否認德國人系統化滅絕猶太人一事。于是在訪談一開始，他就直接向艾希曼問到了“600萬人的說法”以及霍特爾的聲明，而且后來一再舊話重提。[[412]](#_412_1)此外他也試圖通過朗格爾博士關于霍特爾的長篇大論，找出那名證人在私人生活方面的每一個弱點。對薩森來說，最關鍵的問題莫過于：“怎么樣才能讓這份聲明……顯得荒謬絕倫？”[[413]](#_413_1)

可是問題并沒有因此減輕，因為迪特爾·維斯利策尼也曾引述其昔日上司提到過的類似數目。他在紐倫堡出庭的時候，報告了自己與艾希曼就此問題進行的幾次對話，而每一次談到的數目最起碼也有400萬。除此之外，維斯利策尼還曾逐字復述艾希曼在柏林臭名昭著的告別感言：“他表示他會笑著跳進坑里，因為一想起有500萬條人命要算在他的賬上，他就感到極大的滿足。”[[414]](#_414_1)艾希曼當然十分清楚自己究竟跟哪些人聊過這回事，薩森卻不知道另外還有多少證人可能記得相關陳述。特奧多爾·格雷爾，駐布達佩斯大使館的猶太事務處處長和艾希曼的聯絡人，也在庭審時做出不利于艾希曼的證詞，表示艾希曼曾于1944年秋末很自豪地告訴他說，有“600萬人”必須記在自己的賬上。[[415]](#_415_1)薩森要到很久之后才意識到自己反駁這種說法所遇到的最大障礙究竟何在：如此龐大的遇害人數確實讓他的訪談對象艾希曼感到極為滿足。但即便如此，艾希曼還是勉為其難地盡可能說出薩森及其同儕們想聽的話。沒有，他當然從來都沒有說過好幾百萬被殺害的猶太人，他所說的始終只涉及“國家的敵人”（Reichsfeinde）。不，他也從來沒有說過“人”（Menschen），他說的肯定是“國家的敵人”。直到在以色列出庭受審時，艾希曼才被迫承認自己的確講過“猶太人”（Juden），因為他曾經一時糊涂，親手寫下了那個字眼。[[416]](#_416_1)

在阿根廷，艾希曼卻表示，怎么偏偏會有人“無緣無故地把這種說辭”[[417]](#_417_1)賴到他的頭上來，實在令人費解。霍特爾只不過是“碰巧跟維斯利策尼遇到一樣的謊言”[[418]](#_418_1)罷了。艾希曼甚至還斬釘截鐵地表示，他在萬湖會議時提供給海德里希的統計數字，實乃“別人后來的偽造”[[419]](#_419_1)。他強調“我根本不知道被消滅的人數到底是多少”[[420]](#_420_1)，因為他從未匯總出一個統計數字。但浮夸的虛榮心還是出賣了艾希曼，他補充道，不管怎樣，他分別提出的各種數字，當然從來不會讓希姆萊不滿意。[[421]](#_421_1)艾希曼有時極度夸大了自己的無所作為，以致薩森必須提醒他，請他過來參加訪談會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他為那些數字提供擔保。“我們必須使出全力反駁一種說法，那就是艾希曼的工作部門對這些人數沒有整體把握。”在薩森一再強調“必須使出全力”之后，艾希曼才不得不回答說：“好吧，如果這能幫得上忙的話。”[[422]](#_422_1)倘若這一切不是那么的諷刺，簡直會讓人覺得滑稽好笑。艾希曼否認自己的所知所見以便取悅薩森圈子里的人，而那些圈內人之所以求證于艾希曼，則是因為只有艾希曼才知道真相，只不過他知道的真相與那些人想象的完全南轅北轍。在這場猜謎游戲當中，薩森就好比一個捺不住性子的花花公子，憑借三寸不爛之舌終于說服他心儀的美女摘下了面具，但他做夢也想不到的是，面具后面隱藏著的其實是蛇頭女妖美杜莎。

在這種錯綜復雜的情況下，企圖反駁猶太人“600萬人的謊言”，從兩方面來看都是一場鬧劇。那些人一同讀到一個接一個的謀殺統計數字（卻明顯不理會他們自己在過去幾年里偽造出來的那些數據[[423]](#_423_1)）：格爾拉德·賴特林格在1953年提到420萬至470萬；1946年6月向世界猶太人大會提出的報告列出了600萬；萊昂·波利亞科夫甚至認為有可能是800萬。他們試著逐一分析《萬湖會議記錄》和1943年提交給希特勒的《科赫爾報告》中的每個數據，并且閱讀了集中營指揮官魯道夫·赫斯關于奧斯維辛毀滅能力的聲明。薩森把數目計算得比較低，而艾希曼則把數目計算得比較高。艾希曼在談到幸存者人數的時候更是夸大其詞，薩森則表示懷疑，而他們想要共同推算出一個數字。讀這些談話內容有時讓人覺得好像是在集市上討價還價，對艾希曼而言，他所談論的并非人類，只是純粹的數字：“他（賴特林格）說6.5萬，我說4萬，那么就算成是5萬左右好了。”[[424]](#_424_1)“38.1萬稍微高了一點，30萬左右應該接近真相。”[[425]](#_425_1)每當薩森開始有一點樂觀時，艾希曼講出來的話卻又讓所有事情變得一團糟。就奧斯維辛的“篩選”過程而言，艾希曼宣稱“通常有一半的人活下來”。雖然那種講法驚人地低估了匈牙利運輸過程中的謀殺率，薩森的反應卻幾乎被嚇壞：“不，不，我們已經計算過，那里的容納能力是25萬左右，但如果總共有200萬人去了那里的話……”那么光是在奧斯維辛就有100萬猶太人遭到毒殺。[[426]](#_426_1)盡管今天我們知道這個數字頗為接近真相，但它卻完全不是薩森在1957年所想聽到的。

薩森訪談會上這種荒誕的數字拉鋸，以諷刺的態度表現出對人的蔑視，幾乎與納粹種族屠殺本身一樣讓人感到難以忍受。在進行討論的過程中，只有當有人對進展緩慢感到不耐煩或不高興的時候才會流露出情緒。受害者很少被提及，同情心、羞愧感或內疚之意就更不用說了。然而若是有誰一邊聽著那些人如何在薩森舒適的客廳里來回計算，一邊艱難閱讀抄本記錄的話，便無法忽視一個現象：雖然他們打算瞞天過海、否認一切，卻完全奈何不了事實的力量。不管那些人再怎么煞費苦心，他們還是不情愿地積攢起一個又一個數字。那些數字在他們削尖的鉛筆下面不可避免地顯得像是如山的鐵證，暴露出那種危害人類罪行的嚴重程度。除了艾希曼之外的所有與會者顯然都深信，對猶太人的系統化屠殺行動只是一個宣傳謊言罷了，而期待仔細檢視的結果能夠證明他們對事情的看法。薩森認為，如果迫使“猶太人”提交名單，亦即精確指出到底有誰被殺的話，便能夠發現人數實際上微乎其微。[[427]](#_427_1)他只是慢慢才意識到，這種方法將在接下來幾十年產生恰好相反的效果。畢竟，沒有人能在仔細審視的同時，卻不重新檢視自己的觀點。艾希曼則在訪談的過程中意識到，他在手稿中提出的第一個“最后統計”根本站不住腳，并且顯然也理解了用統計數據支撐自己的謊言的根本問題。不管怎樣，他在以色列會變得更加小心，改口強調永遠也不可能把遇害猶太人的數目查得一清二楚。

甚至連阿根廷那批人也以自相矛盾的方式逐步接近了實情，原因正在于他們對事情的真相有著截然不同的想象。他們涉入了一個剛剛起步的研究領域，充滿各種新人會犯的錯誤。在今天看來，戰后十年設法只根據可證實的數字、以高學術水準研究猶太人大屠殺的歷史學家，所得出的初步計算結果全都明顯低估了遇難者人數。我們絕不可小看這項研究在剛開始時的難度，因為有別于想象中完全以“德國人的周密作風”進行的系統化謀殺，滅絕猶太人的行動至少也同樣具有即興色彩，時而還夾雜著無序的犯罪行為。德國人不僅試圖燒毀各種書面記錄，甚至他們自己也不總是能夠掌握全局。各座死亡集中營內所發生的事情，更完全違背了希姆萊希望效仿病蟲害防治的方式，宛如臨床醫學般“人道”殺戮的滅絕理論。那些地方以生產堆積如山的尸體為目標，秩序結構恐怕難免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瓦解。我們若認為歷史研究最終會有辦法得出遇害者的確切人數，那就未免過度理想化了此一巨大罪行的情況。若有誰希望盡可能精確地還原當初的情況，無論如何都需要獲得比20世紀50年代中期多得多的文件和證詞。然而在當時，即便一些幸存者能夠大致猜到罪行的程度，但只有一名兇手真正知道詳情。勞爾·希爾貝格（Raul Hilberg）在1961年估計有510萬人遇害。馬丁·吉爾伯特（Martin Gilbert）在1982年推測的570萬人，則沒有得到充分證據的支持。一直要等到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檔案對外開放之后，情況才變得明朗起來，原來特奧多爾·格雷爾1944年從艾希曼口中聽來的數字（霍特爾號稱自己也聽到過那個數字），是如此接近犯罪的真實規模。

諷刺的是，霍特爾的說法在今天看來反而站不住腳。霍特爾于1945年戰敗之后告訴美國調查人員的大部分內容，其實并不是他自己聽到的消息，而是他從別人的報告中“借用”的內容，有時還加以夸大渲染，以便用這種乖戾的方式讓自己成為不可或缺的關鍵證人，并借此向美國情報機構推銷自己。由于霍特爾當時與特奧多爾·格雷爾和迪特爾·維斯利策尼都有接觸，如此一來他也可以套用那兩個人的記憶。霍特爾最大的問題，主要是轉移人們對他所扮演角色的注意力。他之所以在匈牙利與艾希曼見面，顯然不是為了給歷史研究留下證據，而是要在納粹政權崩潰之際刺探情況。艾希曼可以直接聯系海因里希·希姆萊，而對霍特爾及其上司們所計劃的自救行動來說，希姆萊正是最大的不確定因素之一。此外，通過艾希曼還可以探聽出蓋世太保的頭子海因里希·米勒到底有何打算。霍特爾同樣也不是機器上的一顆小齒輪，但這個事實在向盟軍毛遂自薦時不會給他帶來任何好處。于是霍特爾設法回避了過于尖銳的問題，大肆宣揚另一種故事版本來分散人們對他的注意力。他利用1944年8月在布達佩斯與艾希曼的談話，正好就達到了那個目的。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即霍特爾打算利用他那些細節豐富的故事，以一種駭人的方式勝過他的競爭者。

后來，霍特爾無意中自己加深了別人對其可信度的懷疑。他在自傳中承認，自己從一開始就意識到，可以借助那些說辭搖身成為炙手可熱（且報酬豐厚）的時代見證人。正因為如此，他才得以在人生的最后幾年開展電視事業。然而到了生命將盡的時候，霍特爾卻多次暗示，他自己從不相信曾有過那樣大規模的滅絕猶太人行動。這種暗示和霍特爾最后一本書中的許多內容都證明，他就那么若無其事地講了一輩子的違心之論。霍特爾在晚年的一次訪問中說道：“一如往常，我的謊話成真了。”[[428]](#_428_1)

值得注意的是，艾希曼給出那個巨額數字的時間，竟然早于臭名昭著的布達佩斯死亡行軍，以及同樣跟艾希曼有關系的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毒氣處決行動。此外，當艾希曼視察特萊西恩施塔特和其他集中營，例如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毛特豪森集中營和達豪集中營的時候，自然也清楚在戰爭最后幾個月，那里惡劣的條件將使猶太人大量死亡。因而特奧多爾·格雷爾并非唯一把艾希曼在1944年給出的數據視為吹噓的人。況且歷史學家們很早就已經指出，艾希曼跟1941年開始、由“特別行動隊”在東線戰場后方進行的大規模謀殺行動沒有任何關系，即便他從各種報告中得知了它的規模。但顯而易見的是，艾希曼樂于把龐大的數字包攬到自己身上。艾希曼的證言令人印象深刻，他表示，對猶太人進行的各式各樣的滅絕行動其實同屬于一個單一的大型項目。盡管在旁觀者眼中，許多事情似乎出于臨時起意、賣弄表現和獨斷獨行，但從柏林的角度來看，每一次反猶太人的攻擊都是在實踐納粹所追求的目標。艾希曼顯然已經把自己視為與這個“猶太人謀殺方案”完全融為一體，就像劇場導演，甚至從演員的即興發揮和臨場表現之中，也能看見自己的意志。這種“可能的氣氛”所產生的效果，甚至讓包攬一切的做法顯得可信。艾希曼和其他人不斷助長暴戾氣氛，而那種氣氛足以制造出數不勝數的暴行。正因為艾希曼意識到了這一點，于是主動把所有謀殺都算到自己賬上。

盡管如此，事實仍然是，艾希曼給出的數字最接近今日可證實的受害者人數。無論艾希曼所講的是500萬還是600萬，還是根據聽眾和時機的不同而輪流說出二者，他仍然早在歷史學家獲得足夠證明材料之前幾十年，即已接近了受害者的實際數目。艾希曼在納粹執政時期說出的數字就已經吻合事實，光從這一點便可看出他其實多么清楚種族滅絕的規模，以及后來在阿根廷和以色列謊稱不知情的做法有多么虛假。薩森及其同志卻求助于艾希曼，因為他們確信霍特爾是個騙子，只能借由霍特爾所引述的那個人來徹底駁斥他。結果艾希曼不得不公開宣稱，他從來都沒有提到過那樣的數字。連續好幾個月，艾希曼不斷向薩森保證，他也想“走在真理的道路上”，通過另外提供一份艾希曼報告，駁斥“600萬人的謊言”，而且這回將是一份真實的報告。然而，杜勒出版社圈內人士所援引的每一份文件，卻在不知不覺間鋪設出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等到薩森發現的時候，已經來不及掉頭了，因為他自己的關鍵證人竟然出乎意料地對他“右線超車”，而且使他在阿根廷的對話伙伴們成為新的證人，目睹了這一次想賴也賴不掉的自白。

### 不合時宜的結束語

我只想借此告訴您……所得出的結論，

而且我覺得必須當著您的面把它講出來。

——艾希曼，1957年在阿根廷[[429]](#_429_1)

1960年薩森出售的錄音抄本，是以臭名昭著的67號錄音帶為結束。其最后兩頁“艾希曼的結束語”（Eichmann-Schlusswort），則立即成為薩森抄本當中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文字。其實阿道夫·艾希曼在1957年發表的那篇簡短講話，并非薩森抄本的結尾。然而就薩森訪談會而言，那是一次頗不尋常的會議。光是通知開會的方式就讓艾希曼產生了誤解，以為它將意味著薩森計劃的盛大結束。因此這回他準備了一篇明顯具有“結論”性質的報告。錄音帶上的背景音清楚表明，此次的參加人數確實多了一些。艾希曼將出席者稱為“圓桌成員”，顯然是認為1957年9月或10月舉行的這次會議是一個理想的場合，適合發表這篇在其同儕中間——以及在歷史上——惡名昭彰的告別演說。艾希曼不無技巧地找了個機會，趁著討論《德意志國與猶太人》（Das Deutsche Reich und die Juden）書中最后一些文件的空檔，過渡到他的感言。接著他就用往常不即興發言，而是照稿宣讀時的語氣開講。他說話時注重抑揚頓挫，在當時的氣氛下格外顯得沉穩和緩慢，而且為了起到修辭效果，他還會不時停頓一下。有一卷原始錄音帶保存了這篇講話、此前進行的討論，以及講完之后引發的反應。[[430]](#_430_1)這篇演講對于理解薩森訪談會，尤其對于證明艾希曼在阿根廷所發表言論的突出史料價值而言，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值得完整地逐字謄抄下來[[431]](#_431_1)，必要時并在注釋中做出補充說明：

艾希曼：……請不要在時隔12年之后試圖讓我困惑，不管那個名字叫考夫曼[\*](#_464)，還是艾希曼，還是薩森，還是摩根索[†](#_465)，我都一點也不在乎。有些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于是我告訴自己說：好吧，那么我就必須拋開一切顧忌。因為在我的民族翹辮子之前，整個世界必須先翹了辮子，然后才輪到我的民族。但就只有這樣！

我就是這么想的。而我——現在我希望在我們的事情告一段落之前向您說明白——我是個“謹小慎微的官僚”。[\*](#_466)是的，我的確如此。但我打算詳細說說“謹小慎微的官僚”這回事，多少對我自己有些不利。跟那個謹小慎微的官僚密不可分的是一位……一位狂熱的戰士，捍衛我出身血統的自由。而我在此告訴您，正如我之前告訴過您的一樣：薩森同志，我對咬您的虱子不感興趣[†](#_467)，我只在乎我自己領子下面的虱子。我會把它捏死。這種態度也適用于對我的民族。于是那個謹小慎微的官僚——當然那就是我，我就是那樣——引領了我，給我帶來啟發：只要有益于我的民族的事情，對我來說就是神圣的命令和神圣的法律。就是這樣！

現在我想在全部這些唱片[‡](#_468)的結尾告訴您，因為我們很快就要結束了，我首先必須告訴您：我不后悔任何事情。我絕對不會屈服在十字架下！我們在此處理那件事情已經有四個月了。[§](#SS_2)在這四個月的時間里，您努力讓我重溫自己的記憶，并且喚醒了許許多多的回憶。本來我大可附和今日的意見，很容易，也很廉價地……宣稱自己深感遺憾，假裝“掃羅”已經變成了“保羅”。

可是我告訴您，薩森同志，我沒有辦法那樣做。我沒有辦法，因為我不愿意，因為我的內心阻止我這樣說，說我們曾經做錯了任何事。我沒有辦法。我不得不誠心誠意地告訴您，假如當初我們把1030萬猶太人（如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由科赫爾[\*](#_469)確定身份的1030萬猶太人）都殺掉的話，那么我會心滿意足地表示：很好，我們消滅了一個敵人。然而在命運的捉弄下，這1030萬猶太人當中的絕大部分都保住了性命。于是我對自己說，既然命運想要如此安排，那么我就只能順從命運和天意。我只是一個無關痛癢的小人物，我既沒有辦法力挽狂瀾，也完全不打算這么做。我們本可以實現我們為自己的血統、為自己的民族，以及為各個民族的自由[†](#_470)所應擔負的使命——假如我們把今日還活著的人類靈魂中最狡猾的那些對手[‡](#_471)都消滅了的話。那正是我向施特萊徹[§](#SS_3)說明的，也是我所一再強調的：我們正在與一個敵人戰斗，而那個敵人經過好幾千年的教育[¶](#P_1)，在心智上領先我們。我記不得是在昨天還是前天，或者是在去年，我曾聽說或者在哪里讀到，在羅馬人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甚至在羅馬還沒有建城的時候，猶太人就已經能夠書寫。但這還只是個輕描淡寫的講法。應該說的是，早在羅馬建國千百年前，早在羅馬建城千百年前，他們就已經能夠書寫了。看看“十誡”的石碑。您想想看，一個如今可以追溯悠久——比方說6000年——書面歷史的民族，一個大約在5000年或6000年前就已經制定律法的民族，而且我相信即使我說那是在7000年前，應該也不為過。今日基督教會使用的就是他們所制定的那種律法[\*](#_472)，這對我而言是非常令人沮喪的。但這件事情也告訴了我，那必定是一個出類拔萃的民族，因為制定律法的一直都是偉大的人。這個認識于是促使我對抗這個敵人。

您必須從這些動機來理解，我為什么會說，假如把這1030萬敵人都殺掉的話，我們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停頓片刻以制造效果。）但鑒于這并未發生，我只能告訴您，我們尚未出生的后代將不得不承受苦難和災殃。也許他們會詛咒我們。（停頓片刻以制造效果。）可是我們人數有限，沒有辦法抗拒時代潮流。我們已經竭盡所能了。

當然，我必須告訴您的是，人類的情緒也在這里起了作用。我也未能免俗，我也受困于同樣的薄弱意志。我知道這一點！我自己也難辭其咎，因為我未能貫徹或許來自某個上級機關，或許一直縈繞在我心中的那種構想，以致無法實現真正的徹底清除。我已經向您舉出了一些這方面的小例子。我才智不足，卻被放到了一個位子上，在那個位子上我其實可以做得更多，而且必須做得更多才對。

我向您說出的事情，可算是一種道歉：首先，我缺乏足夠的才智。其次，我缺乏必要的頑強體格。第三，有一大批人違背我的意愿湊了過來，甚至還對我的意愿橫加阻撓，以致讓我覺得自己無能為力。結果就連我原本或許能夠取得突破的其他事情，也都只做成了半吊子，因為我長年陷在一場斗爭之中，必須對抗那些所謂的“干涉主義者”。[\*](#_473)這就是我在最后想要告訴您的。

我不知道您是否會把它寫入書中，也許那不是個好主意，或許根本就不該這么做。但我只想借此告訴您，我在這幾個月重溫記憶之后所得出的結論，而且我覺得必須當著您的面把它講出來。

薩森：嗯。（一桌人陷入了長時間的沉默與不安）

艾希曼：現在我們已經結束了全部的錄音，對吧？

薩森：對不起？

艾希曼：現在我們已經結束了，對吧？難道不是嗎？

薩森：其實并沒有。我還有幾頁需要討論。不過我確信我們會做完的。

艾希曼：啊，我們根本還沒有把這本書討論完畢嗎？

薩森笑了出來（一半出于同情，一半出于容忍）。

艾希曼：（完全不知所措且陷入困惑）我以為我們已經完全……因此我……向……呃……向圓桌成員……發表了一個小小的……呃，結束感言。

薩森：那沒關系。

聽到“那沒關系”之后，艾希曼似乎這才注意到，他“向圓桌成員發表的小小結束感言”有多么荒腔走板。由于沒有受到任何立即的反應，艾希曼只得直接詢問薩森對這個感言的看法，卻還是得不到任何回應。這名不知悔改的演講者于是開口承認，自己充分意識到話中的怪異之處：“我知道我向您說出了非常強硬的字眼，而我一定會因為措辭這么強硬而受到譴責。可是我沒有辦法告訴您別的東西，因為這就是事實！我為什么要否認它呢？”那一切都在剎那間“從他的內心深處涌出”，因此艾希曼才想將之訴諸言詞，以便未來供后人“進行某種研究”。誰要是耐得住性子，在錄音帶上聽過完整的版本，就不會注意不到，當艾希曼還在發表“感言”的時候，其可悲的表演及其內容已讓在座者變得越來越焦躁不安，而且明顯開始心生不快。這個怪誕場面的結果，就是薩森試圖將它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因為艾希曼所做的事情無非是把整個薩森訪談會搞成一場鬧劇，并在其發起者的面前實地上演。他們已經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設法為國家社會主義洗刷“老是讓我們受指責的那檔子事”，也就是猶太人大屠殺，還煞費苦心地把每一個數據都貶低成“敵方的宣傳”，并竭盡所能計算出最低的統計數字，希望這么一來就能徹底擺脫問題。他們原本以為問題的根源就是艾希曼在戰爭末期所講的那些話，誰曉得他們寄予厚望的王牌證人反而又公開了對另外幾百萬人的謀殺。在場的每一個人想必都心知肚明，用艾希曼公開澄清艾希曼的嘗試已經徹底失敗了。更重要的是，他那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玩世不恭論調讓最后一個懷疑論者也明白了，維斯利策尼和其他所有人在引述艾希曼有關數百萬死難者的說辭時，他們并非迫于盟軍占領下的嚴酷情況而不得不撒謊。那個可恨的威廉·霍特爾固然喜歡夸大其詞來虛張聲勢，可是1957年在薩森桌邊發生的現實，甚至讓霍特爾也相形見絀。他們非但未能揭穿飽受指責的“600萬”講法，表明它是拷打之下的自保謊言或者霍特爾的生財妙招，反而讓自己變成了這個駭人自白的目擊證人，徹底確認了那種講法。艾希曼果真在1945年提到過“那檔子事”。戰爭結束12年后，那名大屠殺兇手于不受任何人脅迫的情況下，在一個配備錄音機的房間內主動向“圓桌成員”重申：確實有過屠殺猶太人的行動；該行動在他的配合下成為對數百萬人的謀殺，甚至是全面的種族滅絕；他仍然認為那個方案是完全正確的；他為自己能夠參與其事而感到心滿意足。艾希曼對這個瘋狂的國家社會主義項目——以及對他自己——做出的唯一批評就是，我們“其實可以做得更多，而且應該做得更多”。薩森和弗里奇不僅無法羞辱以色列的“敵人”和全世界每一個猶太人，證明“600萬人的謊言”實乃猶太人的戰斗策略，最后更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指出，他們自己妄想中的“純凈國家社會主義”之真正敵人，就在納粹黨的意識形態當中，其具體的化身就是他們最成功的官員和最后的國家社會主義堅定信仰者之一，一個完全符合阿道夫·希特勒理想納粹形象的人物：奧托·阿道夫·艾希曼，尚未復職的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不管薩森再怎么試圖不當回事，他的專案計劃已在此刻隨著一個信誓旦旦的聲明而壽終正寢。其他的一切，諸如更多受害者的證詞、重新發現的統計文獻、附有謀殺人數的電報、死亡登記簿、錄像、照片和各種研究報告等等，都可以被斥為“反德”、“宣傳”、“夸張”或“造假”而不予置信。但這個如此令人信服地確證了自己行為的艾希曼，卻不可同日而語。艾希曼是國家社會主義者，而且正因為如此，他也是一名堅定的大屠殺兇手，除此之外沒有其他任何因素產生了更大的作用。

### 沒有結論的結束

總而言之，艾希曼只相信他自己所說的話。

——哈里·穆里施[[432]](#_432_2)

我們只能猜測，那個充滿了意外洞悉實情的傍晚接下來發生了什么，因為錄音機隨即就被關掉，盡管薩森曾經宣布他“還有幾頁需要討論”。似乎不再有人對著書立說感興趣，因為更進一步的問題要等過了一個星期之后才被提出，從68號錄音帶開始。隨后發生的事情表明，艾希曼已明顯感覺到訪談會成員普遍對他無法諒解的態度。事情發生之后，艾希曼立刻直接寫信給薩森，為失敗的“結束語”做出辯解，并且局促不安地要求獲得更多材料，以便繼續發揮其有關所謂“考夫曼計劃”和“猶太人推動自我毀滅”的強詞奪理的說法，試圖按照薩森對歷史的詮釋方式來重新組織語言。[[433]](#_433_2)艾希曼在事發之后第一次訪談會上準備的說辭，也顯示他覺得有必要極力附和薩森的說法。記錄了那晚情形的68號錄音帶便從艾希曼的那些字句開始。[[434]](#_434_2)他結結巴巴地說：“嗯，我想要確定一點。在錄制上一盤錄音帶的過程當中……我給出了一種結論性的聲明。……現在我已經讀完了波利亞科夫的這本書，并且發現了里面……呃……所搞出來的東西……這讓我覺得我以那種形式發表的結束語已經不再站得住腳。”[[435]](#_435_2)艾希曼顯然就像個心虛的小學生一般，刻意擺出討人喜歡的姿態。但艾希曼扮演“痛改前非的演說者”這個角色并不完全成功，因為他還是忍不住加上了一個附帶條件，表示他的退讓當然只在一種情況下有效，那就是“如果這些文件真實無誤，而非出于偽造”。不過他立刻又改口說道：“縱觀全局之后，我還是幾乎產生了懷疑，覺得有一些事情可以被認為是真的……您認為呢？”從接下來的那些錄音帶更可以聽出薩森不但已經被惹惱而不愿再相信任何事情，甚至還嚴重缺乏積極性。薩森開始讀書中的內容，比平常更加緩慢且心不在焉，有時突然停止，再從另一個段落重新讀起，接著再度中斷，而且一停就是好幾分鐘。他提出的問題只是在虛應故事，而非真正出自興趣。只剩下艾希曼還一如既往地積極參與訪談，即便他對薩森的不信任感也與日俱增。他的回答明顯變得越來越吞吞吐吐：“我是第一次聽到這種事情……不過我必須告訴您，我無法對此發表意見，因為我與此事完全無關”[[436]](#_436_2)；“我不知道這回事”[[437]](#_437_2)；“我記不得了”[[438]](#_438_2)。

薩森幾乎不再理會艾希曼的言論，很少提出問題，也無意追問下去，只是想按部就班地完成計劃中的每個主題。錄音內容的抄本也不再完整，錄音帶的順序也變得不那么確定。[[439]](#_439_2)最后一些抄本和錄音帶更讓人無法不感覺到，薩森根本失去了興趣。早期訪談會中的緊張氣氛已經一去不返。其中的原因肯定在于薩森周遭那些人對艾希曼的失望。薩森不得不意識到，盡管他設法通過各種手段、書籍和助手來控制艾希曼，但始終沒有成功。到頭來，艾希曼還是艾希曼。他只不過是利用與薩森的會面來清楚闡釋自己的計劃和歷史版本而已，因此他才會說：“薩森同志，我對咬著您的虱子不感興趣……”薩森曾經在對南美政治領袖的采訪中證明了自己的高超技巧，結果卻因為艾希曼的大言不慚而栽了跟頭。顯然正如所有必須跟艾希曼或者其文稿打交道的人一樣，薩森在某個時刻也會覺得心煩氣躁。但這不僅由于他那位固定嘉賓的句型結構和用字遣詞非常糟糕，也因為薩森至少已經同樣意識到，自己原本關于國家社會主義歷史的認知不但存在嚴重的錯誤，而且再也站不住腳了。薩森的女兒曾經多次強調，她的父親既無法也不愿面對“大屠殺”這個問題，因為那違背了他有關“純凈國家社會主義理念”的夢想。然而通過艾希曼，甚至薩森也意識到，任何對大屠殺視而不見的做法都形同否認。大規模謀殺和毒氣室的確存在過，它們是德國歷史的一部分，而像艾希曼那般信仰堅定的國家社會主義者，正在其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薩森自己雖然也對國家社會主義深信不疑，同樣是一名種族反猶太主義者，不過就連他都認為那種謀殺項目是犯罪行為。而且他非常有自知之明，不至于把否認看成一種解決辦法。既然無法根據錄制的談話內容寫出令薩森和艾希曼都滿意的文稿，這個失敗的嘗試只會讓薩森更加明白：如果他想繼續作為一名國家社會主義者，艾希曼就已經不再是正確的搭檔了。只有跟艾希曼唱反調才能粉飾歷史，為希特勒和“德意志民族精神”洗脫謀殺猶太人的罪名。

對全世界的戰后國家社會主義者來說，1957年秋天徹底改變了他們的框架條件——康拉德·阿登納以絕對多數贏得了聯邦議會大選。他們抱持的夢想，以為德國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極右派人士能夠遏止那場選舉勝利，從而給德國戰后政治帶來決定性的轉變，在20世紀50年代已經完全沒有了實現的可能，他們隨之失去了沿著這條路線重新登上權力高峰的希望。正如阿登納所正確認識到的，德國百姓已經不再熱衷于實驗。[\*](#_474)于此情況下，甚至連最后那些人也已經明白，再也沒有回頭路，他們只能設法適應新世界現有的模樣。如果探究埃伯哈德·弗里奇、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威廉·薩森或者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等人的生平，我們便可更清楚地發現，那些人也逐漸明白希特勒早已死去多時，第三帝國已成過往云煙，永遠不可能再回來了。當世界的其他地方繼續向前發展時，即便是最充滿浪漫情懷的夢想，也無法在流亡時所處的隔離環境中無限制地蔓延下去。世界正在劇烈地變動，阿根廷亦然。在1957年年底的時候，阿根廷已經遠不同于十年前庇隆統治下充滿活力的建設時期。納粹“運動”已經過時，凡是不想被困在過去的人都必須開始跟上新的世界及其各種可能，甚至連《路徑》也停止發行了。因此薩森的項目并非在一個精心策劃的盛大場面或者戲劇化的敲鑼打鼓之中結束。它純粹是死于失望和厭煩。

然而艾希曼的自白不僅改變了阿根廷的目擊者，更不可阻擋地首先在那些還夢想著“元首國家重返”的人之間傳播開來。嚴格說來，所謂的“薩森訪談”之所以也導致了艾希曼的墜落，原因正在于它摧毀了人們對國家社會主義世界觀的病態同情心理，而這種同情心理曾經長年保護了那批犯下危害人類罪行的罪犯。

[\*](#_387) 指用尺規做一正方形，其面積等于一給定圓的面積。化圓為方與三等分角、倍立方并列為古希臘尺規作圖三大難題。——編注。

[\*](#_388) 艾希曼在此寫著“我會快樂地跳進坑里”（ich springe freudig in die Grube），他當初告訴屬下的卻是“我（將）會笑著跳進坑里”（ich würde lachend in die Grube springen）。——譯注

[\*](#_389) 般雀·比拉多或譯為本丟·彼拉多，是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時的羅馬帝國猶太行省總督。詳情參見本章的下一個譯注。——譯注

[\*](#_390) 此為天主教的譯名（新教的譯名是本丟·彼拉多，拉丁語讀音則為“彭提烏斯·皮拉圖斯”）。比拉多曾經擔任羅馬帝國猶太行省的總督，迫于猶太宗教領袖的壓力，違反自己意愿判決將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比拉多接著在眾人面前洗手說道：“對這義人的血，我是無罪的，你們自己負責吧。”可參見：馬太福音27章，馬可福音15章，路加福音23章，約翰福音18章。——譯注

[\*](#_391) 古埃及底比斯的主神，意為“隱藏者”，是“八元神”之一。——編注

[\*](#_392) 拉德馬赫曾擔任納粹德國外交部的猶太部門主管。——譯注

[\*](#_393) 德意志國指的是德國歷史上從德意志帝國、魏瑪共和國，一直到第三帝國的時期（1871-1945）。——譯注

[\*](#_394) 根特位于比利時北部的荷語區。——譯注

[†](#_395) 烏得勒支亦音譯為“烏特勒支”，但荷蘭語讀音實為“于特萊赫特”，情況類似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或被音譯成“馬斯垂克”。——譯注

[‡](#_396) 亨利·南寧在戰后創辦了德國《明星周刊》（Stern）。——譯注

[\*](#_397) 班牙文的“晚安”。——譯注

[\*](#_398) 在歌德的《浮士德》中，瑪嘉麗特（葛麗卿）問浮士德：“你怎樣對待宗教？說給我聽。你是個好心腸的人，不過我覺得，你對宗教不大關心。”——譯注

[\*](#_399) 漢斯·勞特爾（1895-1949）是奧地利籍黨衛隊上級集團領袖（上將），荷蘭占領區最高階的黨衛隊和警察領導人，1949年在荷蘭被判處絞刑。阿圖爾·賽斯-英夸特（1892-1946）是奧地利的納粹領袖，于德奧合并前后擔任過奧地利總理和東方邊區總督。其最后職務為荷蘭占領區總督，1946年在紐倫堡被判處絞刑。——譯注

[†](#_400) 海德里希在1940-1942年間擔任國際刑警組織的主席。當初引薦艾希曼加入黨衛隊的卡爾滕布倫納，則是1943-1945年的國際刑警組織主席。（國際刑警組織的總部原本位于維也納，德奧合并后該組織便落入納粹德國手中，1942-1945年其總部甚至就設在柏林市。）——譯注

[\*](#_401) “愿神（為此）賜福（于您）！”（Vergelt’s Gott!）是南德和奧地利的用語，意為“多謝”。——譯注

[\*](#_402) 德文諺語“wo gehobelt wird, fallen Späne”，大致意為“有得必有失”或“良藥也有副作用”。——譯注

[\*](#_403) 是德語中一種粗俗罵人的臟話的含蓄寫法。其完整表達為“ein Arsch mit Ohren”，可直譯成“一個有著［兩只］耳朵的屁股”。——譯注

[\*](#_404) “無存在價值”（unwert）主要為納粹優生學與安樂死的用語，如“無存在價值的生命”（unwertes Leben）。——譯注

[\*](#_405) 艾希曼玩了個文字游戲。歌德自傳的副標題為Dichtung und Wahrheit，通常翻譯成《詩與真》或《詩與真實》。那兩個德文關鍵字具有許多不同含義，可得出各式各樣的組合：Dichtung（詩歌、文學、杜撰、虛構、密封墊……），Wahrheit（事實、真相、真理、實話、實情）。——譯注

[\*](#_406) 《天主經》是羅馬公教的稱呼，新教則稱之為《主禱文》。它的中譯文種類繁多，比較通順的譯文是：“我們的天父，愿禰的名受顯揚，愿禰的國降臨，愿禰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最古老的中譯文則是：“在天我等父者，我等愿爾名見圣，爾國臨格，爾旨承行于地，如于天焉……”）——譯注

[\*](#_407) “布比”（Bubi）有“小毛頭”、“小家伙”之類的意思。——譯注

[\*](#_432) 補充說明“考夫曼”：在薩森訪談會上，人們一再將所謂的“考夫曼計劃”（Kaufman-Plan）與“摩根索計劃”（Morgenthau-Plan）混為一談。西奧多·考夫曼（Theodore N. Kaufman）于1941年在紐約自費出版了一本名為《德國必須滅亡》（Germany Must Perish）的小冊子，呼吁通過絕育來消滅德國人。納粹宣傳部于是利用該出版物宣揚“猶太人窮兇極惡的滅絕計劃”（Ungeheuerliches jüdisches Vernichtungsprogramm Völkischer Beobachter, 24. 7.1941）。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曾任美國財政部部長，在1944年委托研擬計劃，以便分裂德國并使之退化成農業國。此計劃也被戈培爾用于“奮戰到底”的宣傳口號。雖然那兩個計劃都停留在理論階段，卻直到今天都還為國家社會主義者服務，被用作為德國戰爭罪行和危害人類罪行辯解的理由。它們同時也造成了薩森訪談會上的混淆。參見Wolfgang Benz (Hrsg.), Legenden Lügen Vorurteile. Ein Lexikon zur Zeitgeschichte. München 1990，pp.85, 145.——原注

[†](#_433) 補充說明“摩根索”：參見補充說明“考夫曼”。——原注

[\*](#_434) 補充說明“謹小慎微的官僚”（der vorsichtige Bürokrat）：引自迪特爾·維斯利策尼的報告。這種稱呼對黨衛隊人員而言是不可原諒的侮辱，維斯利策尼卻給艾希曼貼上了這個標簽。薩森訪談會曾多次閱讀并討論這份報告。——原注

[†](#_435) 補充說明“您的虱子”（Ihre Laus）：指的是薩森希望把希特勒和“德國的精髓”盡可能與猶太人政策分離開來的努力，也就是讓“元首”和“國家社會主義”在歷史上擺脫對大屠殺的指控。艾希曼卻打算把自己展現為典型的德國人，以及為元首執行任務的優良官員。

[‡](#_436) 補充說明“全部這些唱片”（diese ganzen Platten）：艾希曼對技術方面的問題不怎么感興趣。對錄音技術更是一竅不通，經常選用不恰當的字眼來形容它。——原注

[§](#SS) 補充說明“四個月”（vier Monate）：艾希曼類似這樣的時間描述都很不可靠，因為它們被用作修辭上的“裝飾”，往往取了整數或使用有象征意義的日期。艾希曼被捕后不久，他甚至在以色列的一份文件中寫下當天是“投降后的十五年又一天”。但每一個參與其事的人都清楚這是瞎胡謅，因為5月9日那天艾希曼還在阿根廷樂享自由。——原注

[\*](#_437) 補充說明“科赫爾”、1030萬猶太人（10.3 Millionen Juden）：指的是所謂的《科赫爾報告》。薩森訪談會曾對此進行過詳細討論，而艾希曼刻意做出了誤導性的評論。——原注

[†](#_438) 補充說明“為了各民族的自由”（für die Freiheit der Völker）：根據納粹意識形態，猶太人是全人類和各民族的敵人，種族滅絕就是為了造福全世界。——原注

[‡](#_439) 補充說明“最狡猾的對手”（schlauester Gegner）：這完全呼應了希特勒把猶太人稱作“敵對人種”（Gegenrasse）的描述，亦即將之視為唯一可對“雅利安人種”（arische Rasse）構成真正危險的人種，必須與之展開生死較量。其他所有人種則都是“次等人種”（unterlegene Rassen），不會帶來危險。——原注

[§](#SS_1) 補充說明“施特萊徹”：指的是尤利烏斯·施特萊徹，在紐倫堡被處決的反猶太煽動狂以及《沖鋒報》的總編輯。該報甚至在反猶太主義者之間也引起爭議。有證據表明施特萊徹和艾希曼曾在1937年見過面，當時艾希曼應施特萊徹之邀前往紐倫堡參加納粹黨大會。海德里希的方向與《沖鋒報》形成很大的矛盾，前者不想要街頭的打打殺殺，而主張更加“中規中矩”（偷偷摸摸）的反猶太人政策。——原注

[¶](#P) 補充說明“教育”（Schulung）：在黨衛隊保安局眼中，知識是猶太人的“戰斗手段”，亦即用于統治世界的武器。這在很大程度上與納粹的反智主義有關。——原注

[\*](#_440) 補充說明“制定律法”（Gesetzgebung）：指的是所謂的“十誡”（10 Gebote）。在國家社會主義對教會的批評中，《圣經》本身被認為是猶太人的東西，這就是艾希曼在妻子面前撕毀《圣經》的原因。見上，薩森抄本3,1。——原注

[\*](#_441) 補充說明“干涉主義者”（Interventionisten）：與薩森的對談中，艾希曼一再舉例說明別人如何阻撓他進行大屠殺，通常是政府要員為牟取私利或為親友爭取例外待遇而提出的個別要求。到1944年，艾希曼甚至把庫爾特·貝歇爾之類受到希姆萊委派的人員也視為這種障礙。——原注

[\*](#_442) 當年阿登納競選海報上的口號是“不要實驗”（Keine Experimente）。——原注

[[1]](#_1_8) 加布里埃爾·巴赫在接受訪問時曾（非常驚訝地）多次提及此事。艾希曼自己則在1961年4月17日的家書中對此表示感謝，見BArch Koblenz, AllProz 6/165.

[[2]](#_2_9) 見薩森與《時代》/《生活》的合同、弗里奇告訴艾希曼家人和漢斯·雷興貝格的講法，以及艾希曼多次在以色列的說法。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3.亦參見本書第七章《余波蕩漾》。

[[3]](#_3_8) 感謝薩斯基雅·薩森提供了有關此事件的大量信息，并且在2009年時慷慨同意與我交換意見。另參見魯爾夫·范·提爾（2005年3月21日和27日）以及雷蒙德·萊伊（2000年6月7日）對薩斯基雅·薩森的采訪，在此并感謝二人與我一同進行討論。

[[4]](#_4_9) 魯爾夫·范·提爾2005年對英格·施奈德的采訪。下文會出現更多關于她的細節。

[[5]](#_5_9) 在現存錄音帶上經常能聽到這兩種情形。

[[6]](#_6_9) 2005年的時候，薩斯基雅·薩森仍然認為躲在閣樓上的人很可能就是佩恩，不過她已經在2009年修正了自己的說法，現在相當確定她并不認識那名男子。

[[7]](#_7_9) L’Express No. 494, 1.12.1960.

[[8]](#_8_8) 薩森和艾希曼的辯護律師羅伯特·塞爾瓦蒂烏斯在1960年相互指責對方在雜志上發表了那篇報道，蓄意進行毀謗。這表明二人應該都不是該文的作者（參見本書第七章《余波蕩漾》）。此外文中的內容已被證明錯誤百出，為薩森的否認提供了證據。

[[9]](#_9_8) “Coups in South America’s Biggest Countries and Forces Behind Them,”Life, November 28,1955, pp. 44-47。這篇文章未署名。

[[10]](#_10_9) 感謝烏基·戈尼從一位資深記者的視角提出這個想法。作者與戈尼在2009年的信件往來。

[[11]](#_11_7) 這些日期和信息根據的是佩恩的報道（Time, 17.3.1952; Life, 31.1.1955），以及可找到的佩恩向《時代》雜志提交的文章。其中包括1957年5月10日佩恩從布宜諾斯艾利斯發出的報告，以及1961年4月12日關于艾希曼審判案的一篇報道。Estate of Roy E.Larsen, former president of Time, Inc., 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 Harvard (Dispatches from Time Magazine Correspondents: First Series, 1942-55, MA 02138; Second Series,1956-1968, MS AM 2090.1).

[[12]](#_12_7) “Israel: On Trial,” Time, July 11, 1955.

[[13]](#_13_7) 薩森抄本6, 3。

[[14]](#_14_7) 薩斯基雅·薩森對訪談會的記憶相當不完整，就她當時的年齡而言，這一點也不奇怪。當客人來時，孩子們并不總是在家。何況大人針對這么一個龐大而敏感的圖書項目向小孩做出解釋，更是相當不可能的事情。

[[15]](#_15_7) 斯坦·勞里森斯那個游走于事實與虛構之間的大師甚至宣稱，佩恩自己就從事秘密情報工作。他表示，在摩薩德的負責人伊塞爾·哈雷爾從《時代》/《生活》接獲兜售獨家密報的消息之后，佩恩向哈雷爾說明了艾希曼和薩森之間對話的情形。接著哈雷爾前往阿根廷與佩恩會面，佩恩向他出示了抄本。Stan Lauryssens, De fatale vriendschappen van Adolf Eichmann. Leuven, 1998, 179.

[[16]](#_16_7) HHStA Wiesbaden, Abt. 461, Nr. 33 531, T 20/1 ff. BMJ an Oberbundesanwalt bei dem Bundesgerichtshof Karlsruhe, Bonn 6.10.1956.感謝黑森州總檔案館的曼弗雷德·普爾特先生協助尋找相關頁面。可惜與一般說法不同，完整的緝捕文件并不在黑森州總檔案館。

[[17]](#_17_7) 依據刑法第211條和74條（§§ 211, 74 StGB）所列出的罪行。逮捕令的復印本參見Schneppen, Odessa ..., A. o., 158.

[[18]](#_18_7) 相關文件引用自Schneppen, Odessa ..., A. o., 162f.可惜該作者很少按照學術規范引用資料。

[[19]](#_19_7) 德國外交部政治檔案，聯邦憲法保衛局1953年12月8日致外交部的公函：BfV (i. A.Nollau) an das Auswärtige Amt, 8.12.1953, PA AA, Abt. 3, Bd. 87。感謝霍爾格·梅丁。

[[20]](#_20_7) 佩恩給《時代》/《生活》公司的第317號電訊. Estate of Roy E. Larsen, former president of Time, Inc., 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 Harvard (Dispatches from Time Magazine Correspondents: Second Series, 1956-1968, MS AM 2090.1).

[[21]](#_21_7) 謹在此由衷感謝薩斯基雅·薩森一再以坦誠開放的態度，面對這個混合了記憶、情感和投射的復雜事件。

[[22]](#_22_7) Götzen, 8/AE: 3.

[[23]](#_23_7) ebd.

[[24]](#_24_6) 米爾登施泰因在1933年與庫爾特·圖赫勒（Kurt Tuchler）花了半年時間游歷巴勒斯坦，并且以利姆（Lim）為筆名寫作。這個支持猶太復國主義，但明顯帶有反猶太色彩的文章系列連載于1934年9月26日至10月9日之間，在推出時廣受宣傳，甚至獲得《猶太環視報》的評論（1934年9月28日）。1938年，這一系列文章更被印刷成書。關于最初幾篇系列文章受到的討論，參見Axel Meier, “‘Ein Nazi fährt nach Palästin’. Der Bericht eines SS-Offiziers als Beitrag zur Lösung der Judenfrage”, in Wolfgang Benz (Hrsg.),Jahrbuch für Antisemitismusforschung 11, 2002, 76-90.然而該文在介紹米爾登施泰因的黨衛隊保安局職業生涯時，完全采信了艾希曼的（錯誤）說明。

[[25]](#_25_6) Verhör, 66.

[[26]](#_26_5) 黨衛隊保安局的“導報”是其內部的公務小冊子，通常標示為機密級別。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存有一本1937年3月名為《出版業》（‘Verlagswesen’）的“導報”，包括35頁標有頁碼的A4紙，標題是“黨衛隊全國領袖以及黨衛隊保安局負責人”（BArch Koblenz R 58/1107）。《黨衛隊導報》則是每月固定發行的小開本通俗雜志，里面有各式各樣的文章和插圖。它起先由黨衛隊人種與移居部，而后由黨衛隊行政部（SS-Hauptamt）為黨衛隊全國領袖編輯。

[[27]](#_27_4) Israel,Verhör, 66.

[[28]](#_28_4) 艾希曼在以色列聲稱（第102次開庭時的證詞），手稿完成于1942年5月，并希望把它獻給已經去世的海德里希（亦即在6月4日以后）。他在薩森面前卻表示，手稿完成于“比亞韋斯托克（Białystok）和明斯克（Minsk）的行程之后”，并建議用海德里希的名義來發表（那么就是在6月4日以前）。

[[29]](#_29_4) 20.4.1942: US Holocaust Museum Washington RG15 007M reel 23: HK Warschau 362/298 fol 1.5: Niederschrift über die Arbeitstagung mit Prof. Franz (Günther Franz, Prof.“Reichsuniversität Straßburg”) bei VII C am 10. und 11.IV.1942, gedruckt als Dokument 6 bei Jürgen Matthäus, “‘weltanschauliche Forschung und Auswertung’, Aus den Akten des Amtes VII im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in: Wolfgang Benz(Hrsg.), Jahrbuch für Antisemitismusforschung 4, 1996, 287-330, hier: 309-312.關于局長（西克斯）在1942年4月20日針對工作會議記錄表示的意見，參見Dokument 7, 312-314.那個計劃最后顯然遭到放棄，參見1942年7月1日的下一次會議記錄。ebd. fol. 12, 15.18-19, als Dokument 10 bei Matthäus, A. o., 314-320 und Protokoll der Tagung vom 16.1.1943, ebd. fol 21, 25, 27,als Dokument 12, 321-324.

[[30]](#_30_4) 例如23.2.1938: Ziel und Methodik in der Lösung der Judenfrage, BArch R 58/911, 144.

[[31]](#_31_4) 南德廣播公司的魯道夫·佩克爾（Rudolf Peckel）時常在《贊成與反對》（Für und Wider）節目系列中剖析《路徑》（1954年6月8日，1954年11月23日，1955年1月4日）。霍爾格·梅丁還提到了巴伐利亞廣播公司的節目（Meding, Der Weg..., A. o., 133.）。

[[32]](#_32_4) 關于尋獲原本認為已經遺失的一些文件的經過，參見本書第七章《余波蕩漾》。

[[33]](#_33_4) 謹在此感謝赫爾穆特·艾希曼（艾希曼的一位孫輩）愿意與我討論其家族保有的手稿，并代向其父迪特爾·艾希曼詢問查閱手稿的可能性。其家人正在認真考慮出版手稿的可能性，但前提條件是能夠獲得合理報酬，并且仔細比對手稿與目前已公開材料在內容上的差異。

[[34]](#_34_4) Servatius: Einlassungen zu den “Sassen-Memoiren”, sechs Seiten, Jerusalem 9.6.1961, 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4.

[[35]](#_35_4) 克勞斯·艾希曼接受《快客雜志》的采訪，1966年1月2日。

[[36]](#_36_5) 所謂“專業文獻”中的許多引文也不例外。

[[37]](#_37_4) 這種區別并不總是顯而易見，但還是有許多證據。艾希曼在寫作和講話時使用一種獨具個人風格的語言——其主要特征是把納粹用語和官腔與其他風格結合在一起。

[[38]](#_38_4) 第一次出現于錄音帶8:1，談話的時間可以確定是在1957年4月中旬之后，因為它晚于魯道夫·卡斯特納遇害（3月3日遭刺殺，3月15日去世），以及《阿根廷日報》對此發表的評論（1957年4月15日）。此外談話中還提到了克魯邁被逮捕一事（8:9.2，1957年4月1日）。

[[39]](#_39_4) 錄音帶上錄了薩森口述的一部分艾希曼手稿，以便打字下來。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它最晚在什么時候就一定已經寫好了，亦即在剛好錄制了那段口述的15號錄音帶之前。薩森抄本15, 5-9，等同于《其他人都講過了，現在我想說話！》，第54-65頁。

[[40]](#_40_4) 《通論》（Allgemein），白紙上的兩頁手寫稿，BArch Koblenz Nachlass Eichmann,N/1497-92。《通論》顯然和《私事》（Persönliches）完成于同一時期。這兩份文稿都試圖創造出艾希曼所想要呈現的自我形象。

[[41]](#_41_4) 薇拉·艾希曼接受《巴黎競賽畫報》的采訪，1962年4月29日，BArch AllProz 6/252。

[[42]](#_42_4) In Die Welt, 17.8.1999.

[[43]](#_43_5) 沃亞克認為“那份手稿無法驗證”，參見Irmtrud Wojak, Eichmanns Memoiren. Ein kritischer Essay. Frankfurt a. M. 2004, 68.大多數作者引用了羅伯特·彭道夫，或者是非常可疑的版本《我，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手寫版的《私事》現藏于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Nachlass Eichmann, Barch Koblenz, N 1497-92）。與彭道夫所說的不同，這是一份寫在不同尺寸條紋紙上的手稿——或者更精確地說，它是一本練習簿，額外插入了較大的紙張。總共有九頁，其中兩頁雙面書寫。只有標題為“通論”的手稿才使用了方格紙。由于彭道夫顯然同時知道這兩份手稿，因此很可能混淆了它們。《通論》殘缺的手寫稿，見BArch Koblenz, N 1497-92，一個（不可靠的）當代抄本見N 1497-73。

[[44]](#_44_5) 除特別標明的部分之外，以下所有引文皆來自《私事》手寫稿，Eichmann Estate, BArch Koblenz, N 1497-92。此處為第4頁。

[[45]](#_45_4) ebd., 5.

[[46]](#_46_4) ebd., 7.

[[47]](#_47_4) ebd.

[[48]](#_48_4) ebd., 6.

[[49]](#_49_4) ebd.

[[50]](#_50_4) ebd., 9.

[[51]](#_51_4) 艾希曼在行刑前寫給家人的告別信中表示：“你們可以放心地讓歷史來做出判決。”（Barch Koblenz, AllProz 6/248.）

[[52]](#_52_4) Persönliches, Eichmann Estate, BArch Koblenz, N 1497-92, 6.

[[53]](#_53_4) ebd., 9.

[[54]](#_54_4) 共107頁，手寫于接近A4紙大小的方格紙上。手稿和各種殘篇如今散布在好幾個檔案館的資料夾內，例如路德維希堡聯邦檔案館、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AllProz 6（塞爾瓦蒂烏斯遺物），以及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Nachlass Adolf Eichmann（阿道夫·艾希曼遺物）。此外亦參見本書第七章《余波蕩漾》。

[[55]](#_55_4) 關于公開“阿根廷文稿”的經過，參見本書第七章《余波蕩漾》。

[[56]](#_56_5) “Die anderen sprachen”, in I, 1.

[[57]](#_57_5) ebd., 2.

[[58]](#_58_5) ebd.

[[59]](#_59_4) ebd., 7.

[[60]](#_60_4) Raphael Gross, Anständig geblieb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oral. Frankfurt a. M. 2010, 191.

[[61]](#_61_5) “Die anderen sprachen”, in I, 7.手稿的這一頁已經消失不見，顯然薩森把原件賣給了《生活》雜志。對這一頁以及同時期副本的提及，見路德維希堡聯邦檔案館，“雜項”資料夾（Ordner Diverses, BArch Ludwigsburg）。亦參見本書第七章《余波蕩漾》。

[[62]](#_62_4) “Die anderen sprachen”, in II: Betrifft: Meine Feststellungen ..., 1.

[[63]](#_63_4) ebd., 65（根據手寫稿的頁碼）。手寫稿已根據上述各檔案館的資料合并重組起來。

[[64]](#_64_4) ebd., 1.

[[65]](#_65_4) ebd., 2.

[[66]](#_66_4) Zur Jackson-Äußerung A. o.

[[67]](#_67_4) “Die anderen sprachen”, in II: Betrifft: Meine Feststellungen ..., 54.

[[68]](#_68_4) ebd., 57.

[[69]](#_69_4) 1943年1月18日希姆萊向米勒寫道：“帝國保安總局……不得在這方面繼續自己進行統計工作，因為此前的統計資料缺乏專業準確性。”Peter Witte and Stephan Tyas, “A New Document on the Destruction and Murder of Jews during ‘Einsatz Reinhardt,’ ”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5, pp. 468-86.

[[70]](#_70_4) 迪特爾·維斯利策尼的手寫稿《主旨：耶路撒冷大穆夫提》（Betr. Grossmufti von Jerusalem, Bratislava 26.7.1946, T/89）對“卡片室”做出了說明。艾希曼辦公室的秘書埃里卡·朔爾茨（Erika Scholz）在1972年3月27日的“諾瓦克審判案”中，描述了羅爾夫·金特的墻上掛圖，以及弗朗茨·諾瓦克在自己背后墻上掛出的一份圖表，用小旗子標示出各個毀滅營。Kurt Pätzold, Erika Schwarz, »Auschwitz war für mich nur ein Bahnhof«.Franz Novak, der Transportofizier Adolf Eichmanns. Berlin 1994, hier 171.

[[71]](#_71_4) 關于《科赫爾報告》和其他數據所引起的爭論，參見本章《600萬人的謊言》一節。

[[72]](#_72_5) 這份手寫稿的抄錄本被歸類為15號錄音帶的一部分，因而收錄于薩森抄本。手寫稿中的“大約”（rund）一字被誤讀成“以及”（und），見哈加格版的薩森抄本第116頁。但手寫稿的意思非常清楚。

[[73]](#_73_5) “Die anderen sprachen”, in II: Betrifft: Meine Feststellungen ..., 64.

[[74]](#_74_4) ebd., 65.

[[75]](#_75_4) ebd., 63-64.

[[76]](#_76_4) 薩森訪談會67號錄音帶，BA Tape 10B 1:01:00.

[[77]](#_77_4) Nachlass Eichmann, BArch Koblenz N 1497-90, Bl. 1.薩森出售的拷貝上面很可能已經刪掉了這些補充文字，因為他努力不給艾希曼制造任何麻煩。參見本書第七章《余波蕩漾》。

[[78]](#_78_4) 克勞斯·艾希曼接受《快客雜志》的采訪，1966年1月2日。

[[79]](#_79_4) 艾希曼在以色列監獄里坐牢的時候顯然就如此盤算，認為一場“怪物審判”可以讓簡單的文稿匯編變成暢銷書。1961年4月17日“在審判前夕”的家書，All. Proz 6/165.

[[80]](#_80_4) 艾希曼為海德里希草擬了萬湖會議和其他場合的演講稿。他曾在討論萬湖會議記錄時向薩森談及此事，薩森抄本47, 10及其他。在以色列的時候，他當然聲稱自己已經記不得那回事了。

[[81]](#_81_4) Die anderen sprachen..., III 10.

[[82]](#_82_4) ebd., 4.

[[83]](#_83_4) ebd., 3f.

[[84]](#_84_4) ebd., 5.

[[85]](#_85_4) ebd., 6.

[[86]](#_86_4) ebd., 7.

[[87]](#_87_4) ebd., 9.

[[88]](#_88_4) ebd.

[[89]](#_89_4) ebd., 10.

[[90]](#_90_4) ebd., 7.

[[91]](#_91_4) 艾希曼告訴威廉·赫爾的說辭。William L. Hull, Kampf um eine Seele, Gespräche mit Eichmann in der Todeszelle. Wuppertal 1964, 75.

[[92]](#_92_4) Bettina Stangneth, Adolf Eichmann interpretiert Immanuel Kant. Vortrag Universität Marburg 2002.

[[93]](#_93_4) 斯坦·勞里森斯雖然在談到薩森時“引用”了艾希曼關于自己崇拜康德的講法，但嚴格說來，他只是把以色列的文件與薩森抄本中的段落拼湊在一起而已。其實無論在薩森抄本、錄音帶，還是艾希曼的阿根廷文稿中，艾希曼都完全沒有像在以色列那樣表達出他對哲學的喜愛。Lauryssens, A. o., 137.

[[94]](#_94_5) Die anderen sprachen..., III 10.

[[95]](#_95_4) ebd., 11.

[[96]](#_96_5) ebd.

[[97]](#_97_5) 薩森抄本3, 3。

[[98]](#_98_4) 薩森抄本33, 10。

[[99]](#_99_4) Die anderen sprachen..., III 3.

[[100]](#_100_4) Karl Beyer, Jüdischer Intellekt und deutscher Glaube, Leipzig 1933, 28f. und Otto Dietrich,Die philosophische Grundlag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Ruf zu den Waffen deutschen Geistes. Breslau 1935.關于所謂“猶太”和“德國”哲學概念的納粹書籍汗牛充棟，它們也可以在通俗讀物中找到，例如Theodor Fritsch, Handbuch der Judenfrage, Leipzig,1943, 393ff.

[[101]](#_101_4) Walter Groß, Der deutsche Rassegedanke und die Welt. Berlin 1939 (Schriften I,42), 30.

[[102]](#_102_5)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 A. o., 174.

[[103]](#_103_4) 總結陳詞的草稿和最后實際說出內容的復印本在1996年之后很容易即可獲得，見Zvi Aharoni und Wilhelm Dietl, Der Jäger ..., A.o., 275-281.羅伯特·塞爾瓦蒂烏斯曾要求艾希曼做出大刀闊斧的修改。按照艾希曼自己的構想，總結陳詞應該使用他計劃撰寫的《偶像》一書的部分內容。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Barch Koblenz Allproz 6/196。

[[104]](#_104_5) 對阿夫納·萊斯的采訪，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當代史檔案館阿夫納·萊斯遺物，Nachlass Less, AfZ, ETH-Zürich, Band 7.1.IX。

[[105]](#_105_4) William L. Hull, Kampf um eine Seele, Gespräche mit Eichmann in der Todeszelle.Wuppertal 1964, 131.赫爾是一位基督教傳教士，他把自己描述為“新教神職人員的非官方觀察者”。他主動要求前去探望艾希曼，目的是讓一名受過洗的新教徒回到正確的道路上，把他從詛咒中拯救出來。赫爾本身屬于一個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基督信仰復興教派，該教派傲慢對待其他類型的宗教信仰，具有明顯的反猶太主義色彩。（他曾在接受加拿大記者采訪時，以最理所當然的方式說道：艾希曼的所有猶太受害者無論如何都會在地獄里受到烈火炙烤，因為他們還不如自己的謀殺兇手，非但沒有受過洗，而且還不曾向救世主祈求。）這些“皈依對話”最荒誕的后果之一在于，艾希曼實際上是以一種正面的姿態出現的。因為他不但體面地反駁了咄咄逼人的傳教方式，而且作為讀者，你會因為要面對如此令人厭煩的原教旨主義者登門騷擾而對艾希曼產生一種真正的同情——這又轉而成為讓人不喜歡赫爾的原因。盡管如此，遺憾的是，赫爾的那本書幾乎沒有人讀過。書中包含了三封非常有趣的艾希曼信件，而且這些信件與根據記憶還原的談話內容相比，無疑是比較可靠的消息來源。

[[106]](#_106_4) 1933年11月11日海德格爾在萊比錫舉行的德國學術界國會選舉造勢大會上發表的臭名昭著的演說。引自Dok. Nr. 132 in Guido Schneeberger, Nachlese zu Heidegger. Bern 1962 und 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1934). Frankfurt a.M. 1983, 14.海德格爾在此代表了許多被國家社會主義“一體化”（gleichschaltet）的哲學家。

[[107]](#_107_4) 艾希曼在1962年5月回答《巴黎競賽畫報》提出的書面問題時，曾經提到寫給弟弟羅伯特的這封信。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2, 27.

[[108]](#_108_4) 1939年2月20日在柯尼斯堡舉行的哥白尼和康德紀念會上，羅森貝格說了這句話。

[[109]](#_109_4) 什洛莫·庫爾恰爾說，艾希曼在短暫的憤怒之后相當熱衷于這個新想法。艾希曼告訴他面前的這位心理學家：“您似乎是對的，他的確只是巴勒斯坦的總督。”于是對艾希曼而言，把自己和他相提并論的做法也就變得合理了。Kulcsár, Kulcsár und Szondi, »Adolf Eichmann an the Third Reicht« ..., A. o., 33f.

[[110]](#_110_4) Die anderen sprachen..., III 13.

[[111]](#_111_4) Stern, Heft 28, 9.11.1960.艾希曼1960年9月15日在以色列接受審訊時證實了此事。

[[112]](#_112_4) 艾希曼告訴薩森，在滅絕行動中，他曾經允許殺害了一位親戚，而且即使在家庭成員的極力要求下也沒有阻止此事。67號錄音帶——錄音帶的內容比抄本更加詳細。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05B，開始于21:00。

[[113]](#_113_5) Die anderen sprachen..., III 13.

[[114]](#_114_4) Rudolf Höß, Kommandant in Auschwitz, Autobiographische Aufzeichnungen. 1. Auflage 1958, hier zitiert nach München 2000, 194.

[[115]](#_115_4) 艾希曼真的這么寫了出來。Götzen, 138, A.E. 97.

[[116]](#_116_5) Handschrift, Allgemein, Nachlass Eichmann, BArch Koblenz N 1497-92, 2.

[[117]](#_117_4) 薇拉·艾希曼接受《巴黎競賽畫報》的采訪，1962年4月29日。

[[118]](#_118_4) Handschrift, Allgemein, Nachlass Eichmann, BArch Koblenz N 1497-92, 2.

[[119]](#_119_5) Die anderen sprachen..., III 14.

[[120]](#_120_4) ebd., 16.

[[121]](#_121_5) ebd., 21.

[[122]](#_122_4) ebd., 23.

[[123]](#_123_4) ebd., 24.

[[124]](#_124_4) ebd., 25

[[125]](#_125_4) “懺悔是小孩子才會做的”這個講法常被引用，卻很少有人說明出處。這句話出自1961年7月13日第96次開庭交叉審訊時艾希曼的證詞。艾希曼否認曾經在阿根廷講過“小小的結束感言”之后，便說出了那句話。

[[126]](#_126_4) 艾希曼記不起來的《圣經》引文為《約翰福音》4:22。

[[127]](#_127_4) Die anderen sprachen..., I 1.

[[128]](#_128_4) ebd., III 26.

[[129]](#_129_4) 1960年6月9日阿根廷聯邦警察針對艾希曼被綁架一事做出的報告。Archivo General de la Nacíon/ Argentinisches Nationalarchiv (AGN), DAE, Bormann-Akte, S. 77-79. Zitiert bei Uki Goñi, Odessa..., A. o., 296, n.559.

[[130]](#_130_4) 關于米爾登施泰因的戰后生涯，參見Timothy Naftali, “The CIA and Eichmann’s Associates,” in US Intelligence and the Nazis, ed. Richard Breitman.Washington, D.C., 2004,337-374.其主要依據為NA, RG 263, CIA Name File Leopold von Mildenstein.

[[131]](#_131_4) 艾希曼于1960/1961年寫道，他曾經有過前往智利躲藏的可能，但他愚蠢地沒有利用那個機會。Meine Flucht, A. o., 27.

[[132]](#_132_4) 起訴文件T/873：弗朗茨·拉德馬赫在費利克斯·本斯勒（Felix Benzler）發給外交部的電報上手寫的注記（1941年9月12日）。復印本參見R.M.W. Kemprter, Eichmann und Komplizen. Mit Dokumentenfaksimiles. Zürich, Stuttgart, Wien 1961, 291. Identisch mit IMT Dok. NG-3354.

[[133]](#_133_5) Shlomo Kulcsár, “De Sade and Eichmann,” Mental Health and Society 2 (1976), 108.

[[134]](#_134_4) 克勞斯·艾希曼接受《快客雜志》的采訪，1966年1月2日。

[[135]](#_135_4) 對萊斯的訪問。Nachlass Less, Afz ETH-Zürich, Band 7.1.IX.

[[136]](#_136_4) 艾希曼給家人告別信的最后一行是：“我現在要被送去執行絞刑了，現在是1962年5月31日，差5分鐘零點。永別了！”（信中最后一個詞“Pfuat Euch！”用的是奧地利說法。） BArch AllProz 6/248.

[[137]](#_137_4) 薩森抄本18, 8。

[[138]](#_138_4) 非常感謝薩爾茨堡市檔案館的彼得·克拉默爾（Peter F. Kramml）先生為我查看戶口登記卡。

[[139]](#_139_4) 薩森／魯德爾在《德國和阿根廷之間》一書中，提到了弗里奇的此次德國之行。另參見右派刊物Deutsche Annalen, Jahrbuch des Nationalgeschehens, Jg. 4, 1975, “Deutsche Abschiede 1974”.關于弗里奇納粹生涯的傳言是由弗里奇自己首先散播出來的，因為他在寫給納粹作家們的招攬信件中，聲稱自己聽到過他們親自朗讀——例如弗里奇1948年2月10日寫給維爾納·博伊梅爾堡的信函（Rheinische Landesbibliothek Koblenz,Nachlass Werner Beumelburg）。

[[140]](#_140_4) 作者在2009年與薩斯基雅·薩森的采訪及通信。

[[141]](#_141_5) 弗里奇寫給維爾納·博伊梅爾堡的信函，1948年4月23日，Nachlass Beumelburg, A. o.

[[142]](#_142_4) 弗里奇寫給維爾納·博伊梅爾堡的信函，1949年6月6日，Nachlass Beumelburg, A. o.

[[143]](#_143_4) 弗里奇寫給維爾納·博伊梅爾堡的信函，1948年8月19日，Nachlass Beumelburg, A. o.

[[144]](#_144_4) German Nationalist and Neo-Nazi Activities in Argentina, July 8, 1953, declassified on April 11, 2000 (CIA-RDP620-00 856 R000 3000 30004-4)。烏基·戈尼據此認為魯道福·弗洛伊德是杜勒出版社的共同擁有者。

[[145]](#_145_4) ebd.弗里奇早年也曾經與“好書書店”（EI Buen Libro）的老板特奧多爾·施密特（Theodor Schmidt）合作，但如果我們相信弗里奇在信中所說的，那么這種合作關系因為財務上的分歧并沒有持續很長時間。

[[146]](#_146_4) “Argentinisches Tageblatt”, in: AHK, Argentinische Vereinigungen deutschsprachigen Ursprungs. Ein Beitrag zur sozialen Verantwortung. Buenos Aires 2007, 589-597.

[[147]](#_147_4) 薩斯基雅·薩森在2009年提供的信息。

[[148]](#_148_4) 漢斯·雷興貝格在為艾希曼的辯護提供資助時，從1960年開始與弗里奇有所接觸。他曾向羅伯特·塞爾瓦蒂烏斯抱怨這種依賴性。參見本書第七章《余波蕩漾》。

[[149]](#_149_4) 阿道夫·馮·塔登在一封信中提到，魯德爾是最后一個離開薩森的人，見塔登1981年9月10日寫給格特·祖德霍爾特（德魯費爾出版社）的信函。Nachlass Thadden,Landesarchiv Niedersachsen, VVP 39, Ace. 1/98 Nr. 49. Korrespondenz S.

[[150]](#_150_4) 第95次開庭時的證詞。艾希曼聲稱，弗里奇只在很短一段時間參加了對話，然后就再也沒有出現過。然而抄本和錄音帶都顯示，弗里奇和艾希曼在最后幾次的錄音中仍然保持聯系。

[[151]](#_151_5) 艾希曼在1960年被綁架的消息傳開之后，艾希曼的弟弟奧托和羅伯特立刻與埃伯哈德·弗里奇見面會商。這表明他們在此之前就已經相互認識。參見本書第七章《余波蕩漾》。

[[152]](#_152_4) 關于薩森逃離歐洲之前的生平，參見Gerald Groenefeld, Kriegsberichter. Nederlandse SSoorlogsverslaggevers 1941-1945. Haarlem 2004, insb. “De fratsen van Sassen”, 356-368.關于其逃亡和在阿根廷的生活，參見薩森在其小說《門徒與婊子》第六章對逃亡所做的文學化描述、魯爾夫·范·提爾的紀錄片，以及對英格·施奈德和薩斯基雅·薩森的采訪。斯坦·勞里森斯的《阿道夫·艾希曼的致命友誼》則只有消遣娛樂價值，拉迪斯拉斯·法拉戈對薩森的采訪更顯然全是虛構。參見本書第七章《余波蕩漾》。

[[153]](#_153_4) 這個講法的來源并非完全可靠。勞里森斯的許多敘述都不準確，或者會讓人對作者產生懷疑。例如他稱自己喜歡科隆大教堂唯一的尖頂（而眾所周知該教堂有兩個尖頂）；他聲稱在薩森家中看見的文件夾，其實只存在于以色列。

[[154]](#_154_4) 艾希曼后來強調自己也“曾經在前線戰斗”。關于武裝黨衛隊成員在阿根廷與艾希曼等人的巨大分歧，參見佩德羅·波比耶辛2009年接受雷蒙德·萊伊采訪時的回答：“艾希曼不是黨衛隊隊員……他是個豬狗不如的東西。”

[[155]](#_155_4) 以下細節來自英格·施奈德的回憶（魯爾夫·范·提爾的采訪），以及紀錄片《威廉·薩森》（Willem Sassen, kro, 2005）。

[[156]](#_156_4) 薩斯基雅·薩森記得，《門徒與婊子》那部小說導致了她父母親之間的齟齬。甚至不需要對國家社會主義的抽象理解，只要讀過描述他們乘船渡海的那一章，看到薩森如何以令人倒胃口的粗暴方式描述強奸和垂死的胎兒，就能夠體會為什么一位妻子會反對丈夫的這種撰寫方式。佩德羅·波比耶辛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他前往薩森家做客時也曾聽到爭執（Raymond Ley, 2009）。

[[157]](#_157_5) Sassens Akte: 186 912/48; Goñi, Odessa ..., A.o., 176.

[[158]](#_158_4) 英格·施奈德在接受魯爾夫·范·提爾采訪的時候，曾對那段時期做出了詳細的說明（Willem Sassen, kro 2005）。亦參見薩斯基雅·薩森的童年記憶，以及2005年和2009年與作者的通信和采訪。

[[159]](#_159_4) 薩斯基雅·薩森接受雷蒙德·萊伊的采訪，2009年。

[[160]](#_160_5) 關于他在阿根廷的生活，參見魯爾夫·范·提爾對英格·施奈德的采訪（2009年）、薩斯基雅·薩森與作者的通信（2009年），以及弗朗西斯卡·薩森與作者的通信（2009年）。

[[161]](#_161_4) 根據英格·施奈德和薩斯基雅·薩森的講法。

[[162]](#_162_4) 從英格·施奈德的回憶，尤其是密普·薩森拒絕接受德國國籍一事，皆可看出密普·薩森對國家社會主義的批判態度并不只是她女兒一廂情愿的想法。薩森的妻子無論如何都不想被看成德國人，即便那會使她更容易在歐洲立足。檔案的補充文件中提到了密普·薩森的哥哥：BVerwG 7A 15.10, Saure gegen BND, BND-Akten 121 099, 1853 (Meldung zum Hintergrund des Life-Vertrags vom 23.11. 1960).

[[163]](#_163_4) 艾希曼審判第102次和105次開庭時的證詞，以及艾希曼向他的律師和阿夫納·萊斯做出的說明。

[[164]](#_164_4) 薇拉·艾希曼接受《巴黎競賽畫報》的采訪，1962年4月29日。

[[165]](#_165_4) 佩德羅·波比耶辛在紐約買了一些錄音機，然后拿去阿根廷出售，“薩森也是我的客戶之一”（Interview Raymond Ley, 2009）。

[[166]](#_166_4) 感謝薩斯基雅·薩森和弗朗西斯卡·薩森，通過回憶她們父母家內部的情形來幫助我理解歷史文獻。

[[167]](#_167_4) 薩斯基雅·薩森的表述。

[[168]](#_168_5) 薩斯基雅·薩森回憶，父母親都非常努力地把自己的教育理念傳遞給女兒們。

[[169]](#_169_4) 艾希曼自己在以色列提到了星期六下午和晚上，以及星期日上午（第92次開庭的證詞）。薩森抄本和各種文件更能夠讓我們驗證此事。雖然薩斯基雅·薩森對星期日的印象特別深刻，但我們現在可以確定這并不是全部。除了密普·薩森喜歡帶著她的女兒們外出和郊游之外，星期六更是一個正常的上學日。

[[170]](#_170_4) 所有談論過這件事情的當時的目擊者都提到是在薩森家進行的訪談（薩森的女兒們、佩德羅·波比耶辛、20世紀70年代后的威廉·薩森、薇拉·艾希曼、克勞斯·艾希曼），沒有任何人提到在艾希曼家進行的錄音。艾希曼的家人甚至對錄音帶內容一無所知，這個事實有力地反駁了他在以色列講的故事。

[[171]](#_171_4) 薩森抄本10, 2。

[[172]](#_172_4) “薩森同志”出現過無數次，“我親愛的薩森同志”出現在薩森抄本11, 13。此外也同樣頻繁地出現了“朗格爾”和“弗里奇”（當二人缺席的時候），以及“拉亞科維奇”之類不在場的熟人。“先生們”則用于人數較多的時候。例如艾希曼在薩森抄本18, 8說道：“先生們，這對您們來說應該非常明顯……”

[[173]](#_173_4) 甚至連本身未曾出席訪談會的抄寫員，也在發言者身份不夠清楚的時候，用括號注明了“Eichm”（艾希曼），見薩森抄本13, 11。

[[174]](#_174_4) 例如薩森曾告訴艾希曼：“我只不過是想請您這個星期再重新考慮此事……”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09D, 5:59。

[[175]](#_175_4) 例如艾希曼在薩森抄本72, 6表示：“您最近給了我一些關于外交部活動的資料。”

[[176]](#_176_4) 艾希曼：“我相信我交給弗里奇同志的這些報紙對事情做出了更詳細的描述”（指的是一些關于拉烏爾·瓦倫貝里的報紙文章，薩森抄本10, 2）。

[[177]](#_177_4) 薩森抄本9, 17。

[[178]](#_178_4) Die Schwärmer von Zion.——這篇關于以色列境內激進團體的長文呼應了卡斯特納遇刺案所引發的討論。艾希曼仔細閱讀了這篇文章，以致能夠逐字引述。

[[179]](#_179_4) “Religion: Two Kinds of Jews”, Time 26.8.1957 (erschienen am 20.8.).這篇文章提到了本—古里安在8月初針對猶太復國主義發表的講話。阿爾貝特·巴林誕生于1857年8月15日，《阿根廷日報》報道了星期四舉行的慶祝活動（“Albert Ballins Lebenswerk”, 15.8.57）。這表示37-39號磁帶的錄音時間為1957年8月24日至25日的周末。

[[180]](#_180_4) 艾希曼表示“讓我們以舍納爾為例，因為他目前正當紅”，接著是艾希曼針對判決所發表的意見（薩森抄本72, 2）。費迪南德·舍納爾因為過失殺人罪，1957年10月被慕尼黑第一地方法院判處四年半有期徒刑。

[[181]](#_181_4) 薩森抄本20, 2。“上周日我們在‘大厚書’中找到了一個日期。”(Ludw Div. 12.)

[[182]](#_182_4) 給抄本排序的手寫嘗試顯然出自薩森，因為那些標記都出現在原件、負片和影印本上面。10號錄音帶第3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讓人快速看到這種排序標記的做法（及其錯誤）。

[[183]](#_183_5) 逐行比對的結果顯示，薩森抄本的內容有11%是書籍引文，6%來自其他材料（與艾希曼訪談無關的部分、薩森自己的札記和口述），83%是真正的談話部分。在某些頁面上，引文所占的比例可高達90%以上（例如63號和65號錄音帶，艾希曼針對每一則引文所做的評斷僅僅是“正確”或“不正確”）。在一個例子中，甚至整整一頁都是引文（Poliakov, 236；薩森抄本63, 5）。

[[184]](#_184_4) 正是因為這個理由，德魯費爾出版社所謂的薩森抄本版本（Aschenauer, Ich, Adolf Eichmann. Leoni a. Starnberger See 1980）不堪使用。因為它把所有內容都混為一談，打破了對話結構，而且沒有清楚認識到其他發言者和各種引文的存在，于是讓艾希曼說了一大堆他根本沒有講過的東西。更重要的是，德魯費爾出版社的版本完全消除了看出問題的可能性。結果薩森和阿爾文斯萊本的話也被一些嚴肅的二手文獻當成了艾希曼的講法。關于該版本亦請參見本書第七章《余波蕩漾》。

[[185]](#_185_4) 舉幾個可以精確證明這一點的例子：艾希曼進行修訂的時候，是一次連續處理好幾卷錄音帶并寫下編號，標明順序。在處理8號錄音帶時，艾希曼還沒有讀過約埃爾·布蘭德和魏斯貝格的書，他在處理24號錄音帶時補上了自己的閱讀印象，因此8號錄音帶的時間早于24號。第11、12和13號錄音帶則共同呈現了一次完整的談話。一些內部的關聯性，像是“剛才”（42號）顯然指的是41號錄音帶，證明了先后順序。類似的還有“幾個星期前”（46號提到37號錄音帶）、“昨天”（54號提到51號錄音帶），或者后來確實按計劃進行的訪談（在50號錄音帶宣布朗格爾將發言而后在64號錄音帶證實）。但更重要的是，那些人是按照專業文獻內容的順序來討論的，因此我們可以通過引用的書中文字來跟蹤談話。例如58號錄音帶結束于賴特林格的第399頁，59號錄音帶則開始于賴特林格的第399頁……我們能找到大量這樣的證據，從而以驚人的準確性重建訪談過程。

[[186]](#_186_4) 72號錄音帶抄本的編號被標示成一個問號，因為打字時不確定它是否為72號錄音帶。7號錄音帶——根據薩森的說明——從來沒有存在過。70號和71號錄音帶至今蹤跡全無。55號和69號錄音帶則明顯殘缺不全。

[[187]](#_187_4) 61號錄音帶包含有關波利亞科夫那本書的談話，然后針對賴特林格的第218-220頁進行辯論。出現無編號錄音帶，是因為薩森拿了一卷錯誤的磁帶，它上面有關于賴特林格討論的前面部分，即212-217頁。

[[188]](#_188_4) 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8A，開始于30:10。

[[189]](#_189_4) 薇拉·艾希曼接受《巴黎競賽畫報》的采訪，1962年4月29日。

[[190]](#_190_4) 薩森抄本67, 6。錄音帶的內容出現了更多細節，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10B，開始于38:50。

[[191]](#_191_4) 1960年6月6日艾希曼接受阿夫納·萊斯的審訊，第397頁：“我直到大約三年前才再一次與米爾德納說話……當著一位薩森先生的面，逐點反駁了那些事情。”

[[192]](#_192_4) 由于丹麥百姓的反抗太過強烈，計劃中的大規模遣送猶太人行動無法實施。由于艾希曼直接參與了相關計劃，因而把計劃的失敗看成是個人的挫折，并且在自己的隊伍中尋找罪魁禍首。

[[193]](#_193_5) 所有猜測米爾德納在阿根廷的論述，完全都立基于艾希曼在以色列的說辭。它們之所以有時顯得相互獨立，只是因為沒有詳細說明出處的緣故——維森塔爾、烏基·戈尼、施內彭，沃亞克，以及大衛·切薩拉尼皆如此。這并不表示米爾德納從未去過阿根廷。然而這也意味著，我們不可將艾希曼視為米爾德納逃往阿根廷的證人，因為我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其他證據。總之可以確定的是，米爾德納從來都沒有參加過薩森訪談會。

[[194]](#_194_4) 我們可以放心地忽略“艾希曼或許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聽錯了朗格爾博士的名字”這種貼心的想法。朗格爾是薩森訪談會的固定成員，艾希曼曾多次在錄音帶上大聲念出這個名字，甚至把它完全正確地手寫到一份抄本上（薩森抄本59, 6）。

[[195]](#_195_4) 31號錄音帶，薩森抄本修正稿4, 1。路德維希堡聯邦檔案館BArch Ludwigsburg Ordner Diverses, 14.

[[196]](#_196_4) 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8A，開始于27:50。從上下文可以看出，這次錄音出現于相當早期的磁帶，來自訪談會的前三分之一。

[[197]](#_197_4) Holger Meding, Der Weg ..., A. 0., 117.

[[198]](#_198_4) Juan Maler, Frieden, Krieg und “Frieden”. Bariloche, 1987, 340.

[[199]](#_199_4) 約瑟夫·施萬伯格也在那里住過一段時間，但最遲在1954年又返回了布宜諾斯艾利斯。

[[200]](#_200_4) 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03A的開頭部分。

[[201]](#_201_4) 薩森抄本3, 4。

[[202]](#_202_4) 摘自1991年Telefe電視臺Edicion plus節目的專訪。遺憾的是原材料尚未歸檔。

[[203]](#_203_4) 薩森抄本3, 3。

[[204]](#_204_4) 關于有女士參加和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的線索其實都相當明顯，可我也是經過多次閱讀之后才發現了它們。或者更準確地說，那是在我采用了我敬重的老師克勞斯·厄勒（Klaus Oehler）關于解讀深奧文字的建議，把全部文字從后往前又讀過一遍之后的事情。盡管那個方法當初被用于教我們閱讀亞里士多德，但它也是分析艾希曼文字的絕佳工具。

[[205]](#_205_4) 薩森抄本3, 2。

[[206]](#_206_5) 薩森抄本3, 1。

[[207]](#_207_4) 薩森抄本29, 4。29號錄音帶的抄本上面有艾希曼手寫的補充說明：“這29號錄音帶僅供您參考。”其修改意見更清楚地注記，類似這樣的生平敘述“不應該在書中出現”。

[[208]](#_208_4) 艾希曼后來講述了這個故事的不同版本。但他的人事檔案使時間可以追溯到1938年上半年（SS-Akte, BDC BArch Berlin）。

[[209]](#_209_4) 黨衛隊檔案的文件，被用作起訴文件T/37(12)。

[[210]](#_210_4) 關于赫爾牧師的更多信息，參見下文。

[[211]](#_211_4) 薩森抄本3, 2。

[[212]](#_212_4) 在最初的一些抄本中，抄寫員習慣將“國家社會主義”縮寫成一種極易被誤解的形式，直到薩森在一卷錄音帶上做出明確指示為止。但由于這個敏感的字眼在說話時往往已被簡稱，不難理解它為什么還是會不斷造成問題。

[[213]](#_213_5) SSO-Akte, BArch Berlin (BDC); Karl Schlöger (Hrsg.), Russische Emigranten in Deutschland 1918-1994. Berlin 1995.

[[214]](#_214_5) 薩森抄本3, 2。

[[215]](#_215_4) ebd.

[[216]](#_216_4) 埃里卡·伊麗莎白·加爾特·德·加利亞德（Erika Elisabeth Garthe de Galliard），她嫁給了戰犯皮埃爾·達耶（Pierre Daye）的一個比利時朋友。烏基·戈尼曾告訴我，她從未否認自己知道薩森的計劃，并且與威爾弗雷德·馮·奧芬和迪特爾·門格保持著密切聯系。但這一切并不表示她對國家社會主義的觀點有許多批判性的問題。

[[217]](#_217_4) 英格·施奈德在接受魯爾夫·范·提爾采訪時詳細解釋說，她既不明白自己的妹妹為什么會想聽那些無稽之談，也不理解她為何不結束與薩森的戀情，盡管密普·薩森對此早有所知。安切·施奈德在1990年死于癌癥，英格·施奈德在2006年去世之前住在阿根廷和不來梅。

[[218]](#_218_4) BA tape 09D, 29: 08.

[[219]](#_219_4) 薩森抄本中偶爾會出現“Dr. Lange”的拼法，但由于這個名字不但被艾希曼手寫更正，而且還在錄音帶上被說出過許多次，此人的名字毫無疑問是“Langer”。

[[220]](#_220_4) 薩森抄本47, 12。

[[221]](#_221_4) 薩森抄本44, 9。

[[222]](#_222_4) 薩森抄本46, 8。

[[223]](#_223_5) 薩森抄本44, 10。

[[224]](#_224_4) 薩森抄本59, 10。

[[225]](#_225_5) 對薩森抄本16, 1的手寫修正。

[[226]](#_226_4) 薩森抄本44, 10，艾希曼手寫補充文字：“這是朗格爾博士說的，我可沒那么講。”艾希曼顯然很想避免人們懷疑他可能曾經幫助過猶太人。

[[227]](#_227_4) 薩森抄本47, 16。

[[228]](#_228_5) 薩森抄本50, 2。

[[229]](#_229_4) 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09D, 53:45ff.

[[230]](#_230_5) 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09D, 1:04:30ff.

[[231]](#_231_4) 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09D, 29:55ff.

[[232]](#_232_5) 迪特爾·福爾默接受霍爾格·梅丁的采訪，此外亦參見他在《國族歐洲》發表的文章。福爾默于1953年年底再次離開阿根廷，但他直到最后都繼續為弗里奇撰稿，并且顯然還負責杜勒出版社被查禁刊物在德國的分銷工作。最遲在1960年，他即已經相當了解1957年的計劃，甚至努力設法減輕薩森抄本所造成的風險。參見本書后文。

[[233]](#_233_4) 薩森抄本54, 14。

[[234]](#_234_4) 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10D, 22:45f.

[[235]](#_235_4) 參見帝國保安總局第四局的職責分配表（Geschäftsverteilungspläne des RSHA [4]），艾希曼審判案起訴文件T/99（即BArch Koblenz R58/840）。關于IV A 4：卡爾滕布倫納1944年2月10日的通告（Runderlaß Kaltenbrunner 10.2.1944 BStU, RHE 75/70,Bd.3, Bl.12-17）；1944年3月15日之后的第四局國家秘密警察職責分配表（GestapoGeschäftsverteilungsplan des Amtes IV, ab 15.3.1944）, ebd. Bl. 2-10。部門名稱的證據，參見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記錄IMT 42, 315ff.，瓦爾特·胡本柯騰的宣誓證詞（Gestapo-39），以及維斯利策尼的證詞。

[[236]](#_236_4) 阿夫納·萊斯的個人筆記。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當代史檔案館，ETH Zürich, Archiv für Zeitgeschichte, NL Avner W. Less, 4.2.3.2.

[[237]](#_237_4) 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10D, 21:30.

[[238]](#_238_4) 薩森抄本53, 15。

[[239]](#_239_4) 艾希曼審判，第102次開庭。

[[240]](#_240_4) 我在抄本和錄音帶上皆未發現有任何人試圖隱瞞身份，或者故意不清楚說出某人的姓名。唯一的“稱呼更改”是打字錯誤所造成的結果，因為像格洛博奇尼克（Globocnik）和維斯利策尼（Wisliceny）之類的姓氏拼寫起來不像艾希曼或薩森那么簡單。

[[241]](#_241_4) 我在黨衛隊和武裝黨衛隊的人員名錄，以及柏林聯邦檔案館柏林文獻中心的檔案中查找朗格爾和類似的姓名，最后只找到兩條有可能的記錄，分別為奧托·朗格爾（無黨衛隊編號！生于1899年3月18日，黨衛隊三級小隊長，有一條關于“毛特豪森集中營”的記錄），以及弗里茨·朗格爾（黨衛隊編號54691，生于1904年1月13日，刑事組長——可能是在維也納）。支持弗里茨·朗格爾的證據為，他是維也納黨部領導當局的偵查人員（RS-PK）。然而他曾因為在意大利北部竭力打擊游擊隊而獲得表揚，因此有過“前線作戰經驗”（R70），名列“戰犯及安全嫌犯中央登記處名單”（CROWCASS List）之上。此外R70和RS-PK兩份文件也有相互矛盾之處。我還沒有找到關于奧托·朗格爾足夠的身份資料，但他的官階顯然太低，不適合從事朗格爾博士所描述的任務。在此感謝柏林聯邦檔案館的盧茨·默澤（Lutz Möser）博士提供協助。

[[242]](#_242_4) 特別在此感謝維也納大學檔案館的芭芭拉·比林格爾（Barbara Bieringer）女士。

[[243]](#_243_4) 在此感謝米夏埃爾·維爾特（Michael Wildt）、貝特蘭德·佩爾茨（Bertrand Perz），以及奧地利抵抗運動文獻中心（DÖW）的工作人員，花時間考慮進一步追蹤朗格爾的可能性。烏基·戈尼曾設法在阿根廷尋找朗格爾的蹤跡，但是在檔案文件中沒有發現任何有關朗格爾、朗格或“克蘭博士”的線索。

[[244]](#_244_4) 73號錄音帶，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8A, 10:35.

[[245]](#_245_4) 我在這一章刻意不標示發言人的姓名，也不列出其他閱讀輔助說明。否則一連串的驚嘆號和“原文如此”非但會導致閱讀不便，還會妨礙讀者注意到語言所產生的效果。

[[246]](#_246_4) 薩森抄本5, 6。

[[247]](#_247_4) 薩森抄本21, 10。

[[248]](#_248_4) 薩森抄本9, 3。

[[249]](#_249_4) 薩森抄本17, 1。艾希曼加了一個手寫的修訂改成了現在的樣子。

[[250]](#_250_4) 薩森抄本18, 3。

[[251]](#_251_4) 薩森抄本21, 6。

[[252]](#_252_4) 薩森抄本34, 4。

[[253]](#_253_4) 薩森抄本5, 5。

[[254]](#_254_4) 薩森抄本68, 9。

[[255]](#_255_4) 薩森抄本34, 4f.。

[[256]](#_256_5) 薩森抄本11, 6。

[[257]](#_257_4) 薩森抄本11, 8。

[[258]](#_258_4) 薩森抄本23, 4。

[[259]](#_259_4) 薩森抄本13, 6。

[[260]](#_260_4) 薩森抄本13, 7。

[[261]](#_261_4) 薩森抄本17, 1。

[[262]](#_262_4) 薩森抄本12, 2。

[[263]](#_263_4) 薩森抄本14, 6。

[[264]](#_264_4) 薩森抄本14, 9。

[[265]](#_265_4) 薩森抄本14, 10。

[[266]](#_266_4) 薩森抄本41, 1。

[[267]](#_267_4) 薩森抄本22, 19。

[[268]](#_268_4) 薩森抄本8, 4。

[[269]](#_269_4) 薩森抄本13, 5。

[[270]](#_270_4) 薩森抄本8, 8. 2。8號錄音帶的謄寫稿分布在連續折起來的幾頁紙上，如今與相關頁碼對應的頁面已被裁成幾部分。這里編號的意思是：8號錄音帶，第8頁，第2片。

[[271]](#_271_5) 薩森抄本9, 8。

[[272]](#_272_4) 薩森抄本10, 5。

[[273]](#_273_5) 薩森抄本10, 1。

[[274]](#_274_2) 薩森抄本13, 4。

[[275]](#_275_2) 薩森抄本64, 4。

[[276]](#_276_3) 薩森抄本50, 5。

[[277]](#_277_3) 薩森抄本33, 10。

[[278]](#_278_2) 薩森抄本72, 16。

[[279]](#_279_2) 薩森抄本68, 5。

[[280]](#_280_3) 薩森抄本26, 7。

[[281]](#_281_3) 薩森抄本73, 1。

[[282]](#_282_2) 薩森抄本21, 8。

[[283]](#_283_2) 薩森抄本19, 5。

[[284]](#_284_2) 薩森抄本61, 4。

[[285]](#_285_2) 薩森抄本52, 13。

[[286]](#_286_2) 薩森抄本42, 5。討論集中在所謂的安樂死行動。薩森對此不感興趣，因而沒有讓人把它打字出來。大部分引用參見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07B , 39:15。

[[287]](#_287_3) 薩森抄本43, 8。

[[288]](#_288_2) 薩森抄本39, 4。

[[289]](#_289_2) 薩森抄本56, 7。

[[290]](#_290_2) 薩森抄本56, 9。

[[291]](#_291_2) 薩森第23號錄音帶（未收錄于抄本的段落，見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9D,51:55ff.）。

[[292]](#_292_2) 薩森抄本15, 3。

[[293]](#_293_2) 薩森抄本15, 3。

[[294]](#_294_2) 薩森抄本60, 2。

[[295]](#_295_2) 薩森抄本43, 5。

[[296]](#_296_2) 薩森抄本46, 5。

[[297]](#_297_3) 薩森抄本16, 10。

[[298]](#_298_2) 薩森抄本18, 3。

[[299]](#_299_2) 薩森抄本17, 9。

[[300]](#_300_2) 薩森抄本20, 7。

[[301]](#_301_2) 薩森抄本44, 4。

[[302]](#_302_2) 薩森抄本51, 11。

[[303]](#_303_2) 薩森抄本58, 5。

[[304]](#_304_2) 薩森抄本68, 6。

[[305]](#_305_2) S. Kulcsár, S. Kulcsár u. L. Szondi, “Adolf Eichmann and the Third Reich” ..., A. 0., 28.

[[306]](#_306_3)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Iem ...‚ A.o., 78 ff.

[[307]](#_307_2) 在一些現存的錄音帶上可以找到中途離席的片段。例如在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06A, 47:55可清楚聽見一個不知名者的聲音：“對不起，但我必須走了……”

[[308]](#_308_2) 參見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09C, 1:51:55。薩森結束了會議，人們開始彼此交談，有一個聲音與薩森討論了另一份文本的提交截止日期。

[[309]](#_309_3) 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10C, 39:46.

[[310]](#_310_2) 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10B, 1:11:00ff.

[[311]](#_311_3) 薩森抄本1, 1。

[[312]](#_312_2) 薩森抄本1, 2，艾希曼儼然是“狂熱的猶太復國主義者”。

[[313]](#_313_2) 薩森抄本1, 2，據稱艾希曼親自在波蘭組織了大規模槍殺行動。薩森抄本1, 3中艾希曼說：“我會快樂地跳進坑里……”

[[314]](#_314_3) 第一版出版于1952年，作為《歐洲各國的猶太人例外法規》（Das Ausnahmerecht für die Juden in den europäischen Ländern）系列的一部分，阿根廷那些人使用的是經濟實惠的單行本（Düsseldorf 1954）。

[[315]](#_315_2) 討論時的概況可簡述如下：魏斯貝格，第6, 8-17, 19-22, 24-26號錄音帶；波利亞科夫／伍爾夫，第28, 34, 37-39, 42-44, 49-52, 54-57, 61-67號錄音帶；布勞，第39-40, 44-47號錄音帶；哈根／霍特爾，第10-11, 51, (56), 64號錄音帶；賴特林格，第1, 18-19, 22-23,25-27, 33, 49, 52-54‚ 58-61‚ 68, 69, 72‚ 73和一卷未編號錄音帶。

[[316]](#_316_2) 例如Hermann Graml, Der 9. November 1938. “Reichskristallnacht”. Bonn 1955: Gerhardt Boldt, Die letzten Tage der Reichskanzlei. Hamburg 1947 u. ö., Charles Callan Tansill, Die Hintertür zum Kriege. Düsseldorf 1956.

[[317]](#_317_1) 錄音帶37, 1ff.我們知道薩森讀了一篇新發表的文章，因為從接下來的錄音內容可以看出錄音時間是在哪一個星期。

[[318]](#_318_1) 那張照片發布于審判開始之前，而且曾多次對外公開，所以并非如某些說法所稱，它呈現的是艾希曼撰寫回憶錄《偶像》時的情景。艾希曼在律師的要求下拿到了那些書，因為律師希望他針對它們發表意見。除了已經提到的書之外，還有幾本在薩森訪談會結束之后出版的新書，包括Rudolf Höß, Kommandant von Auschwitz, 1958; Albert Wucher,Eichmanns gab es viele, 1961; Joel Brand, Fakten gegen Fabeln, 1961; Poliakov/Wulf, Das Dritte Reich und seine Denker, 1959; H. G. Adler, Theresienstadt 1941-45, 1960。在此特別感謝卡洛·許特先生提供漢堡當代史研究中心的藏書，以便重建書籍清單。

[[319]](#_319_1) 阿夫納·萊斯接受羅爾夫·德弗蘭克的訪問。Rolf Defrank für Erscheinungsform Mensch, Achiv für Zeitgeschichte, ETH-Zürich, NL Avner W. Less 7.1.IX.

[[320]](#_320_1) 薩森抄本50, 6。

[[321]](#_321_1) 薩森抄本49, 16。

[[322]](#_322_1) 薩森抄本4, 6；39, 8。

[[323]](#_323_1) 薩森抄本49, 14。

[[324]](#_324_1) 薩森抄本18, 1；33, 9；40, 2；52, 1；52, 5；52, 6；54, 4。

[[325]](#_325_1) 薩森抄本22, 7。

[[326]](#_326_1) 薩森抄本24, 1。

[[327]](#_327_1) 薩森抄本31, 10；61, 3。

[[328]](#_328_1) 薩森抄本17, 5。

[[329]](#_329_1) 薩森抄本21, 3。

[[330]](#_330_1) 薩森抄本62, 1；72, 8。

[[331]](#_331_1) 薩森抄本2, 4。

[[332]](#_332_1) 薩森抄本73, 13。

[[333]](#_333_1) 薩森抄本68, 15。

[[334]](#_334_1) 薩森抄本6, 1。

[[335]](#_335_1) 德國研究協會（DFG）進而推出了一整個期刊系列，意圖建立“德國數學”（Leipzig,1936-44）。

[[336]](#_336_1) 薩森抄本20, 4。

[[337]](#_337_1) 薩森抄本11, 6。

[[338]](#_338_1) 薩森抄本11, 4。

[[339]](#_339_1) 薩森抄本25, 8。

[[340]](#_340_1) 薩森抄本8, 2。

[[341]](#_341_1) 薩森抄本10, 14。

[[342]](#_342_1) 薩森抄本10, 17。

[[343]](#_343_1) 24號錄音帶和25號錄音帶的開頭部分包含了艾希曼的這段讀書筆記。他的筆記也保存了下來，見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BArch Koblenz, Nachlass Eichmann N 1497-87。艾希曼的發言幾乎是逐字逐句讀的他的筆記。

[[344]](#_344_1) 薩森抄本8, 2。

[[345]](#_345_1) 薩森抄本12, 1。

[[346]](#_346_1) 薩森抄本14, 7。

[[347]](#_347_1) 艾希曼在抄本上手寫的一段冗長的文字，52, 16。

[[348]](#_348_1) Götzen, Blatt 19（艾希曼編號第1頁）和其他許多地方。

[[349]](#_349_1) 薩森抄本3, 6。

[[350]](#_350_1) 薩森抄本26, 4。

[[351]](#_351_1) 薩森抄本31, 9。

[[352]](#_352_1) 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10C, 55:40。

[[353]](#_353_1) 薩森抄本54, 5。

[[354]](#_354_1) 參見娜塔莎·德·溫特和雷蒙德·萊伊2009年對佩德羅·波比耶辛的采訪。

[[355]](#_355_1) 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09D, 41:30。

[[356]](#_356_1) 薩森抄本47, 12。

[[357]](#_357_1) 薩森抄本47, 12。

[[358]](#_358_1) 薩森抄本36, 2。這句話很顯然出自威廉·薩森，來自討論中一段很長的口述記錄。不過由于這篇文字之前被認為是艾希曼的聲明，在此引用的句子也一直被認為出自艾希曼。那是完全不正確的事情。固然可以假定薩森是從艾希曼那里借用了這個句子，但沒有證據能夠證明這一點。更何況薩森自己長于表達，用不著借用艾希曼的話。

[[359]](#_359_1) 薩森抄本36, 5。

[[360]](#_360_1) 薩森抄本52，艾希曼的手寫補充說明。

[[361]](#_361_1) 薩森抄本54, 9。

[[362]](#_362_1) 艾希曼與其下屬特奧多爾·丹內克爾的電話記錄，起訴文件T/439（等同于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記錄IMT RF-1233）。丹內克爾1942年7月20日與艾希曼和諾瓦克通過電話之后，在7月21日寫下的注記。Klarsfeld, Vichy-Auschwitz ..., A. o., 416 (Neuauflage Darmstadt 2007, 441). Faks. Kempner, Eichmann und Komplizen ..., A. o., 212.

[[363]](#_363_1) 薩森抄本3, 6。

[[364]](#_364_1) 未被謄寫的錄音帶部分之一，艾希曼可信地證明了他對其他麻醉劑一無所知，例如他甚至不知道如何攝入嗎啡。薩森訪談，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10B, 1:14ff.

[[365]](#_365_1) 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10C, 1:00:00ff.

[[366]](#_366_1) Ernst Klee, Persilscheine ..., A. o.

[[367]](#_367_1) 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10C, 1:00:00ff.

[[368]](#_368_1) 薩森抄本44, 6。

[[369]](#_369_1) 從37號錄音帶開始，從兩個跡象可以看出錄音的日期是在8月下旬：在37號錄音帶上面，薩森翻譯了1957年8月26日《時代》雜志新刊出的一篇文章（按照美國雜志慣用的做法，實際發行時間為1957年8月20日）；在39號錄音帶上面，艾希曼引述了他前一個禮拜讀到的有關紀念巴林百年冥誕的報道——那可以確定是《阿根廷日報》1957年8月15日的一篇文章。

[[370]](#_370_1) 關于其生平，主要參見BDC-Akten Dieter Wisliceny , BArch Berlin。此外亦參見CIC Arrest Report, August 1, 1946, 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

[[371]](#_371_1) 艾希曼總是強調，維斯利策尼和他一起待在阿爾陶塞，維斯利策尼則對此極力否認。但有證據表明，維斯利策尼1945年5月12日在阿爾陶塞湖畔遭到逮捕。

[[372]](#_372_1) 維斯利策尼關于艾希曼的主要聲明和注記包括：1945年1-2月維斯利策尼與卡斯特納進行的談話，當時維斯利策尼已試圖樹立一種艾希曼的形象，攬下最多責任，借此減輕自己的罪責（Kastzners im Kastzner-Bericht ..., A. 0., 273 ff.）；1945年8月25日和27日被美國當局逮捕（5月3日）之后的詳細供詞（Arrest Report, and Reports from NA,RG 263, File Name Adolf Eichmann）；1945年11月9日在紐倫堡的宣誓口供（起訴文件T/57）；1946年1月3日在紐倫堡的證人陳述（起訴文件T/58）；1946年5月6日在布拉迪斯拉發發表的聲明（Polizeidokument B06-899）；1946年7月26日關于菲亞拉事件的手寫筆記（起訴文件T/1107）；1946年7月26日說明艾希曼與大穆夫提之間關系的手寫筆記（起訴文件T/89）；1946年10月27日，關于前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阿道夫·艾希曼的22頁手寫報告（布拉迪斯拉發，又名“133號牢房文件”，起訴文件T/84）；1946年11月14日與摩西·珀爾曼關于艾希曼的談話（CDJC LXXXVIlI-47,gedruckt in Pearlman, Die Festnahme, 137f.）；1946年11月18日有關“最終解決方案”的報告（布拉迪斯拉發，又名“106號牢房文件”，起訴文件T/85——僅僅部分收錄于Poliakov/Wulf,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ie Juden. Berlin 1955‚ 87-98）。

[[373]](#_373_1) 維斯利策尼，133號牢房文件，起訴文件T/84，第17頁。

[[374]](#_374_1) 維斯利策尼被處決于1948年2月27日。

[[375]](#_375_1) 20世紀30年代初期，艾希曼曾多次親眼目睹蓋世太保的審訊。雖然作為保安局人員，他無法親自執行審訊，卻能夠把人帶去接受審訊。在一些例子中，他自己的審訊方法可被還原出來——那只能被形容為陰險的精神折磨。例如，在奧斯維辛，他試圖在審訊中用雅各布·埃德爾施泰因妻子的信使他崩潰。他從臨近集中營那個不疑有他的女士那里獲得了這封信。她寫信時相信丈夫還擁有（相對的）自由，而艾希曼只是好意帶信給他。艾希曼會在開始動用肢體暴力時離開房間，但之后還會回來，好利用暴力的后果。Adler, Theresienstadt ..., A. 0., 730 f, 810.

[[376]](#_376_1) 薩森抄本44, 5。

[[377]](#_377_1) 薩森抄本42, 3-44, 6。

[[378]](#_378_1) 薩森抄本44, 5。

[[379]](#_379_1) 薩森抄本44, 6。

[[380]](#_380_1) 薩森抄本44, 6。

[[381]](#_381_1) 薩森抄本44, 7。

[[382]](#_382_1) 薩森抄本44, 7。

[[383]](#_383_1) 薩森抄本44, 8。

[[384]](#_384_1) 我們有兩卷這個轉折點之前的錄音帶，所以聽得出音調上的變化。只可惜這次關鍵會議的錄音已不復存在。

[[385]](#_385_1) 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08A, 42:13ff.

[[386]](#_386_1) 薩森抄本46, 8。

[[387]](#_387_1) 薩森抄本47, 7。

[[388]](#_388_1) 本節是我一篇未發表文稿的摘要總結。原標題為《另一名在阿根廷的納粹分子——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與威廉·薩森的談話》（‘Noch ein Nazi in Argentinien -Ludolf von Alvensleben im Gespräch mit Willem Sassen’），雷蒙德·萊伊和NDR以之為基礎拍攝了紀錄片《艾希曼的末日》（NDR, 2009）。文稿中包含了完整的采訪內容及評論。

[[389]](#_389_1) 薩森抄本54, 5。

[[390]](#_390_1) 56號錄音帶并非抄本中的異物，它從一開始就是討論項目的組成部分，以相同的方式編號和打字，而且一直在后續討論中被提及。因此薩森并不是不小心歸錯了檔。

[[391]](#_391_1) 以下信息主要基于阿爾文斯萊本的黨衛隊檔案（BDC BArch Berlin）。同樣不可或缺的還有Ruth Bettina Birn, Die höheren SS- und Polizeiführer: Himmlers Vertreter im Reich und in den besetzten Gebieten. Düsseldorf 1986, insb. 330, aber auch 311, 382 f (Fn. 2);Christian Jansen, Arno Weckenbecker, Der “Volksdeutsche Selbstschutz” in Polen 1939/40.München 1992 (=Schriftenreihe de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Band 64).以及杰出的影片Stanislaw Mucha, Mit “Bubi” heim ins Reich. Die Spuren eines SS-Generals.Abschlussfilm Potsdam-Babelsberg. Uraufführung: Berlinale 2000, Erstausstrahlung ZDF,20.11.2000.

[[392]](#_392_1) Heinz Schneppen, Odessa und das Vierte Reich. Mythen der Zeitgeschichte. Berlin 2007,125.施內彭煞費苦心地破除敖德薩神話，并追溯它的起源。令人遺憾的是，他對個別國家社會主義者的研究依然沒有竭盡所能，以致他的描述有時轉向了相反的神話。即使在施內彭所提到的材料來源中，里面的東西也比他實際運用的多得多。他所謂“設法重建那些逃亡者的生活和性格時，很快就會面臨瓶頸”的講法，至少就阿爾文斯萊本、艾希曼、門格勒、海利希、拉亞科維奇和克林根富斯等人而言是站不住腳的。（順便說一下，魯道夫·米爾德納也被施內彭列入了在阿根廷納粹的名單，因為他沒有注意到維森塔爾其實重復了艾希曼在以色列的說辭。）

[[393]](#_393_1) 見1944年11月的一般黨衛隊資歷名冊，柏林，1944年。

[[394]](#_394_1) 黨衛隊資歷名冊的編號方式乍看之下令人困惑，因為在數字后面還加上了字母。繼43名黨衛隊上級集團領袖和上將之后，阿爾文斯萊本在黨衛隊集團領袖和中將當中位于41f，這使他成為黨衛隊的第90號人物。DAL, Stand vom 1. Juli 1944, Reprint:Osnabrück 1987, 14.

[[395]](#_395_1) 黨衛隊阿爾文斯萊本檔案，1938年6月15日的員工考核報告。

[[396]](#_396_1) 無論在錄音帶還是抄本上都有許多這樣的例子。艾希曼毫無顧忌地對其他與會者大吼大叫、不假辭色，或者找其他方式奪取話語權。與阿爾文斯萊本的談話有許多誘使他插嘴和反駁的地方，而艾希曼不傾向于忍氣吞聲。

[[397]](#_397_1) 在58號錄音帶上，阿爾文斯萊本“基于自己的經歷”，談到了希姆萊對1945年轟炸德累斯頓的反應。在德累斯頓轟炸之后不久，阿爾文斯萊本履行他作為黨衛隊高級官員和警察領導人的職責向希姆萊匯報。然后在拜訪戈培爾時描述了希姆萊的行為。納粹宣傳部部長在1945年3月6日的日記中記錄了阿爾文斯萊本的來訪。除了艾希曼以外，薩森訪談會的其他與會者都沒有近距離接觸過希姆萊或戈培爾。

[[398]](#_398_1) 阿爾文斯萊本為了進入薩森訪談會或者加以“滲透”而假裝自己仍然堅信國家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很低。一則薩森訪談會并非秘密，再則沒有任何已知的“入場限制”。任何想要聲稱阿爾文斯萊本在1945年以后改變了看法的人，都面臨著沉重的舉證負擔。

[[399]](#_399_1) Peter Longerich, Heinrich Himmler ..., A.o., 9: “Eine Himmler-Legende wollte in den Nachkriegsjahren nicht aufkommen.”

[[400]](#_400_1) 薩森抄本56, 7。

[[401]](#_401_1) Steinacher, Gerald: Nazis auf der Flucht ..., A. o.

[[402]](#_402_1) 那封來信和回函都保存在博岑的國家檔案館。感謝格拉爾德·施泰納赫快速提供協助。

[[403]](#_403_1) 比對的范本是黨衛隊檔案中阿爾文斯萊本寫給希姆萊的信件。筆跡在許多方面帶有個人特征，很少有人能夠成功地改變自己的書寫方式。阿爾文斯萊本雖然試圖以一種比較圓潤的“女性化”方式來寫字，卻仍然與黨衛隊檔案的范本若合符節。具備20年筆跡鑒定經驗的人，可以根據書寫角度、字母上下長度比例、特定的大寫字母、標點符號、行間距等等細節，判定二者出自同一人筆下。但在這個例子中，我根本不需要運用自己的經驗——因為一眼就能看出。任何想要自己試試的人，只需把那兩封信件套疊比對一下即可。

[[404]](#_404_1) 阿爾文斯萊本和他的妻子梅利塔·瓜伊塔（Melitta Guaita）生了四個孩子：出生于1925年和1934年的兩個女兒，以及出生于1942年和1944年的兩個兒子。他們的長女當時已經成年（而且很可能已婚），所以不再作為兒童登記。細節參見柏林文獻中心的阿爾文斯萊本檔案，BDC SSO-Akte Alvensleben。

[[405]](#_405_1) 事實上，甚至有兩份特奧多爾·克雷姆哈特的申請書，使用了兩張不同的阿爾文斯萊本照片。可能是因為在填表時發生了錯誤。再一次非常感謝烏基·戈尼和格拉爾德·施泰納赫針對這些文件提供協助。

[[406]](#_406_1) 烏基·戈尼告訴我，他只知道愛德華多·德默特爾在兩份護照申請上面簽了字。

[[407]](#_407_1) Juan Maler, Frieden, Krieg und “Frieden”. Bariloche 1987, 345.

[[408]](#_408) Stanislaw Mucha: Mit “Bubi” heim ins Reich. Die Spuren eines SS-Generals.結尾處有一名阿爾文斯萊本的家庭成員做了這樣的推測，穆哈沒有足夠的證據來加以反駁。

[[409]](#_409) 薩森抄本49, 15。

[[410]](#_410) 1957, Heft 7, 495-6，署名為“Dr. Ernst Rauhart, Sao Paulo, Brasilien”。由于《路徑》的讀者來信往往出自編輯部之手，因此名字的真實性相當可疑。不管怎樣，決定在那一天刊出該文的人就是弗里奇。

[[411]](#_411) 發表于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記錄IMT vol. 31, pp. 85-87 in Poliakov and Wulf,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ie Juden, pp. 99-100.

[[412]](#_412) 薩森抄本4, 10。

[[413]](#_413) 薩森抄本50, 1。

[[414]](#_414) Aussage Wisliceny, IMT, 3.1.1946, 4, 412. Zu weiteren Zahlen ebd. 411.

[[415]](#_415) 格雷爾在艾希曼審判時的證詞，貝希特斯加登，1961年5月23日。

[[416]](#_416) 伊扎克·拉維法官曾用艾希曼自己的手寫筆跡，當面質疑了他說的那句話。（起訴文件T/43。）

[[417]](#_417) 薩森抄本24, 1。

[[418]](#_418) 薩森抄本4, 2。

[[419]](#_419) 薩森抄本50, 10f。

[[420]](#_420) 薩森抄本49, 9。

[[421]](#_421) 薩森抄本49, 8。

[[422]](#_422) 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02A, 43:30。

[[423]](#_423) 如果還需要進一步證明海曼和赫斯特的文章是自己偽造的，那么光是以下這個事實就足夠了。薩森訪談會閱讀了有關這個主題的每一本出版物，甚至連《時代》雜志上的文章也不例外。只有《路徑》的那些文章從來沒有被討論過。每個人都知道那是不必要的事情，因為它們與現實完全無關。

[[424]](#_424) 薩森訪談53, 11。

[[425]](#_425) 薩森訪談73, 3。

[[426]](#_426) 薩森訪談61, 3。

[[427]](#_427) 薩森的口述被誤植到談話部分，位于哈加格版本36號錄音帶抄本326-335頁的開頭部分。口述的其余部分見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08A, 32:37ff。

[[428]](#_428) 感謝馬丁·海丁格爾讓我過目他的訪問記錄。

[[429]](#_429) 薩森訪談67號錄音帶。

[[430]](#_430) 聯邦檔案館保存的十卷錄音帶當中，還包括這篇演講不同長度和不同部分的副本。因此令人遺憾的是，今日在文獻和媒體上找到的抄本往往都不夠完整。以下是首次依據未經剪接的完整錄音帶進行的轉錄。聯邦檔案館BArch 10B 52:30-1:02:58。

[[431]](#_431) 其他抄本的聽寫錯誤已直接更正，不再另做說明。

[[432]](#_432_1) Harry Mulisch, Strafsache 40/61. Eine Reportage über den Eichmann-Prozeß, Schauberg,Köln 1963, 118.

[[433]](#_433_1) 薩森抄本67, 11-12。這兩個頁面打字員不知該如何歸類，薩森則把它們標示為接在“結束語”后面的部分。然而他在出售抄本之前拿掉了這個部分以及隨后出現的所有頁面，使薩森抄本隨著結束語戛然而止。但實際上并非如此，這兩頁保存在薩森自己的第67號錄音帶相關文件當中，目前收藏在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的艾希曼遺物，BArch Koblenz, Nachlass Eichmann, N1497-65。

[[434]](#_434_1) 從艾希曼的上下文可以斷定當時是晚上，薩森抄本68, 15。

[[435]](#_435_1) 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01A, 7:22ff.

[[436]](#_436_1) 薩森抄本69, 2。

[[437]](#_437_1) 薩森抄本72, 1。

[[438]](#_438_1) 薩森抄本72, 1。

[[439]](#_439_1) 69號錄音帶的抄本很不完整，70號和71號錄音帶則完全沒有抄本，無法判斷是否曾經聽寫謄錄過。

# 第五章 虛假的安全感

艾希曼真是傻得可以。每個人都知道他在哪里。

——英格·施奈德，薩森一家的友人

1957年4月初，法蘭克福首席檢察官阿諾德·布赫塔爾（Arnold Buchthal）舉行了一場新聞發布會。此前他已經在4月1日下令逮捕赫爾曼·克魯邁——艾希曼長期的工作伙伴和1944年在匈牙利的代表。布赫塔爾奉命主導對謀殺40多萬名匈牙利猶太人的一切調查工作。他所發表的任何言論，幾天之后就會出現在聯邦德國的各種主要報紙上，甚至連在《阿根廷日報》上面都能讀到。當然，官方仍在通緝克魯邁昔日的上司阿道夫·艾希曼，依據的是1956年11月24日發布的逮捕令：“據悉他在南美洲某個不明地點。”[[1]](#_1_11)我們知道艾希曼曾經看到過這篇文章，因為他在薩森訪談會上提到了它。但許多跡象顯示，還有一個人聽到過這篇文章。他是一位名叫洛塔爾·赫爾曼的盲人，曾被國家社會主義害得家破人亡，孑然一身逃脫了對猶太人的迫害。

人們時常津津有味地談論那名昔日達豪集中營囚犯的女兒，如何在學校認識了艾希曼大兒子的故事。一想到艾希曼沒有被情報機構識破行蹤，卻因為他兒子的愛情生活而暴露身份，這種幸災樂禍的滿足感簡直會讓人把所有疑問都拋之腦后。但不管這種涉及情色和秘聞的故事再怎么引人入勝，歷史學家們還是應該善盡自己的職責，不可不加批判地屈服于八卦故事的魅力，而且更要找出捍格不入之處和查明事情的原委。正如常見的情形那樣，這個故事遠比看起來要復雜多了。[[2]](#_2_12)有關弗里茨·鮑爾、洛塔爾·赫爾曼、他的女兒以及克勞斯·艾希曼的信息，要到許多年之后才被公之于世。《復仇者》（The Avengers）一書首開其端，作者米迦勒·巴爾-祖海爾是大衛·本-古里安的親信，他是第一個將弗里茨·鮑爾與追捕艾希曼行動聯系起來的人，盡管他起初只是暗示而已。只有在弗里茨·鮑爾過世后出版的該書希伯來文版本中，以及在各種采訪中，巴爾-祖海爾才公開說出了鮑爾與以色列當局的秘密合作。[[3]](#_3_11)雖然他那本著作是平裝的通俗出版物，但巴爾-祖海爾作為歷史學者享有良好的聲譽。他撰寫的本-古里安和以色列國防部部長摩西·達揚的傳記廣受稱贊。此外并有證據表明，他能夠直接接觸到摩薩德的負責人伊塞爾·哈雷爾。巴爾-祖海爾毫無疑問人脈頗廣，因此我們必須認真看待他聲稱曾經在1967年3月與弗里茨·鮑爾親自交談的說法。

《復仇者》一書的成功讓伊塞爾·哈雷爾深受鼓舞，于是這位摩薩德的負責人也親自出現在各種采訪和報紙文章中，最后更寫了一本書把自己的故事公之于世。[[4]](#_4_12)當時，哈雷爾以為赫爾曼早就已經死了，于是打算在審判十周年之際，為他的情報機構——而且顯然也為他自己——樹立一座紀念豐碑，畢竟綁架艾希曼一事無疑是哈雷爾任內最大的成就。他隨后出版的那本書，在全球各地的行銷重點都放在“納粹之子與幸存猶太人之女的愛情故事”上面，為哈雷爾帶來了巨大的發行量，畢竟情色和納粹絕對不愁沒有銷路。

洛塔爾·赫爾曼在阿根廷聽說了哈雷爾的故事版本之后，怒不可遏地表示，哈雷爾的講法絕大部分“完全錯誤”，有人在“蓄意地公然扭曲真相”。“我從來沒有想過，信仰猶太教義的人竟然可以惡劣和狡詐到這種地步。”哈雷爾完全“濫用了我和我女兒的名字”進行廣告宣傳。[[5]](#_5_12)赫爾曼因而拒絕了以色列的邀請，不肯為自己在綁架艾希曼過程中做出的貢獻接受公眾的贊譽。然而，鑒于這個故事的背景以及赫爾曼多年來的生活境況，我們可以理解他為什么最后還是接受了以色列政府給他的一萬美元獎勵——盡管如此一來，赫爾曼又讓那個八卦故事符合了另一種反猶太人的刻板印象。從極右派學者漢斯-迪特里希·桑德爾（Hans-Dietrich Sander）與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之間的信函往來，便不難看出哈雷爾的故事版本是多么迎合公眾的口味。桑德爾寫道：“最近我在《南德意志報》（Süddeutsche Zeitung）讀到一篇有關艾希曼被捕的故事。照其說法，艾希曼被發現并非因為以色列情報部門神通廣大，而是由于該情報部門開出了懸賞金。于是有一個又老又瞎的阿根廷猶太人宣稱知道艾希曼的下落，因為他的女兒跟艾希曼的兒子是朋友。后來大家都知道艾希曼被弄到國外去了，懸賞金卻始終沒有支付。那個老猶太人于是興訟追討，結果事情鬧了許多年。”桑德爾接著說，并且很遺憾地補充寫道：“可惜那個女兒再也沒有在文章當中出現。”[[6]](#_6_12)他的偷窺心理顯然還需要更多八卦細節來滿足。

值得注意的是，伊塞爾·哈雷爾版本的西爾維婭·赫爾曼（Silvia Hermann）的故事并沒有獨立的消息來源，因為它發生在摩薩德正式采取行動之前。所有在日后說出了1960年以前各種相關細節的特工人員，都是從他們的頂頭上司哈雷爾那里聽來的消息。在綁架小組成立之前，他們根本不知道任何有關搜捕艾希曼的事情。曾在1958年年初前往拜訪赫爾曼的埃弗拉伊姆·霍夫施泰特（Ephraim Hofstaedter），后來在伊斯坦布爾的一場恐怖襲擊事件中遇難。第一個看到艾希曼的住址，甚至還實地展開了調查行動的摩薩德特工茲維·阿哈羅尼，則從不吝惜于批評哈雷爾的情報政策，而且與赫爾曼一樣，指責其罔顧事實真相嘩眾取寵的作風。[[7]](#_7_12)湯姆·塞格夫在其關于西蒙·維森塔爾的傳記中也顯示出，隨著年齡漸老，哈雷爾如何醋意十足地試圖提高自己的聲譽，并試圖抹除維森塔爾在搜尋艾希曼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盡管維森塔爾曾獲得過以色列政府頒發的獎勵，得到了官方的認可。光明正大顯然不屬于哈雷爾公共關系工作的一部分。此外還有一個事實不容忽視：根據之前描述的版本，克勞斯·艾希曼的行為對他父親的行蹤泄露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并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克勞斯曾為導致父親去世的事件感到自責，因為恰恰相反，他所看到的故事與此截然不同。[[8]](#_8_11)因此我們在把哈雷爾引用為唯一資料來源的時候至少應該多加小心。不僅因為情報機構的負責人囿于職業需求，對事情真相有著策略上的考量，更主要的是因為還有其他渠道接觸到阿根廷的那些事件。

### 舉報人洛塔爾·赫爾曼

……這樣我恐怕就放棄了留名青史的機會……

——洛塔爾·赫爾曼告訴弗里茨·鮑爾，1960年6月25日

當克勞斯·艾希曼遇見西爾維婭·赫爾曼的時候，二人都還在上學，分別最多只有19歲和14歲。[[9]](#_9_11)因為赫爾曼一家最晚在1956年1月即已離開布宜諾斯艾利斯，搬到了500公里外的蘇亞雷斯上校鎮（Coronel Suárez）。[[10]](#_10_12)洛塔爾·赫爾曼因為猶太人的身份而被迫離開德國后，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移民到了阿根廷。他曾經向哈雷爾強調自己是“全猶太人”（Volljude），哈雷爾卻按照納粹用語稱之為“半猶太人”（Halbjude）。[[11]](#_11_10)赫爾曼在1901年出生于德國的奎恩巴赫（Quirnbach），是一名律師。他說自己曾于1935年9月14日至1936年5月7日之間，被“保護性拘禁”在達豪集中營[[12]](#_12_10)，原因或許是他對社會主義感興趣。接著他作為“參與政治的猶太人”（politisierender Jude）而被驅逐出德國來到荷蘭。那里，他終于能夠在1938年與他的“雅利安”妻子成親，并移民前往阿根廷。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未能從納粹黨人的手中幸存下來。1947年的時候，赫爾曼在阿根廷完全失明，但他繼續擔任法律顧問，主要專精于申請養老撫恤金。這也導致他遷居蘇亞雷斯上校鎮，因為當地有一個大型德國猶太人社區，需要赫爾曼提供服務。但沒有任何資料顯示赫爾曼曾經富有過，或者曾經手頭寬裕過。

西爾維婭·赫爾曼1941年出生于布宜諾斯艾利斯，是一個很有天賦的孩子。他們家的一位友人和洛塔爾·赫爾曼的女秘書都記得，赫爾曼夫婦決定把女兒送回布宜諾斯艾利斯完成中學學業，以便她可以前往北美繼續上大學，他們有遠房親戚住在那里。從赫爾曼的信中更可清楚看出，西爾維婭最晚在1959年秋天，也就是當她年滿18歲之后，就已經離開阿根廷去美國生活了。這使得她的離開不可能跟艾希曼的綁架案直接扯上關系。但即便如此，我們至少知道了西爾維婭·赫爾曼和克勞斯·艾希曼可能是在什么時候相遇的。

那兩位新移民子女的邂逅相逢，并非不可思議的巧合，反而是許多德國移民前往阿根廷過生活之后所產生的結果——昔日的受害者與加害者名副其實地毗鄰而居，他們的子女進了同樣的學校。縱使二者之間橫亙著一道文化上的鴻溝——例如一邊是猶太人的德語報紙、劇院和電影院，另一邊則是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甚或國家社會主義者的類似機構——年輕人卻總是難得嚴守分際，不怎么在乎父母的畛域之見。洛塔爾·赫爾曼從未說過他的女兒是于何時何地結識艾希曼的兒子的，僅在1959年指出，西爾維婭可以證實其關于艾希曼的身份和居住地的一切陳述。不過有一位朋友記得，西爾維婭在學校遇見比她年長五歲的克勞斯，結果愛上了他，并保存著他的一張照片。但我們不知道那究竟是一張學校的合影、在聚會上胡亂拍攝的快照，還是其他類型的東西，因為它直到今天都沒有再出現。但是有許多人聲稱曾看見過那張照片，甚至表示它就掛在赫爾曼家的墻壁上。[[13]](#_13_10)

洛塔爾·赫爾曼一直對阿根廷境內的納粹人士興味盎然，期盼看到謀殺其家人的兇手被繩之以法。所以“艾希曼”這個名字立刻引起他的注意，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事情。可以確定的是，最遲在1957年秋天，也就是赫爾曼和家人一同生活在蘇亞雷斯上校鎮一年多之后，弗里茨·鮑爾即已掌握了有關艾希曼在阿根廷的消息。有一些證據甚至顯示，鮑爾在1957年6月以前就已經收到了赫爾曼的來信。

但目前還不清楚，赫爾曼是怎么想到要把關于艾希曼確切下落的消息寄給法蘭克福總檢察長弗里茨·鮑爾的。赫爾曼只提到了他們互通郵件的時間：“1957/1958年”。[[14]](#_14_10)他的第一封信至今不知去向，而且日期不詳[[15]](#_15_10)，但其收件人很可能就是名字曾出現在《阿根廷日報》上，說艾希曼正藏匿在南美洲的那位先生：阿諾德·布赫塔爾。布赫塔爾隨即把信交給了弗里茨·鮑爾，當時阿根廷還沒有任何關于艾希曼的報道提到鮑爾的名字。鮑爾和布赫塔爾不僅彼此熟識，更有一位共同的支持者，黑森聯邦州總理格奧爾格·奧古斯特·齊恩（Georg August Zinn）。齊恩總理積極致力于誠實面對過去，因而對這兩位猶太裔司法人員寄予厚望。最晚等到阿諾德·布赫塔爾由于一起政治事件，被迫把首席檢察官的職務讓給一位有納粹污點的先生之后，他肯定寧愿把調查卷宗交給弗里茨·鮑爾，而非把它留在辦公桌上。[[16]](#_16_10)我們清楚知道鮑爾是什么時候開始采取具體措施尋找艾希曼的，因為他曾在1957年6月9日向薇拉·艾希曼的母親發出詢問。得到的答復是：其女兒從1953年起就住在國外，因為她嫁給了一個姓名不詳的男子，已跟他一起前往美洲。[[17]](#_17_10)7月初，鮑爾經歷了一次重大挫折。德國聯邦刑事調查局通知黑森州刑事調查局，表示不會啟動國際刑警組織追捕艾希曼，因為其罪行具有“政治和種族性質”，而國際刑警組織的章程禁止其參與這類追緝行動。鮑爾于是“沒有辦法經由聯邦刑事調查局這個德國中央辦公室對艾希曼進行國際追捕”。[[18]](#_18_10)聯邦刑事調查局在搜捕納粹罪犯方面表現得毫無熱情，畢竟除了其他許多老同志之外，昔日的黨衛隊成員保羅·迪科普夫（Paul Dickopf）也在局內大展宏圖。迪科普夫日后甚至升任該局局長，并且獲選擔任國際刑警組織主席。艾希曼后來聲稱，國際刑警組織拒絕對他采取追緝行動一事，始終讓他感到放心，但他是如何得知此事的，目前尚不清楚。[[19]](#_19_10)

就在1957年夏天的這個時候，關于艾希曼藏在中東的舊日傳言再次死灰復燃。各種納粹在開羅的故事，連續一個多月占據德國報紙的版面[[20]](#_20_10)，就連《路徑》也對它們進行了討論和反駁（但并未提及艾希曼的名字），或許是因為待在開羅的約翰·馮·萊斯感覺到了此類文章的威脅。[[21]](#_21_10)這些線索于是又一次出現在情報部門的檔案中。[[22]](#_22_10)最晚從這個時候開始，弗里茨·鮑爾已經不得不意識到，繼續在德國境內傳播自己的信息無法取得任何效果，求助于聯邦德國當局甚至反而只會危及任何成功的可能。11月初，鮑爾與以色列代表進行了首次會晤。除向他們說明來自阿根廷的情報之外，鮑爾還強調他與以色列政府的合作并非擅自行事，而是與黑森聯邦州總理兼他的私人朋友格奧爾格·奧古斯特·齊恩先生商討之后做出的決定。[[23]](#_23_10)于是在1958年1月，摩薩德派遣了一個名叫伊曼紐爾·塔爾莫爾（Emanuel Talmor）的情報員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核對地址。只可惜查卡布科街上的那棟房子與刻板印象中神通廣大的流亡納粹很不相符。盡管收到了此次探訪結果的報告，弗里茨·鮑爾仍然堅持要進一步調查下去。于是1958年3月的時候，以色列高級警官埃弗拉伊姆·霍夫施泰特奉派至赫爾曼家中拜訪。盡管霍夫施泰特后來在審訊期間領導以色列警方的調查單位，但當時他接獲此項任務完全出于巧合。總之霍夫施泰特恰好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參加國際刑警組織在阿根廷的會議。[[24]](#_24_9)不過我還不清楚他在那里究竟遇見了哪些來自德國聯邦刑事調查局的同僚。我們只知道，聯邦刑事調查局的二號人物、喜歡自詡為該局“建筑師”的保羅·迪科普夫，在那期間正好也主管該局的“外事處”。不但經常作為機構代表出席國際會議，還在1955-1961年間被國際刑警組織大會正式遴選為此類會議的發言人。因此我們不能排除迪科普夫前往老同志們的避難之處探訪的可能性。假如有辦法找到代表團參訪報告的話，那絕對值得好好瞧上一眼。[[25]](#_25_9)

霍夫施泰特在洛塔爾·赫爾曼面前使用了假名，并出示了一封來自鮑爾的信件，將自己偽裝成法蘭克福總檢察長辦公室的職員。自稱認出艾希曼的那個人竟然是個瞎子。不難想象，發現這個事實會讓每個人多么大失所望。霍夫施泰特隨即禁止赫爾曼與弗里茨·鮑爾有任何進一步的接觸，并給了他一個美國地址，要求他此后都把郵件寄往該處。赫爾曼在許多年后抱怨說，他寫信去美國的時候，還附上了一張“意外”落入他手中的“克勞斯·艾希曼的照片”，卻從未得到回復。迄今為止，尚未發現任何赫爾曼寄往紐約的信件。但愿那些材料能夠公之于世，以便表彰赫爾曼的貢獻。[[26]](#_26_8)赫爾曼后來解釋說，“他歷經千辛萬苦，費了很大的勁”才分兩期從“卡爾·胡貝特”（Karl Hubert，霍夫施泰特的假名）那里獲得1.5萬比索。但由于赫爾曼再也沒有收到回信，他在1958年就把所有資料寄回法蘭克福，而且正如他后來所言，已經完全放棄了后續的調查，因為他覺得自己的工作變得毫無意義可言。[[27]](#_27_7)更何況赫爾曼夫婦此時已經把他們的女兒送去國外留學，赫爾曼于是再也沒有信得過的人協助他進行調查了。不過當時的人也回憶說，后來有人認為西爾維婭的離開是出于安全考慮。調查行動已使那個女兒陷入危險境地，再加上洛塔爾·赫爾曼基于可理解的原因覺得自己又受到了迫害，因此盡管出國留學給他們全家帶來了沉重的經濟壓力，他還是一直催促西爾維婭離開。但由于西爾維婭·赫爾曼明確表示不對當時的事情發表任何意見，所以我們只能推測她離開的真正原因。

收到赫爾曼提供信息的人的反應非常清楚：自從霍夫施泰特造訪之后，舉報人洛塔爾·赫爾曼就不再被認真看待。盡管他確實找到了阿道夫·艾希曼，可是一個遠在蘇亞雷斯上校鎮的盲人，竟然聲稱自己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追蹤到了“猶太頭號敵人”的下落，而他所給出的地址只是一套既無保安又不奢華的簡陋公寓，這似乎并不可信。此外，赫爾曼在進行調查時，還把艾希曼的房東弗朗西斯科·施米特誤認成了艾希曼本人，終于徹底毀掉了自己的信譽。納粹分子竟然租屋居住，而且是住在這樣的房子里面！此事完全超出了伊塞爾·哈雷爾及其工作人員的想象。弗里茨·鮑爾卻不愿放棄。赫爾曼的那些來信已經說服了他，而且他還發現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那位阿根廷的舉報人所言不虛。

### 回德國去？

純粹巧合的是，

聯邦憲法保衛局當時也在關心艾希曼的下落……

——依爾姆特魯德·沃亞克（Irmtrud Wojak）[[28]](#_28_7)

與納粹黨人腰纏萬貫的刻板印象不同，艾希曼在1957年年底面臨著經營上的問題。養兔場的生意以失敗告終，原因似乎是不同品種的兔子雜交時出了差錯。[[29]](#_29_7)畢竟針對猶太種族而發的癡心妄想才更是艾希曼的專長。但艾希曼這次同樣沒有一蹶不振。他再度獲得老朋友們的援助，于1958年年初在羅伯托·梅爾提希（Roberto Mertig）的公司找到一份差事。[[30]](#_30_7)梅爾提希是約瑟夫·門格勒父親的生意伙伴，經營一家煤氣爐工廠，而且門格勒本人據說也受雇于此。老門格勒是農用車輛制造者，終其一生都在支持自己的兒子，總是找得到門路為他生財。盡管艾希曼受雇于煤氣爐工廠一事，想必曾經在老同志們那里引發了許多與死亡相關的玩笑，不過根據他從以色列寄給家人和朋友的信件中對阿根廷最后兩年生活的回憶，當時已經出現了改變的跡象，似乎就連艾希曼自己也開始更加關注眼前和當下。不過我們仍有理由懷疑這種轉變并非出于自愿。

隨著杜勒出版項目的失敗，艾希曼和薩森的出書計劃也跟著告吹，此事對二人都產生了影響。阿根廷的德國人社區已經開始發生改變。許多“受牽連不深”的流亡者紛紛尋找重返桑梓之地的途徑，重新回到歐洲。聯邦德國和奧地利的追訴時效限制以及有關重新融入社會的各種規定，使不曾犯下重罪或戰爭罪行——或至少是沒有被揭露——的那些人，都能夠返回故里展開新生活。甚至連出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埃伯哈德·弗里奇也收攤關了出版社，在1958年3月初遷居到薩爾茨堡附近。[[31]](#_31_7)于是阿根廷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群體失去了一個重要據點，薩森則失去了工作崗位，更失去了愿意印出他的文字、讓他成為圖書作者的那個人，而出版文字曾經確保了他作為記者和作家在阿根廷德國人社區內的地位。弗里奇移民出境之前不久出版的最后一期《路徑》，以威廉·薩森的一篇文章作結，其中再次哀嘆了當代德國的命運。[[32]](#_32_7)雖然薩森和艾希曼都希望弗里奇在歐洲建立出版業務的計劃能夠實現，但艾希曼自己出書的夢想已經變得遙不可及了。不過他們還是保持聯系以備萬一。后來的事件更顯示，弗里奇一定曾與艾希曼在奧地利的家人取得過聯系，因為當艾希曼在1960年遭到綁架的消息被宣布之后，弗里奇立刻與艾希曼的弟弟們會面安排辯護事宜。[[33]](#_33_7)弗里奇遷居薩爾茨堡為艾希曼提供了很好的機會，可以讓他的父親獲得有關其新生活的詳細信息。

遷居回到德國的顯然并不只有埃伯哈德·弗里奇。薩森也在1958年和1959年更迭之際去了歐洲，部分原因就是為了從故舊那里收集宣誓聲明，借以確認他有資格取得德國國籍。盡管1956年10月薩森在康斯坦茨登記戶口時可能已自稱是德國公民，但此事仍未完全得到澄清。不過他的確有辦法在相當短的時間內不但證明了自己已在1943年成功申請入籍——那對自愿參加武裝黨衛隊的荷蘭人來說易如反掌——而且還能夠提供一些宣誓證詞確證此事，包括他昔日指揮官金特·達爾肯（Gunter d’Alquen）的證詞。以上各種文件連同薩森昔日的軍人補給證和戰地記者證，已足夠讓康斯坦茨市的司法與治安局在1959年1月26日簽發國籍證明。接著他又于2月4日遷出戶口，在慕尼黑有了新的住址。[[34]](#_34_7)讓薩森的妻子感到驚恐的是，雖然她無論如何都不愿取得德國國籍[[35]](#_35_7)，卻只能越來越頻繁地聽薩森說他打算在德國定居下來，在那里擔任記者。薩森以他特有的混合了欺騙和冒險的風格，在家人和其他人的面前吹噓道，他已經和好幾家德國報社簽訂了通訊員合同。事實上在1959年，他的確以威廉·S.馮·埃爾斯洛這個筆名，出現在好幾期《明星周刊》的報頭。時隔多年，薩森在喝完第一瓶威士忌酒之后裝模作樣地嘀咕著，他當初移居慕尼黑還有一個特殊的原因：他曾計劃在蓋倫將軍那邊從事特務工作。雖然隨后的事件表明，那個計劃只不過是空中樓閣，但薩森的夸夸其談在艾希曼被綁架之后給他自己帶來了很大的麻煩，導致他突然被懷疑是叛徒。[[36]](#_36_8)他對自己的德國之行有點熱過了頭。尤其他在1959年夏天的旅程想必更是讓聯邦憲法保衛局提高了警覺，因為薩森不但前往拜訪了他的老朋友魯德爾，而且據說還設法去了民主德國的一些城市——在那個年代，光是這樣的旅行計劃便足以讓人懷疑他是東方集團的間諜。[[37]](#_37_7)雖然薩森當時仍經常與艾希曼見面，但他顯然已有了更多令人興奮的想法。無怪乎艾希曼不打算獨自留在彭巴草原上了。

克勞斯·艾希曼回憶說，他的父親在20世紀50年代末經常談起回德國接受審判的可能性。“給聯邦總理的公開信”已經清楚表明，那不只是空口說白話而已，完全有別于“不想進入公眾聚光燈下”那種言不由衷的論調。[[38]](#_38_7)然而按照克勞斯的講法，其他黨衛隊領導人和國家社會主義者勸他打消這個念頭：“他們研究了在歐洲投案的可能性，并派了一個具有影響力的人前往歐洲。多次討論之后，他們把結果轉告給我的父親，表示時機尚未成熟，歐洲還是一個十分危險的是非之地。他應該再等五年，至少在阿根廷繼續待上五年。他們確信，那段時間，他在南美洲肯定不會出任何事。”[[39]](#_39_7)好幾個人都有可能是那位助益良多的歐洲專家，尤其是薩森，他從1958年年底開始便一再前往德國，能夠順便請他的朋友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現身說法。不過就法律事務而言，還有更專精于此者。例如《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AZ）的記者弗里茨·奧托·埃勒特（Fritz Otto Ehlert）不但與奧爾斯特·卡洛斯·福爾德納相識，而且還是西德外交部的消息來源。此外更不可忘記的是，西德駐阿根廷大使館也跟當地的納粹團體有著十分密切的往來，因而也可能提供有關當前法律狀況的資訊。我們現在更知道，維爾納·容克（Werner Junker）大使本人一直與薩森有聯系，對他相當欣賞，認為他是一位“異常能干的記者”，甚至還有些同情他的政治立場。[[40]](#_40_7)

然而埃伯哈德·弗里奇在歐洲的遭遇，實在讓艾希曼提不起勁來。弗里奇曾告訴志同道合的圈內人，作為德國父母的孩子，他其實更想前往聯邦德國，但他只有阿根廷的公民身份，而且被禁止入境德國。[[41]](#_41_7)事情的真相卻不那么具有英雄色彩：弗里奇由于散播極右派違憲刊物，正遭到德國警方的通緝追捕。呂訥堡地方法院第四刑事庭已對杜勒出版社在德國北部的銷售經理提起刑事起訴，并且查封他的倉庫，沒收了最后一期的《路徑》。弗里奇雖然擁有阿根廷國籍，并且獲得了布宜諾斯艾利斯西德大使館核發的簽證和入境許可，但是入境之后就將面臨對他的刑事訴訟。因而弗里奇沒有被拒絕入境，只是出現在了被通緝名單上。[[42]](#_42_7)弗里奇希望繼續在薩爾茨堡從事出版業的雄心壯志，也隨著他被禁止進行出版活動而完全破滅。結果他不得不找了份旅館門房的工作。雖然那是一家位于中央廣場的一流大飯店，但那可不是這位來自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先生為妻子和五個孩子設想的生活。

如果連弗里奇那樣沒有納粹犯罪背景的人都會面臨這種問題，艾希曼的前景只會更加黯淡。我們可以推測，艾希曼在林茨的家人因為那個臭名昭著的哥哥遠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緣故，還能過著相當不錯的生活，因此自然不會鼓勵他回來。除了艾希曼自己的家人有充分理由建議他留在原地之外，在阿根廷親眼見過艾希曼或者聽說過他的那些人，想必也對審判艾希曼感到膽戰心驚。他們不但知道艾希曼在想些什么，而且尤其重要的是，艾希曼清楚哪些人曾經仔細聽過他講話的內容。更何況他對納粹網絡、逃亡與救援組織，及其通訊渠道的了解，都可能造成令人不快的后果。因此沒人敢想象，假如艾希曼在德國說出那些事情，將會對他們自己的生活造成多大影響。總而言之，阿根廷的朋友們以一種近乎令人感動的方式，讓那位退休的一級突擊大隊長覺得愜意，確保他總是能夠獲得收入，甚至有能力前往馬德普拉塔那個豪華海濱勝地度假。[[43]](#_43_8)

不僅阿根廷的流亡者有理由擔心艾希曼出庭受審，對德國和奧地利的許多人來說，艾希曼的重新現身也將帶來嚴重的困擾。因此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朋友們為何反對或支持他重返歐洲，而是昔日的納粹官員當中，究竟有誰不對艾希曼在西德接受審判一事感到害怕。艾希曼在納粹政權內所處的位置，讓人難以估計他究竟知道哪些人的事情，尤其是他能夠重新認出哪些人來。人們常常錯誤地以為，“我們知道名字的人，一定也知道我們的名字”，這更只會加深他們的恐懼。如果我們看看艾希曼在1960年落網之后所引發的不安，便可明白艾希曼的名字在聯邦德國會讓人聯想到什么，以及人們為什么如此害怕。有太多曾經的納粹已經重新宏圖大展，因為他們早就設法相互保駕護航，讓自己的履歷看起來無傷大雅。因此很難想象聯邦刑事調查局內部的前黨衛隊隊員（保羅·迪科普夫只不過是其中的佼佼者罷了），以及外交部里面因“復職條款”而早就重新擔任外交官的那些人，如果知道了艾希曼的打算會真的樂意支持對他進行審判。聯邦情報局內部許多人員的態度也與此沒有兩樣。光是艾希曼知道的人名，便足以撼動那些老同志辛辛苦苦建立的門面。我們只需要看看2010年《外交部》（Das Amt）一書[\*](#_483)出版之后，在外交部人員及其并不總是有用的朋友們那里引起的風暴，便不難想象類似行動在50多年前所可能帶來的震撼。畢竟當時會受到波及的多半可不是退休官員的身后名譽，而是許多人重獲職務、高位和厚祿時新穿上的漂白外衣。

與此同時，艾希曼對聯邦德國開始追捕納粹罪犯的措施有著驚人的了解。他不但密切關注昔日同僚赫爾曼·克魯邁的被捕，以及對費迪南德·舍納爾等人的審判，此外更知道1958年10月在路德維希堡籌劃成立了國家社會主義犯罪調查中央辦公室，以便協調整個聯邦德國的調查工作。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甚至也聽說了有關慕尼黑當代歷史研究所的消息。1960年6月艾希曼剛開始在以色列接受審訊時便曾表示：“我讀到過，在西德的某個地方——但我已記不得是在哪里了——成立了一個中央檔案處，負責收集相關文獻資料。”[[44]](#_44_8)艾希曼草擬給阿登納的公開信具有“報告”性質，再加上他堂而皇之地使用真實姓名，還精心鋪陳了辯護路線，這些事實都表明艾希曼至少已經認真考慮過在聯邦德國投案的可能性。很有可能，艾希曼打算以王牌證人的身份，在一場對他有利的轟動審判中現身。可惜今天我們無法直截了當地宣稱，這種策略根本就是荒唐可笑。

除了朋友們的勸阻之外，艾希曼在家里提到，還有另一個原因導致他沒有回德國作證。克勞斯·艾希曼后來指出：“只要米勒還活著，他就不想把事情和盤托出。”我們至今都不清楚“蓋世太保米勒”在1945年5月以后的生活，盡管有種種跡象顯示他那時已經死了。[[45]](#_45_7)無論如何，艾希曼認為他毫無保留崇拜的海因里希·米勒仍然活著，而且正躲藏在東方。克勞斯·艾希曼模糊地補充說道：“不過他從未說過米勒待在東歐。”艾希曼不太可能真的知曉米勒在戰后的生活，因此不排除這種解釋其實部分是一廂情愿的夢想，部分是艾希曼猶豫不決的表現。畢竟在阿根廷的時光，是與全家人一起度過的自由生活，一切都變得越來越好。艾希曼買了一塊地，規劃并建造了一棟房子，看著他的兒子們長大。在這種情況下，他很容易就會聽從昔日同志們的勸阻，不要回到歐洲去。

不論是由于弗里茨·鮑爾的初步調查結果，埃伯哈德·弗里奇在奧地利說的話，其他返回德國者或是艾希曼的朋友們不小心的探究，反正在1958年年初，越來越多的證據浮出水面，艾希曼的下落早就不再是秘密。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慕尼黑的一名線人3月時報告指出，德國聯邦情報局有一份資料顯示，艾希曼正化名“克萊門斯”在阿根廷生活，不過該人按照慣例又加上補充說明，強調艾希曼當然也有可能置身中東。[[46]](#_46_7)根據該報告中提到的“從1952年開始”以及“克萊門斯”這個名字的拼寫錯誤，我們現在可以知道那名中央情報局線人看見了什么資料。那是德國聯邦情報局的艾希曼索引卡信息，以及1952年6月24日的舉報信息：“艾希曼……化名克萊門斯住在阿根廷。德文報刊《路徑》的總編輯知道他的詳細地址。”1958年的時候，聯邦情報局應該有了更加準確的了解，因為他們在科隆的聯邦憲法保衛局的同僚們已經比過去消息靈通多了。[[47]](#_47_7)聯邦憲法保衛局甚至認真地努力挖掘更多細節，并于1958年4月11日通知外交部：“根據所獲得的未經證實的情報，有個名叫卡爾·艾希曼的人（無詳細個人資料）曾在‘第三帝國’負責組織遣送猶太人的行動，接著在納粹垮臺一年之后化名克萊門特，經羅馬逃往阿根廷。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與杜勒出版社的共同所有人和《路徑》雜志總編輯埃伯哈德·弗里奇保持聯系，并且出沒于前納粹黨員的圈子。”聯邦憲法保衛局建議，不妨指示德國駐布宜諾斯艾利斯大使館注意該人，因為他很可能與一級突擊大隊長阿道夫·艾希曼是同一人。憲法保衛局還立即附上了艾希曼的出生日期和昔日單位名稱。科隆方面最主要想知道的是艾希曼的居住地點，此外更要求應該指示駐外單位“查明其詳細個人資料并報告其政治活動”。[[48]](#_48_7)我們不知道這個未經證實的情報的來源為何，但它無疑相當可靠和神通廣大。姓氏開頭字母的拼寫錯誤[\*](#_484)則既不難理解又無關緊要，因為K這個字母并非到處都像在德國那樣使用頻繁，于是在西班牙語的地區往往就遭到了西班牙化。即便在洛塔爾·赫爾曼的信件中，克萊門特也一直被拼寫成“Clement”——既然赫爾曼只能聽到那個名字，而無法看到它的拼寫，于是就選擇了最常見的寫法。盡管如此，赫爾曼卻并非這個情報的來源，因為聯邦憲法保衛局的線人知道更多東西，是住在蘇亞雷斯上校鎮的那位老先生所無法發現的。那名線人不但和德國聯邦情報局一樣，清楚艾希曼在阿根廷所處的環境、知道天主教會曾協助艾希曼逃亡，并且更掌握“Clement”是艾希曼在逃亡過程中即已使用的名字，而非抵達阿根廷之后才開始使用的化名。今天我們當然清楚，紅十字會的護照和逃亡所需的其他各種證件，都是在1948年以克萊門特這個名字簽發的。然而在1958年年初，只有艾希曼圈子內的人或者幫助他逃亡的人，才會清楚這些細節。有幾個可能的原因讓那名線人誤以為埃伯哈德·弗里奇當時仍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也許這個情報是在同年2月底弗里奇還沒有離開的時候發出的，否則就是線人看到弗里奇試圖移民聯邦德國沒有成功之后，以為他又回阿根廷去了。畢竟杜勒出版社和《路徑》雜志在那個時候都還沒有正式結束營業，而且弗里奇尚未完全賣掉他所擁有的不動產。[[49]](#_49_7)但我們還是能夠排除一個可能的告密者，那就是弗里奇自己。可惜聯邦憲法保衛局的弗里奇檔案至今還沒有對外開放，因此我們只能繼續熱切地期待，希望可以從這位活躍在幕后的出版商的報告中獲得更多資料。[[50]](#_50_7)不過聯邦憲法保衛局的另一個提示卻頗具啟發性。該局開門見山地指出，艾希曼有可能再次積極參與政治，并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到聯邦德國的制度。現在我們知道了這樣的懷疑是多么有道理。

德國大使館過了將近兩個月給出的答復，在許多方面都令人驚訝：“到處打聽那個化名克萊門特或其他姓氏的人，迄今仍無結果。”天真的研究者當然認為，查找會從搜索他們自己的檔案開始，然后駐布宜諾斯艾利斯大使館的工作人員自然就會在那里找到這個名字。至少如我們所記得的，薇拉·艾希曼曾于1954年帶著她的兒子們親自出現在大使館，因為艾希曼的兒子們需要德國護照。不管當初讓孩子們背誦黨衛隊不同官階名稱的人是誰，他總不能辯稱那位太太和那些小孩的名字對他沒有任何意義吧。從另一方面來看，“到處打聽”也未嘗就是個壞主意，更何況與納粹小圈子有所往來者不乏其人。維爾納·容克大使本人不但欣賞而且認識薩森，更與極右派人士頗有交情。當容克的繼女想要去報社實習的時候，他對那位年輕女性選擇《自由新聞報》（Freie Presse）完全沒有異議。該報的總主編正是威爾弗雷德·馮·奧芬，昔日戈培爾手下的新聞處處長。[[51]](#_51_7)既然連大使本人都不害怕跟那些口口聲聲強調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家伙打交道，我們禁不住想問，莫非大使館方面在“到處打聽”的時候總是找錯了對象？更別提他們為什么需要將近兩個月時間來給出這么不痛不癢的答復了。

艾希曼被綁架后，護照核發事件被曝光，引發了對這項重大疏失的質疑。聯邦德國外交部的法律部門被迫出面，宣布布宜諾斯艾利斯大使館當時不可能知道，“從那些護照申請即可推斷出如今遭到緝捕的艾希曼的下落”。[[52]](#_52_7)內部調查顯示，造成這種無能表現的主要原因在于，“大使館詢問后發現，除一個人外，包括大使在內的每個人皆不曾于綁架前聽說過有關阿道夫·艾希曼及其罪行的任何事情”。在成為通俗歷史書作者之前曾擔任過德國駐外大使的海因茨·施內彭（Heinz Schneppen），則委婉地把原因歸為“相關領事官員警覺性不足”。[[53]](#_53_7)但若仔細探究德國方面當時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情況，便不難得出結論，大使館全體工作人員所欠缺的是與“警覺性”完全不同的特質——例如購買當地報紙所需的金錢。不然的話，他們早就能夠在阿根廷發行量最大的德文報紙上頻繁讀到阿道夫·艾希曼是誰，以及被指責犯下了哪些惡行，畢竟大使館內的先生女士們似乎從來不閱讀有關德國歷史的書籍，或者自己國內的新聞刊物。不過大使館那些人想必具有未卜先知的本事，因為他們早在1958年的時候，即已針對他們（除一人之外）直到1960年年中都還不曉得的那個名字，給出了一個特別的提示：艾希曼“可能在中東”。得助人處且助人，此之謂也。

盡管如此，德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還是言過其實地表達出合作的意愿：“大使館仍將繼續查明艾希曼的下落，并在時機適當的時候提出報告。為達此目的，我們需要知道有哪些曾經定居此地的前納粹黨員，以及《路徑》雜志的編輯或工作人員，目前正定居在埃及或中東。”[[54]](#_54_7)這種虛偽的表現甚至惹惱了聯邦憲法保衛局。因為不管外交部所請求的信息究竟能夠對在阿根廷追查艾希曼的工作有什么幫助，外交部還忘記了一件事情：他們自己的工作人員早在1954年8月11日即已通知過聯邦憲法保衛局，他們一度誤以為是《路徑》出版商的一位作者約翰·馮·萊斯已經去了開羅。[[55]](#_55_7)最起碼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那簡直像是有人打算利用這個機會，查明聯邦憲法保衛局到底知道了多少東西。不管怎樣，科隆方面仍決定提醒外交部，務必要一絲不茍地采取自己的行動，但已不再進一步提出有關艾希曼的問題。[[56]](#_56_8)一直要到綁架事件發生之后，聯邦憲法保衛局才在與外交部的信函往來中重新回到艾希曼這個主題。聯邦憲法保衛局的工作人員想必已在1958年得出結論，向外交部及其駐阿根廷大使館詢問艾希曼根本毫無意義。

可惜我們還不知道，聯邦憲法保衛局1958年時是如何繼續處理艾希曼相關事宜的，因為除了上述那些檔案之外，沒有其他資料對外公開。因此我們也不清楚約瑟夫·弗特爾是否在其中發揮過作用。來自薩爾茨堡的弗特爾曾經擔任過刑事警察和邊防警察，還曾加入“在東方的”特別行動隊D支隊（Einsatzgruppe D），執行“邊境保安”和“對抗游擊隊”等任務。后來弗特爾和艾希曼一樣逃亡到阿根廷，但在1955年返回德國待了三年，并在聯邦憲法保衛局找到了工作。聯邦憲法保衛局與外交部令人泄氣的信函往來幾天之后，弗特爾又在1958年9月回到布宜諾斯艾利斯。根據海因茨·施內彭的說法，那是因為“他受到一家阿根廷公司的禮聘”，而且聯邦憲法保衛局的待遇過于菲薄。[[57]](#_57_8)我們對這個更有利可圖的新職缺知道得不多，但它應該不太可能是看上了弗特爾在“對抗游擊隊”方面的多年經驗。

無論聯邦德國各個駐外單位及其決策者表現如何，不可忽略的事實都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1958年年初時再次掌握了足夠資訊來找到艾希曼。然而我們對此仍然所知非常有限。嚴格說來，迄今可參考的所有文件都是偶然發現的，因為無論聯邦情報局還是聯邦刑事調查局都尚未開放50多年前的相關檔案供人研究。盡管我們非常樂意使用像外交部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外交政策文件》（Akten zur Auswaertigen 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那樣由官方單位委托發行的原始資料集，但從已出版選集的目錄卻可看出問題所在：它們只涵蓋了1949-1953年和1963-1979年的文件，1962年卷直到2010年12月底才問世。[[58]](#_58_8)一想到肯定還有許多相關機密文件隱藏在各種檔案中，以及官方對提高透明度的意愿有多么欠缺，整件事情就變得更加明顯和不光彩了：人們不僅在艾希曼被綁架之前不希望聯邦德國對他提起審判，而且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要保護誰，甚至直到今天都還對此遮遮掩掩。

1963年，聯邦德國外交部任命恩斯特-金特·莫爾（Ernst-Günther Mohr）擔任駐阿根廷大使，才終于設法采取措施扭轉了其高級外交人員對德國過去的可怕無知。[[59]](#_59_7)人們至少可以確定，莫爾知道艾希曼到底是誰。因為1941年在海牙擔任大使館參贊時，莫爾曾經針對遣送荷蘭猶太人的行動撰寫過詳盡的進度報告，而提交對象正好就是艾希曼的事務處。艾希曼還記得那回事，因為他在1961年的自傳《偶像》中提到了莫爾的鼎力合作。[[60]](#_60_7)這種維持延續性的努力不僅限于阿根廷。胡貝特·克里爾（Hubert Krier）大使退休之后，仍然不以為然地說：“我在1965年年底調任巴拉圭，就任前就接獲外交部的指示，不必針對有關門格勒的事情采取任何行動。”[[61]](#_61_8)假如艾希曼也能像門格勒那個集中營“醫生”一樣小心謹慎，只把自己對猶太人深惡痛絕的仇恨，以及對國家社會主義的贊揚歌頌默默留在日記中的話，他或許也有很大可能在進行休閑活動之際死去。1979年，門格勒在海中游泳時溺水身亡。

### 博爾曼在阿根廷

他們已經徹底改換了名字、履歷和其他許多東西。

當全世界都在追捕他們，或者認為他們已經死去的時候，只有這樣才能活下去。

——艾希曼在以色列評論南美的納粹，1962年[[62]](#_62_7)

艾希曼在阿根廷的最后一年，已經很難說是過著不引人注目的生活了。他在1957年如此大肆張揚之后，不僅行蹤暴露無遺，就連他的世界觀也不再是秘密。想重返隱姓埋名的狀態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他決定從布宜諾斯艾利斯消失不見，前往其他地方重新來過。結果他沒有那么做，反而在郊區買了一塊地。克勞斯·艾希曼回憶說，他的父親支付5.6萬比索買下了70平方米未開發的土地。艾希曼自己則表示，那是為時十年的分期付款。[[63]](#_63_7)誰要是有那么多好朋友的話，便不愁沒有穩定的收入。建筑材料的購買收據上寫的是利布爾·艾希曼女士（Señora Liebl de Eichmann）的名字。艾希曼則興高采烈地投入到自己的蓋房子計劃中，并且繼續在威廉·薩森的圈子內活動。

薩森訪談會的抄本顯示，艾希曼一直修改到最后一卷錄音帶的謄寫稿。他甚至還審閱了薩森所寫的文稿，結果大不以為然，因為它們與他實際的談話內容幾乎沒有關聯。艾希曼的妻子曾多次表示，她的丈夫直到1959年年底才結束了與薩森共同進行的工作。[[64]](#_64_7)此外甚至有確鑿的證據表明，即便在薩森訪談會結束之后，艾希曼仍然沒有停止自己的政治活動。他不但開始為孩子們撰寫一份新的手稿《圖庫曼小說》，而且還參加了一個迄今沒有被史學家們認真研究過的驚人計劃：收集納粹時期的文獻資料。艾希曼的兒子克勞斯在1966年表示，納粹黨人曾試圖建立一個更緊密的國際網絡。他解釋說：“南美、中東、北美和歐洲的國家社會主義者之間都有聯系。”我們若還記得右翼出版商之間的廣泛合作，便不難想象這可能意味著什么。在《路徑》的最后幾期中，這些聯系甚至對局外人都顯而易見。約翰·馮·萊斯在開羅使用各種不同的化名，撰寫了大量來自中東的文章，此外從世界各地傳來的新聞報道也明顯增加了許多。但克勞斯·艾希曼也談到了另一個網絡：“事情是這樣組織的，每一位住在國外某地的前部門主管都負責編輯和收集有關其昔日領域的資料。我弟弟霍斯特也匯報說，從前主管已經死亡的部門雖然由別人主司其事，卻仍沿用原先主管的姓名。于是關于空軍的部分仍有一位‘戈林’，關于宣傳的部分仍有一位‘戈培爾’，等等。”艾希曼的兒子斬釘截鐵地表示：“我們的父親也參與了收集資料。”[[65]](#_65_7)艾希曼還能夠為此提供額外助力，因為他的二兒子曾經任職于商船船隊，在1959-1961年間穿梭于加拿大、美國、非洲、南美和歐洲之間，遞送了“厚厚一沓文件”。盡管艾希曼后來信誓旦旦地宣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遠離政治和軍事，但他顯然至少讓自己的一個兒子卷入了他的政治活動。對布宜諾斯艾利斯那名犯下危害人類罪行的罪犯來說，一個名叫“霍斯特·艾希曼”的國際信差絕對稱不上理想的掩護。

“資料收集”的組織結構，為經常被提起的納粹高官在阿根廷的下落問題提供了線索。除了諸如希特勒仿若置身厄爾巴島的拿破侖，正藏匿在南極洲的冰天雪地[[66]](#_66_7)等待卷土重來的那種荒誕傳說外，長年來關于戰后納粹的最頑固謠言之一，就是馬丁·博爾曼逃到了南美洲。如果克勞斯·艾希曼關于分頭收集資料的故事所言不虛，那么“馬丁·博爾曼”就果真是在南美洲——作為負責收集黨秘書處相關資料的人所使用的化名。至少這可以解釋，為什么拉迪斯拉斯·法拉戈（Ladislas Farago）和格爾德·海德曼（Gerd Heidemann）之類輕信盲從的記者，會一再堅稱自己看見過1945年之后由“博爾曼”親筆署名的文件和資料。

### “避開艾希曼！”

他很快就掌握了工作訣竅，

并且受到上級的賞識。

——身份不詳的戴姆勒-奔馳工作人員[[67]](#_67_7)

一再有人聲稱，艾希曼是國家社會主義者圈內的賤民，沒有人愿意跟他扯上關系。其實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期，這種說法都站不住腳。但艾希曼的兒子卻有印象，在阿根廷的最后一年，他的父親已越來越被人疏遠。對克勞斯·艾希曼來說，原因非常清楚：“門格勒博士散播了一句口號：避開艾希曼，接近他是很危險的事情。”然而這種說法并不合乎情理。光是那句口號來自約瑟夫·門格勒就值得懷疑，畢竟認識門格勒的風險無論如何也算不上更小。所有人中，偏偏這名在那個向后看的德國群體中深具影響力的集中營“醫生”，提醒人們提防最終解決方案的組織者，這個想法反正不怎么讓人信服。盡管如此，艾希曼兒子的感受指向了一些確實發生過的事情。

門格勒感覺自己正遭到追捕，此事確非空穴來風。1959年2月，法蘭克福地方法院向他發出了拘捕令。與艾希曼不同，門格勒堂而皇之地以自己的本名定居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然而門格勒當時已經放棄了他與薩森位于同一條街上的房子，從阿根廷逃往巴拉圭躲藏。他的日記內容顯示，阿根廷的朋友們認為這種逃亡完全是反應過度。[[68]](#_68_7)由此可見，門格勒根本不可能呼吁別人避開艾希曼，因為他早就不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了，而艾希曼也在同一時間離開了門格勒父親持有股份的羅伯托·梅爾提希的公司。所以，門格勒確實遠離了艾希曼，但原因并非他打算避開艾希曼，而是因為他自己帶著老朋友們一起消失不見了。克勞斯·艾希曼所觀察到的狀況，顯然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納粹同情者整體的情緒變化。因為除了門格勒的倉皇逃跑已喧騰眾口之外，有關聯邦德國法律形勢出現重大轉變的消息也流傳開來。拘捕令和逮捕行動變得日益頻繁，1958年的“烏爾姆特別行動隊審判案”（Ulmer Einsatzgruppen-Prozess）終于引發公眾對如何處理戰爭罪行的辯論。昔日納粹國防軍在希臘的行政軍官馬克斯·梅爾滕（Max Merten），更因為參與遣送薩洛尼卡（Salonika）猶太人的行動，于1959年年初在雅典出庭受審，因為他竟然膽大包天地偏偏要去希臘度假。從阿根廷返回德國的格哈德·博內更在1959年9月遭到逮捕，官方準備為了“安樂死行動”中慘遭殺害的成千上萬人把他送上法庭。阿根廷的新聞媒體也報道了整個事件。

按法律程序起訴納粹罪行的興趣被喚醒之后，不但有關大屠殺的知識變得越來越豐富，追究大屠殺組織者的聲音也越來越大。如今只要一談起納粹罪行，艾希曼的名字就肯定會出現在書上和報紙上。此外僅從一個細節即可看出情況的變化：再也沒有人把他的名字搞錯，而總是稱他為“阿道夫·艾希曼”。其他關于他的傳說也開始動搖，例如《時代周報》有一篇文章的標題為《終究不是圣殿騎士》（‘Doch kein Templer’）。[[69]](#_69_7)

艾希曼的兒子后來回憶說，人們出遠門回來以后帶給他父親越來越多的報紙文章。那些之前曾與艾希曼共度許多時光的人，如今卻可以出國旅行，這不免成為艾希曼感覺自己被遺棄的另一個原因。

但艾希曼與那些老朋友之間的距離不可能太遠，因為正是借由他們的關系，艾希曼才獲得了下一份工作。奧爾斯特·卡洛斯·福爾德納幫他在向北兩小時車程的岡薩雷斯卡坦（Gonzáles Catán）工業區，找到一份在梅賽德斯-奔馳阿根廷公司工作的差事。艾希曼在1959年3月20日入職，成為備用零件倉庫的管理員。[[70]](#_70_7)他的推薦人除了奧爾斯特·卡洛斯·福爾德納之外，還包括一位克拉斯（Krass）博士，以及弗朗西斯科·何塞·菲格納（Francisco José Viegener）。艾希曼遭到綁架之后，副董事漢斯·馬丁·施萊爾（HannsMartin Schleyer）得知，那名申請人“有很好的推薦，而且給人留下良好印象”[[71]](#_71_7)。里卡多·克萊門特按規定參加了法定退休金保險（保險號碼1785425），要求的薪資為每月5500比索，約1100西德馬克，高于當時聯邦德國的平均薪資。[[72]](#_72_8)1959年第二季度的一份薪餉名冊顯示，他真的領到了那個金額。[[73]](#_73_8)梅賽德斯-奔馳當時雇用了許多德國人，其中不少是昔日的黨衛隊成員。一名員工曾經證實，“幾乎整個管理團隊都由戰后來自德國的移民組成”，他們有些人知道“克萊門特”是何許人，但這個話題是禁忌。[[74]](#_74_7)善于交際的艾希曼很快便在梅賽德斯-奔馳結識了一些新朋友，甚至把他們介紹給了他的家人。在艾希曼被綁架之后，克勞斯·艾希曼和威廉·薩森還請他們幫忙藏匿一些敏感文件。

艾希曼的新工作意味著每天坐四小時公交車通勤。到了周末，他就忙著和兒子們一同在買來的那塊地上建房子。克勞斯·艾希曼還記得，那項工作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這也減少了艾希曼與其他人密切接觸的機會。如今，那位父親大多數的空閑時間都在家中度過。他看起來平靜篤定，讀了許多書，而且經常拉小提琴，因為“他特別喜歡查爾達什（Csárdás）與其他吉卜賽旋律”。1939年的時候，艾希曼曾巴不得第一列火車就把奧地利的吉卜賽人遣送到尼斯科，但這對他來說似乎并不構成矛盾。[[75]](#_75_7)然而就連他的兒子也不相信，艾希曼在1959年的時候仍舊像他所表現的那么從容不迫。不過克勞斯還是稱了他的心意，在父母結婚紀念日的前一天成親，而且不久后就為家族添了一個女孩。然而家族生活中的另一個事件卻給艾希曼的人生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后果。1959年4月，他的繼母瑪麗亞·艾希曼在林茨去世。奧地利的家人們十分不小心地提到了那位媳婦和她的幾位兒子。他們顯然忘記薇拉已經“正式離婚”而不再姓艾希曼，因為訃告中寫出的名字是“薇拉·艾希曼”。

### 弗里茨·鮑爾的消息來源

我在猶太人那里沒有敵人……

——艾希曼在薩森訪談會上的說辭[[76]](#_76_7)

西蒙·維森塔爾后來寫道，他在《上奧地利新聞報》（Oberösterreichische Nachrichten）上讀到了艾希曼繼母的訃告，“可是我究竟該把這個消息告訴誰呢？”[[77]](#_77_7)盡管維森塔爾在奧地利有過不少聯絡人，例如他認識以色列大使本人，但之前的一些經歷卻讓他躊躇不前。如今在世界各地都有越來越多的人基于各種不同原因加入了追捕艾希曼的行動，難怪這個故事的線索有時會變得繁雜不清。

1959年3月25日，奧地利以赫爾曼·朗拜因建立的國際奧斯維辛委員會（Internationalen Auschwitz-Komitees）的名義，正式對艾希曼提出刑事指控。朗拜因與專門代理納粹受害者案件的法蘭克福律師亨利·奧蒙德洽商之后，采取了此一行動。雖然奧地利早在20世紀40年代末期就已經對艾希曼發出了逮捕令，并且從1955年開始將他列入了通緝名單，但這次指控仍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朗拜因始終努力尋找可能有助于追捕艾希曼之類戰犯的資料或證據，他在造訪波蘭的時候，還設法拿到了另外一張艾希曼的照片。奧蒙德和朗拜因二人都和弗里茨·鮑爾保持著聯系，但目前還沒有證據表明鮑爾當時已經信賴他們當中的任何一人。盡管如此，他們的努力——特別是朗拜因的奔波——仍然增添了壓力。[[78]](#_78_7)因此來自官方的一則消息顯得更加令人困惑：聯邦憲法保衛局在1959年春季接獲“未經證實的報告”，指出“艾希曼的妻子和他的四個孩子一直生活在南美洲，艾希曼本人則據說生活在歐洲某地”。[[79]](#_79_7)我們仍不清楚這個傳言是否緣于某種張冠李戴，例如跟造訪歐洲的薩森混為一談，還是源自阿根廷方面的障眼法。但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當時提到的是阿道夫·艾希曼有幾個孩子，而非里卡多·克萊門特。

1959年從以色列傳來的一個聲音，給艾希曼問題掀起了更多波瀾。托維阿·弗里德曼在戰后不久便加入了尋找兇手的工作，一直和維森塔爾保持聯系，并且在移民以色列之后充滿理想地在海法創辦了猶太文獻中心。從此弗里德曼到處提出批判性的問題。1959年7月13日他寫信給路德維希堡國家社會主義犯罪調查中央辦公室的負責人埃爾溫·許勒（Erwin Schüle），指責聯邦德國政府未曾采取任何行動緝捕阿道夫·艾希曼，因為它顯然不愿面對那個人的所作所為。許勒在一周之內答復，向弗里德曼說明了從1956年至今有效的逮捕令，以及有關艾希曼可能藏身阿根廷或者以色列周邊國家的傳言。因為弗里德曼當初寄信過去時使用了“海法猶太文獻中心”的信箋，許勒不久之后也寫信請他提供關于艾希曼的資訊和消息。弗里德曼于是滿懷熱情地投入了這項工作，除了低調地提供資訊之外，還想做出更多表現。但弗里德曼所不知道的是，搜尋艾希曼的工作早已取得重大進展，他自己的積極行動反而險些妨礙了它的成功。

和伊塞爾·哈雷爾不同，弗里茨·鮑爾并沒有那么快就放棄阿根廷的線索。鮑爾雖然沒再收到任何來自洛塔爾·赫爾曼的消息，因為赫爾曼已恪守約定將信件寄往北美的那個地址，卻還是從其他方面獲悉，阿根廷的線索是正確的。鮑爾的屬下記得，聯邦刑事調查局的保羅·迪科普夫曾經造訪過他們的上司。迪科普夫自己有黨衛隊的過去，并且仍一直與極右派人士保持交往。[[80]](#_80_7)據稱迪科普夫極力建議鮑爾放棄繼續追捕艾希曼，因為想在阿根廷找到他是不可能的事情。這個“希望”卻讓鮑爾感覺得到了確認，自己已經找對了線索。[[81]](#_81_7)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導致公眾——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開始為那些兇手迄今沒有受到懲罰而感到不安。民主德國已著手將“未受檢視的過去”用作冷戰中的武器，并且以揭露聯邦德國領導階層的不光彩事跡為要挾。借助蘇聯當初繳獲的檔案資料，東柏林方面每周都將更多細節公之于世。沒有人知道該如何應對這種危險的武器，因為所揭露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完全符合真相。[[82]](#_82_7)在此背景下，艾希曼的重新出現想必會演變成最糟糕的災難。依爾姆特魯德·沃亞克根據伊塞爾·哈雷爾的描述進行了事件重組。按照他的說法，弗里茨·鮑爾在1959年夏天進一步與以色列的代表們會面，并且催促他們迅速采取行動。哈雷爾聲稱，鮑爾提到了能夠證明艾希曼藏身阿根廷的第二個線人，一名昔日的黨衛隊隊員。但鮑爾無法說出那個人的名字，因為這將危及他的人身安全。

這名黨衛隊告密者的身份從一開始就眾說紛紜。今天我們知道，死不悔改的納粹黨人在戰后仍然彼此保持著密切聯系，在阿根廷和聯邦德國之間的紐帶更是緊密。鑒于有那么多人知道艾希曼的下落，應該提出的問題其實并非誰可能是另一個線人，而是誰根本不可能如此。極右派雜志《國族歐洲》1961年的一篇文章無意中泄露了，曾經有多少右派人士宛如屋頂上的麻雀一般，嘰嘰喳喳地大肆宣揚消息——曾在《路徑》發表過文章的F. J. P.維爾（F. J. P. Veale）寫道：“首先讓我們承認，艾希曼逃往阿根廷這件事情早已眾所周知。”[[83]](#_83_7)

直到今天我們仍不清楚究竟誰是弗里茨·鮑爾口中的第二個線人，因為鮑爾不愿意透露他的姓名。自從伊塞爾·哈雷爾在書中昭告天下，鮑爾的保密做法是為了要庇護一名黨衛隊成員之后，人們便開始懷疑艾希曼的身邊出了“叛徒”。這項懷疑完美印證了人們的猜測，即威廉·薩森為了把他的訪談記錄賣出最高價而出賣艾希曼，否則就是他出售訪談記錄的企圖把線索導向了艾希曼。但鮑爾與薩森日后的一次信件往來卻表明，薩森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是鮑爾的線人。[[84]](#_84_7)不過毫無疑問的是，許多可能的線人都既曾經任職于黨衛隊，又如今確切知道艾希曼在阿根廷的居住地點和生活方式。除此之外，當然還有另外一名昔日的黨衛隊成員，曾經無意中堅定了弗里茨·鮑爾關于阿根廷是正確搜尋方向的信心，那就是主動前往鮑爾辦公室拜訪的保羅·迪科普夫。這次亮相使迪科普夫成為鮑爾眼中具有黨衛隊背景的高級線人，如果鮑爾無意指名道姓地點破聯邦德國的這樁丑聞，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不過弗里茨·鮑爾還是在朋友中間提到過一個具體的名字：托馬斯·哈蘭在人生將盡的時候表示，一個姓“施奈德”（Schneider，但不排除是其他拼寫方式）的人，曾經一五一十地告訴了鮑爾里卡多·克萊門特在梅賽德斯-奔馳就業的情況。[[85]](#_85_7)這位施奈德先生自己也有一段過去。他曾任職于特別行動隊，而后于20世紀50年代末期在梅賽德斯的斯圖加特總部負責新員工部門。施奈德的這個職位能夠讓鮑爾查閱人事檔案并獲得更多訊息，從而幫助他搜尋艾希曼。只可惜我還沒能說服戴姆勒公司，為什么值得與研究者合作，從而有機會在他們的員工名單上不僅找到一名大屠殺兇手，可能還會發現一位著名德國總檢察長的得力助手。他們甚至無意接受我所提供的一份列出了可能的施奈德們[[86]](#_86_7)，并且附上出生日期的名單。幾經詢問之后才終于有人告訴我，1959年時，公司里沒有人會知道里卡多·克萊門特究竟是誰。[[87]](#_87_7)我顯然并非恰當的人選，來提醒他們那個身份早在50多年前就已經為人所知，而且具備相關知識也意味著應負起相應的責任。由于某些認識的形成需要時間，或許假以時日，會有其他人成功說服那家享譽全球的企業，一位協助找到艾希曼的員工既不會給公司歷史蒙上陰影，也不會損害企業形象。即便那位梅賽德斯員工幫助弗里茨·鮑爾的原因可能是鮑爾知道他過去（可能）在特別行動隊的歷史，但他在決定要提供協助的時候，仍然表現出了比大多數人更大的勇氣。

在我們談論弗里茨·鮑爾的線人時，還有另外一條線索指向完全不同的方向。鮑爾曾經私下提到過除洛塔爾·赫爾曼之外的第二個猶太消息提供者。鮑爾曾向他的一位好朋友透露過這個消息來源，表示多虧那個人，他才知道了艾希曼在阿根廷的生活情況。托馬斯·哈蘭回憶，鮑爾說那是“一個巴西的前波蘭猶太人、索比布爾起義的幸存者，但他從來沒有告訴我那個人的名字”。[[88]](#_88_7)本-古里安向以色列國會宣布艾希曼已被囚禁于以色列之后不久，特拉維夫便短暫地傳出消息，稱是一名來自波蘭的難民提供了關于艾希曼下落的線索。[[89]](#_89_7)巴西也一再成為話題，因為當時已有人懷疑約瑟夫·門格勒就在那里。只有“索比布爾”這個關鍵字眼尚未出現在相關討論中。此一線索在1960年對大多數人而言還不具特別意義，因為直到最近幾年，關于這個恐怖地點及幸存者的詳細研究才開始出現。

索比布爾是“萊因哈德行動”的死亡集中營之一，按照納粹的規劃，那里本不會留下任何活口。[[90]](#_90_7)因此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場囚犯起義，才有至少47人成功逃脫。總共只有62人從那個地獄存活下來，其中更只有兩個出生于波蘭的猶太人果真在20世紀40年代末期移民巴西，分別為1923年出生于伊茲比察（Izbica）的哈伊姆·科倫菲爾德（Chaim Korenfeld），以及索比布爾起義的策劃者之一，1927年出生于普瓦維（Puławy）的斯坦尼斯瓦夫·“什洛莫”·施邁斯納（Stanisłav “Shlomo” Szmajzner）。我們對科倫菲爾德在巴西的生活所知無幾，只曉得他在1949年經由意大利來到巴西。施邁斯納原本打算移民以色列，之前只打算到里約熱內盧探訪親戚。他于1947年抵達巴西，結果卻在那里度過了余生。他開了一家珠寶店，并在十年時間里將它打造為一家成功的企業。1958年把它賣掉后，他用賺來的錢買下了熱帶雨林中的一座島嶼，轉而經營畜牧業。[[91]](#_91_7)他在1968年出版了《索比布爾：一個少年猶太人的悲劇》（Sobibór:Von der Tragödie eines jugendlichen Juden）[[92]](#_92_7)。與他自己的親身經歷相比，那個書名反而顯得輕描淡寫。當施邁斯納在1942年5月來到索比布爾集中營的時候，他是帶著自己的工具包一起過去的，因為當時他還不到15歲，天真地相信了有關“人口遷移”的謊言。正是工具包救了這名金匠學徒，使他沒有立刻遇難，因為索比布爾的黨衛隊人員鐘情于飾有SS符號的金戒指，以及皮鞭握柄上的鎏金字母圖案。[[93]](#_93_7)副指揮官古斯塔夫·瓦格納（Gustav Wagner）看出了那個少年的天分，而且幸運的是，金幣和金牙一應俱全，不虞匱乏。施邁斯納從一開始便知道，他必須用來打造金飾的材料從哪里來。此外他也知道，自己的父母和手足如何在索比布爾慘遭殺害。強迫勞動使施邁斯納認識了瓦格納和營地指揮官弗朗茨·施坦格爾（Franz Stangl），二人的面孔從此不可磨滅地烙印在那個年輕人的心中。許多年后，施邁斯納再次與那兩個人相逢。1968年，施邁斯納在巴西利亞的街頭遇見了施坦格爾。在西蒙·維森塔爾的有效施壓下，施坦格爾被送上了法庭。[[94]](#_94_8)古斯塔夫·瓦格納則在1978年被他昔日的囚徒指認出來。雖然瓦格納僥幸逃過了被起訴的命運，卻還是自殺身亡——至少警方的正式報告是這樣的。另一位索比布爾的幸存者曾說：“施邁斯納讓人感覺得出，他與瓦格納之死并非完全無關。”[[95]](#_95_7)

斯坦尼斯瓦夫·施邁斯納是一名來自波蘭的猶太人，在巴西以經商為生。假如他聽說過有關艾希曼定居阿根廷的消息，那么他很可能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期就已經實際利用了這方面的情報。那位住在巴西的前波蘭猶太人完全有可能知道艾希曼的下落，畢竟巴西和阿根廷之間商務往來頻繁。不僅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很早便去過巴西，甚至埃伯哈德·弗里奇也曾造訪這個國家。佩德羅·波比耶辛那名來自波蘭、與納粹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做生意、幫薩森采購錄音機的德國前國防軍士兵，也出差到過巴西。對一個足智多謀的人來說，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納粹社區進行調查絕非難事，特別是如果他已經知道自己在尋找什么的話。1959年的時候，假如鮑爾想要找人在阿根廷暗中調查，那么施邁斯納可能是一個理想人選。既然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弗里茨·鮑爾的講法，那么一切跡象便都顯示，確實有兩名拉丁美洲的猶太線人，以及一名前黨衛隊成員向鮑爾提供了關鍵的線索，從而使艾希曼能夠被帶上耶路撒冷的審判庭。

### 艾希曼在科威特

總檢察長鮑爾即將于1960年年初，

通過波恩各主管部門向科威特提出引渡艾希曼的要求。

鮑爾認為，國際法不會對引渡構成障礙。

——向媒體發布的新聞稿，1959年12月23日[[96]](#_96_8)

從1959年年中開始，有關艾希曼藏身中東的消息不但甚囂塵上，而且還出現了一個新的變種。海因茨·魏貝爾-阿爾特邁爾那個想象力過于豐富的記者受到西蒙·維森塔爾的啟發，前往中東尋訪當地的納粹。[[97]](#_97_8)他甚至號稱在一次采訪中，前穆夫提阿明·阿爾-侯賽尼不但遞給他一本約翰·馮·萊斯的反猶太小冊子，并且言之鑿鑿地證實：“是的，我跟艾希曼很熟，而且我可以向您保證，他還活著。”據悉還有人在大馬士革開價五萬美元，向魏貝爾-阿爾特邁爾“兜售”艾希曼。[[98]](#_98_7)如果一名新聞記者都能打聽到，“某些阿拉伯圈子談論‘艾希曼交易’已經好幾天了”，那么這個消息無疑也會引起情報機構的注意，更何況德國聯邦情報局在當地還有阿洛伊斯·布倫納和弗朗茨·拉德馬赫之類的線人。反正不管怎樣，聯邦憲法保衛局在1959年9月下旬接獲線報，表示艾希曼藏身在大馬士革或卡塔爾。[[99]](#_99_7)那名線人甚至宣稱親自見到了布倫納和艾希曼。湯姆·塞格夫則懷疑魏貝爾-阿爾特邁爾自己就是消息的來源，因為那名記者曾于1960年夏天在科隆的八卦雜志《新畫刊》（NeueIllustrierte）上發表了一篇故事，自稱在一家酒吧看見艾希曼和布倫納就坐在隔壁桌。

然而，聯邦憲法保衛局還有一條截然不同的線索。按照它的說法，中東的朋友們1959年時曾試圖為艾希曼創造一種新生活。消息來源是恩斯特·威廉·施普林格（Ernst Wilhelm Springer），一名來自巴特塞格貝格（Bad Segeberg）的軍火商，當時已前往中東發展。根據聯邦憲法保衛局的報告，施普林格“針對1959年10月報刊上有關艾希曼的文章發表意見說，艾希曼目前正在中東一個與民族解放陣線（FLN）關系友好的國家，并且不時與他的伙伴費雪（阿洛伊斯·布倫納）見面。他們的打算是讓艾希曼在科威特的一家石油公司獲得高級管理職位。不過在被媒體報道之后，據說此計劃已被放棄”[[100]](#_100_7)。

可以確定的是，中東這些頭條新聞確實引發了一陣特別的騷動，因為德國工業聯合會立刻否認了這些傳言——至少在接到赫爾曼·朗拜因用“Comité International d’Auschwitz”[\*](#_485)信箋發出的詢問函之后，他們是這么說的。[[101]](#_101_7)但他們還是回信表示：“大函敬悉，已承囑徹底調查是否有任何名叫阿道夫·艾希曼之人，受雇于科威特的大型德國工業公司。”他們追查了兩個月，甚至連在科威特代表德國企業利益的團體，也受委托進行調查。結果是“完全否定這種可能”，而且在中東沒有人知道那個艾希曼究竟是誰。但如此一來，確實知道艾希曼是誰的人現在也已經曉得，人們是多么努力地在中東尋找艾希曼。假如的確有人曾經打算聘用艾希曼的話，赫爾曼·朗拜因在得到弗里茨·鮑爾的一名親信同意后發出的那封詢問函，無疑也會讓他打消這個念頭。[[102]](#_102_8)聯邦憲法保衛局的報告此外還包含了另一個引人注目的細節：根據施普林格的講法，“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派駐巴特戈德斯貝格（Bad Godesberg）[\*](#_486)的邁達尼上校（Oberst Medani）應該知道艾希曼的下落”。[[103]](#_103_7)

無論這些說法究竟是胡思亂想、張冠李戴，或者是故意散布的謠言，人們對艾希曼日益增長的興趣已經顯而易見。總之可以確定的是，艾希曼直到被綁架之前都沒有離開過阿根廷和他的家人。另外一個問題則是，艾希曼在1959年是否還有辦法前往中東，在那里隱姓埋名地生活。其實艾希曼早已陷入自己所設的圈套之中，遷往北非只會讓他更容易遭到逮捕。但最重要的是，這些傳言使弗里茨·鮑爾更容易掩護對這名大屠殺兇手的獵捕行動。1959年夏天以來出現的各種錯誤情報，頗有可能不僅僅是巧合。

1959年8月20日，埃爾溫·許勒從路德維希堡秘密地通知托維阿·弗里德曼，他得到的新消息表明艾希曼在科威特為一家石油公司工作。[[104]](#_104_8)我們不知道許勒當時是否知道這個消息并不正確，也不知道是否有人刻意利用許勒來提供假線索。但一切跡象指出，弗里茨·鮑爾確實已和以色列情報機關商量妥當，要繞個彎子通過許勒把這個中東故事的新版本散播到全世界。在阿根廷追捕納粹罪犯的經驗早已表明，德國駐阿根廷大使館并不完全值得信賴，因此鮑爾或許也不信任路德維希堡國家社會主義犯罪調查中央辦公室的主任，即便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鮑爾當時已經知道了許勒自己在黨衛隊的歷史。無論如何，鑒于每過一個月，艾希曼發現他們越來越逼近的風險就加大一分，因此刻意散播假消息的想法顯然并非空穴來風。

托維阿·弗里德曼顯然對此進展非常興奮，以致在10月的時候自作主張把關于科威特的消息告訴了新聞界。10月12日，甚至在《阿根廷日報》上都可以讀到一篇標題為《阿道夫·艾希曼據悉在1945年后置身科威特》的文章。報道稱，“以色列海法猶太文獻中心的負責人……托維阿·弗里德曼表示，該中心曾懸賞一萬美元來尋找和捉拿艾希曼”。盡管弗里德曼曾因為這種明顯欠考慮的做法向許勒道歉，而且許勒也對此表現得非常惱火，卻仍無法阻止弗里德曼采取進一步的動作。畢竟他想在法庭上見到艾希曼的愿望實在難以遏止。弗里茨·鮑爾和以色列情報部門巧妙地利用有關科威特的不實報道，虛晃一槍做出嚴正反應。10月13日的《南德意志報》討論了引渡艾希曼的可能性。接下來幾天，新聞媒體繼續報道，以色列外交部部長已針對艾希曼是否的確藏身科威特一事，正式向西德和英國當局[\*](#_487)提出詢問。以色列政府發言人進而宣稱，“以色列正在調查艾希曼的案件，而且法蘭克福總檢察長辦公室已將該涉案人列入通緝名單”。這個消息自然也出現在《阿根廷日報》和其他報紙上。[[105]](#_105_7)對假消息策略一無所知的托維阿·弗里德曼則在本-古里安的選舉造勢集會上，公開呼吁懸賞捉拿在科威特的艾希曼，其做法又進一步刺激了相關的新聞報道。[[106]](#_106_7)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調查人員竭盡全力讓那些假消息不斷出現在新聞媒體上。鮑爾孜孜不倦地舉行新聞發布會和接受采訪，以色列也配合發布更多新聞，這一切都如愿持續地引發了媒體的回響。1960年1月初傳出了有關引渡申請的消息，盡管聯邦德國當局加以否認，外交部甚至表態拒絕，但英國外交部仍然同意協助。鮑爾更釋放出關于“酋長”的風聲，表示艾希曼“在其帳下擔任一些西德公司的委托代表人”，雖然“為求保密起見”，他無法說出那些公司的名字。鮑爾甚至宣布，鑒于國際法上的一切障礙目前皆已排除，他將為德國外交部準備詳盡的資料。[[107]](#_107_7)這使記者們不禁納悶起來，為什么外交部對一切完全保持緘默。例如慕尼黑的《德國周報》（Deutsche Woche）寫道：“所以現在的問題是，外交部為什么既沒有公開辟謠，也不曾正式說明傳言是否屬實。”[[108]](#_108_7)那個謊言顯得非常具有說服力，以致最后就連德國當局也開始對自己的情報產生懷疑。于是外交部向聯邦司法部提出詢問，想知道那里是否有任何關于艾希曼在科威特或埃及下落的消息。結果司法部同樣一頭霧水地回答說：“我們甚至無法確定艾希曼是否還活著。”[[109]](#_109_7)

只有一份報刊對此極力否認，那就是《帝國呼聲報》，德意志國家黨的喉舌。阿道夫·馮·塔登那個非常關心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在德國政治生涯的人，于1959年10月24日在一篇題為《艾希曼如今究竟何在？》的文章中指出：“艾希曼被藏匿在意大利的一間天主教修道院內，然后在天主教高層的幫助下，被從意大利接應到了阿根廷。”這顯然已不是幫助，而是公然的背叛。塔登嘲諷地表示：“許勒先生和以色列在科威特搜尋他的行動，將只會徒勞無功。”并且以威脅的口吻補充說道：“此事令人感到非常遺憾，因為假如艾希曼真是臭名昭著的猶太人大屠殺兇手，那么把他定罪之后就能更清楚地了解這個可怕的事件了。”其字里行間都洋溢著他的夢想，要把600萬這個數字揭露為謊言。

不管那是由于《帝國呼聲報》一心想要激起“能夠力挽狂瀾”的艾希曼發出聲明，還是因為多嘴的編輯部門再次無法守口如瓶[[110]](#_110_7)，總之一件相當詭異的事情已經發生了。塔登后來曾輕蔑地指責其昔日撰稿人威廉·薩森不忠不義地背叛了艾希曼，結果偏偏是他自己于艾希曼被綁架的半年之前對追捕者嗤之以鼻，主動大肆張揚艾希曼的藏身之處，使報刊上首度明確提到阿根廷。那個來自下薩克森的極端分子甚至毫不掩飾自己的消息來源——塔登公然提到了“德國移民圈子”，即便他也強調他們跟艾希曼“避不見面”。此一線索的重要意義在于，每個人或者至少每位《帝國呼聲報》的讀者都知道，有一個來自那個圈子的人甚至從1953年開始就一直出現在德意志國家黨的候選人名單上。那么有誰注意到這個提示了嗎？有的，聯邦憲法保衛局細心的工作人員便注意到了。[[111]](#_111_7)那里的人認為，這篇來自違憲刊物的文章“值得注意”，于是恪盡職責地把它歸檔到艾希曼相關文件中。這不禁讓人心生懷疑，若能毫無保留地開放一切相關檔案，是否便足以讓我們明白德國有關當局在那幾個月到底發生過什么事情？

《帝國呼聲報》的發行量小得微不足道，以致那篇文章一直沒有引起回響。塔登從來沒有被指控背叛了同志，盡管他后來擔任德國國家民主黨主席的時候，甚至暗中為英國的軍情六處（MI6）工作。[[112]](#_112_7)與此同時，弗里茨·鮑爾的假消息策略卻發揮了出色的作用。從艾希曼對這些新聞的反應，即可看出轉移注意力的做法并非多余。克勞斯·艾希曼記得他的妻子有一天晚上在收音機廣播中聽到，國際刑警組織正在通緝據悉藏匿于科威特的艾希曼。“我急忙趕去圣費爾南多把父親從睡夢中搖醒：‘國際刑警組織正在追捕你。’他卻只是冷冷地說：‘去他的，你竟然為了這種事情半夜把我吵醒？等明天再說也不遲。趕快回家好好睡覺吧。’”接下來幾天，他的父親還是向朋友們征詢了一下意見，但沒有任何人覺得這個消息令人不安，或者值得把它當成一回事。[[113]](#_113_8)

與此同時，洛塔爾·赫爾曼也在《阿根廷日報》上讀到了托維阿·弗里德曼提到一萬美元獎金的那篇文章。由于他和鮑爾已經完全失去了聯系，也沒有收到其他任何人的答復，于是立即寫信去以色列向弗里德曼通風報信。那篇文章給他一種印象，現在終于有人嚴肅對待這件事情了。起先，赫爾曼對他當時住在美國的女兒只字未提。[[114]](#_114_7)然而赫爾曼并不清楚，那個“文獻中心”僅僅是一名狂熱的納粹獵人的私人收藏罷了，本身并沒有任何資金來源。他認為那是一個國家級的機構，誤以為的確存在獎金。赫爾曼因而清楚地把話講明，這次他不會在沒有預先付款的情況下透露任何信息。弗里德曼則在11月8日把這個信息轉達給許勒，但沒有提及赫爾曼的名字。最晚從這個時候開始，許勒顯然也知道了追捕行動的真實情況，因為他極力敦促弗里德曼務必要保持低調。他表示自己“很遺憾地獲悉，艾希曼的事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煩請鼎力相助，讓‘艾希曼案件’暫且成為絕對禁忌。……請勿發表任何文字、任何演說，并且不要采取任何其他行動”，因為這一切“都擾亂了我們厘清艾希曼案件的努力”。為強調這一點，許勒暗示追捕行動一定會獲得成功。[[115]](#_115_7)直到許勒重申這個勸誡之后，弗里德曼才真正變得有所節制。不過弗里德曼還是讓洛塔爾·赫爾曼知道，他已經把消息轉達給了耶路撒冷的世界猶太人大會代表，而且肯定會有人與他聯系。[[116]](#_116_8)

從洛塔爾·赫爾曼的角度來看，事件的發展過程甚至比托維阿·弗里德曼的經歷更加曲折。1959年12月26日，阿根廷猶太社區的一位代表前往拜訪赫爾曼。他以為那位“G.舒爾曼先生”（Herr G. Schurmann）是弗里德曼派過來的，然而弗里德曼后來卻表示自己未曾采取任何進一步的動作[[117]](#_117_7)。在聽說了有關中東的新聞之后，他已經不再相信赫爾曼了。[[118]](#_118_7)赫爾曼后來的信件表明，在他眼中，弗里茨·鮑爾、托維阿·弗里德曼和摩薩德都是一丘之貉，合謀從他那里套消息，卻無意向他支付合理的報酬。赫爾曼當然不可能知道當時正秘密發生著什么事情：有一小群人早就決定要由摩薩德來綁架阿道夫·艾希曼。[[119]](#_119_8)

\*\*\*

尋獲艾希曼的經過，是通過復雜的關系網取得成功的最佳范例。人類的活動只在極少數情況下是單一原因的，通常是許多不同參與者各顯神通之后所產生的累積效應。保羅·迪科普夫從沒打算用自己的行為來鼓勵鮑爾；托維阿·弗里德曼顯然也從未想過要危及追捕的成功；西蒙·維森塔爾無論如何都不肯放棄，一心只想把艾希曼送上法庭接受審判；伊塞爾·哈雷爾期待他的特勤機構展開一次聳人聽聞的行動，而且他和本-古里安同樣熱衷于緝捕“謀殺猶太人的頭號兇手”；本-古里安還必須心系德國與以色列之間的對話，因為兩國的貿易協定談判也涉及軍備供應；弗里茨·鮑爾則巴不得能在德國起訴艾希曼。最后之所以能夠擒獲艾希曼，并非是一連串事件所造成的結果，而是因為一系列的線索逐漸交織成一張羅網。但正如前面所說，這才是比我們事后回想時通常認為的更為普遍的人類活動模式。

與搜尋艾希曼不同，最后的逮捕反而顯得異常簡單。1959年12月6日，本-古里安在日記中寫道，他已責成伊塞爾·哈雷爾籌備一個摩薩德小組，確認阿道夫·艾希曼的身份，然后實施綁架。[[120]](#_120_7)弗里茨·鮑爾又一次前往以色列，要求迅速采取行動。此外，西蒙·維森塔爾11月時從以色列駐維也納大使艾策希爾·薩哈爾（Ezechiel Sahar）那里獲悉了當下人們對艾希曼的高度興趣之后，又運用自己所掌握的全部信息，整理出一份內容包羅萬象的卷宗。這一回薩哈爾能夠告訴維森塔爾，他的工作給以色列方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薩哈爾甚至還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進一步的問題。當維森塔爾讀到在2月5日去世的“阿道夫·艾希曼，退休公司董事”的訃告[[121]](#_121_8)，并且發現其兒媳薇拉·艾希曼再度出現于死者親屬名單當中的時候，他更迅速做出了反應。由于艾希曼或他的妻子也有一絲可能前往參加葬禮，他讓人拍下了所有吊唁者的照片。雖然艾希曼和妻子都沒有現身，但維森塔爾還是以這種方式獲得了艾希曼弟弟們的照片，畢竟他們兄弟的長相一直非常相像。[[122]](#_122_7)盡管伊塞爾·哈雷爾后來聲稱維森塔爾從未參加過摩薩德的行動，但他自己的探員茲維·阿哈羅尼卻證實，正是這些照片讓他不必只依靠艾希曼昔日當官時的照片，從而可以更好地辨認出1960年時的艾希曼。[[123]](#_123_7)哈雷爾在1960年2月派茲維·阿哈羅尼去了阿根廷。阿哈羅尼并非第一次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在1959年3月已經因為其他任務到過阿根廷，擁有了必要的知識和門路。[[124]](#_124_7)因此盡管艾希曼剛剛才從查卡布科搬進自己的新房子，他還是順利查明了艾希曼的行蹤。摩薩德行動小組隨即于4月底跟進。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當地重要聯絡人的配合下，他們成功地讓摩薩德從此揚名于世：1960年5月11日，“猶太人的頭號敵人”于返家途中在自己的房子外面遭到綁架。

艾希曼把被捕的責任歸在自己頭上。他“在阿根廷自由自在地生活了11年，感覺十分安全”，以至忽略了所有危險的跡象。[[125]](#_125_7)他是個“傻瓜”，沒有逃去圖庫曼、智利或亞洲——引人注意的是，他并未提到中東。在以色列，艾希曼從自己的角度詳細描述了綁架事件。[[126]](#_126_7)這些描述證實了綁架行動果真如摩薩德特工們所宣稱的那般發生，雖然在細節上間或有所出入。[[127]](#_127_7)艾希曼表示，幾個月來他發現自己一直受到監視。這并不是一個試圖否認自己被智取的人所想出來的托詞。盡管他不可能讀過摩薩德特工的報告，但艾希曼在札記中描述了搜捕過程中實際發生過的一些事件。例如他還記得茲維·阿哈羅尼試圖向其兒媳問話時的可疑舉動。他甚至注意到了輪流停放在他家附近的汽車。威脅已經變得如此明顯，以致艾希曼的兒子打算借給他一把槍。艾希曼的妻子則連連做到帶有天主教背景的噩夢，夢見丈夫身上披著一件血淋淋的白色懺悔服。[[128]](#_128_7)可是那個感覺自己在阿根廷頗受歡迎的人犯了一個關鍵錯誤。艾希曼在1961年寫道：“我沒有料到此事會演變成一場綁架行動，而以為那只是阿根廷警方的行動，以為就像他們對其他人做過的一樣，正在開展調查工作。”[[129]](#_129_7)對國家社會主義者而言，阿根廷警方是真正的朋友和幫手，永遠可以依賴他們提供的保護。

### 我沒有同志

讓我特別感到欣慰的是，

我的許多阿根廷朋友在我生日當天，

用鮮花表示他們還記得我。

——艾希曼在以色列的家書，1961年4月17日

當丈夫沒有如預期回到家里后，薇拉·艾希曼立刻向大兒子發出警訊。艾希曼的失蹤隨即引發一陣喧囂，讓人驚覺艾希曼一家已然成為阿根廷非法德國社區的重要部分。阿道夫·艾希曼于1960年5月11日遭到綁架，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棟房子里藏了十天之后，被送上飛往以色列的飛機。[[130]](#_130_7)直到大衛·本-古里安在5月23日公開宣布已經捕獲阿道夫·艾希曼，阿根廷沒有人知道艾希曼在哪里，盡管此事對不少人來說非常重要。薩斯基雅·薩森還記得有許多人突然跟艾希曼的兒子們一同出現在家里，以及隨后持續了許多天的混亂，因為有越來越多的人上門想要打聽消息或提供協助。孩子們雖已習慣了家中的社交生活，但當時的情況卻頗不尋常，因為沒有人關心他們聽到了什么，或者沒有聽到什么。薩斯基雅·薩森的母親在那些日子處于精神崩潰的邊緣。等獲悉艾希曼遭到綁架之后，她甚至離開家好幾個星期，因為她再也忍受不了那種緊張的氛圍以及她丈夫與整個事件的糾葛。[[131]](#_131_7)薇拉·艾希曼雖然聲稱從來不知道她的丈夫做過什么事情，卻表示她立刻就想到是猶太人把艾希曼綁走了。直到威廉·薩森和丈夫的其他朋友勸阻之后，她才打消了向警方報案的念頭。奧爾斯特·卡洛斯·福爾德納便是其中一位朋友，他有感于自己對艾希曼一家負有責任，于是立刻回應了他們的求助。[[132]](#_132_7)克勞斯·艾希曼后來說道：“父親最要好的朋友促使我們不得不冷靜地思考。”他們的父親說不定喝了太多酒，或者在出事故之后被送進了醫院。艾希曼的家人因為過于害怕猶太人的報復，起初完全沒考慮到或許還有這兩種可能性存在。“我們花了兩天時間在派出所、醫院和太平間找來找去，可是一無所獲。最后剩下的就是認識到：他們逮到他了。”克勞斯·艾希曼于是和薩森一同驅車前往梅賽德斯-奔馳見他父親的朋友，并把手稿藏在那里。[[133]](#_133_8)艾希曼最受信賴的故舊們紛紛前往市區各地，監控海港和火車站等交通樞紐。薩森負責監看飛機場，克勞斯·艾希曼即使在1966年也能毫不遲疑地回想起來。此外他們還為艾希曼一家組織了保衛工作。艾希曼的兒子不無驕傲地說，一個“庇隆主義青年團體”出動了多達300名成員來守護他們的房子。有些人甚至談到了諸如綁架以色列大使，或者攻擊大使館之類的武力報復行動。但福爾德納為那一家人安排了另外一個棲身處所，靜觀后續的事態發展。[[134]](#_134_7)

盡管從1960年5月11日綁架事件發生以來，搜尋艾希曼的行動便已密集展開，但本-古里安將近兩個星期后發表的演說還是震驚了全世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檔案顯示，就連該局也必須詢問那些所謂的“友好情報機構”，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尚難以斷定，也許是由于阿根廷的艾希曼同情者們在變化無常的局勢下表現得特別謹慎[[135]](#_135_7)，或者是因為線索遭到誤判。至少美國各情報機構、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以及德國外交部迄今對外公開的檔案當中，都沒有跡象顯示曾有人預料摩薩德將采取行動。盡管如此，德國駐布宜諾斯艾利斯大使與納粹圈子的密切聯系，還是讓人懷疑他自己并非毫無察覺。

何塞·莫斯科維茨（José Moskovits）——布宜諾斯艾利斯納粹迫害幸存者協會主席——回憶起德國大使館曾發生過的一個驚人事件。他非常確定，事情就發生在艾希曼被綁架“兩個月，最多三個月”之前。“有兩位先生從波恩過來，其中一人來自德國情報機構。他們要求調取關于艾希曼的檔案。”結果卻引發了一場爭吵，因為大使館一位熱心的員工在不久之前，才剛剛把那份檔案連同門格勒的相關檔案交給莫斯科維茨。于是相關檔案當時根本不在大使館。根據莫斯科維茨的講法，必須為此負責的人立刻被炒了魷魚。[[136]](#_136_7)

有證據顯示，何塞·莫斯科維茨當時確實在收集關于艾希曼和門格勒的資料，因為他是西蒙·維森塔爾在阿根廷的聯絡人，而且他與林茨那位先生的信件往來記錄了二人之間的信息交流。[[137]](#_137_7)此外他多年來一直不斷積極尋找門格勒的下落。莫斯科維茨出生在匈牙利，與阿根廷安全部門維持著良好的關系，并且在其他許多領域也非常活躍。他多次提起賠償訴訟，促成納粹時期遭到竊占的猶太人資產得到歸還，因而使幸存者協會成為一個令人不敢小覷的組織。莫斯科維茨對艾希曼被綁架不久前的情況念念不忘，還有另一個原因。茲維·阿哈羅尼和摩薩德小組曾向莫斯科維茨尋求協助，于是他利用自己的關系幫他們租下公寓，并且備妥了綁架時所需的車輛。[[138]](#_138_7)

莫斯科維茨與德國大使館的良好關系，甚至使他能夠帶茲維·阿哈羅尼進入使館內進行研究。阿哈羅尼第一次去是在1960年3月1日和4月7日之間，使用了一本以假名核發的外交護照，冒充以色列外交部財務部門的代表。[[139]](#_139_7)因此我們沒有理由懷疑莫斯科維茨的回憶以及他給出的日期。這個故事當中唯一令人不解的地方在于，大使為何會對那名允許幸存者協會正式代表前來查閱檔案的大使館員工做出如此強烈的反應。我們暫時先把大使館竟然有艾希曼的檔案放在一邊，畢竟1958年時它還聲稱沒有任何關于艾希曼的資訊，甚至在綁架事件發生幾個月后仍然宣稱館內只有一個人知道艾希曼是誰。更讓人煩擾的問題是，究竟是什么事情讓聯邦德國的代表們在1960年春天，千里迢迢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親自詢問有關艾希曼的消息。若只是為了當前的調查資料或者逮捕令的話，其實只需要看看西德現有的檔案就已經足夠了。總之他們來訪的時間非常值得注意。

1960年2月底，當茲維·阿哈羅尼前往阿根廷籌劃綁架行動時，聯邦德國正在準備一項極不尋常的棘手任務：康拉德·阿登納和大衛·本-古里安即將首度會面，為日后德國與以色列之間的關系邁出關鍵一步。1959年圣誕節過后，聯邦德國出現了一波反猶太行動，從猶太會堂被涂上納粹卐字符號開始，一直到猶太墓地遭到破壞。根據聯邦憲法保衛局的統計，截至1960年1月28日，總共發生了“470起事件”，除此之外“另有215起幼稚的涂鴉行為”。那在國外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以致聯邦政府急忙做出反應，迅速決定改變學校歷史課程的教學。[[140]](#_140_7)為了避免這個高度敏感的會面出現任何尷尬情況，或許真的有必要在阿根廷展開調查，畢竟關于艾希曼下落的消息出現得日益頻繁。一封由退役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阿道夫·艾希曼寫給聯邦總理的“公開信”，恐怕真的會在德國與以色列雙方會談的時候產生嚴重后果。

此外讓人無法視而不見的事情是，弗里茨·鮑爾已經越來越投入地尋找那些參與滅絕猶太人的兇手。盡管這位黑森總檢察長極為小心翼翼，但仍有跡象顯示，他試圖經由巴西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搜尋艾希曼的努力，并非完全未被察覺。本-古里安宣布艾希曼就在以色列之后不久，《明鏡周刊》便獨家發表了有關弗里茨·鮑爾第二名線人的消息，表示最早有關艾希曼下落的線索據稱來自一名“巴西猶太人”。[[141]](#_141_8)該文并且推測，以色列人之所以刻意選在這個節骨眼綁架艾希曼，是為了“向聯邦德國施加道德壓力，借此確保獲得更多的經濟援助”。那份來自漢堡的新聞雜志里，充滿了消息特別靈通的圈子提供的各種資料。從鮑爾在1959年年底敦促以色列采取行動時的聲嘶力竭，即可看出他非常害怕自己的調查進展會被發現。這位黑森總檢察長更千方百計施放煙幕彈，務必要讓聯邦德國外交部等機構疲于應付“將艾希曼從科威特引渡回國”的相關詢問，這種做法更暴露了鮑爾不信任的對象主要是誰。因此假如西德外交部、聯邦刑事調查局，或者聯邦情報局在1960年春天向鮑爾詢問艾希曼的下落，所得到的答案只會跟他們多年來的講法一模一樣：艾希曼在中東。

從后來的各種暗示中可以看出，有些人顯然害怕那名“猶太事務主管”會在德國和以色列進行敏感會談的這個階段現身——以色列人綁架他只是為了影響談判的結果，使之變得對自己有利。然而在另一方面，本-古里安與阿登納見面的時候會是什么感覺？他知道對艾希曼的審判近在眼前，而聯邦德國總理甚至對此一無所知！在紐約華爾道夫酒店舉行會談三天之前，茲維·阿哈羅尼還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回報說，他已經找到了艾希曼的新地址。

縱使對一名足智多謀的特工而言，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阿哈羅尼自己便親身體會到，從1960年2月和3月之交開始，即便獲得了德國大使館工作人員的鼎力相助，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調查工作還是變得越來越困難。艾希曼剛剛搬了家，而且新址不詳，因為他所挑選的那塊建地位于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區的無人地帶。阿哈羅尼在徹底的調查和運用了一些非常聰明的詭計之后，才終于找到了艾希曼的新地址。那個綽號“摩薩德大審判官”（Großinquisitor des Mossad）的人聲稱他給艾希曼的一個兒子準備了一份禮物，從而設下圈套。拉斐爾·埃坦直到今天仍然對阿哈羅尼贊不絕口。他十分確信，如果沒有阿哈羅尼的話，這條路恐怕走不下去。運氣和高超的技巧缺一不可，否則這次行動肯定無法成功。茲維·阿哈羅尼已經證明，就連一個與德國右翼社區毫無關系的以色列人也能找到艾希曼，但先決條件是有人真心想要找到他。

然而從德國大使館獲得的消息卻只是，使館雖然知道艾希曼的孩子們和薇拉·艾希曼（而且無疑還有檔案記錄可查）在阿根廷，卻沒有其最新地址。何塞·莫斯科維茨遇見的聯邦德國人員，當然不可能在如此短時間內查明艾希曼住在哪里。但問題是，他們接下來會如何繼續呢？顯然等到訪客離開大使館之后，那些人員并不覺得應該加快尋找的腳步。人們往往不認為別人比自己更加神通廣大，而正如隨后發生的事件所清楚顯示出來的，德方人員至少就是這樣看待以色列情報機構的。聯邦總理府如今針對為何不向研究人員開放艾希曼檔案一事所給出的理由之一，就是當時工作人員發表的某些模棱兩可的言論，可能會“嚴重損害或危及與外國公共機構的友好關系”。[[142]](#_142_7)我們根據1960年年初發生的種種事件，至少能夠領悟這段話中的含意。然而，這也使得全面解密聯邦情報局艾希曼檔案的必要性隨之提高。因為若不解密的話，一個可怕的懷疑就揮之不去，讓人認為官方根本無意積極尋找艾希曼，而且聯邦情報局的工作人員非但不信任以色列的同僚和黑森總檢察長，甚至還盡量設法阻撓他們的行動。

摩薩德的勝利顯然讓每個人都不知所措。1960年5月23日，艾希曼重新現身的消息伴隨著引起的慌亂迅速傳開。就在一日之間，報紙上突然充滿了艾希曼的照片和他所犯罪行的細節。由于長年下來圖書館和報社檔案中已經積存了豐富的資料，世界各地撰寫長篇報道都易如反掌。這個消息在西德政壇引起的不安顯而易見。卸任聯邦總統特奧多爾·豪斯在首度訪問以色列之際，對這則新聞感到震驚不已，但他仍相當鎮定地告訴媒體，艾希曼無疑將在以色列受到公正審判。波恩方面的反應則更加驚駭，康拉德·阿登納總理恨不得亡羊補牢地把艾希曼宣布為奧地利人，這樣德國就不用為他負責了。于是一個應對委員會迅速成立，試圖協調所有涉及此案的機構，從德國聯邦新聞局一直到聯邦憲法保衛局和情報單位都包括在內。他們更成立了“艾希曼工作小組”，不過目的當然不是為了要查明以色列監獄內的那個無名小卒究竟是誰。聯邦新聞局在極短的時間內安排了一場精心策劃的媒體宣傳活動。德國歷史博物館現任館長拉斐爾·格羅斯甚至找到證據，證明當時為求以最積極正面的形象展現年輕的聯邦共和國，還籌劃了一個名為《天堂和火爐》（Paradies und Feuerofen）的電影項目。[[143]](#_143_7)面對即將來臨的審判時的恐懼與無助，已被那個標題描繪得淋漓盡致。

雖然直到今天，聯邦德國各機構當時的相關檔案都只對外公開了一小部分，但即便從這批資料也可以看出，人們擔心會出現最壞的情況。艾希曼已經重新露面，而且隨之而來的不僅有過去的陰影。追根究底，最害怕這場審判的人包括所有那些曾經參與大屠殺，如今卻不受影響地在聯邦德國站穩腳跟的兇手。他們現在必須擔心自己的職業前程了。除此之外還有如今在警方、聯邦刑事調查局和聯邦情報局大展宏圖的昔日帝國保安總局成員。外交部工作人員也有類似的擔心。德國駐阿根廷大使館幾年前曾給艾希曼的兒子們簽發了使用他們真名的護照，這個事實更讓人擔心會產生惡果。尤其是布宜諾斯艾利斯大使館的人員竟然“無能”到在1958年收到非常具體的請求后仍然“無法”找到艾希曼，看上去令人難堪地簡直像是有意協助逃亡。可是大使館工作人員在收到指示之后，卻突然有辦法把關于艾希曼在阿根廷生活的大量卷宗送到波恩，這表明只要在阿根廷認真進行調查，就可以發現（或者早就發現了）多少事情。他們尷尬地保證，在綁架事件之前館內沒有人知道艾希曼是誰。然而這種說法現在只會顯得厚顏無恥，更何況大使館工作人員與艾希曼朋友圈之間的聯系已經再也無法隱瞞下去。德國大使能夠針對威廉·薩森交出一份洋洋灑灑的報告，而且報告中顯示，他非但與薩森相交甚稔，甚至還贊同薩森的許多政治觀點。這種卷入程度幾乎讓他的上司、外交部部長海因里希·馮·布倫塔諾（Heinrich von Brentano）大為光火，斥責道：“我們的一些駐外單位顯然未能針對這批國家社會主義的余孽（！）提出足夠報告，也沒有充分采取預防措施，明確地與他們保持距離。”[[144]](#_144_7)

布倫塔諾似乎并不擔心他在波恩的一些同事也屬于那種“余孽”。但不管怎樣，他針對維爾納·容克大使而發的直率言論全是白費功夫。1962年年底，容克仍將盡其所能阻止引渡大屠殺兇手約瑟夫·施萬伯格，并為此得到了康斯坦丁·馮·諾伊拉特的積極支持。當時已升任西門子阿根廷分公司負責人的諾伊拉特費盡口舌解釋說，那位猶太人隔離區的管理專家“已在公司任職長達12年之久”。把像他這樣的人移交給西德執法部門的想法，讓大使先生和西門子分公司負責人都“客觀上憂心忡忡”。他們預期施萬伯格在未來許多年內都將繼續被“迫切需要”，萬一離職“將給公司帶來巨大困難”。[[145]](#_145_7)那位創意十足的大使甚至提出建議，可以如何巧妙地運用阿根廷法律來拒絕德國司法單位的要求。期待對艾希曼的審判能夠扭轉風氣的愿望并未實現，人們反而從中學到了投機取巧的竅門。大使館所犯下的錯誤，成功地在1960年秋天被淡化成“缺乏專業知識所導致的溝通問題”，從而避免了一場公開的丑聞。唯一令人害怕的是，艾希曼可能對他在外交部的昔日同僚記憶猶新。沒有人能夠確定，他是否會在審判中忍不住把那些事情也講出來。因此那些人今后更有必要好好照顧他們在阿根廷的保護對象。

通過大量雇用昔日同志擔任公職來“去納粹化”的那些國家機關，也因為艾希曼掌握的知識而面臨問題。其中包括聯邦刑事調查局。該局不但有一名擔任總統常駐代表的前黨衛隊隊員，更招募了至少47名昔日骷髏頭單位的成員加入。[[146]](#_146_7)這種自己惹上身的麻煩當然也存在于情報機構。它們出于對布爾什維主義的恐懼，聘用了許多有著艾希曼非常熟悉的過去的人，其中就包括威廉·霍特爾、奧托·馮·博爾施溫[[147]](#_147_7)、弗朗茨·拉德馬赫，以及尤其重要的阿洛伊斯·布倫納——德國聯邦情報局幾個月前剛剛在德國駐雅典大使館的協助下，促成希臘當局將布倫納從通緝名單中刪去，因為聯邦情報局不想冒險失去它在中東最重要的聯絡人之一。[[148]](#_148_7)

跟上述這些被揭露的對象比較起來，甚至連阿登納的左右手漢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_488)之類的人物都顯得無傷大雅，因為人們早已習慣了民主德國對那批達官顯要的攻訐，隨時可將之貶低為東德（民主德國）的宣傳。從聯邦德國政府堅持拒絕向艾希曼提供法律援助一事即可看出，官方的神經有多么緊繃——雖然艾希曼身為德國公民，完全有權獲得法律援助。[[149]](#_149_7)政府寧愿容忍國家社會主義圈子在聯邦情報局知情的情況下秘密資助艾希曼的辯護，而讓以色列政府負擔艾希曼的律師“開銷”。[[150]](#_150_7)為了防范審判過程中出現太多具有破壞性的爆料，原先已同意提供給以色列的貸款被凍結“直至艾希曼審判結束”。[[151]](#_151_8)阿登納一直要等到1962年1月22日[†](#_489)才通知本-古里安，現在終于可以發放所承諾的貸款了。[[152]](#_152_7)

其他人還有更具體的擔心。例如路易斯·辛特霍爾策總是樂于告訴別人，他曾經幫助艾希曼逃離德國，甚至親自開車載著艾希曼一路來到奧地利邊界，如今卻突然被法院傳喚出庭作證。[[153]](#_153_7)辛特霍爾策持有的是偽造的聯邦德國身份證件，作證一事讓他覺得過于冒險，于是干脆逃避出庭，逃到慕尼黑躲了起來。他的一位熟人還告訴聯邦德國的情報單位，辛特霍爾策也曾在因斯布魯克咨詢過，希望能夠在當地投案，可是那里的人建議他，最早也要等到1960年9月才可以這么做。辛特霍爾策隨后如釋重負地告訴那位熟人，他可能會面臨五至七年的刑期，真正坐牢的時間則是二到三年。然而，事實證明他根本不必擔心艾希曼的供詞會牽連到他。盡管辛特霍爾策果真于審判開始之后，在1961年4月前往投案，但他僅被拘留調查了一年便獲得釋放，直到1989年去世為止都是自由之身。他雖然不再大肆張揚自己曾是那名臭名昭著的囚犯的司機，但終其一生都未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辛特霍爾策的妻子以“他的榮譽叫作忠誠”（Seine Ehre hiess Treue）[\*](#_490)為題刊登了他的訃告。旁邊昔日黨衛隊同志們獻上的悼詞明白顯示出，辛特霍爾策太太的那種寫法并非無心為之。[[154]](#_154_7)

艾希曼的綁架不只在德國引起恐慌。1960年6月初，羅馬也變得騷動不安。[[155]](#_155_7)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教廷大使翁貝托·莫佐尼（Umberto Mozzoni）前往拜訪阿根廷外交部部長，不光是為了討論阿根廷總統即將與教宗進行的會面。根據奧地利《人民意志報》（Volkswille）一位消息靈通的記者報道，梵蒂岡的外交人員曾呼吁一些聯合國成員國，應該要求將艾希曼遣送回阿根廷：“教廷當局通過半官方渠道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主張二戰時期的主要納粹分子不應再被起訴，因為他們現在已屬于捍衛西方社會秩序、防堵共產主義的勢力，而且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集結一切反共力量的必要。”那種觀點早在紐倫堡審判期間就已經受到鼓吹，并且被用作協助國家社會主義者逃亡的理由。如今之所以又信誓旦旦地宣揚國際法和對抗“東方野蠻行徑”的斗爭，那是因為每個人都將很快知道，艾希曼獲得過紅十字會護照，以及天主教神父為這名危害人類罪犯開列過品行證明。報紙上刊出的第一篇詳盡文章，就已經闡述了與胡達爾主教和其他停留站有關的細節，并且說明了他們與國際紅十字會的合作詳情，以及諸如南斯拉夫神父克魯諾斯拉夫·德拉加諾維奇（Krunoslav Draganovic）之類可疑人物所扮演的角色。人們開始談論“梵蒂岡護照”，沒有人能夠預料艾希曼知道總共多少種“梵蒂岡證件”。

艾希曼在阿根廷的好朋友們之前曾為了尋找他的下落而盡心盡力，現在卻都避之唯恐不及。當警方前去詢問艾希曼的旅途同行人及其在查卡布科街公寓的擔保人“佩德羅·蓋勒”時，卻遇見了奧爾斯特·卡洛斯·福爾德納。福爾德納幫大吃一驚的警員開了門，并喋喋不休地打開了話匣子。他表示因為申請破產的程序曠日持久，自己仍然是“卡普里”公司的負責人。此外他同時認得蓋勒和艾希曼。警方的記錄指出：“福爾德納宣稱他直到5月26日都不知道里卡多·克萊門特的真實姓名，而且該人于1953年就已經辭去了在‘卡普里’的職務。……當天早上十點鐘的時候，一位完全絕望的陌生年輕人來到他位于翁布街2929號（Ombú 2929）的住宅，自我介紹是克勞斯·艾希曼，所謂‘里卡多·克萊門特’的兒子。”福爾德納非常合作，不假思索地告訴了警方庫爾曼和艾希曼抵達阿根廷的確切日期，還表明他們是搭乘“喬凡娜C”那艘輪船橫渡大西洋的。但似乎沒有人注意到，如此一來他等于已經承認了自己協助過納粹逃犯。[[156]](#_156_7)有些人甚至公開劃清界限。例如，當時在漢堡南部設有一個信箱的奧托·斯科爾策尼，曾在新聞界將他描述為艾希曼的朋友時發表否認聲明，并且威脅要對任何試圖做出此類暗示的人采取法律行動。[[157]](#_157_8)與福爾德納一樣，約翰·馮·萊斯也告訴警察和新聞界，他跟艾希曼只是泛泛之交。艾希曼的雇主、同事和朋友則宣稱——多半都在撒謊——他們從來不知道這個里卡多·克萊門特到底是誰。

即將發生的事件所引發的惴惴不安，也產生了一些滑稽可笑的花絮。以色列宣布即將審判艾希曼兩個星期之后，一名男子突然出現在美國中央情報局位于法蘭克福的聯絡辦公室，聲稱自己一直為中情局工作，因此有權得到豁免。那人是深受艾希曼敬重的利奧波德·馮·米爾登施泰因，艾希曼在黨衛隊保安局II 112猶太事務部門的第一位上司。米爾登施泰因顯然害怕那個因為他而開始對“猶太人問題”興味盎然的人，將會開口揭露真相。然而中情局卻把米爾登施泰因視為無足輕重，因而拒絕提供任何特別保護。有消息指出，中情局與他的最后一次接觸是在1956年，他定居中東并且試圖支持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Gamal Abdul Nasser）對抗以色列的時候。[[158]](#_158_7)艾希曼其他昔日的戰友們顯然也迫不及待想要展開行動。美國中情局在1961年年初接獲的消息，指向了被尊為“墨索里尼解放者”的奧托·斯科爾策尼。有謠言指出，他昔日的戰友們雖已擬定好解救艾希曼的計劃，但由于此事過于困難，他們現在轉而打算殺死那名關押在以色列的囚犯。[[159]](#_159_7)從檔案中很難看出究竟哪件事會讓美國人更加感到困惑：是竟然存在如此荒謬絕倫的計劃，還是他們在德國聯邦情報局的同僚們確實相信有這樣的計劃？但無論如何，那則消息讓我們對納粹老英雄們晚上聚在一起都在空談些什么東西有了清晰的印象。[[160]](#_160_8)

艾希曼被綁架一事，攪亂了昔日黨衛隊成員和其他種族屠殺兇手的生活，而且其嚴重程度甚于1945年5月戰敗以來的任何事件，因為它永久改變了那些人彼此打交道時的氣氛。逍遙自在的流亡歲月以及老同志之間理所當然的信賴關系，一下子都成了過去。對原先不怎么清楚猶太人大屠殺的人而言，新的認識驅散了任何懷舊之情。其他人則突然再次成為流亡者，因為他們終于意識到，重返正常生活已是不可能的事情。約瑟夫·門格勒情緒激動地在日記中寫道：“現在他們明白我是對的了。”他隨即就在1960年10月繼續遷往巴西。[[161]](#_161_7)戰爭結束15年后，那些人突然記起，他們必須小心翼翼地不讓別人注意到自己。他們只有很短的時間來思考自己的對應策略。

以色列為了盡可能推遲其違反國際法的做法所不可避免地引發的爭論，于是把中東的舊調拿來重彈，散播假消息表示艾希曼正被囚禁在一個中東鄰國。

但艾希曼此前真正的藏身地點很快便被曝光，從那時起阿根廷便擠滿了想要查明艾希曼生活細節的記者。威爾弗雷德·馮·奧芬終于找到機會展現他關于杜勒出版社圈內人的微薄知識。福爾德納則接受了他的朋友、《法蘭克福匯報》記者弗里茨·奧托·埃勒特的采訪，以致梅賽德斯在阿根廷的負責人威廉·莫塞蒂（William A.Mosetti）急忙極力要求埃勒特至少不要透露公司名稱。對其他那些非常熟悉艾希曼的人來說，唯一能做的事情就只是保持低調。[[162]](#_162_7)薩森的小圈子分崩離析了。如今既不可能再繼續參加有關往日時光和歷史形象的大范圍討論，又不可能在社會上出人頭地，甚至更不可能公開進行希特勒冥誕的慶祝活動。1965年時，曾在里加參與屠殺猶太人的拉脫維亞人赫貝茨·丘庫爾斯（Herberts Cukurs）在蒙得維的亞（Montevideo）遭到槍殺，這個消息更讓南美洲的老同志們回想起自己的恐懼。[[163]](#_163_7)

只有一位住在阿根廷的朋友，拿出了他過去生活中勉強能夠曝光的一小部分來展開攻勢：威廉·薩森。根據阿根廷警方的一份報告，兩名身穿便服的男子在6月6日闖入艾希曼家中，把所有東西都拍攝下來。[[164]](#_164_7)就在前一天，薩森剛剛說服薇拉·艾希曼與《生活》雜志簽訂合同并提供照片。顯然，阿根廷警方所觀察到的其實是一次秘密造訪，而非非法入侵。匆匆人去樓空的那棟房子內的照片，幾天后就出現在了德國《明星周刊》與荷蘭《人民報》的文章當中，而且薩森顯然也向他們出售了摘錄自“阿根廷文稿”的材料。[[165]](#_165_7)從那時起，這名前任武裝黨衛隊戰地記者就以調查記者的身份露面，推銷他那千載難逢的故事。薩森厚著臉皮聲稱，他真正的朋友們一直以美國化方式昵稱他這個極力反美的人“威利”（Willy）。此外他還不厭其詳地向家人解釋，實際上自己從來都不喜歡將近一年里每逢周末就到他家做客的那位客人。[[166]](#_166_7)

隨著以色列的審判在媒體的密集報道中日益逼近，為什么世上沒有任何人想跟艾希曼牽連在一起，也變得越來越顯而易見。各種事實已逐漸浮出水面。人們首度開始討論它們，而非逐項加以辯駁。然而艾希曼的出庭受審，同時也為歐洲史上最驚人和最成功的一次耍賴行動提供了機會：站在玻璃隔間內一張小桌子后面的不起眼男子、堆積如山的文件，以及滿口讓人難以理解的德語——怎么可能會是什么重要人物呢？艾希曼把自己形容為坐在辦公桌后面的人，于是從未踏進其辦公室的昔日同事們得以冠冕堂皇地聲稱從未見過他本人。沒有人認得機器上的“一顆小齒輪”，尤其那些假裝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更是如此。這種撇清關系的策略在20世紀60年代大獲成功，而直到今天都還能在幾乎每一本關于猶太人大屠殺的書中見到這種策略的事實讓人感到驚恐。我們只需瞧一眼1960年5月24日的報紙即可看出，當記者們使用諸如“最終解決方案的經理人”之類的大標題來撰寫艾希曼的專文時，預設其讀者擁有了何種程度的相關知識。[[167]](#_167_7)早在審判開始之前，艾希曼的名字就已經成為一個無需進一步解釋的象征。而我們直到今天都還在向世人解釋，為什么1960年之前沒有人知道這個人，可他的被捕卻引發了從紐約到華沙、從波恩到特拉維夫的情緒震蕩——這種情緒反應只有在世界歷史瞬間變得清楚，無需進一步說明解釋的時候才會出現。

俗話說“患難見真情”，然而艾希曼卻無法像預期的那樣找到真朋友。偏偏就是那些仍然不屈不撓堅守國家社會主義理念的人，既無法也不愿與這位同志產生任何關聯。極右派的報刊非但沒有為艾希曼挺身而出，反而異乎尋常地與德國輿論界一個鼻孔出氣，強調并非德國人，而是許許多多個艾希曼偷偷摸摸地殺害了600萬猶太人，而那當然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嚴格說來，新納粹運動從此就像薩森、弗里奇和阿爾文斯萊本等人在1957年所計劃的那樣，開啟了恣意褻瀆事實的過程。他們努力試圖洗白德國人、希特勒和德意志國家，宣稱阿道夫·艾希曼連同他的同僚們并不屬于其中。如今的口號是“犯罪無祖國”[[168]](#_168_8)，而且祖國只愿意承認它的英雄們。正如大規模謀殺歐洲猶太人的行動在犯下罪行的國度很少被稱為“滅絕猶太人”（Judenvernichtung），而通常叫作“大屠殺”（Holocaust）或“浩劫”（Shoah）一般，在阿根廷的那些人徑自把這種犯罪行為扭曲成一種“進口商品”，被人強加給了不明就里的德國百姓。那些人和希特勒一樣，什么都不知道，因此事情根本與他們無關。在艾希曼審判開始時，《國族歐洲》月刊的一位匿名作者帶著如釋重負的興奮，引述了艾希曼所講的一句話，因為那對他來說已經解釋了一切：“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希特勒）本人。”艾希曼從來沒有親眼見過“元首”本人，猶太人和德國人也都不知道艾希曼是誰，因此艾希曼聲稱他是遵從元首指令的說法就值得懷疑了，而且“料想艾希曼先生也不敢訴諸德國百姓”。[[169]](#_169_7)但作者在這一點上也錯了，幫極右派雜志撰稿的那些德國人為求小心起見，已不再聆聽審判。使用筆名者的數目顯著增加了，因為作者們比他們所愿意承認的還要害怕。

前國防軍士兵佩德羅·波比耶辛曾經表示，“當時沒有人為他流淚”，但此說法并不完全正確。艾希曼被處決之后，在遙遠的巴西，約瑟夫·門格勒“心情非常沉痛地”撰寫悼詞，向他的那位同志致以最后的哀思與敬意。這不僅是為了感謝艾希曼既沒有背叛門格勒，也沒有背叛他在阿根廷遇見的其他任何人。對門格勒而言，艾希曼的死刑既有個人意義也有歷史意義：“我過了好幾天才知道6月1日發生的事情。它沒有讓我感到意外，卻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犧牲有意義嗎？這令人忍不住想要進行類比，但隨即震驚于過去2000年來的歷史現實，于是又放棄了那個打算。他自己的民族卑鄙地背叛了他，這對他來說想必是最沉重的負擔。這整個事件的問題核心或許便在于此。總有一天德國人會為此感到羞愧！要不然的話，他們就根本不會為任何事情感到羞愧了！”[[170]](#_170_7)

莫非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成了“德國的耶穌”？門格勒童年的天主教經歷并不能完全解釋這個駭人聽聞的想法。但有兩件事情是顯而易見的：門格勒比所有在阿根廷的納粹黨人都更了解艾希曼，而且門格勒明白他們二人之間存在著某種共性。德國人顯然不想和艾希曼產生任何瓜葛，而且自從1959年對門格勒的逮捕令發出以來，他們對門格勒的態度也一樣。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德國百姓就像門格勒和艾希曼一樣，陷入了對國家社會主義的狂熱。若是沒有他們，門格勒和艾希曼都不可能變成他們后來成為的那種人。他們二人不但把自己看成元首命令的執行者，更是在為全體德國百姓執行任務，如今他們卻無法從德國百姓那里得到自認為應得的尊重。這個民族已經不想再跟他們扯上任何關系了。艾希曼的擔憂與日俱增，他勸告自己的家人說：“暫時不要經常去德國。我覺得你們最好還是小心為妙。”[[171]](#_171_7)

艾希曼在以色列的總結陳詞中指出，他覺得自己是代表別人站在法庭接受審判。艾希曼無疑是一個理想的替身。盡管他作為個人所犯下的深重罪行，是人世間的審判無法完全追究的，但這并不足以否定艾希曼那種感覺的正確性。兇手們所屬的那個民族巴不得讓事情看起來就好像艾希曼獨自殺害了600萬猶太人。艾希曼希望能夠當眾上吊，以免除“德意志青年”的罪責。他的提議雖然荒誕，卻揭示了審判的關鍵問題。以色列希望的是一種精神凈化，一種對集體罪行的集體反思。甚至連艾希曼也意識到，他那扭曲的“代贖性的死亡”（Sühnetod）可讓其可憐處境充滿悲愴情懷與英雄主義，而那些作惡者、共謀者和心甘情愿的支持者，卻一心一意只想擺脫他們的替罪羊。門格勒試圖安慰自己，于是寫道：“神圣的祖國，你的許多子孫讓你處境維艱！但我們不會離開你，我們將永遠、永遠愛你！”[[172]](#_172_7)艾希曼則在行刑前寫給家人的告別信中表示：“讓歷史來做出判決。”[[173]](#_173_7)艾希曼和門格勒對現實已經完全失去了指望。

[\*](#_475) 書名中的“Das Amt”指的是“Das auswärtige Amt”（聯邦德國外交部）。該書全名為《外交部及其過去：德國外交官在第三帝國與聯邦共和國》（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譯注

[\*](#_476) 指的是Klement被寫成了Clement。——譯注

[\*](#_477) 這是“國際奧斯維辛委員會”的法文名稱。——譯注

[\*](#_478) 巴特戈德斯貝格位于波恩，外國派駐聯邦德國的大使館在1999年之前集中在這里。——譯注

[\*](#_479) 科威特當時仍為英國的“保護國”，1961年6月19日才獲得獨立。——譯注

[\*](#_480) 格洛布克曾擔任阿登納時代的聯邦總理府主任（1953-1963）。他從前是納粹德國內政部的高級官員和法律專家，參與制定了各種反猶太法律，并曾批準艾希曼將兩萬名希臘猶太人運往死亡集中營。《生活》雜志于1960年11/12月刊登薩森提供的艾希曼文稿之前，美國中情局曾要求該雜志刪除任何可能涉及格洛布克的部分。東德最高法院在1963年舉行“格洛布克審判”（Globke-Prozess），于缺席審判的情況下判處他“終身監禁”。——譯注

[†](#_481) 艾希曼在1961年12月15日被判處死刑。——譯注

[\*](#_482) 套用了納粹黨衛隊的座右銘：“我的榮譽叫作忠誠”（Meine Ehre heißt Treue）。——譯注

[[1]](#_1_10) Frankfurter Allgemeine, 4.4.1957.但其他規模較小的報紙，如《漢堡晚報》（Hamburger Abendblatt）和《阿根廷日報》，也在同一天報道了“前黨衛隊中校遭逮捕”（“Ehemaliger SS-Oberstleutnant verhaftet”）。

[[2]](#_2_11) 迄今已經重新發現了洛塔爾·赫爾曼的下列信函：致弗里茨·鮑爾，1960年6月25日（AdS Bonn, Nachlaß Fritz Bauer, mit Dank an Christoph Stamm - gedr. b. Wojak, Eichmanns Memoiren ..., A. o., 27 f.）。致弗里德曼，1959年9月17日、1959年11月5日、1960年3月28日、1960年4月27日、1960年5月26日、1960年5月30日、1961年5月1日、1961年5月26日、1971年5月14日、1971年6月2日。致本—古里安，1961年5月20日。以上均見Tuviah Friedman , Die “Ergreifung Eichmanns”: Dokumentarische Sammlung.Haifa, 1971，其中也包括弗里德曼與埃爾溫·許勒的信函往來。其余信件見路德維希堡聯邦檔案館，BArch Ludwigsburg, Sammlung Zentrale Stelle III/24。

[[3]](#_3_10) 鮑爾生前，1968年巴黎出版的該書法文版（Les Vengeurs），以及美國出版的英文版（The Avengers）都沒有出現相關文字。德文版則根本沒有發行。關于巴爾—祖海爾的美聯社專訪，參見“Führte Hinweis aus Frankfurt auf Eichmanns Spur? ”, Frankfurter Rundschau,12.2.1969.關于以色列境外的書評，參見Neuen Zürcher vom 19.2.1969 “neue Version über die Fahndung nach Eichmann. ”

[[4]](#_4_11) 英譯版為：Isser Harel, 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 The Capture of Adolf Eichmann. London 1975。德譯版Das Haus in der Garibaldi Straße. Frankfurt a. M. 1976有一部分與英譯版和希伯來文版明顯不同。從1997年的英譯版開始，書中大多數化名都已經公開。

[[5]](#_5_11) 洛塔爾·赫爾曼寫給托維阿·弗里德曼的信函，1971年6月2日。

[[6]](#_6_11) Carl Schmitt, Hans-Dietrich Sander, Werkstatt - Discorsi. Briefwechsel 1967-1981. Schnellroda 2008, 247 f.

[[7]](#_7_11) 阿哈羅尼進行了詳細的分析，發現哈雷爾把虛構出來的彼得·馬爾金與艾希曼的對話展現為歷史事實。但每個參與者都知道，他們二人沒有共同語言，根本不可能彼此交談。Aharoni, Dietl, Der Jäger..., A.o., 227f.

[[8]](#_8_10) 2010年時，雷蒙德·萊伊在其紀錄片《艾希曼的末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克勞斯·艾希曼盡管身患疾病，卻在一張照片上認出了洛塔爾·赫爾曼的女兒，并對那位年輕時的女朋友做出正面反應。可惜艾希曼家人發表的其他聲明皆不可考。但如果一個人仍然認為某位朋友背叛了自己的父親，很難想象還會對她有好感。

[[9]](#_9_10) 克勞斯·艾希曼1936年出生于柏林，西爾維婭·赫爾曼1941年出生于布宜諾斯艾利斯。

[[10]](#_10_11) 感謝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娜塔莎·德·溫特，針對赫爾曼一家的生平資料和生活條件所做的杰出研究。此外我特別要感謝雷蒙德·萊伊、雅斯明·格拉芬霍斯特（Jasmin Gravenhorst, docstation, Hamburg）、帕特里夏·施萊辛格（Patricia Schlesinger, NDR），因為《艾希曼的末日》那部文獻紀錄片的腳本不僅咨詢了專業意見，而且允許我隨時獲得他們所有的研究結果。

[[11]](#_11_9) 赫爾曼寫給弗里德曼的信函，1971年6月2日。其中也包含一些生平資料。

[[12]](#_12_9) 在達豪集中營的囚犯數據庫中也可以找到赫爾曼的名字。感謝達豪紀念館的迪爾克·里德爾（Dirk Riedel）先生提供詳細信息。根據他提供的資料，赫爾曼的說法基本上與現存文件相吻合。

[[13]](#_13_9) 即便是聲稱擁有那張照片的人，到今天也沒有找到它。

[[14]](#_14_9) 艾希曼被綁架之后，赫爾曼寫給鮑爾的信件，1960年6月25日。

[[15]](#_15_9) 有人認為時間是1957年8月27日，但赫爾曼自己只提到了一封1957年的信。該信的原件至今仍未找到。根據沃亞克的講法，鮑爾把那封信交給了以色列外交官費利克斯·希納爾（Felix Shinnar）。Irmtrud Wojak, Fritz Bauer. 1903-1968. Eine Biographie. München 2009, 286.但此說法有些問題，因為（同樣按照沃亞克的講法）鮑爾最初沒有透露線人的名字，而赫爾曼所有其他現存的信件都使用了印有獨特信頭的信箋。丹·塞頓的影片《獵捕艾希曼》（Dan Setton , The Hunt for Adolf Eichmann）中出現的“文件”絕對不是原件，因為它有一個事實錯誤，片中的“赫爾曼”自稱為“半猶太人”，而他按照納粹的標準其實是“全猶太人”。赫爾曼后來的信件顯示他自己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

[[16]](#_16_9) 參見阿諾德·布赫塔爾遺稿中有關新聞事件的部分（Institut für Stadtgeschichte, Frankfurt a.M., S1/138）。亦參見Der Spiegel v. 16.10.1957: “Der Mann muß weg”.

[[17]](#_17_9) 引自Irmtrud Wojak, Fritz Bauer ..., A. o.: HHStA Wiesbaden 461, 32 440, File 2.

[[18]](#_18_9) 1957年7月1日，引自Schneppen, Odessa ..., A. o., 162 f .可惜作者不總是按照學術標準來引用資料，但他取得檔案資料的能力無疑非常突出。

[[19]](#_19_9) 艾希曼在《我的逃亡》第28頁提到了此事，而且責怪自己因為聽到這樣的消息而變得過于不小心。

[[20]](#_20_9) 首開其端者為Allgemeinen Wochenzeitung der Juden mit dem Artikel “Terror und KZs am Nil”vom 12.7.1957; vgl. weiterhin Frankfurter Illustrierte, 17.8.1957, “SS-Treffpunkt Kairo”.

[[21]](#_21_9) Kai Jensen, “SS-Treffpunkt Kairo - eine dicke Ente!”, erscheint außerdem in Die Brücke,Auslandsdienst, Folge 18, IV. Jahrgang 1957, 6-8.這篇文章吹毛求疵地駁斥了所有可能的傳言，所引用的細節顯然是為了轉移讀者注意力，使他們忽略真正躲在中東的國家社會主義者。

[[22]](#_22_9) 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

[[23]](#_23_9) 伊塞爾·哈雷爾所稱的日期為1957年11月6日，依爾姆特魯德·沃亞克則認為是1957年11月7日（Irmtrud Wojak, Fritz Bauer ..., A. o., 295）。

[[24]](#_24_8) Hanna Yablonka, The State of Israel vs. Adolf Eichmann. New York 2004, 15.

[[25]](#_25_8) Dieter Schenk, Auf dem rechten Auge blind. Die braunen Wurzeln des BKA. Köln 2001,302.

[[26]](#_26_7) 洛塔爾·赫爾曼的第二任妻子在2009年接受采訪時表示，她在丈夫死后把他所有的文件都寄到了德國，以便由檔案館加以保存。可惜老太太已經想不起來到底把郵袋寄給了誰，她只記得從來沒有收到過回復。

[[27]](#_27_6) 赫爾曼寫給鮑爾的信函，1960年6月25日。

[[28]](#_28_6) Wojak, Eichmanns Memoiren, 30.

[[29]](#_29_6) 至少這是艾希曼的家人直到今天都還在講述的故事。感謝赫爾穆特·艾希曼提供相關細節。

[[30]](#_30_6) 梅爾提希曾經是納粹黨員。Uki Goñi, Odessa ..., A. o., Kapitel Eichmann, 276-298 und Holger Meding, Flucht vor Nürnberg? Köln, Weimar, Wien 1992, 162 f.艾希曼自稱開始替梅爾提希工作的時間為1958年1月31日。參見艾希曼的梅賽德斯—奔馳阿根廷公司求職申請，復印本見Schneppen, Odessa ..., A. o., 160 ff.

[[31]](#_31_6) 埃伯哈德·弗里奇（1921年11月21日出生于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戶口登記卡，列出的申請日期是1958年3月6日，職業為“出版商、旅館門房”。感謝薩爾茨堡市檔案館的彼得·克拉默爾先生提供協助。

[[32]](#_32_6) 這一期雜志雖然被標示為1957年第12期，卻提到了1958年3月。《路徑》的出版從來不像發行編號讓我們相信的那樣有規律。

[[33]](#_33_6) 宣布即將進行審判后不久，弗朗索瓦·熱努便與艾希曼一家取得了聯系。他用自己特有的方式結合了商業意識和對遇難同志的責任感，既想取得艾希曼故事的版權，同時又愿意資助艾希曼的辯護。本—古里安向以色列國會發表演說幾天之后，他便前往林茨，在當地艾希曼親人的家中與弗里奇會面。Pierre Péan, L’extrémiste: François Genoud, de Hitler á Carlos. Paris, 1996, 257.

[[34]](#_34_6) 感謝康斯坦茨市檔案館的安妮—瑪麗·薩納（Anne-Marie Sana）和于爾根·克勒克納（Jürgen Klöckner）提供精確信息。可惜聲明和文件的副本已不復存在。薩森給出他在慕尼黑的新住址為霍恩斯陶芬大街12號。

[[35]](#_35_6) 英格·施奈德指出，密普·薩森的堅定立場甚至對她自己產生了負面影響。因為沒有德國的身份證件便無法在德國工作，而英格·施奈德曾在同年夏天為她提供了留在不來梅的機會。

[[36]](#_36_7) “阿根廷文稿”傳播的經過否定了薩森與德國聯邦情報局之間的任何接觸。聯邦情報局的薩森抄本拷貝顯然并非來自薩森本人。參見本書第七章《余波蕩漾》。

[[37]](#_37_6) 薩斯基雅·薩森和弗朗西斯卡·薩森2009年與作者的信件往來；2009年格爾德·海德曼與作者談論他1979年訪問薩森的情形。聯邦憲法保衛局有關薩森和魯德爾的文件至今仍未對外公開。二者應該都包含了這些資料，因為薩森曾經前往拜訪魯德爾。謹在此感謝聯邦憲法保衛局提供了極為簡短但相當有用的信息。在德國聯邦行政法院的文件中（BVerwG 7A 15.10, Saure gegen BND），薩森有關蓋倫組織和“G將軍”的言論并未遭到涂黑，可見那是薩森的信口開河。至于1959年有關薩森的文件為何會出現在1960年以前的艾希曼檔案里面，則是較難回答的問題。參見上述文件的補充文件BND Akten 100 470, 9-13。

[[38]](#_38_6) 67號錄音帶，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10B, 1:03:30。

[[39]](#_39_6) 克勞斯·艾希曼接受《快客雜志》的采訪，1966年1月2日。

[[40]](#_40_6) Eckart Conze, Norbert Frei, Peter Hayes, Moshe Zimmermann,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München 2010, 608 f.

[[41]](#_41_6) 弗里奇被拒絕入境的說法無法證實。巴伐利亞內政部沒有相關檔案，因為文件保存期限已過（2010年12月27日的來信）。聯邦憲法保衛局則只能確認，該局擁有一份關于弗里奇的檔案。弗里奇的英雄故事版本只出現于德魯費爾出版社《德國紀年，國家事件年鑒》的訃告。那些右翼團體把弗里奇看成一個“偉大的德國人”，參見Deutsche Annalen,Jahrbuch des Nationalgeschehens, Jg. 4, 1975, “Deutsche Abschiede 1974”.

[[42]](#_42_6) 艾希曼審判，2JS178/56。根據弗里奇從1960年開始寫給羅伯特·塞爾瓦蒂烏斯的信件，他用盡了所有法律手段試圖推翻呂訥堡地方法院的判決，直到最后被卡爾斯魯厄聯邦法院判決上訴失敗為止。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BArch Koblenz AllProz6，散見于Bestände 253和Abteilung 4。

[[43]](#_43_7) 當我告訴烏基·戈尼，艾希曼在馬德普拉塔有過哪些聯系人時，他完全嚇了一跳。因為他沒想到艾希曼竟然能夠負擔得起在那個昂貴旅游勝地的開銷。艾希曼在他從監獄寄出的信件中，曾經感激地提到了當地的朋友和住處。

[[44]](#_44_7) 艾希曼在1960年6月1日如此告訴他的審訊官阿夫納·萊斯。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當代史檔案館，ETH Zurich, NL Less, 4.2.3.2。

[[45]](#_45_6) 嚴格說來，我們對米勒在此之前的生平也所知有限。大多數講法都立基于艾希曼的說辭（可惜并非總是標明出處），而他的說辭是出了名的不可靠。Andreas Seeger, “Gestapo Müller”: Die Karriere eines Schreibtischtäters. Berlin, 1996一書的資料來源，清楚顯示了這本傳記多么依賴艾希曼。

[[46]](#_46_6) “阿道夫·艾希曼（201-047132）生于以色列，后來成為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據悉他從1952年開始一直化名克萊門斯居住在阿根廷。有傳言指出，盡管他必須對猶太人的大規模屠殺負責，但他現在生活在耶路撒冷。”（Report 19.3.1958, NA, RG 263, CIAName File Adolf Eichmann.）

[[47]](#_47_6) 感謝聯邦憲法保衛局允許我閱讀和引用以下來自艾希曼檔案的文件。關于這份BVerwG 7A 15.10, Saure gegen BND檔案，參見本書第七章《余波蕩漾》。

[[48]](#_48_6) 聯邦憲法保衛局致外交部的公函，主旨：卡爾·艾希曼，阿根廷，聯系：無。1958年4月11日，保密文件（機密等級在1971年4月下調為“限公務使用”）。

[[49]](#_49_6) 這方面的謠言數不勝數。例如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在科爾多瓦的住宅據說屬于弗里奇所有，但我無法查證此事。

[[50]](#_50_6) 相關文件已被聯邦憲法保衛局歸類為“可歸檔”，這個好消息表示它們即將在未來幾年移交給聯邦檔案館。雖然確切的時間仍然無從得知，不過我還是必須感謝聯邦憲法保衛局撥冗回答我的問題（聯邦憲法保衛局2010年12月3日和20日給作者的來函）。

[[51]](#_51_6) Michael Frank, Die letzte Bastion. Nazis in Argentinien. Hamburg 1962, 108.

[[52]](#_52_6) 外交部，1960年7月27日，見Schneppen, Odessa ..., A. o., 164.

[[53]](#_53_6) ebd., 163.

[[54]](#_54_6) 外交部1958年7月4日致聯邦憲法保衛局的公函，出處同上。

[[55]](#_55_6) 1954年8月11日聯邦德國駐布宜諾斯艾利斯大使館致外交部的公函（212, Nr.2116/54）。外交部接著在1954年8月25日將消息轉寄給聯邦憲法保衛局（306 21202/5.20973/54）。詳細引用于1958年8月21日的回函草稿，詳見下一注釋。

[[56]](#_56_7) 聯邦憲法保衛局給外交部的回函共有兩份草稿，讓我們得以重建其決策過程。第一份草稿的最后一個句子仍然請求對方向科隆報告任何有關艾希曼的進一步發現，但已經被用筆劃掉。第二份草稿完全沒有提到這一點，只有“主旨：憲保局致外交部，1958年8月21日”、對草稿的手寫更正和補充，以及“保密文件”（機密等級已在1974年4月下調為“限公務使用”）。這封回函草稿還包含了一些關于弗朗茨·拉德馬赫的評論，但無法確定該函是否的確以這個形式寄出。

[[57]](#_57_7) Schneppen, Odessa ..., A. o., 136.

[[58]](#_58_7) 原始資料集由慕尼黑當代歷史研究所編輯發行。我們只能希望，1954-1961年的空缺能夠盡快填補起來。本書雖然使用了剛出版的1962年資料集，只可惜限于原材料的選擇，這里的分析過于簡略。

[[59]](#_59_6) 莫爾和他的前任，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擔任大使直到1963年的維爾納·容克，彼此十分熟悉。二人在1936年任職于駐南京大使館之際即已相識。關于二人的生平信息，可參考Biographisches Handbuch des deutschen Auswärtigen Dienstes 1871-1945. Band 2 und 3,Paderborn u.a. 2005 f.盡管其中缺少批判性的評論，也有一些空白和輕描淡寫。

[[60]](#_60_6) Götzen, 360, AE: 40.莫爾1941年2月26日寫給帝國保安總局的信函曾被用作起訴文件之一。

[[61]](#_61_7) 胡伯特·克里爾接受采訪時的說法。Dan Setton, Josef Mengele: The Final Account. SET Productions, 2007.

[[62]](#_62_6) 《巴黎競賽畫報》的書面問題，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2。

[[63]](#_63_6) 艾希曼在以色列的筆記“Vorgeschichte der Enführung”, 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3。

[[64]](#_64_6) 薇拉·艾希曼接受《巴黎競賽畫報》的采訪（1962年4月29日），以及向編著者祖德霍爾特博士做的說明。根據祖德霍爾特博士2009年提供的信息，以及德魯費爾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阿根廷文稿”《我，阿道夫·艾希曼》所收錄的薇拉·艾希曼宣誓聲明。此外亦參見本書第七章《余波蕩漾》。

[[65]](#_65_6) 克勞斯·艾希曼接受《快客雜志》的采訪，1966年1月2日。

[[66]](#_66_6) 例如Miguel Serrano, Das goldene Band. Wetten 1987.在互聯網簡單搜索一下，即可發現有關希特勒藏身不朽冰層之間的傳說至今猶存。不過在人工授精和克隆的時代，那種說法已經逐漸轉化成現代的版本—希特勒僅僅留下了他的“基因物質”（Genmaterial），以便有朝一日獲得重生。

[[67]](#_67_6) 一位身份不詳的工廠人員在1960年5月30日寫給漢斯·馬丁·施萊爾的信函。引自Gaby Weber, Daimler-Benz und die Argentinien-Connection. Berlin, Hamburg 2004, 91.

[[68]](#_68_6) 門格勒在媒體報道艾希曼被綁架的消息之后立刻寫道：“現在你們知道我是對的了。”

[[69]](#_69_6) “Doch kein Templer. Eichmanns Geburtsort: Solingen, nicht Sarona”.該文糾正了前任漢堡總檢察長格哈德·克拉默（Gerhard-F. Kramer）為該報撰寫的以色列報告。

[[70]](#_70_6) 主要引自Gaby Weber, Daimler-Benz und die Argentinien-Connection. Berlin, Hamburg 2004, 87-95.有關求職申請和人事記錄的復印本，見Schneppen, Odessa ..., A. o., 160ff.福爾德納毫不掩飾自己的友情相助，而且在艾希曼被綁架后仍然在向警方的證詞中提到了這一點。這個消息也出現在德國駐阿根廷大使館給外交部的報告中。

[[71]](#_71_6) 一名身份不詳的工廠人員在1960年5月30日寄給漢斯·馬丁·施萊爾的信函。引自Gaby Weber, Daimler-Benz A. o., 91.雖然韋伯質疑了那封信的真實性，但其內容完全符合艾希曼朋友們自圓其說的講法。

[[72]](#_72_7) 迄今在文獻中發現的金額都使用了錯誤的匯率，并且經常混淆了美元和西德馬克。男性的平均總月薪一般為600西德馬克左右。謹在此感謝德國聯邦銀行的工作人員好心提供了相關信息。從杜勒出版社與德國作家之間的稿費結算報表，亦可明顯看出此處所使用的匯率符合實情。參見前述弗里奇的信件往來。

[[73]](#_73_7) 復印本參見Gaby Weber, Daimler-Benz ..., A.o., unpaginierter Anhang. 1959年4月8日至6月30日之間，里卡多·克萊門特總共收到了15216.6比索。

[[74]](#_74_6) 2000年大衛·菲爾克（David Filc）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接受蓋比·韋伯采訪。Gaby Weber, Daimler-Benz ..., A. o., 91.

[[75]](#_75_6) 1939年10月16日艾希曼發給阿圖爾·內貝的電報，奧地利抵抗運動文獻中心（DÖW-Akt 17 072/a）。內貝曾詢問他們是否可以利用載人前往尼斯科的機會，同時也把“柏林吉卜賽人”運送過去。艾希曼隨即建議在火車上增加“三到四節車廂的吉卜賽人”。

[[76]](#_76_6) 薩森抄本13, 7。

[[77]](#_77_6) Simon Wiesenthal, Ich jagte Eichmann. Gütersloh 1961, 239.

[[78]](#_78_6) 奧地利國家檔案處，Nachlass Hermann Langbein, ÖStA, E 1797。在幾個文件夾和盒子里面可找到關于此一行動的證據、文件和評論。例如106號文件夾是1959年年初與奧蒙德的通信；綠色文件夾為與德國的通信（20, 21 -新聞界；23, 24 -司法界）。

[[79]](#_79_6) 1960年6月9日聯邦憲法保衛局致外交部的公函（II/a2-1-P-20364-5a/60）。感謝聯邦憲法保衛局允許引用。

[[80]](#_80_6) 保羅·迪科普夫的朋友包括臭名昭著的希特勒崇拜者弗朗索瓦·熱努。二人自共同為黨衛隊和納粹政權效力時開始，便一直維持著密切關系。熱努自1960年起更積極資助艾希曼的庭審辯護。參見本書第七章《余波蕩漾》。

[[81]](#_81_6) 兩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弗里茨·鮑爾昔日同僚與作者的對話。

[[82]](#_82_6) Annette Weinke, Eine deutsch-deutsche Beziehungsgeschichte im Kalten Krieg. Paderborn,München, Zürich, Wien 2002, 151-157.

[[83]](#_83_6) F. J. P. Veale, »Eichmann-Entführung - Zufall oder Regie?«, Nation Europa, 1961, Jg. 11,Heft 1, 73-78, hier 73.

[[84]](#_84_6) 鮑爾曾在1962年寫信向薩森索取更多背景資料，而薩森的回函中沒有任何內容足以表明二人之前有過接觸。參見威廉·薩森1962年7月16日從里瓦達維亞海軍準將城（Comodoro Rivadavia）致法蘭克福總檢察長鮑爾的信函（Wojak, Eichmanns Memoiren ..., A.o., 48 f.,218.）。可惜書中列出的消息來源并不正確（Landesarchiv Berlin, Nr. 76, BRep 057-0），我也沒有在其他任何可能的檔案館（Hessisches Hauptstaatsarchiv Wiesbaden, Fritz Bauer Archiv Frankfurt, Archiv der Sozialen Demokratie Bonn）找到這封信。

[[85]](#_85_6) 接受采訪時的說明（Ilona Ziok, Fritz Bauer - Tod auf Raten, 2010）。

[[86]](#_86_6) 研究顯示，這個姓氏的涉嫌前黨衛隊成員總共有14人。

[[87]](#_87_6) 沃爾夫岡·拉布斯（Wolfgang Rabus）2010年12月7日發給作者的電子郵件。雖然其內容平淡無奇，卻還是同時抄送給了公司內的另外四個人。

[[88]](#_88_6) 2010年托馬斯·哈蘭與作者的信件往來。同樣出現在影片中：Ilona Ziok, Fritz Bauer-Tod auf Raten. 2010.

[[89]](#_89_6) Quentin Reynolds, Ephraim Katz, Zwy Aldouby, Der Fall Adolf Eichmann. Der Bevollmächtigte des Todes, Zürich 1961, 201.

[[90]](#_90_6) 關于這個恐怖地點的信息，參見Jules Schelvis, Vernichtungslager Sobibór. Berlin 1998;Thomas “Toivi” Blatt, Sobibór - der vergessene Aufstand. Hamburg, Münster 2004.

[[91]](#_91_6) 施邁斯納在1967年又出售了這家企業，在戈亞尼亞（Goiânia）成為一家紙張回收公司的負責人，最后于1989年去世。Jules Schelvis, Vernichtungslager ..., A. o., 291, 314 und 220 (Foto); Richard Lashke, Flucht aus Sobibór, Roman (mit Materialanhang). Gerlingen 1998, 436.

[[92]](#_92_6) 葡萄牙文原名為：Inferno em Sobibór - A tragédia de um adolescente judeu. Rio de Janeiro 1968.該書直到今天仍未被翻譯成其他文字。

[[93]](#_93_6) 索比布爾集中營當時的指揮官古斯塔夫·弗朗茨·施坦格爾在1969年親口證實了這件事。引自Jules Schelvis, Vernichtungslager ..., A.o.

[[94]](#_94_7) 湯姆·塞格夫重新整理了西蒙·維森塔爾講述他尋獲施坦格爾經過的幾個不同版本。塞格夫懷疑維森塔爾沒有說出真正的通報人，并沒有找到直接指向施邁斯納的線索，而且在檔案資料中出現了明顯的空缺。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 A.o., 372 ff.施邁斯納后來才在與其他索比布爾幸存者的交談中，講述了他對施坦格爾的記憶。至于他和瓦格納的巧遇，甚至有照片可供確認。亦參見Simon Wiesenthal, Recht, nicht Rache. Frankfurt a. M., Berlin, 127.

[[95]](#_95_6) 尤勒斯·施爾維斯（Jules Schelvis）在撰寫他那本關于索比布爾的書時，曾花了很長時間采訪施邁斯納。Jules Schelvis, Vernichtungslager ..., A.o., 314.在巴西代表維森塔爾的記者馬里奧·奇馬諾維奇（Mario Chimanovich）在2008年10月29日接受塞格夫采訪時也認為那是一起謀殺案（2008年10月29日接受塞格夫的采訪），參見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 A.o., 374.就連警方的照片也駁斥了瓦格納上吊自殺的說法。

[[96]](#_96_7) 這篇新聞稿幾乎出現在第二天所有的報紙上，包括《阿根廷日報》在內。此處引文摘自Schwäbischen Albzeitung vom 24.12.1959.

[[97]](#_97_7) 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 A.o., 177.

[[98]](#_98_6) 引自Heinz Weibel-Altmeyer, “Jagd auf Eichmann”, Neue Illustrierte, 11.6-8.7.1960.在艾希曼被捕后分五次發表。

[[99]](#_99_6) 1960年6月9日聯邦憲法保衛局致外交部的函件（II/a2-051-P-20364-5a/60）。感謝聯邦憲法保衛局允許引用這份文件。

[[100]](#_100_6) 同上。

[[101]](#_101_6) 1960年2月12日朗拜因致德國工業聯合會的信件。1960年4月26日德國工業聯合會給國際奧斯維辛委員會的回函。兩封信函都保存在奧地利國家檔案處（Nachlass Hermann Langbein, ÖStA E1797-25 Korrespondenz-Ordner grün, Deutschland A-C）。

[[102]](#_102_7) 就像所有這類操作一樣，朗拜因曾事先詢問法蘭克福檢察官亨利·奧蒙德，他這封信是否有可能造成任何損害。相關證據見奧地利國家檔案處（Korrespondenz-Ordner Ormond, Langbein-Nachlass, ÖStA）。關于奧蒙德、朗拜因與鮑爾之間的聯系，參見本書第七章《余波蕩漾》。

[[103]](#_103_6) 1960年6月9日聯邦憲法保衛局致外交部的函件（II/a2-051-P-20364-5a/60）。

[[104]](#_104_7) 埃爾溫·許勒1959年8月20日寫給托維阿·弗里德曼的信函。Tuviah Friedmann, Die“Ergreifung Eichmanns”: Dokumentarische Sammlung. Haifa, 1971.

[[105]](#_105_6) 16.10.1959, “Israel und der Fall Eichmann”.

[[106]](#_106_6) 一些相關新聞報道的副本見：Tuviah Friedmann, We shall never forget. Haifa o. J. (1965).關于調查當局對弗里德曼任性行為的憤怒，亦參見維森塔爾在20世紀70年代與路德維希堡國家社會主義犯罪調查中央辦公室的信件往來，以及迪特里希·措伊格在1961年向路德維希堡提出的報告（BArch Ludwigsburg, Sammlung Zentrale Stelle）。

[[107]](#_107_6) 1959年10月13日鮑爾向媒體發表的完全捏造的聲明，以及英國外交部所采取的立場。該行動一直持續到1960年，而且也出現在一些較小的報紙上。在此查閱過的報刊計有：Frankfurter Allgemeine, Frankfurter Neue Presse, Times London, Die TAT. Schwäbische Albzeitung, Weltwoche, Deutsche Woche und Neues Österreich.

[[108]](#_108_6) Deutsche Woche, 27.1.1960.

[[109]](#_109_6) 聯邦司法部1959年12月16日給聯邦外交部的答復。引自Schneppen, Odessa ..., A.o.,163.施內彭沒有標明檔案的出處（但通常來自外交部的政治檔案）。

[[110]](#_110_6) 若有誰認為這是惡意中傷的話，不妨花幾個小時來瀏覽一下阿道夫·馮·塔登的遺物。架子上數以千計的信件里面充滿了真正惡意十足和顛倒黑白的流言蜚語。薩森至少曾經為塔登寫過一篇文章（Reichsruf, 29.10.1955），但塔登仍然公開譴責薩森。參見本書第七章《余波蕩漾》對德魯費爾出版社的評論。

[[111]](#_111_6) 1960年6月9日聯邦憲法保衛局致外交部的函件（II/a2-051-P-20 3645a/60）。

[[112]](#_112_6) Neo-Nazi Leader ‘Was MI6 Agent’, Guardian, 13.8.2002.塔登的遺物中已經徹底清除了相關證據。

[[113]](#_113_7) 克勞斯·艾希曼接受《快客雜志》的采訪，1966年1月2日。

[[114]](#_114_6) 赫爾曼寫給托維阿·弗里德曼的信函。Tuviah Friedman, Die Ergreifung Eichmanns:Dokumentarische Sammlung. Haifa, 1971.

[[115]](#_115_6) 路德維希堡聯邦檔案館，中央辦公室藏品III 24/28。

[[116]](#_116_7) 弗里德曼1971年4月27日寫給赫爾曼的信函，所指稱對象是阿里·塔塔科維（Arie Tartakower）。

[[117]](#_117_6) 赫爾曼寫給弗里德曼的信函，1960年3月28日。

[[118]](#_118_6) 弗里德曼為此在1971年多次寫信向赫爾曼道歉。

[[119]](#_119_7) 關于做出決定的經過，參見杰出的著作Hanna Yablonka, The State of Israel vs. Adolf Eichmann. New York 2004.

[[120]](#_120_6) Hanna Yablonka, The State of lsrael..., A. o., 15 f. Tagebuch-Eintrag zitiert bei Tom Segev,Simon Wiesenthal ... A. o., 178.

[[121]](#_121_7) 有趣的是，我也在赫爾曼·朗拜因的遺物中找到了一份訃告副本（奧地利國家檔案處，ÖStA Wien, Presseordner Eichmann）。

[[122]](#_122_6) 他們兒時的一張照片顯示，兄弟二人即便在當時就已經非常相像。

[[123]](#_123_6) 亦參見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 A. o.,180.

[[124]](#_124_6) 阿哈羅尼沒有說明他在1959年3月執行了什么任務。

[[125]](#_125_6) Meine Flucht, 26.

[[126]](#_126_6) 日期為1961年11月7日的《綁架發生前的歷史》（Vorgeschichte der Enführung），以及內容詳盡的《拘捕報告》（Verhaftungsbericht）。后者未標明日期，但顯然撰寫于審判開始之前。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3。內容與艾希曼的《我的逃亡》（1961年3月）相吻合（BArch Koblenz AllProz 6/247）。

[[127]](#_127_6) 關于艾希曼自愿離開阿根廷之后經由其他地點前往以色列，或者阿根廷將他引渡到以色列，這種說法至今存在。然而它成立的唯一可能，就是艾希曼在以色列審判期間的書面聲明和相關陳述都是在逼迫下做出的。不過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對原始資料進行仔細研究之后可以確定，艾希曼自愿前往以色列以及除綁架以外的說法，都完全站不住腳。

[[128]](#_128_6) 克勞斯·艾希曼接受《快客雜志》的采訪，1966年1月2日。薇拉·艾希曼1962年4月29日接受《巴黎競賽畫報》采訪時講述了這個夢境。

[[129]](#_129_6) Vorgeschichte der Entführung, Aufzeichnung datiert am 7.11.1961, 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3. Ebenso: Meine Flucht, 28.

[[130]](#_130_6) 艾希曼自己的報告也提供了詳細的信息，內容與其他參與者做出的陳述相吻合。

[[131]](#_131_6) 英格·施奈德也證實了這一點。當時她剛好在歐洲，而密普·薩森就借住在她家（2005年接受魯爾夫·范·提爾的采訪）。

[[132]](#_132_6) 薇拉·艾希曼接受《巴黎競賽畫報》的采訪，1962年4月29日；福爾德納向阿根廷警察做出的非常低調的聲明；克勞斯·艾希曼接受《快客雜志》的采訪，1966年1月2日。

[[133]](#_133_7) 克勞斯·艾希曼接受《快客雜志》的采訪，1966年1月2日；莫恩（Mohn）寫給塞爾瓦蒂烏斯的信函，參見Servatius-Bericht 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3.

[[134]](#_134_6) 克勞斯·艾希曼和他的家人起先還留在自己的住處，但隨著新聞記者在1960年5月23日之后紛紛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尋訪艾希曼的足跡，他們從公眾視線中消失了一段時間。于是從《國族歐洲》到《明鏡周刊》等雜志上很快便出現了向以色列提出的警告：如果他們也侵犯艾希曼家人的話，將會損害“猶太人”的聲譽。

[[135]](#_135_6) 后續的發展顯示，當時駐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大使維爾納·容克，曾多次向他的上司海因里希·馮·布倫塔諾隱瞞消息。

[[136]](#_136_6) 何塞·莫斯科維茨接受雷蒙德·萊伊的采訪（2009年）。莫斯科維茨先生說一口雖然蹩腳，但清楚易懂的德語。其話中內容不致造成誤解。即使在進一步追問之下，他對時間仍舊完全篤定。

[[137]](#_137_6) 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 A.o., 410 f.

[[138]](#_138_6) 所有參與者皆證實了此事。莫斯科維茨在前述采訪中提到了他所提供的幫助，甚至還促成阿哈羅尼匿名前往大使館；湯姆·塞格夫在西蒙·維森塔爾的私人文件中發現了維森塔爾和莫斯科維茨之間的大量信函往來；茲維·阿哈羅尼更稱莫斯科維茨從一開始就在提供幫助，即便他很晚才直接提到這個名字。莫斯科維茨協助阿哈羅尼收集信息，并且不動聲色地為摩薩德團隊租了公寓和汽車。就連伊塞爾·哈雷爾也指出，布宜諾斯艾利斯有一位匈牙利人與警方關系很好，并且是阿哈羅尼的聯絡人（但沒有透露莫斯科維茨和阿哈羅尼的本名），見Isser Harel, 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 Ausgabe 1997,35.

[[139]](#_139_6) 莫斯科維茨、阿哈羅尼和哈雷爾的說法在這里也不相互矛盾。

[[140]](#_140_6) 參見聯邦德國政府出版的小冊子：Die antisemitischen und nazistischen Vorfälle. Weißbuch und Erklärung der Bundesregierung. Bonn 1960, 36.

[[141]](#_141_7) Der Spiegel, 15.6.1960.

[[142]](#_142_6) 聯邦總理府的解釋，德國聯邦情報局的艾希曼檔案為何即使在2010年也不能對外公開（第3頁）。細節參見本書第七章《余波蕩漾》。

[[143]](#_143_6) 羅爾夫·福格爾（Rolf Vogel）1960年8月30日從波恩寫給金特·迪爾（Günther Diehl）的信函（B145, 1132），引自Raphael Gross, Anständig geblieben ..., A. o., 197.

[[144]](#_144_6) 維爾納·容克1960年11月29日提出的關于薩森的報告，德國外交部政治檔案（PA AA B83, Bd. 55）；布倫塔諾1960年12月1日告訴楊茨（Janz）的說法，出處同上。引自Das Amt, A. o., 608 f.書中也可找到外交部對艾希曼被綁架事件的詳細反應，但關于20世紀50年代阿根廷納粹社區的研究工作，在檔案中顯然并沒有什么發現。

[[145]](#_145_6) 維爾納·容克大使于1962年12月13日致外交部的公函。Dokument 483 in: Akten zur Auswärtigen 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62. München 2010, 2060-61.

[[146]](#_146_6) Irmtrud Wojak, Fritz Bauer ..., A. o.

[[147]](#_147_6) 關于美國中央情報局，參見Richard Breitman (Hrsg.), U. S. Intelligence and the Nazis. Washington D. C. 2004.

[[148]](#_148_6) Das Amt, A.o., 609.

[[149]](#_149_6) ebd., 600ff.

[[150]](#_150_6) 從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保存的塞爾瓦蒂烏斯相關文件可以明顯看出這種雙重簿記方式，并且可以找到詳細的財務報表。關于資助艾希曼出庭辯護，參見本書第七章《余波蕩漾》。

[[151]](#_151_7) 引自一份發給部長們的絕密備忘錄，參見Das Amt, A.o., 614.

[[152]](#_152_6) 阿登納1962年1月22日致本—古里安的信函，見Dokument 37 in: Akten zur Auswärtigen 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62. München 2010, 206-7.

[[153]](#_153_6) 至1960年年底為止的事件被記錄在德國聯邦行政法院補充文件：BVerwG 7A 15.10,Saure gegen BND, BND-Akten 121099, 1664: Schreiben vom 3.6.1960 “auf AA-Anfrage”;1784: 11.8.1960.感謝克里斯托夫·帕爾奇允許引述相關資料。

[[154]](#_154_6) 其家人隨即對訃告的內容公開表達反對意見。參見Trafojer‚ “Die Stimme eines Mörders” ..., A.o.

[[155]](#_155_6) “艾希曼的路線經過了梵蒂岡”，見Volkswille, 23.7.1960.與當時的其他文章相比，其消息非常靈通。

[[156]](#_156_6) 阿根廷聯邦警察針對艾希曼被綁架一事做出的報告，1960年6月9日，阿根廷國家檔案Argentinisches Nationalarchiv (AGN), DAE, Bormann-Akte, S. 77-79.引自Uki Goñi,Odessa ..., A. o., 296.

[[157]](#_157_7) Kurier, 31.5.1960 und öfter.

[[158]](#_158_6) 參見Timothy Naftali, “The CIA and Eichmanns Associates” ..., A.o., 341-343.關于米爾登施泰因在埃及的活動，參見1957年1月3日CIA來自開羅的報告：Combined AlliedIsraeli Invasion of Egypt. NA, RG 263 Name File Leopold von Mildenstein。

[[159]](#_159_6) 我所知道唯一一項打算暗殺弗里茨·鮑爾為艾希曼報仇的計劃，就是臭名昭著、來自弗里德里希·施文德私人檔案的《ODESSA議定書》（ODESSA-Protokoll）。這份奇特的文件談到了一個黨衛隊秘密社團據稱在西班牙舉行的會議。其日期長久以來一直不清楚，但實際是在1965年6月。議定書中包含了呼吁謀殺弗里茨·鮑爾的提議。由于施文德是一名專業的偽造者，因此無法判定該文件是否出自偽造，或者是一群過于有野心的男性于酒酣耳熱之際的談話記錄。漢堡社會學研究所，HIS, Archiv, Schwend-Papiere。

[[160]](#_160_7) 1961年3月3日的報告，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奧托·斯科爾策尼本人不無可能就是這份報告的來源。暗殺計劃的故事或許出自東德的宣傳：早在1960年5月29日，《柏林報》（Berliner Zeitung）便發表題為“艾希曼——波恩企業在科威特的中間人”的文章，稱聯邦情報局的負責人蓋倫親自下令鏟除艾希曼，借此保護聯邦德國境內的納粹。

[[161]](#_161_6) Ulrich Völklein, Josef Mengele: Der Arzt von Auschwitz. Göttingen, 2003, 270.

[[162]](#_162_6) 《法蘭克福匯報》阿根廷通訊記者“尼古拉斯·埃勒特”（Nikolaus Ehlert）的這篇文章，顯然是根據威爾弗雷德·馮·奧芬和奧爾斯特·卡洛斯·福爾德納提供的信息撰寫的。

[[163]](#_163_6) Friedrich Paul Heller, Anton Maegerle, Thule. Vom völkischen Okkultismus bis zur Neuen Rechten, 93.

[[164]](#_164_6) 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警方報告，引自Uki Goñi, Odessa ..., A. o., 296.

[[165]](#_165_6) Volkskrant, 8.6.1960, “Eichmann, alias Klement. Jodenvervolger in zwaar verhoor”.

[[166]](#_166_6) 薩斯基雅·薩森今天仍然相信她的父親無法忍受艾希曼。但他在文章中所表現出的對艾希曼的同情，尤其是他后來為艾希曼出庭辯護提供的支援，講述了一個明顯不同的故事。薩森在接受《理性報》采訪時提到了他的美國化昵稱。

[[167]](#_167_6) 這是1960年5／6月號奧地利刊物《反抗斗士》（Widerstandskämpfer）和1960年5月25日《工人報》（Arbeiterzeitung）的標題。

[[168]](#_168_7) “Das Verbrechen hat kein Vaterland. Der Eichmann-Prozeß wirft seine Schatten voraus”.In: Der Heimkehrer. Göppingen Jg 12, Heft 6, 1961, 1.

[[169]](#_169_6) “Vorschau auf einen Sensations-Prozeß”, in: Nation Europa 11, 1961, Heft 4, 37-41, hier 41.

[[170]](#_170_6) 1962年6月7日的日記，引自Heinz Schneppen, Odessa ..., A. o, 155。施內彭表示在黑森州總檔案館（HHStA）找到了那份資料。然而在實際詢問之后發現，那里雖然有一些門格勒的日記，卻沒有這一篇日記。同樣的資料引用亦見Völklein, Mengele ..., A.o.,270 f.

[[171]](#_171_6) 艾希曼1961年4月17日的家書。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AllProz 6/165, 6。

[[172]](#_172_6) 門格勒1962年6月1日的日記，于接獲執行死刑的消息之后立即寫就。引自Völklein,Mengele ..., A.o., 270 f.

[[173]](#_173_6) 艾希曼果真寫下了“做出判決”（Urteilsbildung）一詞。他不明白法理可以獨立于特定的時代潮流，而普世的人權價值卻永遠不會讓他得到無罪赦免。

# 第六章 角色的轉換：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他很高興能夠在審判中作證，并且指出：“現在殺人犯和大屠殺劊子手都完全消失了。”

——薇拉·艾希曼，1962年4月22日前往監獄探視后

艾希曼意識到自己是被綁架而非落入暗殺小組的手中之后，提出的第一個請求非常值得注意：“由于我已無法記得全部細節，而且還把許多事情搞錯了或弄混了，我希望有人可以幫幫忙，向我提供一些相關文件和論述。”[[1]](#_1_13)艾希曼想要他已經研究得非常透徹的那些書籍，因為他清楚地知道該怎樣把它們為己所用。以色列警察隊長阿夫納·萊斯在開始審訊艾希曼后，馬上就產生了懷疑：“首次審訊結束之后，我已經確信艾希曼不是第一次講述這個故事。”[[2]](#_2_14)萊斯并且表示：“我有種感覺，那個人曾經在某個地方排練過。”[[3]](#_3_13)那名囚犯雖然并非學者，卻讀過很多書，而且“非常聰明、非常狡猾，在審訊期間的表現也是如此”。那是兩個熟悉審訊工作的人在下的“一盤棋”。[[4]](#_4_14)萊斯很快便意識到艾希曼知道每一本書，即便他的說辭完全相反，甚至還嘆著氣表示非常遺憾直到現在才在以色列讀到那些書。但沒有逃過那位審訊官法眼的是，他的犯人能夠以可怕的速度找到書中“顯然對他有利的段落”。萊斯要到好幾個月之后才終于獲悉，艾希曼曾經在哪里進行過練習，以及他為什么對審訊準備得如此充分。

等到艾希曼發現自己竟然被死敵囚禁起來的時候，他早已知道何種流傳于世的艾希曼形象最有利于他的辯解：一個謹小慎微的官僚——但必須排除他在阿根廷補充的對他不利的說明。在這個角色中，艾希曼融合了兩個元素，希望它們能夠把他從絞刑架上解救下來：分別是關于猶太人大屠殺的獨家知識，以及他自己的清白無辜。他甚至可能有機會表達自己的個人見解：“我知道那回事，但我什么也改變不了。”[[5]](#_5_14)

艾希曼曾是炙手可熱的“猶太問題”專家、滅絕計劃的部際協調者，以及與上司們圍著火爐共飲白蘭地慶祝大屠殺進展順利的人，如今卻自稱為一個無足輕重、沒有指揮權的會議記錄員，在萬湖會議上甚至只能“坐在旁邊的小桌前削鉛筆”。[[6]](#_6_14)艾希曼在阿根廷的時候曾經詳細又自豪地解釋，為什么他的名字在戰前就已經成為一個象征，并且對他收集的新聞剪報如數家珍，此時卻聲稱“我在1946年以前幾乎沒有公眾知名度”。[[7]](#_7_14)即將舉行的審判實際上只是一個誤會，因為他“15年來受盡了全世界的指控、誹謗和迫害”。[[8]](#_8_13)他將在法庭的總結陳詞中，以抱怨的口吻表示“我也是，我也是受害者”。

在這場偽裝中，艾希曼不惜用一些從前會讓他怒不可遏的講法來形容自己。如今他搖身變得“腦筋死板”，是一個“在辦公室耍筆桿的人”，而且“過分拘泥小節”，“不敢逾越自己的職權范圍”。[[9]](#_9_13)最后一個謊言或許甚至會讓艾希曼心中暗暗好笑，因為他想象著昔日的同僚們——尤其是外交部的那批人——對此只能側耳傾聽卻無法做出任何反駁，雖然他們原本可以針對艾希曼的濫權行為講出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反正艾希曼一直特別以自己的詭計為傲，其以色列審訊官則機警地注意到，那名囚犯在施展伎倆時變得格外生氣勃勃。

艾希曼給自己貼上的所有標簽實際上都符合納粹眼中敵人的形象，例如“官僚”幾乎就是黨衛隊隊員的反義詞。[[10]](#_10_14)官僚主義可以被用作武器，尤其是拿來對付那些相信官僚主義的人。艾希曼在納粹時期曾運用各種不正當的官僚主義花招阻撓國家的其他機構和他自己的受害者。他對這種權力的精細形式了解得非常透徹。而如今在以色列的牢房里，“官僚”聽起來又比“黨衛隊成員”無害多了。艾希曼因而搖身成為一個謹小慎微、對國家社會主義沒有狂熱興趣的官僚，是一個熱愛大自然并具有學術傾向的普通人。此外他向往開明作風和世界主義，終于在過去15年擺脫了煩人的命令和犯罪的政權，成功回歸自己的本性。這正是那名被告在耶路撒冷為自己人生最后階段選擇的艾希曼形象。艾希曼總是有辦法完美地扮演一個角色，這讓他不但能夠前后一貫地假裝下去，甚至還使角色更加豐滿。他從健談的囚犯和勤奮不懈的歷史學家，進而成為尊重國際法的和平主義者，最后更儼然哲學家，與康德和斯賓諾莎一同闡述道德和生存方面的終極問題——只不過這次完全沒有了“血統的呼聲”。

然而一窺納粹時期的種族反猶太主義思想即可明白，他所扮演的那些角色也包含著反猶太主義的陳詞濫調。艾希曼始終是從死硬的反猶太主義者角度來思考的。他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便一直宣稱，猶太人是世界主義者，其弱點在于將諸如知識之類的普世觀念置于血脈的語言之上。艾希曼一定曾經希望，只要訴諸他所認為的猶太人這種天生“本能”，就能給自己帶來一線生機。種族反猶主義者深信不疑的是，猶太人和所有被他們感染的人，都會情不自禁地把他們對理智主義和科學的嗜好置于“血統的神圣利己主義”之上。只要艾希曼能夠滿足他們的求知欲，他們就不會殺了他。

即便在以色列，身邊圍繞著那么多清楚他底細的人，艾希曼還是成功實現了昔日擔任黨衛隊官員時經常辦到的事：真正引起對手的同情。所有在以色列跟艾希曼打過交道的人，后來都表示他們確信自己曾經是艾希曼所依附的重要對象。無論是審訊官、典獄長、醫生、心理學家、神學家還是副總檢察長，每個人都稱贊了艾希曼的合作意愿，發現他樂于交談，并且相信他特別感激他們的對話。盡管他們都極力抵制艾希曼，并且譴責他的過去，印象中那個心懷感激的囚犯卻感動了他們每一個人。[[11]](#_11_12)甚至連阿夫納·萊斯那樣善于應對溫情攻勢的審訊專家，在面對顯然具有驚人吸引力的艾希曼時，也偶爾陷入困難。

艾希曼和他的文字一再獲得成功，甚至讓經驗豐富的解讀者也受到誤導而得出錯誤結論。例如一個必須攜帶行李“前往東方”，并且在“除虱”之前被要求記住衣服擺放位置的人，免不了會期待這么做必定有其道理。誰若是收到了親友從黑森林寄來的明信片，自然會認為親友果真在黑森林，而不會料想到他們早已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遭到毒氣殺害。同樣地，我們總是在各種文件和聲明當中尋找與我們自身經驗和知識的關聯，換句話說，我們想要理解。與此同時，“世界觀的精英”卻看出了這種“想要理解”的愿望的脆弱性。可以利用這種對邏輯一致的渴求來混淆人們的判斷，從而使他們無法采取行動。想要理解的人，甚至還會在其他人早已摧毀所有邏輯橋梁的地方尋求理解，盡管在那些人的世界里，并非人人都享有生存權。艾希曼的《偶像》于是歌頌了哲學和道德價值、國際法的理想與對和平的向往，并表達出對納粹的幻想破滅和所謂的回心轉意，試圖借此為一心想要理解的人搭起一座橋梁，因為那些人怎樣也無法理解像滅絕猶太人這樣的罪行。

艾希曼設法至少像那些譴責他的行為的人一樣，使用道德和正義的進步語言，借此傳達出一種建立關聯的可能性，一種了解他的意圖的機會。如此一來，艾希曼是否成功地把自己推銷成一個官僚、一個精神分裂者，還是一個失憶患者，就不再重要了。最要緊的還是不讓人發現他的真正想法、不提出疑問，而且不至于因為仔細聽他說話而看清其真面目。即使在出色的出版物和紀錄片中，艾希曼的照片也經常被左右顛倒地呈現，這并非巧合。[[12]](#_12_12)人們在對他做出仔細觀察之前，就已經迫不及待地想勾勒出他的形象，那正是艾希曼在黨衛隊大權在握的根本原因之一。他巧妙地利用了人們的愿望，讓他們看到自己想看見的東西。正因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做出了巨大努力，假裝為想要理解的人提供幫助，搭起了通往其世界觀的橋梁，所以我們更應該清醒地以懷疑的態度看待“阿根廷文稿”惡毒的思想泥淖，以免落入艾希曼設下的“偶像”陷阱。

阿夫納·萊斯審訊官和伊扎克·拉維（Yitzhak Raveh）法官令人印象深刻地展示了，如何通過艾希曼講過的話和觀察他扮演的角色，了解到他表象下隱藏的東西。只是出神地凝視自己在鏡中的反射，無法使我們了解鏡子。關鍵在于不再關注映照出來的倒影，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反射面本身。

阿根廷的文稿和談話內容不僅確切證明了，艾希曼在以色列的各種撰述中所表達的對不公不義的認知、對上級的失望，尤其是對理性和世界和平的呼吁，是多么虛偽不實，那些文字更讓我們得以看清艾希曼的操控手段如何運作，以及他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打算運用謊言和虛假信息的方法。好幾千頁的自我標榜與篡改歷史并非出于偶然，更不是疏忽和記憶出錯造成的結果，而是同一個人針對自我形象與歷史圖景刻意留下的兩個截然不同的版本。“阿根廷文稿”讓我們看到了鏡子的背后，瞧見了那個在制造和傳播各種能夠自圓其說的解釋模式上有著豐富經驗的人。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轉移人們對其根本弱點的注意力，那就是它們與實際情況并沒有什么關系。在掌權的時候，艾希曼就背信棄義地利用人們想要擺脫困境的愿望，讓他們毫無抵抗地走上死路。在阿根廷，艾希曼為了得到老同志們的尊重和幫助，于是遷就他們的期待，將國家社會主義與趕盡殺絕的命令區分開來。在以色列，艾希曼則試圖利用他眼中“猶太人的本能”，亦即猶太人對理解和獲得知識的渴望。他就像一面鏡子，隨時隨地反映出人們的恐懼和期望，無論他們是在擔憂自己的性命，還是希望能夠通過他證實一種關于邪惡的理論。而在所有鏡像的背后，艾希曼非常有效地偽裝成勤奮的模樣，隱藏起他的權力意志和控制人們思想的欲望。只有一件事情總是讓艾希曼疏忽大意因而容易暴露弱點，那就是他想得到認可的強烈欲望。一個經常隱藏在面具后面的人，難免總是會想冒險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控制的意圖和操縱的欲望最終需要的正好是艾希曼所認為的最大精神負擔，亦即“個人的匿名狀態”。

在以色列，艾希曼也毫不例外地再度試著“與狼共舞”，成為權貴眼中不可或缺的專家，成為編年史作者和歷史學家，成為哲學家，最后更成為先知，鼓吹世界和平與民族諒解。他押下了最高的賭注，但這一回卻沒有如愿以償。奧托·阿道夫·艾希曼在1962年6月1日凌晨遭到處決，他的骨灰被撒進地中海，而其魚目混珠手段所留下的痕跡卻至今猶存。

[[1]](#_1_12) 起訴文件T/3，移送聲明。

[[2]](#_2_13) 阿夫納·萊斯遺稿，ETH Zürich, Archiv für Zeitgeschichte, 4.2.3. 2。

[[3]](#_3_12) 阿夫納·萊斯接受《偶像》采訪，Nachlass Less, AfZ, ETH-Zürich, Band 7.1.X。

[[4]](#_4_13) 阿夫納·萊斯接受紀錄片采訪，Erscheinungsform Mensch (de Frank), Kassette im NL Less,7.1 IX.

[[5]](#_5_13) Meine Flucht, 39.

[[6]](#_6_13) 艾希曼在以色列重新潤飾的這個神話，成為他所講的最成功的故事之一。正如艾希曼在阿根廷多次解釋的那樣，他的任務是在將會議記錄送交各部委之前，先按照“語言規范”審查內容。在會上，海德里希向所有與會者介紹艾希曼為聯絡人，在場的每個人隨后也都以這種方式看待他。為什么竟然會有人相信艾希曼只是會議記錄抄寫員，這實在令人費解，更何況他根本沒有受過這方面的訓練。如果艾希曼與萬湖會議抄寫工作有任何關系的話，那就是實際督導了會議記錄的謄寫。相關引文來自Auch hier im Angesicht des Galgens, BArch Allproz 6/193, 16.

[[7]](#_7_13) 回答《巴黎競賽畫報》的書面采訪，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2。

[[8]](#_8_12) Auch hier im Angesicht des Galgens, AllProz 6/193, 22.

[[9]](#_9_12) 在《我的存在與作為》里表達得尤其露骨，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AllProz 6/253, 8。

[[10]](#_10_13) “Die Grundlagen der Bürokratie”, in: Das Schwarze Korps, 12.6.1941。該文根據黨衛隊的觀點，塑造出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官僚形象。

[[11]](#_11_11) 參見一部早期德國紀錄片里面的各種講法，Erscheinungsform Mensch: Adolf Eichmann(Deutschland 1978/79)，以及上述那些人士的文字記錄和進一步的采訪。

[[12]](#_12_11) 大衛·切薩拉尼書中的許多照片也是如此（Eichmann: His Life and Crimes, London,2005）。艾希曼的臉是如此不對稱，實際上很容易分辨出左右顛倒的情況，此外從他的制服也很容易辨認正確的方向。

# 第七章 余波蕩漾

沉默不會立刻顯露它的意義。

我們必須在它釋放信息之前，對此有所警惕。

——勞爾·希爾貝格，《大屠殺的研究資料來源》[[1]](#_1_15)

當“阿根廷的納粹”變成“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繼續忙著為新的目標對象撰寫一摞摞文稿的時候，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同志們也想起了那位談話伙伴留下的印跡：1000多頁附有評論的聽寫打字記錄、一些剩下來的錄音帶、500多頁手寫稿和筆記，其中一部分還有打字謄錄的副本。這些文件進入公眾視野的過程非常復雜，相關材料足夠寫出一部小說，而且直到今天都還沒有完全結束。盡管所謂的“薩森訪談錄”已成為最常被引用的大屠殺戰后史料之一，但人們對這一大堆重要文件的內容與范圍卻了解得驚人地不完整，對“阿根廷文稿”里面究竟包含哪些內容的好奇也低得出奇。原因不僅是心理上的，例如可以理解的害怕打開潘多拉盒子，或者擔心像戈洛·曼（Golo Mann）所警告的那般，處理完骯臟的想法之后，留下的不只是沾滿灰塵的雙手。最主要的問題在于，即便只是想概略地了解艾希曼在南美洲留下了什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們仿佛一大塊令人難以捉摸的拼圖上的零件，散見于多個不同的檔案館。詳細索引的缺失，加上倉促草率的分類，更使尋訪之路難上加難。例如在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這項過去幾十年最重要新發現的說明上竟大剌剌地寫著：“這些文件多年來一直可供研究使用。”盡管有附加說明指出，由于時間倉促，只能做出“臨時的”分類，但這種說明并不能減少此一明顯錯誤的破壞性。我們若想把歷史拼圖組合起來，往往可以在它解體的過程中找到關鍵線索。解決了這個難題，便能夠一路返回原點，來到拼圖還沒有成為謎團的時候。因此現在就讓我們從“阿根廷文稿”具備已知最大體量的那一刻開始：1960年5月。

### 薩森的資料

5月11日艾希曼被綁架時，他在阿根廷留下的資料主要分布在兩個地方：他自己的家中和薩森的住處。雖然筆記、私人記錄、寫有批注的書籍、薩森的一些草稿，以及那本《圖庫曼小說》都存放在艾希曼家中，但大部分的材料都在薩森那里。直到今天，布宜諾斯艾利斯都還流傳著謠言，哪些人可能長年藏著艾希曼文稿，哪些人則不可能。但事情的真相或許沒有那么復雜：自從在聯邦德國選戰不利、出書計劃失敗，以及出版商離境前往奧地利之后，薩森已經厭倦了所有材料，于是把它們擱置一邊并轉向了新的項目。要等到艾希曼被綁架之后，一切才突然重新舊事重提并產生話題性。不過最重要的是，薩森保管的那些材料起初意味著很高的風險。從艾希曼被綁架到本-古里安公開宣布艾希曼在以色列成為階下囚，中間已經隔了12天。在那段時間里，艾希曼的家人、朋友和熟人都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更不知道接下來還會發生什么。他們普遍擔心這個事件恐怕只是開端而已。薩森立即的反應是把那些材料從家里移走，反正不把所有東西放在同一個地方才是明智之舉。艾希曼在梅賽德斯-奔馳的一位同事表示，薩森和克勞斯·艾希曼曾把手稿存放在他那里長達一個星期之久。[[2]](#_2_16)其他人更報告說，錄音帶和抄本一起被埋在花園的地下，甚至還有人提到埋在薩森的贊助人迪特爾·門格的廣闊庭院下。[[3]](#_3_15)出于顯而易見的原因，艾希曼一家人在郊區邊緣的房子也不再覺得安全，于是在薩森和福爾德納等朋友們的幫助下，把私人物品帶去了安全地點。但更進一步的動作并沒有發生，最晚在艾希曼的綁架獲得官方證實之后，薩森面臨的局面已經全面改觀：舊資料終于有了派上用場的機會。

阿道夫·艾希曼曾和薩森有過約定，采訪內容“只有在我一命嗚呼或者落入以色列人手中之后，才可以對外公開”。[[4]](#_4_16)薩森嚴格遵守這個協議，并且迅速采取了行動。雖然錄音內容早已打字謄寫完畢，但由于薩森訪談會最終因為厭倦而進展不暢，有一些艾希曼的手稿還未來得及處理。但它們必須經過重新謄寫才能使用，因為艾希曼的筆跡非常有特色，有時甚至讓熟悉老式德文書寫體的人也很難讀懂。[[5]](#_5_16)薩森曾經和《生活》雜志有過一些往來，因而想到了美國市場，于是他聘請一位女秘書把那些剩余的部分打字出來。[[6]](#_6_16)此外薩森還采取了一個非常有遠見的措施：他不但把所有文件都影印了一份，而且還拍攝成底片。這是最簡單的做法，因為今日通用的靜電復印機當時尚未出現，永久的拷貝只能通過攝影技術來制作。[[7]](#_7_16)1960年6月，薩森想要出售的所有文稿都已拍攝成35毫米底片，而那正是模擬攝影多年來最常使用的格式。這個聰明之舉的目的，不僅是為了保護原件。薩森主要是為出門旅行做準備，1500頁的文稿只會成為笨重又顯眼的行李。（簡單說明一下：我們談論的是厚達將近20厘米的一大堆打字紙，重量超過7公斤。）

薩森決定不賣掉全部抄本，而只出售一些手寫文稿的拷貝。他光是從訪談抄本當中就拿掉了100多頁，把它們全部放在家中，其中大部分一直在那里放到了1979年。但這種倉促的清理工作進行得一點也不徹底，因為他漏掉了包含阿爾文斯萊本的訪談錄音內容（應該來自第2號磁帶）。畢竟時隔兩年之后很難清楚記得，一個裝滿雜七雜八文稿的行李箱里到底有些什么東西。

### 出售

按照下面這個故事最常見的版本，威廉·薩森抓住機會，趕緊把錄音抄本賣給了媒體，以便從這個事件中賺取最大收益。然而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薩森不僅有當初與艾希曼達成的協議作為依據，還能夠運用那些材料來追求二人從一開始便共同擁有的興趣。他除了知道如何趁機大發利市之外，還始終是個立場堅定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和反猶太主義者。今天這聽起來或許讓人覺得匪夷所思，可是薩森并非僅僅為了錢的緣故，才利用自己與《生活》雜志的關系，出版了他跟全世界最著名囚犯的訪談內容。后來的事件更表明，薩森真的相信公布那些資料，能夠在審判過程中為艾希曼提供幫助。凡是熟悉薩森-弗里奇圈子內那種虛妄歷史論述的人，都不會對如此不通世故的表現感到驚訝。例如薩森認為，綁架艾希曼的行動根本沒有得到以色列政府的批準，而只是一小撮狂熱分子在搞事情，現在將給以色列帶來巨大的麻煩。薩森深信，一個能開口說話的艾希曼正是“那些猶太人”所害怕的。他曾寫信給艾希曼的辯護律師，表示這場審判“將如當年的德雷福斯（Dreyfuss）事件一般，在公眾輿論的層面決定結果”。[[8]](#_8_15)曾是一名成功戰地記者的薩森，相信自己格外擅長使用輿論這種武器。艾希曼在阿根廷的各種言論將讓“猶太人”陷入困境，將揭露“以色列地”（Eretz Israel），世人將意識到艾希曼——和所有德國人一樣——是猶太人世界陰謀的真正受害者，并終于看清“猶太人”的真面目。如果還有什么東西能夠救得了艾希曼的話，那就是“猶太人”對這些“真相”遭到“揭露”的畏懼。那對薩森而言是毫無疑問的事情。因此，如果他能巧妙運用艾希曼在彭巴草原的自由天地所發表的言論，艾希曼即可在全世界面前自由地說話，完成比作為以色列人的階下囚更多的事情，反正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只會遭到刑訊逼供，因為薩森與包括《明鏡周刊》在內的一些德國媒體[[9]](#_9_15)想當然地認定那場審判不可能是公正的。假若薩森圈內人的歷史圖景不是如此瘋狂的話，那種策略說不定還可以行得通。然而為一個無可辯護的人辯護，只會帶來最糟糕的災難，因為艾希曼的所作所為已經超出了一切犯罪行為的范圍。

當然，這種奇特的友情相助也會帶來利潤，而且在一夜之間失去了養家支柱的艾希曼一家對此也有迫切需求。薩森結合商業頭腦、政治野心和個人情誼從事的這項行動，成為其新聞生涯的最大成功，但同時也終結了他的新聞事業。薩森曾經在1955年首開先河出售對庇隆的專訪，深諳新聞工作是一個快節奏的行業。于是他邀請那家美國雜志派代表前來布宜諾斯艾利斯，并且催促薇拉·艾希曼在6月5日即與《生活》雜志簽訂了合同。[[10]](#_10_16)艾希曼的妻子作為丈夫的法定代理人，而薩森則擔任她的顧問和艾希曼文稿的“編著者”。文稿要等到審判結束后才可以發表，《生活》雜志有權在其他地方出售材料，但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出售給以色列。雙方協議用1.5萬美元和支付給薩森的5000美元酬勞，來換取“150頁手寫稿和600頁打字稿”。然而有跡象顯示，薩森或許曾在薇拉·艾希曼不知情的情況下，以其他方式獲得了更大一筆錢。[[11]](#_11_14)

為了證明材料貨真價實，薩森同意《生活》雜志的代表看了幾頁挑選出的原稿，并播放了一部分錄音帶。從頁面的數目（以及后來《生活》雜志發表的內容）可以看出，交給《生活》雜志的文稿只是節選，相當于訪談內容的60%以及手稿的40%，其中包括67號錄音帶上艾希曼臭名昭著的“結束語”，以及消失了很長時間、筆跡難以辨認的《開潛艇的匿名流浪者》手寫稿。正如艾希曼的律師后來向薇拉·艾希曼說明的那樣，她實際上無權進行這種談判，因為版權擁有者實際上還活著，盡管他被囚禁在以色列的牢房里面。[[12]](#_12_14)薩森卻可以用“編著者”這個稱呼鉆法律的漏洞，從而保障自己的權利。因為按照新聞界迄今的慣例，獲得酬勞和版權的不是受訪者，而是進行采訪的編著者。此外薩森顯然想要以這種方式保留對出版內容的控制權，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被稱為作者。然而他的這個如意算盤沒有打成。

薩森在6月的時候便再度前往歐洲和德國。塞爾瓦蒂烏斯后來聽說，薩森陪同阿根廷總統阿圖羅·弗朗迪西（Arturo Frondizi）一同飛越了大西洋。那個消息雖不正確，卻清楚表明了其他人如何看待薩森擁有的關系。[[13]](#_13_12)薩森隨即與德國《明星周刊》進行了談判。他和那家雜志社的關系非常特殊，因為薩森曾經與《明星周刊》的創辦人亨利·南寧一起服役于黨衛軍的庫爾特·埃格斯中隊。南寧的成功部分要歸因于他大膽信任不走尋常路的通訊記者，不太顧慮道德方面的問題。1959年的時候，南寧甚至讓薩森的筆名“威廉·S.范·埃爾斯洛”上了《明星周刊》的刊頭，并且附上了他在阿根廷的真實地址。[[14]](#_14_12)薩森在家人面前對此津津樂道，同樣他也喜歡向他們講述自己為《明鏡周刊》工作的經歷。[[15]](#_15_12)今天我們只能推測薩森究竟把哪些文件賣給了《明星周刊》，因為盡管雜志社大方地向我開放檔案，盡職盡責的檔案管理人員卻找不到任何一頁薩森的資料。對于出版社檔案管理中不幸出現的這個遺失，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一種是檔案在某個時候全被清理了，另一種就是果真如中情局的線人所說，負責報道艾希曼的那位《明星周刊》記者已經把原件寄去了以色列。[[16]](#_16_12)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有幾條線索指出《明星周刊》最初的資料包含哪些東西。美國中情局的報告提到了80頁手寫稿。羅伯特·彭道夫（Robert Pendorf）則根據他為《明鏡周刊》撰寫的文章系列，在書中引用了可明確辨識出來的艾希曼手寫稿，包括《開潛艇的匿名流浪者》以及大型手稿的若干內容，也有一部分來自薩森抄本。此外，德國報社的編輯部逐漸開始有傳言，表示漢堡有人持有大量艾希曼采訪稿。《明星周刊》的文稿很可能與《生活》雜志的材料相同，而其編輯部門極度克制地只提及手寫稿的做法，應該主要是想避免因為使用權的問題與《生活》雜志對簿公堂。[[17]](#_17_12)除了提供這些文件之外，薩森還讓《明星周刊》的記者們深入了解了艾希曼在阿根廷的生活。但他仍然小心翼翼地完全避開薩森訪談會，而是把艾希曼刻畫成一個被拋棄的人，在記者薩森的誘導下傷感地談起自己當年的服從行為。許多跡象表明，薩森也向《明鏡周刊》提供了這80頁的“阿根廷文稿”以及抄本的一部分，但該雜志顯然并沒有使用這些內容。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名消息提供者推測，《明鏡周刊》發行人魯道夫·奧格施泰因（Rudolf Augstein）打算等待更好的時機。[[18]](#_18_12)此外薩森還與荷蘭哈勒姆（Haarlem）的斯帕爾訥城（Spaarnestad）照片文獻庫簽訂了合同，而且《人民報》也收到了拍攝的底片材料。[[19]](#_19_12)

### 艾希曼與阿根廷的舊包袱

大約同一時間，艾希曼在以色列也開始談起他與薩森的交往，起因是艾希曼被問到了一位昔日同僚的名字：魯道夫·米爾德納。[[20]](#_20_12)艾希曼在薩森訪談會的討論中還深信魯道夫·米爾德納已經“消失無蹤”，此時卻謊稱米爾德納是薩森訪談會的積極參與者。他厚顏無恥地引用了米爾德納的紐倫堡聲明，而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時還宣稱根本沒那么一回事：“我直到大約三年前才再一次與米爾德納說話……當著一位薩森先生的面，逐點反駁了那些事情。薩森先生是一位得到認可的人，按照當地官方的講法是一位‘記者’。……米爾德納依舊堅持他在紐倫堡出庭作證時所采取的立場，亦即蓋世太保事實上與殺戮的過程毫無關系。”[[21]](#_21_12)艾希曼這么做的時候，承認了有關阿根廷錄音帶和錄音抄本的事情。但那其實符合他慣用的伎倆，在預期即將遇到困難的時候故意主動放出一些風聲，借此打探以色列人手中掌握了多少證據。然而檢方當時尚未接觸到薩森訪談錄，因此還沒有任何更詳細的資料。

薩森與《明星雜志》談判之后，便前往薩爾茨堡拜訪埃伯哈德·弗里奇，而弗里奇已經安排好與奧托·艾希曼和羅伯特·艾希曼兩兄弟的會面。[[22]](#_22_12)薩森明白，長遠來看，若無艾希曼家人和弗里奇的一致同意，他什么也做不了。畢竟弗里奇當初是薩森項目的出版商，因此也是與艾希曼協議的一部分，而且根據協定，應由他們三人平均分享出版后的收益。弗里奇仍然信任和尊敬薩森，于是等薩森說明了新的出版計劃之后，他和艾希曼的弟弟們都沒有表示反對。薩森一再重申自己僅僅售出了在美國的權利。雖然這是個謊言，但想必會讓弗里奇感到高興，因為盡管已被禁止從業，他卻仍然希望能夠再次成為出版商。薩森甚至還借口他不幸遺失了與《生活》雜志的合同來蒙混過關，所以無法把它拿出來作為證據。薩森也沒有向他們任何人出示抄本，以致艾希曼的弟弟們始終料想不到，這些文檔可能會對艾希曼的辯護構成多大威脅。薩森主張立刻撰寫一本關于艾希曼的書，這個提議得到了一致同意，弗里奇更準備親自負責聯絡出版社的工作。弗里奇為此拿到了薩森從《明星周刊》的那份拷貝中抽出的幾頁資料——但這也將證明是一個錯誤。[[23]](#_23_12)

亨利·南寧為《明星周刊》充分利用了這個機會，從1960年6月25日即已開始分四期連載《艾希曼的最后蹤跡已被發現》系列文章。即使沒有我所遇到的《明星周刊》今日工作人員對此的興致，我們仍可以稱它是新聞界的一項杰作。本-古里安向以色列國會發表聲明一個月后，《明星周刊》發表了更多有關艾希曼地下生活的照片和內幕資訊，其數量之多至今仍非其他任何雜志所能及。記者們巧妙運用了艾希曼針對自己生平給出的每一條線索，而薩森在1957年還覺得它們完全乏善可陳。記者們在阿爾騰薩爾茨科特進行采訪，在美國與艾希曼的逃跑助手兼情人內莉·克拉維茨交談，刊登艾希曼家中的照片，并且引用他寫在書中的私人注記，所掌握的頭條新聞材料遠遠超出《生活》雜志。當美國的雜志編輯們還在對著大量幾乎無法翻譯、結構散漫的抄本頁面不知所措時，《明星周刊》的系列文章卻大手筆地糅合了北德風土民情、阿根廷（空蕩蕩的）家中情景，并且充滿了家人的照片——從可愛的小孩一直到媚俗的阿爾卑斯山脈全景前方的小提琴盒照片，此外還加上了關于納粹歷史的驚人恐怖事實。從住在隔壁的大屠殺兇手到情報單位的綁架故事，這一系列文章涵蓋了編輯們所夢寐以求的一切。歷史學家們甚至至今仍在引用這些文章，此一事實因而也呈現出來，這個文章系列不只在增加發行量上獲得了成功，它所提供的正確資訊也明顯多于謬誤（以及一些來自薩森的虛假信息）。這種快速發表的勇氣也意味著高風險，南寧和《明星周刊》在1983年時就因為急于刊載所謂的“希特勒日記”而付出慘痛代價，但在1960年6月，南寧得到了豐厚的回報。

《明星周刊》的這些文章甚至成為審訊艾希曼時的輔助材料，但如此一來也向艾希曼發出了信號，表示薩森已經開始出售“阿根廷文稿”。不過由于調查人員未曾在文章中發現任何提及薩森或者訪談會的地方，艾希曼得以再次處于有利地位。

### 艾希曼的文稿成為搖錢樹

隨著以色列檢察機關開始注意到薩森訪談會的意義，那名納粹分子以自由之身發表的自白也在以色列境外燃起了人們的希望。和薩森一樣，其他信仰堅定的國家社會主義者也希望“阿根廷文稿”有助于推翻或至少反駁那名以色列囚犯預計將做出的供詞，或者能夠進行反駁。反猶太主義者覺得猶太人什么手段都使得出來，因此確信艾希曼最終會說出以色列人想聽到的任何東西。納粹圈子更普遍認為，艾希曼當初想必早就在阿根廷說出了他們的“真相”，亦即從來沒有過猶太人大屠殺，否則至少也會堅決加以否認。因此他們起先非常積極地幫助那名身陷囹圄的黨衛隊同志，設法將“阿根廷文稿”公之于眾，并且希望最好還能夠從中牟利。

弗朗索瓦·熱努在把納粹文稿變成現金方面，具有最為豐富的經驗。他十分可疑地結合了許多不同角色于一身，像是希特勒的崇拜者、落難英雄的撫慰者和情報機構的好幫手、戈培爾和鮑曼的出版商，以及阿拉伯世界的銀行家。[[24]](#_24_11)在1960年時，熱努的交際范圍已從昔日與希特勒的交往，發展到了與聯邦刑事調查局領導高層和阿拉伯自由戰士的親密友誼。他與當時居住在巴特特爾茨（Bad Tölz）的好友漢斯·雷興貝格協力行動，立刻聯系了艾希曼的弟弟們以組織辯護工作。艾希曼的弟弟們卻已經選好了一位律師，即雷興貝格很可能從紐倫堡審判時期便已熟識的羅伯特·塞爾瓦蒂烏斯。[[25]](#_25_11)但從一開始就很清楚的是，訴訟費除了來自艾希曼文稿的銷售收入之外，還有以色列政府支付給塞爾瓦蒂烏斯的款項，以防他沒有其他經費來源。[[26]](#_26_10)從1960年秋季開始，有一個“林茨利益聯合會”（Interessenvereinigung Linz）為此一再舉行會議。某次甚至還有人看見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在薩爾茨堡一家大飯店舉行的會議上現身。[[27]](#_27_9)擔任飯店門房的弗里奇提供了那個場地，雷興貝格和熱努負責出錢，塞爾瓦蒂烏斯負責聯絡以色列牢房內的那名囚犯，艾希曼的弟弟們則成為其兄長阿道夫·艾希曼的全權代表。從他們彼此之間的信件往來，以及德國聯邦情報局所接獲的報告，皆可看出“林茨利益聯合會”實際上名不副實：該聯合會一點也不團結一致，而且因為利用艾希曼賺取的金錢起了爭執。

參與其事的每一個人似乎都沒有意識到，這不啻于進行“化圓為方”的困難嘗試：他們打算通過公布文件來資助一場成功的辯護，不過那些文件本身的存在，就使得原本已無甚希望的辯護工作變得完全沒有了勝算。不過他們最初面臨的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問題：“阿根廷文稿”的保管人威廉·薩森無意讓其他人推銷他所持有的那些文件，因而拒絕把它們交出來。艾希曼的辯護律師雖然通過弗里奇和艾希曼的弟弟，知道了“阿根廷文稿”的存在以及與《生活》雜志簽訂的合同，可是他和艾希曼的弟弟一樣，完全不知道自己未來的客戶在阿根廷講過什么東西和寫出了哪些內容。[[28]](#_28_9)當塞爾瓦蒂烏斯在1960年7月14日正式收到律師委任書時，他根本不知道阿根廷的自白所可能帶來的危險。從10月9日在以色列進行第一次談話開始，他的當事人在這個問題上就在對他說謊，而且一直持續到審判結束。羅伯特·艾希曼和埃伯哈德·弗里奇也始終沒有讓塞爾瓦蒂烏斯得到足夠的信息。但無可否認的是，塞爾瓦蒂烏斯確實給人一種印象，覺得他實際上并不想知道太多細節，更何況他手頭有關艾希曼一案的文件已經讓他忙不過來了。

那個時候薩森正不知疲倦地在歐洲穿梭旅行。波恩的記者們報道，薩森在7月的一次聚會上還播放了一卷原始錄音帶。“林茨利益聯合會”緊張不安地注意到了這一切。[[29]](#_29_9)同時薩森還在努力構思自己的艾希曼專文，因為他仍然相信他會親自撰寫《生活》雜志的那篇文章。埃伯哈德·弗里奇和漢斯·雷興貝格則不像薩森那么謹慎。弗里奇想要快速找到出版商，因此粗心大意地導致德國聯邦情報局獲得了有關“阿根廷文稿”的消息。于是當大家屏息凝神等待即將到來的審判時，又冒出了另外一個不可估量的風險。[[30]](#_30_9)

來自弗里奇的信息驚動了聯邦德國的情報部門，部分原因也在于他拒絕把樣稿交給出版商，而且出于宣傳目的夸大了文稿的篇幅，宣稱其內容多達3000頁。德國聯邦情報局隨即從慕尼黑向華盛頓發出求助，表示艾希曼的朋友們正積極試圖出售“艾希曼的回憶錄”，以向其家屬提供財務援助。這其間存在的很大危險在于，拷貝有可能落入東德手中。[[31]](#_31_9)艾希曼一案早已成為東西德對立關系中的火藥桶。弗里奇喋喋不休地談論與《生活》雜志的合約，導致德國聯邦情報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急忙向《生活》雜志詢問那些文件，并針對弗里奇展開調查，因為他們懷疑他是東歐集團的間諜。波恩方面更特別擔心艾希曼會提到“格洛布克”之類的名字。美國中情局于是伸出援手，向《生活》雜志施壓，要求在公開發表時絕對不可以出現格洛布克的名字。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W. Dulles）很快即向慕尼黑做出讓人松了一口氣的答復，表示“格洛布克”這個名字只在艾希曼的言論中出現過一次，而且《生活》雜志已被說服不會把它印出來。[[32]](#_32_9)其實中情局完全不必施加太多壓力，因為“阿根廷文稿”里面根本沒有出現格洛布克的名字。[[33]](#_33_9)在阿根廷聽寫錄音帶內容的時候，確實不時會提到“格洛……”，但所指的對象其實是“萊因哈德行動”的領導人奧迪洛·格洛博奇尼克，而且在閱讀打字稿時完全不會漏掉。由于《生活》雜志刊出的艾希曼文字摘錄多半沒有評注，其簡短的介紹性說明甚至不可能讓人覺得是在影射格洛布克。不管是誰蒙騙了誰，反正《生活》雜志沒有任何東西值得杜勒斯施壓阻撓。但德國聯邦情報局和聯邦總理府還是應該為此心懷感激才對。

美國中情局已經獲得了一些關于《生活》雜志那份拷貝的信息：它總共包括600頁打字稿和40頁手寫稿。薩森通過《生活》雜志知道了情報機關在編輯部的調查行動，并且責怪弗里奇害得他此后被拒絕入境美國。弗里奇的過失讓薩森有理由不再向奧地利寄送更多文件。[[34]](#_34_9)熱努和雷興貝格對這個發展只會感到滿意，因為如此一來至少擺脫了一個與他們分享利潤的人。只要埃伯哈德·弗里奇那位深受艾希曼敬重的出版商還在，即便沒有薩森，他們也能得到故事講述者的信任。

弗朗索瓦·熱努和“林茨利益聯合會”那時早已找到一個獲得艾希曼自白不那么復雜的來源——在以色列的囚犯本人。艾希曼抵達以色列之后，立刻就按照調查當局的要求開始撰寫新的文稿。[[35]](#_35_9)讓總檢察長感到驚訝的是，艾希曼主動寫下了一大堆文字，包括其生平自述（《我的回憶錄》，Meine Memoiren，1960年5月）、他在戰后的逃亡經過（《我的逃亡》，Meine Flucht，1961年3月），以及別人向他建議的任何主題。他在這些文稿中純熟地扮演了新手作家的角色，“15年來第一次”嘗試寫下自己的想法和經歷。他對每一本為此目的而提供給他的書籍都表現出好奇與喜悅，盡管它們正是艾希曼前些年在阿根廷與朋友們逐字逐句研討過，并斥為“猶太瞎扯淡”（jüdischer Schmus）[[36]](#_36_10)和“謊言大雜燴”（Lügensammelsorium）[[37]](#_37_9)而撕毀的書籍。

艾希曼甚至認為文稿可在審訊結束不久之后對外公開發行。他努力不懈地對最后多達3564頁的文稿進行修改，而且很晚才告訴他的辯護律師，自己“每天都在口述報告”。[[38]](#_38_9)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竭盡全力隱瞞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他多年下來在立論撰寫、錄音口述和文字創作等方面累積了豐富的實務經驗，如今所做的不外乎是針對一個新的目標群體寫下自己的遁詞。艾希曼在以色列的寫作，從一開始便或多或少微妙地跟他自己的“阿根廷文稿”唱反調。

最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留下大約8000頁的文字：手稿、談話記錄、信件、個人文檔、世界觀論述、零星札記，和文件上面的好幾千條旁注。熱努和雷興貝格，以及未被以色列當局多加阻撓，但受到德國聯邦情報局監視的塞爾瓦蒂烏斯[[39]](#_39_9)要從這一大堆資料中尋得解脫，他們對外出售了那些文稿的一部分，再加上艾希曼在阿根廷的私人照片，還包括對艾希曼妻子的獨家采訪。[[40]](#_40_9)他們的商業頭腦不知節制，竟然還讓人拍攝了薇拉·艾希曼拿著一束鮮花站在達豪大街（Dachau-Straße）路牌前的照片。那些人顯然認為艾希曼的人生已經毫無指望，但仍舊可以賣個好價錢。那批專業利潤榨取者的最后一件作品，就是以書面形式對那名囚犯進行的獨家專訪，并且起了一個吸引力十足的法文標題《艾希曼在墳墓另一邊的話》（‘Eichmann parle d’outre-tombe’），于艾希曼被處決一個星期之后刊登在《巴黎競賽畫報》（Paris Match）上。[[41]](#_41_9)

熱努很快就對艾希曼的出庭辯護失去了興趣，因為他想必已經意識到，那名被告根本不適合擔任關鍵證人來證明“德國人的集體無罪”或拯救“阿道夫·希特勒的榮譽”。[[42]](#_42_9)無論艾希曼在第三帝國、阿根廷還是以色列，他在所扮演的每一個角色中都詳盡地說明了對數百萬人的大屠殺，只不過根據實際情況調整了對自己角色和態度的描述。

### 《生活》雜志及其后果

1960年10月19日，漢堡新聞雜志《明鏡周刊》在報道中指出，“聯邦德國一些編輯部門”中間傳聞，《生活》雜志買下了艾希曼的“人生告白”，而且預計將于近日刊出。這個消息也提醒了塞爾瓦蒂烏斯，意識到還有來自阿根廷的文稿是他所不知道的，因此有必要進一步與艾希曼兄弟和弗里奇討論。他們決定邀請據悉已回到南美洲的薩森前往奧地利，弗里奇甚至表示愿意負擔他的機票。薩森卻拒絕讓任何人看到那些材料，甚至還將行程延后了一個多月，因為他已經告訴艾希曼的妻子，計劃在12月把它出版成書。[[43]](#_43_10)雖然薩森仍一直堅信自己將會替《生活》雜志撰文，那家美國雜志卻提前讓生米煮成熟飯，在11月中旬宣布即將對外公開發表，接著在隨后幾期發表了兩篇文章。[[44]](#_44_10)塞爾瓦蒂烏斯在11月25日得知刊登的消息之后，試圖采取反制行動，卻徒勞無功。《生活》雜志以《艾希曼講述其該死的故事》（‘Eichmann Tells His Own Damning Story’）為題，選錄了為數不多但具有重要意義的訪談抄本和手寫稿段落，并且巧妙地把艾希曼自己的兩個說法用作子標題，分別是《我把他們運給屠夫》（‘I transported them to the butcher’，1960年11月28日）和《總而言之，我不后悔任何事情》（‘To sum it all up, I regret nothing’，1960年12月5日）。與此案有關的每一個人都深感震驚，盡管他們各自的反應有所不同。薩森連忙去找薇拉·艾希曼，完全手足無措地抱怨道：“瞧瞧《生活》雜志對我做了什么！”當薇拉表示不明白《我把他們運給屠夫》那個標題所指為何之后，薩森告訴她說：“那是《生活》雜志干的好事。我為《生活》雜志工作了七年，而那就是他們向我表達謝意的方式。”[[45]](#_45_9)

塞爾瓦蒂烏斯律師也陷入了相當嚴重的危機。他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激動地談到此事對辯護的“災難性影響”，并且表示假如這些文件真實無誤的話，他將會請求辭去律師職務——不過他仍相信它們是偽造的。[[46]](#_46_9)艾希曼在以色列看到《生活》雜志相關文章的譯文時，則直接因神經過敏而精神崩潰。一直負責照顧艾希曼的醫生復述他那名病人的原話：“我完蛋了，我不行了。”[[47]](#_47_9)塞爾瓦蒂烏斯最快回過神來，在《生活》雜志刊出第一篇文章之后便開始系統化地研究“阿根廷文稿”，因為他終究必須查明那些文字到底潛藏著哪些危險。他發了電報給薇拉·艾希曼，并且也向弗里奇和艾希曼的弟弟詢問了有關版權的事宜。所得到的答案非常一致。薇拉隨即回電指出，公開發表一事“乃基于薩森、奧托和薇拉的共同意愿與一致同意”。可見她認為自己是按照丈夫（奧托）的意愿行事的。[[48]](#_48_9)弗里奇同樣向塞爾瓦蒂烏斯證實，艾希曼曾經明確表示，可在他被捕之后對外公開發表。弗里奇還出示了一份號稱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簽訂的舊合同副本。但美中不足的是，它是用德文打字機打出來的[[49]](#_49_9)，而阿根廷并沒有德文打字機。[\*](#_496)

應塞爾瓦蒂烏斯的要求，維拉·艾希曼寄了一份《生活》雜志合同的副本給她在林茨的小叔羅伯特·艾希曼，而且顯然在塞爾瓦蒂烏斯不知情的情況下，把她的那一份“阿根廷文稿”也寄了過去。艾希曼家族想必已經決定，既不向律師也不向雷興貝格、熱努或者弗里奇透露文稿已經抵達的消息，因為塞爾瓦蒂烏斯仍不斷向薩森索取其實早已抵達羅伯特辦公室的那些資料。羅伯特·艾希曼很可能已經開始閱讀那些文件，并擔心萬一塞爾瓦蒂烏斯瞧見這些文件的話，果真會宣布放棄辯護。今天我們知道，林茨的那一份“阿根廷文稿”比《生活》雜志的副本內容更加豐富，而且包含了許多艾希曼的手寫文字。辯方因此無法稱那些文稿為《生活》雜志偽造出來的或者經過薩森編輯的，因為它們顯示了艾希曼自己的筆跡。當塞爾瓦蒂烏斯還在努力設法把薩森傳喚到德國，并且詆毀《生活》雜志所發表的文章時，羅伯特·艾希曼已經與薩森和弗里奇一樣，知道了“阿根廷文稿”的真正內容。不過顯然只有艾希曼的弟弟意識到，任何進一步的對外公開只會造成傷害。然而事實證明，把文稿留在辦公室同樣也是不智之舉。

與此同時，薩森終于如愿以償地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因為《生活》雜志指出他就是采訪者，只不過把他說成了一位“德國記者”。現在每個人都想知道究竟是誰完成的這項壯舉，在阿根廷采訪了艾希曼。這個迄今為止幾乎不為人知的記者所引發的巨大興趣，甚至又激發出一篇想象力十足的“采訪稿”，進一步破壞了塞爾瓦蒂烏斯與薩森之間的關系。二人相互指責對方為這篇文章向新聞界提供了虛假信息。[[50]](#_50_9)隨后薩森果真在阿根廷接受采訪，表現得充滿自信且公開反對以色列。[[51]](#_51_9)他又一次提供了影響審判案的關鍵用詞：薩森將艾希曼形容成“納粹邪惡機器上的一個小齒輪”。當薩森后來真正設法向塞爾瓦蒂烏斯伸出援手，提供自己的內部知識時，塞爾瓦蒂烏斯卻只看見了威脅，因而沒有理會他可能提供的幫助。[[52]](#_52_9)盡管幾個月之后，艾希曼還在與他的律師討論薩森準備撰寫的那本書，以及對任何獲利的分配方式[[53]](#_53_9)，但薩森已經再也無法靜下心來撰寫自己的艾希曼專書。現在換成他自己覺得受到追捕，仿佛他就是把阿道夫·艾希曼出賣給以色列的那個人一般。

### 尋求懺悔

可以理解的是，自從《生活》雜志發表的專文給以色列檢察當局帶來很大助益之后，以色列檢方日益渴望能夠拿到完整的薩森訪談錄。熱衷于獲得這些材料的并不只有以色列當局一方，但令許多人失望的是，顯然沒有人能夠真的拿到《生活》雜志的那一套副本。然而，最晚在1960年12月21日，卻有一名來自德國的美國中情局線人以“主題：艾希曼回憶錄”為標題，向華盛頓寄送了數頁薩森抄本與手寫稿。[[54]](#_54_9)他（或她）為“艾希曼回憶錄復印件熱轉印副本”的低劣品質表示歉意，并指出原因在于副本原件的質量已經不佳，有時甚至完全無法閱讀。然而手寫稿的副本卻容易閱讀多了，不過前提是讀者必須能夠閱讀老式德文書寫體。線人還說，他尚未把這些副本與《生活》雜志的文章進行比對。盡管當時在德國已有許多份拷貝，但那名線人仍然極力請求中情局對所收到的材料高度保密。尤其應完全避免提及寄件者的相關信息，否則將會泄露消息來源地——漢堡市。由于漢堡市內唯一已知的副本是在《明星周刊》，因此寄件者只可能是一個曾經在南寧的雜志社竊取資料的人，而且不是第一次這樣做。如果中情局所獲得的消息正確無誤，那么年輕的記者茲維·阿爾杜比（Zwy Aldouby）、伊弗雷姆·卡茨（Ephraim Katz），以及應邀配合的快速寫手昆廷·雷諾茲也使用了據稱直接得自《明星周刊》編輯部一位秘書的材料。[[55]](#_55_9)他們用那些材料撰寫了《死亡的祭司：阿道夫·艾希曼的故事》（Minister of Death）一書，并在1960年9月底出版問世。通過中情局關于漢堡的那條線索，我們也知道了漢堡的“阿根廷文稿”副本（以及由它衍生而出的各種拷貝）是何模樣：質量不佳的抄本拷貝和易于閱讀的手寫稿頁面。當艾希曼審判案的首席檢察官終于在1961年5月公開出示“阿根廷文稿”的以色列副本之后，它看上去卻恰恰相反。那一份副本包含了易于閱讀的薩森抄本，以及閱讀不易的手寫稿拷貝。于是我們根據美國中情局的報告可以推斷，以色列檢方的那一份副本絕對不是來自漢堡。因為不可能像變魔術一般，通過復印把不易辨識的文稿變得清晰可讀。

1961年2月，曾為《明星周刊》撰稿的記者羅伯特·彭道夫在漢堡推出其關于艾希曼的著作《殺人犯與被謀殺者：艾希曼與第三帝國的猶太人政策》（Mörder und Ermordete. Eichmann und die Juden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彭道夫在書中描述他的參考資料（亦即《明星周刊》從薩森處獲得的資料）是寫在方格紙上的手稿，“一篇長達80頁左右的手稿，非常籠統地報告艾希曼在納粹德國的活動，沒有細節”[[56]](#_56_10)。此外他還可以運用許多“有艾希曼手寫旁注的圖書”，以及“艾希曼針對所有探討第三帝國猶太人政策的重要出版物，在活頁紙上寫的一篇篇長達數頁的評論”。然而彭道夫過分強調了自己并未使用薩森訪談錄，那份“前荷蘭黨衛隊官員威廉·薩森·范·埃爾斯洛后來協助艾希曼錄音到磁帶上，接著于艾希曼被捕之后由美國《生活》雜志大幅刪減（！）加以發表的‘回憶錄’（請注意彭道夫所使用的引號！）”。由此可見彭道夫清楚知道薩森訪談錄的范圍，此外在其書中也出現了運用薩森抄本的痕跡。他之所以采取那種劃清界限的做法，很可能主要是為了避免與《生活》雜志產生版權糾紛。然而彭道夫的描述不但指出薩森至少曾向《明星周刊》及其阿根廷記者展示了哪些資料，更顯示出人們在1961年2月時對“阿根廷文稿”的范圍可能已經知道了多少。但無論如何，彭道夫早已看見了直到幾年前都沒有對公眾（或者甚至是對研究人員）開放的資料。

1961年年初的時候，《生活》雜志摘錄稿、一部分抄本和大約80頁手寫稿已在報刊編輯部門和至少兩家情報機構之間流傳。然而沒有證據表明以色列檢察機關或黑森總檢察長弗里茨·鮑爾在此時已經掌握了“阿根廷文稿”的拷貝。這種情況在1961年3月出現了改變，但這并非樂于助人的記者所導致的結果，而且顯然也不是德國或美國情報機構的功勞。

### 安全漏洞

1961年3月初，來自維也納的赫爾曼·朗拜因，華沙的托馬斯·哈蘭和法蘭克福的亨利·奧蒙德，在法蘭克福的一家大飯店舉行了一場意義重大但迄今鮮為人知的會議。這三個人各自都有著不同凡響的人生經歷，若非基于還原納粹歷史和伸張正義的強烈共同愿望，他們肯定不可能聚在一起。

1912年出生的赫爾曼·朗拜因是奧地利共產黨的早期成員，相繼從幾座集中營幸存下來，成為維也納國際奧斯維辛委員會第一任總書記，后來也擔任國際集中營委員會（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Camps）的負責人，并被授予“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榮譽稱號。[[57]](#_57_10)他在1945年后完全致力于揭露和懲罰納粹罪行、喚起公眾對幸存者悲慘遭遇的關注，并要求有系統地提出刑事訴訟。他還整理了大量關于追捕納粹逃犯的新聞檔案、參與教育工作和組織前往波蘭的調查之旅。朗拜因良好的關系使他在鐵幕的另一邊也能找到證人。在聯邦德國還沒有與波蘭建立外交關系時，他就促成了弗里茨·鮑爾與波蘭司法人員建立聯系。艾希曼在朗拜因的名單上名列前茅。1959年年初，朗拜因已經在波蘭目標明確地尋找照片，同一年更在奧地利配合亨利·奧蒙德正式對艾希曼提出刑事指控。[[58]](#_58_10)

亨利·奧蒙德原名漢斯·路德維希·雅各布松（Hans LudwigJacobsohn），1901年出生于卡塞爾（Kassel）。他是一名德國司法人士，但因為猶太出身而在1933年失去其曼海姆地方法院法官的職位，接著在1938年11月的迫害猶太人行動中遭到逮捕。奧蒙德在三個月后證明自己有辦法移民出境，才終于獲準離開達豪集中營。此次拘禁害得他的一只手幾乎動不了，讓他終生都會回想起那段時光。奧蒙德先后輾轉逃往瑞士、英國和加拿大，后來又以英軍士兵的身份返回歐洲，在漢諾威和漢堡擔任占領軍官員，負責建立新的新聞媒體。亨利·南寧和魯道夫·奧格施泰因都是通過亨利·奧蒙德獲得了許可執照，而奧蒙德畢其余生都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明星周刊》和《明鏡周刊》。[[59]](#_59_9)他從1950年4月開始在法蘭克福擔任律師，參與了對法本化工公司進行的第一次強迫勞動審判案（Zwangsarbeiterprozess），并通過各種方式致力于維護納粹受害者的權益。光是在奧斯維辛審判案中，他便代表了15名共同原告。[[60]](#_60_9)此外他也屬于最早發現并譴責聯邦德國外交部修正主義歷史做法的人之一。[[61]](#_61_10)

托馬斯·哈蘭出生于1929年，是因為拍攝《猶太人蘇斯》一片而聲名狼藉的電影導演法伊特·哈蘭的兒子。他從1959年開始定居華沙，把對父親的失望（以及對戈培爾在圣誕節送玩具火車給他的記憶），轉化為創造力以及在歷史新聞學方面的研究。哈蘭走了一條不同尋常的道路，因為他主要在波蘭進行研究工作，完全不理會當時已大行其道的東西方分裂局面。哈蘭希望揭露納粹罪行，并指名道姓地說出犯案者。他為此策劃了一部名為“第四帝國”的大型出版物，講述納粹要犯在戰后的生活。1960年5月，他在波蘭著名的《政治周刊》（Polityka）發表文章，是關于艾希曼的最早幾篇文章之一。[[62]](#_62_9)

奧蒙德和朗拜因最晚從1955年起就彼此認識，而且很快相互欣賞。二人一起商定新聞稿的內容；奧蒙德運用朗拜因的關系來獲得訴訟時所需的文件和證人，朗拜因則借助奧蒙德熟悉德國法律體系的細節。早在1959年，黑森總檢察長弗朗茨·鮑爾就已經通過亨利·奧蒙德與朗拜因取得了聯系。朗拜因提議幫鮑爾及其同事安排前往奧斯維辛實地考察的行程，只可惜那次行程在最后一刻因為官僚主義而失敗了。[[63]](#_63_9)朗拜因和哈蘭則是經由哈蘭作為奧斯維辛幸存者的波蘭女友而結識，同時也因為哈蘭在波蘭從事新聞和出版工作。最后，奧蒙德和哈蘭至遲在1960年左右，經由朗拜因或弗里茨·鮑爾而認識了彼此。

朗拜因從維也納帶過來的“阿根廷文稿”最完整拷貝，促使三人于1961年3月3日至6日在法蘭克福齊聚一堂。[[64]](#_64_9)那些資料直接來自艾希曼同父異母弟弟羅伯特·艾希曼在林茨的辦公桌。朗拜因告訴托馬斯·哈蘭，有一名“鎖匠”進入了位于主教街3號（Bischofstraße 3）的辦公室，于是取得了薇拉·艾希曼寄給她小叔的900頁拷貝。我們無法確定是否真的需要一名鎖匠，因為還有另外一個可能性。西蒙·維森塔爾早在1960年年初即已通過奧地利秘密警察，與羅伯特·艾希曼20歲出頭的女秘書建立了聯系。說不定就是她協助那名“鎖匠”打開了門。[[65]](#_65_9)

但不管怎樣，這些戰利品都被交給了赫爾曼·朗拜因。[[66]](#_66_9)于是他立刻展開行動，聯系了他認為能夠妥善利用這些文件的一些人。依爾姆特魯德·沃亞克發現證據，弗里茨·鮑爾在3月7日將復印設備留給自己的辦公室使用，以致其他同僚的復印工作都必須轉移到黑森州司法部進行，因為正如一份辦公室備忘錄所說，“法蘭克福的復印設施已經不夠用了”。[\*](#_497)總檢察長鮑爾需要動用一切設備來復制錄音帶的抄本，而那些錄音帶“據稱乃艾希曼還是自由之身的時候親自口述的”。[[67]](#_67_9)哈蘭的波蘭女朋友克雷斯蒂娜·日武爾斯卡（Krystyna Żywulska）回憶說，鮑爾所復制的文件直接來自赫爾曼·朗拜因。這意味著鮑爾也從法蘭克福的那次會面獲益良多。艾希曼在林茨的同父異母弟弟顯然沒有告訴任何人其辦公室遭竊的事，結果艾希曼的律師還在等著威廉·薩森的副本，漢斯·雷興貝格的信件也顯示他仍然相信只有薩森才持有抄本。顯然，羅伯特·艾希曼因為對“阿根廷文稿”這樣敏感的材料缺乏安保措施而尷尬不已，以致根本沒有把此事告訴哥哥的家人。除此之外，至今也沒有證據顯示曾有人向林茨警方報案。[[68]](#_68_9)整個行動進行得干凈利落，甚至連情報機構的檔案中都找不到任何記錄。

奧蒙德、哈蘭和朗拜因之間的會晤還有另外一個目的。朗拜因需要資金把羅伯特·艾希曼版本的“阿根廷文稿”拍攝下來，以便哈蘭深入分析這些內容涵蓋甚廣的原始文件。因為朗拜因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盡快發表這些資料。3月底的一份財務報表顯示，亨利·奧蒙德果真想辦法為拍攝底片一事提供了資金。與此同時，意大利左派出版商詹賈科莫·費爾特里內利（Giangiacomo Feltrinelli）也承諾繼續資助哈蘭的工作。[[69]](#_69_9)人們推測弗里茨·鮑爾應該也在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是在多大程度上迄今還不清楚，因為所有信件往來都是通過亨利·奧蒙德進行的。托馬斯·哈蘭在把負片帶到華沙之后立刻就開始閱讀，并且聯絡了另外一位朋友——《政治周刊》的編輯丹尼爾·帕森特。[[70]](#_70_9)帕森特向他的主編建議，不妨把那些材料整理成一個文章系列。那位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先生想必是個非常小心翼翼的人，因為他馬上委托波蘭國民警察（Milicja Obywatelska）的犯罪學家展開鑒定工作。5月6日，《政治周刊》的主編收到了鑒定報告：那些材料真實無誤，筆跡的確是艾希曼的。[[71]](#_71_9)拉科夫斯基與帕森特和哈蘭共同決定，要采取跟《生活》雜志不一樣的做法：《政治周刊》從5月20日開始推出一個分五次連載的系列，不但首度刊登了未經編輯的文稿，而且還向讀者展示了圖像資料、文件復印本、筆跡分析、具有歷史批判性的評論，以及被艾希曼指稱為共犯的那些人的簡介。哈蘭和帕森特在這短短時間內寫出了350頁的評論供人參考。[[72]](#_72_10)直到今天那仍然是最徹底的嘗試，設法以簡單明了的方式向廣大公眾介紹“阿根廷文稿”的史料價值。

因此《政治周刊》的工作人員對所收到的效果格外感到失望，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因為沒有產生效果而大失所望。就連在東歐集團境內也不曾出現任何值得一提的反應。拉科夫斯基在系列文章連載完畢之后心灰意冷地表示，無論是蘇聯還是其他東歐集團國家的媒體，都沒有對此表現出興趣，只有民主德國的柏林廣播電臺在一個星期后要求提供第一篇文章的相關資料。[[73]](#_73_10)在西方國家，《猶太通論周報》（Allgemeine Wochenzeitung der Juden）和《世界報》（Die Welt）附帶提到了這個系列，可是波蘭方面對此并不知曉。[[74]](#_74_9)顯然每個人都誤以為這個系列只不過是轉載《生活》雜志的文章而已，就像法國《巴黎競賽畫報》之類的雜志在5月初所做的那樣。[[75]](#_75_9)此外讓拉科夫斯基摸不著頭緒的是，為什么以色列總檢察長吉德翁·豪斯納聲稱自己在《政治周刊》之后才收到“阿根廷文稿”的拷貝，以及為什么豪斯納沒有出示完整的內容，而只提到了67份錄音帶抄本和83頁手寫稿。拉科夫斯基和吉德翁·豪斯納都沒有想到，原來波蘭的那個版本更加完整，而且內容多出了100頁以上。拉科夫斯基根本無法想象，華沙的一名雜志編輯竟然可以使用以色列檢察當局所不知道的資料——畢竟那可是20世紀最重要的審判案之一。拉科夫斯基因而變得炙手可熱，不僅與以色列檢察機關有了良好關系，與艾希曼研究界亦然。

### 以色列的副本

吉德翁·豪斯納究竟從何處取得了他的那一份“阿根廷文稿”副本，以及他的團隊從什么時候獲得了這份副本，一直是一個謎。但那些探索文稿的流傳經過而一直追蹤到這里的人，至少已經向前多走了好幾步。我們不無理由相信，赫爾曼·朗拜因也曾打算向吉德翁·豪斯納提供他的偉大戰利品（或者至少確保弗里茨·鮑爾會替他這么做）。此外我們可以篤定地推斷，弗里茨·鮑爾這一次也不吝于幫助他的以色列同事，畢竟協力尋找阿道夫·艾希曼的目的，可不是為了向大功告成的追捕者們隱瞞他透過關系獲得的如此重要的文件。但可以確定的是，以色列檢察機關所獲得的那一份證據材料并非來自鮑爾。因為以色列的副本非但內容比較簡略，品質也明顯差了許多：手寫稿的復印本難以閱讀，有些甚至根本無法辨識，當初拷貝時所使用的母本就已經出現污漬和部分受損。羅伯特·艾希曼的那一份盡管偶爾有點模糊，有些地方的頁面邊緣更被裁切得所剩無幾，可是抄本和手寫稿的部分都沒有出現污損。所以很可能的情況是，鮑爾——或許還有朗拜因——盡管樂意提供那些文件，以色列警察第六局卻禮貌地拒絕了，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已經擁有了弗里茨·鮑爾所掌握的一切。那當然不是因為缺乏興趣，畢竟手寫稿是無與倫比的書面證據，而且就連艾希曼自己也無法聲稱手寫稿扭曲了他在阿根廷的真實想法。

一切跡象顯示，以色列方面獲得自己那一份資料的時間應該不晚于弗里茨·鮑爾，也就是在大約3月初的時候，而且與林茨的入室盜竊行動無關。艾希曼的審訊官阿夫納·萊斯仍清楚記得，盡管塞爾瓦蒂烏斯反對繼續審訊下去，他們還是討論了是否該把剛取得的薩森抄本拿來與艾希曼對質。[[76]](#_76_9)萊斯還是相信能夠贏得艾希曼的合作，以便在庭審前獲準使用那些文件，他擔心到了法庭以后，艾希曼恐怕就沒那么容易接近了。這條線索于是讓人得以把收到文件的時間限縮到1961年2月至3月初之間。但不管怎樣，亨利·奧蒙德和赫爾曼·朗拜因都認為，以色列的那個版本也是通過冒險且不合法的行動獲得的。[[77]](#_77_9)因此當總檢察長吉德翁·豪斯納4月26日在法庭上宣稱，“可惜還沒有取得《生活》雜志那些專文所依據的資料”時，他所說的必然不是事實。艾希曼的律師固然也發表過同樣的聲明，但塞爾瓦蒂烏斯當時的確只看見了“阿根廷文稿”的片段。[[78]](#_78_9)當時的參與者多年來一直對自己那份拷貝的來源三緘其口。一直要等到2007年，豪斯納昔日的副手加布里埃爾·巴赫（GabrielBach）才對薩森抄本做出模糊的聲明，表示在艾希曼被綁架之后，“這位記者就把它交給了《生活》雜志，我們則從那里得到了它”[[79]](#_79_9)。然而，如果看一下以色列的版本就可發現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至少有一點顯而易見：那些頁面絕非好整以暇仔細制作的拷貝，完全不像是來自一家擁有薩森原始副本的雜志社。顯然加布里埃爾·巴赫跟其他大多數人一樣，誤以為《生活》雜志的材料與“薩森文件”是同一個東西。而真相其實復雜多了。

湯姆·塞格夫在廣泛研究西蒙·維森塔爾的文稿時發現了一封信。維森塔爾在信中提醒豪斯納總檢察長，幾十年前是他——維森塔爾——讓豪斯納接觸到薩森抄本的。[[80]](#_80_9)涉及維森塔爾的話時固然應該特別小心謹慎，但由于維森塔爾幾乎不可能向肯定比自己更清楚內情的人說謊，看樣子果真是這名來自林茨的熱心人士找到了那些文件。直到最近，維森塔爾當初在審判準備期間提供的幫助都還鮮為人知。由于強調維森塔爾所扮演的角色顯然不符合參與者的利益，因此就沒人記得此事了。摩薩德的首腦伊塞爾·哈雷爾更是不惜扭曲事實和編造故事，借此貶低維森塔爾在給他帶來赫赫聲名的“艾希曼”一案中所起的作用。多虧了湯姆·塞格夫的緣故，我們才得以在50年后做出更公正的判斷。不過維森塔爾的那封信顯示，他只發現了一部分抄本：“你想必還記得，我給艾希曼審判案帶來了28頁帶有艾希曼手寫注記的錄音帶抄本。”[[81]](#_81_9)這表明維森塔爾亦非正式的消息來源。

逐頁比對之后還能發現，以色列檢方必須費勁地拼湊出他們那一份薩森抄本拷貝。它明顯有別于赫爾曼·朗拜因的上好版本，不像后者看得出確實直接拷貝自薩森出售給新聞界的原始副本。[[82]](#_82_9)但我們只有等到檔案開放，能夠知道取得這份文件的時間之后，才有辦法確定維森塔爾究竟是從新聞記者還是從情報人員那里得到了它。但無論如何，德國聯邦情報局一位工作人員宣稱該局是從摩薩德處獲得了“那個謀殺猶太人兇手的日記”，根本就是無稽之談。比較合情合理的問題反而是：德國聯邦情報局為什么沒有把自己在1960年年底就已經擁有的文件，主動提交給以色列檢方呢？[[83]](#_83_9)

豪斯納盡其所能地在審訊期間對那些資料保密。這位總檢察長顯然不僅試圖借此讓艾希曼陷入錯誤的安全感，而且希望爭取更多時間。即便沒有薩森抄本，各種文件也已經堆積如山，如今新增的材料更是難以辨認。因此到了1961年4月的時候，以色列官方仍在要求《生活》雜志交出檢方其實早就擁有的那些資料。吉迪翁·豪斯納首先征詢了專家的意見，并把他的那份拷貝交給以色列警方筆跡鑒定專家亞伯拉罕·哈加格（Avraham Hagag）鑒定。[[84]](#_84_9)

哈加格的貢獻在于最先整理了一個薩森抄本拷貝的順序，并對它做出完整描述。他把一頁頁紙分類，把堆積如山的紙張排列成一個個易于管理的文件卷宗，而且每個卷宗當中都有若干按照編號順序排列的錄音帶抄本。如此便形成了那著名的“2個穿孔文件夾和17個卷宗”——其中16個是錄音帶抄本，“第17號卷宗”則是83頁手寫稿的拷貝。[[85]](#_85_9)順序并不總是完全正確，因為哈加格無意間把若干頁薩森自己的口述內容，以及一份艾希曼獨立文稿的片語只字混進了訪談錄音抄本里面。但在當時的緊迫時間壓力下，那位警方鑒定專家還是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86]](#_86_9)他總共整理出716頁錄音抄本和83頁手寫稿。若扣除三次頁碼重復的錯誤[[87]](#_87_9)，那么以色列的這個副本總共包括了713個打字頁面，以及83個手寫頁面或不完整的頁面。明顯可以看出錄音帶的抄本并不完整，因為5號和11號錄音帶之間出現了空白，41號錄音帶缺少第三頁[[88]](#_88_9)，55號錄音帶則總共只有兩頁。以色列的那一份抄本，效果十足地結束于67號錄音帶“對圓桌成員的小小感言”。因此以色列沒有人想到，它后面還有更多錄音，而且原始錄音帶總共超過了70卷。《政治周刊》的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雖然立刻注意到至少還有第68卷錄音帶存在，但他也沒有由此得出正確的結論。另一方面，5號和11號錄音帶之間的空白以及55號錄音帶不完整的內容，是羅伯特·艾希曼的版本與其他所有流通版本的共同特征。薩森在1960年先移除了這些部分（以及阿爾文斯萊本談話的第一部分），然后才把錄音帶抄本的拷貝公之于世。甚至連他自己也已經意識到，最開始幾次談話中那種肆無忌憚談論“猶太世界陰謀”和“以色列這個強盜國家”（der Raubstaat Israel）[[89]](#_89_9)的言論，是不適合在審判期間對外公布的。

### 被湮滅的證據

如果審判過程中突然出現新的證據，時間就會成為關鍵問題。以色列副本的796頁內容因而對豪斯納的工作人員構成了極大挑戰。誰知《政治周刊》從5月20日開始摘要發表了相關材料，非但刊登樣稿的拷貝，甚至還公開表示愿意把資料提供給以色列來配合檢方辦案。吉德翁·豪斯納為避免顏面盡失，這下子就再也不能繼續假裝若無其事了。于是他在1961年5月22日宣布，目前已擁有手稿的影印本。在法官們的催促之下，豪斯納說出了一半的事實，表示他和他的團隊在三個星期之前得到了那些文件，不過他的拷貝并非直接來自《生活》雜志。

從此以后，該文件就被稱作“薩森文檔”（Sassen-Dokument）。辯方也立即收到一份副本，上面有艾希曼在囚禁期間寫的閱讀注意事項（這份資料現在作為“塞爾瓦蒂烏斯遺物”[Servatius-Nachlass]藏于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德國法律界人士也可以申請使用這份文件。來自路德維希堡的審判觀察員迪特里希·措伊格（Dietrich Zeug）于是寄了一份拷貝給弗里茨·鮑爾，并建議不妨跟他現有的那個版本比對一下。[[90]](#_90_9)豪斯納起初以為的一大成功突破，最后卻出乎意料地凄慘作結。因為當那位總檢察長準備將此證據提交法庭時，恰恰遇到了阿夫納·萊斯所預見的問題：羅伯特·塞爾瓦蒂烏斯立即提出異議，因為艾希曼極力駁斥那些材料的真實性——盡管哈加格在6月9日提交的鑒定書早已證明那就是艾希曼的筆跡。此外在沒有錄音帶的情況下，又該如何證明錄音內容的打字抄本就是原話呢？豪斯納因而被迫一頁又一頁地爭取，可是到了6月12日，他爭取到的結果卻是只能使用艾希曼在上面做了手寫更正，或者完全由艾希曼手寫的那些頁。檢察當局于是眼睜睜看著戰后關于艾希曼和大屠殺的最有力資料，從796頁縮減到83頁上的邊緣注記，以及另外83頁字跡幾乎難以辨認的手寫稿。[[91]](#_91_9)諸如“對圓桌成員的小小感言”之類最具震撼力的文字反而不能引用。艾希曼在接下來幾天依然勤奮不懈，甚至試圖讓為數不多的剩余材料也失去證據資格。他駁斥“著名的薩森文檔”、強調酒精產生的影響、聲稱他所做的大部分修正已經不見了，并且謊稱抄本的品質太過糟糕，所以他干脆完全放棄了繼續修改。在被問到一些手寫評論的時候，艾希曼則表現得跟筆跡專家（以及任何有眼睛的人）完全相反，認不出那是他自己寫出來的。反正那些手寫頁面都毫無用處，因為它們非常不完整，只會讓人產生一種錯誤的印象。艾希曼此外還堅稱自己與薩森達成過協議，每一頁在對外公開之前都必須經過他親筆簽名。但這其實是他在以色列接受審訊時了解到的做法——艾希曼的審訊官阿夫納·萊斯會讓他在每一頁上簽字。[[92]](#_92_9)艾希曼最不可思議的謊言是聲稱薩森的德文很差勁（7月13日）。那位先生原本能夠駕輕就熟地運用鏗鏘有力的德文，不但溫暖了德國納粹思鄉者的法西斯之心，而且讓艾希曼欽佩不已，現在卻突然變成“德語講得結結巴巴，幾乎什么都聽不懂”！除此之外，艾希曼更一再堅持要求拿出原始錄音帶。不過作為預防，他表示薩森曾經鼓勵他做出不實陳述，以便制造頭條新聞（7月19日）。由此他發明了“小酒館談話”（Wirtshausgespräche）這個詞，形容他們連續數小時共同研讀歷史理論與納粹歷史，有時更在酒精的影響下情緒激動地夸夸其談（恰好是在7月20日[\*](#_498)）。艾希曼表示，薩森不時試圖誤導他“回歸”到國家社會主義的范疇。不過艾希曼當然沒有說，整個薩森訪談會其實就是一場回歸行動。艾希曼反而告訴律師，他在阿根廷真正寫出的文稿內容與此大相徑庭，并且愿意像塞爾瓦蒂烏斯后來在法庭上指出的那樣[[93]](#_93_9)，把它“作為證據，向法庭表明被告的真正態度”。艾希曼進而借由薩森和《生活》雜志所傳播的“艾希曼回憶錄”的傳說，巧妙地淡化和避開了任何詢問訪談會為何會發生的問題。

薩森把“阿根廷文稿”賣給《生活》雜志的時候就用了“艾希曼回憶錄”的題目。艾希曼綁架案創造了只有薩森能獨一無二地滿足的需求，即了解大屠殺兇手流亡時的生活細節和思維方式。這樣薩森就同時達到了三個目的：保護薩森訪談會的參與者、將自己展現為沒有國家社會主義傾向的記者，并且根據時局抬高資料的價格。[[94]](#_94_10)薩森當然沒有提起，幾年前他還要求打字員在謄寫訪談錄的時候完全省略艾希曼的生活軼事。不過也沒有人追問薩森是否計劃寫一本關于艾希曼生平的書。

對于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來說，盡管“阿根廷文稿”的存在本身是個根本問題，但這種歪曲事實的說法卻正好可以帶來很大幫助。畢竟艾希曼試圖讓人相信他是一個洗心革面的前納粹分子，如今在既沒有希特勒又不必服從命令的情況下，已經實現初衷重新成為一個完全無害和根本不搞政治的人。因此他在阿根廷是一位正直的公民，很高興不必再奉命執行那么可怕的任務。就此而言，對“回憶錄”標題的更正不可能產生任何助益，因為那只會表明艾希曼參與了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政治計劃，意圖用新的手段繼續進行反猶太主義斗爭，完全有違清白阿根廷公民的形象。所以薩森和艾希曼二人不約而同都在說謊，讓世人相信一個落魄潦倒的流亡者和一名貪財成癮的記者曾經對著一兩瓶威士忌酒暢談往日時光。而世人根據納粹喜歡酗酒吹噓的刻板印象，心甘情愿地聽信了他們的謊言，更何況其他所有參與者都一直默不吭聲。

在昔日杜勒出版社的圈子里面，只有一個人針對薩森抄本的背景公開發表了意見：迪特爾·福爾默，埃伯哈德·弗里奇的副手。福爾默于1954年返回德國定居，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不斷為《路徑》撰稿，而且顯然還辛苦地致力于杜勒出版刊物的經銷工作。1961年，福爾默以《論新聞記者的職業道德》（Vom Berufsethos desJournalisten）為題，為聯邦德國立場偏頗的《國族歐洲》月刊寫了一篇相當牽強附會的文章，聰明地設法拆解那些來自阿根廷的令人尷尬的清楚證據。[[95]](#_95_9)文中不無恭維地表示，薩森“曾經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系統地詢問艾希曼的過去”。“當時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很難找到錄音帶。因此每當錄滿一卷之后，就草草地（！）用鉛筆（！）把內容抄寫到紙上，然后抹掉磁帶內容繼續錄音。我們那位精明干練的新聞記者隨即根據簡略的鉛筆手稿制作了抄本。”福爾默不但強調艾希曼已經在耶路撒冷“令人印象深刻地”駁斥了抄本的真實性，進而言之鑿鑿地保證：“艾希曼在那幾個月里真正確認和回答過什么，如今再也無法查明了。”為求保險他更補充表示，“即便根據我的兩位朋友所見過的鉛筆手稿復印本”也還是無法進行重建工作。福爾默的故事版本，包括“草草地”和強調了三次的“鉛筆”，很顯然完全出于杜撰。他的意圖擺明就是要盡可能防微杜漸，避免薩森抄本給曾經在阿根廷參與其事的納粹黨人、修正主義的歷史項目，以及阿根廷境外的納粹網絡帶來危險。同時亦借此讓人——至少是那些與訪談會無關的人——更加懷疑艾希曼是否真的提供過如此確鑿的文件證據。[[96]](#_96_10)德國那些對此了解得甚至比他還要清楚的人，這一回也沒有反駁。[[97]](#_97_10)

以色列總檢察長吉德翁·豪斯納的情況則帶有一些悲劇色彩：他雖然能夠深入了解艾希曼在阿根廷的言論，卻只被允許引用其中一小部分。弗里茨·鮑爾于是想方設法幫助他在以色列的那位同僚，并且試圖——但顯然沒有成功——在維也納審訊埃伯哈德·弗里奇，以便澄清抄本的真實性。[[98]](#_98_9)后來他甚至還親自寫信給薩森。[[99]](#_99_9)但不管豪斯納再怎么希望至少能夠獲得一卷原始錄音帶，那些磁帶就是無處可尋，仿佛被大地吞噬了一般。[[100]](#_100_9)來自阿根廷的見證者后來報告說，這正是實際發生的事情：威廉·薩森把錄音帶埋在花園里了。[[101]](#_101_9)其實薩森只需要拿出幾米的錄音帶就可以大發利市，因此有關他是“一個貪得無厭、對阿道夫·艾希曼毫無責任感的新聞記者”的說法不攻自破。豪斯納后來暗示，他曾花了大量資源和精力搜尋錄音帶。由于審判曠日持久，他希望最終還是能夠用“在阿根廷的艾希曼”錄音帶來駁倒“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102]](#_102_10)盡管證據非常確鑿，而且閱讀薩森抄本避免了檢方被艾希曼的一面之詞所迷惑[[103]](#_103_9)，可惜那到頭來還是一場失敗。我們簡直無法想象，假若人們能夠通過世界各地的新聞，聽到艾希曼用其刺耳尖銳的嗓音說出“對圓桌成員的小小感言”，那場審判的公眾影響將會多么不同！然而當艾希曼講出“不對，我可沒有那么說過！”的時候，檢方卻根本拿他沒辦法。[[104]](#_104_10)薩森抄本因而僅僅得到了一個“來源不可靠”的名聲。于是每一個想要書寫艾希曼的人，都只能像漢娜·阿倫特那般滿足于法院核可的少數幾頁資料。除此之外只有《生活》雜志的系列文章可供參考，而且還無法斷定它們是正本，抑或只是夸張的小道新聞。[[105]](#_105_9)波蘭《政治周刊》的那些文章是更加可靠的消息來源，但顯然一直沒有得到使用。那位以色列總檢察長終其余生都無緣聽見錄音帶的內容，更沒有辦法證實，他從一開始就正確看出了薩森抄本的史料價值。吉德翁·豪斯納1990年于耶路撒冷去世。

### “阿根廷文稿”的評估與舊材料

“阿根廷文稿”繼續被冠上“艾希曼回憶錄”的標簽，也是因為它們被拒絕采納為證據，最后還是無法反駁艾希曼對其真實性的攻訐，因此也就沒有必要為了審判而對那些資料進行更徹底的評鑒了。這個原因，再加上薩森抄本所存在的各種問題，也解釋了為何阿爾文斯萊本接受采訪的內容、薩森和艾希曼撰寫的文字，以及朗格爾博士的發言都很少引起注意。從檢察機關也未能發現這些資料即可看出，想在卷帙浩繁的文件中發現這些“異物”是多么困難的事情。弗里茨·鮑爾同樣希望把這些原始資料用于調查工作。1961年，艾希曼審判案使得追捕在逃戰爭罪犯的意愿提高了。鮑爾于是委托巴登-符騰堡州刑事調查局（LKA-BW）進行詳細的“薩森訪談錄評估”。1961年12月4日，國家社會主義犯罪調查中央辦公室、鮑爾總檢察長和埃森（Essen）地方法院，因為正在進行中的審判案而聯系起來的三家機構，共同收到了評估結果：結果長達700多頁，并附有詳細的人名索引和逐段列出的目錄。州刑事調查局當時附上的信函[[106]](#_106_9)讓我開始注意到這個龐大的資料，此外在聯邦檔案館的館藏目錄中也能查到那份人名索引。[[107]](#_107_9)此索引厚500多頁，共有467個人名條目，并摘要指出它們在薩森抄本中是如何被提及的。但由于抄本中的許多人名被拼錯了或者被聽錯了，這樣的人名索引當然永遠不可能完整。有趣的是，州刑事調查局的官員為此使用了薩森抄本的兩種拷貝：一種是在相片紙上的（那是當時通用的拷貝方式），另一種則是負片！相片紙版拷貝也保存在聯邦檔案館，但負片已不復可尋，所提到的那份目錄似乎也已經散逸無蹤。如今這一切皆可重新供人使用，要感謝國家社會主義犯罪調查中央辦公室一張字條上的鉛筆手寫注記。也必須感謝巴登-符騰堡州刑事調查局一位好奇的官員，以及路德維希堡聯邦檔案館同樣好奇的工作人員們，樂意在我堅持不懈的要求下做出行動。州刑事調查局的諾貝特·基斯林（Norbert Kiessling）先生幫助解讀了其前任令人費解的信頭，并向我解釋了特別委員會的問題[[108]](#_108_9)；托比亞斯·赫爾曼（Tobias Hermann）先生則鼓舞起聯邦檔案館同仁們的熱情，與他一同在中央辦公室尋找那個老舊手寫注記所指稱的檔案柜。結果那兩個文件夾竟然重見天日，與它們一同發現的還有一個裝滿負片的信封，后來證明那原來是“阿根廷文稿”的另一份拷貝。此外我們還完全意外地發現了另一個資料夾，上面引人注目地寫著“薩森訪談錄雜項”（Sassen-Interview Diverses）。那時我們所有人都不知道，我們找到了第一份幸存下來的手稿拷貝——它在半個世紀以前被從阿道夫·艾希曼同父異母的弟弟位于林茨的辦公室竊取出來，然后交給了赫爾曼·朗拜因。

州刑事調查局的內容目錄幾乎厚達250頁，其中包括1-5號和10-67號錄音帶每一個段落的詳細信息，更包含了以色列拷貝所缺失的41號錄音帶第3頁。目錄的制作者并非歷史學家，而是執法機關的官員。而且這樣的工作是在時間壓力下完成的，就此而言只有幾個月的工夫。任何曾經翻閱過幾頁薩森抄本的人都知道，那樣的打字稿閱讀起來有多么困難。盡管如此，雖然在細節上包含很多不正確的解釋和錯誤的縮寫，但它不僅是至今唯一的一份薩森抄本內容概要，更可以快速地讓人一目了然。后來法庭記錄中的若干引文顯示，這份內容目錄的確曾被使用過。然而州刑事調查局的工作人員沒有注意到的是，訪談會上曾經有多名發言者。于是朗格爾博士的發言被看成了艾希曼的聲明，對阿爾文斯萊本的采訪也被誤認為是在采訪艾希曼。后一個錯誤更特別在刑事訴訟上造成了奇特和令人沮喪的后果：當慕尼黑第二地方法院在1963年對卡爾·沃爾夫提起訴訟的時候，阿爾文斯萊本其實是理想的證人。然而薩森抄本第56號錄音帶的內容被用作起訴沃爾夫的證據。起訴書更兩次詳細引用了“艾希曼”關于沃爾夫的言論。[[109]](#_109_9)假如1963年時有人看出第56號錄音帶上究竟是誰在發言的話，檢方就能夠在阿爾文斯萊本缺席的情況下，將他作為對沃爾夫不利的證人。鑒于阿爾文斯萊本和沃爾夫長年密切配合的工作關系與私人交情，其證言具有難以超越的可信度。但如果證詞出自艾希曼的話，他只是以帝國保安總局部門主管的身份，來反對黨衛隊全國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的參謀長。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卻和沃爾夫一樣，多年以來辦公室就在希姆萊隔壁。他針對那名被告講出的詞句自然具有無可比擬的分量。

### 艾希曼之后

繼上訴失敗之后，緩刑申請也在1962年5月31日遭到駁回。處決終于斷絕了艾希曼影響自己公眾形象的可能，使他再也無法盡量讓人忘記他在阿根廷的自白，尤其是他對自己的罪行所抱持的態度。對在世的人來說，薩森抄本卻繼續籠罩在神秘之中。原因主要在于，艾希曼的漫天謊言使抄本的擁有者不完全相信其史料價值，更何況人們難得有機會仔細研究那些文稿。吉德翁·豪斯納卻是個例外，他在1963年年底、1964年年初，以《正義在耶路撒冷》（Justice in Jerusalem）為題出版了他對艾希曼審判的敘述，并詳細引述了薩森抄本。但令人困惑的是，他顯然不經意地把抄本的內容說成了659頁（而非以色列副本的713頁）。與此同時，托馬斯·哈蘭于20世紀60年代初期在波蘭卻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問題，而且不被允許返回華沙。他出版“阿根廷文稿”的意圖先是在波蘭受挫，而后在意大利也落空，因為出版商詹賈科莫·費爾特里內利擔心會出現版權問題：看樣子艾希曼（或其繼承人）是“阿根廷文稿”的版權所有者，要不然就是薩森，況且薩森還把使用權賣給了《生活》雜志和其他的人。我們可以推測，費爾特里內利至少已聽說過弗朗索瓦·熱努的大名——那個人曾在1961年和1962年時在羅馬招搖于市，宣稱自己為艾希曼文稿使用權的所有人，并且因為喜歡打版權官司而名滿半個歐洲。[[110]](#_110_9)亨利·奧蒙德和赫爾曼·朗拜因試圖以各種理由來讓費爾特里內利放心。朗拜因曾寫信給奧蒙德：“在我看來，艾希曼并非這些磁帶錄音的合法所有人。既然薩森已經把它們……賣給《生活》雜志了，所以薩森也已不再是擁有者。我認為頂多只有《生活》雜志可以聲稱擁有版權。但由于我們的錄音抄本既非來自《生活》雜志，亦非來自薩森，而是通過與耶路撒冷法院相同的途徑取得，那在我看來也是有問題的。”朗拜因甚至一度考慮是否應該正式篡改文稿的來源途徑，例如宣稱他自己的那一份拷貝來自以色列或波蘭，以此消除費爾特里內利的顧慮。[[111]](#_111_9)

然而問題主要出在托馬斯·哈蘭身上，或者更準確地說，問題在于這件事本身。光是閱讀3564頁的審訊記錄已非易事，而且就連漢娜·阿倫特那樣對此進行過深入研究的人[[112]](#_112_9)，也不得不公開承認，光是研讀審訊記錄（還不包括審判記錄在內）的工作，便足以完成一份無懈可擊的歷史研究報告。嚴格來說，隨著審判艾希曼才真正展開了對國家社會主義歷史的仔細檢視。今天我們固然有數十年下來的研究成果、優秀的文獻匯編和各種數據資料可供參考，可是在1961年的時候，那些作者只能獨自面對堆積成山的艾希曼耶路撒冷故事而一籌莫展。

和其他作者相比，托馬斯·哈蘭更形同面對著一座大山。因為他不但從弗里茨·鮑爾那里獲得了所有審判資料，更獨家取得了“阿根廷文稿”。除此之外，他最初的愿望是想寫一本關于“第四帝國”的書，討論那些仍然生活在德國而未被揭發的戰爭罪犯。他還打算在奧斯維辛審判案的準備工作當中，向弗里茨·鮑爾、赫爾曼·朗拜因和亨利·奧蒙德提供幫助。即便沒有額外的私人問題，這樣的任務也會讓單獨的個人不堪負荷。哈蘭于是因為讓自己的朋友和支持者失望而深感內疚。[[113]](#_113_10)后來，他找到了其他更加藝術化的表現形式來處理當代歷史。幾年前，他干脆把剩余的艾希曼資料交給了依爾姆特魯德·沃亞克，以供她繼續進行研究——她現在仍然擁有這些文件。[[114]](#_114_9)不幸的是，迄今為止我只能看到保存在哈蘭檔案中的一小部分資料。[[115]](#_115_9)所以我只能寄望于沃亞克女士早些時候向我許下的承諾，相信我們有朝一日終能安排機會來查閱這些資料。可惜我們已無機會真正贊賞托馬斯·哈蘭的成就。他曾抱病認真地針對那些文稿給了我至關重要的建議，嚴重的病情最終在2011年奪走了他的生命。

### 消失的錄音帶

在審判之后的幾年，關于艾希曼和國家社會主義猶太人政策的研究急劇增加，主要依據的是耶路撒冷的審訊和審判記錄，以及越來越多的歷史文獻匯編，但人們對阿根廷的艾希曼依舊懷有好奇。沒有什么比無法取得甚或消失不見的資料更能激發想象力。由于沒有人猜到“阿根廷文稿”的真實規模（也沒有人閱讀老舊的波蘭雜志），人們的好奇便完全集中在了缺失的5-10號錄音帶上。[[116]](#_116_10)它們到底包含了什么神秘的內容，以致薩森在出售抄本之前要先把它們抽掉呢？

此類問題的特質使得學者往往根本不想碰它們，寧愿讓記者先出頭，免得被譏為“打算用聳人聽聞的研究課題來沽名釣譽”（或者直截了當地說，就是不想冒著出丑的危險做出頭鳥）。這種分工方式的糟糕之處在于，雙方都會對材料視若無睹，而最壞情況下的結果是：一方在舊世界里面被嚇癱了，另一方則在新發現的天地無助地陷入泥淖。

在今天看來，拉迪斯拉斯·法拉戈已然成為“在泥淖中”傳播薩森訪談秘聞最成功的人，他非常貼切地稱之為“恐怖故事”。他那本關于逃往南美洲的戰爭罪犯的著作，很可悲地糅合了挖新聞的本事與對歷史的天真觀點。很少有作者能夠如此緊密地把高度爆炸性的信息和完全的廢話編排在一起。[[117]](#_117_9)法拉戈與艾希曼出生在同一年，他除了是專職的電影編劇之外，還撰寫了大量關于間諜活動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暢銷書。這些書適合拿來消遣（而且效果非常好），但我們不應該按照學術研究的標準來衡量它們，即便其中一些內容早已從后門被帶進了專業文獻之林。有些作者把它們照抄下來，并且忘記了——當然只是“出于疏忽”！——使用引號和說明出處。有時甚至還在其實應該強調“法拉戈”的地方寫下了“我認為”。[[118]](#_118_9)如此一來，法拉戈精彩有趣的消遣故事搖身成為值得引用的“見證者陳述”，如今出現在一些相當嚴肅的著作之中。因此我們不能不仔細看一看法拉戈的故事。

法拉戈那本用了陰謀論式名字的書——《假死》（Scheintot）[\*](#_499)——初版于1974年，因而屬于率先講述納粹分子海外逃亡路線的書之一。書中有兩章專門講述艾希曼。[[119]](#_119_10)但法拉戈還是在一些名字上面栽了跟頭，例如薩森圈子內的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以及杜勒出版社的埃伯哈德·弗里奇等人[[120]](#_120_9)。法拉戈的故事還由于他號稱與現實中不存在的人物親自交談而大出洋相，因為他只不過是根據《路徑》上出現的那些筆名，虛構出了一些角色。尤有甚者，他把威廉·薩森描繪成一位政治立場中立，但過去曝光不足的作家同行：“不同于魯德爾和弗里徹（！）等人……薩森想要書寫未經粉飾的真實故事。”[[121]](#_121_10)法拉戈詳細報告了他拜訪薩森的情形，聲稱自己看見過薩森抄本，甚至還閱讀了那些“來自67卷錄音帶，整齊存放在17個穿孔文件夾里面的謄寫稿”，連同一些“寫在邊緣的注釋”，以及艾希曼用打字機（！）打出的“額外頁面”。[[122]](#_122_9)根據法拉戈的說法，它們總共有695（！）頁。[†](#_500)由此我們至少可以知道，法拉戈看見的到底是什么：那就是一些關于艾希曼審判的書籍，特別是豪斯納的《正義在耶路撒冷》。他巧妙地提煉出書中對以色列副本的描述，再加上一個抄寫錯誤的數字。因為在阿根廷既沒有17個文件夾，更沒有695頁文稿。[[123]](#_123_9)在法拉戈對其他62卷錄音帶內容的“總結摘要”中，艾希曼主要講述的是“逃跑和躲藏起來的國家社會主義者”。這清楚表明法拉戈從未讀過薩森抄本。薩森根本沒有向艾希曼打聽此種消息的必要，因為他自己——尤其是奧爾斯特·卡洛斯·福爾德納——恰恰比艾希曼還要了解納粹逃跑到阿根廷的路線。這個想象出來的目擊者報告登峰造極的敘述，卻是法拉戈自己“采訪”薩森之后獲得的“獨家消息”：“今天我們知道，薩森從來沒有把完整的艾希曼自白內容拿去兜售。他自己保留了5卷錄音帶和51頁文字……在那些內容中，艾希曼談論了自己與博爾曼的關系。”法拉戈是這樣說的：“在五卷錄音帶當中的一卷，艾希曼講述了自己逃亡前往阿根廷的故事，并且一再指出他與昔日黨衛隊全國領袖的關系。”然后又說，“薩森當面向我（法拉戈）坦承，博爾曼反復出現在艾希曼的故事當中。然而他怎么也不肯與我商討出售事宜，甚至也不允許我只是聽一聽那五卷錄音帶的內容。他告訴我：‘我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并且強調他‘害怕某些人伸長的觸手’”。此外薩森只肯在一種情況下公開“未刪節的艾希曼報告”，那就是“博爾曼和我當中有一個人死了以后”。[[124]](#_124_9)我們不妨大膽地假設一下，薩森確實非常害怕，因為納粹圈內人在艾希曼事件之后將他視為叛徒。我們甚至還可以過于大膽地推斷，薩森當然有可能在一個唯恐天下不亂的記者面前講述關于博爾曼的謠言，因為這樣的謠言總是能夠換取暴利。然而事實仍舊是，從來都沒有缺失過“5卷錄音帶和51頁文字”，它們上面更不可能出現博爾曼這個名字，或者由艾希曼講述他如何在博爾曼的幫助下脫逃成功。因為馬丁·博爾曼，納粹黨中央辦公室主任和希特勒的私人秘書，在1945年5月未能幸存下來。他自身都已經難保，更不用說指點任何同志該如何逃往阿根廷了。6-10號錄音帶（只有4卷錄音帶和62頁文字）上，一個字也沒有提到艾希曼與博爾曼在戰后的見面。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聲稱去過薩森家里的人，盡管他們宣稱自己曾經看到過薩森的原始文件，卻都沒有見過68-73號錄音帶或者提及薩森私人錄音帶的討論片段。

我們沒有理由認為薩森是刻意想要愚弄他的作家同行，畢竟薩森在其他有真實記錄的采訪中從未講過那樣的故事，而是提供了非常可靠的消息。[[125]](#_125_9)我們因而可以把這種法拉戈式的“薩森訪談”視為作者的藝術發揮，是為了消遣文學的戲劇效果，應該干脆把它置之一旁——此外還要忽略隨之而來的各種報道，像是如何拜訪那位虛構的薩森先生，以及看見他的67卷錄音帶和17個文件夾。然而，這個傳說進入專業文獻的途徑卻顯示了輕率引用資料的做法可能產生怎樣的影響。在艾希曼研究中出現過許多這樣的實例。

法拉戈絕不是唯一一個對“阿根廷文稿”失蹤部分寄予厚望的人，因為就像其他任何執著于一線希望的人，他相信自己能夠在不得其門而入的地方找到答案。類似的期望還出現在一個完全不同的背景中，即在阿拉伯文化世界的反猶太復國主義論述當中。中東的人們一直認為，以色列在艾希曼審判案和一般的歷史研究中壓制了證據。乍看之下，那往往讓人聯想到新納粹歷史幻想所發展出的陰謀論，其中聲稱艾希曼是猶太人，他刻意犧牲了幾百萬自己人以便建立以色列國。盡管阿拉伯世界也很早就有人質疑猶太人大屠殺的原因與規模，但其動機截然不同。阿拉伯人的著眼點并不在于幫希特勒或納粹黨人平反，只是試圖借由削弱以色列的大浩劫歷史，來給以色列的合法性打上問號。這個希望衍生出各式各樣不同的論證策略。[[126]](#_126_9)其中一派援引了艾希曼的策略，因為他曾試圖聯絡德國的猶太復國主義者，讓他們相信他唯一的目標就是讓猶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那個自視為二戰真正受害者的文化由此衍生出一種陰謀論，認為猶太復國主義者和國家社會主義者從一開始就簽訂條約，締結了一個與阿拉伯人為敵的秘密同盟。在這個陰謀中，一個必要步驟便是“非猶太復國主義猶太人”（nichtzionistische Juden）遭到納粹與“猶太復國主義猶太人”（zionistische Juden）的合力滅絕。例如法里斯·葉海亞（Faris Yahya）在《猶太復國主義與納粹德國的關系》（Zionist Relations with Nazi Germany）一書中指出：“艾希曼雖然并非幸存下來的最高階納粹戰犯，但他或許是最清楚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與納粹政權之間關系的人。”猶太人沒怎么審問便急著把他處決，結果“所有相關知識都跟著他一起死去”，除非他已經在阿根廷的錄音帶上說了些什么。[[127]](#_127_9)

誰要是希望在未被發現的艾希曼阿根廷資料里面，找到國家社會主義與猶太復國主義陰謀勾結的關鍵證據，那只會大失所望，因為“阿根廷文稿”表達了完全相反的意愿：艾希曼宣布了他有關建立國家社會主義-阿拉伯大聯盟的夢想，一如他之前在大穆夫提阿明·阿爾-侯賽尼前往柏林參訪，以及在帝國保安總局與大穆夫提的聯絡官合作時即已預期的那般。更重要的是，在國家社會主義根除猶太人的計劃失敗以后，艾希曼就只能希望至少阿拉伯世界有朝一日將會稱許他的滅絕工作，不但贊揚其“畢生志業”，甚至還將它徹底完成。“光明來自東方”（Ex Oriente Lux），便代表了這種在“阿拉伯朋友”的協助下實行最終解決方案的瘋狂迷夢。其他一些國家社會主義者也曾有過類似夢想，甚至還為配備毒氣卡車的特別行動分隊擬定好了在巴勒斯坦的行動計劃。[[128]](#_128_9)艾希曼在阿根廷仍然將“沙漠”考慮作一個“最終解決方案的構想”。[[129]](#_129_9)艾希曼一直想成為阿拉伯人的盟友，而非當一個反阿拉伯陰謀的關鍵證人，當然更絕對不肯變成以色列的盟友，迄今“消失不見”的錄音帶和手寫稿都尤其明確地顯示出這一點。即便在以色列的時候，艾希曼也一再告訴自己的弟弟和律師，他同意讓別人編輯潤飾他的阿根廷文稿，但前提條件是必須保留他有關“光明來自東方”的看法。[[130]](#_130_9)于是他在西方情報機構引發了最嚴重的恐懼。實際上艾希曼不但使用了那句拉丁文諺語，而且還身體力行。這名以色列的囚犯在寫給弟弟的一封信中宣布了他最近的皈依經歷，他興奮地宣布自己已經轉向共產主義，因為只有這個學說能夠對抗“罪惡的根源：種族仇恨、種族謀殺，以及”——他的確那么寫了——“反猶太主義”。[[131]](#_131_9)任何希望艾希曼的言論會證實自己所害怕之事的人，都很少會失望。

### 重新發現

一直要等到1979年，研究狀況才終于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此前只有獲準在路德維希堡查閱“犯罪調查中央辦公室”庫藏資料的人，才能讀到薩森抄本。如今又多了一個地方，因為聯邦檔案館（當時僅限于科布倫茨）收購了羅伯特·塞爾瓦蒂烏斯的遺物。從此以后，在“同盟國審判6”（AllProz 6）這個編號下面，便能找到審判文件和往來信函、財務報表、各種札記，以及塞爾瓦蒂烏斯遺留下來的其他資料，其中最重要的是薩森抄本的以色列拷貝。因此如今司法界以外的人也可取得這份文件，盡管它上面帶有艾希曼在以色列的注記。[[132]](#_132_9)雖然我們無法說這些藏品現在已經得到了充分研究，但它們還是給相關專業文獻帶來了巨大變化。

與此同時，威廉·薩森決定把所有文件都交給阿道夫·艾希曼的家人。關于薩森的動機，目前只有兩條可能的線索。首先，他那位年輕的新婚（也是最后一任）妻子即將分娩[[133]](#_133_10)，這樣的事件往往會引發要與過去的是非一刀兩斷的愿望。除此之外，薩森的住處于1979年再次成為聚會場所。卡爾·沃爾夫，昔日希姆萊的參謀長以及仍然在世的最高階納粹黨人，與一位《明星周刊》的記者聯袂前往南美洲探訪“老同志們”。于是薩森實際上是在等待兩位同僚登門造訪，而且格爾德·海德曼還記得，薩森感到非常緊張，因為他仍然被指控為把艾希曼出賣給以色列的人。一名在秘魯的納粹黨人甚至聲稱薩森從未加入過黨衛隊，而是從一開始就蓄意欺騙和利用艾希曼：他“泄露了艾希曼的藏身之處”。[[134]](#_134_9)薩森再也無法擺脫這種嫌疑。他在弗里奇移居奧地利之后所承繼的南美納粹網絡重要聯絡點的地位，也隨之一去不返。弗里德里希·施文德更聲稱薩森“把應該繼續傳遞出去的重要信息賣給了敵對雙方。經他轉手的信件都會遭到拆閱”，所以他是“一個叛徒”。[[135]](#_135_9)薩森迫于無奈，只能逃離布宜諾斯艾利斯一段時間來避風頭。即使過了許多年后，他仍然因為不能得到人們的信任而深受其苦。再加上薩森當時確實曾為摩薩德工作——茲維·阿哈羅尼花了幾個小時說服他這個決定是何等明智——這個事實當然更不可能提高薩森的自信。[[136]](#_136_9)因此無怪乎同樣認為薩森是叛徒的格爾德·海德曼會覺得，薩森想要盡最大努力討好他的客人。[[137]](#_137_9)從薩森的角度來看，他顯然不想繼續在家中留著那些臭名昭著的材料，巴不得這位在昔日黨衛隊上級集團領袖陪伴下的《明星周刊》記者同行能夠問起它們。

艾希曼的后人做了一個事后證明不怎么明智的決定，與一家明顯以右翼偏見而出名的出版商簽訂了合同。該出版商又找來一位享有同樣名聲的編輯，魯道夫·阿舍瑙爾（Rudolf Aschenauer）。1980年，德魯費爾出版社出版了《我，阿道夫·艾希曼》（Ich,Adolf Eichmann），那是一本時而存在編輯錯誤的薩森版“阿根廷文稿”與明顯帶有修正主義色彩的評論拼湊出來的書。即使在右翼保守派的圈子內，該書的粗制濫造也引起了不滿。阿道夫·馮·塔登——西德最活躍的戰后右翼分子之一、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的朋友、德意志國家黨的成員，以及德國國家民主黨的創黨元老——更在那份現在改名為《國族與歐洲》（Nation und Europa）的月刊上針對該書提出批評。與阿舍瑙爾的編輯意圖相反，塔登把艾希曼的回憶錄解讀成滅絕猶太人的確鑿證據，即便他依舊堅持“600萬人的謊言”。塔登還寫信給出版商，強調此一版本并不完全符合真正的文稿。[[138]](#_138_9)

大衛·歐文（David Irving）之類的右翼極端主義者，則直到今天都還稱贊阿舍瑙爾“指出了抄本中許多錯誤的艾希曼言論”。而這些“錯誤”往往明顯涉及歐文用來立名的歷史否定論。[[139]](#_139_9)不過德魯費爾版本的最大問題并非阿舍瑙爾的刺耳評論，而是更動文字先后順序的決定，導致訪談的對話結構變得面目全非。結果，讀者無論怎么挖空心思，也沒有辦法看出到底是誰在講話。編者顯然自己也看不出來，于是他干脆把薩森的口述、朗格爾博士的評論和發言、阿爾文斯萊本的回答等等，一概都算作艾希曼的言論。不幸的是，德魯費爾出版社的祖德霍爾特博士（Dr. Sudholt）熱心地告訴我說，他們出版社2000年搬遷的時候已經把原稿丟棄掉了。出版社在導言里面引用的薇拉·艾希曼的宣誓聲明書，祖德霍爾特博士也同樣一直沒能找到。幸好這并不是說，今天我們只能辛苦地通過逐句比對來評斷阿舍瑙爾的版本。因為與所有阿根廷文稿和錄音帶一樣，阿舍瑙爾的手稿現在也已經重新出現了。更何況近幾年來各種相關原始文件皆已開放供人使用，我們也沒有理由再參考這樣一個問題百出的版本。[[140]](#_140_9)

1991年10月，大衛·歐文在阿根廷取得了薇拉·艾希曼存放在她丈夫最要好朋友那里的剩余文件。歐文聲稱，薩森的一位荷蘭同胞胡戈·比特比爾（Hugo Byttebier）從“一位實業家朋友”那里接手了這些文件，并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個花園將“426頁打字機謄寫稿”交給了他。根據歐文對材料進行的評鑒以及他所公開的樣稿，任何熟悉“阿根廷文稿”的人都可以明白這些文件是什么：在聯邦檔案館也能找到的一些艾希曼手稿的拷貝、聯邦檔案館同樣有保存的幾頁薩森抄本[[141]](#_141_10)，以及至少一個章節的薩森書稿。[[142]](#_142_9)薩森這份書稿的內容的確迄今不為人知。我們只曉得艾希曼對它發表過貶損言論，他因為這個匯編極大地修改和部分扭曲了他在薩森訪談會上的發言，所以不愿授權出版發行。順便值得一提的是，大衛·歐文雖只拿到了62卷錄音帶的抄本，但已宣布將在自己的網站上公開交給他的所有頁面。從之前已經對外發表的書稿第四章可以清楚看出薩森對這個寫作計劃的構想，并且發現艾希曼確實有理由表達不滿。[[143]](#_143_9)艾希曼的言論被削弱了，而且被移花接木到薩森所想要傳播的陰謀論當中。對于研究威廉·薩森的思想與作品來說，這些新發現的文稿可能會非常有用。

1992年，瑞士ABC出版社從艾希曼家人手中買下了薩森的資料，此外還有一些錄音帶、35毫米底片，以及阿舍瑙爾文稿。出版社制作了總覽概要，并將一部分底片上的抄本頁面重新沖洗出來，但是卻無法決定究竟該怎么運用它們。接下來幾年發生的事情基本上是由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決定的。出版社的經營者雖然已經換人，但還是逐漸有消息流傳開來，表示時隔40多年之后，原始錄音帶終于重新出現。吉多·克諾普（Guido Knopp）隨即在1998年率先將錄音片段用于其紀錄片《希特勒的幫手II：毀滅者，阿道夫·艾希曼》（Hitlers Helfer II : Der Vernichter, Adolf Eichmann）。這部紀錄片讓數以百萬計的觀眾，還有目瞪口呆的現代史專家，首次有機會親耳聽見艾希曼“對圓桌成員的小小感言”，以及他敘述自己在面對大規模槍決時進行“誦《主禱文》儀式”的荒誕情景。不久之后各個文化頻道紛紛傳出消息，表示出版社一位不具名的編輯人員已將薩森資料存放于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從此可供研究者使用。依爾姆特魯德·沃亞克率先鼓起勇氣獲得了對庫藏錄音帶的第一印象，并在她2001年出版的《艾希曼回憶錄》（Eichmanns Memoiren）一書中，介紹了研究人員僅靠錄音材料即可完成的任務。然而，瑞士資料擁有者慷慨大方又高瞻遠矚的決定，其真正重要意義并未立即得到重視。原因之一就在于編制目錄的時候發生了一個災難性的錯誤。該藏品的說明文字寫的是：“保管于‘阿道夫·艾希曼遺物’（Nachlass Adolf Eichmann）卷宗內的資料，乃阿道夫·艾希曼的自傳草稿，除了目前已知的信息外，基本上沒有提供新的資訊。這些文件的副本早已保存于聯邦檔案館‘同盟國審判6：艾希曼審判’（Alliierte Prozesse 6: Eichmann Prozeß）卷宗內，多年來一直可供研究者使用。”至少最后一句話錯得離譜，因為收錄于“阿道夫·艾希曼遺物”中的資料，有超過三分之一此前從未供研究者使用。相比之下，雖然“阿根廷文稿”只能在有限程度上被視為艾希曼的“自傳”，但那簡直算是一個無傷大雅的誤解。錯誤的評估毫無疑問必須歸咎于時間和人力方面的不足，導致聯邦檔案館的工作多年來都困難重重。它所造成的后果卻影響深遠，因為研究人員直到近幾年前都還只能依賴“塞爾瓦蒂烏斯遺物”中的文件，亦即只有60%的“阿根廷文稿”。要不然的話，往往就只能引用問題百出的德魯費爾出版社版本，但那樣一個支離破碎、未經專業編輯的資料來源，只會讓人對艾希曼在阿根廷的生活與思想產生種種曲解和遺漏。[[144]](#_144_9)

在路德維希堡聯邦檔案館的意外發現，讓我對“沒有提供新資訊”的講法開始產生了懷疑。該館的人名與段落索引列出了我在“塞爾瓦蒂烏斯遺物”當中遍尋不著的頁面：臭名昭著的41號錄音帶第三頁，其中提到了艾希曼的副手羅爾夫·金特。這條線索終于促使我瀏覽了一下路德維希堡的薩森抄本，而直到那時我都還以為它跟以色列的副本相同。但一眼就可以看出，路德維希堡的紙本拷貝[[145]](#_145_9)明顯不同于以色列的副本。誰若是發現，早在1961年就已經存在著來源明顯不同的兩份拷貝副本，那么就一定也會意識到，雖然它們都被貼上了同樣的標簽，但還是值得查明是否能夠找出第三種版本。那時我連想都沒有想過，它果真被收藏在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的艾希曼遺物當中，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就是消失已久的原始打字抄本和手寫文稿。

慷慨的瑞士出版社捐贈給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的資料，即艾希曼遺物，除包含了能夠證明抄本真實性的錄音帶之外，還有威廉·薩森在1979年仍然持有的全部原始抄本、手稿和底片。但薩森既不是個一絲不茍的人，更稱不上檔案工作者，因此今天可供使用的這個原始阿根廷版本也不很完整，其中缺少了29號錄音帶的抄本（艾希曼在那卷錄音帶上標注著“僅供您個人參考”）、關于羅爾夫·金特的那一頁，以及70號和71號錄音帶的抄本（但我們不知道它們是否曾經存在過）。不過原始材料中涵蓋了5號和11號錄音帶之間所“缺失”的抄本（即6、8、9和10號錄音帶）[[146]](#_146_9)，以及67號錄音帶的兩頁抄本、68-69號和72-73號錄音帶，此外還有一卷未編號的錄音帶，說明標簽上寫著：“W. S.這卷私人錄音帶除了錄有音樂和一出佛蘭德語話劇之外，還有一段E.和W. S.的對話。”[[147]](#_147_9)手寫稿和手稿謄本也不完整，而且因為忽略了草稿的整體架構，劃分得令人困惑，甚至連薩森在談話中所寫筆記的打字抄本也出現在其中。[[148]](#_148_9)ABC出版社在1992年見到的35毫米底片，直到今天都還沒有被拿來與打字稿進行比對。手寫稿和手寫稿謄本總共有200多頁，但缺少了在以色列被歸類到“第17號卷宗”的大量手稿頁。不同于科布倫茨“艾希曼遺物”中的庫藏手稿，路德維希堡聯邦檔案館內標示為“雜項”的資料夾中的頁面拷貝非常干凈，有助于將“第17號卷宗”還原到它原本歸屬的那份大型手稿《其他人都講過了，現在我想說話！》。

把這種令人困惑的情況簡化一下就是：今日想要研究“阿根廷文稿”的人，首先必須從三個不同的檔案館把艾希曼的手寫稿和薩森抄本重新收集起來，有時需要一頁一頁地。這正是我為本書——以及我的其他相關工作——所做過的事情，因此當然認為如此大費周章是值得的。不過在我看來，只需要有一個人耗費生命光陰來進行這種拼湊工作就已經足夠了，所以我很樂意向那些在聯邦檔案館從事進一步研究的人提供頁面索引，指出分別在三家機構的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它們。這同樣適用于錄音帶內容的概述。并非所有錄音帶都是來自阿根廷的原件，所以實際內容少于29小時的完整播放時間，有些部分甚至還重復了好幾次。有些錄音帶顯然是為了提高清晰度的緣故，以不同的播放速度經過了重新錄制。因此即便錄音內容與原版相同，所使用的錄音帶卻非原件。至少有一份拷貝是近幾年才錄制完畢的，雖然錄音帶本身看起來相當老舊。因為它和其他經過重復錄音的磁帶一樣，聽得見原先錄制內容的殘留：一出兒童廣播劇，里面出現了多頻按鍵的信號聲以及復調旋律，而這是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出現的技術。但也有磁帶是1957年錄制的，還能聽到（或猜測）之前薩森訪談會的內容。因此錄音棚的分析，還可能帶來更多驚喜。

### 附記：BND檔案，抑或艾希曼的第四項事業

以色列情報單位“摩薩德”的特工率先發表了自己對艾希曼綁架案的相關事件的講述。茲維·阿哈羅尼、彼得·馬爾金（Peter Z.Malkin）和伊塞爾·哈雷爾都出版了內容詳盡的書籍，讓我們得以一窺摩薩德的檔案。如今，阿舍·本-納坦的回憶錄和大衛·本-古里安的遺稿，也有助于我們更好地了解導致綁架和審判的決策過程。正是因為實際參與者彼此之間也存在著歧見與敵意，導致各種報告至今呈現出一種眾說紛紜，偶爾還相互矛盾的景象。想要提高透明度的意愿顯而易見：摩薩德前負責人伊塞爾·哈雷爾在1997年推出了新版的《加里波第街的房子》（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決定把書中之前多年使用的大部分化名都換成真名。[[149]](#_149_9)此外還有許多以色列參與者親自接受采訪，解釋了他們的動機與想法，并回答了各種問題。盡管與綁架和審判有關的文件仍未完全對研究人員開放，但已經朝著對外公布的方向邁出了很大一步。

當美國國家檔案館1998年開始對外公開情報單位關于納粹分子的文件時，研究人員曾對此抱有很高的期望。盡管許多解密的頁面平凡無奇，有些甚至被涂黑到了荒謬可笑的地步，但光是中央情報局的“阿道夫·艾希曼檔案”（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無疑就提供了大量信息。如果沒有這些文件，就不可能重建薩森抄本形成過程中的某些事件。然而情報單位的資料收集者并非歷史學家，其職責也不在于為學術研究建立檔案，而是要維護國家的利益與安全。因此如今更重要的是認識到，即使揭露了前任同僚們的假情報策略，以及他們犯下的錯誤與疏失，所造成的傷害也絕不可能超過外界的瘋狂猜測，懷疑情報單位蓄意隱瞞了事情的真相。

由于情報單位的文件當中總是會出現來自其他國家的報告，以及友好情報機構傳來的資訊，因此不管再怎么小心謹慎，已解密的中情局檔案無疑也包含了一些明顯來自德國聯邦情報局的信息。但即便如此，解密行動至少在表面上并未引起國際爭端。最晚等到BND的名字被提起的時候，任何對此事感興趣的人都會想起來，德國聯邦情報局當然同樣建立了自己的艾希曼檔案，而且德國外交部和聯邦憲法保衛局也不例外。然而德國聯邦情報局的檔案至今沒有對外開放，只有少數一些勉強跟艾希曼扯得上關系的文件，在2010年11月被移交給了聯邦檔案館。[[150]](#_150_9)

多虧了新聞工作者加比·韋伯（Gaby Weber）的努力，在2010年促成聯邦行政法院判決不得拒絕公開所有相關檔案，這才至少阻止了全面延長保密期限的可能。韋伯是率先成功爭取到至少有限使用檔案的權利，而且能夠研究部分檔案的人，盡管某些頁面已被嚴重涂黑刪除。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就連這些經過篩選的檔案都仍未全面對外開放。換言之，任何即使只想看一眼這些檔案選錄的人，也必須提起自己的訴訟程序。直到施普林格出版社的記者漢斯-威廉·紹雷（Hans-Wilhelm Saure）為了檔案查閱權而提起官司訴訟之后，德國的八卦報紙《圖片報》（Bild）才終于得以在2011年1月首次向大眾公開了其中的一份文件。[[151]](#_151_10)2013年2月，聯邦行政法院卻駁回了關于進一步開放檔案的要求。原告仍可選擇向聯邦憲法法院和歐洲法院提起訴訟。其他記者已經宣布打算仿效紹雷的做法，自己提起訴訟來爭取完全解密艾希曼檔案。這場法律大戰仍然方興未艾。

這種奇特的情況使得學術研究和公共利益必須取決于能否支付法院和律師的費用。這讓人十分好奇一個問題，那就是聯邦情報局的檔案中到底有些什么爆炸性的文件，以致過了50多年仍由于政治原因而無法真正解禁。這方面最全面的解釋可見聯邦總理府2009年9月10日發布的11頁禁制聲明。加比·韋伯在第一次勝訴之前收到了它，并且很大方地在自己的網站上公開。一概不公開艾希曼檔案的做法已被聯邦行政法院宣布為無效，但我們仍有必要仔細研究一下那個企圖，因為它可以讓人深入了解，透明開放的想法如何一如既往地引發了恐懼。而拒絕的特質就是，說明理由的時候，難免不得不泄露比檔案本身更多的東西。任何拒絕某件事的人，首先總是要談論自己。我們越是熟悉阿道夫·艾希曼這個研究主題，以及今日可供查閱檔案的范圍，這種效應就越明顯。

根據聯邦總理府2009年9月10日的正式聲明，相關檔案包括分布在五個保管單位的大約3400頁文件。他們采取了非常寬松的計算方法，于是把“僅僅零星提到在阿根廷的艾希曼”的文件一并算了進去。那些文件顯然也被收藏在那五個保管單位，而且被其工作人員混為一談。[[152]](#_152_9)凡是標注了“艾希曼”這個查詢關鍵詞的聯邦情報局檔案文件都不向研究人員和一般公眾開放，理由主要有三點，它們被認為比“相當抽象的……對追尋真相的興趣”[[153]](#_153_9)更重要。那三點分別是：國家利益、舉報人保護，以及受波及的第三方的一般隱私權。

“國家利益”這個詞意味著，公開那些檔案會對國家的安全利益產生負面影響。由于聯邦德國情報部門的卷帙當中也包含從外國機構獲得的文件拷貝，所以他們無法對外開放那些根本不屬于自己所有的資料。這個理由直接表明，誰要是像情報部門一樣依賴國際合作，就必須信任涉及的各方都能認真對待自己獲贈的資料拷貝。然而任何外國機關也同樣清楚，法治國家的各個機構受到當地法律的約束，因此保密期限原則上也適用于此類外來資料。除此以外，一方面支持一國政府對“外國機構”資料的自由裁量，同時卻指責以色列“迄今未完全對外開放艾希曼審判案的官方資料”，這完全就是前后矛盾。盡管如此，任何向德國聯邦情報局申請查閱檔案資料的人，所想看的就只是聯邦情報局的檔案資料。然而更令人驚訝的是，后來提交給聯邦行政法院的文件當中，竟然也包括了來自以色列的資料。[[154]](#_154_9)

然而，上述聲明又繼續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宣稱“聯邦情報局制作的評價文件，有可能被誤認為是刻意針對外國官方機構特定人員而發的詆毀聲明。無論對特定案例（艾希曼相關檔案）還是一般事務而言，這都將嚴重損害或危及與外國公共機構的友好關系。”[[155]](#_155_9)這個暗示現在果真激起了人們的擔憂，不知聯邦情報局做出的評估，包含了什么直到今天仍足以損害國際友好關系的“時代精神”。其實在進行情報工作和學術研究的時候，評估來自第三方的所有信息都是完全正常的做法。20世紀50年代時聯邦情報局人員——亦即聯邦德國官員——所做出的評估，竟然在今天仍有可能被看成刻意針對“外國官方機構人員”（例如以色列）而發的詆毀聲明，這種想法的確讓人不寒而栗。

第二點涉及舉報人保護，亦即情報機構在運作過程中應善盡自己的職責，避免由于疏忽而對信息提供者造成傷害。舉報人保護因而也與安全利益息息相關，因為如果人們聽說某個情報機構不保護其情報提供者的話，那么很快就再也不會有任何人向它提供情報了。就此而言，禁制聲明卻相當令人吃驚地泄露了具體告密者的有關細節。我們于是知道那個提供幫助的人“相對比較容易”暴露身份，因為他“可以獨家獲取相關消息”，而且“消息的內容和范圍……能夠讓人推斷出消息來源以及舉報人的身份”[[156]](#_156_9)。此外該人還主動“要求……特別保護消息來源”。這名舉報人到2009年仍然健在，“一如既往繼續活躍在他的職業領域（！）”，而且“其身份的暴露不僅會危及舉報人自己的私人生活和專業領域”，更將對“他今日……許多業務伙伴的職業生涯”造成不利影響。光是懷疑他“與聯邦情報局合作……或許即足以給他的事業帶來經濟上和聲譽上的損失”[[157]](#_157_10)。此外，這名舉報人不僅“一如既往繼續活躍在他的職業領域”，而且還“有名有姓地出現在互聯網上，可以被搜索到”[[158]](#_158_9)。20世紀80年代初期，這名舉報人更“因為聯邦情報局的另外一項行動”而被“重新起用”，而任何有關這項行動的公開措施都不無可能對他造成威脅。[[159]](#_159_9)盡管解釋的一方態度可嘉，愿意不厭其煩地詳細說明自己的理由，但我們還是禁不住想問：既然該人可能會因為被猜到在尋找艾希曼時起過關鍵作用而受到傷害，為什么情報部門仍主動對他做出如此詳盡的描述？事實上，并非世界所有地方（而只是在大多數地區）都會由于某人在艾希曼一案立下汗馬功勞就頒獎章給他，因為某些文化直到今天仍然不承認那是一項光榮的成就。[[160]](#_160_10)正因如此，怎么會有人非但不保護一個如今至少已經年近70歲、50多年來始終“有名有姓地”在世界這些部分從事專業工作的人，反而還公開勾勒出他的形象，使得能干的研究人員[[161]](#_161_9)只需花上半天功夫，便能根據那個描述（同時借助文中很有幫助地推薦的互聯網）將可能告密者的范圍極度危險地縮小到很小一群人。結果在聯邦情報局的幫助下，立刻就有十幾個人暴露于那種猜測所帶來的危險之中。以傷害與本案無關的第四者為代價的“舉報人保護”，至少在我看來無法取信于人，而且也不可能讓今天和未來的聯邦情報局線人感到放心。

就“受波及的第三方的一般隱私權”而言，根據禁制聲明的說法，在檔案中總共提到了大約50人。但那是因為他們找出許多文件的緣故，即便那些文件只是跟研究主題“沾邊而已”[[162]](#_162_9)。因此把人名涂黑將是必要的做法，然而與研究可能獲得的成果相比，這將意味著“不成比例的行政負擔”。這種說辭自然會引來每一位研究者的駁斥，質疑一名（或者許多名）聯邦情報局的人員如何能夠斷定哪些資料對研究有用或沒用。即便是一張索引卡片的價值，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一位學術工作者的專業水平和閱讀技巧，而外行人士的猜測則永遠只會不著邊際。盡管每一位學術工作者都必須高估自己研究領域的重要性，如此才有辦法數年堅持不懈地工作，可是不論對學術界還是更大的社會而言，阿道夫·艾希曼這個主題的重要性無可置疑。無論我們是否反對禁制聲明，這個主題早就遠遠不只是私下研究的對象了。德國人對這個主題的態度，在世界各地都不被看成“相當抽象的”事情[[163]](#_163_9)，而是已成了國際社會評斷聯邦德國的標準之一。德國的聲譽取決于我們從自己的過去吸取教訓的意愿，這是顛撲不破的事實。如果有任何事情會威脅到德國“國家利益”的話，那就是在聯邦總理府信箋上寫下的聲明，宣稱開放聯邦情報局艾希曼相關檔案的做法，將造成與“尋找真相的目標”[[164]](#_164_9)“不成比例的行政負擔”[[165]](#_165_9)。

除了上述三點之外，禁制聲明中還提出警告，不可公開發表對相關文件進行研究和調查所得出的結果。它表示：“除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之外，這些文件也會給其他國家的（外交）政策帶來影響。它們能夠脫離檔案文件的歷史情境而具有現實意義，在追尋（中東）外交政策的目標和利益時被用作工具。”[[166]](#_166_9)該聲明于是支持了長久以來宣稱的論調，主張在研究現代歷史相關文獻的時候，所做的工作不只是閱讀歷史的遺緒而已。那些人認為，研究始終對“這里”和“現在”有影響，而這正是進行研究的原因。明理的人都知道，與任何形式的發表一樣，研究寫作也有可能出現誤解和過度詮釋，而且事實上總是會有人把一切資訊都用作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情報部門的檔案材料甚至完全只是為了讓知識成為實現政治目標的工具，在國際關系方面尤其如此。一窺聯邦情報局的艾希曼相關檔案，因而也總是意味著看到了情報機構的工作，以及20世紀五六十年代德國社會與世界的關系。但這并非原始資料研究的不利因素，反而是其明確的既定目標之一。在特定政治背景下將文件工具化的做法，畢竟不是什么新鮮事。然而20世紀的歷史也展現出，宣傳家們會濫用一切信息，因此試圖不讓他們接觸材料，簡直就形同試圖進行全面的審查。

禁制聲明設法解釋檔案處理方式時大費周章的做法，早已使它成為一個產生了國際影響的公共事件。只需要與其他國家的研究人員交談一下便可看出，外界對那種普遍認為不高明的表現是何等不舒服。不公開檔案是很正常的事情，法治國家對此都有明確的規定，同樣在德國我們也致力于維護透明化的理念。這就是為什么在保密期結束之前，會針對部分解密的文件和必要時將文字涂黑的做法制定各種規則。然而，如果我們不提起訴訟就無法依據現行規定獲得查閱文件的權利，這種情況只會損害國家的形象，讓同時也是研究人員的公民在國際研究同行面前感到汗顏。但尤其重要的是，這種行為如今已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傷害。這只會給人一種印象，覺得官方有明確的利益牽涉，因此務必要隱瞞有關艾希曼這類主題的信息，從而使人懷疑最后被迫對外公開的檔案絕不可能完整。恰恰是此種情況，構成了制定機密文件處理法規的原因之一，以防出現這樣的陰謀論，否則將無法打消人們的懷疑。

\*\*\*\*\*

可惜我們不必是陰謀論的愛好者，就能發現目前提交給原告的檔案資料其實并不完整。我們甚至不必親自查閱文件即可看出這一點，因為對于凡是研究過“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的人來說，只要參考一個信息就夠了：艾希曼在1960年5月被捕之前的相關檔案內容總共還不到30頁，而且其中有4頁全是關于威廉·薩森的旅行和護照申請，這不禁令人懷疑，那4頁是在薩森訪談錄曝光之后才被添加到艾希曼檔案中的。無論是西蒙·維森塔爾的消息、奧地利和德國的逮捕令、美國中情局檔案中提到的1958年進行的信息交換，還是弗里茨·鮑爾從1959年夏天開始大規模進行的干擾策略，都沒有反映在那幾頁里面，而這些還只不過是其犖犖大端罷了。除卻那張1952年的索引卡片，以及上面的艾希曼化名與聯絡地址之外，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呈現出我們甚至早已從其他來源所熟稔的事件和信息。舉例來說，如果把目前可供使用的頁面與聯邦憲法保衛局幾年前公開的五份文件相比較，即使不做任何說明，仍可看出其中的差距有多么明顯。正如一張索引卡片就能讓做了功課的人解讀出許多事情，真正的問題也很難讓人視而不見：為什么今天的檔案這么薄？無論其中原因如何，但可以確定的是，它并非一直如此。因為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德國聯邦情報局會像這些文件所顯示的那樣，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漏洞百出又雜亂無章。可惜這個觀察結果不是只對1960年5月之前的檔案文件成立。

在艾希曼檔案這件事情上，對透明的恐懼從何而來？如果我們不認為這是公開情報部門檔案時的一般原則，那就不妨附帶說明一下。艾希曼一案與其他納粹舊包袱的不同之處，在于和艾希曼這個名字相關聯的一切。人們對艾希曼可能說出什么的畏懼，并非從他在1960年5月遭到綁架之后才開始。艾希曼作為納粹迫害猶太人行動的協調者，曾經涉入了政治與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非但逍遙法外的納粹罪犯感到惴惴不安，經濟界和工業界、司法界和醫藥界、行政界和外交界的代表人物也不例外。艾希曼的名字從一開始就在阿道夫·艾希曼自己不曾去過的地方也起了作用，因為這正屬于國家社會主義體系巧妙掌握的權力機制當中的一環。在許多人從中獲利的那個犯罪政權網絡里，必定也有許多人感覺自己是同謀，即便1945年戰爭結束之后的階段并沒有成為他們要面對尷尬問題的時期。在這種集體緘默的氛圍下，一個已成為象征的名字驀然出現，帶來了騷動。最晚等到本-古里安宣布審判艾希曼之后，這種不安情緒便涌現于有人知道這個名字的世界各個角落。在1960年的時候，沒有人能夠確定艾希曼會多么認真地對待同志間的忠誠，以及他是否會收起喋喋不休的作風。[[167]](#_167_9)1960年夏天的情況與納粹時期無甚不同，艾希曼又一次在他沒有去過的地方產生了影響。因此如果有誰在艾希曼被捕之后，像情報單位一定會做的那樣觀察世界各地的反應，將不可避免地遇到與艾希曼根本無關的地區做出的應對。正由于多年來人們一再懷疑艾希曼藏身敘利亞或埃及，研究因而也必須考慮到迄今比較不受注意的中東納粹網絡。正如我們已經從個別案例中所了解到的那樣，這個網絡迅速建立起了各種重要的經濟關系，其中一些至今仍很活躍，而且它們當然也與以色列-巴勒斯坦沖突（“中東政策”）有關。不管是張冠李戴，還是果真如埃里克·施密特-恩伯姆（Erich Schmidt-Eenboom）所認為的，曾經有人膽大包天在中東化名“艾希曼”[[168]](#_168_10)，相關傳言都為戰后早期的一段歷史提供了鎖鑰。20世紀60年代初，情報部門針對艾希曼進行徹底調查的時候，不可能沒聽過這一類流言蜚語。無論在阿根廷、德國、奧地利、西班牙還是中東，普遍出現的騷動不安其實并非艾希曼引發的反應，而是源自人們當年親身參與第三帝國所留下的難以磨滅的記憶。正如一本以1945年之前的艾希曼為主題的書，必然也是一本關于納粹時期的書一樣，任何在1945年以后尋找艾希曼蹤跡的情報機構，也無法不在檔案中勾勒出戰后時期的圖像。因此如果公開艾希曼相關文件的話，一定也會呈現出這個圖像。相關的認識恐怕會讓人感到不舒服，而這的確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但如果把一個機構的舉措，以及它對50多年前的情報檔案的不當處理，都僅僅歸咎到這個機構自身，那將是錯誤的做法。聯邦情報局并不是一個小型陰謀團體，躲在年輕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及其代表身后，追求令人起疑的目標。如果對國家社會主義罪行的研究教會了我們什么的話，那就是小型團體只有在得到社會及其代表指導和允許的情況下，才有辦法為非作歹。片面的指控，例如把某個組織稱為“國中之國”，只會像接受集體罪責的假設一樣，蒙蔽了人們的判斷。如果聯邦總理府想要深鎖歷史文件，或者借口設立工作計劃綿延數年的委員會來延后解禁文件的時間而沒有招致輿論的強烈批判，那么今日聯邦情報局工作人員為此所應負的罪責，與20世紀50年代無法獨立運作于政治利益之外的情報機構一樣微乎其微。

嚴格說來，通過向公眾暗示艾希曼檔案含有爆炸性內容而把它列為機密的做法，有其荒謬怪誕的一面：我們再次將意志的軟弱和對做出必要決定的怯懦逃避，不可救藥地與阿道夫·艾希曼的名字聯系在一起。在艾希曼被處決半個世紀之后，確實存在著一種危險，那就是他再次有可能成為一個象征，誘使我們把目光移開，不去正視那些為了避免日后犯錯而必須注意的事項。如今的問題早已不光是歷史檔案中包含了哪些資料，或者聯邦德國各個相關機構在20世紀50年代疏漏或阻撓了哪些事情。在德國聯邦議會2011年針對聯邦情報局艾希曼檔案的辯論中，耶日·蒙塔格（Jerzy Montag）敦促人們徹底重新思考應如何處理這些陳年舊賬：“現在我們必須改變方向。……如果我們能有三四次通過行政部門提供的新材料有所發現，而非總是只能從調查記者那里，或者在偶然情況下聽到消息，然后事情才會有所改變。”[[169]](#_169_9)

在寫完本書之后，沒想到一位記者允許我看了一下聯邦情報局的檔案。盡管作為作者，我因為不必把書重寫一遍而非常高興，但作為德國的學者，我必須承認，這段經歷給我留下了持久的不安。其實我寧愿知道更多，而非只是補充幾頁附加內容而已。即便如此，在德國聯邦情報局第121099號檔案的2425頁資料當中，卻還是有一張紙頭讓人燃起了希望。上面只有一個大寫寫出的指示：“請仔細收集關于艾希曼的一切，我們仍然需要它。”[[170]](#_170_9)

### 言猶未盡

今日我們探討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的思想時，比起之前任何研究者都有更多材料可供運用：大部分原始抄本、一些不同副本、許多手寫文稿和打字謄本，以及關于當時最重要出版物的筆記和評論。除此之外，我們也比那些目睹審判的人享有更大優勢，能夠多方面借助大量現代史研究成果，以及極佳的審訊記錄和審判記錄版本。

不過這項任務仍然十分艱巨，因為艾希曼一直設法威嚇別人，使他們無法作為。威廉·薩森在艾希曼接受審判，以及他自己在《生活》雜志受挫之后，也一再告訴別人他準備撰文書寫艾希曼的計劃。甚至當薩森在1979年決定將文稿和錄音帶交給艾希曼的家人之后，他仍然想保留在自己的其他文章中使用阿根廷文稿的權利。他從未透露過有關薩森訪談會的細節，而且即便在包括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萊本在內的大多數參與者都去世之后，還是一直秘而不宣。只有與艾希曼交往的經過讓他難以割舍。在薩森接受的最后一次電視采訪中，出現了一個憔悴不堪的酒鬼，幾乎講不出一個連貫的句子，可是他的思緒仍然圍繞著那本關于艾希曼的書打轉。[[171]](#_171_9)然而他永遠也無法寫作了。最后他似乎與《門徒與婊子》中的一個小說人物有了同樣的命運，而那是他自己在剛開始和艾希曼密切打交道時塑造出來的角色：

他回到家的時候，對晚餐已經沒有了胃口。于是他走進墻邊書籍一直堆到天花板的書房，從移動小吧臺拿了一瓶酒和一個玻璃杯，向后斜靠在扶手椅上。他拿起一份報紙、接著是一本書，最后則是一本贊美他最新文章的專業雜志。可是不管怎樣他都無法集中精神，只能索然無味地迅速喝酒。醺醺然的感覺出現得同樣快速，卻沒有帶來慰藉。一切又開始了——他太陽穴有節奏的跳動、他內心的焦慮不安，而且他再次斷斷續續聽見了埃爾溫·霍爾茨充滿穿透力的聲音。那些片段來自他前些日子與霍爾茨進行的多次對話。對霍爾茨來說，它們就仿佛解剖刀一般，毫不留情地從自己和他那一代人的身上劃過。那位醫生曾經努力設法反駁霍爾茨時而相當粗糙的論點和主張，用分析或嘲諷來粉碎它們。事后，當他回顧自己的破壞性努力時，卻又覺得意猶未盡。對他冷靜而思路分明的頭腦來說，那是一個引人入勝的冒險，看著霍爾茨為他照亮道路、帶他進入現代精神困境的迷宮，來到自我犧牲的理想主義者永恒的地下墓穴。那是一個引人入勝的冒險，但也變成了一種負擔。因為如今到處都響著霍爾茨的聲音，在他周圍、在他心中，甚至在托馬斯·鮑爾醫生博士自以為只有他才享有話語權的地方。他收回伸出去的雙腿，雙臂交叉放在膝蓋上，把頭埋進臂彎，仿佛想要保護自己。他閉上眼睛，讓聲音向他發起進攻。[[172]](#_172_9)

薩森真的失去了自己的聲音。與大屠殺兇手個人及其思想的周旋，使薩森永遠喪失了他最強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天賦——說話和寫作的能力。直到2001年去世為止，薩森都沒有再發表作品。[[173]](#_173_9)

1960年，當艾希曼來到耶路撒冷的時候，不僅他自己的罪行，還有他在阿根廷的過去都已經找上了他。但不同于他周圍的人和他的律師，艾希曼不會對此感到驚訝，因為他曾多次告訴薩森和弗里奇，他希望在自己死了或被捕以后，馬上公布資料。于是艾希曼再次比其他人擁有一個決定性的優勢：他確切知道自己在阿根廷留下了什么樣的材料。因此艾希曼早已做好充分準備，要表現出什么樣的“即興反應”。他的方法既冒險又非常有效：否認那些材料的真實性。這樣，艾希曼不但能夠保護那一段阿根廷插曲的全體參與者，使薩森訪談會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變得面目全非，更可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里使“阿根廷文稿”無可比擬的史料價值被打上一個問號。艾希曼對這場驚險賭局的盤算已昭然若揭：他希望在對抗世界觀敵人的最后一場戰斗中，再次自行決定自己在歷史撰述中的地位。然而正因為如此，艾希曼也落入了國家社會主義錯誤的陷阱，因為一個人從來都無法自由選擇其在歷史上的地位，更遑論把它強加給后世了。他能夠用手段操弄，以及用謊言轉移人們注意力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現在有待我們來實現公開透明，把艾希曼放在他所屬的地方，而非被他滔滔不絕的言論弄得目瞪口呆。歷經多年光陰和無數捉迷藏的游戲之后，仍有將近1300頁“阿根廷文稿”和超過25小時的錄音帶保存下來。對那個拼命寫作和為自己辯解的人而言，最大詛咒就是別人反而可以通過他的努力，以他完全想象不到的方式徹底閱讀他所寫出的每一個字。

[\*](#_491) 由于沒有德文打字機的緣故，薩森抄本的打字原稿以及本書所引用的阿根廷第一手德文資料，將ä、ö、ü、ß等字母分別拼寫成ae、oe、ue、ss。——譯注

[\*](#_492) 弗里茨·鮑爾的辦公室在法蘭克福市，黑森聯邦州的首府（以及司法部）則位于威斯巴登市（Wiesbaden）。——譯注

[\*](#_493) 1944年7月20日是刺殺希特勒不成的日子。——譯注

[\*](#_494) 該書德文書名為《假死：馬丁·博爾曼與其他在南美的納粹要員》（Scheintot. Martin Bormann und andere NS-Größen in Südamerika），英文版書名卻是《余波：馬丁·博爾曼與第四帝國》（Aftermath: Martin Bormann and the Fourth Reich）。博爾曼（Bormann）則經常被誤譯成“鮑曼”（Baumann）。——譯注

[†](#_495) 豪斯納不慎把以色列副本的713頁誤寫成“659頁”，法拉戈又把它抄寫成了“695頁”。——譯注

[[1]](#_1_14) Raul Hillberg, Die Quellen des Holocaust entschlüsseln und interpretieren. Frankfurt a. M.2002, 189.

[[2]](#_2_15) 艾希曼的律師羅伯特·塞爾瓦蒂烏斯正在尋找“阿根廷文稿”的時候，一位前德國空軍軍官莫恩寫信告訴他，薩森和克勞斯·艾希曼于5月12日出現在他的梅賽德斯—奔馳辦公室里。Servatius -Bericht“Betrifft: Urheberrecht ADOLF EICHMANN, Veröffentlichung LIFE. USA”. 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3, P 10-17 (im Folgenden Servatius -Bericht).

[[3]](#_3_14) 英格·施奈德接受魯爾夫·范·提爾的采訪。

[[4]](#_4_15) Meine Flucht, 31.

[[5]](#_5_15) 因此使用報刊和專文中出現的艾希曼手稿引文時，必須非常小心謹慎。1960-1979年之間根據低質量副本倉促完成的謄寫稿更是完全不可靠。不過我歡迎任何被艾希曼筆跡搞得一籌莫展的人與我聯系，因為在完成這項研究的過程中，我對大多數手寫稿進行了謄寫。相比之下，錄音抄本是在1957年錄音完畢后立即打字出來的。在最后一卷錄音帶的抄本上，甚至看得見艾希曼的手寫更正（見73號錄音帶，第2、3、6、7、8頁）。

[[6]](#_6_15) 薩森的女兒還記得那些在連續折頁紙上打字的漫漫長夜。紙張接著必須由家人整齊地加以裁切，今日仍可在原稿上看見這些切邊。

[[7]](#_7_15) 在評估“阿根廷文稿”中的個別條目時，關于復印技術歷史的知識非常重要。因為艾希曼審判期間恰好正是復印技術的決定性轉換期。我們今天所熟悉的那種可以直接在普通干燥紙張上拷貝的影印機，是1960年年初才剛剛問世的，此后才逐漸普及到私人辦公室與官方機構。薩森和黑森總檢察長主要仍然使用直接影印機（Photostats），一種基于照相技術并使用感光紙的復制方式。此外在艾希曼審判中還使用了反射拷貝（Reflexkopie）和熱傳真復制品（Thermofax-Duplikate）。

[[8]](#_8_14) 薩森寫給塞爾瓦蒂烏斯的信件全部存放在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3, hier 13.1.61。此外，薩森在早期的訪談中就說過類似的話，見下文。

[[9]](#_9_14) 甚至連《明鏡周刊》也詳細地想象，在艾希曼牢房正下方就有刑訊室，以防他說出以色列不喜歡的言論。Der Spiegel, 15.6.1960.

[[10]](#_10_15) 薇拉·艾希曼寄給她在林茨的妹夫的副本（AllProz 6/253, P 18-19, P 70-71）。根據莫恩寫給塞爾瓦蒂烏斯的一封信，薇拉·艾希曼感覺受到其“出版顧問”的壓力（ServatiusBericht.）。

[[11]](#_11_13) 甚至有人談到令人匪夷所思的金額。但我們在討論之余必須記得，薩森并不特別擅長商業事務。他急著獨力銷售艾希曼的相關文件，以致在無人幫助的情況下犯了嚴重錯誤。他的缺乏經驗使他失去了《生活》雜志文章系列的版權。假如《生活》雜志真的把編輯工作交給他的話，他原本可以保留這些文章的版權。塞爾瓦蒂烏斯找到了各種關于售價的猜測，金額從5萬至120萬美元不等。參見Servatius-Bericht, 26.11.1960, 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3，以及塞爾瓦蒂烏斯1960年12月5日致羅伯特·艾希曼的信函，出處同上。

[[12]](#_12_13) 1960年11月28日塞爾瓦蒂烏斯寫給薇拉·艾希曼的信函，AllProz 6/253。

[[13]](#_13_11) 弗朗迪西從1960年6月14日至7月10日前往歐洲旅行，因此出境航班無論如何都為時已晚，返程航班卻又為時太早。不過薩森在庇隆下臺之后，確實曾尋求與新任總統建立聯系。國家檔案館有一張他與總統阿圖羅·翁貝托·伊利亞（Arturo Umberto Illia）的合影——在魯德爾的陪同下。感謝烏基·戈尼。

[[14]](#_14_11) 經過長時間的沉默之后，《明星周刊》才發布了這個信息。Stern, 24. Juni 2010.

[[15]](#_15_11) 薩斯基雅·薩森曾多次表示，她的父親談到了《明星周刊》、《生活》雜志和《明鏡周刊》。我還沒有機會在這方面進行深入的研究。

[[16]](#_16_11) 1960年12月1日的報告，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

[[17]](#_17_11) Robert Pendorf, Mörder und Ermordete: Eichmann und die Juden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s.Hamburg, 1961, 7.

[[18]](#_18_11) 根據我尚不能證實的傳言，《明鏡周刊》在檢查相關材料之后拒絕使用，并且把它“寄回了慕尼黑”。薩斯基雅·薩森表示，她的父親聲稱自己也是《明鏡周刊》的通訊記者。1960年12月1日，更有一名慕尼黑的線人向美國中央情報局報告說，薩森出售了80頁資料給《明鏡周刊》與《明星周刊》（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另見2009年作者與薩斯基雅·薩森的訪談和通信。

[[19]](#_19_11) 塞爾瓦蒂烏斯研究過這份合同，并提到了一筆超過五萬荷蘭盾（約合五萬德國馬克）的酬金。這份合同可以解釋為什么荷蘭電影制片人魯爾夫·范·提爾在荷蘭檔案館發現了一份薩森資料的拷貝。塞爾瓦蒂烏斯寫給羅伯特·艾希曼的信函，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3, 30-32。此外亦根據魯爾夫·范·提爾與作者的對話。

[[20]](#_20_11) 審訊記錄，1960年6月5日，第397頁。

[[21]](#_21_11) 同上。

[[22]](#_22_11) Servatius-Bericht, 26.11.1960, 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3，以及塞爾瓦蒂烏斯1960年5月寫給羅伯特·艾希曼的信件，出處同上。

[[23]](#_23_11) Servatius-Bericht und Brief vom 30.11.1960.

[[24]](#_24_10) 關于弗朗索瓦·熱努、漢斯·雷興貝格，以及他們為艾希曼而努力的細節，參見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Willi Winkler, Der Schattenmann. Von Goebbels zu Carlos: Das mysteriöse Leben des François Genoud, Berlin 2011, Inbs. Kapitel 9.題材類似的還有Karl Laske, Ein Leben zwischen Hitler und Carlos: François Genoud, Zürich 1996; Interview mit Genoud in Pierre Péan, L’Éxtrémiste, François Genoud, de Hitler à Carlos, 1996, 257 ff. Maßgebliche Originalinterviews in der Dokumentation L‘Éxtrémiste de Hitler à Carlos, Television Suisse Romande 1996.

[[25]](#_25_10) 羅伯特·塞爾瓦蒂烏斯是弗里茨·紹克爾（Fritz Sauckel）的辯護律師，雷興貝格則幫助了瓦爾特·馮克（Walther Funk）的辯護工作。

[[26]](#_26_9) 在林茨的信件往來中，漢斯·雷興貝格“和他的朋友G先生”都被明確稱為法庭辯護費用的資助者。在塞爾瓦蒂烏斯的遺物中還可以找到更進一步的證據，BArch Koblenz auft AlIPoz 6/n7, 253, 257。塞爾瓦蒂烏斯曾試圖讓德國政府正式承擔審判費用，但沒有成功。最后是以色列政府支付了他的律師費。熱努和雷興貝格籌集的大量金錢則從未被正式提及，然而塞爾瓦蒂烏斯遺物中的一些收據清楚揭示了雷興貝格所起的作用。雷興貝格也受到美國中情局監視，相關細節見NA, RG 263, CIA Name File Hans Rechenberg，以及弗朗茨·拉德馬赫的相關資料。除此之外，德國聯邦情報局的檔案（121 099）表明，雷興貝格是德國情報單位的消息源之一，而且將辯方的資料轉交給了德國聯邦情報局，使之掌握了資助審判相關活動的信息。

[[27]](#_27_8) 彼得·伍格（Peter Woog）1965年2月24日的手寫說明。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當代史檔案館，ETH Zürich, JUNA-Archiv/567, Korrespondenz Peter Woog。

[[28]](#_28_8) 塞爾瓦蒂烏斯在7月25日與埃伯哈德·弗里奇見面。弗里奇承諾與那位辯護律師合作，并提供所有文件，以此換取在歐洲的獨家使用權（Servatius-Bericht）。

[[29]](#_29_8) Servatius-Bericht, 26.11.1960, 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3，以及羅伯特·塞爾瓦蒂烏斯與漢斯·雷興貝格的信件往來，出處同上。

[[30]](#_30_8) 迄今公開的艾希曼檔案文件，很大一部分是對艾希曼可能說什么幻想出來的各種恐懼。發布的每一頁“阿根廷文稿”上的人名都經過仔細檢查。這項工作雖然不如弗里茨·鮑爾委托進行的評估那么徹底，但當成人名索引仍非常有用。參見德國聯邦行政法院補充文件，BVerwG 7A 15.10, Saure gegen BND, BND-Akten 121 099, 1-66; 100 470, 181-253.

[[31]](#_31_8) 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 13.9.1960.在德國聯邦情報局迄今公開的艾希曼檔案中，相關通信內容大部分都付之闕如。

[[32]](#_32_8) CIA-Bericht vom 20.9.1960, ebd.

[[33]](#_33_8) 我不管怎么努力都無法在錄音帶上找到他的名字，而且也無法在《生活》雜志所沒有的頁面上找到它。

[[34]](#_34_8) 《塞爾瓦蒂烏斯報告》將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 CIA）向《生活》雜志的亨利·魯斯（Henry Luce）提出查詢，以及薩森與弗里奇起爭執的時間都界定在1960年9月底或10月。

[[35]](#_35_8) 早在1960年10月11日，一名法蘭克福的美國中情局線人（顯然來自《世界報》的圈子）就報告說，艾希曼到目前為止已經寫出了500頁。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

[[36]](#_36_9) 薩森抄本21, 2。

[[37]](#_37_8) 薩森抄本12, 7。

[[38]](#_38_8) 《塞爾瓦蒂烏斯報告》：“他自從被拘禁在以色列，每天都在口述報告。”塞爾瓦蒂烏斯勸告艾希曼不要那么做，卻徒勞無功。

[[39]](#_39_8) 德國聯邦情報局的檔案包括許多以色列的文件，以及塞爾瓦蒂烏斯通信的一大部分。

[[40]](#_40_8) 參加談判的還有格拉斯哥的派翠克·奧康納（Patrick O’Connor），他是柯蒂斯·布朗（Curtis Brown）及其他英國版權代理機構的代表。據悉所談的英鎊金額高達六位數。熱努還與意大利的《時代》（Epoca）和英國的《人物》（People）雜志進行了談判（參見《塞爾瓦蒂烏斯報告》以及佩昂[Pean]對熱努的采訪）。意大利的《時代》刊出了之前未公布的艾希曼阿根廷照片，英國的《人物》則分五次摘要連載了《我的逃亡》（1961年4月30日至5月28日）。關于《巴黎競賽畫報》對薇拉·艾希曼的采訪，參見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2（Paris Match 683 vom 12.5.1962）。

[[41]](#_41_8) 回答《巴黎競賽畫報》1962年6月9日的書面問題。

[[42]](#_42_8) 關于熱努的失望，參見佩昂對弗朗索瓦·熱努的采訪。

[[43]](#_43_9) Servatius-Bericht.薩森在1960年12月才發電報通知他即將到來。

[[44]](#_44_9) 《生活》雜志在出刊日期的前一個星期二開始銷售，這是美國雜志慣用的做法。哈利·戈爾登（Harry Golden）的預告出現于1960年11月21日那期（即11月15日開始銷售）。隨后連載《艾希曼講述其該死的故事》系列文章的兩期雜志，分別出刊于“11月28日”（11月22日銷售）和“12月6日”（11月29日銷售）。

[[45]](#_45_8) 薇拉·艾希曼接受《巴黎競賽畫報》的采訪，1962年4月29日。

[[46]](#_46_8) Servatius-Bericht. 1960年12月1日的德國報紙幾乎都刊登了相關報道。在1960年12月9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塞爾瓦蒂烏斯進一步確認了他的決定。

[[47]](#_47_8) 自艾希曼被監禁以來便一直負責照顧他健康的茲維·沃爾施泰因（Zwi Wohlstein），在日記中記下了這個讓艾希曼陷入困境的經歷。摘錄自Wohlsteins Notizen, 4.12.1960,abgedruckt in Die Welt, 11.9.1999, S. 3.

[[48]](#_48_8) 薇拉·艾希曼1960年11月28日發給塞爾瓦蒂烏斯的電報，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3 P 59。

[[49]](#_49_8) Servatius-Bericht.德國聯邦情報局的檔案也收錄了一份拷貝，德國聯邦行政法院補充文件BVerwG 7A 15.10, Saure gegen BND, BND-Akten 121099, 1840-1843。

[[50]](#_50_8) L’Express No. 494, 1.12.1960, Eichmann parle, Paris；1961年1月13日薩森寫給塞爾瓦蒂烏斯的信函，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BA Koblenz, All. Proz. 6/253, 113-114。塞爾瓦蒂烏斯在審判中利用這篇文章攻擊薩森，損害其作為潛在證人的資格。艾希曼審判，第105次開庭的記錄。

[[51]](#_51_8) La Razón, “Eichmann Fue un Engranaje de la Diabólica Maquinaria Nazi, Dice el Hombre que Escribió sus Memorias en Buenos Aires”, 12.12.1960.

[[52]](#_52_8) 薩森寫給塞爾瓦蒂烏斯的信件，1961年1月13日（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3, 113114），以及1961年1月28日薩森寫給塞爾瓦蒂烏斯的信件（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3, 110）。薩森的建議暴露了他局內人的知識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反猶太態度，使他想要提供的幫助完全脫離了現實，即便我們可以清楚看出他其實是出于好意。

[[53]](#_53_8) 在1961年2月7日給他同父異母弟弟羅伯特·艾希曼的授權書中，艾希曼設想50%歸他的兒子們，50%歸塞爾瓦蒂烏斯所有。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3, 6.

[[54]](#_54_8) 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 21.12.1960.線人的名字已被涂黑。

[[55]](#_55_8) NA, RG 263, CIA Name File Léon Degrelle, 023-230/86/22/04.相關線索出現在萊昂·德格雷勒（Léon Degrelle）的檔案中，因為茲維·阿爾杜比（Zwy Aldouby）顯然計劃綁架德格雷勒。衷心感謝威利·溫克勒（Willi Winkler）。

[[56]](#_56_9) Robert Pendorf, Mörder und Ermordete. Eichmann und die Juden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Hamburg, 1961, 7.

[[57]](#_57_9) 朗拜因的個人資料和以下說明，主要根據奧地利國家檔案處的赫爾曼·朗拜因遺物，Nachlass von Hermann Langbein, ÖStA E/1797。

[[58]](#_58_9) 朗拜因在1959年3月12日通知奧蒙德，他的波蘭之行找到了“幾張黨衛隊隊員的照片”（E/1797, Ordner 106）。關于刑事指控的信件往來，出處同上。

[[59]](#_59_8) 他與赫爾曼·朗拜因的通信中經常針對那些雜志提出評論。每當他們擔心重新陷入納粹英雄崇拜時，還會針對自己的新聞活動相互征詢意見。參見朗拜因遺物，ÖStA E/1797,Ordner 106。

[[60]](#_60_8) 亨利·奧蒙德的遺物如今保管在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可惜我還無緣親自過目。感謝弗里茨·鮑爾研究所的維爾納·倫茨（Werner Renz）先生將奧蒙德的傳記寄給我（Alles zu seiner Zeit. Rechtsanwalt Henry Ormond 1901-1973，未注明日期的打字稿）。該傳記雖然與本章的內容無關，卻提供了關于奧蒙德生平的寶貴信息。下文還原奧蒙德所扮演角色時的主要依據，是他與朗拜因的大量信件往來。參見朗拜因遺物，ÖStA E/1797,Ordner 106。感謝安東·佩林卡（Anton Pelinka）允許我在艾希曼研究中使用這個非常豐富的資源。

[[61]](#_61_9) “有太多人想要強調整個部門的集體清白。”奧蒙德1956年4月4日寫給林格曼（Lingemann）的信函，引自Das Amt, p. 591.

[[62]](#_62_8) Thomas Harlan, “Kto był Eichmann?”, Polityka 28.5.1960.

[[63]](#_63_8) 奧蒙德和朗拜因之間的詳細信件往來，參見奧地利國家檔案處，ÖStA E/1797, Ordner 106。

[[64]](#_64_8) 奧蒙德與朗拜因從1961年2月起的通信內容，包括了會議安排、財務問題、哈蘭的旅費賬單，以及旅館內通知朗拜因哈蘭何時抵達的便箋。參見奧地利國家檔案處，ÖStA,Nachlass Langbein, E/1797。

[[65]](#_65_8) 維森塔爾1960年2月29日就向以色列駐奧地利大使艾策希爾·薩哈爾報告了這次接觸。這個事件有多方驗證，因為維森塔爾也曾將此事告訴他的傳記作者海拉·皮克（Hella Pick），而且伊塞爾·哈雷爾更曾經因為1960年2月的事件，指責西蒙·維森塔爾危及艾希曼的追捕行動。Hella Pick, Simon Wiesenthal: A Life in Search of Justice. London 1996, 147; Isser Harel, Simon Wiesenthal and the Capture of Eichmann, unveröffentlichtes Manuskript, zitiert bei 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 A.o., 181.

[[66]](#_66_8) 感謝托馬斯·哈蘭提供對此事件的回憶。那些拷貝的范圍和質量，表明它們來自羅伯特·艾希曼。此外其上的手寫注記指出，那些是除了被出售給《生活》雜志之外的所有資料。另見路德維希堡聯邦檔案館，BArch Ludwigsburg Ordner “Sassen Interview Diverses”。

[[67]](#_67_8) Vermerk 7.3.1961, HMJ Wiesbaden, Veesenmayer, Edmund—Novak; jetzt: Adolf Eichmann,Bd. II, Bl. 211. Belegt bei Wojak, Fritz Bauer ..., A. o., 582, fn 93.

[[68]](#_68_8) 我們可以排除羅伯特·艾希曼自愿交出“阿根廷文稿”的可能，而且他不可能沒有注意到文稿已經遭竊（假如朗拜因只是偷偷拍照的話，后來就不必再制作膠片了）。羅伯特·艾希曼真應該設法通過律師向其兄發出警告。赫爾穆特·艾希曼好意提供的信息顯示，阿道夫·艾希曼的家人在我詢問之前似乎對被竊取的文件一無所知。參見1961年3-4月的塞爾瓦蒂烏斯的信函、弗里奇寫給塞爾瓦蒂烏斯的信件，尤其是AllProz 6/253, 6062。2009年向林茨警方和檢察官辦公室提出的詢問則沒有帶來任何結果。

[[69]](#_69_8) 哈蘭接受采訪時的說法。Jean-Pierre Stephan, Das Gesicht Deines Feindes. Ein deutsches Leben, Berlin 2007, 124.

[[70]](#_70_8) 感謝丹尼爾·帕森特愿意與我分享自己的相關回憶。如果沒有他的坦誠，我永遠也不可能起心動念去尋找資料來重建事情的來龍去脈。此外我更連做夢都不會想到，此后流傳于世的“阿根廷文稿”竟然包含了各種不同的組合，因此我們必須仔細查看被標示成“薩森訪談錄”的每一張紙，并且計算一下頁數。

[[71]](#_71_8) 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在日記中指出，丹尼爾·帕森特從托馬斯·哈蘭那里收到了一份薩森抄本的拷貝，而且人民警察的犯罪學家已調查證明了它的真實性。Mieczysław F.Rakowski, Dzienniki polityczne 1958-1962, Warszawa 1998, 286. 5月9日華沙國民警察犯罪學家做出的書面評估概要，證明了提交給《政治周刊》的薩森抄本上艾希曼手寫字跡的真實性。其中部分在第一篇文章中引出。感謝克里斯蒂安·甘澤（Christian Ganzer）協助翻譯波蘭語文件。

[[72]](#_72_9) 根據《政治周刊》的說法，抄本的譯文與評論總共有1258頁。可惜報社的檔案中已經沒有那份文稿了。根據哈蘭的女朋友克雷斯蒂娜·日武爾斯卡的記憶，所有拷貝都被偷走了。可是莉亞娜·迪爾克斯（Liane Dirks）回憶（并且在一本小說中這樣寫），日武爾斯卡的記憶并不總是正確。“Eingriff auf höchster Ebene”, in: Frankfurter Rundschau, 20.Juni 2006, 10 und Krystyna, Köln 2006.

[[73]](#_73_9) 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1961年6月20日的日記，見Dzienniki polityczne 1958-1962,Warszawa 1998, 293f.

[[74]](#_74_8) 我個人非常感謝《猶太通論周報》這個簡短的附帶說明，因為它首次提到了《政治周刊》的文章系列。我還必須很慚愧地承認，在此之前我從未想過在前東方集團尋找任何這樣的出版物。我們腦海中的壁壘還是堅固得可怕！亦參見Welt 24.5.1961.

[[75]](#_75_8) Paris Match, “Eichmann par Eichmann”, No. 630 (6.5.1961), No. 631 (13.5.1961) und No.632 (20.5.1961).

[[76]](#_76_8) 從阿夫納·萊斯1960年12月的筆記可以明顯看出，他當時只知道《生活》雜志的那篇專文。由于艾希曼的律師塞爾瓦蒂烏斯在1961年2月2日拒絕萊斯繼續進行審訊，于是審訊在1月正式結束。不過萊斯注意到，艾希曼本人無意遵守此一禁令：“他太喜歡聽到自己講話的聲音，以致不想‘放棄’那種樂趣。”萊斯當然巴不得能夠利用這個機會(Archiv für Zeitgeschichte, ETH Zürich, Nachlass Avner W. Less, 4.2.3.2 Notizhefte)。萊斯的上司卻決定，不可以讓艾希曼現在就知道薩森訪談錄已經到達以色列，以便把出其不意的效果留到開庭審判的時候(Späterer Bericht von Less in A. 0., 4.2.3.2 Persönlich Unterlagen, Sammelmappe II)。

[[77]](#_77_8) 奧蒙德與朗拜因之間的通信，尤其是朗拜因1962年1月25日的信函。奧地利國家檔案處，ÖstA E/1797, Ordner 106。

[[78]](#_78_8) 艾希曼審判，第16次開庭，1961年4月26日。

[[79]](#_79_8) Bach, Gabriel: “Gespräch mit Herrn Gabriel Bach, stellvertretender Ankläger im Prozess gegen Adolf Eichmann, anlässlich des 65. Jahrestages der Wannsee-Konferenz vom 20. Januar 1942 am 18. Januar 2007 im Haus der Wannsee-Konferenz”, in: Haus der Wannseekonferenz (Hrsg.), Newsletter 8, Dezember 2007, 2-21‚ hier 5.

[[80]](#_80_8) 維森塔爾在一封日期較早，于1970年12月28日寄給本恩·塞耶斯（Ben A. Sijes）的信函中即已提及此事。參見Tom Segev, Simon Wesenthal ..., A.o., 188.

[[81]](#_81_8) 西蒙·維森塔爾1980年10月5日寫給豪斯納的信函（Simon Wiesenthal Archiv,Korrespondenz）。在此感謝米夏埃拉·沃采爾卡（Michaela Vocelka）這么快就把它寄給我。

[[82]](#_82_8) 這是仔細逐頁比對之后所得出的結果。若有人想親自查證，不妨采取比較簡單的做法，找一個朗拜因的版本（以及薩森原件）上不存在的典型損毀：薩森抄本18, 12在左側出現一個P字形狀的燒損痕跡，毀掉了大約10%的頁面。

[[83]](#_83_8) 這種講法來自海因茨·費爾弗（他在艾希曼審判案結束后不久被揭發為蘇聯間諜）。參見Heinz Felfe, Im Dienst des Gegners: 10 Jahre Moskaus Mann im BND. Hamburg, Zürich 1986, 248.聯邦情報局檔案BND-Akte 121 099證明，他們在1960年年底已經擁有了第一批“阿根廷文稿”，而且是得自美國。

[[84]](#_84_8) 1961年5月31日完成的哈加格評估報告已于6月9日提交法院，因此可在起訴文件中查閱（希伯來文起訴文件T/1392）。哈加格清楚地表明，他收到全部資料的時間為1961年5月25日。盡管他提到了之前在1961年3月17日和4月10日的兩次客觀評估，但想要在僅僅六天之內把堆積如山的頁面評估完畢是不可能的事情。非常感謝柏林的伊莉娜·亞博廷斯基（Irina Jobotinsky）協助翻譯希伯來文的資料。

[[85]](#_85_8) 在一般文獻，特別是通俗讀物中，有無數人聲稱曾在薩森家里看見過那2個穿孔文件夾和17個卷宗。我們可以立即反駁他們的說法，因為薩森此外還有400多頁的材料。假如薩森使用和哈加格一樣的分類方式，那么就會得到大約28個卷宗。

[[86]](#_86_8) 我有幸與路德維希堡聯邦檔案館的工作人員一起整理了館藏抄本的第二部分。與哈加格不同的是，我的優勢在于事先已對必須整理的頁面非常熟悉。但即便如此，我們進行這項工作的時候仍需要許多幽默感。再次衷心感謝托比亞斯·赫爾曼和西達·托普坦奇（Sidar Toptanci），在我研究艾希曼期間給了我最愉快的檔案館體驗。

[[87]](#_87_8) 這很明顯是一個錯誤，因為重復計算的頁數后來沒有刪除。頁碼重復之處為：第112頁=113頁，第224頁=225頁，第508頁=509頁。

[[88]](#_88_8) 這些頁面包含了關于艾希曼前副官羅爾夫·金特的討論。在原始錄音帶上（聯邦檔案館錄音帶編號BArch 09D），艾希曼要求去掉這些評論，因為他相信金特還活著，而他不想給金特造成任何傷害。

[[89]](#_89_8) 薩森抄本6, 1。

[[90]](#_90_8) 迪特里希·措伊格致弗里茨·鮑爾的信，1961年6月2日。路德維希堡聯邦檔案館，BArch Ludwigsburg, Bestand Zentrale Stelle, III 44/ 28.

[[91]](#_91_8) 按照哈加格的編號，被承認的頁面為：18, 57, 90, 100, 102, 106, 110, 118, 124, 131, 151,152, 158, 168, 201, 202, 209, 213, 221, 227, 230, 246, 253, 265. 267, 272, 276, 277, 278, 279,281, 283, 288, 292, 293, 303, 304, 306, 307, 308, 313, 314, 323, 336, 361, 362, 368, 369, 372,373, 384, 398, 407, 408, 420, 421, 424, 425, 426, 432, 513, 514, 516, 519, 521, 522, 524, 525,574, 577, 578, 582, 585, 587, 609, 610, 613, 616, 617, 662, 663, 665, 667。（可向本人索取各頁的索引，以便在聯邦檔案館查閱。）

[[92]](#_92_8) 簽字并不像沃亞克所認為的（Eichmanns Memoiren, 50），表現了艾希曼的學究氣，那反而是調查證據時的常見做法，用于連續承認抄本和做出的修正。萊斯也好幾次詳細描述了這種做法。Nachlass Less, Archiv für Zeitgeschichte, ETH Zurich.

[[93]](#_93_8) Einlassungen zu den Sassen-Memoiren, 6-seitiges Typoskript, Jerusalem 9.6.1961, 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4.

[[94]](#_94_9) 薩森只有在最后一次接受采訪的時候（“Edicion plus”, Telefe Buenos Aires, 1991），才明確談到艾希曼本來打算寫的自傳。

[[95]](#_95_8) Nation Europa, Jg. 11, 1961, Heft 11 (November), 37-42. Hier 41.

[[96]](#_96_9) 即使在艾希曼審判案之后，福爾默仍繼續與阿根廷保持聯系。胡安·馬勒（萊因哈德·科普斯）表示，福爾默曾于1980年12月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附近的蓬塔奇卡（Punta Chica）主持了“仲夏節”慶祝活動。Juan Maler, Frieden, Krieg und “Frieden”. Bariloche 1987, 403.

[[97]](#_97_9) 甚至在讀到《生活》雜志的文章系列之前，阿道夫·馮·塔登就已經在談論薩森文件所包含的范圍了。他后來承認，自己是通過魯德爾熟悉薩森文件的。塔登在1960年12月6日寫給埃里希·克恩邁爾的信函。Nieders. Landesarchiv, Nachlass Adolf von Thadden, VVP 39, Acc. 8/94 Nr. 80 Korrespondenz K. und Acc. 1/98 Nr. 49 (SudholtKorrespondenz).

[[98]](#_98_8) 1961年6月23日，鮑爾向黑森州司法部宣稱，斯坦巴赫（Steinbacher）檢察官希望能夠在維也納傳訊埃伯哈德·弗里奇。引自Irmtrud Wojak, Vermerk 23.6.1961, HMJ Wiesbaden, Veesenmayer, Edmund - Novak; jetzt: Adolf Eichmann, Bd. II, Bl. 346, Wojak,Fritz Bauer 582.

[[99]](#_99_8) Wojak, Eichmanns Memoiren, A. o.關于這一引用的問題，參見第三章《友情相助》一節。

[[100]](#_100_8) 豪斯納曾在提到艾希曼筆記時說：“這第29卷僅供您參考。”但此處的“卷”不同于沃亞克的理解（Eichmanns Memoiren, A.o., 222 n.93），指的并非錄音帶而是抄本，而且我們可在抄本上找到這一段文字（薩森抄本29, 1，29號錄音帶不在艾希曼的遺物當中，因為其后人聽從了指示）。豪斯納在《正義在耶路撒冷》一書做出的所有引用，很明顯根據的是哈加格所整理的版本。

[[101]](#_101_8) 薩斯基雅·薩森接受魯爾夫·范·提爾（2005）和雷蒙德·萊伊（2009）的采訪；薩森家的友人英格·施奈德接受范·提爾的采訪（2005）。

[[102]](#_102_9) Gideon Hausner, Gerechtigkeit in Jerusalem. München 1967.

[[103]](#_103_8) 豪斯納的副手加布里埃爾·巴赫曾一再令人信服地解釋說，關于阿根廷種種說辭的知識對他有非常重要的個人意義，避免他在艾希曼裝模作樣的時候上當中計。

[[104]](#_104_9) 交叉審訊，艾希曼審判第96次開庭，1961年7月13日。影片記錄令人震驚地清楚顯示出艾希曼的謊言多么具有說服力。

[[105]](#_105_8) 除了《生活》雜志的系列文章之外，漢娜·阿倫特也在她的書中使用了以色列制作的艾希曼手寫片段的打字抄本（Betrifit: Meine Feststellungen zur Angelegenheit “Judenfragen”...）。這些手寫片段屬于起訴文件的一部分，因此所有在場記者皆可查閱。但她沒有看到薩森抄本。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 A. o., 10, 330.

[[106]](#_106_8) 路德維希堡中央辦公室，ZSt Ludwigsburg III 44/10。

[[107]](#_107_8) 路德維希堡聯邦檔案館，BArch Ludwigsburg B162/428 und 429。

[[108]](#_108_8) 巴登—符騰堡州刑事調查局的那封附函和其他信件，都使用了一個特別委員會的信箋，但該局如今對此已無任何記錄。正如諾貝特·基斯林向我解釋的那樣，此事頗不尋常，因為它們原本應該逐一登記在文件收發簿上。信箋上的文字為：LKA BW Sonderkommission Zentrale Stelle Tgb. Nr. SK. ZSt. A/14111/61。

[[109]](#_109_8) 在漢堡當代史研究中心的檔案室就有一份副本。

[[110]](#_110_8) 漢斯·雷興貝格在1961年3月31日的一封信件中，解釋了他與熱努在開始審判之前聯手進行的出版工作。自從博爾曼遺稿和戈培爾日記引起爭論以來，熱努就因為喜歡興訟而臭名昭著。

[[111]](#_111_8) 朗拜因致奧蒙德的信函，1962年1月25日。ÖStA Wien. Nachlass Hermann Langbein,E 1797/106: Briefwechsel mit Henry Ormond.

[[112]](#_112_8) 漢娜·阿倫特雖然曾被指責僅僅親自參加了少數幾次開庭，卻是最徹底閱讀審訊和審判記錄的人之一。她還把那些記錄帶回了美國。

[[113]](#_113_9) 朗拜因和奧蒙德都帶著尊敬與理解的態度談論哈蘭和這本從未寫過的書，并相互交換意見，對哈蘭顯然因為羞愧而退縮感到遺憾。奧地利國家檔案處，ÖStA E1797, Ordner 106。

[[114]](#_114_8) 托馬斯·哈蘭竭盡所能向我描述了那些紙箱的內容。2009年，沃亞克女士告訴我，她自己還沒有時間查看哈蘭的紙箱，因此既不能確認也無法糾正哈蘭的說法。可惜后來和她就沒有了進一步的溝通。

[[115]](#_115_8) 感謝卡特琳·賽博爾德—哈蘭（Katrin Seybold-Harlan）把那幾頁文字寄給我。它們不僅讓我能夠驗證托馬斯·哈蘭關于文件匯編的信息，而且更證明哈蘭收到的副本來自亨利·奧蒙德辦公室。

[[116]](#_116_9) 在此的猜測不應與所謂“消失的頁面”混為一談，亦即那些雖未被使用但已知被歸檔的資料。Jürgen Bevers, Der Mann hinter Adenauer. Berlin 2009, Kapitel “Der Eichmann Prozess und die verschwundenen 40 Seiten”.

[[117]](#_117_8) 事實已經證明，法拉戈買到的既有真消息也有假消息，并且編造了關于艾希曼天花亂墜的故事。然而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他那本書仍然包含若干關于南美洲納粹分子的正確細節。這顯示出法拉戈一定有過某些很好的資料來源，可是書中好資料與壞資料緊密交織在一起，需要大量工作來篩選。

[[118]](#_118_8) 斯坦·勞里森斯以扣人心弦的語言和富有想象力的方式，寫了一本關于威廉·薩森的書。該書在許多方面得益于法拉戈的著作，但往往沒有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仔細分辨引文和編造的故事。Stan Lauryssens, De fatale vriendschappen van Adolf Eichmann. Leuven 1998.

[[119]](#_119_9) Kapitel 16 Eichmanns Entführung und Kapitel 21 Horrorgeschichten, 221 ff. und 285 ff.

[[120]](#_120_8) 法拉戈稱之為“埃伯哈德·弗里徹”（Eberhard Fritsche），他提到人名時往往很不精確。

[[121]](#_121_9) Farago, Scheintot ..., A. o., 187.

[[122]](#_122_8) 勞里森斯也號稱親眼看見過這17個穿孔文件夾，但不管那些故事講得多么天花亂墜，全世界只有一個地方能看見它們：以色列，因為它們是亞伯拉罕·哈加格的工作成果。

[[123]](#_123_8) 659和695這兩個數字僅在以色列副本的語境中出現過，即在吉德翁·豪斯納的著作中。其他說法都是法拉戈的打字錯誤，這個錯誤反而突顯出其所使用資料的來源。

[[124]](#_124_8) Farago, Scheintot ..., A. o., 290.

[[125]](#_125_8) 格爾德·海德曼和卡爾·沃爾夫曾在薩森家里做客一段時間。海德曼說，甚至在1979年的時候，包括他在內的每一個人都堅信是薩森把艾希曼（或者至少是“阿根廷文稿”）出賣給了以色列人，薩森則依舊因為受到懷疑而惶惶不可終日。海德曼也對博爾曼感興趣，但坦白告訴我薩森在這方面沒法提供幫助。可是在另一方面，薩森答應把海德曼介紹給克勞斯·巴比（Klaus Barbie）。于是海德曼在薩森的安排下，進行了為期一天的專訪。可見威廉·薩森根本不需要用博爾曼的神話來打動法拉戈，他本可以把法拉戈介紹給自己認得的一些有資格上頭條的納粹要員——例如1979年才去世的約瑟夫·門格勒。

[[126]](#_126_8) 一篇優秀的文章最早對這個問題做出了概述：Meir Litvak und Esther Webma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Holocaust in the Arab World”, im Konferenzband After Eichmann.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Holocaust since 1961 (Hrsg. David Cesarani). New York 2005,100-115.

[[127]](#_127_8) Faris Yahya (psd. Faria Glubb), Originaltitel: Zionist Relations with Nazi Germany, Beirut, 1978.這種論調的其他例子還有阿布·馬贊（Abu Mazin）——即馬哈茂德·阿巴斯（Mahmud Abbas）——和杰爾吉·哈達德（Jurji Haddad）。他們認為國家社會主義者與猶太復國主義者在資本主義的目標上有共同點。

[[128]](#_128_8) Klaus-Michael Mallmann, Martin Cüppers, “‘Elimination of the Jewish National Home in Palestine’: The Einsatzkomnando of the Panzer Army Africa, 1942”, in: Yad Vashem Studies 35, 2007, 111-141.

[[129]](#_129_8) 薩森抄本10, 11。

[[130]](#_130_8) 1961年2月22日寫給羅伯特·艾希曼的信函；1961年12月5日探視艾希曼時的談話筆記，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BArch Koblenz AllProz 6/238。

[[131]](#_131_8) 1961年2月22日寫給羅伯特·艾希曼的信函，寫給家人的一些信函，出處同上。一份拷貝進入了德國聯邦情報局的檔案，另見CIA report dated October 17, 1961, 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 (nonscanned files, declassified May 2009).

[[132]](#_132_8) 使用這個版本時必須小心謹慎，因為它上面的手寫注記并非全部來自阿根廷，尤其是一些大大的問號和劃線刪除的部分。

[[133]](#_133_9) 感謝弗朗西斯卡·薩森提出這個想法。

[[134]](#_134_8) 弗里德里希·施文德定居在秘魯利馬，是克勞斯·巴比的朋友。他曾散播謠言，稱薩森甚至不清楚黨衛隊的官階名稱。由于真正的黨衛隊成員不可能忘記這樣的事情，因此薩森（他稱之為“薩瑟”[Sasse]）根本不可能是黨衛隊的人。漢堡社會學研究所，HIS,Sammlung Schwend, 18/89, Lima 6.5.1965。

[[135]](#_135_8) 施文德寫給奧伯米勒（Obermüller）的信函，1966年1月7日, HIS, Sammlung Schwend,38/27, 47。

[[136]](#_136_8) 茲維·阿哈羅尼接受丹·塞頓的采訪（Mengele），以及茲維·阿哈羅尼與威廉·迪特爾的采訪（Der Jäger..., A. o.）。

[[137]](#_137_8) 感謝格爾德·海德曼愿意告訴我那次拜訪薩森的經過。當時并有若干錄音和照片，可惜我迄今還沒有機會聽到海德曼所保有的錄音資料。

[[138]](#_138_8) Nation Europa, Jg 31, 1981, Heft 2, 60-61.感謝祖德霍爾特博士提到這篇讓他直到今天都還憤恨不已的評論。在這方面，塔登寫給祖德霍爾特的兩封信函非常具有啟發性，它們現存于塔登遺稿，從中可清楚看出對阿舍瑙爾的批評。塔登采取了中間立場，他承認滅絕猶太人是事實，但刻意不切實際地降低死亡人數。Niedersächsisches Landesarchiv,Magazin Pattensen, VVP39, Acc. 1/98, Nr. 49, Briefe vom 10. und 17.12.1980.

[[139]](#_139_8) http://www.fpp.co.uk/Auschwitz/Eichmann/Buenos\_Aires\_MS.html（歐文的網站首頁,The Eichmann Papers）。

[[140]](#_140_8) 萊尼·亞希勒雖然沒有看到阿舍瑙爾文稿，卻還是設法寫出了一篇很好的文章：“‘Memoirs’ of Adolf Eichmann”, in: Yad Vashem Studies 18, 1987, 133-162.

[[141]](#_141_9) 歐文的引文（Eichmann Papers, Irving-Homepage）甚至可以讓人相當精確地辨認出他所提到的頁面。沒有跡象顯示那些重新發現的卷帙里面包含了迄今未知的艾希曼文稿。

[[142]](#_142_8) 歐文談到了“一部傳記作品的八個無頁碼章節，編號從5到12”，可是對外公布的那個章節卻明顯是有頁碼的，而且章節編號為4。

[[143]](#_143_8) 那一章有許多地方把艾希曼的說辭做了淡化、異化和明顯的扭曲，以達到薩森的目的：理想化希特勒，并借此將猶太人大屠殺呈現為猶太人自己弄出來的結果。任何希望親眼見證的人，可在第四章第15頁和第19頁找到對艾希曼言論明顯的歪曲。

[[144]](#_144_8) 那個資料來源甚至阻止了像依爾姆特魯德·沃亞克和大衛·切薩拉尼這樣的研究人員，實際查閱他們早已注意到的艾希曼遺物N 1497。由于使用德魯費爾出版社的版本，切薩拉尼和沃亞克的書中于是不幸出現了已被證明并不正確的“艾希曼言論”，因為它們其實分別來自朗格爾、薩森，或者阿爾文斯萊本。特別是近幾年國際上關于魯道夫·卡斯特納和其他被迫成為艾希曼猶太談判伙伴的大型著作，也沒有使用與此主題相關的4卷“消失的”錄音帶。例如Ladislaus Löb, Reszö Kasztner. London 2009;Anna Porter, Kasztner’s Train, The True Story of an Unknown Hero of the Holocaust.New York 2007, 324f., aber auch Christian Kolbe: “‘Und da begann ich zu überlegen’.Adolf Eichmanns zwiespältige Erinnerungen an sein ungarisches ‘Meisterstück’”, in: Fritz Bauer Institut (Hrsg.), Im Labyrinth der Schuld. Täter; Opfer, Ankläger, Jahrbuch 2003 zur Geschichte und Wirkung des Holocaust. Frankfurt a.M., New York 2003, 65-93.

[[145]](#_145_8) 路德維希堡的膠片拷貝普遍有與以色列拷貝相同的損壞，這表明路德維希堡的膠片和以色列的拷貝來自同一個復制系列。

[[146]](#_146_8) 根據薩森的一份注記，7號錄音帶并不存在，或者很可能是不小心被打字成了8號錄音帶——這從頁數即可看出。從6號到8號錄音帶的過渡沒有內容缺失。

[[147]](#_147_8) 這一小段應該屬于61號錄音帶。薩森顯然拿錯了錄音帶，但很快便注意到那個錯誤。

[[148]](#_148_8) 這些文字被歸檔到艾希曼文稿，而真正的作者卻被忽略了。或許連薩森自己都記不得了，因為他已經從文稿中移除了他其余的所有注記。

[[149]](#_149_8) Isser Harel, 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 (New York, 1997).

[[150]](#_150_8) 編號為B206/1986。

[[151]](#_151_9) 這個訴訟過程讓我得以在2011年1月查閱相關檔案的內容。我想借此機會感謝漢斯—威廉·紹雷、他的律師克里斯托夫·帕爾奇和羅莎·斯塔克（Rosa Stark），他們與我在柏林度過了一個既工作忙碌又令人愉快的周末，并且使我有機會查證自己書中的內容。所引用的檔案文字均獲得了克里斯托夫的友好許可。

[[152]](#_152_8) 請原諒一個積極投入的研究人員使用這種評語，但研究人員不喜歡聽到另有所圖的人向他們解釋，為什么與他們的研究主題有關——而別人迄今完全不感興趣——的檔案并不重要，理由是所發現的一切資料“與原告人（即尋找艾希曼相關資訊的加比·韋伯）的信息需求無甚關聯”（第9頁）。只有真正進行研究的人才能夠決定哪些資料對研究項目有助益，而非由其他人來決定，更何況決定者是往往并非專家的國家機構工作人員。

[[153]](#_153_8) Sperrerklärung des Bundeskanzleramtes vom 10.9.2009, 9.

[[154]](#_154_8) 其中大多數是以色列警方和檢方的文件。這些文件之所以迄今沒有對外公開，是因為檢方在審判中并未使用它們。關于涂黑的做法，以及被公開檔案的結構和范圍，參見Bettina Stangneth, Kurzgutachten zu den Akten BVerwG 7A15.10. aufgrund der Sichtung der Beiakten zum Verfahren BVerwG 7A15.10 mit den Signaturen 100 470, 100 471,121 082, 121 099 am 21. und 22. Januar 2011. Hamburg, 25. Januar 2011 (7 Seiten mit Dokumentenanhang).

[[155]](#_155_8) Sperrerklärung des Bundeskanzleramtes vom 10.9.2009, 3.

[[156]](#_156_8) ebd., 5.

[[157]](#_157_9) ebd.

[[158]](#_158_8) ebd., 9.

[[159]](#_159_8) ebd., 5.

[[160]](#_160_9) 我明確拒絕認同這樣的觀點，即聯邦德國的一個情報單位非但可以不緝捕艾希曼到案，反而致力于做出與此完全相反的事情。那種想法在心理上讓我覺得無法忍受。

[[161]](#_161_8) 由于加比·韋伯無可否認是一位能干的研究人員，禁制聲明“并非專門針對開放檔案而發”的論點無法成立。

[[162]](#_162_8) Sperrerklärung des Bundeskanzleramtes vom 10.9.2009, 9.

[[163]](#_163_8) ebd., 8.

[[164]](#_164_8) ebd.

[[165]](#_165_8) ebd., 11.

[[166]](#_166_8) ebd., 8.

[[167]](#_167_8) 在阿根廷追蹤過艾希曼，并且是綁架小組成員的茲維·阿哈羅尼，表示他曾試圖讓艾希曼開口談論門格勒，但徒勞無功。鑒于阿哈羅尼綽號“大審判官”，是摩薩德最令人畏懼的審訊專家之一，因此這種不尋常的沉默就顯得更加意味深長。過了幾年，阿哈羅尼甚至在長達十個多小時的談話后，成功說服威廉·薩森協助他尋找門格勒。Aharoni/Dietl, Der Jäger ..., A.o., und Aharoni im Interview, z.B. Dan Setton, Josef Mengele. The Final Account 2007; Dietl im Interview in Roelf vn Til, Dokumentation Willem Sassen, kro 2005.

[[168]](#_168_9) Erich Schmidt-Eenboom, BND: Der deutsche Geheimdienst im Nahen Osten: Geheime Hintergründe und Fakten. Munich, 2007, 94f.

[[169]](#_169_8) 德國聯邦議院會議速記記錄，2011年1月19日，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p/17/17083.pdf——感謝耶日·蒙塔格的辦公室。

[[170]](#_170_8) 德國聯邦行政法院補充文件BVerwG 7A 15.10 (Saure gegen BND), BND-Akten 121099,1665。

[[171]](#_171_8) 接受Edicion plus節目的采訪，Telefe Buenos Aires, 1991.

[[172]](#_172_8) Willem Sluyse (Willem Sassen), Die Jünger und die Dirnen, Buenos Aires: Dürer Verlag,51-53.此處引文經過稍微刪減。

[[173]](#_173_8) 根據薩斯基雅·薩森和弗朗西斯卡·薩森的說明，她們的父親并沒有留下任何未完成的手稿。

# 縮略語

AA　Auswärtiges Amt（外交部）

AfZ　ETH Archiv für Zeitgeschichte, Eidgenö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Zürich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當代史檔案館）

BArch　Bundesarchiv（聯邦檔案館）

BDC　Berlin Document Center, heute im Bestand des BArch

Berlin（柏林文獻中心，如今隸屬于柏林聯邦檔案館）

BdJ　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聯邦司法部）

BfV　Bundesamt für Verfassungsschutz（聯邦憲法保衛局）

BKA　Bundeskriminalamt（聯邦刑事調查局）

BND　Bundesnachrichtendienst, bis 1956 “Organisation Gehlen”（德國聯邦情報局，1956年之前稱為“蓋倫組織”）

BVerwG　Bundesverwaltungsgericht（聯邦行政法院）

CAPRI　Compañia Argentina para Proyectos y Realizaciones Industriales, Fuldner y Cía （阿根廷工業規劃及執行公司，福爾德納公司［“卡普里”公司］）

CI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美國中央情報局，中情局）

CIC　U.S. Army 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美國陸軍防諜隊）

CROWCASS　Central Registry of War Criminals and Security Suspects（戰犯及安全嫌犯中央登記處）

Dok.　Dokument（文獻）

DÖW　Dokumentationszentrum Österreichischer Widerstand（奧地利抵抗運動文獻中心）

ebd.　Ebenda（同上）

FZH　Forschung für Zeitgeschichte, Hamburg（漢堡當代史研究中心）

Gestapo　Geheime Staatspolizei（蓋世太保，秘密國家警察）

HHStA　Hessisches Hauptstaatsarchiv（黑森州總檔案館）

HIS　Hamburger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漢堡社會學研究所）

IMT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

KZ　Konzentrationslager（集中營）

LKA　Landeskriminalamt（州刑事調查局）

NA U.S.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

NSDAP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納粹黨）

O.D.E.S.S.A.　Organisation der ehemaligen SS Angehörigen（“敖德薩”，前黨衛隊成員組織）

ÖStA　Österreichisches Staatsarchiv（奧地利國家檔案處）

PA AA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德國外交部政治檔案）

RSHA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帝國保安總局）

RuSHA　Rasse- und Siedlungshauptamt（黨衛隊人種與移居部）

S. u.　Siehe unten（見下）

SD　Sicherheitsdienst（黨衛隊保安局）

SS　Schutzstaffel（黨衛隊）

SÚA　Státní ust ední archiv Praha（布拉格國立中央檔案館）

Verhör　Protokoll des Polizeiverhörs in Israel（以色列警方審訊記錄）

ZSt　Zentrale Stelle, Ludwigsburg（路德維希堡中央辦公室）

# 致謝

謹在此向相關檔案館的多位工作人員表達感謝，他們不辭辛苦地查取資料，以及通過無數的信函、電話交談和電子郵件，隨時都樂意提供真誠友好的協助。此外還要感謝他們出了許多主意，指點該如何另辟蹊徑，穿越檔案資料的深淵。如果沒有他們的話，我永遠也不可能想到那些辦法。尤其特別值得稱道的是，他們有勇氣打開一些完全沒有內容清單的檔案柜。你能想象我有多么感激他們的好奇心、熱情，以及私下做出的各種鼓勵和評論。

在此感謝下列人士提供的個人協助和資訊、個別的更正、有時內容非常廣泛的通信，以及針對私人檔案做出的指點：希爾德加德·貝歇爾-杜桑（Hildegard Becher-Toussaint，法蘭克福最高檢察官）、索尼亞·馮·貝倫斯（Sonja v. Behrens）、芭芭拉·比林格爾（Barbara Bieringer，維也納大學檔案館）、沃爾夫岡·比克霍爾茨（Wolfgang Birkholz，《科隆環視報》）、萊因哈德·勃蘭特（Reinhard Brandt，馬爾堡）、德特勒夫·布瑟（Detlef Busse，下薩克森檔案館）、米歇爾·戴維斯（Michel Davis，美國《大觀雜志》）、妮珂萊特·多布羅沃爾斯基（Nicolette A. Dobrowolski，紐約雪城大學）、赫爾穆特·艾希曼、法蘭克博士（Dr. Franke，帕滕森）、丹尼爾·弗里奇（Daniel Fritsch）、克里斯提安·甘策爾（Christian Ganzer，基輔）、烏列爾·加斯特（Uriel Gast，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克里斯提安·格拉赫（Christian Gerlach，華盛頓）、烏基·戈尼、彼得·格拉本（Peter beim Graben）、雅斯明·格拉芬霍斯特（Jasmin Gravenhorst）、格奧爾格-米夏埃爾·哈夫納（Georg-Michael Hafner）、馬丁·海丁格爾（奧地利廣播集團，維也納）、托馬斯·哈蘭、格爾德·海德曼、赫爾穆特·海能（Helmut Heinen，《科隆環視報》）、托比亞斯·赫爾曼（路德維希堡聯邦檔案館）、勞爾·希爾伯格（Raul Hilberg）、碧爾姬特·基諾（Birgit Kienow，馬爾巴赫德國文學檔案館）、諾貝特·基斯林（巴登-符騰堡州刑事調查局）、安迪·金（Andy King，《每日電訊報》）、伊麗莎白·克蘭波（Elisabeth Klamper，奧地利抵抗運動文獻中心）、洛特·柯勒（Lotte Köhler）、米夏埃爾·柯勒（Michael Köhler，漢堡）、彼得·克拉默爾（薩爾茨堡市檔案館）、安妮特·克里格（《科隆環視報》）、瑪努艾拉·朗格（Manuela Lange，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雷蒙德·萊伊、黛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瓦爾特·羅倫席茨（Walter Lorenschitz，奧地利國家檔案處）、馬塞爾·馬庫斯（Marcel Marcus，耶路撒冷路德維希·邁爾書店）、霍爾格·梅丁（科隆）、保羅·梅維森（Paul Mevissen）、貝亞特·邁爾（Beate Meyer，德國猶太歷史研究所）、路茨·默塞爾（Lutz Möser，柏林聯邦檔案館）、哈里·穆利什（Harry Mulisch）、安內格雷特·諾伊珀特（Annegret Neupert，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克里斯托夫·帕爾奇、丹尼爾·帕森特、安東·佩林卡（Anton Pelinka，因斯布魯克）、蒂莫拉·佩雷爾（Timorah Perel，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貝爾特蘭特·佩爾茨（Bertrand Perz，維也納）、曼弗雷德·普爾特（Manfred Pult，維斯巴登黑森州總檔案館）、多隆·拉比諾維奇（Doron Rabinovici）、奧利弗·拉特科爾布（Oliver Rathkolb，維也納大學）、維爾納·倫茨（Werner Renz，弗里茨·鮑爾研究所）、迪爾克·里德爾（Dirk Riedel，達豪紀念館）、弗朗西斯卡·薩森、薩斯基雅·薩森、漢斯-威廉·紹雷（《圖片報》）、艾斯德爾·波皮拉（Esther Schapira）、帕特里夏·施萊辛格（北德廣播電視臺）、斯特凡·施密茨（Stefan Schmitz，《明星周刊》）、維爾納·施羅德（Werner Schroeder）、卡洛·許特（漢堡當代史研究中心）、庫爾特-維爾納·澤伯（貝爾根市檔案處）、卡特琳·賽博爾德-哈蘭（Katrin Seybold-Harlan）、克里斯托夫·史塔姆（Christoph Stamm，社會民主黨檔案館）、亞歷山大·施蒂默爾（Alexander Stühmer）、魯爾夫·范·提爾、希達·托普坦奇（Sidar Toptanci，路德維希堡聯邦檔案館）、米夏埃拉·沃采爾卡（西蒙·維森塔爾檔案）、安格莉卡·福斯（Angelika Voß，漢堡當代史研究中心檔案室）、克勞斯·衛格里夫（Klaus Wiegrefe，《明鏡周刊》）、米夏埃爾·維爾特、弗蘭克·維滕多爾弗（西門子公司）、依爾姆特魯德·沃亞克、娜塔莎·德·溫特（布宜諾斯艾利斯），以及其他不愿透露姓名向我提供幫助的人。

不幸的是，一些問題至今仍未獲得答復。我仍然期盼能夠從下列方面得到答案：大衛·切薩拉尼、莉亞娜·迪爾克斯（關于《政治周刊》）、吉多·克諾普（關于資料來源）、約爾格·米爾納（Jörg Müllner，關于磁帶的聲音編輯），以及時代公司（Time Inc.）。

對進行研究的人來說，研究始終是自己人生的一部分。我這一路下來，在面臨垃圾毒害的時候，有幸遇到許多人向我發出提醒。只有通過此類際遇，我才有力量堅持下去，完成這樣的研究計劃。最重要的是，他們是唯一的原因，讓我甚至愿意把這條路再走一遍：埃克哈德·哈斯佩爾（Eckhard Haspel）、彼得·米勒（Peter Müller），以及威利·溫克勒。

# 出處說明

#### 檔案館

AdsD

Archiv der Sozialen Demokratie, Bonn

Nachlass Fritz Bauer

社會民主黨檔案館，波恩

弗里茨·鮑爾遺物

BArch Koblenz (Bundesarchiv Koblenz)

All. Proz. 6　Unterlagen Servatius,

Eichmann-Prozess

N/1497　 Nachlass Eichmann

R/58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

同盟國審判6　塞爾瓦蒂烏斯文件

艾希曼審判案

N/1497　艾希曼遺物

R/58　帝國保安總局

BArch Ludwigsburg

Prozessakten Adolf Eichmann

Bestand Zentrale Stelle - Generalakte III,

路德維希堡聯邦檔案館

艾希曼審判檔案

國家社會主義犯罪調查中央辦公室

BArch Berlin-Lichterfelde

BDC-Bestände (ehem. US-Berlin Document Center)

柏林-利希特費爾德聯邦檔案館

柏林文獻中心檔案（前美國柏林文獻中心）

BStU Berlin Hoppegarten

Die Bundesbeauftragte für die Unterlagen

des Staatssicherheitsdienstes der ehemaligen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柏林-霍佩加爾滕

聯邦前東德國家安全部檔案托管局

Deutsches Literatur Archiv, Marbach

Nachlass Hans Grimm (Korrespondenz Eberhard Fritsch)

Nachlass Ernst Kernmayr (Korrespondenz Eberhard Fritsch)

馬爾巴赫德國文學檔案館

漢斯·格林遺物（與弗里奇的信件往來）

恩斯特·克恩邁爾遺物（與弗里奇的信件往來）

Deutsches Rundfunkarchiv, Frankfurt a. M.

Eine Epoche vor Gericht

法蘭克福德國廣播檔案館

《法庭面前的一個時代》

FZH

Archiv der Forschungsstelle für Zeitgeschichte, Hamburg

漢堡當代史研究中心檔案

Hessisches Hauptstaatsarchiv, Wiesbaden Abt. 461

維斯巴登黑森州總檔案館，Abt. 461

HIS - Hamburger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Sammlung Schwend

漢堡社會學研究所

施文德檔案集

Institut für Stadtgeschichte, Frankfurt

Nachlass Arnold Buchthal

法蘭克福城市歷史研究所

阿諾德·布赫塔爾遺物

Niedersächsisches Landesarchiv, Hannover,

Magazin Pattensen

Nachlass Adolf von Thadden

漢諾威下薩克森州檔案館

帕滕森收藏庫，阿道夫·馮·塔登遺物

Rheinische Landesbibliothek Koblenz

Nachlass Beumelburg Estate (Eberhard Fritsch)

科布倫茨萊茵蘭圖書館

博伊梅爾堡遺物（埃伯哈德·弗里奇）

Stadtarchiv Bergen

Meldebuch Eversen, Fach 585 Nr. 2

貝爾根市檔案處

埃弗森的戶口登記簿（Fach 585 Nr. 2）

Archiv für Zeitgeschichte,

Eidgenö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Zürich

Nachlass Avner W. Less

JUNA-Archiv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當代史檔案館

阿夫納·萊斯遺物（猶太新聞檔案）

Archiv der Universität, Wien

Doktorandenlisten

維也納大學檔案館

博士學位名錄

ÖStA

Österreichisches Staatsarchiv, Wien

E/1797 Nachlass Hermann Langbein

維也納奧地利國家檔案處

E/1797赫爾曼·朗拜因遺物

Simon Wiesenthal Archiv, Wien

Korrespondenz

維也納西蒙·維森塔爾檔案館，信函往來

Stadtarchiv Salzburg

Meldekartei

薩爾茨堡市檔案館，戶口登記卡

CDJC

Centre de Documentation Juive

Contemporaine, Paris

巴黎當代猶太文獻中心

CZA

Central Zionist Archive, Jerusalem

耶路撒冷猶太復國主義中央檔案館

CAHJP

Central Archiv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Jerusalem

A/W Bestand des IKG-Archivs, Wien

耶路撒冷猶太民族歷史中央檔案館

維也納猶太宗教社群檔案（A/ W卷宗）

Deutsches Rotes Kreuz Archiv, Berlin

柏林德國紅十字會檔案館

ISA Israelisches Staatsarchiv Götzen

以色列國家檔案館，《偶像》

Yad Vashem Archive

0-1 Sammlung K. J. Ball-Kaduri

0-3 Sammlung mündlicher Zeugenaussagen

0-51 Sammlung NS-Dokumente (DN)

Tr. 3 Dokumente des Eichmann-Prozesses

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檔案

0-1　庫爾特·雅各·巴爾-卡都里檔案集

0-3　口頭證詞檔案集

0-51　納粹文件檔案集

Tr. 3　艾希曼審判文獻（編號方式為B06/xxx）

Holocaust Memorial, Washington, D.C.

Uki Goñi Collection

華盛頓大屠殺紀念館

烏基·戈尼檔案集

U.S. National Archives

RG 263, CIA Name Files

RG 319, Dossier XE 004471, Adolf Eichmann

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

RG 263，中情局人名檔案

RG 319, Dossier XE 004471，阿道夫·艾希曼

Syracuse University, New York,

Special Collections

Francis Biddle Papers

紐約雪城大學

特別收藏

弗朗西斯·比德爾文件

RGVA

Russisches Staatsmilitärarchiv

莫斯科俄羅斯國家軍事檔案館

SOA Lmt

Státní oblastní archiv Litomerice

MLS, Lsp 441/47

Karl Rahm

捷克利托梅日采國立地區檔案館

MLS, Lsp 441/47，卡爾·拉姆

SÚA

Státní ustŕední archiv Praha

布拉格國立中央檔案館

AGK Warszawa

Archiwum Głównej Komisji Badania, Zbrodni Hitlerowskich w Polsce

華沙波蘭納粹罪行研究總會

#### 采訪：

特別感謝烏基·戈尼、馬丁·海丁格爾、雷蒙德·萊伊、魯爾夫·范·提爾和娜塔莎·德·溫特（阿爾騰薩爾茨科特、布宜諾斯艾利斯、蘇亞雷斯上校鎮2009和2010年）、拉斐爾·埃坦、威廉·霍特爾、何塞·莫斯科維茨、佩德羅·波比耶辛、英格·施奈德，以及薩斯基雅·薩森。

1978年紀錄片《人的表現形式：阿道夫·艾希曼》(Erscheinungsform Mensch:Adolf Eichmann)：西蒙·維森塔爾、伊塞爾·哈雷爾、阿夫納·萊斯、茲維·沃爾施泰因、以色列·古特曼（Israel Gutman）、大衛·弗朗哥（David Franko）、吉德翁·豪斯納、加布里埃爾·巴赫、本亞明·哈列維、什洛莫·庫爾恰爾、威廉·薩森。

#### 阿道夫·艾希曼的文字

1945年之前：

1937：《世界猶太集團：政治活動及其活動對定居德國猶太人所產生的影響》（“Das Weltjudentum: Politische Aktivität und Auswirkung seiner Tätigkeit auf die in Deutschland ansässigen Juden”）。

在1937年11月1日柏林黨衛隊保安局總部舉行的猶太事務主管會議上的演說。莫斯科俄羅斯國家軍事檔案館500/3/22，收錄于Michael Wildt [Hrsg.]: Die Judenpolitik des SD 1935 bis 1938: Ein Dokumenation . München, 1995, Dok. 19, 133-138。

#### 阿根廷文稿：

書中注記：

一些原件見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BArch Koblenz, Nachlass Eichmann, N1497）；其他則引用于1960年6月26日至7月16日的《明星周刊》。艾希曼對此的評論，參見以色列警方審訊記錄，第1026-1035頁。

讀書札記：

原件及薩森抄本保管在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艾希曼遺物，N1497 ；其余在路德維希堡聯邦檔案館（B162），“雜項”資料夾。

大型手稿《其他人都講過了，現在我想說話！》（Die anderen sprachen, jetzt will ich sprechen）

原始手寫稿、謄寫本、膠片和拷貝散見于：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艾希曼遺物（N1497）、塞爾瓦蒂烏斯遺物（AllProz 6），以及路德維希堡聯邦檔案館（B162），“雜項”資料夾。

手稿的一部分，《關于：我所確認的“猶太人問題”以及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國家政府于1933-1945年間為解決此復雜問題所采取的措施》，原本計劃是一封寫給康拉德·阿登納的公開信。

品質很差的69頁手寫稿拷貝《關于：我所確認的“猶太人問題”以及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國家政府于1933-1945年間為解決此復雜問題所采取的措施》（起訴文件T/1393），內容與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的塞爾瓦蒂烏斯遺物（AllProz 6/95-111）相同。這份所謂的第17號文檔的日期被誤寫成1959年2月19日。這份文字有時被認為是在獄中寫出的評論，但它明顯與薩森的采訪有關，撰寫于艾希曼被抓獲之前。

一般論述、注記和講稿（1956-1957年）

現存大約200頁，包括原始手寫稿、拷貝、薩森抄本和膠片，散布于多家不同的檔案館：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艾希曼遺物和塞爾瓦蒂烏斯遺物，以及路德維希堡聯邦檔案館“雜項”資料夾與膠片。

《圖庫曼小說》

至今仍未對外公開，可能是艾希曼在1958-1959年寫給自己孩子們看的。這份仍歸艾希曼家人所有的手寫稿據悉有260頁。我們不能排除它與《其他人都講過了，現在我想說話！》和其余“阿根廷文稿”部分重疊的可能性。

薩森訪談錄音帶

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艾希曼遺物的錄音材料（N 1497）：

10卷錄音帶（29.5小時）、卡式錄音帶（32小時）、數字式錄音帶（32小時，Ton1367, 6-1至6-10）。從磁帶上殘留的較新錄音可以發現，那些錄音帶并非全部都是阿根廷的原件，但重新錄制后的內容與原件大致相同。錄音材料上也包含了一些錄音抄本沒有的內容。

薩森抄本

根據出現的先后順序分別為：

《生活》雜志：至今未對外公開的600頁抄本和一些手寫稿的拷貝。

《明星周刊》：在雜志社的檔案庫已遍尋不著的抄本拷貝和80頁手寫稿。

以色列（哈加格）／塞爾瓦蒂烏斯：以色列國家檔案館74/3156（在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則為：塞爾瓦蒂烏斯遺物，Allproz. 6/95-111，自1979年開始可供使用）。包含62卷錄音帶的抄本（第1-5號，第11-67號，有編號錯誤），第9-26，31-39，48-67卷的抄本上面有艾希曼的手寫修正。以色列將之劃分為16+1個卷宗，抄本有713頁，加上“第17號卷宗”后總共為795頁（重復計算了3頁以后的官方數字則是798頁）。第68-73頁沒有抄本。

林茨：1961年3月竊取自羅伯特·艾希曼博士的辦公室，由赫爾曼·朗拜因拍攝成膠卷。內容總共有900頁（第1-5號，第11-67號錄音帶的抄本也出現編號錯誤，但與以色列不同），此外有大量的艾希曼修正文字和謄抄本，以及更多的“阿根廷文稿”。朗拜因將副本分發給了亨利·奧蒙德、托馬斯·哈蘭（用于波蘭的《政治周刊》），以及至今仍無法確定的其他機構。哈蘭后來將奧蒙德的那一份副本交給了依爾姆特魯德·沃亞克（他自己的那一份副本已丟失）。路德維希堡聯邦檔案館現有的兩份拷貝之一，顯然也脫胎自昔日林茨的版本。

薩森：原始抄本、原始的修改文字，以及薩森拍攝的底片，已在1979年交給了艾希曼的家人。今日由一家瑞士出版社存放于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艾希曼遺物，N 1497。這個內容最豐富的版本共有835頁，再加上78頁艾希曼針對抄本發表的意見。其中也包括第6-10號錄音帶的抄本（沒有第7號錄音帶，它應該從未存在過），以及第68-73號錄音帶（但沒有第29號錄音帶和抄本的41, 3頁。）。

阿根廷文稿早年的編輯與傳播：

根據薩森訪談錄：

魯道夫·阿舍瑙爾（編著），《我，阿道夫·艾希曼：一份歷史見證者的報告》（Rudolf Aschenauer, [Hrsg.], Ich, Adolf Eichmann. Ein historischer Zeugenbericht , Leoni am Starnberger See 1980.）該書明顯具有歷史修正主義色彩，如今已可重建其引用材料的細節。手稿拷貝參見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艾希曼遺物（BArch Koblenz，Nachlass Eichmann, N1497, 77-8）。

直接引述自薩森訪談錄：

《生活》雜志：《艾希曼講述其該死的故事》（“Eichmann Tells His Own Damning Story,” in Life , Chicago, November 28 and December 5, 1960）。第一部分《我把他們運給屠夫》（“I Transported Them to the Butcher,” in Life International 30, no. 1 [January 9, 1961], pp. 9-19），第二部分《總而言之，我不后悔任何事情》（“To Sum It All Up, I Regret Nothing,” in Life International 30, no. 3 [February 13, 1961],pp. 76-82）。（起訴文件T/47）

授權重印：

Revue雜志：《阿道夫·艾希曼的自白》（“Das Geständnis des Adolf Eichmann,” Revue , no. 8, 9, 10, München 1961）。

《巴黎競賽畫報》（Paris Match）：1960年5月6日、13日、20日。

《政治周刊》：1961年5月20日至6月17日，刊出林茨拷貝版的部分內容并附有評論。

吉德翁·豪斯納：在其審判報道《正義在耶路撒冷》（Gerechtigkeit in Jerusalem / Justice in Jerusalem）使用了以色列的拷貝版。在1979年之前，他是唯一能夠引述薩森抄本的作者。

艾希曼針對《生活》雜志薩森訪談錄歷次做出的評論：起訴文件T/1432。

1960年5月：關于押赴以色列的聲明（T/3）。

#### 以色列供詞：

《我的回憶錄》：“今天，1945年5月8日過后的十五年又一天……”。所列出日期是“1960年5月9日至6月16日”，但實際開始的時間為5月23日之后。128頁手寫稿，1960年6月16日列為法庭文件B06-1492（T/44）。

1999年8月12日至9月4日亦刊載于《世界報》，但缺乏學術嚴謹性，而且抄錄得錯誤百出。這份文稿亦被引用為“艾希曼的127頁”（127—Eichmann-Seiten）

《我的逃亡：來自耶路撒冷囚室的報告》（Meine Flucht: Bericht aus der Zelle in Jerusalem，舊名《我的逃亡報告》[Mein Fluchtbericht]）：最初標題是《在1945年5月的一個夜晚》（“In einer Mainacht 1945”），列出日期為1961年3月。這份文件沒有被用作法庭上的證據（BArch Allproz 6/247; 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 Vol. 1, Doc. 72。較好的拷貝是Vol. 3,76）。《我的逃亡報告》手寫稿現存于以色列國家檔案館，1961年4月30日至5月28日曾刊載于英國《人物》（People）雜志。

審訊：1960年5月29日至1961年1月15日（Tape 1-76）和1961年2月2日（Tape 77），38個審訊日的76卷錄音帶，共270個小時、3564個經過艾希曼修改的打字頁面。

最初：Police D’Israel, Quartier General 6—ème Bureau (Commander A. Selinger), Adolf Eichmann, vols. 1-6, Mahana Iyar, February 3, 1961, facsimile。

其次：State of Israel, Ministry of Justice, The Trial of Adolf Eichmann. Statement made by Adolf Eichmann to the Israel Police prior to his trial in Jerusalem. Vols. 7-8, Jerusalem, 1995, facsimile.

獄中札記，1960年5月30日至12月19日（T/44；拷貝大部分保管于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BArch Koblenz AllProz6）：對《生活》雜志文章的14頁打字評論，撰寫于以色列（T/48-51）；對薩森抄本的手寫評論（起訴文件T/1393）；審判開始前即已在獄中撰寫的各種札記和手稿，包括給家人的信件。

精神病學和心理學評估鑒定，1961年1月20日至3月1日由庫爾恰爾（以色列）負責進行：

共7次評鑒，每次大約3小時。采用了當時通行的評鑒項目（智力測驗、羅爾沙赫測驗、TAT測試、客體關系評估、韋克斯勒測驗、本德爾測驗、繪圖測驗、宋迪測驗）。

評鑒報告的原件從未對外公開。總結報告參見：“Adolf Eichmann and the Third Reich,” in Crime, Law and Corrections, ed. Ralph Slovenko. Springfield, IL 1966, 16-52.繪圖測驗的結果曾刊載于《明鏡周刊》（Spiegel, Nr. 2/1978）。

#### 審判文件：

以色列司法部，《對阿道夫·艾希曼的審判》（The Trial of Adolf Eichmann），檢方和辯方提交證物的縮微膠片拷貝，第9卷（耶路撒冷1995年）。引用格式為T/xx。

完整副本保存于路德維希堡中央辦公室（BArch Ludwigsburg, B 162）。大部分內容亦保存于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BArch Koblenz, AllProz 6，塞爾瓦蒂烏斯遺物），以及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當代史檔案館，阿夫納·萊斯遺物（(AfZ ETH，Nachlass Less)。

審判（1961年4月2日至8月14日）法庭發言記錄：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刑事案件40/61（英文翻譯版為：The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State of Israel vs. Adolf, son of Karl Adolf Eichmann. Jerusalem District Court, Criminal Case 40/61. April 2—August 14, 1961. Statements before the court. Transcript of sessions 1-121. Unrevised and uncorrected transcription。）完整抄本：阿夫納·萊斯遺物和塞爾瓦蒂烏斯遺物。審判影片記錄：Steven Spielberg Jewish Film Archive/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偶像》（Götzen）：共1206頁，其中676頁打算對外發表，列出的日期為1961年9月。2000年2月27日曾在倫敦被用作“歐文-利普施塔特審判案”（Irving-Lipstadt trial）的證據。保管于以色列國家檔案館。按照塞爾瓦蒂烏斯的講法，艾希曼撰寫時暫定的標題為“給子孫后代的回憶”（Erinnerungen für kommende Generationen）或“凡爾賽”（Versailles）。

從審判開始到被處決之間的獄中文稿：

各種筆記、書信、文件、草圖、組織結構圖，以及大型手稿。其中包括《拘捕報告》（Verhaftungsbericht）；《綁架發生前的歷史》（Vorgeschichte der Enführung）；《即使在這里面對著絞刑架……》（Auch hier im Angesicht des Galgens）；艾希曼對判決和上訴的聲明；其總結陳述的不同草稿版本；與家人、親屬、律師的通信；外部查詢、《巴黎競賽畫報》的問卷等等。今天它們主要保管于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BArch Allproz 6）、以色列國家檔案館（Eichmann Trial Collection），某些也歸艾希曼家人所有（但不公開）。

神學信函

與赫爾牧師的“皈依對話”（Bekehrungsgespräche mit Rev. Hull）：威廉·赫爾，《為一個靈魂而戰：與艾希曼在死囚牢房的對話》（William L. Hull, Kampf um eine Seele, Gespräche mit Eichmann in der Todeszelle . Wuppertal 1964）。書中引述艾希曼的三封信件，并且（不盡正確地）記錄了1962年4月11日至5月31日之間13次造訪的回憶。

# 參考文獻

隨著越來越多原始資料和研究成果的出現，本書中的內容往往與之前的一些著作有所差異——即便并未特別逐一指出它們當中的錯誤。那些破壞性的文字讀起來令人不快，而對每一個像我一樣積極研究艾希曼的人來說，以下列出的書籍是不可或缺的。在此當然不可能完整列出所參考的艾希曼相關文獻，因為那涵蓋了800多部著作。不過在注釋中可以找到更進一步的說明。

蘭道夫·布拉漢姆的艾希曼參考書目直到今天仍然是最基本的資料：Randolph L.Braham, The Eichmann Case: A Source Book (New York, 1969)。

Adler, H. G.: Adolf Eichmann oder die Flucht aus der Verantwortung. In: Tribüne 1,1962, 122-134.

Adolf Eichmann, Novelist. In: Time and Tide. London 42, no. 25 (1961), p. 1009.

Aharoni, Zvi/Dietl, Wilhelm: Der Jäger. Operation Eichmann. Was wirklich geschah.Stuttgart 1996.

[Aharoni, Zvi, and Wilhelm Dietl. Operation Eichmann: The Truth About the Pursuit, Capture, and Trial. Translated by Helmut Bögler. New York, 1997.]

Aly, Götz: Die späte Rache des Adolf Eich-Aumann. In: Ö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en 11, 2000, Heft 1, 186-191.

Aly, Götz: “Endlösung”: Völkerverschiebung und der Mord an den europäischen Juden. Frankfurt a. M. 1995.

Aly, Götz/Gerlach, Christian: Das letzte Kapitel: Realpolitik, Ideologie und der Mord an den ungarischen Juden 1944/1945. Stuttgart, München 2002.

Anderl, Gabriele. Emigration und Vertreibung. In: Erika Weinzierl/Otto D. Kulka (Hrsg.): Vertreibung und Neubeginn: Israelische Bürger österreichischer Herkunft. Wien 1992, 167-337.

Anaderl, Gabriele/Rupnow, Dirk: Die 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 als Beraubungsinstitution. Wien 2002.

Anderson, Jack: “Nazi War Criminals in South America.” Parade, November 13,1960, pp. 6-9.

Arendt, Hannah: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1963;reprint New York, 1994.

[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Ein Bericht über die Banalität des Bösen. München 1964.]

Arendt, Hannah: “Thinking and Moral Considerations: A Lecture.” Social Research 38, no. 3 (Autumn 1971), pp. 417-46.

“Arendt in Jerusalem.” History and Memory 8, no. 2 (Fall-Winter 1996), special issue.

Aronson, Shlomo: Reinhard Heydrich und die Frühgeschichte von Gestapo und SD.Stuttgart 1971.

Arnsberg, Paul. “Eichmann - The Germans Don’t Care.” Jewish Observer and Middle East Review 10, no. 15 (April 14, 1961).

Ausschuß für deutsche Einheit (Hrsg.): Eichmann: Henker, Handlanger,Hintermänner: Eine Dokumentation. Berlin (Ost) 1961.

Avni, Haim: “Jewish Leadership in Times of Crisis: Argentina during the Eichmann Affair (1960-1962).”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Jewry 11 (1995), pp. 117-35.

Bach, Gabriel: Gespräch mit Herrn Gabriel Bach, stellvertretender Ankläger im Prozess gegen Adolf Eichmann, anlässlich des 65. Jahrestages der WannseeKonferenz vom 20. Januar 1942 am 18. Januar 2007 im Haus der WannseeKonferenz.” In: Haus der Wannsee-Konferenz (Hrsg.), Newsletter 8, Dezember 2007, 2-21.

Bach, Gabriel: “Adolf Eichmann and the Eichmann Trial.” In Holocaust: Israel Pocket Library. Jerusalem, 1974.

Bar-Nathan, Moshe: “Background to the Eichmann Trial.” Jewish Frontier 28, no. 5(May 1961), pp. 4-7.

Bar-On, A. Zvie: “Measuring Responsibility.”Philosophical Forum 16, nos. 1-2(1984-85), pp. 95-109.

Bar-On, Dan. Steckt in jedem von uns ein Adolf Eichmann? In: Die Welt, August 19,1999.

Bar-Zohar, Michel: Les vengeurs. Paris, 1968. [English: The Avengers. New York,1968.]

Bascomb, Neal: Hunting Eichmann: How a Band of Survivors and a Young Spy Agency Chased Down the World’s Most Notorious Nazi. Boston and New York,2009.

Bauer, Yehuda: Freikauf von Juden? Verhandlungen zwischen de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und jüdischen Repräsentanten 1933-1945. Frankfurt a. M. 1996.

Bauer, Yehuda: “Das Böse ist niemals banal”, Interview in: Der Spiegel, 16.8.1999.

Bauer, Yehuda: “Wir müssen jetzt die richtigen wissenschaftlichen Fragen stellen.”Interview in: Die Welt, 12.8.1999.

Baumann, Jürgen: Die Psychologie des bürokratisch organisierten Mordes.” In:Frankfurter Hefte, Zeitschrift für Kultur und Politik 21 (1966), 199-205.

Beatty, Joseph: “Thinking and Moral Considerations: Socrates and Arendt’s Eichmann.”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10 (1976).

Beier, Lars-Olav: Anatomie eines Mörders.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7.2.1999.

Ben Natan, Asher. The Audacity to Live: An Autobiography. Tel Aviv, 2007.

Bergman, Monika: Transporttechnische Angelegenheiten.” In: Die Zeit, 11.2.1999.

Bernstein, Richard J.: “The Banality of Evil Reconsidered.” In Hannah Arendt and the Meaning of Politics.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and John McGowan.Minneapolis, 1997, pp. 297-322.

Bernstein, Richard J.: “Responsibility, Judging, and Evil.”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53, no. 2 (June 1999), pp. 155-172.

Bethke: Der Antisemitismus im Glaskasten. Zum Eichmann-Prozeß. In: Glaube und Gewissen. Halle a. d. Saale 7, 1961, 139.

Bettelheim, Bruno: Eichmann - Das System - Die Opfer. In: Ds., Erziehung zumÜberleben: Zur Psychologie der Extremsituationen. München 1982, 266-284.

Biss, Andreas: Der Stopp der Endlösung: Kampf gegen Himmler und Eichmann in Budapest. Stuttgart 1966.

Biuletyn glownej komsji badania zbrodni Hitleowskich w Polsce (Bulletin of the Commission for Investigation of Hitlerite Crimes in Poland). Warsaw, 1960.Eichmann documents: vols. 12 and 13.

Böll, Heinrich: Befehl und Verantwortung. Gedanken zum Eichmann-Prozeß.” In:Ds., Aufsätze, Kritiken, Reden. Köln, Berlin 1967, 113-116.

Botz, Gerhar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Wien: Machtübernahme und Herrschaftssicherung, 1938-1939. Buchloe 1988.

Braham, Randolph: Eichman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Hungarian Jewry: A Documentary Account. New York, 1963.

Braham, Randolph: The Politics of Genocide: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New York,1994.

Brandt, Willy: Deutschland, Israel und die Juden: Rede des Regierenden Bürgermeisters von Berlin vor dem Herzl-Institut in New York am 19. März 1961. Berlin 1961.

Brand, Joel: Adolf Eichmann: Fakten gegen Fabeln. München, Frankfurt 1961. (Vom Gestern zum Morgen, 10)

Brand, Joel/Weissberg, Alex: Die Geschichte von Joel Brand. Köln 1956.

[Brand, Joel, and Alex Weissberg. Advocate for the Dead: The Story of Joel Brand. London, 1958.]

Brayard, Florent. “‘Grasping the Spokes of the Wind of History’: Gerstein,Eichmann and the Genocide of the Jews.” History and Memory 20 (2008), pp.48-88.

Brechtken, Magnus: “Madagaskar für die Juden”: Antisemitische Idee und politische Praxis 1885-1945. München, 1998. (Studien zur Zeitgeschichte, Hrsg. v.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Bd. 53)

Brechtken, Magnus: Apologie und Erinnerungskonstruktion - Zum zweifelhaften Quellenwert von Nachkriegsaussagen zur Geschichte des Dritten Reiches. Das Beispiel Madagaskar-Plan. In: Jahrbuch für Antisemitismusforschung 9 (2000),234-252.

Breitman, Richard David/ Aronson, Shlomo: “The End of the ‘Final Solution’?Nazi Plans to Ransom Jews in 1944.”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25, no. 2 (1992),pp. 177-203.

Breitman, Richard, ed.: U.S. Intelligence and the Nazis. Washington, D.C., 2004.

Breton, Albert/ Wintrope, Ronald: “The Bureaucracy of Murder Revisite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no. 5 (October 1986), pp. 905-926.

Brochhagen, Ulrich: Nach Nürnberg: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und Westintegration in der Ära Adenauer. Hamburg 1994 (Diss. München, Univ. d. Bundeswehr 1993).

Brockdorff, Werner (alias Alfred Jarschel, former Nazi youth leader) : XVII. Karl[!] Adolf Eichmann. In: Flucht vor Nürnberg: Pläne und Organisation der Fluchtwege der NS-Prominenz im “Römischen Weg”. München-Wels 1969(summary of Eichmann’s delusional alternative biography).

Browder, George C.: Hitler’s Enforcers: Gestapo and the SS Security Service in the Nazi Revolution. New York, 1996.

Browning, Christopher: Judenmord: NS-Politik, Zwangsarbeit und das Verhalten der Täter. Frankfurt a. M. 2001.

Browning, Christopher: Der Weg zur “Endlösung”. Entscheidungen und Täter.Bonn 1998.

[Browning, Christopher: The Path to Genocide: Essays on Launching the Final Solution. Cambridge, 1992.]

Brunner, José: “Eichmann, Arendt and Freud in Jerusalem: On the Evils of Narcissism and the Pleasures of Thoughtlessness.” History and Memory 8 (1996),pp. 61-88.

Brunner, José: “Eichmann’s Mind: Psychological, Philosophical and Legal Perspectives.” Theoretical Inquiries in Law 1 (2000), pp. 429-463.

Buechler, Yeshoshua Robert: “Document: A Preparatory Document for the Wannsee‘Conference.’”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9, no. 1 (Spring 1995), pp. 121-129.

Camarasa, Jorge: Odessa al Sur: La Argentina Como Refugio de Nazis y Criminales de Guerra. Buenos Aires, 1995.

Cantorovich, Nati: “Soviet Reactions to the Eichmann Trial: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1960-1965.” Yad Vashem Studies 35 (2007), pp. 103-141.

Carmichael, Joel: “Reactions in Germany.” Midstream 7, no. 3 (Summer 1961), pp.13-27.

Cesarani, David, ed.: After Eichmann: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Holocaust Since 1961. London, New York, 2005.

Cesarani, David: Eichmann: Adolf Eichmann. Bürokrat und Massenmörder.Biografie. Aus dem Englischen von Klaus Dieter Schmidt. Berlin 2004.

Cesarani, David: Eichmann: His Life and Crimes. London, 2005.

Cesarani, David, ed.: Genocide and Rescue: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1944. Oxford,1997.

Clarke, Comer: Eichmann - The Man and his Crimes. New York, 1960.

Cohen, Ahiba/Zemach-Maron,Tamor/Wolke,Jürgen/Schenk, Birgit: The Holocaust and the Press: Nazi War Crimes Trials in Germany and Israel. New Jersey, 2002. Cohen, Richard J.: “Breaking the Code: Hannah Arendt’s Eichmann in Jerusalem and the Public Polemic: Myth, Memory and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Michael:The Diaspora Research Institute, edited by Dina Porat and Shlomo Simonsohn(Tel Aviv, 1993) pp. 13:29-85.

Conze, Eckart/Frei, Norbert/Hayes, Peter/Zimmermann, Moshe: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München 2010.

Crossman, Richard H. S.: “The Faceless Bureaucrat.” New Statesman, March 31,1961.

Diamant, Manus: Geheimauftrag: Mission Eichmann. Aufgezeichnet von Mosche Meisels und mit einem Vorwort von Simon Wiesenthal. Wien 1995.

Die Kontroverse. Hannah Arendt, Eichmann und die Juden. Red. F. A. Krummacher.München 1964.

Donovan, John: Eichmann: Man of Slaughter. New York, 1960.

“Eichmann and the German Government.”Jewish Chronicle (London), March 17,1961, p. 31.

“Eichmann’s Ghost Writer: A Dutch Friend in Argentina.” Wiener Library Bulletin 15, no. 1 (1961), p. 2.

Einstein, Siegfried: Eichmann: Chefbuchhalter des Todes. Frankfurt a. M. 1961.

Enzensberger, Hans Magnus: Reflexionen vor einem Glaskasten. In: DS., Politik und Verbrechen: Neun Beiträge. Frankfurt a. M. 1964, 7-39.

Felstiner, Mary: “Alois Brunner: ‘Eichmann’s Best Tool.’” Simon Wiesenthal Center Annual 3 (1986), pp. 1-46.

Friedman, Tuviah: Die Ergreifung Eichmanns: Dokumentarische Sammlung. Haifa,1971.

Friedman, Tuviah: The Hunter. New York, 1961.

Friedman, Tuviah, ed.: We Shall Never Forget: An Album of Photographs, Articles and Documents. Haifa Documentation Centre, undated (1965).

Garner, Reuben: “Adolph Eichmann: The Making of a Totalitarian Bureaucrat.” In The Realm of Humanitas: Responses to the Writing of Hannah Arendt. New York, 1990.

Gellhorn, Martha: “Eichmann and the Private Conscience.” Atlantic Monthly 209,no. 2 (February 1962), pp. 52-59.

Gerlach, Christian: “The Eichmann Interrogations in Holocaust Historiography.”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3 (2001), pp. 428-452.

Giefer, Rena, und Thomas: Die Rattenlinie: Fluchtwege der Nazis: Eine Dokumentation. Frankfurt a. M. 1991.

Gilbert, G. M.: “The Mentality of SS-Murderous Robots.” Yad Vashem Studies 5(1963), pp. 35-41.

Glock, Charles Y./Selznick, Gertrude J./Spaeth, Joe L.: The Apathetic Majority: A Study Based on Public Responses to the Eichmann Trial. New York, 1966.

Goldfarb, Jack: “The Eichmann Mailbag.” Congress Bi-Weekly 29, no. 3 (February 5,1962), pp. 8-9.

Goñi, Uki: Odessa. Die wahre Geschichte: Fluchthilfe für NS-Kriegsverbrecher.Berlin, Hamburg 2006.

[Goñi, Uki: The Real Odessa: How Perón Brought the Nazi War Criminals to Argentina. Rev. ed. London, 2003.]

Goshen, Seev: Eichmann und die Nizko Aktion im Oktober 1939. Eine Fallstudie zur NS-Judenpolitik in der letzten Etappe vor der “Endlösung.” I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29 (1981), pp. 74-96.

Goshen, Seev: Nisko - Ein Ausnahmefall unter den Judenlagern der SS. In: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0 (1992), 95-106.

Gottlieb, Roger S., ed.: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Meanings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1990.

Gourevitch, Lev/Richey, Stéphane: Agents Secrets Contre Eichmann. Paris, 1961.

Gross, Raphael: Anständig geblieb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oral. Frankfurt a. M.2010.

Große, Christina: Der Eichmann-Prozeß zwischen Recht und Politik. Frankfurt a. M., Berlin, et alt. 1995.

Haas, Peter Jerome: “What We Know Today That We Didn’t Know Fifty Years Ago:Fifty Years of Holocaust Scholarship.” CCAR Journal 42, no. 2 (Summer-Fall 1995), pp. 1-15.

Halberstam, Joshua: “From Kant to Auschwitz.”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14, no. 1(1988), pp. 41-54.

Harer, Isser: Das Haus in der Garibaldistraße, Tel Aviv 1990 (hebräische Ausgabe).Engl.: 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 The Capture of Adolf Eichmann, London,1975. Dtsch.: Frankfurt a. M. 1976. (Die deutsche Ausgabe weicht z. T. deutlich von der englischen und hebräischen ab. Ab der Neuauflage 1997 sind die Decknamen größtenteils aufgelöst.)

Hausner, Gideon: Gerechtigkeit in Jerusalem. München 1966.

[Hausner, Gideon: Justice in Jerusalem. New York, 1966.]

Heiman, Leo: “Eichmann and the Arabs: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Nazis and the Grand Mufti.” Jewish Digest 6, no. 9 (June 1961), pp. 1-6.

Herbert, Ulrich (Hrsg.):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ernichtungspolitik 1939-1945: Neue Forschungen und Kontroversen, Frankfurt a. M. 2002, 2 Bände.

Herbert, Ulrich: Weltanschauungseliten. Ideologische Legitimation und politische Praxis der Führungsgrupp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icherheitspolizei. In:Potsdamer Bulletin für zeithistorische Studien 9, 1997, 4-18.

Hesselbach: Er schrieb Adolf Eichmanns Memoiren. Die abenteuerliche Geschichte des Willem Sassen. In: Kölnische Rundschau, 16.12.1960.

Hilberg, Raul: Die Vernichtung der europäischen Juden: Die Gesamtgeschichte des Holocaust. Frankfurt a. M. 1990, 3 Bände.

Hilberg, Raul: Eichmann war nicht banal. In: Die Welt, 28.8.1999.

Hillel, Marc/Caron, Richard: Operation Eichmann. Paris, 1961.

Horkheimer, Max: Zur Ergreifung Eichmanns (1960/1967). In: Ds., 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Aus Vorträgen seit Kriegsende, hrsg. von Alfred Schmidt, Frankfurt 1967, 317-320.

Hull, William L.: Kampf um eine Seele: Gespräche mit Eichmann in der Todeszelle.Wuppertal 1964.

Huth, Werner: Adolf Eichmann. Ein Fall von pathologischer Ideologie. In: Glaube,Ideologie und Wahn: Das Ich zwischen Realität und Illusion. München 1984.

Jäger, Herbert: Makrokriminalität: Studien zur Kriminologie kollektiver Gewalt.Frankfurt a. M. 1989.

Jäger, Herbert: Verbrechen unter totalitärer Herrschaft: Studi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Gewaltkriminalität. Frankfurt a. M. 1982 (erstmals erschienen 1967).

Jansen, Hans: Der Madagaskar-Plan: Die beabsichtigte Deportation der europäischen Juden nach Madagaskar. München 1997.

Jaspers, Karl: Die grundsätzlich neue Art des Verbrechens. In: Wohin treibt die Bundesrepublik? München 1966, 58-66.

Jaspers, Karl: Television interview by Thilo Koch, March 10, 1960 (broadcast on August 10). Frankfurter Allgemeine, August 17, 1960.

Kárny, Miroslav: Nisko in der Geschichte der “Endlösung.” In: Judaica Bohemiae 23, no. 2 (1987), pp. 69-84.

Kaul, Friedrich Karl: Der Fall Eichmann. Berlin (Ost) 1963.

Kelen, Emery: “Bureaucrat or Beelzebub?” Atlas 2, no. 2 (August 1961), pp. 125-27. Kempner, R. M. W.: Eichmann und Komplizen: Mit Dokumentenfaksimiles. Zürich,Stuttgart, and Wien 1961.

Klarsfeld, Serge: Vichy-Auschwitz: Die Zusammenarbeit der deutschen und französischen Behörden bei der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 in Frankreich.Nördlingen 1989 (Schriften der Hamburger Stiftung für Sozialgeschichte des 20.Jahrhunderts. Bd. 9).

Knopp, Guido: Hitlers Helfer: Die Täter: Adolf Eichmann, Martin Bormann,Joachim von Ribbentrop, Roland Freisler, Baldur von Schirach, Josef Mengele.München 1996.

Kogon, Eugen: Nicht der Einzige-Nur eine Anmerkung zum Fall Eichmann. In:Frankfurter Hefte 15, 1960, Heft 7.

Kolbe, Christian: “Und da begann ich zu überlegen. ” Adolf Eichmanns zwiespältige Erinnerungen an sein ungarisches “Meisterstück”. In: Fritz Bauer Institut (Hrsg.),Im Labyrinth der Schuld: Täter, Opfer, Ankläger. Frankfurt a. M./New York, 6593. (Jahrbuch 2003 zur Geschichte und Wirkung des Holocaust / A yearbook on the history and impact of the Holocaust.)

Koning, Ines de: A Study of Adolf Eichmann (1906-1962): Adolf Hitler’s Expert in Jewish Affairs. Newton, Mass., 1964. (Self-published by Diss Newton College of the Sacred Heart; highly speculative and a fund of Eichmann legends.)

Krause, Peter. Der Eichmann-Prozeß in der deutschen Presse. Frankfurt a M., New York 2002. (Wissenschaftliche Reihe des Fritz Bauer Instituts 8).

Krummacher, Friedrich A. (Hrsg.): Die Kontroverse: Hannah Arendt, Eichmann und die Juden. München 1964.

Kühnrich, Heinz: Judenmörder Eichmann: Kein Fall der Vergangenheit. Berlin (Ost) 1961.

Kulcsár, Shlomo: “The Psychopathology of Adolf Eichmann.” In Proceedings of the IVth World Congress of Psychiatry. Madrid, 1966.

Kulcsár, Shlomo, Shoshanna Kulcsár, and Lipot Szondi: “Adolf Eichmann and the Third Reich.” In Crime, Law and Corrections. Edited by Ralph Slovenko.Springfield, Ill., 1966.

Kulcsár, Shlomo: “De Sade and Eichmann.” Mental Health and Society 3 (1976), pp.102-13.

Lamm, Hans: Der Eichmann-Prozeß in der deutschen öffentlichen Meinung.Frankfurt a. M. 1961.

Landau, Ernest (Hrsg.): Der Kastner-Bericht über Eichmanns Menschenhandel in Ungarn. München 1961.

Lang, Berel: Act and Idea in the Nazi Genocide. Chicago and London, 1990.

Lang, Berel: The Future of the Holocaust: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Ithaca, N.Y.,and London, 1999.

Lang, Jochen von: Das Eichmann-Protokoll: Tonbandaufzeichnungen der israelischen Verhöre. Mit Nachwort von Avner W. Less. Berlin 1982.

Lauryssens, Stan: De fatale vriendschappen van Adolf Eichmann. Leuven 1998.

Lawson, Colin: “Eichmann’s Wife Speaks.” Daily Express, December 12, 1961.

LeBor, Adam: “Eichmann’s List: A Pact with the Devil.” Independent, August 23,2000.

Levai, Jenö: Abscheu und Grauen vor dem Genocid in aller Welt… Diplomaten und Presse als Lebensretter: Dokumentationswerk anhand der “streng geheim”bezeichneten Akten des Reichsaussenministeriums. New York 1968.

Levai, Jenö (Hrsg.): Eichmann in Ungarn: Dokumente. Budapest 1961.

Levine, Herbert S: Politik, Persönlichkeit und Verbrechertum im Dritten Reich.Der Fall Adolf Eichmann. In: J. Bergman/Kl. Megerle/P. Steinbach (Hrsg.),Geschichte als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Sozialökonomische Ansätze, Analyse politikhistorischer Phänomene, politologische Fragestellungen in der Geschichte. Stuttgart 1979.

Linze, Dewey W.: “LIFE and Eichmann.” Newsweek, December 5, 1960.

Longerich, Peter: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Hitler und der Weg zur “Endlösung”.München, Zürich 2001.

Lozowick, Yaacov: “Malice in Action.” Yad Vashem Studies 27 (1999), pp. 287-330.

Lozowick, Yaacov: Hitlers Bürokraten: Eichmann, seine willigen Vollstrecker und die Banalität des Bösen. Zürich, München 2000.

Malkin, Peter Z./Stein, Harry: Ich jagte Eichmann. München, Zürich 1990.

Man, Peter/Dan, Uri: Capturer Eichmann: Temoignage d’un agent du Mossad. Paris,1987.

Meding, Holger: Flucht vor Nürnberg? Deutsche und österreichische Einwanderung in Argentinien 1945-1955. Köln 1992.

Meding, Holger: Der Weg: Eine deutsche Emigrantenzeitschrift in Buenos Aires 1947-1957. Berlin 1997.

Miale, F. R., and M. Selzer: The Nuremberg Mind: The Psychology of the Nazi Leader. New York, 1975.

Mikellitis, Edith: Der verlorene Sohn. Anmerkungen zum Fall Eichmann. In: 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 Heidelberg 32,1961, 269-70.

Milotová, Jaroslava: Die 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 in Prag. Genesis und Tätigkeit bis zum Anfang des Jahres 1940. In: Theresienstädter Studien und Dokumente, 1997, 7ß30.

Moser, Jonny: “Nisko. The First Experiment in Deportation.” Simon Wiesenthal Center Annual 2 (1985), pp. 1-30.

Moser, Jonny: Die 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 in Wien. In: Kurt Schmid/Robert Streibel, Der Pogrom 1938: Judenverfolgung in Österreich und Deutschland. Wien 1990. (2. Aufl.)

Mulisch, Harry: Strafsache 40/61. Eine Reportage über den Eichmann-Prozeß.Schauberg, Köln 1963.

[Mulisch, Harry: Criminal Case 40/61, the Trial of Adolf Eichmann: An Eyewitness Account. Philadelphia, 2009.]

Naftali, Timothy: New Information on Cold War: CIA Stay-Behind Operations in Germany and on the Adolf Eichmann Case. Nazi War Crimes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 Washington, D.C., 2006.

Naftali, Timothy: “The CIA and Eichmann’s Associates.” In U.S. Intelligence and the Nazis. Edited by Richard Breitman. Washington, D.C., 2004.

Nellessen, Bernd: Der Prozess von Jerusalem: Ein Dokument. Düsseldorf , Wien 1964.

Nicosia, Francis R.: Ein nützlicher Feind. Zionismus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1933-1939. I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37, 1989, 367-400.

Nicosia, Francis R.: “Revisionism Zionism in Germany II. Georg Kareski and the Staatszionistische Organisation, 1933-1938.” In Yearbook of the Leo Baeck Institute 32 (1987), pp. 247ff.

Onfray, Michel: Le songe d’Eichmann: Précédé de’un kantien chez les nazis. Paris 2008.

Oppenheimer, Max. Eichmann und die Eichmänner: Dokumentarische Hinweise auf den Personenkreis der Helfer und Helfershelfer bei der “Endlösung.”Ludwigsburg 1961.

Orth, Karin: Rudolf Höß und die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 In: Werkstatt Geschichte 18, 1997, 45-57.

Paetzold, Kurt/Schwarz, Erika: “Auschwitz war für mich nur ein Bahnhof”: Franz Novak - der Transportoffizier Adolf Eichmanns. Berlin 1994.

Paul, Gerhard: “Kämpfende Verwaltung.” Das Amt IV des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es als Führungsinstanz der Gestapo. In: Gerhard Paul, Klaus-Michael Mallmann(Hrsg.), Die Gestapo im Zweiten Weltkrieg: “Heimatfront” und besetztes Europa. Darmstadt 2000.

Paul, Gerhard: Von Psychopathen, Technokraten des Terrors und “ganz normalen Deutschen.” In: Ds. (Hrsg.), Die Täter der Shoah: Fanatische Nationalsozialisten und ganz normale Deutsche? Göttingen 2002, 13-90.

Pearlman, Moshe: Die Festnahme des Adolf Eichmann. Frankfurt a. M. 1961. (Vor dem Prozess veröffentlicht und nach Pearlmans eigener Auffassung teilweise unhaltbar.)

[Pearlman, Moshe: The Capture and Trial of Adolf Eichmann. New York, 1963.(Published before the trial and by Pearlman’s own admission unsupportable in places.)]

Pendorf, Robert: Mörder und Ermordete: Eichmann und die Juden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Hamburg 1961.

Pohl, Dieter: Die Ermordung der Juden im Generalgouvernement.” In: Ulrich Herbert (Hrsg.),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ernichtungspolitik 1939-1945: Neue Forschungen und Kontroversen. Frankfurt a. M. 1998, 98-121.

Pohl, Diet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Judenverfolgung in Ostgalizien 1941-1944:Organisation und Durchführung des Massenverbrechens. München 1996.

Poliakov, Léon: “Adolf Eichmann ou le rêve de Caligula.” Le Monde Juif. Paris, June 4, 1949.

Poliakov, Léon: Harvest of Hate: Background to the Eichmann Story Introduced by Lord Russell of Liverpool. London, 1960.

Proces Eichmanna: Sprawy Miedzynarodowe. Warsaw, vol. 14, no. 8, 1961.

Rabinovici, Doron: Instanzen der Ohnmacht: Wien 1938-1945: Der Weg zum Judenrat. Frankfurt a. M. 2000.

Ranasinghe, Nalin: “Ethics for the Little Man: Kant, Eichmann, and the Banality of Evil.”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36 (2002), pp. 299-317.

Rappaport, Ernest A.: “Adolf Eichmann: The Travelling Salesman of Genocide.”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o-Analysis 3 (1976), pp. 111-19.

Rein, Raanan: Argentina, Israel, and the Jews: Peron, the Eichmann Capture and After. Bethesda, Md., 2003.

Reitlinger, Gerald: Die Endlösung. Hitlers Versuch der Ausrottung der Juden, 19391945. Berlin 1956.

[Reitlinger, Gerald: The Final Solution: Hitler’s Attempt to Exterminate the Jews of Europe, 1939-1945. London, 1987. ]

Reyna, Mariano. “El caso Eichmann: ” Todo es Historia (Buenos Aires) 116 (January 1977), pp. 6-20.

Reynolds, Quentin: Adolf Eichmann, Henker von Millionen. In: Sie und Er (Zofingen) 37 (January 5—March 30, 1961), pp. 1-13.

Reynolds, Quentin/Katz, Ephraim/Aldouby, Zwy: Adolf Eichmann. Der bevollmächtigte des Todes. Konstanz, Stutthgart 1961.

[Reynolds, Quentin, Ephraim Katz, and Zwy Aldouby: Minister of Death: The Adolf Eichmann Story. London, 1961. ]

Ritzler, B. A., and L. Saradavian: “Sadism and the Banality of Evil as Factors in Nazi Personalities: A Rorschach Analysi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Convention. Washington, D.C., August 1986.

Robinson, Jacob: And Crooked Shall Be Made Straight: The Eichmann Trial, the Jewish Catastrophe and Hannah Arendt’s Narrative. Philadelphia, 1965.

Rosenkranz, Herbert: Verfolgung und Selbstbehauptung: Die Juden in Österreich 1938-1945. Wien, München 1978.

Rotenstreich, Nathan: “Can Evil Be Banal?” Philosophical Forum 16, nos. 1-2 (198485), pp. 50-62.

Rupnow, Dirk/Anderl, Gabriele: Die 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 als Beraubungsinstitution. Wien 2002.

Sachs, Ruth: Adolf Eichmann: Engineer of Death, New York, 2001.

Safrian, Hans: Die Eichmann-Männer. Wien, 1993. Dt. Ausgabe: Eichmann und seine Gehilfen. Frankfurt a. M. 1995.

Safrian, Hans: Adolf Eichmann. Organisator der Judendeportation. In: Ronald Smelser (Hrsg.): Die SS: Elite unter dem Totenkopf. Paderborn 2000, 134-146.

Sandkühler, Thomas: Eichmann war kein Subalterner, der nur Befehle ausführte.Interview in: Die Welt, 16.8.1999.

Schechtman, Joseph B.: “The Mufti-Eichmann Team.” Congress Bi-Weekly,November 7, 1960, pp. 5-7.

Scheffler, Wolfgang: Hannah Arendt und der Mensch im totalitären Staat.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45, 1964, 19-38.

Scheffler, Wolfgang: “Diese Notizen sind der Versuch, sich verständlich zu machen”. Interview in: Die Welt, August 14, 1999.

Schmidt, Regina/Becke, Egon: Reaktionen auf politische Vorgänge: 3 Meinungsstudien aus der Bundesrepublik. Frankfurt a. M. 1967.

Schneppen, Heinz: Odessa und das Vierte Reich: Mythen der Zeitgeschichte. Berlin 2007.

Schubert, Günter: Post für Eichmann. In: Wolfgang Benz (Hrsg.): Jahrbuch für Antisemitismusforschung, 15, 2006, 383-393.

Schüle, Erwin: Die strafrechtliche Aufarbeitung des Verhaltens in totalitären Systemen. Der Eichmann-Prozeß aus deutscher Sicht. In: Forster, Karl (Hrsg.):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für die Bewältigung historischer und politischer Schuld in Strafprozessen. Würzburg 1962, 63-86.

Schwelien, Joachim: Jargon der Gewalt. Frankfurt a. M. 1961 (Vom Gestern zum Morgen, 14).

Segev, Tom: Simon Wiesenthal: Die Biographie. München 2010.

[Segev, Tom: Simon Wiesenthal: The Life and Legends. New York, 2010.]

Selzer, Michael: “On Nazis and Normality.” Psychohistory Review 5, no. 4 (March 1977), pp. 34-36.

Selzer, Michael: The Murderous Mind: Psychological Results of Tests Administered to Adolf Eichman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November 27, 1977, pp. 35ff.

Selzer, Michael: Ein Angreifer, zu nackter Grausamkeit fähig. In: Der Spiegel,2/1978.

Servatius, Robert: Exclusiv-Interview mit Eichmann-Verteidiger. In: Allgemeine Jüdische Wochenzeitung, 21.4.1961.

Smith, Gary (Hrsg.): Hannah Arendt Revisited: “Eichmann in Jerusalem” und die Folgen. Frankfurt a. M. 2000.

Sommer, Theo: Adolf Eichmann, Ostubaf. a. D. Der Mann am Schalthebel der Hitlerschen Vernichtungsmaschine. In: Die Zeit, 3.6.1960.

Sontag, Susan: “Reflections on ‘The Deputy.’ ” 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London,1994.

Sösemann, Bernd: “Viele NS-Quellen sind schlecht ediert.” Interview in: Die Welt,18.8.1999.

Stangneth, Bettina: Antisemitische und antijudaistische Motive bei Immanuel Kant?Tatsachen, Meinungen, Ursachen. In: Horst Gronke u. a. (Hrsg.): Antisemitismus bei Kant und anderen Denkern der Aufklärung. Würzburg 2001, 11-124.

Stangneth, Bettina: Adolf Eichmann interpretiert Immanuel Kant. Vortrag Uni Marburg 2002 (ungedruckt).

Steinacher, Gerald: Nazis auf der Flucht: Wie Kriegsverbrecher über Italien nachÜbersee entkamen. Innsbruck, Wien, Bozen 2008.

[Steinacher, Gerald: Nazis on the Run: How Hitler’s Henchmen Fled Justice.Oxford, 2011.]

Steur, Claudia: Eichmanns Emissäre. Die “Judenberater” in Hitlers Europa. In:Gerhard Paul/Klaus Michael Mallmann (Hrsg.): Die Gestapo im Zweiten Weltkrieg: “Heimatfront” und besetztes Europa. Darmstadt, 2000, 403-436.

Strasser, Peter: Verbrechermenschen: Zur kriminalwissenschaftlichen Erzeugung des Bösen.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1984.

Szondi, Leopold: Blindanalyse der Triebteste Adolf Eichmanns. In: Ds., Kain:Gestalten des Bösen. Bern 1969, 175-176. (Blindgutachten zu Eichmanns SzondiTest.)

Vogel, Rolf (Hrsg.): Der deutsch-israelische Dialog: Dokumentation eines erregenden Kapitels deutscher Außenpolitik. Teil 1 Politik. Vol 1-3. München 1987-88.

Volk, Christian: “Wo das Wort versagt und das Denken scheitert.” Überlegungen zu Hannah Arendts Eichmann-Charakterisierung. In: ASCHKENAS -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r Juden 16, 2006, 195-227.

Wassermann, Heinz P: “Lang lebe Deutschland, lang lebe Argentinien, lang lebeÖsterreich …” - Der Prozeß gegen Adolf Eichmann: Eine Analyse historischer Bewußtseinsbildung durch die Tagespresse. In: Zeitgeschichte 20, 7-8, Jul/Aug.1993, 249-259.

Weber, Gaby: Daimler-Benz und die Argentinien-Connection: Von Rattenlinien und Nazigeldern. Berlin/Hamburg 2004.

Weibel-Altmeyer, Heinz: Jagd auf Eichmann. In: Neue Illustrierte, 11.6.19608.7.1960.

Weinke, Annette: Die SED-Begleitkampagne zum Jerusalemer EichmannProzeß. In: Ds. Die Verfolgung von NS-Tätern im geteilten Deutschland: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1949-1969 oder: Eine deutsch-deutsche Beziehungsgeschichte im Kalten Krieg. Paderborn, München, Zürich, Wien 2002,151-157.

Weissberg, Alex/Brand, Joel: Die Geschichte des Joel Brand. Köln 1956.

Weitz, Yehiam: The Founding Father and the War Criminal’s Trial: Ben Gurion and the Eichmann Trial.” Yad Vashem Studies (2008), 211-52.

Weitz, Yehiam: “The Holocaust on Trial: The Impact of the Kasztner and Eichmann Trials on Israeli Society.” Israel Studies 1, no. 2 (December 1996), pp. 1-26.

Wiesenthal, Simon: Großmufti-Großagent der Achse. Salzburg,Wien 1947.

Wiesenthal, Simon: Ich jagte Eichmann: Tatsachenbericht. Gütersloh 1961.

Wieviorka, Annette: Procès de Eichmann - 1961. Brussels 1989.

Wighton, Charles: Eichmann: His Career and Crimes. London, 1961.

Wildt, Michael: Die Judenpolitik des SD 1935-1938: Eine Dokumentation. München 1995.

Wildt, Michael: Eichmanns Götzen. In: Die Zeit, 23.3.2000.

Wildt, Michael: 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Das Führungskorps des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es. Hamburg 2003.

Wildt, Michael (Hrsg.): Nachrichtendienst, Politische Elite und Mordeinheit: Der Sicherheitsdienst des Reichsführer SS. Hamburg 2003.

Winkler, Willi: Der Schattenmann: Von Goebbels zu Carlos: Das mysteriöse Leben des François Genoud. Berlin 2011.

Witte, Peter: Warum Eichmann bewußt Details verschweigt. In: Die Welt, 21.8.1999. Witte, Peter: Adolf Eichmann unterschlägt bewußt entscheidende Fakten. Der Judenreferent deportiert zielstrebig für seinen Führer. In: Die Welt, 24.8.1999.

Wojak, Irmtrud: Eichmanns Memoiren: Ein kritischer Essay. Frankfurt a. M. 2001.(Wissenschaftliche Reihe des Fritz Bauer Instituts Bd. 8)

Wojak, Irmtrud: Fritz Bauer: 1903-1968: Eine Biographie. München 2009.

Wojak, Irmtrud: Über Eichmann nichts Neues. Interview in: Frankfurter Rundschau,11.8.1999.

Wolfmann, Alfred: Eichmannprozeß: Berichte aus Jerusalem. Düsseldorf 1962.(Schriftenreihe für die gewerkschaftliche Jugendarbeit, Hrsg. V. DGBBundesverband).

Wucher, Albert: Eichmanns gab es viele: Ein Dokumentarbericht über die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 München, Zürich 1961.

Wyss, P.: Eichmann in Jerusalem. In: Hans Saner (Hrsg.), Karl Jaspers:Provokationen. Gespräche und Interviews. München 1969.

Yablonka, Hanna: The State of Israel vs. Adolf Eichmann. New York, 2004.

Yahil, Leni: “‘Memoirs’ of Adolf Eichmann.” Yad Vashem Studies 18 (1987), pp.133-1 62.

Yahil, Leni: Die Shoah. Überlebenskampf und Vernichtung der europäischen Juden.München 1998.

Zachodnia Agencja Prasowa, ed.: Eichmann. Poznan, 1960. (Materials and Commentaries, No. 5 XI, 1960)

Zimmermann, Moshe: An Eichmanns Aufzeichnungen kommt kein Historiker vorbei. In: Die Welt, 17.8.1999.

Zimmermann, Moshe: Aufzeichnungen eines Mörders. In: Allgemeine Jüdische Wochenzeitung, 16.3, 2000.

#### 紀錄片

Adolph Eichmann: The Secret Memoirs. Regie: Nissim Mossek, Alan Rosenthal.Israel, Netherlands: Biblical Productions, EO Television, 2002.（《阿道夫·艾希曼：秘密回憶錄》）

Der Fall Adolf Eichmann: 40 Jahre Entführung und Verhaftung. Regie: Sabine Keutner. Deutschland, Mainz: ZDF, 3sat, 2000.（《阿道夫·艾希曼案：綁架和逮捕40年后》）

Der Spezialist. Regie: Eyal Sivan, Rony Brauman. Deutschland/Frankreich/Belgien/Österreich/Israel, 1998.（《專家》）

Eichmann, der Vernichter. Ein Film von Guido Knopp, Jörg Müllner, Stefan Simons.München: BMG Video/Universum-Film München, 1998. (Hitlers Helfer II). （《希特勒的幫手II：毀滅者，阿道夫·艾希曼》）

Eichmanns Ende. Regie: Raymond Ley. Hamburg: docstation für NDR, SWR, 2010.（《艾希曼的末日》）

Eine Epoche vor Gericht. Regie: Peter Schier Gribowsky. Deutschland: NDR1961.（《一個上法庭的時代》）

Engineer of death: The Eichmann Story. Regie: Paul Bogart. USA: Robert E. Costello, Talent Associates, CBS, New York, 1960.（《死亡工程師：艾希曼的故事》）

Erscheinungsform Mensch: Adolf Eichmann. Regie: Rolf Defrank. Hamburg: Aurora Television Produktions, 1978-1979.（《人的表現形式》）

I captured Eichmann. Regie: Michael Sandler. Belgium: Belbo Film Productions BV,1980.（《我捕獲了艾希曼》）

I met Eichmann/Adolf Eichmann-Begegungen mit einem Mörder. Regie: Clara Glynn. BBC/NDR 2002.（《阿道夫·艾希曼——邂逅謀殺兇手》）

Josef Mengele: The Final Account. Regie: Dan Setton. Israel: SET Productions,Jerusalem, 2002.（《約瑟夫·門格勒：最終決算》）

The Devil Is a Gentleman. Interviewer: Mike Wallace. USA: CBS New York, 1983.（《惡魔是一個紳士》）

Lechidato shel Adolf Eichmann/Eichmann: The Nazi Fugitive. Regie: Dan Setton.Israel: SET Productions, Jerusalem, 1994.（《獵捕阿道夫·艾希曼》）

The man who captured Eichmann. Regie: William A. Graham. USA/Argentina:Butcher’s Run Films, Stan Margolies Company, Turner Pictures, 1996.（《捕獲艾希曼的那個人》）



